  长期以来，官方与民间对海外华人人数的统计数字，存有巨大的歧异。有学者估计，全球海外华人高达3975万余人1；但也有以下不同的估算：2426万余人2；3402万余人3。其间的差额落差甚大。而国别的海外华人之统计数字，则更是纷呈杂沓，使人难以适从，以印尼为例，就有以下不同的数字：500万人4； 600万余人5；450万余人6；及1千万人7。

       海外华人统计的欠缺准确性，因素复杂，举其荤荤大者有以下数端：A. 除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欧、美、澳、日若干先进国家的较具精确统计外，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都缺乏精确的统计。原来人口普查是项重大的课题，涉及庞大的人力、财力与物力，须作科学性的调查。而在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华人零星散布各地，穷乡僻壤，穷山恶水，无不有华人的足迹。尤其是20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放宽移民条例，华人移民偷渡浪潮汹涌澎湃，华人新移民无孔不入，流动性甚大，难以追踪，因而影响到调查的正确性。B. 海外华人居留境外，天长地久，已适应了海外的生活，把异乡视为家乡，并世代相传，已入籍当地成为居留国国民，有些人甚至不承认自己为华人。而近二三十年的新移民，也利用入籍之便，有利于谋生之道，毅然入籍。这些入籍的新旧移民，在各国人口普查中，是“本国国民”呢？还是“海外华人”？不同的标准，大大地影响到统计数字。C. 几百年来，海外华人先民与当地妇女结合，世代繁衍生息，这些混血后裔无论在语言、血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与形态上，已完全同化于当地，融入主流社会。各地具有华人血统的混血儿，都有不同的名称，人口普查的归类标准，也影响到海外华人人数的多寡。

海外华人之被称为“华侨”，大抵滥觞于19世纪80年代。随着革命浪潮的澎湃，尤其是邹容著作《革命军》的广泛流传，以及孙中山与其支持者的普遍使用，一时“华侨为革命之母”的呼声传遍各地，广大人民也以“华侨”自居，并引以自豪8。在此之前，中国的官方文献及民间著述，多以“唐人”、“汉人”、“华人”、“华民”、“华工”或“华商”等名称称呼海外华人。或有意更正确指出移民的地域性，多用“闽粤人”、“闽人”、“粤人”、“漳泉人”、“广府人”或“潮州人”等。“华侨”的原意是指短期侨居海外的中国人，终有一天落叶归根，回归故土，中国才是华侨的祖国。

       自推翻清朝帝制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加强内部组织，以巩固中国的统一，并增设中央党部海外部，积极笼络“华侨”的民心，取得一定的成效。

       战前的国民政府，对海外华人的国籍，一直奉行“血统主义”的原则，即“凡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不论他出生于何地，父母是何人，都是中国籍民。”国民政府尽量设法提高华侨的爱国意识，维系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适值日军侵华时期，华侨出钱出力，回国参军，抗敌救国，高度发挥了华侨的爱国精神。

       战后几十年来，“华侨”一词仍被国民政府所沿用。首先是自1949年国民政府溃败退守台湾后，困守孤岛，挣扎图存，并以此为基地，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以图有朝一日“反攻大陆”。为了笼络华侨，积极推动（华）侨（事）务。直至今天，台湾国民政府仍奉行“血统主义”，把海外具有中国血统的人视为“华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萧规曹随，沿用旧有的华侨政策，本着血统主义的原则，视海外华人为中国籍民。不过这也给中国带来很多麻烦，“华侨”常被诬指为中国的“第五纵队”，制造纷乱与麻烦；也被指为盘剥者与寄生虫。为了缓和与邻国的种族矛盾，以突破外交上的孤立，中国政府毅然放弃了血统主义的原则，1955年与印尼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标志了中国政府国籍法的改弦易辙。在该政策下，中国政府鼓励居留地华人参与当地政治，成为当地籍民，今后不再是“华侨”身份，而改变为“华人”。倘若不愿加入居留地国籍，则保有中国国籍与侨民身份，须遵从当地法律。所以中国官方及民间学术人员，已经对“华侨”与“华人”作了明显的界定，所谓“华侨”，即指居住在海外、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华人”则是指入籍居留地，成为他国公民的中国人。不过尽管“华人”是指入籍居留地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但就其血缘及文化而言，仍然是倾向中华民族属性及中华传统文化9。

       以上的不同称谓，都是以“中国人”为核心，与“（外籍）华人”的身份并不完全吻合。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经过了长期繁衍与成长，其思维、价值观及国家认同等方面，与中国境内的中国人大相径庭。为进一步区别起见，官方文件及学术界又创立了“华裔”一词。“裔”是“后代”、“血统”，其涵义较明确，涵盖面也较“华人”广泛，一般上指入籍的华人，及第二、三、四代或更长远的华人移民后裔，他们是具有较淡薄、或完全没有中国意识的族群。所以我们说“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即具有美国籍的华人；“华裔新加坡人”（Chinese Singaporean），即指拥有新加坡国籍的华人。他们与中国境内的中华民族不同，王赓武教授甚至说这些人是“不再认为自己是华人的华人后裔”10。此外也有用“华族”（Ethnic Chinese）来泛指“广大华人族群”的。构成“华族”的成员是出生于当地，加入居留地国籍，并全盘认同于居留国的华人。也有人给“华族”下了如下的定义：由保持华人意识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稳定群体，是当地族群之一，构成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

       再谈谈“海外华人”一词的称谓。有人认为该词是以中国为核心，“海外华人”有依附中国而存在的寓意，与海外华人的身份与独立性不相吻合，似乎把海外华人边缘化，具有贬义，因此建议用“全球华人”或“世界华人”来取代，但这又使人联想到包括“中港台”的中国人，容易引起混淆。不过“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一词已被学者广泛采用，泛指中港台以外的华人。

 海外华人是个庞大而复杂的族群，他们在不同时期到全球各地移殖、定居，并世代繁衍下来。他们来自中国各省各县，口操各地区不同的方言，南腔北调，彼此不易沟通。他们受到传统思想的浸濡，尊崇儒道释的宗教信仰，祭拜关公、妈祖及地方神祇，并延续中国的传统习俗。不过由于经过数个世纪的繁衍，时移境迁，潜移默化，已经有不少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受到当地的同化，中华族群意识淡化，其中华文化的传统也日渐消失了。

       战后十余年间，中国与世界局势，都发生了风云激荡的剧变。在中国，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政府剑及履及，雷厉风行，推动了一连串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消急传来，是也非也，海外华人茫然不知所措，从而亦动摇了多年来“落叶归根”的意念。至于在海外华人的居留地，民族主义运动激昂澎湃，殖民地要求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争取自治独立。不幸的是，大多数主导独立国的政客，抱持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以土著利益至上，推动排华运动，企图从政治与经济上置华人于死地。在这危机四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华人挣扎求存之道，便是入籍居留地，成为当地公民，寻求法律保护的权益。入籍居留地的前提，便是华人须改变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观念，从认同于中国改变为认同于居留国。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掀起入籍的序幕以来，经过了数十年来奔走与波折，才完成了华人的心愿。

       华人的入籍居留国，在不同的国家，其境遇也不同。大抵而言，新马较顺利，大约50年代末即已解决。印尼与菲律宾则满途荆棘，由于官员的刁难，繁文缛节诸多麻烦，所以华人必须利用旁门左道，破财消灾，通过贿赂的手段，才能完成心愿。直至80年代，入籍问题基本上才迎刃而解。至于泰国华人之入籍，鉴于两族历史渊源的深厚以及长期以来的种族和谐相处，因此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中印半岛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缅甸与寮国，到了80年代，也基本上解决了入籍间题。

       另一方面，不同的东南亚国家，其文化认同的程度不一。有些国家如新马，华人分别占了全部人口的76%与25%，族群意识强烈，所以维系了以华文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有些国家，华人人数虽多，但占整个人口的比例小，如印尼与菲律宾，长期以来受到执政者文化的摧残，华社与华教备受压制，以致华人同化程度较深，相对地中华文化日薄西山。不过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崛起，影响所及，中华文化有绝处逢生、扭转乾坤的态势。

       另一类型的海外华人，则是完全同化的混血华人。经过了数百年来的异族通婚，生儿育女，语言相互吸纳，生活习俗融化，其后裔已被当地土著融化，血统上呈现大混合，在形貌上已与汉人大异其趣了。

       混血华人普遍存在于东南亚各国，在新马称为峇峇娘惹（Baba Nyonya），在印尼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在菲律宾称为中菲混血儿（Mestizo），在泰国称为洛真（Lukjin），在越南称为明乡（Minh Huong）。新马、印尼、菲律宾等地的混血华人，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与社会上，都高居重要地位。

       混血华人也普遍存在于南太平洋地区。如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大溪地与西萨摩亚，他们有的在经济上崭露头角，有的在政坛上出人头地，如新几内亚的陈仲民爵士，就曾经两度荣任总统。

       混血华人也散布在印度洋各岛及非洲，如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留尼汪岛及南非等地。至于南美洲的秘鲁、墨西哥、古巴、智利、洪都拉斯及巴西等国，也无不散布着混血华人的足迹，其人数之多，社区之广，较之其他发展中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公元前221 - 206年）、汉（公元前202 - 公元220 年）时期，中国人已通过海路与陆路，与中亚、东南亚及东北亚发生联系与交往。此后历经唐（618 - 907年）、宋（960 - 1127年）及元（1271 - 1368年）, 前往海外的中国人络绎不绝，他们大多是商贩与僧侣，也有官方使节。而中国沿海一带，也崛起了泉州与广州等国际商港，商船辐辏，万商云集，形成了一幅繁华的景象。明（1368一1644年）清（1644一1911年）之际，尽管官方明令海禁，禁止人民移民海外，但利之所在，移民海外的浪潮仍此起彼伏。有的从此定居海外，与当地妇女成婚，于是东南亚各地如巴达维亚、马六甲、旧港、北大年、宋卡、马尼拉及堤岸等地的华人社区先后出现。

       从鸦片战争（1840一1842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间，除了短期问受到客观因素的遏制外，中国移民呈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其间更出现了波澜壮阔、空前未有的高潮。

       鸦片战争标志了丧权辱国的肇始，在西方帝国的侵略下，中国小农经济走向解体，农民失去了土地耕作，手工业者也大量破产，导致失业浪潮澎湃。民不聊生，横尸遍野，广大的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另谋出路。而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也在19与20世纪的长期间，加深了对殖民地经济的拓殖与剥削。在东南亚，随着港口的兴建，城市的发展，交通的铺设，亟需中国劳工。在美洲、非洲及澳洲等西方殖民地，随着亚热带经济作物如香料、咖啡与甘蔗的种植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庄园经济日益扩大，对劳工需求迫切。于是，广大的中国移民，以自由民或契约劳工的身份，从中国城乡往世界各地去服劳役。

       百年间经历过高潮与低谷。20世纪20年代是移民的高潮，30年代却陷于低谷。兹以新加坡与印尼为例加以说明。自1922至1930年间，作为转口贸易站的新加坡，因胶锡市价看俏而受惠，工商业繁荣，经济蓬勃发展，城市建设扩展，亟需劳工；加上中国政局动荡，民心思动，所以南来移民倍增。1926年，登陆新加坡的中国移民高达34万8593人，翌年更创下了35万9262人的纪录11。印尼亦呈现移民激增的趋势。20世纪20年代，印尼的经济蓬勃发展，造成华人移民蜂拥而至，介于1920年与1930年间，高达42万4175人12。然而，到了 1930年，全球金融陷入萧条，经济急剧衰退，胶锡价格暴跌，工商业不振，失业浪潮澎湃，民生凋敝，饿殍遍野。这期间，新加坡与印尼等地的移民都呈现负面的增长。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初期，欧、美、加、澳等国废弃了战前的限制移民政策，大开方便之门，广纳各国移民，以致在三十多年间，涌现了几股华人移民大浪潮。首先是在50、60年代，香港新界的客家人，大批迁徙到英国去。在 1967年英国4万5千名华人中，有约3万人是从新界移居过来的。新界的移民及其后裔，嗣后又辗转流落到欧洲其他城市去。

       与此同时，在印尼掀起了另一股移民潮。1949年印尼宣布独立后，一批又一批华人（多数是土生华人）相继移居荷兰。1959至1968年间，印尼爆发了多次排华运动，许多华人惨遭杀害，财物被掠夺，房屋被焚毁，华人成了惊弓之鸟，纷纷向外逃亡，有的逃到欧、美、澳，有的逃到港台与新加坡，更多华人逃往荷兰去安身。

       自1975年越南赤化后，境内华人惨遭迫害，难以生存，南越华人被迫沦为“船民”，投奔怒海，很多“船民”不幸葬身鱼腹，沉冤海底。欧、美、澳、加等国家基于人道立场，予以接纳收留。美国收留的印支华籍移民，估计有30 万至40万人。澳洲接纳了约4万人，法国收留了7万至8万人，英国、加拿大、荷兰、德国及意大利等欧美国家，也接纳了成千上万的印支华裔难民。

       此外，亚洲国家（如新马、泰国、菲律宾）、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的华人移民及其后裔，也纷纷以留学生与移民身份，再移民到欧美先进国家去，造成欧美各国的新移民人数激增。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西两大集团对立，中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政府也严禁华人出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站在同一阵线的国家，反共抗俄，禁止中国移民入境，也不许华人返国省亲，因此50与60年代出国的移民浪潮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状态。

       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政府开始放宽出国条例。而随着中国的进入联合国，中美的僵局开始解冻，东南亚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打开移民大门。这期间出境的移民，大抵是以“家庭团聚”为由出境的，人数虽不多，但已开始涌动出国潮。1982年4 月，中国政府更宣布给予归侨、侨眷出境探亲特殊照顾，规定“只要对方不限制，我方应尽快批准”。而欧美国家也基于人道主义，并视移民出国是意识形态的胜利，因此国人多被批准出国。

       80年代以后迄今，中国移民又呈现了另一高潮，他们一批又一批涌向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有些是公费或自费的留学生，有的是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但更多的是农村及乡镇的群众，他们知识水平低下，又无一技之长，因此“要致富，就偷渡”，冒着生命的危险，受尽人蛇集团的盘剥，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此外，大批来自港台、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也纷纷向西方发达国家进军。据美国世界移民报告估计，每年移往外国的中国移民超过40万人，其中美国、加拿大、欧洲及澳洲等发达国家是新移民的首选地；而南美、南太平洋国家则是转向发达国家的中转站。另据福建科学院的调查，1980至1999年间，大陆新移民由正常途径移居外国的超过100万人，其中移往美国、西欧、澳洲和日本的有90多万人。目前大陆新移民约为300万人，加上非法移民，估计人数已超过400万人。

       经过战后几十年新移民轮番大洗牌之后，原先华人的分布状况与各大洲华人所占比例与增长率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倘若比较20世纪50年代与2005年两个不同的阶段，各大洲所占比例的变化如下：亚洲从96.45%滑落至78.7%；美洲从2.12%跃升至14.4%；欧洲从0.31%骤升至4.1%；大洋洲从0.81%晋升至1.7%；非洲则从0.31%晋升至0.39%。又根据一项统计显示，1980年代各大洲增长率如下：亚洲2.4%、美洲8.0%、欧洲3.2%、大洋洲8.5%及非洲2.1%。

  亚洲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地区，总人口超过3000万。仅仅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就占了全亚洲华人总人口的90%以上，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和越南的华人人口皆超过百万。

        最早定居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大抵滥觞于15世纪初年。那时，在马来半岛、印尼群岛及印度支那的商港，已有闽粤移民建立起来的聚落，只是规模不大，聚落人数从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华人大规模迁徙到东南亚，始于19世纪下半叶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鸦片战争标志了华人移民的分水岭。

        早期华人移民多来自广东省及福建省。广东省包括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与海南人，福建省主要是漳州、泉州及厦门人。他们有的以自由移民的身份出国，凭着刻苦耐劳及坚韧不拔的精神，赤手空拳，闯出一片天；也有的以契约劳工（卖猪仔）的身份应聘而来，从事开荒拓土、修路开矿的工作，流血流汗，把榛莽丛林化为绿油油的农园。

        华人移民埋头苦干，克勤克俭，经营各行各业，创造财富。华人的经济活动，以商业为主，商业资本最为雄厚，也以经商的业绩最为辉煌。嗣后，华人资本家又把企业扩大到工业、种植业、建筑业、地产业、服务业与金融业等等。随着时日的推移，华人开始具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大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东南亚各国更冒起了不少华人企业财团，它们以雄厚的财力，展开跨国与多元化的业务，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如马来西亚的郭氏家族、印尼的三林集团及菲律宾的陈永栽家族等等，都是赫赫有名的华人企业集团。

        在战前，除了土生土长的华人外，绝大多数的中国移民都以中国国民自居，期盼有朝一日，便落叶归根，回归故国。但战后时移势迁，归国无期，华人不得不改变身份，代之以落地生根的观念。改变国家认同的思维，归化为当地公民。时至今日，大部分华人均已入籍，与当地人共存共荣。

        过去的华人“在商言商”，不过问政治。但战后以来，为了适应时势变迁，华人不得不参政议政。至于曾经盛极一时的华校、华团及华报，在某些国家里，一度被禁止和封闭。不过自中国崛起，尤其是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批中国移民涌入全球各地，亚洲的形势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华社注入了一股新生的力量，似乎有春回大地的迹象。

        在东南亚以外的亚洲国家，定居华人人数相对较少。除了日本有70余万华人以外，其他地区如南亚、西亚与中亚，在上世纪70年代前，只有零零落落的华人。70年代以后，港台、中国大陆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情势才大大改观

新加坡

新加坡坐落在赤道边缘，平均海拔不到15公尺。这个集国家、首都、城市于一体的袖珍型岛国，得到上天格外的眷顾，不受火山、地震、海啸与飓风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它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为连接亚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的交通咽喉。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登陆占领后，锐意把新加坡发展为转口贸易站。由于它地理位置优越，水深港阔，适合船只的停泊及货物的搬运，加上后来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使远近各国商人蜂拥而来经商。

       1959年新加坡举行新宪制下议会大选，人民行动党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土生华人李光耀荣任自治邦总理。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成员包括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与沙巴。然而，因为政治理念的分歧，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之初，缺乏天然资源的新加坡政府面临难题重重，前途茫茫。原本已高达14％的失业率，在1971年英军撤退之后更为严重，如何养活200万人民，成了政府最头痛的问题。

       此外，错综复杂的种族问题也是国家发展的绊脚石。那时，新加坡各族之间的猜疑频生，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亦出现紧张的局面。同时面临内忧外患，新加坡政府当时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幸得李光耀等的精英领袖们运用过人的睿智，实施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加上全民同心，最终才化险为夷，迈向成功的大道。

       如今，华人与各族之间互相信任，和睦共处。经过举国上下40多年来的努力建设，终于成功将新加坡打造成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井然、民生安乐的典范国家，并先后被权威机构评选为亚洲地区最具竞争力，生活素质最高、犯罪率最低、及最适宜居住、工作和休闲的国家。占新加坡全国总人口超过四分之三的华人，也安享着这个花园城市的安逸与舒适。

* *新加坡是梵语“狮子”的谐音。据《马来纪年》记述，1150年左右，苏门答腊室利佛逝王国的一位王子乘船到此时，看见一头狮子，于是称之为“Singa（狮子）pura（城），后来也把它简作为“星洲”或“星岛”。*

   新加坡华人有积极向上、坚韧不拔的特性，他们所面对的压力越大，就越能发挥扭转乾坤的魄力，并且具有放眼世界的远大视野。新加坡的发展过程，同时亦是华人苦尽甘来的血泪史。

       早在14世纪中期，已有福建泉州人来到这里经商。元朝商人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一书中，将新加坡称为“淡马锡”（Temasek，马来语 “海城”之意），这个源自梵文Tamarasa的词，意即“黄金”，仿佛预告了新加坡将来势必欣欣向荣的前景。

       1819年，莱佛士乘船在新加坡河口一带盘桓，试图在印度与中国之间寻找并建立一个贸易站。独具慧眼的莱佛士，看准了当时还是沼泽地的新加坡有巨大的发展潜能，于是从柔佛统治者手里租下这片土地。 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属殖民地，并因地理优势而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马六甲与当年称为槟榔屿的槟城）的行政中心。

       莱佛士在这里设立贸易站的消息一经传出，便有华人移民从四面八方接踵而来。最早到达的华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自马六甲、槟城的海峡华人，男性称峇峇、女性则叫娘惹。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发展得非常成功，成为海峡华人中的商业巨擎，例如薛佛记、陈笃生、陈金声等人。而另一批受过英文教育的海峡华人，则成为专业人士，为殖民政府所用，是海峡华人社会中较有地位的一群，著名的有林文庆、宋旺相等人。第二类是来自邻近的马来半岛及印尼群岛的华人，他们企图到此闯出一片天。第三类则是来自中国广东和福建沿海一带，也是华人移民最大的群体。1821 年，第一艘载满自由移民及契约华工的帆船从厦门开抵新加坡，自此以后，登陆新加坡的华人移民源源不绝。

       在这一批远洋南来的华人移民中，以福建人居多，其他的是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与海南人。殖民地政府把他们安置在不同的社区，如福建人聚集在直落亚逸 （Telok Ayer）和厦门街（Amoy Street）；潮州人在新加坡河畔；客家人在克罗士街 （Cross Street）落脚；广府人则聚集在现今已发展为唐人街旅游区的牛车水一带。

       直至鸦片战争（1840至1842年）之前，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可谓细水长流，逐年增加。1840年，岛上的华人已有约1万7千人，占了总人口的一半，成为最大的族群。但自鸦片战争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百年间，除了经济萧条或其他特殊原因外，掀起的一波波华人移民浪潮，其波澜之壮阔令人瞩目。尤其是1926年及1927 年，移民浪潮达致顶峰，每年入境的华人高达35万人。

从早期新加坡华人家庭的留影中，已经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融合，男性身穿西服，其妻则穿着传统服装。

20世纪40年代，由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所发出的“华侨登记证”。

       从华南来的移民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移民，另一类是契约华工，亦称“苦力”或“猪仔”。自由移民是指那些自备旅费南来的移民，登陆新加坡后，对任何人都没有义务，行动自由，有权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是构成移民的主体。

       而契约华工，则是指那些来自农村的贫农或城市失业的贫民，受人利诱拐骗而来，如猪仔般被贩卖到农园或矿地工作，受尽折磨。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845年到1875年之间，是苦力贸易的鼎盛时期，新加坡成了著名的苦力贸易中心，牛车水一带“猪仔馆”林立。

       早期，不同籍贯的华人有着不同的职业分野。福建人、潮州人多数经商务农，同时又在银行、橡胶业有所建树；广府人擅长木工、水泥工、矿工、造船、经营酒楼及杂货店；客家人则多是裁缝、鞋匠、铁匠；海南人先是从事农业，之后多为洋人包办伙食，或在洋人家庭里帮佣，他们多数对经营咖啡店颇有心得，海南咖啡更是远近驰名。来自广东三水,刻苦坚强的“红头巾”妇女是牛车水当年建筑业的主要劳工。她们头戴红头巾、身穿篮色碎花衣服及黑色裤子，出现在早期新加坡的许多建筑地盘里。南洋大学、文华大酒店及中国银行等宏伟建筑物，都沾染了她们辛勤劳动的汗水。“红头巾”三水妇女为新加坡的建筑发展付出了不少的血汗，闹市中立有她们的塑像。

       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超凡卓越的智慧，是华人能够在新加坡站稳脚跟的主要因素。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他们开始涉足橡胶、罐头加工、肥皂制造等轻工业及金融业。此后，华人的经济发展日趋完善，百花齐放。

       二战期间，新加坡曾被日本占领，华社遭到巨大的冲击，数以万计的华人被无辜杀害。战后，英殖民政府恢复了对新加坡的统治，实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的政策，移民活动宣告结束。不过，由于自然增长率所使然，新加坡华人在战后的十年依然激增，直至 1957年，增加了37万人，其中约30万人是当地出生的。

       新加坡建国后，政府深知人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于是积极招揽精英。随着中国大大放宽人民出境的限制，及在1990年正式与新加坡建交后，大批中国新移民才陆续移居新加坡。这些来自中国的商人、科研专才、知识分子、留学生及劳工，成了新加坡华人的一分子，与土生土长的华人共同为社会作出了不少贡献。

*19世纪的华人移民以男性占大多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到了20世纪初期，新加坡的华人女性移民才逐渐增多。尤其是在1930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政府实施移民限制法令，严禁男性入境，妇孺则不受限制，于是女性移民激增，才使新加坡华人男女比例的差距日益缩小。*

      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华工移民浪潮期间，华人的祖辈们受尽了皮肉之苦，饱尝了精神折磨，为的仅是能过上安逸的日子，求得足以温饱的生活。

       他们或许曾梦想过，将来有这么一天，一个安逸而富足的福地会出现，并渴望自己有幸在这样的一个人间乐土上快乐地过活。他们万万没想到，当年自己不屈不饶的努力，造就了这个梦想——新加坡，一片大家打造出来的福地真的出现了。

       今日的新加坡，一般人民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粮仓囤积了充足的米粮；每一天，都有形形色色的蔬菜水果从各国源源输入；超过80% 的国民都“居者有其屋”；交通系统四通八达，各类的公共交通工具更是日夜不停地川流不息；摩天大厦林立，展现了动感之都的魅力；全岛的绿化更让新加坡成为姹紫嫣红的花园城市国家。

       在此处，衣食住行样样都方便，这不就是我们的祖辈们，当年只有在梦里才敢想象的世外桃源吗？

       新加坡是两岸三地以外，世上唯一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在占全国总人口超过75％的华人人数当中，福建人约占40%；潮州人约20%；广府人近20%；客家人则不足一成。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虽然华人在人口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无论在任何领域，每个种族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华人依然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与其他族群公平竞争。

       尽管当年如猪仔般被卖到全球各地当劳工时，华人曾是受尽欺压凌虐的一群，但今日的新加坡华人，在努力打造了全球公认的安居乐业之地后，与他族共享这个人人向往的理想家园，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宽容的好榜样。

牛车水的马来名称是“Kreta Ayer”（此乃古时的拼字法，若依现今的规范马来文则应写作“KeretaAir”）,意为水车早年的新加坡没有自来水供应，人们只好用牛车把安祥山（Ann Siang Hill）的井水运载到住在这里的各家各户，故华人惯称此区为“牛车水”。另一种说法则是，为了冲洗尘土飞扬的街道，当地居民每天都用牛车从远处把水运来，故得此名。如今，牛车水的老房子和金融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展示着新加坡的过去与未来。华人是新加坡经济的火车头，活跃于各个领域，也乐于和其他族群共同努力把国家经济一再推向高峰。

       独立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茁壮，新加坡华人的资本紧依政府经济策略的调整，从传统行业转向新兴科技工业。1968年新加坡成为全球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华人的金融服务业更是突飞猛进，全速发展。旅游业则是华人多元经济领域的另一重要支柱。新加坡华人从事的职业无所不包，从祖辈的传统生意，到新兴工业都有华人经营。

       由于出色的经济发展，新加坡涌现大批财力雄厚的华人财团和富商，在世界富豪排行榜当中，新加坡华商至少有十位入榜，其中包括远东集团的创办人黄廷方、大华银行的总裁黄祖耀、城市发展的执行主席郭令明、银行界的翘楚邱德拔家族、华侨银行的前主席李成伟等，都是闻名的杰出华人。不少长袖善舞的华人企业家更进军海外，建立了家喻户晓的国际品牌。新加坡华资企业成功转型，也引领着更多年轻华裔创业家，从新加坡境内走向国际。

       新加坡有许多已属百年基业的华人企业，品牌深入民心，如“余仁生”传统保健品、“广祥泰”调味品、“美珍香”食品等，不仅长期占领国内市场，还成为知名的国际品牌。20世纪后期的高科技产业也羽翼丰满，纷纷在国外建立据点。如今，由华人经营的优质品牌在国外设立多家分店的新闻已是司空见惯。

       在多家华资银行当中，以大华银行和华侨银行的资本最雄厚，除了在新加坡国内有上百家分行外，其业务已扩展到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此外，近年来新加坡的中资企业已有2000家左右，是海外中资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也纷纷进驻新加坡，并在此挂牌上市。

       除了在商界发展，也有新加坡华人选择加入政府机构当公仆，为民服务。与其他国家的华人相比，这里有较多的华裔青年投身警、军界，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此外，在新加坡的华人专业人士也不少，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等，齐心协力地为这个发展一日千里的国家付出，同时也为他们本身带来了美满富足的生活。

  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政府，其行政管理向来举世瞩目。政策对症下药，效率协调统一，也继承了中国古代“父母官”的作风，对国民的照顾就像父母待子女般，不分种族，从住房、医疗、水电补贴；到结婚、生育、养老各方面，凡事考虑周到。政府甚至细心地为人民充当红娘，设立专门替未婚男女介绍理想结婚对象的官方机构。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可谓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

       新加坡华人奉公守法也是举世闻名的。绿灯未亮，哪怕路上无车行驶，华人还是不会越过雷池半步；排队守序也是新加坡华人自小养成的好习惯。用餐时分，生活节奏快速的华人停下急促的脚步，耐心地排队等候入座。在文明修养方面，为世界华人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这里是个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多元的移民社会，“家和万事兴”，华人深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促进族群融洽的重要性，从不因是第一大族群而恃势凌人。

       大多数新加坡人对政治不热衷，并非出于不关心，而是因为政府家长式的管理，早已为人民打点好一切，人民根本毋需为衣食住行等等的烦恼而操心，只需尽情享受生活。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成就，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就是首任总理李光耀及他的优秀团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多少国家的执政者难以实现的“居者有其屋”理想，新加坡却做到了。这里逾80％的人民居住在政府组屋内，这是一种由政府投资兴建、价格大众化而设施完善的单元楼房。

       许多新加坡华人家庭都对组屋充满独特的情感。这种与熟食中心、各类店铺、诊所等连成一片的独特住宅区，有着外表看来朴实无华的房子，里面却宽敞舒适，楼房有两房、三房、四房及五房式，是不少华裔子弟诞生、成长和养老的地方。

       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下，政府极力发展组屋区，打破了早期的新加坡华人依籍贯聚居在不同地区的格局，把各种族、籍贯的人民安置在同一个屋檐下。政府还为选择居住在父母家附近的子女提供购屋津贴，鼓励子女发扬孝敬父母的优良传统。

       华人与各族人民在组屋区可享有优渥的福利和完善的社区设施，游乐场、托儿所、菜市场、小贩中心、休闲公园等设备一应俱全，且环境优美、鸟语花香。他们甚至可在组屋底层举办婚礼、丧礼或烧烤会。另外，同一个社区内的组屋之间都由有盖走廊连在一起，大部分还会连接到巴士站，让大家在出门或步行到巴士站时，不必日晒雨淋，非常贴心。

       不仅如此，组屋的底层还辟有“学习角落”（Study Corner），为那些喜欢清静读书的人提供了好去处。每个学习角落都有十来张桌椅，可以容纳二三十人。有的是供单人使用的桌椅，有的是两张桌椅连在一起，让一个小组的成员进行讨论。此外，学习角落还提供了电风扇、公共电源插座等设备，十分方便。

       在组屋的公园区内，还备有各型各类的简单运动器材和娱乐设施，有些范围较大的社区，甚至还有四五个不同球类的球场，力图让人们住得舒适、活得健康。难怪有些华人其实已经有能力住在高级公寓或独立洋房，却情愿与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住宅区“长相厮守”。

       然而，还是有一部分较注重隐私，又不介意多付一些生活费的华人，选择住在私人公寓。这是一种由私人发展商兴建、入口处有门卫把守的高层楼房；较为富裕的家庭，则住在独家独院的房屋。

       新加坡土地资源有限，却保留了52公顷的土地建设植物园，甚至在高楼组屋或商场顶楼也建有美丽的空中花园。这里葱笼苍翠，赢得了 “花园城市”的美誉。

       无需被混乱的交通状况弄砸一整天的心情，也是新加坡华人所拥有的幸福。这里的各类公共交通设施完善，快捷方便。华人经常挂在嘴边的“MRT”，就是新加坡地铁的英文简称，如今所设立的路线几乎遍布全岛，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巴士往往准时抵达巴士站，误点几率超低；日夜川流不息的德士也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即使没有私家车，华人出外也不会有任何不便。

       想要拥有汽车的华人，最关注的课题莫过于“拥车证”，这是根据每年淘汰车辆的数量所发放的证件，让有意购车者竞标，中标者才可购买汽车。华人时刻关注拥车证的价格，情况就如香港人每晚打开电视留意楼盘价格那般“紧张”。这些车主平日的话题也避不开俗称“ERP”的“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即为了控制车流量而在闹市设立的先进电子收费区。这两项措施让人口密集的新加坡，并没有其他大城市交通拥挤的烦恼。

       此外，华人缴付水电费、电话费以及其他杂费，完全不必赶在上班时间与他人挤在一块儿，因为全岛都有随时可办理付费手续的先进设备，就连租借电影光碟、购买邮票，也不必劳驾任何店员，即使是三更半夜也没有问题。新加坡华人的钱包内，多数也不会少了乘搭地铁所需的“易通卡”，定期给这种亦可在某些商店当作现金卡使用的小卡片加额，也成了本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能够生活在“亚洲美食天堂”，对民以食为天的头号拥护者新加坡华人而言，是一桩幸福美事。好些新加坡华人或不精通向旅客介绍当地的旅游景点，但是一谈及美食，肯定会忍不住说个不停，如数家珍。中文媒体也一直热衷于推广各项“美食运动”，几乎每份中文报章都缺不了美食专栏。

       这里汇集了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欧洲的多种美食，各类菜系相互交织渗透，并且日益“新加坡化”，是岛国多元文化另一层面的真实写照。

       具有代表性的新加坡华人美食多不胜数，海南鸡饭、肉骨茶、粿汁、叻沙、鲜蛤炒粿条、蚝煎、福建炒虾面、沙爹米粉、炒萝卜糕、卤面、鱼丸面等，全部都远近驰名。新加坡四面环海，华人品尝海鲜的热衷程度自然是不在话下。海鲜的种类和吃法很多，如胡椒螃蟹、辣椒螃蟹、碳烤魔鬼鱼、醉虾、烧烤虎虾、奶油虾、龙虾沙西米、清蒸石斑鱼、铁板生蚝以及各种各样的贝类，其中辣椒螃蟹这道佳肴，更是华人向外国人推荐狮城特色美食的头号首选。

       此外，充满地方色彩、南洋风情的各式甜点也是独树一帜的消暑良品，如红豆冰、杂果冰、仙草荔枝冰、海底椰、文头雪、蜜瓜西米露、摩摩喳喳、红宝石，以及结合了本地特产的水果如榴莲、红毛丹、红毛榴莲的许多新旧口味甜品，都深受大家喜爱。

       与马来和印度同胞相处了好几代，华人也十分喜爱融合马来或印度风味的辣食，如咖哩鱼头、亚三叻沙等；一些娘惹佳肴及娘惹糕点——多数由椰浆、班兰叶、糯米、糖等食材制成的美食，五颜六色、小巧玲珑、风味独特。同时，各籍贯的华人也热衷将家乡小食进行改良，综合新加坡风味并发扬光大，成为新加坡的独创美食，如潮州人的水粿、客家人的酿豆腐等。

       新移民也带来了各自家乡的美食。如今，川菜、北方菜、湖南菜、台湾菜或上海小吃餐馆，如雨后春笋遍布各个角落，令新加坡华人拥有更多选择，大饱口福。

       有人说新加坡华人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这一点都不夸张。餐饮业在这富而小的岛国里发展蓬勃，除了餐馆，还有无处不见的熟食中心。无论是在观光区、办公区、工厂区、购物中心、社区中心或地铁站附近，华人都可轻易找到熟食中心，品尝不同风味而又价格廉宜的佳肴。因此，熟食中心里往往都可看见人头涌动的华人食客。身在富裕的社会里，进食对华人来说已不仅是为了充饥，而是一种生活的乐趣。

       碰上美食节，他们更是举家出动，热闹欢腾，常让外国人体验到新加坡人热爱美食的盛况。除此之外，常年轮流上阵的电器展、科技展、书展和旅游展，也是人山人海，热络不绝的华人往往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新加坡华人家庭的周末，永远不寂寞。

       购物、旅游，都是新加坡华人主要的消遣活动。新加坡华人消费能力高，每逢周末或假日，无论是售卖日常用品的商店或是名牌专卖店，都是人潮汹涌。如果碰上大型促销活动，更会出现全家总动员疯狂抢购的画面，因此有人打趣地把购物形容为新加坡华人的全国性运动项目。

       而华人人龙出现得最为频密的另一个地点就是投注站。生活在平静安逸的国度里，合法的赌博活动成了许多华人小市民喜爱的消遣。大彩、多多和万字票投注站无所不在，超市或便利店内也可见其踪影。在一些投注站，许多华人风雨不改地在固定时段排队下注。“小赌怡情”——许多新加坡华人的座右铭。他们盼望通过这小小的投资，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早日成真。每逢周末，新加坡克兰芝赛马场也非常热闹，当然少不了华人的身影。

       新加坡华人很喜欢出国旅游，到外面去感受更广阔的天地。隔岸的马来西亚成了他们的主要选择之一，只要越过一条新柔长堤就可以到彼岸，尽情享受消费较低的吃喝玩乐及购物之旅。这里的旅行社也备有许多两、三日出国游的配套，让他们在无后顾之忧下享受出国游玩的乐趣。

       平日勤奋工作的新加坡华人很懂得慰劳自己，就算没时间出国，他们也会到东海岸或附近的岛屿，租间度假屋或搭上帐篷，游泳、滑水、烤肉，不亦乐乎。再不就三五成群到克拉码头（Clarke Quay）的酒吧一边观赏足球联赛电视直播一边聊天、去舞厅跳舞松松筋骨、结伴高唱卡拉OK，或到新加坡的旅游景点去消磨时光。

       新加坡华人与全球华人一样，对教育十分重视，更何况这里是竞争激烈的国际大都会，教育可谓是他们的人生大事。经济能力许可的华人家庭，送孩子出国深造是平常不过的事情。

       在这里，多数华人都懂得至少三种语言。早期的华人是以地方语言如福建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兴化话或广西话为主，通马来语，初通华语，及少许的英语；现代的华人则方言、华语皆通，并懂得说英语。不只通一种方言者也大有人在，若是父母分属不同的籍贯，邻居或朋友又属另一方言群体，相互交流的日子久了，自然就懂得对方的方言。

       新加坡政府把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并列为官方语文，但鉴于英语的国际地位及作为各族群消除语言隔阂的共同语，而给予高度重视，是所有学生必学的语言。同时，政府也注重母语教育，培育双语精英。许多国际名流选择把孩子送到新加坡来求学，正是看中了这里可以很好地掌握双语的学习环境。

       教育工作者洪丽环说道：“这里一般的学校从幼稚园到中学，都备有华文这一科目任华人选读，除非你放弃母语课，否则，是没有所谓华人在学校无法学习华文这回事的。”

       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有人讲华语的环境中，就算是平常较喜欢以英语来沟通的年轻华人，还是能说得上一口流利的华语。随着许多中国新移民的到来，华语更成了大街小巷最为普遍听到的日常用语。近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备受世人重视，因此把华语学好已成了新加坡华人的全民运动。政府也相当支持这类运动，鼓励大家多讲华语的电视广告片段、四处张贴的相关宣传海报从来没有间断过。

       尽管这里严禁学校或媒体使用方言，如把香港的粤语或台湾的闽南语电视节目和电影经过规范的华语配音后才可播放，但新加坡年轻华人依然能够向主要的方言使用群——他们的长辈讨教学习。香港和台湾流行文化的盛行，也间接有助于新一代掌握广府话及福建话。

       对于中华文化，老一代的华人都很珍惜。新生代尽管也不乏热爱中华文化者，但毕竟受西式教育的影响，难免还是有些洋化了。新加坡著名的文化人韩山元分析说：“大体而言，新加坡华人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受传统华文教育者，这都是一些老人，属于稀有品种；第二类是边缘人，他们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左右逢源。现今的大多数年轻人即属此类别，他们既懂中文，又通晓英文，具有很大的优势；第三类则是彻底洋化的华人，极其推崇西方文化，但这种华人还是属于少数。”

       现实生活中，在新加坡的任何一个角落，招牌、路标和广告上依然可以看到熟悉的方块字；在街头巷尾仍然能够听到亲切的华语。虽然英语成了主要的工作语言和官方用语，但是华语依然是最多新加坡华人使用的日常语言。然而，华人在各种社交场合还是体现出对其他种族的包容。只要有一名友族同胞在场，大家都会很自然地用英语来沟通，真正贯彻了社会大同、民族和谐的宗旨。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新一代新加坡华人的生活过得舒适安逸，有高科技玩物伴随着他们成长，又不必为柴米油盐操心，必定觉得自己很幸福。其实，他们也有充满压力的一面，忙碌的学习生活构成了许多无形的压力，密密麻麻的时间表，不断催促着孩子们“赶场”。

       根据统计，约96％的新加坡孩子有参加各类的课外补习班。补习中心的布条、传单及广告满街招摇，招生广告日日见报，以致有人戏称“补习补习，不补没出息。”来形容这个状况。

       对新加坡华人家庭来说，课业补习不过是一顿孩子必进的“正餐”，许多华人家长还会为孩子提供学习绘画、音乐、舞蹈、书法、中国画、手工艺品等的“营养补助”，欲培养孩子成能文能武的国家栋梁。

       这群新华人身在可轻易购得新颖科技产品的大都会，加上处于资讯发达的年代，所以在勤读书、忙工作之余，也会把时间花在打电动、用时髦的随身听聆赏音乐，以多功能的智慧型手机与朋友上网聊天等等；有表演天分的则积极参加各项艺能竞赛，以期踏上明日之星的康庄大道。

       此外，许多华裔青年也活跃于义工活动、服务社会、或献身文化事业；各类大型的活动，不论是严肃的庆典，还是文化艺术表演的场合，他们都会帮忙维持秩序。双十年华的方洋，就是其中一名经常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等单位服务的在籍女学生。她表示：“申请担任义工的过程很简单，只要到各主办单位的网站去浏览，哪些你感兴趣的活动有空缺，就在网上填写申请表格，非常便捷。虽然这类工作都是无薪性质的，但我们其实都只是志在参与，为能够替人文活动贡献一份力量而得到满足感、同时又结交不少朋友，这一些收获才是当义工真正的吸引力。”她的古道热肠，也证实了新加坡的年轻人并非都是只懂得追求物质享受的“月光族”。

       在专门提供给大众进行活动的广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大群活力十足的华人子弟正在练习相声、舞蹈、演讲、舞台剧等。总体而言，新加坡的华人青年都是上进心很强的一群，无论在知识的追求与学习，或是创意的发挥，都能见识到他们的积极。街头上三五成群手提划桨等体育用具或大提琴等乐器的华人青年，兴致勃勃地赶往练习场的画面随处可见。

       老一辈华人，有些清早5点多就起身，邀约数名同好到小贩中心的食阁，叫上一杯香浓的热饮，聊一聊每日的新鲜见闻、或讲述过去的美好回忆，一聊就过了一个多小时。这时，俗称“巴刹”的菜市场内，各类摊档的叫卖声开始此起彼落，渐渐热闹了起来，老人们才言犹未尽地道别，前去巴刹采购当天所需，为上班的儿女准备餐点；有的还相约共饮下午茶，继续天南地北地享受聊天的乐趣。

       也有许多乐龄人士一早便到社区中心、公园或球场练习健身操，扇子舞、太极，甚至舞刀弄枪。清晨时分，他们动作划一地在齐心健身的壮观场面，朝气蓬勃，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新加坡华人在这里生活都深感有安全感，这不单是指人身安全方面，也包括心灵上的安全感。已经60开外的乐龄妇女林爱华坦言，身在新加坡，纵然年纪渐大却不会有感自己的晚年没有保障。“尤其让我欣赏的是，政府为选择住在父母家附近的子女提供购屋津贴，鼓励他们发扬孝顺父母的传统美德，令我们感到十分温暖。这里也有很多照顾老人的措施是很多国家所没有的。在新加坡，年老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语毕，林爱华还露出满足的笑容。

       这里几乎每个社区都设有“老年人活动中心”，里面有各类的娱乐设施，电视机、收音机、游戏牌、象棋、报刊杂志，更少不了爱唱歌的乐龄人士最需要的卡拉OK设备，应有尽有。一些社区甚至还有按摩椅，组屋旁则有公众使用的各类健身设备，适合给乐龄人士们锻炼身体。他们闲来无事，便相约到这里来聊聊天、打打牌，唱唱歌，乐不可支。也有一些身体比较健壮的乐龄人士到小贩中心、快餐店或购物商场从事一些能力所及的工作，有时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消磨时间，或不想与整个社会脱节、或希望能够自力更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

    通晓中英语是新加坡华人立足世界舞台的重要筹码，这优势促使新加坡成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国际走廊，无数的文化活动或节日庆典也让新加坡绽放绚丽的光彩。至于华人传统文化与节庆，老一代的华人珍惜如昔，也保留得周全。

       为了鼓励年轻一代更为热衷了解各节庆的真正意义，新加坡华人民间组织和政府机构近年来积极推广各类华族文化庆典，并加入一些新加坡独有的本土元素，以期华族的传统文化与节庆得以传承下去。新加坡华人最为重视的节庆，就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和中秋节。他们至今还保留着除夕夜吃团圆饭、派红包、穿着红彤彤的新装去拜年、舞龙舞狮等习俗。

       春节来临之际，新加坡可说是满城洋溢着浓厚无比的新春气息。每年元旦刚过，新加坡华人就开始置办年货，买新衣服。春节前家家户户进行大扫除，有些比较传统的华人家庭还要在门上贴春联、倒贴“福”字；除夕夜全家老小在一起吃团圆饭。有些家庭吃过年夜饭后，还会赶到牛车水年货市场，人挤人，凑热闹。到了午夜时分，家长们祭神拜祖先；有的则前往当地著名的两座寺庙——观音堂及天福宫上香祈福。

       张灯结彩、绚丽夺目的牛车水，是体验新加坡华人迎接新春佳节盛况的最理想地方。除了可以观赏年年有新意的春节装饰，那里更是最热闹的年货市场，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年花、色香味俱全的年货、五花八门的装饰品，琳琅满目。春节前的十几天，牛车水夜夜灯火辉煌、人山人海、欢腾的气氛有增无减。随著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去旧迎新的活动就越是高潮迭起，群众尽情选购、讨价还价、情绪亢奋。尽管过了午夜 12时，牛车水的年货市场人潮仍然没有减退，华人多如过江之鲫，忙着享受办年货的乐趣，将牛车水挤得水泄不通。

       大年初一，寺庙前一早便万头攒动，华人争先恐后插头柱香，场面极为壮观。华人在春节期间所吃的食物也很讲究，如鱼象征“年年有余”，年糕代表“年年高升”，发菜是取“四季发财”中发财二字的谐音，桔子表示“大吉大利”等。一些传统习俗如大年初一不能扫地也沿用至今。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华人拜年时有一个特色，就是携带两颗桔子，祝贺对方“大吉大利”，而对方也会礼尚往来，在你道别时奉上两颗桔子作为回礼。

       许多华人企业、社团和家庭在新年时也会一起“捞生”。“捞生” 是以鱼片、姜丝、萝卜丝、辣椒丝、袖子、花生、芝麻等拌成的七彩鱼生，大家用筷子把鱼生高高捞起，边捞边说吉祥语，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捞得风生水起，事事如意。

 在滨海湾举行的“春到河畔迎新年”，也是贺新春的重点活动之一。许多华人到这里猜灯谜、逛年货市场、品尝传统小吃，欢赏港台及本地艺人的歌舞和特技表演，到处人潮汹涌，洋溢着新春气息。    一年一度配合春节而隆重登场的“妆艺大游行”，除了是新加坡人一年当中最期待的节目之一，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特地前来观赏的重大盛会。这个与新加坡华人息息相关的艺术大汇演，为春节注入了现代与时尚的元素。随着夜幕降临，路上就像一个露天的大舞台，一辆辆装饰华美的花车鱼贯登场，各种奇装异服、曼妙歌舞轮番上演，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长达两小时的表演犹如一次梦幻之旅，演出结束之际，烟花绽放，彩带飞舞，人人兴高采烈地涌至马路上，现场瞬间成了公共舞池，将普天同庆的气氛推向最高点。

       农历八月十五是人们赏月吃月饼的中秋佳节。除了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等馅料的月饼外，这里的华人每年都创新不同口味的月饼，如绿茶、黑芝麻、冰淇淋、各类水果味等。然而，最受欢迎的终究是内含咸蛋黄的莲蓉月饼。中秋节当晚，华人会在组屋楼下或庭院内举办称为月光会的赏月会，泡上一壶热茶，品尝月饼和水果，欣赏花灯与月色，有的还会举家到新加坡河畔放河灯祈福。孩子们则提着造型特出的灯笼，呼朋引伴，欢欣快活地四处游行，洒下一路欢笑。

       在婚礼习俗方面，新加坡华人与其他地方华人的情形基本上大同小异，只是西方色彩比较浓一些。通常是未来新郎拜会未来岳父岳母，请求长辈将女儿许配给他，在女方家长答应以后，准新郎、新娘双方家长互赠首饰与佳酿等礼品。于大喜之日当天，新人会向长辈们一一敬茶，之后宴请亲朋好友。除了在酒楼宴客、行夫妻交拜之礼以外，狮城男女结婚的最大特色，是在婚姻局注册后便马上排队申请政府的组屋，共筑爱巢。

    新加坡华人大多信仰佛教或道教，他们在家里设香台，日日烧香祈福，初一十五还固守吃斋的习俗。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也不少，而无神论者日益增长的现象亦愈加显著，约占华人人数的15%。

       民间信仰也深深影响着新加坡华人。早期华人经水路艰苦跋涉到此，因此新加坡大部分寺庙都供奉护航女神妈祖，譬如历史悠久的天福宫和粤海清庙。天福宫在19世纪初由福建人兴建，采用正统闽南建筑风格，主体建筑完全没有用到一根钉子。1973年，天福宫被列为新加坡国家遗迹，如今已是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而粤海清庙建于1827年，1850 年才扩建至今天的规模，前去祈拜的善男信女以潮州人居多。

       其他充满华人色彩的庙宇还包括了坐落在俗称“四马路”的奎因街（Queen Street）的观音堂。此庙常年香火鼎盛，每逢大年初一，信徒都涌往观音堂抢插第一柱香，希望来年鸿运当头。

       新加坡华人成长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因多元种族的环境带来了多元宗教，但这里的回教堂、佛寺、道观、兴都庙、基督和天主教堂一直都融洽地共处。各族间也能更了解各个宗教及文化，避免愚昧的偏见和误解带来不必要的纷争，同时发挥有容乃大的高尚情操。所以，在小印度可以看到回教堂；牛车水可找到兴都庙；阿拉伯街亦设有藏传佛教场所，是难得的和谐画面。

       此外，华人至今仍保留着相当完整的华族丧礼和出殡仪式。如果有亲人过世，他们会在中文报上刊登讣告，有的则是好友至交为亡者刊登挽词，代表对亡者的追思。

       新加坡部分宗乡会馆拥有本身的义山，如福建人的咖啡山、客家人的双龙山和丰永大、海南人的海南山、潮州人的泰山亭和广东人的碧山亭。早期的义山只开放给同乡会员，到了后期才开放予各籍贯人士。

­       随着土地陆续被政府征用，大部分坟场已改建成安放骨灰瓮的灵塔。灵塔一般采用多层式设计，向高空发展，整洁美观。一些义山的设备也趋向多元化，如历史悠久的广东碧山亭建立了先贤碑、公所、安老院等，再经美化，成了寻根问祖的好去处。

 会馆原先是为了办理华人的身后事、或祭祖拜佛而设的。早期很多客死异乡的华人都是举目无亲的一群，因此需要成立理事会来管理坟场、神庙。后来，会馆的作用逐渐扩大到凝聚华人社群的力量。

       华人社团多以地缘、血缘与业缘为组织基础。来自同一乡县的地缘组织，有晋江会馆、花县会馆；同宗同姓的血缘组织，如台山黄家馆、四邑陈家馆；同一行业的业缘组织，如建筑工会、渔业公会等。此外还有许多文化团体，包括运动、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及校友会等；宗教团体包括孔教、基督教等；其他的华人社团还有进行消闲活动的俱乐部等。

       早期的社团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里扮演着维护和发展华人社会的角色，是早期移民的精神依托，也是凝聚华人的重要据点。在新加坡独立初时，这些乡团会馆曾经设立登记站，协助会员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

       今天的新加坡华人社团中，代表多数华人社团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是规模较大的一个。它成立于1986年1月27日，由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广东会馆、福州会馆、南洋客属会馆、琼州会馆及三江会馆为基干，共有183名成员，几乎涵盖所有活跃的宗乡会馆；其宗旨包括：促进新加坡各宗乡会馆之谅解，推动文教和社交活动，及鼓励、赞助研究华人传统文化。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则是最具威望的华人社团，成立于1906年，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商业团体。总商会不但是当地华商最高的领导机构，在国际商业舞台上享有良好的信誉，同时也是世界华商大会的创办机构，并拥有广泛联系世界各地华人企业的商业资讯网站《世界华商网络》 （www.wcbn .com.sg）。

       社团是老一辈华人消磨时间的好去处，而管理工作也多由他们负责。新一代华人平时忙于工作、进修、运动，对参与会馆、社团活动并不热衷，导致许多会馆、社团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新移民对家乡的情感犹浓，于是成了这些社团、会馆的新生力量。近来更出现了不少新的会馆组织，如天府会、华源会、九龙会等，在新移民初到异域，人地生疏之际，及时伸出援手。

       时至今日，好些早期的华人会馆依旧屹立于原处，然而风雨飘摇，当年的盛况已经不再。尽管如此，它们作为华人曾经的依归，也见证了华人的移民史，仿佛是一部对华人子弟诉说着祖辈们的丰功伟业、光荣背后的辛酸血泪故事的播放机。

  阅读中文刊物是许多新加坡华人的日常习惯，新加坡中文报计有《联合早报》、《新明日报》、《联合晚报》、免费双语报章《我报》，以及十余种中文杂志如《I周刊》、《女友》等供选择。邻国马来西亚出版的中文报刊《新生活报》、《中国报》、《民生报》等，在新加坡也购买得到。主流报章《联合早报》每天的销量约有20万份，读者群主要是老一代华人，而新移民的出现，也给中文报刊带来了销量创新高的曙光。

       在新加坡，电视台华语节目的收视率高于英语节目。或许对华人来说，华语还是比较亲切的。华人家庭的餐桌一般都是对准电视机的，而许多华人经营的咖啡店也装上电视机，让食客们时时刻刻都能观赏中文节目。除了8频道及U频道，还有一些须付费的中文有线电视频道。新加坡的中文电台也不少，计有动力频道、城市频道、醉心频道等。

       有人曾批评新加坡重理轻文，是一片缺少底蕴的文化沙漠。的确，文化事业在新加坡不被视为经国大业，但却无疑是受到重视的。新加坡华人推广中华文化活动的努力向来不曾间断过，还将这些活动提升到国际层次，较为突出的有“妆艺大游行”、“新加坡华艺节”、“国际华文书展”、“端午节龙舟比赛”等。

       其实，在文化艺术方面，新加坡是人才辈出的，尤其是近年来，他们竞放异彩，使新加坡不再是文化沙漠，而成了一片绿洲，洋溢着十足的活力。如多元艺术家陈瑞献、戏剧家郭宝坤、享誉海内外的音乐指挥家朱晖、在海外发展的电影配乐师Ricky Ho、著作等身的作家尤今，都是脍炙人口的美谈。

上世纪80年代，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创出了清新质朴的“新谣”，不但开辟了一条属于新加坡华人独有的音乐道路，在全国掀起一股“新谣运动”，同时也崛起成为亚洲中文乐坛的一股新力量。当时的音乐工作者梁文福、许环良、黎沸挥、李伟菘、李思菘等，创作过无数耳熟能详的好作品，多数都在各国华人社会中传唱多年。至今，他们仍是中文乐坛举足轻重的创作人或制作人。

       歌手如孙燕姿、林俊杰、阿杜、蔡健雅也突破地域的限制，凭着悦耳的歌声、丰沛的创作力，征服了歌迷的耳朵，成为全球华人爱戴的新生代偶像。近年来，新加坡的乐坛更是新人辈出，不论幕前幕后都充满潜力，歌手因表现出色而到港台发展的新闻，己让人司空见惯。

       新加坡中文电影亦独具一格，大部分作品都反映了本地华人的心声，因此颇受大家的喜爱。尤其是由梁智强执导的作品，通过嬉笑怒骂的方式，赤裸裸地点出新加坡的社会现象和华人的生活面貌，一系列深受欢迎的电影如《小孩不笨》、《钱不够用》等，让观众在笑中带泪的剧情中找到共鸣。其中一部作品《我在政府部门的日子》，还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一次发表演说时点名谈论。

       除了梁智强的通俗喜剧，文艺气息较浓的导演如陈子谦，曾以新加坡华人独特的七月歌台文化为题材，拍出了《881》电影而掀起一股热潮，引起年轻人关注中元节期间的歌台表演。其他出色的新加坡导演邱金海、唐永健等，一旦有新动向都会引起话题，并在国际间与各国电影业者有良好的互动，是新加坡中文电影界不容忽视的一股动力。另外，新秀导演们频频获奖扬威国外的消息也时有所闻。总体而言，新加坡华人不论在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方面都交出了漂亮的成绩，是华人的骄傲。

       热爱艺术的华人，一年当中总会赴上多场的艺术之约。每当翻开报章的活动介绍栏目，星空下的露天芭蕾舞、湖面上的大型歌剧、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以亚洲各语言进行的剧场表演、热门音乐会不胜枚举，叫人眼花缭乱。经典歌舞剧如猫（Cats）、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也都曾在此上演。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流行乐手或古典音乐名家更是不在话下，几乎每周都有国际巨星到来献艺。

       现今的新加坡华人生活在文化气息浓郁的大都会里，这得归功于政府一直努力把它打造成一个充满艺术与人文气息的环境，以致许多超大型的国际艺术表演、一连串的盛大艺术节不断轮番上阵，而且一般免费供民众观赏，令所有华人艺术爱好者乐不可支。

       幸福的新加坡华人也活在一个注重文明建设的国度里，政府积极耗资建立博物馆、文明馆、美术馆及艺术中心等机构，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又创立艺术学院及戏曲学院，培育更多艺术人才；成立了国家交响乐团及华乐团；而且，每年举办盛大的艺术节，为整个城市增添热闹的气氛。新加坡政府也设立古迹保存机构，不遗余力保护文化遗产。对于有出色成就与创意的文化人，还颁发文化奖，以资鼓励。

       喜欢阅读的华人必定对新加坡每个社区都有一间图书馆的安排，十分感恩。在这里，一家大小前往图书馆借书、参与读书会的热衷程度是令人鼓舞的。印刷业者傅佩佩透露：“新加坡的中产阶级平日的工作时间不短，在家陪伴孩子的时间有限，所以会非常珍惜在周末与他们共处的时光。最常陪他们到图书馆的原因，除了学习，也是因为新加坡的图书馆设有亲子阅读特区，环境的设计又那么地宽阔优美，而且图书馆当局还会常在报章上介绍每周上架的新书内容呢！那种鼓励大家阅读的服务精神，总是叫我万分感动。”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及各分馆中文书籍总数近200万册，占总藏书量的四分之一。目前在新加坡正式的中文读书会，共有20多个，而且还在增长中。至于中文出版社方面，数量虽然不多，但也算活跃，生命力颇强。

     独立40余年后的今日，新加坡仍续写着“华人移民史”，只要有才，移民厅的大门永远敞开。毕竟，对这个天然资源匮乏的国家而言，人才是它最大的财富。

       新加坡生活水平高，使一般年轻华人不愿多生育；加上新一代受英文教育为主，到西方国家发展并不困难，导致社会老龄化的现象进一步加剧。新移民的到来，刚好缓解了这一问题。国父李光耀、前总理兼国务资政吴作栋及多名部长曾异口同声表示，由于华人婴儿生育率偏低，新加坡若要继续发展经济，必须广纳外来人材。

       年轻、高学历、熟练的技能，是新一代移民的最大特征。拥有学术资格或特别技能的新移民，为新加坡各领域提供了较高层次的劳力资源；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健将如冯天薇、李佳薇、陶李等，如今已是新加坡体坛响当当的名字。

       激烈的就业竞争，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是新加坡华人和新移民之间急需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对于新移民，大部分新加坡华人都抱着宽容友善的态度，而新移民也努力克服语言障碍、跨越文化差异，积极融入这个多元社会。

       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也被称为“跨国华人”，他们对祖国和居住国都有所贡献，摆脱了非“落叶归根”即“落地生根”的情感归宿，在两者之间游走，试图在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框架里取得平衡。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特邀研究员、联合早报《新汇点》主编周兆呈认为，在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移民只能说是一大批人的背景符号，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利益社群，不必也无法结合成争取所谓权益或政治地位的特定群体。与其他来源地相比，这在某种程度上却又反证了中国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的有利环境。不过，如今的网络时代、交通工具的便利，移民与出生地的联络成本大大降低，联络机会和能力大大增强，造成出生地和移居地时空同步，在极为便利掌握中国动态的同时，对认同新加坡亦可能形成新的挑战。

       华人迁徙、打拼、融入的故事，在新加坡不断上演，昨日的历史和今日的生活纵横交错，丰富了这个岛国，也为华人社会注入更多元的色彩。

   李光耀是一位极富魄力、高赡远瞩的政治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参政至今，在政坛纵横60余年，直到2015年逝世前，仍在担任内阁资政，关心国事民痪。

       李氏祖籍广东省大埔县党溪乡，1923年9月16日出生在新加坡一个海峡华人的家庭。他曾以优异的成绩，考获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荣誉学位，1949年毕业回国后，取得律师资格。50年代初期，新加坡政治动荡，左翼工会势力庞大，工潮与学潮接二连三地爆发。这时的李光耀，经常挺身而出，为工人与学生辩护。

       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李氏就任秘书长一职。1959年，人民行动党参加新宪制下的自治邦议会大选，在51个议席中赢得43席，组阁成立新加坡自治政府，李氏荣登新政府首届总理，时年35岁。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奈何之后又因双方意见分歧而退出。独立建国之初的新加坡面临经济、国防及民生等诸多难题，幸而在李氏40年的任职总理期间，在同僚的合作、以及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成功突破重重难关。他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使经济多元化；落实工业区，以吸引国外财团来投资设厂；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贪污调查局、解决人民的屋荒困境、进行教育改革，及进行环境绿化等各方面的努力，使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今天新加坡的政府以高效率及廉洁而闻名，人民安居乐业，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李氏率领的政府，创造了“新加坡模式”的奇迹。

       李氏于1990年11月辞去总理职务，自1991年起任总理公署内阁资政至今，仍然对政府的施政积极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卸下总理职务后的李氏，也一直担任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主席，管理新加坡的政府外汇储备。

       李氏在国际上极负盛名，多位政坛名人如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均对他表示赞赏。李氏始终提倡“亚洲价值观”，认为亚洲国家不应全盘依照西方的那一套行事，西方民主不能强加于亚洲人民身上。2000年，李氏获香港中文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2005年，上海复旦大学授予李氏名誉博士学位，表扬他对促进中新两国关系所作出的贡献。

       综观李氏的一生，充满了战斗的色彩。50年代争取自治独立期间，他跟殖民主义者斗争；在治国的道途上，与左翼人士斗争；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后，他又与种族主义者斗争。他一生不息的斗争，显示了其倔强坚韧的个性。而他对新加坡不可磨灭的贡献，使他赢得“新加坡国父”的美誉。

       “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这句话，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南洋大学是中国以外的全球第一所中文大学。1953年，当时的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倡议创办一所中文大学，还率先捐出500万元，并以福建会馆主席的身份捐献该会馆位于裕廊路的500英亩土地作为大学校址。陈六使的呼吁马上获得了华人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大学筹委会很快便成立，且将大学命名为“南洋大学”。

       当年7月，南大破土动工。新马各地的华人掀起了献捐热潮，短时间内就募得数百万元建校基金。南洋大学于1956年1月开始招生，首批录取的新生有330名。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所中文大学诞生了，这是海外中文教育史上空前的创举。至此，新加坡建立了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中文教育系统。

       1958年3月30日，由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主持南大落成纪念碑揭幕礼，社会各界前往观礼者有十多万人，将通往校园的裕廊路挤得水泄不通。

       然而，南大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是一所民办大学，在创办过程中受到殖民政府的多方阻挠；学生毕业后，学位得不到政府的承认、毕业生难以找到理想工作的境况一直困扰大学多年。但是，南大毕业生的杰出表现慢慢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南大的杜会声誉也越来越高。

       到了1968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承认南大学位，但仍未获邻国政府的承认。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迅速发展，华语人才的出路越来越窄，于是1975年在政府的建议下，南大开始将教学语言改为英语。1980年，南大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共组新加坡国立大学。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就是在南大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

       南大开办25年，共培养了1万2千多名毕业生。这些人后来成为新马华文师资的主要来源，也有很多人在商界、政坛、新闻出版界作出了很大贡献。南大虽然消失了，但那份自强不息、逆流而上的 “南大精神”，成了海外华人捍卫中华文化的坚定决心与顽强意志的象征。

  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新加坡华人将会庆祝中元节，与春节相比，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有二，一是被政府分置到不同组屋区的同乡可以趁中元节共聚；二是华人可藉这个节日举行募捐、办义卖会，展开公益活动。

       中元节与佛教的盂兰盆会重合，因此佛道两家都设坛拜祭，使得这个节日热闹异常。一向被世人冠以“清洁国家”的新加坡也不得不为这个节日让步，无论是繁华的市中心或是百姓的住宅区，都会看到华人焚烧冥纸祭品，致使满城灰烬飘绕，蔚为奇观。

       这段期间，华人还会在全岛各地举办超过500场的“歌台”表演，艺人们在台上使尽浑身解数，载歌载舞，流行曲、歌仔戏、诙谐表演悉数登场，以精彩的表演“娱乐”孤魂。通常，舞台下最靠前的一排空着的椅子，是特别预留给阴间“好兄弟”的贵宾座。各类表演除了在全岛的街边和操场唱响，一些社区还会搭起台子，让居民自娱自乐，唱方言歌，跳民间舞，演地方戏，欢腾热闹足足一个月。

       据悉，新加坡是中国以外，传统戏曲保留得最完整的地区。闽剧、潮剧、粤剧等的传统地方剧种和木偶戏，每一年都会把中元节当作展示和延续民俗文化的平台。

 就如看透新加坡社会精髓的著名海外华人研究专家王赓武教授所说：“在这里（新加坡）每个人都是典型的新加坡人，因为他代表这多元族群和文化中的一员；每个人又不是，因为从一个人身上，无法看到真正的新加坡人的全貌，要把很多人放在一起，才是多元。”新加坡华人，也力求达到多元精神。

       马来西亚位于赤道北缘，处于东西方航路要冲。全国分为东马来西亚（东马）和西马来西亚（西马）两个部分，两者之间隔着南中国海。西马半岛共有11州，北依泰国，南临新加坡。东马则有沙巴（Sabah）和砂拉越 （ Sarawak）两州，与印尼的加里曼丹和汶莱为邻。

       公元初马来半岛有羯荼、狼牙修等古国。15世纪初的马六甲（Melaka，中国古籍称为“满刺加”）是个强大的王国，也是个举世瞩目的贸易海港。

       自16世纪起，马六甲先后沦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1874年以后，英国更把势力伸展到整个马来半岛。

       至于东马，砂拉越自19世纪中叶，便受英国人的拉惹王朝所统治，长达105 年。到了1946年才让渡给英国，沦为英国殖民地。另一方面，1870年英国的渣打公司，也先后与汶莱苏丹及苏禄苏丹签订割让条约，取得了沙巴的主权，并于1946年把统辖权拱手让给英国，成为英殖民地。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赢得独立，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了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成立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幅员辽阔，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和石油；还有延绵不绝的沿海区域，渔产取之不尽；境内覆盖的热带雨林，则提供了丰富的林业资源。它得天独厚，既无酷暑也无严寒，更无台风、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的侵袭。而这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上天赐予的一切，他们在肥沃的土地上开荒拓土，辛勤劳动，发展工农矿业，来建立美好的家园。

       马来西亚是多元民族国家，华人作为第二大族群，是除了中国和新加坡外华人比例最高的国家。华人在当地享受着温饱宽裕的生活，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和其他民族和谐相处，早已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了；但他们也依然坚守着从祖辈传承下来的传统习俗，可以说是海外最具中华文化特色的华人社会。

      华人最早移民马来半岛，大抵可追溯到15世纪初的马六甲王朝。 1408年，当明代航海家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他的随从费信曾载述道：“（满刺加）男女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

       到了葡萄牙统治马六甲（1511-1641）初期，马六甲已有一个中国村（Kampong China）；而在荷兰人统辖马六甲时（1641-1824），由于华人人口越来越多，荷兰政府先后委任了七名甲必丹（Kapitan，指华人领袖或头目）来管理华人事务。那时候的华人，大多原籍福建漳州。

       打从那时起，华人已零星地移居到东南亚经商，有的还选择了长期居留。一些华人和当地妇女通婚，其混血后裔被称为土生华人 （Peranakan），或称海峡华人（The Straits Chinese）。土生华人男性也俗称“峇峇”（Babas），女性则称“娘惹”（Nyonyas）。这个特殊族群受到马来人、华人及西方人士的影响，具有驳杂的文化形态，如生活方式接近马来人与西方人，但却保留非常传统的华人风俗习惯，而语言也掺杂了福建话、马来语和英语。

战前的海峡华人，无论在商界、航运界、金融界或专业领域都出类拔萃。1960年代以前，峇峇娘惹在马来亚拥有土著身份，但后来被政府归类为华人。在二战后，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的情形大量减少，后来的混血儿也不再自称为峇峇。因此峇峇族群逐渐没落，迄今仅有少数居住在马六甲和槟城（Pulau Pinang）。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清廷锁国大门，贫穷和战乱迫使许多华南沿海居民离乡背井，远赴南洋谋生。而当时马来亚还是一个人烟稀少、荒凉落后的地方，英殖民政府试图开拓荒土，因此就从印度和中国输入大量的廉价劳工。有迹象显示，早在19世纪初，槟城已输入了中国契约华工。有人甚至被半哄半骗，成了“猪仔”被贩卖至这里。对于未知的土地与未来，这些自愿和非自愿的“新客”（早期定居者对后来者的称呼）只能寄托于命运。

       在“推力”与“拉力”的牵引下，马来亚华人移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高潮。据统计，1871年马来半岛的华人人口为10万5千人；到了1941年，华人已增至261万4千人。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移民来马才基本停止。此后，马来亚华人人口增长，完全依赖自然出生率，而非移民。

       早期华人移民一般先在种植园和锡矿场做苦力稍有积蓄后就转向零售业、饮食业、土产收购、加工业、矿产开发、种植业甚至银行业。当时华人的行业基本上是按籍贯来划分的：福建人多从事港口贸易；海南人一般开咖啡店和餐厅；潮州人集中于种植业及土产贸易；客家人则主要开采锡矿。

       锡与橡胶，曾经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命脉，华人在胶锡的种植、发展与经营上，一直扮演着先驱与策动的角色。当年，华人还一手开发了首都吉隆坡。

       早期，吉隆坡还是个人口稀少的落后小镇，直到一位来自广东的华人领袖叶亚来开发并吸引前来采锡的华人大批涌入后，吉隆坡才逐渐地发展繁荣起来，独立后更成为国家的定都之地。

       砂拉越的华人移民，大抵滥觞于19世纪初年。那时期，在西部的石隆门（Bau）散居着一些客家人矿工，他们都是从西加里曼丹华人金矿地移居过来的。后来受到英国人的武力镇压，华人不得不改行，改种胡椒、甘蜜维生。与此同时，在砂拉越河口的古晋（Kuching），也有潮州人种植胡椒与甘蜜。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人政权的巩固与疆域的扩大，吸引了更多华人移民的到来。境内几条大河流域，也由于华人的增加，经之营之，逐渐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城镇。如拉让江河口的诗巫（Sibu）等，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商埠，是得力于福建闽清人黄乃裳的开发。

       1900年，他与砂拉越统治者签定协约，从中国招募农工来开发诗巫。两年间，共有三批福州人1118名到诗巫拓荒垦殖。此后诗巫华人人口激增，市容面目一新，所以诗巫别称“新福州”。

       沙巴华人的大量移民大概始于1882年。那一年，“英国婆罗洲公司（简称“公司”）成立，试图在沙巴大事扩种烟草，需要大批劳工，于是从广东龙川、五花等地招募一批客籍人士到沙巴来，为数有96人，被安置在古达（Kudat）荒区垦殖。

       嗣后，又有广东东江紫金、惠阳、宝安、东莞及花县等地的客家人继续入境，华人人数因而激增。

       除了香港、华南及海峡殖民地以外，“公司”代理人更到中国北方招募华工，1913年，大概有430多名河北人抵达沙巴，定居在亚庇附近地区。“公司”除了给他们分配耕地外，还给予津贴金。因华工领头是山东人，所以他们的聚落也被称为“山东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司”苦于劳动力严重短缺，因此制定许多有利于移民政策，以鼓励移民携眷前来定居，其中包括免费供应船票给有意前来的移民。此外，他们还可以获得耕地垦殖。新计划果然奏效，在1921年之后，有9千多名华人入境，其中绝大部分是客籍人，包括不少女性，他们大多被安置在东西岸的农地耕作。

       此外还有一大批自由移民入境沙巴。他们或在种植园成为农工，或在城市寻求工作，成为工匠或普通工人。1937年，自由移民的入境人数，就高达7912人。

       直到二战之前，远赴南洋的侨民和家乡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不只等待落叶归根的时机，还主动发起支持祖国的各种运动。当时，华人聚集地之一的槟城正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在海外宣扬革命理念的重镇。

       二战期间，日军侵占了马来亚，当地华人纷纷从戎投军。这段抗日岁月也成了马来西亚华人重要的历史事件。大难当前，华人也对眼前保卫的这块土地产生浓烈的感情，成为日后选择留居此地的一大契机。

       1945年，日军才刚投降，英殖民者又卷土重来。为了歼灭以马来亚共产党为首的武装力量，英政府实施了紧急状态法令，强制把华人迁入临时建立的480个新村里，并用铁丝网与外界隔开，严厉限制他们的行动。如今，除了城市地区，各个新村也是华人的集聚地，拥有浓厚的华人色彩，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57年马来亚独立、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大多数华人对这块土地已产生情感，他们都愿意落地生根，纷纷从侨民身份转变为当地公民。独立后百业待兴，华商们捉住了良好的商机，凭着高瞻的远见和刻苦耐劳的传统美德，逐步把投资扩张到制造业、食品加工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带动了国家经济发展，也为自己立下了稳固的基业。

       人口比例不低的华人在经济上的强大，招致友族的忧虑和猜疑；在一些居心不良的政客煽动下，终在1969年爆发了 “五·一三” 种族冲突事件。此后政府推出了“新经济政策”，试图平衡各族间的财富，增加土著的公司股权，使华人在经济发展方面有所限制。

       但大体而言，华人依然在种种挑战下寻求发展，至今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领域上的表现皆有目共睹。

* *孙中山于1910年11月间在马来亚的槟城开会，密议广州“三·二九”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而在这次起义中栖牲的黄花岗72烈士中也有不少是马来亚华人。此外，华人人口密集的槟城也出了一位兼通中英语言及文化的学者辜鸿铭，除了获得13个博士学位，也是将《论语》、《中庸》翻译到西方的第一人。*
* 马来西亚华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5%。这里奉行出生地原则，多数华人已加入当地国籍。由于战后极少有中国新移民到来，华人现在大多是土生土长的第三、四代。他们早已落地生根把这里当成祖国，并热爱着这块土地。但他们也依然保持着鲜明的华人特色，其中以拥有大中华圈外最健全的华文教育体系，最为人所称道。
* 据研究所示，90%以上的西马华族，聚居在马来半岛西海岸的城镇，包括吉隆坡、槟城、怡保（Ipoh）、马六甲、新山（Johor Bahru）、芙蓉（Seremban）及巴生（Klang）。 至于东马的砂拉越与沙巴，也有同样的现象。砂拉越68％的华族人口，集中在古晋、诗巫与美里（Miri）三大县区；沙巴67％的华人，聚居在亚庇（Kota Kinabalu）、山打根（Sandakan）及斗湖（Tawau）三大县内。
* 当地华人的祖籍多为中国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四省，其中福建又以闽南人、福州人为主；广东则以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最多。各籍贯华人的聚集地也非常明显例如半岛北部多福建人，广东人集中在吉隆坡、怡保等城市地区，而诗巫则是以福州人为主。
* 马来西亚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辽阔的土地，因此人民拥有广大的生活空间。在这里，人们只要肯努力，要谋得生计，糊口于四方，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倘若能把握机会，富甲一方也非罕见的事。
* 在这个新兴的土地上，华人挥洒自如，充分利用独到眼光和勤奋个性，填满了每一个发展空间。他们有建党结社的权利，并享有宗教、教育与言论的自由。华人可以礼佛拜神祭祖，也可以庆祝传统节日、舞龙舞狮，连春节都享有两天公假。虽然在某些方面不能尽如人所愿，但华人都以整个国家与全民利益为前提，发挥容忍与包容的精神，以达致全民团结、和谐共处的目标。
* 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涉足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其中以从商的人数最多，而商业中主要以零售业与服务业最为活跃。华人零售商经营的形式，包罗万象，从近乎绝迹的刻匾店、祭拜香店，到茶室、杂货店、中医药材店铺、汽车修理店，再到牙医诊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建筑师工作室等，无一不有。两家著名的华资银行——大众银行和丰隆银行，其分行遍布全国。不论是在喧嚣闹市或是穷乡僻壤，随处可见挂着华文招牌的商店。
* 在过去三四十年间，陆陆续续冒起了若干华人企业集团。目前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企业集团大约有40家，其中较大的有郭鹤年集团、林梧桐集团、丰隆集团、骆文秀集团、李莱生集团、陈志远集团、杨忠礼集团及郑鸿标集团等等。它们拥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及多元化业务，经营稳定后也逐步迈向国际市场，例如郭鹤年集团已将业务范围伸展到亚、欧、美等十多个国家。
* 砂沙两州，都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其中尤以棕油、橡胶、胡椒、椰子及可可等农作物，给国库带来巨大的收入。这些农作物的小园主，大部分是华族的小资产家。而受雇佣的农工，也以华人为主。
* 砂沙两州丛林密布，盛产木材，成为重要资源。两州的锯木厂，业主多是华人。其产品除部分供应国内市场外，也出口、销售国外市场。因经营伐木业而致富的华族资本家比比皆是，其中佼佼者有砂拉越的张晓卿和刘会干，及沙巴的郑昭明。
* 迄今，华人控制马来西亚经济命脉的说法已不太准确。在70年代初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试图重新分配各族间的财富后，大大地局限了华人的经济发展。不过华人企业家仍灵活地采取各种应对之策，积极投入新的产业，总体上还是获得相当顺利的发展。
* “马来西亚世界级的华人富豪不少，但那毕竟是少数。”拉曼大学中文系教授林水檺说，“总体而言，大部分华人在社会各阶层就业，收入高低皆有。不过，与其他族群相较，华人的经济确实比较优渥，大多都过着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
*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华人仍有能力生存下去。不过我们依然希望可以争取到公平的待遇，因为这是人民的权利。”马来西亚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前任会长吴德芳表示。名列马来西亚成功企业家之一的他不无自豪地说：“目前，华人是马来西亚缴税最多的民族。”
* 长期以来，华人对马来西亚经济的贡献一直备受肯定。槟城的开埠者莱特就曾写到，华人是政府唯一不必拨出费用和作出特别努力，便可以从他们身上增加收入的东方民族。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也称赞，全靠华人的奋斗与经营，马来西亚经济才有今天的活力。
* 除了经济，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自抗日战争后，华人的政治意识不断提高。1949年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成立，开启了华人涉足政治领域的新页后，几十年来参政的华人不计其数，他们多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为目标。
* 马华公会在1955年与巫统、印度国大党结成联盟，参加大选获胜，组成执政政府，并向英殖民政府申求独立，立下大功。1972年，联盟容纳了更多政党后所组成的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参加历届大选均获胜利，长期执政。如今马华公会依然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政党，拥有多达110万名党员，是海外华社中数一数二的大型华人政党。
* 几十年来政坛上也出现了多个华基政党，如民政党、民主行动党（简称行动党）等。成立于1968年的民政党，原是反对党，在1969年的大选中夺得了以华人居民为多的槟城州政权。1972年加盟国民阵线，成为执政联盟之一员。在以后历届州选举中，民政党一直执掌槟州政权，长达40年，直至2008年，才被民主行动党所取代。
* 民主行动党成立于1966年，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主张种族、社会与经济平等。自创党以来，敢于仗义执言，扮演着监督政府的角色，因而获得一部分华人的支持。
* 至于沙巴，以华人为基干的政党有团结党、沙巴华人公会、沙巴中华统一党、沙巴华人党及沙巴进步党；砂拉越则有砂拉越人民联合党。
* 其他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也都有华人参与，如公正党等，共同构成华人在政治上一股重要的力量。在历届国会与州议会大选中，华裔的选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但华人基干的政党候选人，因华人的投票中选，即使是标榜多元种族政党的候选人，也得力于华人投票而中选。
* 在马来西亚2010年的中央政府，共有6位华人出任部长，9 位华人担任副部长，在政府决策中占有一席之地。
* 进入21世纪，华人参政的目的已不再是为华人利益代言。更多年轻的华人政治家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想要发挥华人优势，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建设马来西亚家园。
* 此外，马来西亚华团成熟而独立，也是华社一股重要的力量。百余年来成立的华人社团可说是多不胜数，它们在各个时代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早期华团多属地缘、血缘与业缘组织，如地缘组织有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番禺会馆等；血缘组织如槟城李氏宗祠、马六甲赖氏宗祠；业缘则有笨珍树胶商公会、吉隆坡布业联谊会等。
* 马来西亚华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他们说，那是先辈们长久以来坚持的教育理念。
* 虽然大部分早期华人移民都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但他们知道，教育是延续文化的不二法门，也可以使下一代摆脱贫困，所以筹办教育就成了一项时代的使命。自从在此地扎根以来，他们便致力发展华文教育事业。1819年，华人在槟城建立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而第一间现代华校则是创立于1904年的槟城中华义学。
* 自此在这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华文教育就不曾间断过，百年来后代对于祖辈们的理念更不曾动摇。当地华社通过自力更生、坚忍奋斗，建立起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专院校的完整教育体系，这在海外其他地方是非常罕见的。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学校，全靠华社自主经营，其投入的心力财力之大，也属独一无二。
* 如今，1280所华文小学、60所华文独立中学、3所民办学院伫立东西马各地，是当地华人引以为荣的成就。他们骄傲地说，这是马来西亚华社长期力争，甚至不惜以血泪生命来换取的成果。
* “维护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是一件艰难的任务。由于华人群体庞大，文化底蕴深厚，让政府感到压力，进而推出了一波波的教育单元化政策，给每一个时代的华教发展造成巨大的阻力。”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前首席执行主任莫泰熙说。
* 然而，阻力越大，华人反弹力越强。他们众志成城坚守着华教，多年来毫不松懈。只因他们坚持，每个人都有选择母语的权利，也坚信语言乃是保持文化薪火不灭的种子。
* “所幸马来西亚宪法赋予人民选择教育的自由，可选择就读各语文源流的学校就读。据了解，90％以上的马来西亚华人都愿意把子女送进华文小学，接受6年免费的华文小学教育。”
* 仅在只有35万华人的沙巴州，就拥有华校80多间，在校学生近5万人。有条件的马来人、印度人也开始送孩子到华校读书。
* 但看似前景明朗的华文小学，其实也面对着许多棘手问题。
* 莫泰熙说：“华文小学的良好口碑，加上近来华文地位水涨船高，使其他族群的小孩也蜂拥报读华小。但华小却一直保持原来的数目，甚至面临关闭的命运。此外，师资、拨款不足也是一个华小长期面对的绊脚石。”
* 原来，华文小学虽被纳进国家教育的体制内，但政府对于华文小学的投资却极其有限。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华社唯有靠自己想办法，为筹资各尽其力。政府要关闭华小，华人就群起抗议，坚持华小一间都不能少。
* 小学毕业以后，华人子弟又要在华文独立中学、国民中学或改制中学之间作出选择，让他们陷入两难之中。
* 所谓改制中学，是60年代一些华文独立中学接受政府部分津贴后改制而成，除了每星期各8节的华文和英文课，其他科目的媒介语都是马来文。而在国民中学，华文则作为非正式的选修课，每周只上课一两小时，而且要求必须凑足至少25名学生方能开班。
* 以华文作为主要媒介语的独立中学，完全由华人社会自主经营，政府不给予任何津贴。由于独中学校不多，加上学费较为昂贵，许多华人往往只能选择国民中学和改制中学。目前，只有约15％华人学生在60间独立中学就读。
* 华文报刊也是马来西亚华社耕耘出来的一朵奇葩，是陪着华人在风雨中走过来的精神良伴。华人对华文报刊的执著，与坚持华文教育的理念是相同的——他们认为每份华文报都是一颗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种子，所以长久坚持保护它们。
* 目前马来西亚约有16家华文报章，其中《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东方日报》《光华日报》和《光明日报》6家影响较大。据了解，《星洲日报》是发行量最大的报刊，每日发行超过35万份，读者人数逾百万。
* 华人人口较少的东马，华文报章却异常发达，两州的华文报章多达十家，如沙巴州有《华侨日报》、《亚洲时报》、《晨报》等；砂拉越则有《国际时报》、《诗华日报》、《中华日报》等，这些报章都只在当地发行，地方色彩浓厚。
*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一些华文报纸还发行到柬埔寨、汶莱、印尼、新加坡等周边国家，覆盖层面非常广。
* 中文日报多采用横排，版面整齐美观。中文报纸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地从繁体字转换去简体字。有趣的是，如今有报纸的标题还是用繁体字，内容却已全是简体的了。“繁简并茂”正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对旧文化的不弃对新文化背负起了传承的使命。
* 资深报人古玉梁说：“一早醒来阅读华文报纸，已是大部分华人每天的生活习惯。报章是华人宣泄心声的平台，及联系华人群体的桥梁，也是华人关注国际的耳目。”
* 除了本国新闻，华文报章也特别注重与中国和海外华人相关的新闻。报上的评论也常以中国的时事为论点，因此大马华人对中国的脉动了如指掌。每当从报章中读到一些与中国或华人相关的事件时，无论悲或喜，当地华人都会特别关注，感同身受。
* “马来西亚政府规定，所有印刷媒体每年必须重新申请准证，因此中文媒体在言论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尽管如此，华文媒体仍然守法经营，整体上茁壮健康地成长着，而且读者也还不断地在增长中。”对中文报章的发展了若指掌的古玉梁如是道。
*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除了像其他地区的报纸扮演着新闻报道和服务社会的角色外，也承担起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华文媒体本身也积极主办与传承华人文化有关的各种活动，如《南洋商报》主办十大歌星义演为华教筹款、《星洲日报》主办“花踪文学奖”等，都对当地华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为争夺华人读者市场，华文媒体之间也经常展开各种竞争。但在发扬中华文化、维护华人文化权利的基本立场上，它们却保持着一致。” 古玉梁说。
* 另外，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也是培养马华文学作家的主要媒介，可以说，华文文学在马来西亚得以发芽及成长，华文报章是最重要的推手。

 至于电子媒体方面，目前国营和私营电视台都设有华语新闻播报时段，还长时段播放华语、粤语和闽南语的电视剧、娱乐综艺及访谈节目。华人也可通过卫星付费频道，与中国大陆和港台等地区同步收看中文节目。此外，当地还拥有3个华语电台和两家华文新闻网站，为华人提供更多的生活资讯和时事知识。

* *《光华日报》为全球最长寿的华文报。1910年孙中山为宣扬革命而在槟城创立，初期为中国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机关报，并曾推动马来亚华人捐款中国协助抗日。目前《光华日报》为北马最畅销的报纸之一。*
* *马来西亚华社也出了许多出类拔萃、享誉国际的影视艺人和流行音乐歌手，其中就有闯荡好莱坞的巨星杨紫琼，还有广为海内外华人所熟悉的光良、梁静茄、李心洁等歌手影星，还有著名导演蔡明亮等，为世界华人歌影坛增添了缤纷灿烂的色彩。*
* 在强大的教育体系、华团和华文报章作为后盾下，马来西亚华人保存了相当完整的文化传统。他们保留中华传统节日之齐全，往往让人感到惊讶，一些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已逐渐消失的节日或习俗，在这里依然流传着。
* 从某个角度来说，马来西亚的人民是幸福的，各民族的隆重节日，都列为公共假期，大有普天同庆的味道。春节是马来西亚华人最重要的节日，更有两天的公假和浓浓的佳节气氛。佳节前夕，各商场人头攒动，各个车站都挤满了游子的身影，大街小巷上各种语言的祝贺布条及大红灯笼高挂，热闹欢腾的新春佳节气氛萦绕着整个国家。
* “除夕夜里，全家大小都会聚在一起吃团圆饭；过后，长辈还会根据吉时迎接财神。派压岁钱、舞龙舞狮、赌博更是少不了的春节活动。而且我们的庆祝活动将延续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说及春节的热闹气氛，马来西亚华人不无自豪。
* 在马来西亚，元宵节也是华人情人节。这一天，除了吃元宵、观灯、赏花、猜谜，未婚男女还会在浪漫的夜色中，彼此抛柑和苹果，寻求如意郎君或温柔女孩。
* 春节期间，这里还盛行一种独特的活动叫“捞鱼生”，寓意新的一年能够“捞”得风“生”水起，步步高升。此外，各华团和政党也会举办团拜活动，并开放门户欢迎各族民众登门拜年，促进和谐关系。
* 除了春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当地华人也非常注重孝道，因此清明节祭祖、扫墓的风气历久不衰。“老一辈人以前会担心传统节日会逐渐消失，但看到清明节时路上车水马龙的状况，疑虑往往就一消而散。”马来西亚华社研究者陈亚才笑着表示。
* 此外，端午节、中秋节、中元节、冬至等大大小小的传统节日，在这里不但一个不少，而且华人都会遵循礼俗，欢度佳节，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过得非常热闹。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中秋节赏月提灯笼、中元节举办盛大普渡会等，都是这里常年不衰的节日活动。
* 随着时间过去，这些节日流传到下一代那里，不但不见消失，气氛反愈加浓厚。“年轻一代还赋予它们更深厚的文化内涵。例如端午节也是诗人节，文学团体会举办诗歌朗诵会；中秋节则延伸成亲子节，一家人会聚在一起吃月饼、提灯笼，一些华团也会在那天举行‘传灯’文化活动，象征文化源源不息。” 陈亚才如是道。
* 在这里，中华文化所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源源不绝，民间自动自发、不计回报的力量，不但维持，还创新提升文化，他们的坚持让人感动。
* 马来西亚华人享有宗教自由，可以公开地信奉各种宗教。将近80%的华人同时信奉佛道二教或民间宗教。他们既到佛堂祈福，也在道观拜神，以及在家里祭祀祖先。至今，许多华人家里还摆设着神台，供奉菩萨、关公等神明，神台下面是土地公，旁边则是祖先灵位，厨房里还有灶神坐镇；此外，屋外还有天公神龛，这往往也是识别华人住宅的最佳标志。
* 在这里，拥有百年历史的寺庙也不少，有些还成了著名的旅游名胜地。马六甲的青云亭始建于17世纪，是马来西亚最早的华人庙宇，迄今香火不断。在一些华人集中的地区，如槟城、吉隆坡等，大大小小的寺庙庵观更是随处可见。信徒们除了到庙里祭拜神明、求签问卦，一些庙里头还驻有乩童神婆，为人们消灾解忧。此外，风水占卜、算命看相在这里也非常盛行。
* 九皇爷诞为当地华人，尤其是福建人所重视的盛事。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信徒们都会坚持不杀生、吃素净口，并拜祭九皇爷来消灾解难。他们还会在海边设立祭坛迎神送神。九皇爷回天之夜，成千上万名信徒穿上洁净的白衣白裤，护送九皇爷绕境游行，场面非常壮观。
* 另外，农历正月十九到廿二的柔佛古庙游神，至今也已发展成10万人大游行。整个游神长达八九公里，气氛热烈，充分展现出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旺盛活力。参与抬神游街的大部分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脱下平时时髦的装束，换上统一的服装，争相抬神，投入的精神不亚于他们的先辈。
* 一些台湾有名的宗教团体如佛光山、慈济、法鼓山等也在马来西亚建寺立院，开设道场，而且信徒众多。此外，在这里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华人也不在少数，约占15%，这国度西方风气浓郁，加上不少华人是接受英文教育，都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此盛行的主要因素。其余的华人有4％是穆斯林，1％的华人则信奉兴都教或其他宗教。
*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马来西亚华人的婚礼采取中西合璧的仪式。结婚时新人都穿西式礼服。在家里举行传统的仪式后，才到酒店宴请宾客。在婚礼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大妗姐，也叫送嫁娘。她是结婚当天新娘的“贴身保护人”，有时还会担任婚礼的主持人，把婚礼喜庆的气氛推到最高点。*
* *“拿督公”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本土地方保护神，神像容貌似马来人、穿着马来民族服装，本土色彩浓厚。“拿督”（Datuk）即是该国君主册封有功人士的封号，有部分拿督公更有马来名字，如也法、苏勿兰等。此外，拜祭拿督公的祭品也不可有猪肉食品。*

  在马来西亚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马来人或印度人经营的小食档——又称嘛嘛档（mamak），深受华人的喜爱。一位华人青年说：“嘛嘛档的食物和饮料价格不高，而且营业时间长，有的甚至24小时不休，我们一班好友知己最喜欢夜来聚集在这里长谈。” 可以说，“泡嘛嘛”在这里的华社中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融合现象。   事实上，在数十年来与各族共处，接受多元文化的熏染下，这个坚持保留母语和传统文化的华社也有着其开放多元的一面。尤其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点滴中，既可见他们对传统的坚持，也可感受到他们高度融合的一面。

       “华人对自己的文化非常坚持，但也非常接受友族的文化，我们可以说已发展出一个独特的混杂文化，是马来西亚华人独有的。”致力于保护槟城古迹的文化人林玉裳说。

       相反地，华人本身的文化也渐渐融入友族的生活和文化当中。“例如华人春节会派红包，马来人和印度人也有样学样，只不过他们将之改成该民族的喜庆颜色，变成‘青包’和‘紫包’。”陈亚才表示。“此外，其他民族也将华人的饮食文化进行改良，变成符合他们文化习俗的美食，如包子、油条等。”

   生活在多元族群、籍贯的圈子中，当地华人随时随地都需要准备好几种语言去面对各层面的人事，因此除了华语和本身的方言外，他们也会说马来语及英语，一些人还通晓不少其他籍贯的方言，如福建话、客家话、广东话等。无怪乎许多人都把当地华人称为 “语言天才”。这也造成他们用语混杂的现象——讲华语时，掺夹英语、马来语和方言的词汇和语法，反之亦然。

       在一段话中多语并用，听起来固然新鲜有趣，有时候外人却难以理解其意思，不过，这恰恰成了该国华社的一大语言特色，被戏称为“罗惹”（Rojak，当地特色小吃，类似水果沙拉，在马来语中有“大杂烩” 的意思）。

       马来西亚的城镇已走上现代化，生活条件不错，衣食住行都令人满意。这里的屋价低廉，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房产；建筑风格各异，有中国式的楼阁庭院，构思美妙；有西式的洋房别墅，恢宏坚实，美观实用；更有中西合璧的建筑，兼具两者所长，蔚为奇观。

       马来西亚华人对饮食也非常讲究。他们除了保留很多中国南方闽粤的食物，还结合了其他种族的食物特色，创造出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食品，花样繁多，如巴生肉骨茶、槟城叻沙、罗惹等，都是叫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此外，华人也善于在饮食中融入南洋风味，如酸辣鱼、马来风光、印度式咖缠、泰式东炎等，都是华人的桌上佳肴。他们也因此养成了无辣不欢的饮食口味，例如香辣的马来椰浆饭、咖哩都成了许多华人的最爱美食。

       当地华人也有着混杂多元的服饰文化。他们衣着轻便随意，加上当地气候炎热，因此除了会在正式场合穿上西服外，T恤、短裤和拖鞋就是街头最常见的打扮。在许多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如宴会、各类仪式中，华人身穿马来或印度传统服装的情况也非常普遍；更有不少华人把舒适的纱笼（马来服饰）作为家居服来穿，图个凉快。

       在娱乐方面，华人也尽显自身的多元文化优势。他们既可赶场去看西洋乐队表演，也喜欢听本国歌星西蒂·诺哈丽扎（Siti Nurhaliza）演唱的马来歌曲。他们既爱观看好莱坞动作大片，也喜欢本地著名演员 P·南利的喜剧小品。

       当然，最让他们感到息息相通的，仍是自己的民族文化。

       在这里，粤剧、潮剧等传统戏剧不乏观众；而对于中文影视和流行音乐，华人更是如数家珍。中国大陆、香港或台湾各年代歌星演员的作品，在这块土地上都获得广泛热情的回响。此外，阅读如金庸、余华、张爱玲等中、港、台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是许多文艺爱好者的体闲活动之一。

       无论如何，对于通婚，华人却显得相当抗拒。

       的确，当地华人较少和外族人士通婚，一般都保持纯华族血统。尤其是出生即为回教徒的马来人，华人家长通常都不允许子女与他们通婚。因为一旦结为秦晋之好，华人将被强制变成回教徒，这样就等于要放弃自己的文化，甚至中文名字。“虽然华人可以通过通婚获得‘土著’身份，享有‘土著’的一些特权，但比起要放弃自己的文化，还是得不偿失。” 一名华人青年如是说。不过，在东马，与原住民通婚的华人就相对较多。一些原住民信奉天主教，因此华人比较容易接受。

       从通婚的多寡情况看来，中华文化显然还是当地华人最为坚持的一环。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们来说，忘祖弃宗可是一项严重“罪名”。

* *当地华人虽已进入第三、四甚至第五代，尽管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去过自己的祖籍地，但大部分人对自己的祖籍都还很清楚。他们名字英语的拼写方式也是以祖籍地方言发音为标准，因此经常同一个姓有多种不同的拼法，可以轻易从姓氏中认出他们的籍贯。例如，同样是姓陈，广东人拼为“Chan”，客家人拼为“Chin”，福建人拼为“Tan”，福州人拼为“Ting”，潮州人拼为“Tang”。*
* 因通货膨胀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马来西亚新一代华人开始选择减少生育，家庭结构越来越趋于小家庭式。这促使华人人口日益趋少，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华人害怕他们的权益可能会受到侵蚀，因此人口问题成为当地华社的一大忧虑。一些华团为鼓励华人多生育，还曾推出多生有奖的活动。
* 这忧虑来自于何？若问起当地华人，往往可以在其言谈中感受到对当地政府的一丝怨叹。当年，华人人口比例也较高，在政、经、文、教等各领域的发展非常顺利。但随着人口的缩小和政治上的无能为力，加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让华人觉得自己作为公民的平等权益遭到侵蚀。
* “不过华人也明白，这并非政策问题，而是执行的偏差所造成。” 陈亚才说。
* 在坚持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当儿，华人也不断遭受到是否爱国的质疑；当地政府的偏差待遇更让年轻华人难以适应及困惑，有些人甚至发出“我爱这个国家，奈何国家不爱我”的感慨。“尤其来自独立中学的华人子弟，往往因被国家体制拒绝而有疏离之感，也导致他们和主流社会的鸿沟越来越大。” 陈亚才叹道。
* 有不少人选择离开，移民他国。如今许多国家如新加坡、台湾、澳洲、英国等都可以找到马来西亚华人的踪影，当中不乏许多精英在各界各业大放异彩；但有更多的人扎根已深，早己视马来西亚为一己家园。对土生土长的华人来说，马来西亚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热爱这块土地，并效忠于这个国家。只是在那血液里的“文化基因”，他们无法全然切断。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本民族文化的权利，而国家和文化认同可以截然分开，更可以并行不悖。马来西亚华人常常强调：“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的华人。”在他们强调身份之时，也正是他们寻找身份之时。如何在“坚持”与“融合”的天秤上寻找平衡点，成了马来西亚华人长期以来念兹在兹的问题与困境。
* 提起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就不得不提起林连玉。
* 林连玉1901年出生在福建永春，自上世纪20年代便开始投身杏坛教育耕耘，来马后依旧操持故业，为华文教育耕耘。他不但将毕生积蓄投入建校，还致力于维护华文教育，主张民族、语言平等，并推动了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和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的成立，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及华人公民权益的代言人。
* 在出任教总主席的8年间，他面对一次次不利于华教的冲击却毫不退缩，以智慧和勇气保住了早期摇摇欲坠、花果飘零的华文教育。最后，他却被马来西亚政府褫夺公民权并吊销教师注册证。林连玉坚信，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而教育就是民族的文化堡垒。他也曾振臂高呼：“我个人的利益早置之度外，为华文教育牺牲永不后悔！”
* 他为马来西亚华社树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典范，于是大家都尊称他为“族魂”。
* 马来西亚华人不但完好地保留中华文化和习俗传统，而且还不时为之注入新的元素，通过创新把华人文化发扬光大。除了传统的华乐、扯铃、茶道、书法、武术之外，他们最引以为荣的是自创的二十四节令鼓和高桩舞狮。
* 在没有二十四节令的国度里所创立的二十四节令鼓，可谓独创之举，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智慧再现。其主要创始人是陈徽崇和陈再藩（小曼），宽柔中学二十四节令鼓队则是世界首创的队伍。他们在1988年为新山的”端午诗节” 及吉隆坡天后宫的“源之夜”演出后，1989为马六甲第六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的序幕礼做了一次空前的露天演出，更是惊艳全场。
* 二十四节令鼓由二十四面单皮鼓和二十四名鼓手组成，每面鼓代表一个节令，表演融合鼓乐、舞蹈及书法艺术。鼓声、呐喊声与鼓手合为一体，气势振天，让中华文化焕发出无穷的活力，流传不息。
* 如今，除在原创地有超过5千名鼓手之外，它也传至新加坡、印尼、中国大陆、台湾甚至澳洲、欧洲等地，享誉全球。特别是在台湾的小学，二十四节令鼓已蔚然成风，甚至还有专门的暑假培训营。
* 作为传统中华文化的舞狮舞龙，曾被马来西亚政府明令禁止。“他们觉得狮子和龙怪异，要舞就舞马来西亚特产的老虎。”华人哭笑不得之余，反而更加坚持维护传统文化，不但在禁令下舞得更多更起劲，还精心专研中国舞狮，创出动作惊险、更具观赏性的高桩舞狮，在世界性的比赛是著名的长胜军。
* 如今禁令已除，舞狮不但获得各民族喜爱，在各场合中经常亮相，2007年高桩舞狮更被马来西亚政府列为本国50大国家文物遗产。它也北上中国，获得了国际龙狮总会的表扬，并推广到世界各地。

印尼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地跨赤道两侧，拥有1万7千多个岛屿，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这里处处青山绿水、椰风蕉雨， 被誉为“赤道上的翡翠”；土壤肥沃、资源丰富，也为它赢得热带宝岛的美誉。

       17世纪初，荷兰殖民势力首先侵占爪哇，接着便向外岛扩张势力，到了20世纪初，整个印尼沦为荷兰殖民地。1945年，印尼宣告独立。独立多年以来 ，政局动荡，军人跋扈， 经济萎靡，贪污盛行，民生困苦。今天，政府极力推动改革措施，逐步导向正轨发展。

       华人移民印尼的历史悠长，他们曾用生命来捍卫这片土地，并与当地人共同参与艰辛的建国工程。奈何，政治变天，华人的性命、文化一度岌岌可危，但他们总是咬紧牙根，意志坚定地熬过连串排华事件。在血泪斑斑的苦难史迹上，印尼华人凭着不屈不饶的精神改善自己的命运，在荆棘满布的道路上走向光明。

 早在17世纪荷兰的势力伸向爪哇（Jawa）之前，华人已涉足印尼。据马欢（郑和随从）的《瀛涯胜览》记载，15世纪初，爪哇北岸的杜班 （Tuban）、锦石（Gresik)、苏儿把牙（Surabaya，即泅水）等港口已出现了华人聚落，有的聚落有千多户人家，都是广东人与漳州人。

       爪哇西部的万丹（Banten），16、17世纪时是个繁荣的商港，胡椒的集散地，各地商贾云集。当时的华人人口多达3千至4千人，当中有的耕种，大多数经商。

       到了1619年荷兰占领了巴达维亚（雅加达）后，积极发展，很多华人便被吸引过去。巴城华人人口迅速增加，1629年已达3千多人，他们的职业形形色色，有种植水稻及甘蔗等作物的农夫，有手工业者与劳工，有从事制糖业与酿酒业者，更多的是商人。

       早期爪哇的中国移民，绝大部分是男性，一旦有了稳定的生活，安定下来之后，便与当地妇女结婚。异族通婚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的后代便成了混血儿，世世代代繁衍下来，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即所谓的土生华人（Peranakan），在爪哇的人数很多，势力雄厚。

       为了阻止华人经济实力扩张，荷兰从17世纪末开始，多次立法禁止华人入境，甚至于1740年谋划了“红溪大屠杀”惨案，怂恿当地人屠杀和劫掠华人，导致近万名华人被杀害。后来，荷兰发觉印尼的经济发展必须靠华人去推动，才废除了华人入境的限令。

       19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间，爪哇各地掀起了中国移民浪潮，中国移民所到之处，促进了地方的开发，城市的兴起与经济的繁荣，爪哇一系列的城市如万隆（Bandung）、三宝垄（Semarang）、茂物（Boyor）与玛琅（Mellang）等，都是因华人的涌入而发展壮大的。

       华人移居外岛，源远流长。据《瀛涯胜览》载述，东人陈祖义曾携眷逃亡旧港（Palembang，即巨港），沦为海盗，剽掠过客。郑和率领兵卒将他擒拿伏诛。那时，旧港也有其他华人流寓，他们多是广东人与漳泉人。17世纪的亚齐，是个繁荣的商港，中国商贾来这里经商，有些做完生意后，便扬帆归国；有些则定居下来。

       可是，一直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才有大批契约华工踏足苏门答腊（Sumatera）。西方资本家已在苏岛投下巨资，拓殖发展庞大的种植园，栽种经济作物。他们首先在海峡殖民地招募华工，嗣后更打中国华工的主意。他们通过代理人，在香港、澳门、厦门、汕头及广州等地，用劝诱、拐骗及掳掠的手段，要华工签订合约。

       签约后，华工就被送往苏岛东岸的日里（Deli）的烟园去服劳役。据统计，在1930年，日里的契约华工有2万6037人。合约期满后有些华工回国，有些则留下来。华族移民的涌入，促成了棉兰（Medan，日里的首府）的崛起。

       18世纪之前，加里曼丹（Kalimantan，即婆罗洲）很少华人。直至18世纪中叶，华人矿工蜂拥而至，在三发（Sambas）及坤甸（Pontianak）等矿区组织了公司，进行采矿。矿工多属客籍，鼎盛时期多达好几万人。兰芳公司后来更扩展为共和国，组织严密，职权分明，独霸一方，公然与荷兰政权对抗。1888年，在荷军的猛烈围攻下，不幸被击溃，共和国遂告寿终正寝。除金矿工人外，这里的华人也务农，从事水稻、蔬菜等的种植，现在被誉为西加里曼丹的粮仓如邦戛（Pamangkat）、山口洋（Singkawang）等地区，都是那时开垦出来的。

       邦加（Bangka）与勿里洞（Belitung）锡藏丰富，18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了锡矿的开采权，便通过代理人，从华南招募劳工前来采矿。自18世纪中叶以后，前来的契约华工络绎不绝，至1921年，受公司雇用的邦加矿工已高达2万3400人，勿里洞的矿工也有2万865人。

       随着大批矿工的到来，商人亦接踵而至，华人聚集的地区，逐渐形成了喧闹的城镇。这就是西加里曼丹比其他地区开发较快速的原因。

       与早期的中国移民不同，19与20世纪的移民不仅掀起了巨浪，女性移民也越来越多，男女的比例逐渐趋向平衡，因此减少了异族通婚的现象。这些后期的移民，建立了华人的家庭，保留了中华文化与华人的传统习性，形成一个庞大的华族群体，就是所谓纯血统华人（Totok），纯血统华人除居住在爪哇外，尤多散布在外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内外情势的变迁，不再有中国移民入境，印尼华人人口的膨胀，主要是基于自然增长的缘故。而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华人又逐渐恢复过去的经济地位。不幸的是，他们渴望迎来安定的生活，却接连爆发排华事件。

       1960年，当地政府禁止华人在县级以下的地区居住，华人唯有涌进城内，造成50多万人失去生计；1965年的政变，华人更是遭遇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印尼以铲除共产党的名义，滥杀了许多无辜的华人。那时有任何风吹草动，华人都提心吊胆。在几十公尺外听到‘砰砰’的关门声，华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自己的店门也关上。”走过那场九·三十排华风暴的老华人，至今仍记忆犹新：“至少有30万华人死在那血腥的暴行中，多么惨痛啊，但我们又无能为力。”

       此后，华人走入了“被合法歧视”的黑暗时代。印尼华人的居民证上注有“非原住民”的记号，且经常被称作带有歧视意味的“支那”（Cina）。前印尼总统苏哈多所实行的强制同化政策，使得华人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包括禁止使用中文，中文学校遭关闭，中文刊物、招牌等遭禁，华人改用印尼文名字，不容许在军警部队和国立学校担任公务员，甚至不能公开进行任何中华文化活动。因此，华人大多从商，靠做生意累积财富。

       在战后的数十年间，印尼间歇性地爆发了排华暴行，尤其是1998年的“黑色五月”，华人店铺和住宅被抢掠及焚烧，华人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侮辱和强暴，造成华人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并构成难以磨灭的创痛。

       幸而在苏哈多总统下台后，印尼改朝换代，排华暴行逐渐消失，华人才得以喘一口气，重新振作起来。

* *在强制同化政策下，绝大部分华人都改名换姓了，有些不愿舍弃本身姓氏的，便把中文姓氏的发音融进印尼文名字里，如姓林的改为Salim，姓陈的改为 Tadjuddin，Tandjung， Tanto或Chandra，姓苏的改为Susilo或Sufeni， 姓许的改为Sunarko， 姓黄的改为Widjaja：或 Wantah，姓叶的改为 Yaputra，姓何的改为 Hondir，姓吴的改为 Soedargo或Gunawan，姓谭的改为Hamdami，姓丘的改为Hiunardy，姓颜的改为Gani或Gandraputra，姓古的改为Kusima，姓李的改为 Rusli或Liman等等。*
* 印尼华人人口到底有多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30年荷兰殖民政府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共有123万余华人，占总人口的2.03%，相隔70 年后才有另一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华人约有241万，占总人口的1.2%。据印尼研究学者廖建裕、Mary Somers Heidhues、陈怀东、《亚洲周刊》及《远东经济评论》等的估算，印尼华人人口介于500万至600万之间，约占总人口的2.6%。但印尼学者达哈纳（A. Dahana）认为有772万，而印尼报人李卓辉却认为已高达1千万。印尼华裔总会主席许世经甚至说：“到今天为止，我相信全印尼共有1500万华人人口，大概占印尼总人口的6％。”
* 落差之大，关键在于对“华人”定义的不同。混血的土生华人是否算是华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估算数据自然“高估”，否则就是“低估”。此外，在长期的排华环境下，为了避免麻烦，有些华人否认自己的“华人”身份，也引起调查上的混乱。
* 一般而言，福建人多聚集在爪哇各地、苏门答腊东部、西部与南部、加里曼丹东南部、苏拉威西与马鲁古等地；客家人多居住在爪哇、苏门答腊北部、邦加、勿里洞与西加里曼丹；潮州人多散布在苏门答腊东岸、廖内、西加里曼丹等地；广府人则多聚居在加里曼丹东南部、苏门答腊东部、邦加、苏拉威西、马鲁古及小巽他群岛。
* 印尼华人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省份，福建和广东各占约40%，海南、广西、江苏、浙江、山东及湖北等省籍者共占约15%。目前，90%以上的华人已入籍成为印尼公民。
* 印尼华社曾有过辉煌的岁月，可惜经历了多次排华浪潮，文化内涵已冲淡不少。近十年来，反种族歧视政策纷纷出台，华文学校、华文媒体、华人社团组织、华人文化活动接连复办，为华族文化的复兴掀开序幕。这里的华人，正整装待发，重新上路。
* “华人都很富有”、“华人是吸血鬼”、“华人控制了印尼70％的经济” 等以讹传讹的言论，让许多人信以为真，也成了排华的催化剂。
* 其实，印尼的华人社会，阶级分化，呈现金字塔形，下层阶级的人数最多，中层阶级成员居次，上层阶级的人数最少。上层阶级成员包括大企业家、金融家等，他们腰缠万贯，资产雄厚；中层阶级包括中小型企业家、商人、专业人士、服务业与运输业业主等，收入不错，生活舒适；下层阶级成员包括工人、农民、渔夫、流动小贩、店员与矿工等，散布在爪哇与外岛，地位低微，生活穷困。
* 从商是印尼华人经济最重要的一环，其中以经营零售业如百货、五金、电器、药材等占多数，也有的是从事入口贸易或开设餐馆。近年来，华人经营的超级市场，处处设立分店，引人注目。在城镇里，触目所见都是华人商店，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华人控制了大部分商业活动。实际上，根据经济学家哈林·佐迪帕的调查显示，无论是大、中、小商人，原住民都要比华人多，说华人支配了商业，是站不住脚的。何况乡村的零售店，自1959年政府立法强制华人停业，全盘由合作社与土著接收后，华商在乡间便销声匿迹了。
* 曾几何时，华人在某些经济领域占尽优势，如纺织业、面粉加工业、成衣业、木材加工业等。1970年代以后，大型华人企业集团逐渐冒起，资产高达几亿或几十亿美元，较著名的有林绍良的三林集团、黄奕聪的金光集团、蔡道行的盐仓集团、李文正的力宝集团、彭云鹏的巴里多太平洋集团等。他们投下巨资设厂，经营银行、汽车、木材、水泥、房地产、纺织、塑料、食品、酒店等行业，数十家华人企业的年营业超过一万亿盾。可是，这毕竟是少数，而且跟国营企业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
* 国营的石油、天然气、邮电、大种植园、通讯、电力、铁路及航空，完全操纵在政府手中。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数字，90年代初印尼全国资产总额为2500亿美元，其中各类私营公司资产总额占12%，即300亿美元左右。即使这300亿美元资产中的一半是华人资产，所占比例也不过6%，说什么华人控制了印尼70％的经济，何以自圆其说。
* 华人的经济实力不如传言般雄厚，却在国家经济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减缓了当地的人口就业问题，并增加国家财政税收，为促迸印尼的繁荣与富强作出卓越的贡献。
* “印尼200大企业家排行榜里，有170个是华人。根据统计，华人大企业约有500家，中小企业则有30万家左右。不过，劳动阶层还是占多数，超过华人总工作人口的80%。” 印尼《国际日报》总编辑李卓辉说出了华社贫富悬殊的现象。“大多数华人还是得靠双手劳动，每天省吃俭用来维持生活的。有的华人还住在茅草屋里，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就会让女儿嫁到国外去，以改善家里的经济环境。” 出生于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市的林展理表示。
* 在后苏哈多时代，印尼已经没有可资垄断的行业，很多行业都有土著参与。目前仍由华人独领风骚的领域，可能就只有零销代理。许多国外品牌的电器、交通工具等，主要都是由华人引进代理销售。“华人凭着良好的商誉和勤俭、讲信用的美德，才能屹立不倒。” 班芝兰唐人街的玩具批发商黄耀鸿如是说。
* “华人在印尼的经济发展显得非常活跃，更在中产阶级中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 印尼华人研究学者廖建裕分析说：“华人的优势是住在城市，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接触更多外界资讯，加上与世界各地华人保持联系，让他们轻易在印尼建立起覆盖面广泛的销售网络，日常用品销路坚挺，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 华人踏足印尼，为的是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至今他们仍然对这片土地怀着梦想。“这里资源丰富，市场庞大，劳力低廉，对脑筋转得快的华人来说，找生活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政治保持稳定，这个国家肯定前途无量，我们的未来也一样。”华人总是这样想。
* 普遍上，华人的平均收入比当地人高，物质生活也较为充裕，也正是这些差距，引起部分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华人要做好生意，也要搞好国家经济，更要积极参与印尼的建设。”印尼工业界闻人郑年锦语重心长地说。
* 为国家建立良好的经商环境，推动更多建设工程，协助土著创业，是印尼华人目前的首要任务，也是拉近与当地人距离的最佳途径。
* 印尼华人社会结构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各具特色。
* 土生华人是早期华人移民与印尼土著通婚的结晶。他们只有印尼文名字，中文姓氏与祖籍或许已不可考，有的甚至会把自己归类为土著族群的一分子，生活中参杂了许多当地特色。他们大多已失去说中文的能力，平常以印尼语或当地方言沟通。会说中文的华人群体，就把这群和其他不懂中文的华裔称为“侨生”。
* 土生华人已没有使用筷子和汤匙的习惯，反而入乡随俗，像当地人那样用手来吃饭，食物口味也偏辛辣。有人形容，土生华人的生活习惯已接近土著，但依然传承了华人的传统文化。“虽然他们不知道很多习俗背后的意义，有些甚至已被其他地区的华人群体扬弃了，但他们还是完好无缺地保留下来，如拜堂和祭祖仪式等。”难怪有些土生华人会说：“完全看不懂Lian（春联），但每逢新年还是会请人来写。我们就是比其他华人更华人！"
* 纯华人和20世纪上半叶才移居印尼的新客华人，则是民族意识较强的一群，也是较常被提及的印尼华人社群。他们口操华语或家乡话，还保留着不少华人习俗。基于殖民制度，他们没能很好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依旧活在华人圈子里。
* 比如一些爪哇以外的外岛华人，很多都是18世纪中叶招募到当地从事开采活动的华人矿工，后来矿源枯竭，他们转而耕作、当木匠或做小生意，与多数是商家的爪哇华人有别。他们散居各地，并保有更纯粹的华人传统文化。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和山口洋市亦是如此，潮州话和客家话响遍耳际，栖身其中，仿佛在一个淳朴的华人小国里漫步。
* 苏哈多实行了30多年的同化政策，让许多新客华人的后裔，尤其是住在大城市如雅加达者，也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不过，即使入了籍、改用印尼姓名，他们当中有些仍保留着中文姓名；无法在当地接受中文教育，就把子女送到邻近国家学习中文；没有中文读物，就通过卫星电视或进口影碟重温中华传统文化。
* 随着中国崛起，国内政治气氛逐渐开放，印尼华人积极展开文化寻根之旅，坊间也兴起一股学习中文的热潮。
* *印尼住着300多个族群，文化交融的现象处处可见。在印尼语词汇中，Tauge（豆芽）、 Tauhu（豆腐）、Kuchai （韭菜）、Caisim（菜心）、Teh（茶）、Lobak（萝卜）、Beca（马车）、Bihun（米粉）、Bakmie（肉面）等，都借用了闽南语的发音。直到今天，土著还是习惯以“Jipak”（一百）、“Gohchap”（五十）来叫价。*
* 对华人来说，印尼既是地狱，又是天堂。每当发生排华暴乱，恶浪铺天盖地而来，转瞬间成了人间炼狱；雨过天晴，一切恢复正常之后，这里又是华人的天堂。
* “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血洗的历史固然惨痛，但华人并没有带着仇恨和恨意，因为他们知道多数的印尼人并不赞成排华的恶行。“印尼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大多数印尼人都很善良，他们原本就很单纯、乐观，也没有坏主意，如果你对他们好，他们会对你更好。杀害华人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有心人从旁煽动罢了。”有的华人这么说。甚至有人说：“华人在这里不是异类，我们是印尼人，是一体的。”.
* 这里交通秩序紊乱，只需花1千或2千盾，就有人替你开路，让你通行无阻；出门用餐不打伞，下雨也不着急，身边随时有人为你撑伞遮雨，每次酬劳大约5千盾。华人笑说：“在印尼有几千盾就可以获得如帝王般的享受。”
* 1998年爆发了排华事件之后，华人提高了警惕性，并从现实中吸取教训，体悟出一些道理来。“只要你摸索出一套生存之道，日子还是可以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这是印尼华人的生活体验。华人言行举止也收敛了不少，不再大事铺张，过着低调的生活。
* 一般来说，印尼华人的生活是较为舒适的。多数华人属小康家庭，都会聘请帮佣打理家务，如洗衣烧饭、搞卫生、带小孩，或充当司机，这样一来，华人便能心无旁鹜，专注事业的打拼。在一些大城市如雅加达，帮佣或许还不止一个。一些华人雇主坦言，失去了帮佣，他们的生活会变得一团糟，1998年骚乱爆发之际，也是这些帮佣站出来维护华人雇主。
* 纵使排华事件已经过去，但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 “心理上还是有些害怕，所以会选择住在华人居多的新村，并且聘请保安看守，晚上出门也会找人陪伴。”难怪许多华人住宅，都用高高的围墙区隔开来，大门铁栅至少有两公尺半高，上面还有锋利的铁丝。“以前做生意没有那么多顾虑，商品总是堆满整个仓库；现在由于担心暴乱重演，一切可能在瞬间化为乌有，因此经商手法变得保守，不敢存货太多。” 华人商家这样说。
* 不过，这一切都在改善中。
* 在苏哈多时代，华人丝毫不敢张扬，深恐泄漏了炎黄子孙的身份，会惹来飞来横祸；现在，华人可光明正大在屋外拜天公，甚至贴上春联或挂上红彤彤的大灯笼，再也不避讳了。
* 印尼华人终于可以踏上公众的舞台，毫无顾忌地唱起中文歌曲来。许多脍炙人口的中文歌曲如《月亮代表我的心》，都谱上印尼文歌词，这首歌也是许多大型晚宴指定的演唱歌曲。年长的老华人喜欢在聚会上载歌载舞，即使是不谙中文的年轻华人，也会以拼音的方式来背诵中文歌词。
* 在文化多元的印尼，华人的生活也显得多姿多彩。“印尼这么大，到处都有明媚的景色，闲来与家人在国内旅游是一种至上的享受。” 因此，不难理解华人家中为何总是有一台7个座位的多用途轿车。
* 提到未来的远景，印尼华人总是说：“突破华人圈子的围墙，与其他族群融为一体，创造和谐安宁的社会！"
* 在苏哈多时代，当世界各地的华人燃放鞭炮，敲锣打鼓迎接新年之际，印尼华人碰到亲友却只能偷偷拱手作揖，低声说 “恭喜恭喜”。
* “在苏哈多时代，华人到庙里烧香膜拜，大家都行色匆匆，不敢长时逗留，气氛不比现今热闹。那时候，庙里不得不取下有中文字样的牌匾，或用布遮盖，而印上中文字样的蜡烛，也得换上特别订制的印尼文蜡烛。” 历史最悠久、香火最鼎盛的金德院管理员梁佑益回忆说。
* 今天的情况却大异其趣。自2003年开始，华人新年被列为全国公共假日，而舞龙、舞狮等大型活动，也堂堂正正走上街头。在印尼，元宵节的热闹气氛更胜年初一，有说是因为当年政府禁止任何庆祝活动，华人在年初一只好低调地串门拜年，到了元宵节就能以宗教名义，抬着神轿出游，举办盛大庆典，让春节有个圆满的句号。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到山口洋观赏元宵庆典，就发觉到它的魅力有多大。

尽管农历新年被禁了30多年，但华人还是保留了一些过年的传统习俗。初一到十五都有特定的习俗，比如初五到墓园向死者拜年，初七要吃7样菜，初八到8间庙宇祭拜等等。当然，华人节日也参杂了一些印尼本土特色，比如在除夕夜，咖哩鸡（Kari Ayam）和沙爹肉串（Satay）就是饭桌上少不了的佳肴。

       农历新年以外，华人最重视清明节。就算是在外地工作的游子，都会趁清明时节赶回家乡拜祭祖先。另一个重要的节日是中元节，俗称 “鬼节”。

       华人节日如今不再纯粹属于华人了，印尼人也同时分享节日的气氛。

* *华人新年在印尼文中称为“Perayaan Imlek”，借用闽南话“阴历” 的读音，而印尼传统食品“Lontong”也打动华人的欢心，演变成“Lontong Chap Goh Mei"（元宵饭团）。印尼华人新年采用孔历计算法，即从孔子诞生的年份开始算起，如2009年，也是孔子诞辰2560年，庆祝的就是 2560年的新年。*

  1966年以前，印尼有大约2100多个华人社团，与数量庞大的中文学校、中文媒体，构成发展成熟的华社。在苏哈多时代，政府接连取缔华人社团，只保留少数以基金会（Yayasan）形式成立的华人团体，以及一些姓氏、慈善宗教社团。这一来，社团的华人色彩变淡，融入更多的本土元素，也有的社团改以宗教或慈善团体的形式，暗地里地从事社团工作。

       直到1998年以后，印尼华社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日渐式微的中华文化如同久旱逢甘露，华人社团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可能情绪压抑得太久，政策放松了，大家组社团、办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转瞬间，印尼各地涌现了各种各类的社团组织，特别是雅加达、万隆、泗水、棉兰和三宝垄等华人集中的地方。” 但也有华人认为，无节制地组织社团，会减弱华人的凝聚力。

       大大小小的华人社团，散落在全国各地，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包括早操队伍、歌唱团体、学术协会等，保守估计有近千个。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开办了崇德三语学校；一些原中文学校校友会、姓氏和宗亲会、地缘组织，购置会址充当活动场所；全国性综合社团如印尼华裔总会、印尼百家姓协会等，要求撤销种族歧视法令，并且积极争取印尼华人享有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权益。

       经历了1998年的排华风暴，华人不再只是一味埋头经商，取而代之的是纷纷参政议政，以提升本身的地位。4个由华人主导的政党相继成立，即印尼融合党、中华改革党、印尼大同党和印尼佛教民主党。在1999年大选中，唯一获准参选的印尼大同党赢得3个国会议席，有8名华人当上国会议员，郭建义更当选为人民协商会议副议长兼内阁部长。

       “华人政党在印尼还成不了大气候，但华人参政为大势所趋，无论加入哪个政党，整个华社就是强力的后盾。” 印尼华裔总会和印尼百家姓协会创办人黄德新，鼓励更多年轻华人踏上参政之路。

       近年来，华人的政治表现可圈可点。2003年，西加里曼丹华人张锦坤当选为上候县县长；2004年的国会大选中，参选政党分别推举170名和130名华人为国会及地方议会议员的候选人，同年十月，冯慧兰被委任为贸易部长；2009年，约有1千名华人参与国会和地方议会的选举。

       走上改革道路后，印尼政府逐步改善当地华人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华人也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印尼华人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 *同生肖的华人也聚在一起成立联谊会，只要本身或配偶出生在该生肖年，就可以成为会员。现有属虎、属狗、属蛇以及属兔的生肖联谊会，其中威虎联谊会成立得最早，已有4年历史。华人社团活动，大多沿用华人传统仪式，如瑞狮迎客等，但致词或开会时，则主要使用印尼语。*
* 印尼有接近90％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有说当年把伊斯兰教传入这千岛之国的，就是中国的航海家郑和。然而，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的华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却不多。
* 早期华人以民间信仰为主，由于当时福建人占多数，因此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流传最广。大大小小的寺庙遍布全国各岛，许多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古庙，至今仍香火鼎盛。雅加达著名的金德院，早在1650年已建立，主要供奉妈祖、观世音菩萨、关帝等。华人居多的山口洋市，更被称为“千庙之城”，多是供奉大伯公的庙宇。
* “华人庙宇不纯粹是宗教场所，同时也积极投入社会慈善工作，有的设立西医诊疗所为人民看病；每逢初一、十五或发放救济品时，我们也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地给予援助。”梁佑益说。
* 1965年印尼发生流血政变，华人担心被扣上“无神论者”或“共产党人”的帽子，纷纷饭依基督教或天主教，特别是受西方或中文教育的华人。据学者统计，1953年，在印尼华人中只有10%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但是到了1991年，人数已超过20%，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为了更容易融入主流社会，也有人曾呼吁印尼华人加入伊斯兰教，但华社的反应却相当冷淡。
* 可能原因有三。首先，基督教与天主教跟华人习俗的冲突比伊斯兰教小。其次，基督教和天主教自殖民时代沿袭至今，印尼有不少原住民都是信徒，华人也信奉同一宗教，意味着与土著达到某个程度上的融合。
* 另外，当年中文学校遭关闭后，许多华人家长把孩子送到教会开办的学校就读，而这些原本信奉佛教、道教或民间信仰的家长，对孩子宗教的转变并没有太大的抗拒。经过时间的推移，许多华人家庭已逐渐过渡到西方宗教信仰，印尼华人还凭着自己的力量，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华人基督教堂——弥赛亚大教堂。
* 曾几何时，印尼政府把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及以华人信徒为主的孔教列为国家的六大宗教。孔子的儒家教义、思想，受承认为国家宗教之一，这是东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罕见的现象。不过，后来基于政治因素，苏哈多政府以“妨碍同化”为由，宣布自1900年开始在印尼发展的孔教为非法宗教，使当时约有300万信徒的孔教转为地下和家庭活动。
* 1999年，自称有华人血统的瓦希德当上总统后，恢复了孔教的合法地位，他还出席了孔教会所主办的春节联欢会。会上所宣布的孔历华人新年，也推广到全国各个阶层，并沿用至今。继任总统也大力支持孔教会在春节期间所办的活动。
* “孔教会在全印尼大约有100多个分会，相信有超过几百万信徒，在侨生华人群体内流传极广。”雅加达近郊丹格朗（Tangerang）孔教庙的负责人罗伟源如是表示。
* 孔教庙每周日以类似基督教崇拜诵经的方式，进行祭孔仪式，不过，教义内容都是四书五经翻译成的印尼文版本。“侨生看不懂中文，但却十分了解传统习俗，教会还成立了舞狮舞龙队伍，以吸引更多的年轻华人参与。”
* “孔教不仅仅是宗教，也是人类生活哲学的最佳指引，以免误入歧途。”侨生信徒以印尼语这么说。
* 印尼建国宪法“潘查希拉”（Pancasila）的第一条就是“信仰神道”，即政府承认人民有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经历了接近半个世纪的磨难，华人在这里终于呼吸到宗教自由、多元化的新鲜空气。
* 中文报刊在印尼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但经历坎坷。
* 20世纪初，印尼华人自办的中文报纸陆续出现，有1901年创办的《理想》、1902年的《泗水新闻》、1908年的《泗滨日报》，以及《新报》和《天声日报》等。日本占领印尼并勒令所有中文报纸停刊前，大约有20多家在发行。
* 印尼独立后，中文报纸进入群雄争霸的发展阶段，主要分为亲中国大陆、亲台湾和标榜中立3类报刊，其中《新报》、《生活报》和《天声日报》影响力较大。后来，排华浪潮把印尼13家中文报刊卷入停刊寒流中；九·三十政变后，更是中文媒体走向衰落的开始。一声令下，中文报刊悉数被关闭，政府为了向只懂中文的华人群体传达信息，于是在 1966年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日报》8个版面中，保留了4版中文，成为中文仅存的活动空间。
* 1998年瓦希德上任后，中文报禁解除，新闻自由的尺度也变宽了。“现在的印尼，可说是东南亚区域新闻和言论最自由的国家。”住在这里的华人，都有这种感受。
* 自2001年台湾联合报系在印尼出版了首家外资中文报——《世界日报》后，陆续出现的中文报有《和平日报》、《新生日报》、《国际日报》、《印度尼西亚商报》、中文和印尼文互译的《华文邮报》及《千岛日报》等。曾经垄断市场的《印度尼西亚日报》于2006年与马来西亚最大的中文媒体星洲集团合作，易名为《印尼星洲日报》，改变办报风格及开辟电子版，继续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 由美国国际日报集团于2001 年斥资创办的《国际日报》，目前是全印尼发行量最大，也是唯一在雅加达、棉兰、泗水、坤甸 4个城市同时印刷发行的中文报纸，包括东爪的《泗水晨报》、西加的《坤甸日报》和苏北的《棉兰早报》。
* “全印尼的中文报纸发行量有十多万份左右，许多仍是亏损地经营着。不过，随着中文教育复苏，加上中国迅速发展，可以预见中文读者群将会不断扩大。” 业者大都对中文媒体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
* 无可否认，目前中文报业的发展还是处于过渡期。
* “经历了30多年的文化断层，中文人才严重短缺。许多中文报馆的员工其实对中文一知半解，排版员大多是不懂中文的印尼人。” 李卓辉感慨地说，《国际日报》就有四分之一的员工不谙中文。也有些报馆直接从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引进人才，以填补人力资源上的不足。“可能还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接上轨吧！” 有人这么认为。
* 不仅是平面媒体，印尼的中文电子媒体也面临相似的窘境。由于缺乏中文造诣较高的人才，广播时经常出现发音、语法等问题。这一切，都在慢慢改善当中。
* 启播于2000年的加科哇拉（Cakrawala）第一华语广播是雅加达首家中文广播电台，除了播放中文歌曲，也播报新闻，同时制作一些时事和清谈节目，深受华人社会的欢迎。这个初期只有老华人收听的电台，后来也吸纳不少年轻的听众，主持人甚至用印尼语与听众沟通，以拉近与新一代华人的距离。迄今，印尼仍未有覆盖全国的中文广播电台，发展空间不小。
* 中文电视台在印尼则仍是个梦，不过2000年启播的美都电视台（Metro TV），却开创了每天早上播报中文新闻的先例，惟播报时间不断缩减。
* 自禁令解除后，这个中文一度湮灭的国度，处处林立着中文招牌和广告牌。中文媒体也跟着浴火重生，期望有朝一日能百花齐放。
* 苏哈多统治时代，制定了法令禁止发行和销售中文报刊，没收并烧毁中文书籍，禁止中文的教授与应用，即使用印尼文拼出中文语音也不允许，似乎要把中文从印尼华人的脑海里连根拔起。
* 1965年以前，印尼原本有42万5千名学生在1600多所中文学校上课，后来在不同阶段被全面关闭了。“最后一天上课时，老师和学生都坚持把最后一堂中文课上完，即使那时校园已站满军人。我们心中其实并不害怕，只有激动，因为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中文教育从巅峰跌入谷底。”华人说，这是他们胸口永远无法痊愈的痛。眼见当年投下不少心血建立起来的华校，不是遭废弃就是任由破坏，更是令他们感慨万分。
* 查禁中文的年代，还是有一些教育斗士翻山越岭，冒着被捉和被打的风险，到华人家庭教导中文，继续传递薪火。“上课时只能默读，不能发出声音，担心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西加中文教育协调机构副主席陈惠珍，道出了当年华人对中文教育的坚持。有些华人，甚至把祖辈遗留下来的武侠小说当入门，自学中文。
* 1998年苏哈多倒台后，被禁了30多年的中文，终于重现曙光。可惜，中文教育已经断层多年，40岁以下的华人几乎无法掌握中文。李卓辉分析说：“爪哇岛内或许只有18％的华人说中文，懂得书写的剩下70 万人左右，全国也不过一百多万人。”
* 中文教育风光不再，但印尼华人没有气馁，自解禁后开始筹办中文补习班，并期许中文学校复办。1999年以后，民办中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发芽，后来政府也把中文列为国立学校的外语选修科目。到了2007年，全国共有1万6千所中学开办中文课，吸引了近2千 万人来学习。
* “中文教育复办得相当快，但基础却没有了。国立学校每周有两节到五节中文课，由校长决定。从中学才开始学中文，成效可想而知。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只能要求数量上有所增加，接下来再提升质量。我们要把中文教育塑造成不仅仅是华人，而是整个印尼民族的事业，如此才能长期发展下去。”雅加达中文教育协调机构主席蔡昌杰这么说。
* 印尼中文教育目前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它普及化。
* 这就是2004年雅加达中文教育协调机构成立的大背景。目前全国共有18个省份设有协调机构。“阻力虽然很多，但大气候已经形成，我们必须从这个缝隙努力扩展，争取其他国立学校也开办中文班。” 蔡昌杰说，从以前不准讲中文到现今可教中文，耳边传来孩童朗朗的读书声，是许多华人无法想象的画面。 “为了应付国内庞大的中文师资需求，印尼政府甚至提供师资培训资金，而教学大纲也是本地编写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勇于踏出第一步。”
* 印尼中文教育可分为三类：一是台湾商人开办的中文学校；二是国立学校开办的中文课程，把中文列为外来语；三是以印尼语、英语和华语来授课的私立学校、特殊学校或国际学校，开办幼儿班至高中课程，这也是当地华社所指的三语学校。
* 中文教育的大门虽然已经打开，但政府仍禁止设立华校，也未把中文列入国家教育体系内。不谙中文的印尼华裔人数众多，年轻一辈绝大部分已本土化，无法用中文写作或阅读中文读物。“这里的环境根本就没有机会说中文。”新一代华裔无奈地说。
* 中文要在这南洋翡翠岛国健康成长，显然并非易事。所幸，随着当局放宽中文政策，加上中国崛起，印尼也掀起一股中文热，让华人看到中文复兴的希望。
* “前路是曲折的，也是漫长的，但我们肯定会坚韧不拔地走下去，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经历过中文教育的兴衰，曾是中文教师的鬓白老华人坚定地说。
* 早在18世纪，华人曾在西加里曼丹（简称西加）建立起一个小国。
* 那时，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有许多华人来到加里曼丹谋生，大部分集中在西部沿海的坤甸市，他们除了种植农作物外，也开采矿产和煤炭。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华人也组织了会社。
* 1770年，广东梅县客家人罗芳伯在西加设立了兰芳公司，从会社发展为贸易公司，为当地商人或酋长提供服务。后来，罗芳伯在当地的势力大增，把“兰芳公司”改为“兰芳共和国”，全称为“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并担任大唐总长（相等于现今的国家元首）。以东万律为首都，并把立国之年定为 “兰芳元年”。罗芳伯还参照西方国家的法制，制定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把地方分成省、府和县三级来管理。
* 不过，“兰芳共和国”的合法性曾引发争议。但若以当时兰芳拥有独立政府、民主选举公推的国家元首、人民、土地、法律、国防和钱币来看，似乎已符合一个共和国的成立条件。而荷兰史书上也曾记载过“Republic of Lanfang”这个名称。
* 这个华人小国后来遭到荷兰围攻，顽强抵抗后战败，最终于1888年左右灭亡，结束了一百多年的建国历史
* 印尼西加省华人精英多，出现了“黄门三杰”!
* 现年42岁的黄努山（Ria Norsan），于2009年4月13日宣誓为坤甸县首位华裔县长。出生于山口洋市的他在丹戎普拉大学毕业后，在政府部门工作了11年之久。
* 在山口洋市出生的第六代华裔律师黄少凡（Hasan Karman），于2007年选举中击败包括原任市长在内的4组候选人，在自己的家乡扬眉吐气，当选为全国首位华人市长。今年47岁的他毕业于印度尼西亚大学法律系，过后攻读生态环境博士学位。他从事过企业管理工作，并开设律师事务所、广播电台、餐馆等。
* 全山口洋市有20万人口，华人占了62%。“在全印尼华人比例最高的地方当选市长，背负的责任当然重大，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很多。最重要的是全面整顿市政，把这里打造成一流的文化旅游都市。”黄少凡雄心勃勃地说。
* 第三代华裔黄汉山（Christiandy Sanjaya）于2008 年当选为西加省副省长，这是华裔在印尼担任省级地方行政长官的第一人。他与竞选搭档以超过40％的选票胜出。他大学毕业后在高中教书，投身教育界为他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后来曾任坤甸市地方议会代表。任期的5年内，他竭尽所能为西加省全体民众服务。
* 三 “长” 同姓黄，一时传为佳话，同时也提升了华人的政治地位。
* “印尼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园，只是偶尔有点脏。我们坚信，只要用心去打扫，最终会变得清洁明亮。”印尼华人如此形容孕育他们成长的国家。对于过往惨痛的历史，他们铭记于心，却也把它当成前车之鉴，如今努力回馈祖国，为印尼的繁荣作出贡献。
* 华人深信，这是个种什么都能生存的美好国度，而自己的根，早就牢牢地扎在这里，开枝散叶了。“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当然也要终老于这里。”身处印尼，华人深深了解国徽中的格言——“异中求同，殊途同归”。

菲律宾

     菲律宾位于亚洲东南部，西濒南中国海，东临西太平洋，是一个群岛国家，由大大小小 7107个岛屿组成。

       1542年，西班牙航海家来到这里，为了在亚洲炫耀西班牙帝国的“国威”，便按照西班牙皇太子菲力（Philip）的名字，把群岛命名为菲律宾群岛。自1565年起，西班牙在这里开始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

       1898年，美国击败西班牙，占领并统治了菲律宾；1941年，日本入侵菲律宾；二战结束后，美国重新恢复对菲律宾的统治。直到1946年7月4日，菲律宾才终于赢得最后的独立。

       菲律宾天然资源丰富，有“西太平洋明珠”的美誉。因其地理位置接近中国东南沿海，长期以来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移民到这里打天下。今天，他们已成功在当地打造出一系列商业王国。

    早在西班牙人于1570年占领马尼拉以前，这里已经有华人的足迹。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之后，殖民政府因建设和贸易的需要，于是积极招募华人前来。此后，从中国抵达马尼拉的航船便络绎不绝，也载来了大批的中国商品和移民。在短短30年间，这里的华人人口激增，直至1600 年，菲律宾的华人已有2万人，他们主要聚集在吕宋岛（Luzon Island）的马尼拉。

       17世纪，马尼拉道路两旁已是华人商店林立，唐人街逐渐形成。那时，就连穷乡僻壤也遍布着华商所经营的菜仔店（Tienda de Sari-sari），贩售各式各样的日用品。殖民政府对华人可谓爱恨交织。刻苦耐劳的华人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对地方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的贡献甚大；可是，一旦华人人口膨胀，人数若是超过西班牙统治者，又令殖民政府深感不安。于是，殖民政府开始对华人加以限制和打压，例如强迫华商缴纳重税；限定华人居留在马尼拉城外的“八连区”（Parian），没有通行证不得擅自离开等等。此外，当时的殖民政府还经常找借口将华人集体驱逐出境。

       华人终于无法忍受而群起反抗，却遭致更为残酷的镇压。1603年和1639年，殖民政府对华人展开了大屠杀行动，当时受害的华人数以万计。之后，从1662年到1762年之间，屠杀华人的悲剧又一再重演。

       18世纪后期，由于殖民政府需要劳动力，便开始改变对华人的政策，不但将移民和居留法令放宽，还积极地招募契约华工。这一来，华人人口逐年增加，致使华人的足迹遍及各岛，除了马尼拉市以外，在帕奈（Panay）、那牙（Naga）、宿务（Cebu）、三宝颜（Zamboanga）等地都有华人聚居。

       到了美国统治菲律宾的40年间，殖民政府因为要笼络人心，不惜牺牲菲律宾华人的利益，实施了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尽管如此，试图入境的华人还是千方百计以各种途径踏入这块土地，其中的一个方法便是冒充当地华商的儿子，正因如此，也导致了今日菲律宾华人在中英姓氏方面的混乱现象。

       1935年，美国予以菲律宾自治权，民族主义者以及政客于是大肆利用舆论来鼓动排华情绪，同时还滥用手中的职权，推行了好些种族性政策，以致种族关系日渐紧张。

       1946年，菲律宾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之后，民族主义者的排华呼声更是响彻云霄。结果，国会通过一连串的菲化法令，华人首当其冲，被剥夺了多年以来经营传统行业的权利，只得另辟蹊径，委屈求全。

       独立之后的30年间，菲律宾华人，尤其是年长的一辈，仍然具有浓烈的中国意识以及故乡地域观念。但是进入70年代之后，华人的历史开始迈入新纪元。1975年，菲政府简化华人的入籍手续，许多中国移民才因此而入籍。

       今天，在菲律宾华人当中，有90％以上已经入籍成了菲律宾公民，他们基本上与当地人获得同等的待遇，且大多已融入主流社会，将菲律宾视为自己的家园。

*菲律宾国父何塞·黎刹 (Jose Rizal）和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Corazon Cojuangco Aquino）皆有华人血统。他们属于中菲混血儿（Mestizos)，这一个特殊群体在菲律宾的社会发展，尤其是独立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菲律宾华人人口向来缺少确切的统计，粗略估计大概有100万人。一半以上的华人聚居在马尼拉市，其他则分布在宿务、达沃（Davao）及三宝颜等城镇。

       来自漳州和泉州的福建人，占了菲律宾华人人口的85％至90%，余者则是原籍南安、惠安、同安和厦门的福建人，以及一些广府人。

       菲律宾华社主要由3个群体构成，即老华人、土生华人和新移民。老华人指的是50岁以上的华人。他们有的出生于中国，自幼南来；有的在当地出生，已是第二或第三代。

       土生华人是最庞大的群体。由于成长的家庭背景与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各异其趣。那些在传统家庭长大、接受华文教育的华人，有较强的传统意识；而那些没有传统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华人，则没有中文姓名，更遑论会说写中文。无论如何，这两个群体都已融入菲律宾社会，认同自己为菲律宾人。

       至于新移民，则是指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自港台及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一群。港台的新移民大多是投资移民及技术移民；而近年来则有越来越多的大陆移民，据粗略计算，目前他们的人数多达10至20万，其中以福建人居多。这新一波的移民浪潮，其人数之多大大地冲击着菲律宾原有的华社，引来一丝忧虑。

    华人善于经商，福建人更是以精于营商之道而闻名。菲律宾华人在当地的人口比例虽低，但他们在菲律宾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史上一直扮演着先锋的角色，对菲国的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菲华商人在东南亚国家中的人数比例最高。在16世纪西班牙建立殖民政权之后，中菲贸易随之展开与扩大，绵延了数个世纪。后来虽遭到殖民政府和独立后的菲化政策打压，华商命运几度浮沉，但他们凭着独到的眼光、勇气、勤劳和信用等营商“法宝”，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奠下了稳固的基石。

       “1950年代菲化政策禁止华人涉足零售业，华人被迫放下这传统的行业，转向批发业和工业。谁知坏事变好事，这种转型对华人来说反而是好的。它让华人可以进军更多行业，也因此出现了不少大企业家。”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陈本显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危机可能就是转机。菲华的经济至今还在持续飞速地发展，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经济，并且也赶上国际经济发展的步伐。

       如今，菲华商业触角延伸到各行各业。从木材加工业到钢铁制造业，从餐饮业到房地产业，从轻纺化工到进口贸易业、电信业、食品业、金融业等，都有华商涉足其中，并形成跨领域的经济模式。菲律宾首富陈永栽，就因其生意遍及不同领域，而被誉为“航空大王”、“啤酒大王”、“烟草大王”及“金融大王”等。

       在各领域执牛耳的菲华企业家还有“百货业大王”施至成、“食品业大王”吴奕辉以及“本土快餐大王”陈觉中等。他们经营的都是家族式的企业集团，资金雄厚的集团所涉及的领域包括零售百货业、房地产业、银行保险业、通讯运输业、制造业等。

       由陈觉中领导的 “快乐蜂”（Jollibee）快餐集团，更是一举打败了世界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和肯德基，占据了菲国快餐市场65％的份额。

       当代菲律宾华商虽迈向现代行业，但他们的传统行业在该国仍是举足轻重，颇具分量。据菲华商联的资料显示，2001年涉足杂货及贸易业的华商已有8500多家。近年来他们更积极兴建大型商场，以满足广大的市场需求。

       菲律宾华商经营银行业也颇具历史与规模。在上世纪20年代，菲律宾出现了3家银行，即中兴、华兴及民兴；不过在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以下，最后硕果仅存的只有中兴。如今，菲华经营的银行已超过十家，在菲律宾国内、香港、台湾及美国等地皆设有分行，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性企业集团。

       除了大型企业，菲华也是中小型企业的主力，尤其是纺织服装业。除了外销，在华人聚居的岷沦洛区（Binondo）也可以看到林立的服装店，林林总总的成衣让人目不暇接。该区也是流动商贩聚集的地方。每天早上6点多，辛勤的小贩（其中包括不少新移民），就推着货物到街上摆卖成衣和纺织品，一直到晚上8点才打烊。每逢周末，这里更是万头涌动，热闹非常，喧嚣的人声交织出独特的生活乐章。

       此外，华人经营的餐馆也比比皆是。走在马尼拉市，几乎每一条街道旁都可以看到华人餐馆和小吃店，供应各种风味的中华美食。

       新移民则多数以从事零售业为主，马尼拉著名的一路发商场，即是中国新移民做生意的主要场所。他们多贩卖价格廉宜的中国商品，和当地中小型华商形成新一波的竞争。此外，也有一些新移民在华文学校、报社和工厂等单位工作。

       土生土长的菲华青年通常都能口操流利的菲律宾语和英语，所以他们的发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商业领域。他们多能顺应潮流，掌握经济脉动，进军银行、法律、会计、建筑、设计等行业。华人的生意也不局限在传统的岷沦洛区，而陆续迁至菲政府重点发展的马加地（Makati）商业金融中心。

打败快餐业跨国集团的本土快餐“快乐蜂”, 成为菲律宾华人的骄傲。

    今天，虽然绝大部分菲律宾华人已融入当地社会，而且多信奉天主教，但他们仍强调尊师重道的中华文化，并保留不少传统的习俗礼仪。

       不过，由于菲律宾长期处于西班牙和美国的统治下，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华人所保留的文化习俗也不可避免地打上西方文化的“烙印”。

       这种东西文化的交融，使菲华社有别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

       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佳节，菲律宾华人都会热热闹闹地聚集在岷沦洛大事庆祝。他们也非常重视圣诞节。出门在外工作或求学的华人，无论远近，总要在圣诞节赶回来和家人团聚，就像是中国人匆匆忙忙赶回家过春节一样。他们会在平安夜吃团圆饭，欢聚的热闹气氛丝毫不亚于除夕的年夜饭。

       此外，菲华依然保留传统的婚丧习俗，但也将本地人和西方的仪式融入其中。例如，华人婚礼一般会在教堂举行，但他们在家里依然遵循传统习俗，给聘金、过大礼、敬茶仪式等一件不可少。

       菲华裔青年联合会创会会长洪玉华也说：“菲律宾华人虽信奉天主教，但他们还是沿袭传统的葬礼习俗，为死者穿上寿衣，并焚烧元宝、蜡烛及纸扎物品等给往生者。”

菲律宾华人还有一句话：“死后的安息地要和生前的身分地位对等”，所以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为逝世的先辈建造一座住宅（俗称“阴宅”）。占地约54公顷的马尼拉华人义山也因这些造型各异的阴宅，而成了菲华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义山内分为土葬区、灵骨塔区以及吸引无数观光客前往参观的佳城区。所谓“佳城”就是墓宅，是以大理石砌成的房屋，用来置放灵枢，以让后人前来祭祀。

这些阴宅建筑风格各异，既有排屋式也有独立式，有西式洋房也有中式庭院，楼高一至两层，有的甚至3层，非常特别。据说，一些富豪墓宅犹如别墅，各种设施如空调、抽水马桶、电视机、电冰箱、沙发等一应俱全，平时还有佣人专门照料，与一般生人住宅无异。

建造如此壮观墓地之举，除了是后代子孙对先人的尊敬和爱戴，体现了“孝”的传统文化之外，其背后还有一个历史因素。一个已移民美国的菲华说，很早以前菲华被禁止购置屋产，但墓地却不受禁令的影响，于是华人就在这方面大兴土木，算是满足了“安家”的心愿。

除了祭祀先人，这一栋栋宽广的墓宅还是一个聚会的场合，有着凝聚家族成员的作用。

除了传统清明节，每年11月1日的万圣节，也是菲律宾人的“亡人节”，菲华称之为“番子清明”。菲人会在这一天到亲人墓地去献花悼念。但生性乐天的他们，不但会在墓前点上蜡烛念诵圣经，还在一旁野餐打牌、唱歌跳舞、通宵守夜，颇有与逝去亲友同乐的味道。

       菲华在文化上能兼容并蓄，在宗教上也体现出类似特色。事实上，一种把天主教、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融为一体的混合宗教在菲华社会中极为流行。

       因此，在许多菲华天主教徒的家庭或商店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同时供奉佛祖、菩萨和关公等；此外，在唐人街上，则可以看到人们对着缠满红黄绸缎的十字架烧香膜拜；在马尼拉华人义山的神龛上，圣母、耶稣和佛像也摆在一起供人祭拜。

       在不少当地华人心中，圣母和观音的形象已经融为一体。在巴当加斯省（Batangas）的塔尔镇（Taal），凯萨赛圣母（Virgin Caysasay）被当地华人视为妈祖化身来膜拜；而在加巴朗牙（Capalonga），黑耶稣（Jesus Nazarene）也被华人当作保王善士来供奉。

       菲律宾一些教堂建筑也隐约中具有中国风格。1587年，不少华人工匠参与建造了位于古马尼拉的圣奥古斯丁大教堂（San Agustin）。它融合了欧洲古典建筑风格和中国元素，教堂大门前和庭院内还各摆放了4 尊中国狮子石像。

* *闻名全菲律宾的“马面”（Mami），是当地华人马文禄所售卖的面食。食用时先把面放入沸水浸透，再盛进碗内加上鸡丝碎肉和鸡汤。起初，来自广东省的马文禄只是挑着担子在马尼拉街头叫卖，后来开设面店。虽然马文禄已去世30多年，因其面食在菲律宾曾流行一时，所以现在马尼拉，人们一般仍然把面食叫作“马面”。*
* 菲律宾的华人社团有上千个，它们当中多数是在美治时期，尤其是 20世纪20年代以后成立的。菲国独立后迄今，华人新社团仍继续出现。林林总总的社团包括地缘的同乡会、血缘的宗亲会、业缘的同业公会，以及慈善、宗教、文化、体育与娱乐等组织，其中有代表性的社团包括菲律宾华裔商业联合总会、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菲律宾华人体育总会以及马尼拉中华商会等。
* 于1954年成立的菲华商联总会，是领导全体菲律宾华人团结的重要机构。
* 目前仍活跃的团体约有两三百个，除了关注当地华人的福利与权益外，也与中国家乡有所联系。如中国发生自然灾害，华团便汇去巨款赈济灾黎，并且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也无不慷慨解囊，全力以赴。
* 此外，菲华社团也协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其中各华团所合力打造的“菲华三宝”，展现了华团积极融入主流社会的一面。所谓“华社三宝”，一般指的是“华团、华文报和华文学校”。至于“菲华三宝”，其独特之处则更意在融入社会：第一宝指的是，华商不仅资助华文学校，他们同样出钱出力捐建菲律宾农村的校舍，让菲律宾孩童拥有好的读书环境；第二宝是助人助己的华人志愿消防队，他们服务不分种族，只要有火灾和天灾都赶往现场施予援手，令当地人赞颂不已；第三宝则指的是深入穷乡僻壤的菲律宾华人义诊队。他们解决了各山地民族的医药需求，其悬壶济世的精神受到菲律宾人的高度敬佩。
* “这三宝不仅对菲律宾主流社会贡献良多，亦促进华人和菲律宾人的关系，化解了一些政客和异议分子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使排华的声音随之消弭。” 陈本显表示道。
* 此外，文艺团体如菲华作家协会等则有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例如，菲华作家协会自成立以来，不但广开门户，不囿于信仰派别，成为华文创作者的大家庭；更致力于培育华文文学新秀的工作，出版了许多文学丛书，被誉为菲华文艺界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承者。
* 但是时下不少菲律宾华人传统社团一直面对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窘态。这一点既表现年轻一代对传统活动不感兴趣，也反映出年青一代在民族意识和感情上的变化。
* 伴随着绝大部分华人的入籍、通婚和菲化运动，越来越多华人或主动或被动，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思想与价值观已经西化和本土化。他们不但拥有许多菲律宾人朋友，而且也有越来越多人参加菲人团体。“不同年龄和阶层的菲华在融入的程度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应该融入主流社会，包括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和感情。”当地著名报人吴文焕如是说。
* 虽然对中年以上的华人而言，一时要他们完全放弃中国意识和中华文化，完全融入主流社会，似乎不是朝夕间能办到的事；可是对年轻人而言，融入主流社会不但可能，而且他们愿意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快融入的脚步。
* 上世纪80年代末，菲律宾发生经济危机，华人又差点成了代罪羔羊。在女中豪杰洪玉华的倡议下，一群来自各阶层的华裔青年，认为唯有促进种族间的了解、加强种族间的凝聚力，以及扩大华人的生活圈子，主动融入主流社会，才一是解决种族矛盾和促进和谐的关键，于是在1988年筹组了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
* 他们在《宣言》中这么表示：“我们把菲律宾当作是自己的国家，是我们世世代代生活下去的地方。我们决心融合到菲律宾大社会中去，同菲律宾人共同建设这个国家……我们感到有需要促进华菲之间的了解，改善华菲之间的关系，并愿意为此竭尽我们的努力。”
* 基于这个目标，联合会开展了各项活动，不断改善菲律宾人对华人的认知，致力减少彼此的隔阂和化解矛盾，这包括出版华文周刊《融合》与英菲文月刊《桥》，针对有关融入和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作为沟通种族的桥梁，并参与社会活动，以贯彻“华菲融合，亲如一家，共同建设美好的菲律宾”的目标。
* 位于古马尼拉，创办于1999年的菲华历史博物馆，也是菲律宾华人试图让外界更了解菲华移民史和奋斗史的一大桥梁。这个世界上少数由华人民间团体所创办的博物馆，通过展示华人如何在菲律宾艰苦奋斗、落地生根的历史，以“分享”作为主题，表现了华菲不可分离的共同命脉。
*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菲华社会终于熬过最艰苦的时期，成功融入社会并有了今天受人尊敬的地位。然而，近一二十年来新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华社的结构。由于语言的障碍、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使新移民往往自我孤立，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无法顺利加入当地主流社会，从而阻延了华人融入的进程。这是目前菲华社会普遍认为不得不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他们担心菲华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华菲良好关系会毁于一旦。
* 于是菲华社积极展开沟通活动，例如举办新移民座谈会，向新移民解释本地的移民法和营商法令。此外，许多华文学校也为照顾新移民学生，还开办特别班教导新移民了解当地文化及学习英语，以方便沟通和融入当地社会。

在菲华历史博物馆里有一首名为《我是菲律宾人》的诗歌，透露着当代菲华融入社会的心声，也显示出他们的身份认同。     菲律宾独立后，菲政府推行华文学校菲化政策：规定不许注册新华文学校；现存的华校中文课只能作为外语教授，每天授课不得超过100 分钟；禁止采用台湾编印的教科书，中文教师也只能在当地聘请。

       华校菲化导致当地华裔学生的中文水平及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急剧下降，但这也加强了学生对菲律宾的认同，加速融入主流社会。

       目前菲律宾有150多间华文学校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131间归属在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旗下。虽然华文学校数量不少，但华人子弟学习华文的意愿并不强，再加上学费不菲，最便宜的也要每学期一万比索，最贵的则高达十多万，所以辍学率日益增加。

       据了解，在这几年里，华文学校华人学生的人数锐减30％至50％左右，发展情况令人担忧。

       虽然中国的崛起让菲政府开始致力提倡中文，然而，当地华人的学习热忱非但没有提升，反之每况愈下。大多数青少年会把学习菲律宾语和英语放在第一位，不重视华文的学习。加上商场上多使用方言和英语，在大环境之下，华语往往被放弃。

       因此，菲华商联总会、华教中心、各华文学校都竭尽所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菲华商联总会引进不少中国师范大学的志愿老师，捐建华校，创办华教中心的双联课程，修订课本，保送学生赴中国厦门进修，与菲律宾著名的雅典耀大学开办孔子学院等，期望把华文教育向前推进。此外，华文教育也获当地华人商会和不少校友热心支持，包括提供助学金和贫寒子弟奖学金。

       除了生源问题，菲律宾华校如今面对的问题，还包括教学语言问题：华校究竟应该用闽南话还是华语（普通话）来教学？

       菲律宾的老移民和新移民大都来自福建，他们会把闽南话放在首位，认为闽南话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也是菲律宾主要的商业语言，先学闽南话是理所当然。另一方面，一些家长和商界人士则认为，从中国崛起的长远发展来看，华语的使用范围会比闽南话来得广，所以各华校应该以普通话授课。也有人主张，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用闽南话教学，小学高年级开始用普通话授课。

       这种情况在菲律宾各华文学校体现出来，可以看到课堂上语言的使用往往相当混乱，出现了闽南话、英语、菲律宾语和华语一起使用的现象。

       如何提高华人下一代对华文的兴趣，及用何种语言教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菲律宾华团、校方和各界人士的热心付出与参与中，可以看到在菲律宾华文的前途，仍透射出希望的曙光。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菲律宾华人的生活一度被绑架的阴影所笼罩。

       早期殖民政府长期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种族间的感情，加上后来种族主义分子和政客的曲意渲染，使菲律宾人相信华人是经济剥削者，或华人都是富有的一群，于是华人便常常成了被绑架的目标。

       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菲律宾治安不靖，令华人闻之丧胆的绑架案不断上演。单单在2003年8 月，当地就发生了约20起华人遭绑架案。令人费解的是，面对绑架问题的华人却鲜少报警，往往只是选择默默忍受。

       华人深怕自己成为绑匪的下一个目标，所以只好紧闭家门，足不出户，即使出门也得大费周章，要经常更换上班时间、路线和交通工具。华商的生意也因此大受影响。

       公民反罪恶行动组织主席，有“华社花木兰”之称的学者洪玉华曾带领菲华裔青年联合会等华团进行和平示威，除了呼吁政府正视绑架问题，也教育人们如何应对及报警的重要性。

       有鉴于绑架案日趋严重，总统阿罗约特别向华社做出承诺，加强军警巡逻并成立专门打击绑架罪犯的部门，也出动军队搜捕绑匪，解救人质。如今，在各方的合作下，菲律宾治安已日渐好转，华人的信心也逐步恢复。

       在历史的长河中，菲律宾华人备受排斥、歧视、驱逐与屠杀。但在劫后余生之后，华人移民往往又卷土重来，生生不息。马尼拉城因此成了华人的聚居地，唐人街上人潮汹涌，华人商店林立，华人在经济领域上独领风骚。

       尽管苦难深重，处境凄惨，菲华竟能凭着坚韧的意志逆境求存，屹立不倒；他们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顺应时势，毅然入籍成为当地公民，并主动融入主流社会，成为菲律宾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他们向世人如此宣告：

       “我继承着我的华人祖先的遗产，有着我的祖先高尚的精神，我为菲律宾，我的国家服务……”

       “我是菲律宾人。”

（摘自菲华历史博物馆《我是菲律宾人》一文）

泰国

    旧称“暹罗”（Siam）的泰国，民风淳朴，是举世闻名的“微笑之邦”。最早的素可泰王朝（Sukhotai Dynasty）建立于1238年，现有76个一级行政区，是东南亚唯一不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君主立宪制下的政府主管国事，但泰王地位崇高，受到人民由衷的爱戴。

       这个盛产稻米、崇尚和平的“黄金佛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印半岛上重要的鱼米之乡，同时也是南传小乘佛教的重镇。这里有许多诱人的名胜古迹，又被一层神秘诡异的宗教氛围笼罩着，各地游客长年蜂拥而至，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情，急于揭开面纱看个究竟。

       踏上这块神秘胜境的人们，往往在僧云寺海中获得崭新体验之外，也为泰国人友善的目光，以及遍地是华人的境况，暗暗感到诧异。那一股无法形容的柔畅之风，伴随着仿佛亘古永存的祥和之气，缭绕在千尊佛陀的圣像之间。

       数百年来，华人和泰人早就“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代代的华人，就在这祥和的土地上安居乐业。

    华人到泰国来谋生及定居的历史，已经达8个世纪之久。早在素可泰王朝时代，中国东南各省份的华人便已陆续移民泰国。

       那时候，克拉地峡（Kra Isthmus）两岸的春蓬（Churnphon）、六坤（Ligor）与素叻他尼（Surat Thani）等商港相当繁荣，以致南来的移民日渐增加。在15世纪初，有华人以逞罗使者的身份到中国去朝贡，而郑和下西洋的事迹就发生于阿瑜陀耶王朝（Ayudhya Dynasty, 1350 - 1767 年）的统治时期。

       到了16世纪，已有华人矿工开始于泰南建立基地。与此同时，中国的江洋大盗林道乾携同部众约2千多人到北大年（Pattani）落户，并与当地女王成婚，在当地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华人社会。

       16世纪初，阿瑜陀耶城就有了华人的聚集区。那时，华人和日本人、葡萄牙人展开了十分激烈的商业竞争，华商总是占上风，最终更成为皇家贸易的代理人。直至17世纪末，暹罗的华人人口约有十万人，他们多数来自福建和广东，属于商贸移民。

       在1767年，缅甸大军压境，并且攻陷阿瑜陀耶城，华人和当地人齐心合力抗敌。最终中泰混血儿郑昭率领部队突围出城，接着领来援军。成功击退缅甸大军。由于阿瑜陀耶城已经成了焦土一片，他就将首都迁往湄南河西岸，并建起吞武里王朝（Thouburi Dynasty, 1767 - 1782年）。

       郑昭的原名是郑信，母亲为泰国人，父亲郑镛则是广东澄海人，移民至暹罗之后才发迹。英勇善战的郑昭在战后全力削平其他势力，收复失地统一暹罗。在郑昭统治暹罗的15年间，极力鼓励潮州人前来经商或种植胡椒与甘蔗等。故此，湄南河东岸附近的王城处，出现了一个新的华人聚落。

       郑昭逝世后，曼谷王朝（Bangkok Dynasty, 1782年至今）成立，此后皇家贸易也空前繁盛。华商大批涌入，市场一片兴旺。国王拉玛一世在曼谷核心地带兴建了一个华人商业区。随着1850年代经济蓬勃发展，华人的移民步伐更是大大加速，加上大批劳工移民蜂拥而至，19世纪末时华人已遍布泰国各地。

       泰国大部分华人来自福建及广东。20世纪初，潮州人占了绝对的优势，总数的40%，其他是海南人18%、福建人16%、客家人16%、广府人 9%。潮州人之所以居多，除了因为郑昭当年的大力招揽，另一个原因是曼谷和汕头之间的海运往来频繁。

      要准确统计泰华社会的人口，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泰国近6千万人民当中，约2千万人拥有华人血统。据估计，泰华的人口约有700万左右。

       除潮州人外，另外还有海南、客家及福建人等，多聚居在曼谷、清迈（Chiang Mai）或合艾（Hat Yai）等大城市里。

       泰国的每一步发展，都留下华人的足迹。华人在经济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主导金融、钢铁、汽车装配、房屋开发等工商领域，正大集团、盘谷银行、律实他尼集团等，更是平地崛起，成为一批跨行业、跨地区乃至跨国界的大企业机构。

       除了经济，华人在政治上的表现也非常突出，各党派人才辈出，其中不乏内阁部长及总理。在负责保家卫国的军警队伍当中，华人不在少数。

       多年来，华人广泛吸收泰国文化，并把许多中华传统融入泰国社会。与其说泰华社会被“泰化”，倒不如说它是中泰文化融汇的产物。

       曼谷的耀华力路（Yaowarat）一带是历史悠久的唐人街。在这里，中文招牌、中华美食、华人庙宇触目可见，整条街从白天喧腾到黑夜。走出这里，中文招牌少了，但遍地依然是华人的身影。如果不是耳边的泰语呢喃，或那些从身旁呼啸而过的七彩“Tuk Tuk”车，人们会误以为自己身在香港的闹市之中。

   在泰国政府的公平政策下，华人在此找到了归属感，自然将自己看作“泰国人”，并引以为荣，尽管拥有华人血统，却不会刻意提起。尤其是中泰通婚家庭中的混血儿，更是强烈认同“泰国人”的身份。

       泰国华人人数众多，大致可以分成四大源流：老华人及其后裔、泰北中国老兵及其后裔、中国大陆新移民及台商。这四大源流的华人，在泰国社会各具特色，形成一个多元的泰华社会。

       老华人及其后裔，是泰国最大的华人群体，以潮州人为主。他们在泰国生活了两三代以上，持泰国国籍，普遍与泰人通婚。第二、三代华人后裔的长相虽还具有华人的特征，但其他方面已经完全融入当地，与一般泰国人无异。

       泰北的中国老兵，是非常特殊的华人群体。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部队93师被击败，退居泰北，后来协助泰国平定了北方的骚乱，获泰王颁赠泰国国籍，从此在泰北一带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他们以云南人居多，几乎都已有泰国国籍，不少人也与泰人通婚。泰北华人大多聚居在一起，因此将云南文化和特色保留得非常完整。

       至于台商和中国新移民，则是带着投资的动机移居而来。台商更早登陆泰国，大多投资于工商领域，如餐饮、旅游、科技业，或设厂发展制造业。中国新移民，则在中国开放之后，纷纷涌入泰国进行投资，涉猎领域相当多元，包括科技、化工和制造业等领域。

       不管是台商还是新移民，他们大多拥有不错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当初都是为了挣钱而来。但逗留的时间一长，他们往往爱上了泰国的多元与民主。许多人在此住了一二十年，始终舍不得离开，他们已渐渐将泰国当成一个避风港。有不少人干脆就在此安家落户，与当地人通婚，加入了泰华社会大家庭。

 从移民变成国民，有些华人的民族特质逐渐淡化，但社会地位却获得提升。在此开枝散叶的华人，一般以家族生意起步，凭血缘联系铺下商业网络，在东南亚创造了经济奇迹。难怪有人说，华人是泰国资本主义的先驱。

       泰国华人早期从事大米贸易，之后跻身新兴商人阶层，大大刺激当地的商业发展。凭着多年的从商经验和雄厚资金，华人至今仍在工商界扮演着主导的角色。

       全国十几家银行中，超过三份之二是华资银行，泰国规模较大的盘谷、大城、京华、泰华农民等银行，主要股东都是华人。此外，在商界呼风唤雨的泰华不胜枚举，包括曾获泰国一等白象勋章的金融大王、盘谷银行总裁陈有汉博士，以及碾米业大王黄作明、保险大王马灿雄、鳄鱼大王杨海泉、林业火锯大王陈卓豪及泰国橡胶种植业巨掌许心美等。

       泰华经济并非成于朝夕之间，而曼谷唐人街，见证了华人的经济成长和转型。

       曼谷唐人街是泰国最古老的商业区，由三聘街（Sampeng）、耀华力路和石龙军路（Charoen Krung）3条主要街道组成，外加几十条围绕着主街道的小街。这些纵横交错的小街，大多以行业来命名，如布街、童装街、米街、咸鱼街、蚊帐街、打锡街等。许多华人老店铺，都在这里经营了好几代，残旧的老屋诉说着华人走过的历史。

       密密麻麻的中文招牌、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摆满摊档的走廊跟络绎不绝的人潮，共同构成了唐人街繁华的景象。

       如今，唐人街的热闹依旧不减当年。耀华力街上，三五步就看到华人开设的金行，百年老字号比比皆是。泰人喜欢买金保值，从金行的兴旺便可以看出端倪。当时尚女性嫌黄金俗气，纷纷转戴白金饰物时，唐人街金行的人潮却依然络绎不绝。诸如金链、耳环、手镯、等金饰都深受欢迎。

       除金店外，唐人街还有数不完的华人钟表店、中药店、餐室、杂货店等。店铺大多保留了残旧的原貌，却焕发勃勃生机。华人店铺一般不大，货物从地面排到天花板，华人“物尽其用”的本色可见一斑。令人惊奇的是，老板总能在杂乱拥塞的环境中，第一时间找出顾客想要的东西。

       唐人街上许多店铺，都是老一辈华人奋斗多年的成果。如今，年轻一辈都已走出老街，足迹踏遍全国。第三、四代的华人，有些还传承父业，但更多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纷纷投入金融、科技、服务等领域。

       华人当中也不乏爱挑战、思创业的年轻人。这群新崛起的青年才俊，不像父辈那样，局限于家族生意或传统行业。他们另辟蹊径，积极投入地产开发、汽车制造、出口贸易、旅游、酒店、科技、零售等新型行业。

       另一些年轻人，则将家族企业打理得有声有色，通过先进的管理方式突破瓶颈，把企业重新定位，式突破瓶颈，把企业重新定位，携带巨资，往泰国设厂发展成衣、五金等制造业，均取得不俗的成绩。

       此外，泰华在政治舞台也很活跃，历任泰王总爱委任华人为大臣。担任过总理或副总理的华裔，计有阿南、差猜、素金达、披猜、挽限、川立沛及前首相达信等，曼谷几任的市长，也都由华人来担任。

* *泰国曼谷有一长约50公尺的“演说街”（Thanon Mangkon），为孙中山1908年到此宣扬革命思想的历史遗迹。*
* *华人每年的春节庙会活动，泰国公主诗琳通都会前来参加，操一口流利华语的她极受爱戴。此外，耀华力路口的 “圣寿无疆”大牌坊，也是由她亲手题赠。*
* 泰国各省都有华人居住，但主要集中在城市里。“动感之都”曼谷人口密集，超过半数的居民拥有华人血统。走在街上，迎面而来的多是熟悉的华人脸孔。纯华人一般拥有较白暂的皮肤，样貌相当容易辨认。中泰混血儿则有更多泰人特征，如皮肤较黝黑，华人特征较难察觉。
* 这是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对多元、新颖甚至奇异的文化都能兼容并蓄，但又遗存了亚洲社会的保守风气。
* 在这独特的氛围下，华人打扮时尚入流却绝不暴露，在公共场所的举止都很有分寸。华人平日多用泰语交谈，语气温和，与一般的泰国人没有两样。
* 泰华社会中，出身小康者居多，但家财万贯的富豪也大有人在。有人说：“泰国是块好福地，消费低廉，赚钱容易，发达的梦想绝非遥不可及。”只要肯努力付出，华人一般在十年之内就能住洋房、开大车，家中还有佣人服侍。泰国的房产价格合理，多数华人都拥有个人的产业。
* 几百年来，中泰文化早已水乳交融，连华人、泰人的家居风格，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泰国，人民对“全民偶像” 泰王极为尊敬，华人也不例外。他们家里未必会挂上传统的对联或山水画，但泰王的照片、海报，或其他印有王室徽章、肖像的装饰品却少不了。由于大多是佛教徒，华人也爱摆设佛像、佛珠，甚至会在风水方面下工夫呢！
* 与泰人家居有所不同的是，华人保留了供奉土地公及祖先的习俗。主人家是否有华人血统，一进门就能看出端倪。大部分华人家庭，对传统信仰、习俗都相当重视。他们一般会在客厅里安置土地公神龛，临近天花板处则摆放祖先的牌位，早晚按时上香。即使在海外生活了好儿代，饮水思源的华人仍希望子孙能通过种种传统习俗，如春节酬神祭祖等活动，牢记自身的根源所在。
* 对华人来说，泰国就是“美食天堂”。无论是泰国餐、传统中餐，还是各国料理，华人都无法抗拒。每逢周末假日，华人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身影闪现在泰国各处的大小餐馆。不管是洽谈生意、家人团聚、朋友聚会还是情侣相会，都少不了满桌的佳肴美馔。
* 受泰人饮食习惯的影响，当地华人的口味也开始变重。他们不但嗜辣，也对泰式酸辣冬炎汤、凉拌木瓜沙拉等酸咸滋味非常喜爱，就连吃起中餐，也不忘拼命加上辣椒粉或辣椒。不过，曼谷华人特别嗜甜，总是潇洒地在中式面汤或一般食物上，撒下大把白糖。此外，华人传统美食，如猪脚饭、清汤面、叉烧烧肉等几乎随处可见，作为高级食材的鱼翅和燕窝，更是获得华、泰人民一致认同的珍品。
* 在曼谷唐人街的三聘市场，可以很方便购买到中餐食材，选择也相当齐全。泰国的华人家庭，一般还是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规矩，由太太负责全家人的起居饮食。她们的烹调手艺，主要传承自母亲，因此保留了不少家乡风味的菜式，同时也会烹制传统的应节食品，如端午节的肉粽、中秋节的月饼等。

       在曼谷街上，中文招牌处处可见，会让人有一种中文十分通行的感觉。不过，当你真用华语跟当地华人交谈，却会迎来一脸的错愕。

       其实，泰国会说华语或能看懂华文的华人非常少，讲华语的大半是年过半百的长辈。华人早已经融入泰国社会，泰语说得比华语还溜。年轻一代的华人，多半对华语一窍不通，而第三、四代潮汕人，多数也已经不会说潮州话了。

       华语会在一代代华人的生活中消失，与泰国的教育政策息息相关。

       自1930年代开始，基于政治的因素，泰国禁止学习华文。原有的 300多所华文学校，在禁令颁布后无法公开教授华文，华人只好偷偷开办华文补习班。二战之后，泰国政府采取统一政策，推出泰语教育，以泰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

       在一片凄风苦雨中，华教在泰国没法修成正果，华文补习班几十年来，始终无法重振声威。直到1992年，中泰恢复友好的关系，华教才开始露出曙光。

      如今，泰国政府积极推广华文教育，华文正式享有与英、法、德、日等外语教育同等的地位。小学华文从过去的4年级，改成授课至6年级，华文也成为中学外文的选修科之一。国内著名大学，如朱拉隆功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等，都开办了华文专业，以作为招生的卖点，并培育了一批精通华文的硕士生。

      另一方面，华文补习学校也与日俱增，泰国76个一级行政区的华人社团所开设的华文补习学校、夜校、培训班、华文讲座等不胜枚举，其中东方文化书院的规模最大，属于个中翘楚。

      由于精通华文的人不多，致使泰国华教面临师资短缺的严重问题。清莱的皇太后大学（Mae Fah Luang University）成立了“泰国华教促进会”，举办华文师资培训班，并计划在曼谷开办一所华文师资培训中心，以期能彻底解决华文师资问题。此外，基于师资问题的急迫性，泰国华文民校协会也屡派教师赴中国培训。

     泰国华教能否扭转乾坤开创一片天，令人关注，毕竟在许多华人社群中，泰语已成为日用语言。尽管上了华文学校，但由于缺乏使用华语的大环境，许多毕业后的华人子女，华语还是不太流利。在这里定居多年，泰语早已取代华语，根深蒂固地渗入了泰国华人脑海深处。

      现今，除了大量增加的中国游客，数以万计的华人新移民，也为泰国华文教育带来新契机。如果华人新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甚至超过泰化的华人人口，那么华文教育的重生指日可待。此外，华人家庭开始重视孩子的华文教育，对泰国华教发展而言，也是一次重要的转机。

* *直到今天，泰国的商家、政要主要还是潮汕人。据统计，泰语中的外来语，超过300个是用潮语发音，如“耀华力”、“新正如意”、“食斋”等。泰国潮汕人“称王入相”，举国上下充满“潮味”，堪称“海外潮汕”。*
* 过去，中文报刊是华人和泰国主流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
* 然而，随着华人逐渐融入泰国社会，中文报刊的存在价值备受考验。泰国目前拥有6家中文日报，即《世界日报》、《星暹日报》、《中华日报》、《京华中原联合日报》、《亚洲日报》和《新中原报》。这些中文报刊，大多拥有超过30年历史。除了《世界日报》将读者群锁定为新移民及台商之外，其余5份报纸的主要读者都是老华人。
* 这6家报章的总销量，目前大约只有6万至7万份。这么小的市场，同业间的竞争岂不是更激烈？大部分报人认为，竞争还谈不上，大家眼前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升市场需求，让中文报继续生存下去。
* 当地的泰文报纸，都用国内新闻来当头条，而中文报章却以国际新闻为头条，弥补了泰国报纸内容上的不足，固定的读者几乎都是老华人。他们仍抱着落叶归根的心态，非常关注中国的动向，希望通过华文报获取更多相关信息。至于年轻华人，由于强烈认同“泰国人” 的身份，因此对泰国的关心甚于中国，一般只选择泰文报或英文报。
* 除了读者不多，中文报业也面临新闻从业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
* 华文教育停滞了数十年，导致中文新闻从业人员出现巨大的断层，报馆都靠老报人在把关操持。中文程度较高的泰北华人是报馆的生力军。
* 近年来，新移民不断涌入泰国，稍微缓解了人才短缺的问题，加上中泰密切合作，华文教育逐渐受到重视，必定进一步推动中文媒体的发展。报人们普遍认为，中文报业应该把握良机，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 华人和社团的关系可谓唇齿相依，华人社会的发展靠社团的扶持，而社团的壮大与否，又取决于华人事业上的成就。
* 泰国的华人社团很多，最久的达百年历史，但大多数都是在二战之后才成立的。它们大致分为5大类，即乡土团体、宗族团体、慈善团体、宗教团体和商业团体。
* 泰国九属会馆是一个团结乡亲、凝聚泰国华社力量的最重要的社团。它由潮州、客家、广肇、海南、福建、江浙、台湾、云南和广西9 个会馆组成，成立时间各不相同。历史最悠久的广肇会馆，已有超过 120年的历史；而最年轻的广西总会，成立还不足30年。目前，人数最多的潮州会馆，担负着领导九属的重任。
* 泰国中华总商会算是最高的侨团机构，负责推动泰华工商界的团结与合作，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除了老华人，新移民和台商也成立了不少组织。泰国华人青年商会凝聚了年轻有为的新移民企业家，彼此相互扶持以提升竞争力。台湾商人也成立了台湾总商会，促进台商在泰国的发展。
* 深受当地认同的华人慈善团体，更为所有需要协助的泰国公民，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其中以报德善堂、明满善堂为代表，积极推动慈善、公益活动。
* 尽管大部分华人已经同化，但泰华团体却想方设法培育出新一代的接班人，以继续维持、发扬中华文化与精神。
* 宗教信仰是泰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泰华亦然。华人以佛教徒居多，基督徒和回教徒所占比例极少。曼谷的唐人街有一座著名的华人庙宇——龙莲寺，长年香火不绝，信徒无数。
* 此外，藏身于大街小巷中的华人寺庙如关帝庙、观音庙等，也有不少膜拜的信众。泰国的寺庙多如繁星，华人不怕找不到上香之处，只愁没时间走访所有的寺庙。
* 扶老携幼前往寺庙烧香拜佛，可说是华人全家参与的活动。在泰国的寺庙里，随处可见衣着前卫的年轻华人，携带着供品如鲜花水果、各色糕点、蜡烛、香枝和金银元宝等，虔心地在烧香礼佛。
* 每逢喜庆节日或佛诞，庙里更是香火鼎盛、人潮涌动，袅袅的白烟，缭绕着男女老幼虔诚的心。祈福的、还愿的、捐钱行善的人群，整日络绎不绝。
* 华人大多为佛教徒，但潮汕人由于受到祖辈影响，对传统的民间信仰也很虔诚。除了礼佛，他们也崇拜神明、神话或历史人物，如八仙、林默娘、孙悟空等。从商的华人一般供奉财神，祈求大发利市；有些则崇拜关公，希冀团结乡亲，把忠孝节义的精神传承下去。
* 泰华社会多元丰富，一方面融入本土的风俗人情，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习俗，真可谓百花齐放，特色鲜明。
* 在华人密集的曼谷，最热闹的日子并非在春节期间，而是在春节前一个月左右，大家开始办年货的时候。唐人街一带，放眼尽是排山倒海的人潮，以及琳琅满目的年货，诸如对联、金元宝、假红炮、十二生肖装饰品等，四处一片红彤彤，令人目不暇接。小贩们还售卖各色引人垂涎三尺的应节食品，如芦柑、糕饼和肉干。
* 办年货的人太多，唐人街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 然而，春节前的繁华景象却在春节期间消失了。曼谷华人说：“虽然春节不是法定假日，但华人大多会休假，曼谷街头因此显得特别冷清！”留在当地过年的华人，则会相互拜年，举行家庭聚餐。
* 若身在距离曼谷北部约300公里的北榄坡（Nakhon Sawan），则更能够体会到春节的热闹气氛，因为这是华人春节习俗保留得最完好的城市。每年春节，这里都会举办游神盛会，至今已有七、八十届了。活动内容洋洋大观，有中国民间艺术表演、舞狮舞龙、武术表演等，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
* 除春节外，华人也庆祝端午节和中秋节。在曼谷的唐人街，常年都买得到粽子，逢端午佳节更是不在话下；说到中秋节，早期唐人街一带，家家户户会在农历八月十五设好神坛，摆上祭拜月亮娘娘的供品，而如今在曼谷的各大商场，中秋前后都设有“月饼专卖柜台”，推出传统及其他口味的月饼，包装特别讲究。
* 话说回来，其实泰华社会，对泰国的传统节庆更感熟悉。许多土生土长的华人，从小就在当地度过大大小小的泰国节庆。例如元旦当天，华人会依当地习俗，前往9家寺庙去膜拜，水灯节也会一同到河边去点水灯祈福。但最热闹的，莫过于泼水节这个举国欢庆的节日。每逢其时，在炎炎的天气下，华人泰人不分你我，互相泼水祝福对方，体现出华人与泰人之间深厚的情谊。
* 在泰国北部，素有“泰国香格里拉”之称的清莱府一带，有一群华人在山林里居住超过半个世纪。他们是当年滞留于此的国民党93师军人及后裔。这里仿佛是一个中国云南人聚居的部落，村子主要由云南人组成。近年来，也有不少台商来这里投资和定居。
* 清莱府最有名的华人村叫美斯乐（Mae Salong），绿浪起伏的山头，种植着品质优良的茶叶和蔬果，人们不再需要扛着枪过日子，他们从事种植或旅游业，生活安定平静。跟城市华人相比，泰北华人大半仍过着清贫的生活，房子简陋。不过近几年，茅草房都改建成洋灰房，水电也已一应俱全。
* 邻里之间都说云南话或华语，中文在这里比泰文更通用，华人经营的店铺都有中文招牌。此外，泰北有80多所中文学校，孩子们可在闲暇时间，到学校提升自身的中文水平。尽管得不到政府的认可，但中文学校却在华人的支持下走到今天，造福了不少华人子弟。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往城里跑，掌握中、泰双语的他们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许多人当起华商的助理、翻译或中文报馆的编辑、打字员等。
* 泰北华人热爱中华文化，保留了大量的云南人生活习惯和礼仪。他们用碗筷吃着道地的云南菜，热烈庆祝华人的喜庆节日，并遵守传统的中华风俗习惯。富丽堂皇的云南会馆，正是他们自豪的展现。为了让后人记得祖辈的付出，以及泰王和国家对华人的恩惠，他们在美斯乐建立了一个泰北义民文史馆，让泰北华人的历史永远流传下去。
* 华人到寺庙烧香拜佛之外，另有一桩绝不会忘记的事，那就是捐款。行善首要在心意，善款多寡倒是其次。泰国崇佛的华人大抵相信因果，毕竟“须念世上苦人多”呀！
* 原本供人烧香膜拜的寺庙，也成了凝聚华人力量的场所。寺庙毅然办起了慈善事业，并逐渐发展为善堂。
* 报德善堂是泰国规模最大、声望最隆的慈善机构，成立至今已近百年。1910年，泰国侨领郑智勇与12名华人在唐人街共襄义举，购地修盖了大峰祖师庙，取名“报德堂”，后改称“暹罗华侨报德善堂”。早年来到泰国的华人普遍贫困，那不幸客死异乡的，死后甚至无人领尸，善堂便负起了收埋无名尸骨的责任，后来还开设了华侨医院，造福同胞。
* 报德善堂初期只用了2千泰铢注册资金，如今拥有的资产接近数十亿泰铢。善堂能有今日的规模，除了热心华人的支持，也不能不提第二任掌舵者郑午楼的热心灌溉。郑氏将企业管理的丰富经验运用到慈善事业上，将善堂办得有声有色。除了医院，还设有华人义山及华侨崇圣大学，大学还开办中文系。善堂的成就，赢来了当地一致的肯定和赞扬。
* 泰华拥有数百个大小不等的慈善团体，名声传遍东南亚各地。多年来，它们在泰国社会修桥铺路、创办学校、提供医药服务及筹募善款。这种无私的付出，不但令华族、泰族之间的隔阂消弭于无形，更促进了彼此的情感交流。
* 佛教的慈悲和宽容，似乎渗透入每个泰国人的心灵。八方云集的朋友，不分你我，安然共处于这片气氛和煦的土地上。
* 有人说，这里的华人已经被泰化。但从另一面来看，华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力，何尝不是深入泰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曼谷，这个华人最密集的泰国城市，不正每天展现着华人社会强盛的活力吗？
* 当许多海外华人感叹孤儿命运之际，泰国华人，却已经在这“微笑之邦”中谱写出一段又一段美好的家园故事

寮国

* 寮国有“万象之国”的称号，北临中国，东与越南接壤，西以湄公河为界和泰国相隔。它是印支半岛上唯一的内陆国家，80％的国土是山地和高原，森林覆盖面积很广。如此地理环境，造成寮国交通不便，开发起来更是困难重重。因此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它较为落后贫穷。
* 不过，这里的人民却出奇地乐观知足，68个民族融洽相处，安居乐业。华人人口排在三大少数民族——越南人、束埔寨人和缅甸人之后，但他们对寮国的经济却贡献良多，并且与寮国人感情融洽，广受社会欢迎。
* 1997年，奉行社会主义的寮国加入东盟，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企业前来投资。为迎接2009年的东南亚运动会，它更是全力发展硬体设施，振兴经济。
* 寮国，似乎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根据记载，在数世纪以前，华人已经来到寮国。他们翻山越岭从中国云南以及广西边境进入寮国。

      那时，寮国境内经济不发达，只有一些被称为“马帮”的华人商队，每年2月会来到这里经商，通常只逗留一两个月后就离开。

      19世纪末，华商开始从越南及柬埔寨移居到寮国来，并且在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和万象建立家园。

      1893年，寮国成为法国保护国后，殖民政府为了开发寮国，于是颁布种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华人移民前来，例如允许他们开垦土地、可自由出入境、出入口货物皆可免税等。当时不少本已离去的华人，因此卷土重来。

      二战过后，寮国于1945年取得独立。为了解决国内资金的问题，政府大力鼓励外侨投资。这时，华人移民的数量自然略有增加。

      然而，1962年寮国发生政变，不少华人所开设的工厂均被没收。稍后，华人重整旗鼓，并于70年代初达到了巅峰时期，估计当时的华人人口至少已达十万人之多。

      那时的华人大多数相当富有，他们主要居住在接近泰国的湄公河流域，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与此同时，华人社团纷纷成立，华文教育也迅速发展，当时共建立了20多间华校，学生人数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人；而华文报刊也随着出版。

      1975年到1984年之间为寮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停滞期。这期间，由于寮国与越南结盟，1979年又跟随越南公开反华，导致中寮关系紧张。当时的寮国政府甚至没收华人的财产，封闭工厂及商店，只允许华人进行小本生意，华文教育以及华文报刊亦遭到全面禁止。

      当时有九成华人纷纷逃往泰国、印尼和新加坡，或转往欧美各国，其中不乏财力雄厚者；而留下来的，则大多数是幼童或中老年人。在大逃离事件发生后，华人人口遂锐减至5千多人。

      而今，每当提起这些陈年往事，寮国的华人总是轻描淡写。许多年长者觉得，寮国华人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这里并没有发生过真正大规模的排华行动。即使是在中寮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善良的寮国人与华人依然和睦相处。

      到了1986年底，中寮终于恢复往来，为当地的华人华侨带来了新希望。

      近20年来，随着两国之间展开亲密的邦交，许多中国的创业人士及企业家，纷纷迁移到寮国。

      此外，不少东南亚华人以及少数早年离开寮国的华人，也都选择到这里发展。华人人口的数量因而再度上升，使寮国华社又迎来了一个春天。

* *寮国华人多数为生计奔波，几乎无人愿意参与政事。有“华人之光” 称号的华裔凌绪光（宋萨瓦・伦萨瓦），是寮国政界凤毛麟角的华人之一。他曾出任寮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又当选为寮国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 寮国华人有这样的说法：万象以南，多为广东潮汕人；万象以北，则是云南人的聚集地。
* 除了潮州人和云南人，寮国也有客家人、广府人、福建人和海南人。据万象中华理事会登记在册的华人大约为3万人，其实边远山区的华人和流动性大的新移民却无从统计，确切人数不得而知，据估计全国华人人口超过十万。寮国华人主要居住在万象、百细（Pakse）、琅勃拉邦和沙湾拿吉（Savannakhet）等城镇。
* 如今，超过95%的老华人已经取得寮国国籍。他们和寮国人的通婚率高达90%以上，在第三、四代的土生华人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寮混血儿。寮国的经济发展缓慢，但大部分华人都过着安稳的生活。这里财力雄厚者并不多，华人多数是投资于中小型企业、经营小商店的小老板。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多在私人公司或政府部门任职。
* 1975年的大逃亡事件，使华人社会元气大伤。但留下来的华人，并没有放弃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但同时也吸取教训，更开明地接纳当地文化，淡化了那浓郁厚重的华人色彩。
* 近几年，中国和寮国之间经济往来频密，中国在寮国投资的发展项目越来越多，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企业家、商人、技术人员陆续到了寮国，这个群体人数不断增长，当地人把他们称为“寮国新华侨”。他们不仅为寮国经济注入活力，也把丰富的中华文化带来这里。
* 万象是寮国华人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它虽为一国之都，看起来却像一个小城镇。这里没有摩天高楼，城中最讲究的建筑物就是庙宇。市内有许多老店铺，泛黄的招牌上偶尔可以见到熟悉的方块汉字。由于是内陆地区，万象有一股挥之不散的沉闷气息。无风的下午，一切看起来是静止的，仿佛连时间也睡着了。
* 没错，这是21世纪的寮国，但这里的人们，仿佛依旧过着上世纪的生活。寮国华人保持着一颗单纯的心和淳朴的生活方式。他们并不一定受过高深教育，但谈起生活，个个都是哲学家。他们走路悠然自在，脸上也常常挂着笑容。
* 近几年来，世界各地都在拼命推广“慢活”、“有机饮食”等健康概念，或许这群寮国华人不曾听过这些新颖名词，但他们却都是健康生活的实践者。一名华人说：“这里的蔬果都没有农药，牛羊猪等都是用天然饲料喂养，可以放心吃。我好几年都没生过病了！”
* 寮国医疗设备虽不发达，但华人一般都非常健康长寿。这没有污染和压力的生活环境，一直是华人深爱寮国的原因。
* 寮国华人虽不富裕，但日子过得写意；生活作息很有规律，睡得早，也起得早。一般华人店铺在清晨六七点开始营业，到傍晚六点左右打烊。睡午觉则是寮国人不成文的规定，不少华人商店也墨守陈规，在中午休息一段时间。因此，午后的寮国，总是特别宁静。
* 大部分华人的商店都是家庭式经营，因此休假时间较自由。一般的商店都会在星期日休业，但是有些华人商店在星期日也照常营业。
* 虽然寮国华人努力上进，却也甘于平淡，对物质不会过份要求。他们既不需要住大洋房，也不喜欢开大房车。永珍善堂的林主任说：“大部分华人像寮国人一样，骑着摩托车自由穿梭在大街小巷，遇到熟人便挥手打个招呼，或者停在路边闲聊起来。”
* 寮国华人社会中甚少出现年轻人不婚或不生育的现象。华人的家庭观念浓重，成家立业的秩序从不颠倒。寮华青年在25 岁左右，就开始组织家庭。生儿育女，打造幸福家庭是他们最大的志愿。因此，许多看起来还像个大学生的年轻男女，其实已为人父母。
* 寮国地价便宜，买房子或租房子的负担都不大。但孩子成家后大多都会与父母同住；经济能力较好的家庭，几乎是整个家族住在一起。
* 在繁忙的大城市，很多人只能在每年除夕和家庭成员团聚，一起吃一顿年夜饭。但在寮国，华人的家庭成员几乎天天齐聚在餐桌上；尽管吃的是粗茶淡饭，但他们享受的却是天伦之乐。
* 每逢周末或休假，则几瓶冰凉的寮国啤酒，就可以陪伴许多华人和寮国人度过一个悠长的下午。这里娱乐活动不多，年长的华人常常和三五好友一起喝酒、聊天、下棋或打球；而年轻人则喜欢相约一起逛街、看电影、唱唱卡拉OK。
* 许多华人的亲友在移民热潮时都已经移民到法国、美国、澳洲等地，因此每逢假期，一些寮国华人也不时会飞到国外探访亲友，小住一段时间。年届80岁的老华侨郭玉兰女士说：“虽然不少寮国华人都曾走访国外，甚至周游列国，但是他们仍然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寮国一样，让他们这么轻松地过日子。”
* 华人与寮国人通婚的现象，比一般华人之间结合的情况还要普遍。在华人的生活圈子里，他们与同族接触的机会太少。从校园到社会，华人身边接触到的儿乎都是寮国人。华人能说流利寮国语，彼此拥有同样的成长背景，加上寮国人天性热情善良，成了华人最好的朋友和人生伴侣。因而目前第三、四代在寮国出生的华人，多半是中寮婚姻的结晶。
* 在许多中寮通婚的家庭中，华人在饮食方面已融入寮国特色，他们的三餐都非常简单，以蔬菜为主。中寮混血儿许文华说：“只要一点辣椒，一些青菜，配上一点糯米饭，就是我们的一餐了。”虽然喜欢刺激的年轻人认为寮国菜比中餐更吸引他们，不过，年长的华人始终认为中餐更为温和可口。
* 早在移民初期，人数众多的潮州人就把许多传统的潮州美食带来这里。如今，不少华人后代仍然经营着祖传的潮州鸭肉面，或者售卖中式牛肉面、云吞面、叉烧面等等。华人的小食如包子、豆花和豆浆，也成了寮国社会最受欢迎的早点和夜宵。
* 寮国是一个佛教国，人民多为虔诚的佛教徒。这里的大街上佛寺林立，许多寮国少年都出家成为僧侣，因为寺院里会提供免费教育，这是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最需要的福利。他们大多在学满后还俗，利用所学专长，在社会上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 华人一般来自小康家庭，甚少人因为经济压力出家，不过他们依然像寮国人一样，尊比丘、礼佛像。每天清晨，不少华人会布施给托钵的僧侣；每逢佛诞等节庆，华人也会到寺庙浴佛。
* 除了佛教，华人也奉行传统信仰。在许多华人家里或店铺里，都可以看到置放在墙上的祖先牌位，而地面上则有土地公；此外，一些华人也供奉财神和泰国神像。
* 虽然寮国处处有佛寺，但华人依然建立了供奉传统神像的庙宇。这些庙宇的屋檐、屋顶、圆柱上，少不了龙凤雕刻等具中国风味的设计。在万象有两间华人庙宇——福德庙和伏波庙，平日前来烧香的人不多，但每逢节庆或者神诞，信徒们就会把庙宇挤得水泄不通。华人还通过庙宇发起了慈善基金、福利金等活动，来扶贫济弱，回馈社会。
* 提起华人传统节庆，当地人最熟悉的是清明节。寮国人死后一般都会进行火化仪式，之后将骨灰撒落河中或安放在寺院里，而寮国华人则遵行土葬。每逢清明节，华人总会扶老携幼，带着食物、香烛、纸扎等供品，到郊外的坟山祭拜先辈。仪式过后，一家大小便席地而坐，在先人的墓碑前，边吃边闲话家常。原本荒凉的坟山，这时候充满了生气。
* 除了清明节之外，琅勃拉邦的华人也仍坚持春秋二祭的习俗，只不过他们把秋祭改定在每年冬至。冬至的早晨，雾色还未散尽，琅勃拉邦的新旧义山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中华理事会引领着当地华人和寮国人一起进行公祭活动。虽然没有吃汤圆过冬至节，但他们却以另一种方式，和阴阳相隔的家人团圆。
* 在寮国，寮语是最通行的语言。另外，泰语在当地也非常实用，和泰国货币一样，在寮国处处通行，是寮国华人掌握得最好的第二语言。华语因在寮国使用的机会太少，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 不少50岁以上的华人，曾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今天，虽然他们的华语因为少用而生疏，但是他们对汉字的热爱还是不减当年。这些爱看中文书、听华语歌曲的华人，都坚持把孩子送到华文学校学习。许多不谙华语的华人、寮国人和其他国籍人士，也乐意送儿女到华校就读。因此，有人把寮国的华文学校形容为“国际学校”。
* 寮国目前共有五所中文学校，大都创办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们是万象寮都公学、琅勃拉邦市的新华学校、甘蒙省（Khammouan）他曲（Thakhek）的华侨学校、南部沙湾拿吉的崇德学校以及百细市的华侨公学。长期以来，寮国政府对华文教育不闻不问，让其自生自灭。近年来，华人人数大量流失，要维持华校也不容易。
* 五所华文学校，全部隶属于寮国各省的中华理事会。从筹集办校基金、争取地方政府对华校的支持到解决师资或教材问题等大大小小的事项，都由理事会派专人负责处理。
* 这些学校中，位于万象的寮都公学较成功实行了华寮双语教育政策，学生人数多达千人，为五校之冠。学校里教授的科目包括华文和中小学的数、理、化和英文等科目，都采用中国中小学教材。与此同时，华文学校也教授寮国中小学的必修课程。
* 在寮国的中小学统考中，寮都公学的学生一直名列前茅。这骄人的成绩成了学校的活招牌，吸引很多政府公务员以及在寮国经商的外国人，争相把孩子送进寮都公学就读。
* 然而，华人人数不多，许多省份的华校都陷入生源短缺的困境。以琅勃拉邦的新华学校为例，校内近700名学生中，拥有华人血统的学生竟不足1%。
* 为了解决生源问题，学校只好对教学政策进行修改，教学媒介语从华语改为寮语。华文和英文一样，被列为外语课，每天各有一小时的学习时间。
* 一般寮国华人对教育都十分热心，愿意慷慨解囊来分担学校的经费。学校更为贫寒家庭的子女提供半免或全免学费，让他们可以安心学习，完成学业。
* 经济能力较好的华人家庭，多会在孩子高中毕业后，把他们送到西方国家学习。
* 近年来，到中国升学渐渐成了另一股风气，其中北京和广州是大部分学生的首选。华文学校也为成绩优秀的学生提供留学中国的奖学金，他们毕业后都会回返母校执教，将所学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也不断提升寮国华文教育的水平。
* 留在寮国的华人，野心不大。一盘小生意，一份安稳工作，已经让他们心满意足。
* 做生意，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寮国的华人，偏偏就少了“地利”的优势。寮国是内陆国家，山多又交通不便，让它长期以来都走不出经济困境。因此华人只能经营中小型企业，财力雄厚的大集团或机构寥寥无几。
* 1975年反华事件后留下来的华人，多半都是出于各种原因而无法离开。对于前景，他们虽感到仿徨无助，然而反过来看，市场上竞争对手已所剩无几，却也是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许多原本住在万象以外的华人，都在那时候纷纷入城，伺机而动。
* 等到局势稳定后，华人或经营残存下来的小餐馆、谷物店与建筑公司，或投入新领域发展，比如汽车代理、电器代理等。许多后来成功的华人企业家， 就是在这期间找到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
* 自1997年寮国加入东盟，走向市场经济后，华人再次控制了建筑业与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在摩托车进口业、木材加工业与家私业方面，均有不错的表现。
* 目前，华商大多数为小老板，经营着各类小生意。实力较雄厚者，则投资于各种行业，如餐饮、金银、服装、日用百货、土产、酿酒、碾米、木材加工、汽油零售、汽车及摩托车销售、电器五金以及机械维修等。
* 随着旅游业兴起，华人也开始转向银行、酒店等方面发展。泰国、越南、柬埔寨的不少华人，也纷纷到寮国来投资。一些寮国华人与外来华商合作开发天然资源，如伐木与锯木业，也联营纺织、化学肥料、橡胶树种植、酒店及银行业等。
* 如今，华人社会的结构，已经迈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 近年来，大批来自中国云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广西等省的新移民持着商业签证到寮国发展，估计人数已经突破十万人。新移民大多是由亲友引进，前来寮国做生意；他们中有的开档口做杂货买卖，也有的开店和办工厂。
* 在万象的三江国际商贸城和琅勃拉邦的中国市场里，触目所见的都是新移民商人。他们多数售卖衣服、五金、电器等商品，销售对象主要是寮国人和泰国人。他们一般都不算富裕，但三餐温饱。当中有些人已经在这里逗留了五年以上，但生活空间却只局限在市场里。
* 自寮国加入东盟后，旅游业成了寮国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原本万象市内只有几家门前冷落的潮州餐厅、泰国餐厅和越南餐厅，但随着旅游业的兴盛将市场扩展后，新移民赶紧把握时机，把各式各样的中华美食引进万象，似乎有意将昭阿努路和兴文路这两条华人商店聚集的唐人街，打造成中华美食天堂，以期让游客流连忘返。
* 除了那些售卖潮州鸭肉面和广式点心的老字号外，新移民更首创先河，将北京烤鸭带到万象唐人街，让吃惯烧烤鸭爪的寮国人，尝试鸭肉的新吃法。来自云南、四川和辽宁的新移民也陆续在寮国办起了餐馆，把过桥米线、田七气锅鸡、麻婆豆腐、重庆火锅和水饺等美食带进来。
* 中餐馆的主要顾客群，大部分是在寮国生活的华人、中国使馆人员、华人游客以及寮国的中上层社会人士。除了餐饮业之外，目前一些新移民也开始经营旅馆、卡拉OK厅和按摩院，发展日渐多元。
* 大部分新移民到寮国的目的都是为了创业挣钱，一旦赚够了钱就会离开这里，衣锦还乡。他们长时间拼命地工作，极少与寮国社会交流。
* 然而，寮国始终是一个会让人情不自禁爱上的地方。日子久了，一些新移民发现他们竟习惯了这缓慢的生活节奏，喜欢上这淳朴的民风。有些人更把一家大小接过来一起生活打拼，有些则干脆申请永久居留，正式加入寮国这个大家庭。
* *继泰国盘谷银行和农民银行在寮国设立分行后，澳、泰、港、台和寮国的华商，联合寮国政府集资一千万美元成立万象商业银行。该集团旗下投资的项目包括寮国芭莎大酒店、友谊大桥免税店、法国标致汽车、万象国际开发公司等，协助寮国走向发展大道。*
* 无论是华人结婚或中寮通婚，摆喜宴招待亲友，都是不能不遵行的礼仪。
* 寮国社会信奉小乘佛教，每年阳历11月末至1月之间，正好是小乘佛教的解夏节之后的宜婚旺季。这时候可谓请柬如飞雪，婚宴连场转，华人几乎每一天晚上都要赴宴。开店做生意的华人，都得提早打烊，以便准时赴宴。
* 一般寮国华人婚嫁，白天依然会进行接新娘、拜天地、敬茶等传统仪式，晚间则设宴招待亲友，宴会的仪式融合了华人与寮国人的文化。当地宴客少则数百人，多的话可达数千人，场面非常壮观。
* 寮国社会非常重视婚宴，宾客们都会盛重打扮。女士穿上传统寮国裙子，发型妆容和服饰搭配都费了不少心思。男士则穿上笔挺的衬衫或西装，皮鞋都擦得发亮。出席婚宴的男女老幼，个个都难掩兴奋之情，像是高中生要赴毕业舞会一样。
* 婚宴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少不了美酒、音乐和舞蹈，美食反而成了配角。寮国人是天生的舞者，全身细胞在音乐一响起就马上活跃起来。寮国华人对舞蹈的热爱和投入，更是令外人咋舌。当一对新人在众人的掌声中跳完第一支寮国舞蹈后，所有宾客便迫不及待地涌入舞池，在不停歇的现场乐队伴奏下，翩翩起舞。
* 华人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民族，不过在这里他们却学会了寮国人的豁达。他们不再含蓄，尽情地在舞池中释放热情。出席过寮国婚礼的人都可以深深体会到，寮国社会已经没有所谓的华人和寮国人之分。这两个族群已经相互融合，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华人离开寮国之后，许多华人组织都已经消失。
* 如今，在寮国华人集中的五个省份里，中华理事会是唯一的华人组织。除了团结当地华人，它也为华人提供文化、教育、福利等方面的服务和帮助。在中华理事会服务的华人都属义务性质，只谈奉献而不问回报。
* 万象中华理事会称得上是寮国华人全国性组织，也是各地中华理事会的“老大哥”。该会除了团结华人并热心社会公益，也致力促进中寮友好关系。万象中华理事会属下除了有寮华公学之外，也设有永珍善堂、伏波庙、福德庙、妇女会、少狮团、校友会等机构和产业。无论在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领域，该会都积极发挥华人的力量，促进寮国的社会发展。
* 今天，万象中华理事会不但在华人社会中广为人知，它也成了寮国政府和华人之间的沟通桥梁，同时也是中国大使馆和华社紧密联系的管道。
* 寮国华人对居留地和人民，都拥有一份深厚的感情。许多在寮国生活了好几代的华人，虽然有能力移民到国外，但是他们却宁愿留在这个内陆小国，过着朴实无华的日子。也许只有在这里真正生活过的人，才能感受到寮国无穷的魅力。无论男女老幼，他们都希望在这里悠闲自在过一辈子。物质不一定是快乐与幸福的保证，寮国华人早已经悟出这道理。他们将快乐融入生活，让生活回归本源。

柬埔寨

 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南部，与越南、泰国、寮国毗邻。它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建立了扶南王国，公元10至13世纪，是柬埔寨文明最灿烂的时代，也称为吴哥时代。境内湖光山色，景色秀丽，富有艺术气息的佛寺与古迹，使它赢得了“东方巴黎”的美誉。柬埔寨于1863年沦为法国保护国，直到1953年才独立建国。

      自独立以来，柬埔寨的局势一直处于动荡的状况，政权更迭，战乱连年，直到80年代末才逐渐稳定。今天提起柬埔寨，除了马上令人想到举世闻名的历史古迹吴哥窟之外，还有骇人听闻的红色高棉恐怖大屠杀，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地雷场”。

      柬埔寨的天然资源虽然富饶，几年前还发现藏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是多年战乱，使柬埔寨沦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国家长期依靠外援，人民生活极其艰苦，教育水平低落。

      今天，这片正被开发的土地，充满着危机与商机。历经风雨的华人，能否如浴火重生的凤凰，展现其更为斑斓的羽翼呢？

      早在宋朝，就已经有华商到柬埔寨活动，那时候，华人被当地人称为“唐人”或“新唐人”。根据元朝使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 （1295年）所记载，当时柬埔寨境内已有不少华人旅居于此。

      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也曾经抵达柬埔寨沿岸港口，往后接踵而来的华人越来越多。

      17世纪，为了逃离清政府的政治迫害，有更多的华南居民乘船南下来到金边。19世纪，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以及民不聊生的困境，人民被迫离乡背井，向南抵达柬埔寨。在柬埔寨成为法国保护国之后，亟需劳动力，因此吸引了大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居民移居柬埔寨。20世纪上半叶，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军北伐、日军侵华等动乱，均是迫使更多华人移居柬埔寨的因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严格限制人民出国，移民浪潮才因此受到遏制。直到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府允许国人出境，再次掀起了移民浪潮，涌入柬埔寨的中国移民至今未曾间断。

      柬埔寨现约有60万华人，首都金边有40万人左右，其他人口分布在公贡布省、马德望省、磅湛省、甘拉和茶胶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份。金边市是华人口中的“潮州城”，那里有80％的华人是潮州人，潮州话是华人最常使用的方言。

      今天绝大部分华人已入籍柬埔寨，很多华人家庭已迎来第三、四代。华人与柬埔寨人和睦共处，他们说柬语、听柬歌、吃当地食物，生活随遇而安。虽然华人的根已深扎在柬埔寨，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仍保留中华传统习俗，代代传承中华文化。

      有人说，现在可算是华人处境最好的时期，因为机会处处，只要肯吃苦打拼，就能闯出一片天。

      柬埔寨华人总算苦尽甘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似乎可以在他们身上获得印证。

      华人在柬埔寨的处境，起伏跌宕，命途多舛。

      20世纪50至70年代，华人的处境较好，不过依然受到歧视，例如华人被禁从事某些行业。1970年，美国支持朗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柬埔寨华人厄运正式开始。

      朗诺掌权后，便以“散播共产主义思想”为由将华校和华报关闭，还鼓动排华情绪，导致华人首次遭到高棉人杀害。

      1975年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展开消灭阶级和种族的行动，强迫城镇居民到乡下劳改。当时多是资产阶级的华人，惨遭拘捕和杀害，许多华人在下乡途中因饥饿、疾病、过劳而丧命。

      近十年的战乱，不仅摧毁了柬埔寨，也导致华人人口锐减。据调查，在短短3年8个月的红色恐怖中，华人死亡人数高达20万人，占死者总人数的一半。

      1979年红色高棉政权垮台，劫后余生的华人战战兢兢地回到金边和各省份重建家园。昔日繁华的金边市，那时已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鬼城，十室九空，路上汽车绝迹。

      历经连年战乱，华人成了惊弓之鸟，为求安全只好隐姓埋名，不敢张扬华人的身份，甚至不再说华语或方言，而一律使用柬语。

      华人就这样“销声匿迹”，在柬埔寨社会沉寂了约20年。直到1989 年，曙光才重新照射在华人身上。

      1991年，西哈努克以国王身份重回金边，取消所有对华人的法定歧视和限制，让华人享有跟当地柬埔寨人同等的法律地位。从此，华人重新回到起跑线，以勤勉耐劳的精神从小生意做起，参与国家重建发展。历经苦难折磨的华人，反而被淬砺得更加坚韧不拔，更努力打拼。

      一路风雨走来，这个国家曾经重重地鞭挞华人，在华人身上烙下伤痕累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的伤痕逐渐消退。华人并没有瑟缩于过往那段令人战栗的“红色记忆”，而是紧跟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创造属于他们的未来。

      战后的柬埔寨，政局逐渐稳定，国家推行经济开放政策，百废待兴。从90年代起，华人的地位渐渐回升，他们活跃地参与各种经济活动。

      今天，华人在柬埔寨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当地人眼中，华人往往具有“老板”的形象。八成的柬埔寨华人以经商为生，其中大部分经营传统的杂货铺和零售摊，大多是小本经营。他们有些在路边或市场里摆摊，有些则开设商店，售卖日常食用品。

      据说，当地不少成功的华商都是从市场摆摊中赚得第一桶金。“要在柬埔寨开店不难，营业准证很容易申请，营业税也不高。在中央市场向政府租用一个摊位，5年的租金不过是300美元。”在中央市场卖手表的林先生说。

      除了从事传统的零售、批发和进出口生意，华商的触角也渐渐延伸到金融业、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此外，金边的中餐馆也多是华人所经营。目前约有500家中餐厅遍布柬埔寨，其中284家就坐落在金边。

      不管开设的是零售商店、中药店、小吃店、餐厅，还是在市场里摆小摊位的华人，都是勤恳务实地工作。

      华人积极投入商业活动，使柬埔寨的经济一片欣欣向荣。近十年来，国家税收很大部分是来自华人公司、工厂和银行。

      柬埔寨政府意识到擅长经商的华人，是振兴国家经济的一大动力，也是连接海外华人的桥梁。于是，政府鼓励他们投入各种商业活动，同时联系海外亲戚朋友，吸引外资前来柬埔寨投资。

      处于建设发展中的柬埔寨，投资环境虽不及越南成熟稳定，但政府推出优惠外商的政策，加上低廉的劳工成本和适中的地理位置，还是吸引了不少中、港、台、澳以及马、新华商前来投资，投资的领域从加工业、纺织、电力、食品、酒店、农林产品到开设医院诊所等等。

      当地华人社会用以下的顺口溜来形容柬埔寨的华商：“香港人办贸易，台湾人炒地皮，大陆人搞机器，各行各业都有华人。”

      华商不断涌入柬埔寨投资设厂，制造了不少就业机会。外来华商需要透过通晓中柬双语的翻译员或中介，才能与当地政府和人民交流沟通。于是懂得中柬双语的华人，又增加了许多工作机会。

      华资建设的华夏大酒店、百乐大酒店，都成了金边市的重要地标；还有金边最大的苏利亚购物中心，最大的加华工业区，最大的加华银行等大型企业，都是华人心血的结晶。

      随着经济能力的加强，华人的政治地位也日渐提高。目前，柬埔寨内阁中超过半数的成员具有华裔血统，譬如现任国会议长谢辛、新闻部长吕来盛、国务部长占比塞，还有内阁部长索安都是华人。此外，还有不少华裔第二、三代也在政府行政机构担任高官要职。

    华人在柬埔寨的生活虽说不上大富大贵，却也三餐温饱，生活安稳。华人生活的节奏，可说是随着国家的经济轮盘而不停转动。

      “柬埔寨这几年的变化很大，我们必须紧跟国家的发展，才能及时掌握时机，获得成功！”在柬埔寨土生土长的黄永昌兴奋地说。虽然已经 50多岁了，但他丝毫没有退休的意念，仿佛是迈向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华人总给人勤劳可靠的良好印象。他们充分发挥刻苦耐劳的美德，辛勤工作，不放过任何机会。尤其随着中国日益壮大，到柬埔寨经商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柬埔寨华人明白现在绝对是他们拼经济的好时机。

      华人商店几乎起早摸黑就开门做生意，一直到日落天黑才打烊，而从事零售业、服务业或在工厂打工的华人，也都是早出晚归，先苦后甜，累积财富，为下一代铺路。

      华人都安于这种刻苦而平淡的生活，并不打算离开。“我们在这里有吃有住，家人亲戚也全在这里，还要去哪里呢？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让孩子们接受好一点的教育。”55岁的潮州人郑利群如是说，他在金边市开设中药店已有十多年之久。

      育有4名孩子的他透露，大儿子打算明年到当地的私立大学修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老实说，开中药店赚不了大钱，不过既然儿子想继续念书，我还有能力的话就会供他念下去。”这可以说也是大部分柬埔寨华人父母的想法。他们不求大富大贵，总想办法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由于多年的战乱，柬埔寨的娱乐比较少，不过中华美食倒相当精彩。

      在金边最常见的是潮州食物。在乌西亚和戴高乐街华人聚集区，到处都是售卖潮州食物的摊子，如各式肉丸、卤鸭肉、炸油条、炒粿条、炒面、粥品等，都可以在这里一饱口福。其中，粿条汤可算是最受欢迎的食物。不只华人，连柬埔寨人也爱吃这道美食，并跟着潮州人叫它做“goateo”。

      近年来，金边的治安问题虽然显著改善了许多，但持刀抢劫、抢摩托车的新闻仍时有所闻，所以入夜后华人尽量留在家里看电视，夜生活并不多。但年轻华人和新移民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娱乐活动。

      华人日复一日过着这种忙碌充实又平淡无奇的生活。然而，一家人能够在一起生活，吃饭聊天、分享苦乐，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现在，华人受到政府宽容和公平的对待，政府也允许华人组团结社，推广中华文化。柬埔寨最有权势的华人团体——柬华理事会，就是 1990年在政府的鼓励之下成立的。柬华理事会是柬埔寨华人共同的骄傲。过去帮派林立、一盘散沙的情景，如今已不复见。

      “没有几个国家的华团，可以像柬华理事会，成为一个很有系统的组织。”柬华理事会副会长蒙美连自信地说。

      柬华理事会是由潮州、福建、海南、客属、广肇五大宗乡会馆的会长来兼任理事会的副会长或常务理事，并在各地设立分会，建立起一个由上而下的一元化管理模式。这样一来，柬华理事会就能够直接管理会馆、华校、庙宇与乡团，有效地凝聚所有柬埔寨华人的力量。

      柬华理事会目前有一百六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分会、四十余座庙宇和三十余个舞龙舞狮团。柬华理事会跟当地政府关系良好，还获授权处理涉及华人的事务和权益等相关事宜。

      华社领袖在柬埔寨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是华人与政府的桥梁。这些领袖在为华人谋福利之余，也尽量支援政府救灾和配合接待国家贵宾，为国家作一些贡献。

      潮州会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会员人数最多的华人社团，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自然不小。大部分会员不是从事商贸，就是经营企业，所以会馆的经济实力较强大。该会馆自成立以来，在社团福利、文教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除了出钱盖学校，还建立了协天大帝庙、中华医院、潮州义山等。

      此外，当地华人也基于血缘关系成立了13个宗亲会，协助料理会员的红白事，并组团到中国寻根。随着中柬合作关系日益密切，华社也特别成立柬埔寨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目的不仅是帮助华校发展，为华校筹款及开办华文培训班等，同时也举办文化活动，比如举行中国书画展览。

      “如今，三四十岁的华人都不懂华语。”一名当地华人甚感惋惜。

      在战乱的年代，华语被禁用，华校遭封闭，绝迹了二十多年，中华语文出现断层现象。随着国家逐渐开放，柬埔寨华人才不忌讳说华语及方言。

      内战结束后，为了让华人子弟可以接受华文教育，柬埔寨华社筹集了资金，把被柬埔寨人占为民居的校舍一间一间赎回来。

      “华文教育能在夹缝中生根，并且继续繁衍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全是华社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换回来的成果。”端华学校李辉明校长一脸骄傲地说。这位年过七旬的老校长在谈及华教的复兴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是的，纵使日子再艰苦，大环境再混乱，如今华人总算还是保住了传承中华文化的根。

      后来，在洪森总理说了“懂华文，易谋生”以后，华文在柬埔寨的地位便大大提升。来柬投资的外商中，使用华文华语者占大多数，华语于是成为市场上及工厂里主要的沟通语言。打开报纸，各公司企业征求员工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懂得华语。

      对华族新生代来说，要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掌握中、英、柬三语。如今在金边会说中柬双语的人才非常抢手，很容易便能在华商公司找到一份月薪约200美元的“好工作”，而柬埔寨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超过100美元。

      华人学子的学习生活是极度紧张而忙碌的。

      “早上到华校修读半天中文，下午再到柬校学习半天柬语，晚上还得到补习班学一小时英文。每天东奔西跑，有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对于紧凑的学习生涯，就读初三的张凤玲表示已习以为常，身边同学朋友大都过着相同的日子。

      年轻华人至少拥有华校小学六年级的程度，一般具备基础的华语水平，有的在家里还会跟父母说潮州话或广东话。但对很多年轻的华人来说，柬语才是他们的母语，是他们在生活中与家人、朋友沟通的语言，而华语只是工作上必备的外语。所以，他们认为华语只要具备基本听说读写的能力，便足以找到一份工资不错的工作。

      如今柬埔寨共有70所华校，近4万多名学生，其中80％是当地华人，其余是越南华侨和柬埔寨人。直属潮州会馆的端华学校，已有50多年历史，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其学生人数共有1万3千人。

      这些华校多由乡团或是会馆直接管理，政府不给予津贴，柬华理事总会负责统筹学制、教材和师资调配。

      端华学校设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和专修班四个等级，学制算得上相当完善。相等于高中的两年制专修班，教授中柬翻译、中英翻译、电脑和会计等实用课程，学生毕业后即能马上投入就业市场。

      随着全国柬文学校即将实行全日制，华校也实行全日制，半日教华文，半日教柬文，这样一来学生就无须每天来回奔走于华校和柬校之间，同时学生也可以多领一张柬文文凭。华校生拥有中柬两张文凭，等于多了一个优势。

      “这样一来，华校毕业证书一直不被政府承认的问题，也连带迎刃而解了。”李辉明校长表示，这对华校无疑是一项非常有利的教育政策，从而可以解决华校的困境。一旦文凭受到政府承认，加上华文日渐倍增的市场价值，势必为华校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华人一向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柬埔寨华人也一样，宁愿让孩子接受更多教育，很多家境好的孩子，中学毕业后就被父母送到国外读大学。最近几年，还有不少华人把孩子送到新加坡念书。不过，很多在海外留学的孩子毕业后还是会选择回国与家人团聚，同时帮忙父母做生意

华人虽在柬埔寨居住了逾百年，也融入了当地社会，然而他们仍保留着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

      柬埔寨华人社群依旧会过中国潮汕的“时年八节”，即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除夕以及春分、秋分二祭。而且，柬华也十分敬仰祖先，每户华人家庭通常会把祖先供奉在大堂正中央的位置，其他神明如观音、关公则供奉在祖先两侧，祖先在华人家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有的华人家庭还供奉土地公和天神，一些虔诚的信徒也供奉灶神。

      “华人对神明很虔诚，每逢初一和十五，鲜花、水果、奉香是必备的，遇上祖先诞辰及忌日、神明诞辰、华人节日等，更是为祭祀忙得不可开交。”一提起柬埔寨华人传统习俗，在金边生活多年的华文补习老师林美发，就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

      他透露，清明节对柬埔寨华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各大华团还纷纷举行公祭，登报号召同乡参加集体扫墓，前往公共墓园祭祀先辈以及失去香火的无主孤坟。

      当地有三间香火特别旺盛的华人庙宇——协天大帝庙、天后圣母宫、保生大帝庙都有逾百年的历史，还有大大小小约50间华人庙宇遍布全国。庙宇是慰藉心灵的庇护所，也是维系华人传统、凝聚华人文化的媒介，且往往还是宗乡会馆，甚至是学校的所在地。90年代，端华、集成、民生等华校都是先修复庙宇再复校的。莘莘学子就在香烛袅袅的庙旁上课，快乐学习，茁壮成长。

      在习俗和宗教上，华人和高棉人这两个民族深深地互相影响。

      例如，在华人所开的商店里，甚至是一些银行门外，都一定会供奉土地公，以祈求经商顺利，招财进宝。慢慢地，一些做生意的柬埔寨人也依样画葫芦，在店里供奉土地公，希望生意兴隆。

      华人也跟着柬埔寨人一起过节日。在柬埔寨新年、亡人节、泼水节时，华人都会跟当地人一样到庙里拜祭，有的华人也对一些德高望重的柬埔寨僧侣相当敬仰。

      同样的，柬埔寨人在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吃起粽子和月饼，清明节则会去上坟扫墓。华人过春节浓烈欢腾的气息，连柬埔寨人也深受感染。虽然春节没有被列为公共假期，但很多政府机关在这期间根本没人工作，而华校则会放假20天，柬校、工厂也有至少三天的假期。可以说，华人春节在柬埔寨已变成了一个举国同庆的节日。

      “信奉佛教的柬埔寨人，性格质朴温和，包容性较强；而对华人来说，佛教虽不是大部分人的信仰，但也是为他们所熟悉的宗教；柬埔寨人跟华人一样喜欢相互拜访，所以两个民族在情感上比较能够接纳对方。”当地华人这样分析两族和谐，和睦共处的原因。另外，华人和柬埔寨人日益普及的通婚现象，也反映了两族融合的情况。

      拜同一个神、过同一个节日、吃同一样食品，甚至到通婚混血，两个民族在宗教和习俗上已经做到不分彼此。华人的根将在这里，继续繁衍壮大。

      32岁前，他是金边乡下一个小商人；39岁前，他是栖身在越南南部的华侨难民；50岁后，他是柬华社著名的慈善家。

      1974年12月14日，柬越边境即将闭关的消息已经沸沸扬扬。郑棉发携带全家族在这一天从南线逃往越南，赶在闭关的前一天成功进入越境。7年间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81年，郑棉发带着家人，和近万华人难民一起沿湄公河返回满目疮痍的金边。他在奥林匹克市场附近摆小食品摊谋生。靠着经验和眼光，他迅速重建事业，在十年间就累积了一笔庞大的资金。 1994年，他购买土地，建起了品牌香烟生产线，产品出口到马来西亚等国，生意十分火红。

      郑棉发不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的财富，但身家过亿的事实，让他成为华社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领袖。作为潮州会馆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进行慈善捐助时，却不局限在潮州帮内部。全柬埔寨80% 的华文学校和许多华人庙宇、金边孤儿院等都曾接受过他的捐助。

      1998年，郑棉发在金边被绑架震惊了华社，他在付出数十万美元赎金后获释，但绑匪一直逍遥法外。为此，郑氏以投资移民的身份移居澳洲。但大多数时间，他依然在柬埔寨管理家族产业。

      从难民到事业成功的商人再到慈善家，郑棉发可以说代表了柬埔寨华人从苦难人生走向美好将来的写照。

     对柬埔寨的老一辈华人来说，自由恋爱等同“伤风败俗”，会引来垢病，所以婚嫁惟有劳烦亲人或同事做媒促成。当地华裔男子的结婚年龄平均是24岁，但女子更早出阁。传统家庭的华裔青年在婚前，都会与交往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

      但无论如何，随着游客大量涌入柬埔寨，带来了文化的开放，青年男女在街上的亲密行为日趋普遍．自由恋爱也不再招来异样眼光。

      如今，华人和柬埔寨人通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在婚礼习俗方面，婚礼一般采取中柬结合的仪式，先进行华人婚礼，再行柬埔寨的传统婚礼。

      婚礼开始是先通知亲友，然后在第二天早上，男方父母和亲友手捧礼盘，在家门前排成一行，由司仪、童男童女和新郎带领到女方家。结婚的礼盘装有猪脚、糕点、水果、酒，以及象征富有和甜蜜的龙眼，一般为88盘、99盘、144盘或更多（吉利数字）。礼盘越多、排行越长，女方越有面子。

      结婚当天，新人先拜天地，再给祖宗上香，告知祖先，后继有人了。华裔新人的礼服通常都融入了浓厚的柬埔寨特色，他们也会依当地习俗进行剪发、洗脚和拴绳仪式。婚礼全程都播放悦耳的柬埔寨歌曲，以增添喜气。

      在柬埔寨人习俗中，结婚后男方得住进女方的家，等于是“嫁”进老婆的娘家。有趣的是，华人也受到一些影响，一对新人结婚后要入住男方家或女方家，就取决于哪一方比较富有。

  在别人眼中，或许不解华人生活在柬埔寨这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为何能够如此乐天知命地过日子？然而，当你经历过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痛失财产的巨大悲伦之后，就会深刻体会，平淡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幸福！

      老一辈对安逸生活的渴望，年轻人对自由不羁的向往，华人都在这个贫穷的国度找到了。就算移民到先进国家，日子也不一定能过得如现在般舒服自在。认清这点后，柬埔寨华人放开了胸怀，迎接生命带来的各种惊喜。

越南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十世纪前，越南是中国的藩属，之后才摆脱中国，建立封建国家。187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宣布独立。与此同时，法国势力卷土重来，爆发了抗法战争，长达 9年之久；1954年国家分裂为南北越；1959年北越又跟支持南越的美国展开战争。直至 1975年，北越才统一全国，正式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战后二三十年来，越南烽火连天，兵连祸结，民生疾苦。孰料苦难尚未终结， 1979年又爆发了中越战争。

      跟美国和中国交恶后，越南在政治上陷于孤立的困境。长期的战争及与世界的隔绝，导致越南的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最终致使超过150万难民在70年代后期逃离越南。

      1986年越南推行改革开放，全力发展国家经济，逐步走向成功之路，并分别于1991年和1995 年跟中国和美国恢复邦交。改革后的越南，经济蓬勃发展，并于2007年加入了世贸组织。近几年，越南更被一些专家及媒体以“中国式的奇迹”、“亚洲新势力”等字眼来形容它的崛起，发展前景备受看好。

     在十世纪以前，越南与中国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而早期华人移居越南，有些是中国官吏，有些是逃避战乱而来。

      华人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移居越南的现象：第一次是发生在明末清初的时期，一些不甘心受他族统治的明朝遗臣，带领部下、家眷以及老百姓逃往越南；第二次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有一部分革命志士因为受清廷追捕而流亡越南；第三次则是日本侵华之后，不少人从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地区南逃至越南。

      在越南定居下来之后，华人大多经营小本生意，也有一些华人从事农业、矿业、渔业或运输业。越南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商业发展尚未发达，对善于经商的华人而言，简直就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宝地”，使华人有大展拳脚的余地。

      商业的发展使得越南的一些城市兴盛繁荣起来。对南方的开发，尤其是胡志明市（旧称西贡）的迅速发展，华人可说是功不可没。

      早在17世纪中叶，华人就已经跟越南人一同南下开发西贡与堤岸。到了18世纪，西贡已经是东南亚著名的繁荣港口，堤岸也逐步成为华人最大的聚集地。

      华人在越南的地位载浮载沉，几经风雨变迁。

      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中期，是华人在越南最为受到礼遇的时期。虽然被法国殖民政府压迫，但是那时期中越关系良好，因此越南人对华人也特别友好。

      “那时候，华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部分华人甚至愿意投入抗法斗争的洪流，为越南独立而牺牲。”在堤岸居住了半个世纪的陈老先生，在遥想那一段华人最美好的岁月时如是表示。

      不过，那时候的华人还是抱着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多数人都持有中国国籍或者双重国籍。

      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越南一分为二。越南政府推行一系列不利于华人的政策，如强迫华人加入越南籍，限制华人从事屠宰、杂货、碾米和木材等11种行业，并且禁止学校使用华语教学，还解散侨团，关闭侨校以及侨报等。

      1975年，越战终告结束，越南新政府为了推行社会主义，诋毁华人资产阶级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并进行劳改，又把华人强行驱逐出境。不少华人或穿越莽林，或投奔怒海，逃离越南。这期间，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逃亡路上。

      在投奔世界各地的100万越南难民中，有60％是华人。越南华人人口锐减，从100多万降至数十万。

      “那时候，能离开的华人都是有点钱的。而没钱的只能留下来听天由命。上了船，大家都已经有九死一生的心理准备。不是每艘船都能幸运地被搭救，也有很多人在船上因染病而死，或因为船只被大浪打翻而葬身鱼腹。”时过境迁三十载，忆起那段大逃亡的悲惨日子，逃到丹麦的越南华人马桂谊至今仍历历在目。

* *早期华人来越南，都是乘搭大中华商轮，这种船每次都是三艘船同时开航，越南人因此习惯称华人为“三船人”, 不过现已很少听到这类称呼。*
* 目前越南约有100万华人，他们大都已经加入越南籍；其中以广府人最多，其依序为福建人及海南人等，广东话在当地华人社区普遍通用。
* 如今，胡志明市是最大的华人集中地，约有50万华人。华人主要聚居在第五、六、八、十和十一郡，其中第五郡的堤岸区又被称为“中国城”。
* 80年代以后，越南推行改革政策，对华人比较宽容，并将华人列为 54个民族共同体之一，赋予他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经济上获得政府的扶持之下，华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生活逐步改善。
* 浩劫之后，华人走出悲情，积极融入越南社会。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共同生活，如今华越两族相处融洽，大部分华人已把越南视为永久家园，并为越南的建设做出各种贡献。
* 越南推行改革开放后，华人积极参与工商业活动，抓紧契机以复苏经济。
* 华人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早前被摧毁的经济基础，还急起直追，尤其是胡志明市的华人更是干劲冲天。在当地的50万华人中，大部分从事小工业生产和商贸活动 。他们已成为越南经济发展中的活跃分子。
* 胡志明市的华人在贸易领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涉足的行业很广泛，从制造业如成衣、纺织、食品、制鞋、塑料、五金、黄金首饰到饮食、建筑、旅游、金融、进出口贸易和零售业等，所经营的大小商店企业达5千多家。
* 目前胡志明市的华人企业大部分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平仙集团、新强盛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商业银行等，都是越南规模较大的华人企业。
* “从1986年革新至2002年，短短的16年间，华人企业家的数量就占了胡志明市企业家总数的20% 至30%，也就是说，在全市两万家企业当中有6千家华人企业，而华人人口只占胡志明市总人口的 5.6%。”《西贡解放日报》的财经记者李伟贤说。
* 堤岸区的批发市场大部分也是由华人经营，如同庆市场、金边市场、陈政照市场、平西市场、安东贸易劳务中心、新城市场、东医药市场等，这些批发市场现已成了越南南部的货物供应中心。
* 华人在经济上的杰出表现，让政府看到华人的利用价值。
* 1995年，越南政府有意进一步借助华人善于经商的力量，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于是颁布了“有关在新形势下加强华人工作”的62号指令，以鼓励华人更积极参与国家经济的发展。
* 在此指令下，华人得到有力的扶持。政府除了在经济上放宽对华人的种种限制，开放他们在商业领域的经营之外，同时也发还一些没收的华人产业，并允许创办小型企业，从事进出口和金融业务，还允许他们与外资合作。
* 在政府打下一支强心针后，华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几年内经济快速起飞。在国家为华人创造的有利环境中，许多华人生产的品牌被视为 “越南优质国货”，还入选胡志明市的“工业生产支柱百强榜”。
* “几年前胡志明市公布了19项国家支柱产业，其中有六家是华人企业。华人再次以傲人的成绩，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和努力。”李伟贤兴奋地说，言语之中难掩他为越南华人感到骄傲的心情。“华人很讲信用，做生意不用签约，只需口头协议即可。还有华商之间有着很强的网络，这是华人做生意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 不少华人企业家就这样凭着坚韧勇敢、克勤克俭的精神，在越南闯出了一片天地。
* 朱应昌是越南家喻户晓的华人企业家，就是最好的例子。1986年越南改革开放，他凭着独到的眼光成立了艺昌家具，将许多被人们弃如敝展、只当柴薪的木材，摇身变为一件件古意盎然的木制家具，从此打开了华人在越南从事古艺家具的响亮名声。
* “80年代时，我本来有离开越南的机会，但是我对政府的革新政策有信心，所以决定留下来。现在，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一脸慈祥的朱应昌坚定地说，今天这番成就全凭他刻苦耐劳、敢打敢拼而来。
* 另一方面，越南政府鼓励外商投资，拟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力图将越南打造为进入东南亚市场的桥梁。以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为主体的亚洲华人资本，已成为越南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此外，近年回国投资创业的越南华侨也逐年增多。
* 如今，越南已成为亚洲经济成长第二快速的国家，连续几年的经济增长都达7％以上。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越南开始在世界经济舞台崭露头角。
* 随着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华人的经济地位势必水涨船高。然而，伴随迅速发展而来的，是激烈的竞争。华人必须更加拼搏，保持竞争力，才能在经济发展洪流中稳住阵脚。
* 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华人跟越南人已经融合在一起，分不清你我。
* “有些华人说起越南话，流利畅通与越南人不分上下。”一名越南人认真地说。再加上越南人的外貌、肤色近似华人，让人难以辨认两者之间的差别。在文化语言、生活习惯、教育背景甚或宗教信仰方面，两个族群也都已非常接近。
* 日常生活中，华人在外的举止言行，俨然就像个越南人，跟越南人也和谐相处。回到家中，又很自然地过着华人方式的生活，吃中餐、看中文电视节目，家庭成员之间也多以方言沟通，偶尔掺杂几句越南话，听起来格外亲切。
* 在饮食上，华人仍习惯吃中式料理。越南的街头巷尾满是兜售美食的路边摊，华人轻易就能品尝到地道的中国菜。不过清淡少油的越南菜也广受华人喜爱，许多华人已习惯在食物里加入鱼露（一种越南调味料）。说到越南最有名的河粉，华人跟越南人一样爱不离口，习惯每天最少吃上一碗。另外，用法国长棍面包制成的三明治，也是很普通的一种越南小吃，华人通常喜欢把它当作早餐或下午茶点。
* 同样的，越南人也喜欢吃中华料理，如海鲜羹、炒饭烩面、潮州糕点等，只要食物的味道好他们就照单全收。上茶楼吃点心，或在路边买珍珠奶茶、粤式凉茶，对越南人来说已成为家常便饭。华人区开满琳琅满目的饼家、食摊、酒楼、餐厅，吸引了不少越南人的光顾。
* 被法国统治近百年，华人也学会了几分“法式浪漫”，跟越南人一样爱泡咖啡厅。
* 胡志明市有不少咖啡厅和咖啡座，顾客多是男士。他们喜欢坐在咖啡厅外，一边喝着加了奶的冰咖啡，一边观看往来经过的行人，形成一幅有趣的街景。“一天喝上三五杯咖啡是稀松平常的事。咖啡厅的气氛轻松悠闲，点杯咖啡跟朋友聊天下棋，一个下午不知不觉就溜走。”一名当地华人笑眯眯地说。
* 华人也住在又长又瘦的越式房屋。屋子一般多是有两三层，若居住在临街的房屋，他们通常会把一楼充作店铺，不是自己做生意卖东西，就是出租赚取租金。屋子的空间不大，华人大都是一家人住一起，有的甚至住了几户人家。加上屋内还得停放几台摩托车，因此家居摆设通常极为简单。
* 与越南人一样，华人习惯在屋外活动，华人喜欢在屋外摆几张矮凳和矮桌，吃饭喝茶、纳凉休息、跟邻居聊天，都在这里进行。街道上，川流不息的摩托车熙熙攘攘地往来着。这在越南是最平常的一幅街景——匆忙之中，洋溢着一股无形的活力。
* 在越南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彭世杞，很满意现在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我平时最喜欢收看有线电视播放的广东节目，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播报的新闻，更是每天必看。”在家里跟儿子媳妇说广东话，媳妇三餐也都煮中国菜给他吃，逗弄牙牙学语的小孙子更是他一天里最开心的事。
* 生活虽然简朴平淡，然而对于经历过战乱贫穷的彭老先生来说，却深切地明了平淡是福的道理。他说，只要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衣食无忧，夫复何求？
* 30岁以下的年轻华人，没有经历过动荡不安的时代，是幸运的一群。他们多会说越语、广东话、华语及英语，与越南人相处得融洽友好。他们生活关心的重点是工作及玩乐，而不太在乎国家大事和世界时事。在他们身上，已看不到上辈华人的悲情痕迹。
* 经济蓬勃发展的胡志明市像个巨大的游乐场，娱乐形式多种多样，娱乐场所遍布各处。入夜以后，整座城市充满动感与活力，散发出自由的气味，蛊惑人心。尤其在经济繁荣的第五郡、第十一郡华人区，大街小巷到处都闪烁霓虹灯，在卡拉OK厅、咖啡厅、舞厅都能见到年轻华人的身影。
* “遇上心烦意躁的事，只要骑摩托车到街上兜兜风就一扫而空。” 少了父辈们认命的沉重感，年轻人的烦恼轻易就消散了。明日太阳升起，又是充满希望、崭新的一天。
* 国家的开放和全球化，也使越南年轻人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不已，因此这里出国的风气很盛。不过，越南近几年的发展还是让不少人充满希望。“我曾想过要出国发展，但已打消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现在胡志明有让我发挥才能机会。”27岁的杨明龙对越南的前景抱着乐观的态度。
* 越南华人的会馆都是馆庙合一，既是宗乡会馆，也是抚慰华人心灵的宗教场所。越南目前有六大华人会馆，分别是穗城会馆、温陵会馆、二府会馆，义安会馆、海南会馆及崇正会馆。
* 华人会馆在越南华社起着很大的凝聚作用。各个会馆都相当活跃，尤其在发展华文教育、保存中华文化方面，向来都是他们首要的使命。例如，各个会馆每年必定会颁发奖学金或助学金给清寒华人子弟，让他们顺利升学。
* 在越南华社，热心公益，爱做善事的风气，也极为盛行。
* “在越南华人心里，‘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热心公益已成为越南华社每一个人的优良传统。”年轻的成功商人林日民指出了越南华社的一大特色。
* 越南华人不论老少，都是抱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想法，透过会馆、宗祠或同乡会来表达爱心。除了帮助自己的同胞，华人每年也都会捐助大笔款项做善事回馈越南社会，只要政府呼吁人民救济天灾灾民，华人大企业大都会积极响应，协助推展社会福利。
* “很多华人做善事都是自动自发，不是为了名誉，而且不分种族。”林日民进一步解释，华人不遗余力地支持多项国家推行的福利慈善项目，如兴建情义屋、温情屋、奉养英雄越南母亲、参加贫穷病人辅助会、励学、消饥抚贫、帮助少数民族同胞等等。
* 华人积极投入慈善事业，赢得了越南人的尊崇。越南人一般认为华人是善良优秀的民族。这也是越南人不会仇视华人的主因。他们得到华人的友善对待和帮助，也会感恩图报。
* 越南华人借庙宇和会馆，维系中华传统习俗，为华人子弟争取受华文教育的机会，同时热心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利人又利己。在华人社区里，六大会馆将各籍贯华人紧紧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稳固的网络。
* 越南华文教育的发展，和华人的命运一样大起大落。
* 1975年越南统一后，三百多所侨校被勒令关闭。到了80年代，政府才放宽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允许华人在夜校和补习学校学习华语，之后华语的发展就一日千里。
* 胡志明市目前共有20多家华文中心及外语中心，学生人数约有3万名。其中，比较有名的华文中心计有：颍川华文中心、麦剑雄华文中心、陈佩姬华文中心、启秀华文中心、礼文华文中心等。
* 虽然政府允许华人学华文华语，甚至允许华人兴办大学，但毕竟越语学校才是正规学校，同时教育政策要求学生必须在学好越语的前提下才可以学习华文。最近几年，各华文中心学生的人数逐年减少，主要原因是越语学校的功课过于繁重，造成华人子弟学习的压力过重。有些学生因而无法兼顾学习华文。
* 近年来，中、台华商涌入越南投资设厂，中文的市场价值日益提高。越南的大公司主要都是外商投资的，需要懂华语的人才。土生土长的关裕华语带轻松地说：“我觉得生活在越南不错，机会很多，这里尤其缺乏翻译，其工作量和压力都不会太大，生活相对轻松一点。”
* “随着就业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多越南人学习中文，学习有关中国的知识。目前有八间大学开设中文系，学生人数约达1千人，大部分学生是越南人。”胡志明市社会人文科学大学东方学系的华语主任黎教授说。
* 早期华人父母不鼓励孩子升大学，认为拥有中学学历就已足够。那时候年轻的华人普遍懂华语，只要有一张越语学校的文凭，再去报读个会计或电脑技能课程，很容易便可以在台湾人或中国大陆人开的公司找到工作。
*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公司开始注重大学文凭，华人子弟上大学的人数也有上升的趋势。一些家境好的就到英、美、澳、纽、新加坡等国深造，但他们主要目的还是学习英文。
* 可以说，尽管华语很吃香，但其发展仍跟不上越南社会的需求。
* 胡志明市华文教育辅助会的彭秘书长感叹：“越南的华文教育仍处在‘打游击’的情况，华文中心始终不是正规学校，所开办的课程和颁发的文凭都不受政府承认。”他认为，由华人民办一间受政府承认的中越双语正规学校，是最有利于华人子弟的。
* 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华人子弟必须拥有越语学校的文凭，才能在社会立足。一些华人为了获得更好的迁升机会，不惜牺牲下班时间，到夜校修读越校课程以考取越校文凭。26岁的黄宝燕每天下班后就赶到夜校上课，已度过了两年奔波的生活，再熬一年就能毕业。她说：“年轻时，不知道越校中学文凭的重要，现在只好半工半读，希望辛苦几年拿到文凭，那么工作的选择就会更多。”其实，像黄宝燕这样半工半读的年轻华人并不少，这些年轻人乐观地相信，有了文凭，未来的出路必定更加宽广。
* 总的来说，基于商业市场对华语人才的需要，越南学习华文风气尚算盛行，间接使得整体的华语水平有所提高。可以预见的是，通晓华语的人将会越来越多。
* 华人在越南享受很多中国传统节日，他们仍然十分注重传统风俗。越南有近千年是中国的藩属，越南人在文化上长期受到中国极大的影响，因此不管在民俗风情还是文化习惯上，华越两族都很相近。越南人对汉字并不陌生，很多越南寺庙和店铺都写有汉字。
* 春节是华越两族人民最重视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举国欢庆，过节气氛浓厚。在越南还能感受到浓厚的广东风俗，春节前家家户户都忙着办年货，逛花市也是华人过春节重要的活动之一。不管华人还是越南人，过春节都有贴春联的习惯。不过，不同的是，越南人的春联是由越文拼音写成。
* “越南华人是幸福的，能在越南享受很多中华节日，而且越南人甚至还沿袭华人的节日，跟华人一起过端午、清明、中秋节。”当地华人说。实际上，越南人所过的传统节日跟华人的几乎相同。
* 长期受到华人的影响，越南人很欣赏中华文化，不断向华人学习，希望变得跟华人一样勤奋节俭。有鉴于此，越南华人益发珍惜自身的传统文化，致力发扬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 近年来，华人和越南人通婚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 对于通婚，一般人持着开通的态度。一些越南父母认为华人拥有优秀的传统，华族男子对家庭较有责任感，懂得顾家，所以希望女儿能嫁给华人。
* 随着两族关系越来越融洽，华人新生代对越南文化产生了更深的认同感，培育起强烈的国家意识，血液里的中华民族意识则渐渐稀薄，最后名符其实成为一名效忠国家的越南人。因此，一些老华人对于年轻一辈不会讲广东话感到焦虑，担忧他们就此失掉华人的根。
* 随着对国家的认同感日渐深厚，有越来越多华人参与政治活动。政府也在华人聚居的胡志明市，设立专门处理华人事务的“华人工作处”，培养华人干部为华人和国家效力。胡志明市华人党员迄今有597 人，其中426人是在1995年之后入党的。
* 越南改革迄今20多年，华人对政府逐渐恢复信心，加强了华人对越南的认同意识。
* 经历过七十年代浩劫的华人，曾经活在巨大的阴影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往昔的悲情终将消逝。命运多舛的越南华人，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走出阴霾。
* 如今，苦了大半辈子的华人终于能安度余生，而新生代也在这里看见希望，国家意识愈益浓烈，相信努力就能出头。
* 越南华人最终摆脱了任人鱼肉的命运，迎向更美好的明天。

缅甸

* 位于中印半岛西部的缅甸，是中印半岛上最大的国家，东北与中国接壤，西边和印度毗邻。自古镶嵌于两个古文明大国之间的它，被一种浑厚而多元的氛围笼罩着。它拥有135个民族，以缅族为主（60%），掸族、克钦族等是法定少数民族，而华人和印度人则为非法定少数民族。
* 这个曾被英国统治，又被日本占领过的 “佛塔之国”，在独立之后有过一段辉煌时期。20世纪60年代，它是东南亚最富裕的国家，是著名的“鱼米之乡”。除盛产鱼虾、海蜇皮、丹老咸鱼、鱼露外，它还拥有丰富的农产，也一度被誉为世界最大的米仓。
* 1962年军政府执政后，推行一系列的“国有化”运动，反而打击了缅甸的经济发展。后来军政府打压民主运动，也导致以美国为首的欧美诸国长期对它实施经济制裁，使它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状态，发展停滞不前。
* 为了摆脱困境，近年来缅甸政府努力与世界各国重建友好关系，逐步走向开放。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对缅甸伸出友谊之手，雪中送炭。这不只促进了中缅的经济合作，更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
* 从当地华人随遇而安的祥和神色中，仿佛看到希望的曙光。

      缅甸自古与中国毗邻，两国之间的漫长边界绵延相连。长期以来，两国一直都有边境贸易活动。

      根据记载，首批定居于缅甸的华人，是数世纪前从云南省移入缅北克钦帮山区的玉石商家。此外，缅甸北部丰富的矿藏也吸引了许多华工。自18世纪起，每年约有5万名云南西部居民前来缅甸当矿工。

      1861年，第一个广东籍商人经由新加坡来到缅甸的曼德勒王朝古都。

      英国于1885年侵占缅甸，并把它纳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份之后，引起大规模的华人移民热潮。这些移民一般通过海峡殖民地由海路迁入缅甸，主要是两广和福建的劳工；另一批移民则是从云南陆路南下来到缅甸。

      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右，缅甸华人移民人数激增。二战期间，华人人口约有二三十万人，占总人口的1%，当时，经商有道的华人个个都取得不俗的成绩，还创办了华校、华报以及华团。

      那时候，华人与缅甸人也浑然没有你我之分，彼此情感融洽，共享安居乐业的日子。

      二战结束，缅甸终于摆脱了英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缅甸政府鼓励华商转向工业领域发展，把外贸让给不善于经商的缅甸人去尝试。华人积极响应，全心投入，他们的工业投资在当时占了缅甸私人工业约 75%，经济发展可说是达到巅峰。

      缅甸分别在1958年及1962年爆发了两起毁灭性的政变，主导人物就是号称“铁腕军头”的奈温将军，从此改写了华人的命运。

      自1962年起，奈温开始推行“国有化运动”，把银行、商店、学校和媒体都收归国有，导致缅甸华人辛苦挣来的财富，一夜间化为乌有。到了60年代中期，缅甸共有1万5千个企业被“国有化”，许多华人商家濒临破产，导致一千多名华人被迫含泪离开，流亡到台湾、中国大陆或美国。不过，还是有不少华人仍然怀着期待留下来，没想到却等来了一场令他们家破人亡的暴乱。

      1967年6月，缅甸华人最黑暗的时期骤然降临！在一场激烈的排华暴动中，杀人放火的暴民们恣意践踏了好几个华人城市，仰光唐人街更是首当其冲。

      华人骤遭飞来横祸，然而老一辈的华人却决定稳守家园，只把孩子送往国外。许多父母和子女就此一别数十载，直到缅甸开放之后才得以重逢。这当中，不知上演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

      从政变到排华，整个过程当中共有十万名以上的华人离开了缅甸。暴动后，他们大多数移居澳洲、泰国、新加坡等地，其中有5万多名华人移居至澳门，在当地形成了著名的“小缅甸”。

* *19世纪后期，大批涌入缅甸的华人当中，福建人大多身穿长袖衫，自称“唐人”，而广东人则一般身穿短袖衫，自称“汉人”，当地人通常由衣著来区分他们的籍贯与行业。*
* 在华人眼中，缅甸如同一颗被沙土覆盖的宝石。曾在繁华盛世下生活过的华人，都见证过它慑人的光芒。老辈回忆起60年代的仰光，脑海中总是闪现出那些热闹、淳朴而人清味浓郁的场景。
* 今天，缅甸成了世界十大穷国之一，但留下的华人早已学会随遇而安，嘴上并无太多抱怨。华人说：“笑中千关过，愁内百事哀”，他们踏实而知足，只求三餐温饱，生活安定。无论住的是洋房、公寓还是木板屋，大家都安于现状，依照自己的经济条件去生活。
* 缅甸华社如今主要由云南人、福建人、广府人和客家人组成。当地习惯以“上缅甸、下缅甸”来划分华社：所谓“上缅甸”，指的是缅北地区，以曼德勒（Mandalay）为中心，另还包括腊戌（Lashio）、密支那（Myikyina）、当阳（Tangyan）及东枝（Toungyi）等，皆是云南人的集中地。“下缅甸”指的则是坐落于南部的仰光及其周边地区，这里是福建人和客家人的天下，而早期人数最多的广府人现已所剩无几。
* 在一派悠闲、对从商兴趣不大的缅甸人眼里，华人是勤快聪慧的商人。缅华大多都是小老板，生活虽称不上富裕，但却比一般缅甸人民过得更安稳踏实。当地人说，在战后缅甸的经济复苏上，华人居功不小。
* 在大力促进当地商业繁荣的同时，华人并没忘记在苦涩的过去与诱人的前景之间，播撒下中华文化的种子，默默推动华文教育和社团活动。老一辈华人对缅甸感情深厚，大多没有离开的打算，但他们却鼓励下一代走出缅甸，到外头去追求更精彩的人生。
* 缅甸言论自由有限，华人常笑称他们有“三不谈”的话题，那就是政治、“女人”和美元。
* 在奈温将军时代，不少华人积极从政并身居要职。物换星移，如今华人已无法在政治上大展拳脚，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变得异常冷淡，也不愿触碰政治这敏感话题。而所谓的“女人”，也与政治息息相关——她是缅甸的民主斗士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多年来为了缅甸的民主大业与军人政府抗争，成为政府眼中最棘手的政治人物。原本就不热衷政治的华人，为避免祸从口出，也尽量不提这“女人”的名字。
* 美元在近几年与缅元的兑换率浮动很大，严重影响了从商华人的收入，理应成为最受关注的对象。不过鉴于缅甸已禁止公民拥有和收藏美元，因此华人只能买金保值，导致他们只谈“黄金”，避谈“美金”。
* 对缅甸华人而言，也许经济上的富庶、生活的安稳才是最实在、也是最重要的目标。
* 1988年12月，中国和缅甸重新开始了边境贸易往来。这个划时代的政策落实后影响深远，致使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商家都纷纷前往缅甸投资，大大拓展了当地华人的商机。接着1989年缅甸开放经济后，许多华人的生活获得大幅度的改善，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 如今，缅甸华人的经济地位，已逐步恢复到60年代国有化运动之前的鼎盛时期。他们带旺了许多城市地区，迎来生机勃勃的市场。在仰光或曼德勒的市中心，金行大多由广东人经营；福建人则从事土产或农产贸易；云南人掌握着玉石、矿产的开发和买卖；潮州人从事塑料袋生产、轮胎代理等与塑料相关的行业。此外，华人的中餐馆、药行及加工厂等也都不少。
* 在工业方面，华人主要的领域是机械修配、食品加工和成衣制造；商业领域则以杂货、餐饮和金饰业为主。据了解，全缅甸共有2万5千多家的华人杂货店。
* 随着缅甸旅游观光业的开放，不少华人也纷纷投资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如旅馆、旅游代理或购物商场等。近年来经济蓬勃发展，部分华人已经走向经营大型企业，出现了不少成功的企业人士。
* 缅华兢兢业业地把家庭事业和私人企业办得有声有色，也为下一代铺平了道路。
* 华裔子弟一般都到缅甸大学深造，出路较好的医学和工程系，往往成为成绩优秀生的首选，因而造就了许多医学人才。但由于在缅甸从医的待遇不高，因此很多医科毕业生都考虑到国外去发展，造成人才外流。至于其他科系的毕业生，毕业后要在当地学以致用也并不容易。缅甸华商商会总干事苏天宝就指出：“华人可说是被逼着从商。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好工作，便接手父母的生意，或自行创业。”
* 尽管在经济上获取了不俗的成就，但缅甸华商在多变的政策中，仍是冒着不小的风险。亚景金铺珠宝商行董事长谭景铨回忆说：“缅钞有过3次被停用的记录，因此华商手中的血汗钱，有可能一夜之间就成了废纸。”此外，面对高达20％的营业税及为数不少的“茶水费”，华商亦只能默默承受。
* 缅甸还长期面对电力不足的问题，无论商店还是住家几乎天天都有电力中断的困扰。一些资本雄厚的商家，干脆就动用自备的发电机。这里的人们常苦中作乐笑称：缅甸就是“免电”的意思。
* 电力不足、电讯设施落后再加上法制的不健全，让有意前来缅甸投资的外商往往静观其变，裹足不前。
* 当外界对缅甸的经济内幕尚存疑问，而投资者也面临种种挑战之时，缅甸华商商会自然就成了沟通国内工商企业界，及海外投资家的主要媒介。
* 成立于1909年的缅甸华商商会，在缅甸的华社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共超过500名缅甸华人企业家都是该会的会员。他们不但是国内经济的强力推手，还积极向海外宣传、吸引以华商为主的外资。该会除了接待中资公司代表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之外，也主办海外考察团，让缅华企业家开拓人脉网络并扩大市场，可谓贡献良多。
* *在缅甸，有不少高层人物都与华人通婚。早期社会党总书记、缅甸代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巴瑞的夫人，就是一名姓陈的华人。此外，原缅甸革命委员会委员丁佩、原山友总统以及丹瑞大将军的夫人，也都是华人。*
* 缅华社会的华文教育，三代华人可说遭遇各异，也导致了他们拥有不同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
* 50岁以上的缅甸华人，多数接受过传统的华文教育，是缅甸华教辉煌时期的产物。他们的华文造诣较高，能说得一口流利的华语，对中国和中华文化也有一种强烈的认同和情感。
* 30岁至50岁的华人，则成长于缅甸华教的断层期。他们主要以缅语沟通，大部分不谙华语，顶多略懂方言。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与缅甸人接近，尽管在形式上仍保留不少中华文化的传统习俗，但灵魂深处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认知，是陌生且有隔阂的。
* 至于3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就有幸再次与华文教育接轨，从小就有机会学习缅语和华语。这使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还能掌握不错的华语。缅华社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当地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有着密切关系。
* 20世纪50年代，缅甸曾是东南亚的教育中心，华文学校在社团的支持和推动下蓬勃发展。当时全国拥有200所以上的华文小学及约300所的中学，课程水平极高，在东南亚华人圈中树立了一流的口碑，还吸引了其他国家的学子前来就学。例如，当时广为人知的南洋中学及华侨中学，培育出的优秀人才如今遍布国内外各领域。
* 然而，在60年代实施的“国有化运动”，几乎把华文教育给摧毁了。
* 华校全都收归国有之后，不但校舍没了，学生也不准公开学习华文。这个政策严重打击了华教在缅甸的发展。缅甸华人只好上下求索，心机费尽，在逆境中默默地维系着华教。许多老师在家偷偷开办华文补习班，为了避嫌，他们教学时多采用小班制，还不时更换地点。华文教育就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下暗渡陈仓。但在强硬的政策下，其效果毕竟十分有限。久而久之，华人社会就出现了巨大的文化断层。
* 到了80年代末，缅甸政府调整内外政策后，才对华教放宽了限制。一些家庭补习班开始进行整合及扩充，华团则以补习班的名义开办华文学校，获得热烈反应。因此，尽管缅甸至今没有正规的华校，但教授华文的机构却不少。
* 从90年代开始，华教以多种不同的名义生存下来，最普遍的就是以宗教或孔学的名义来传授华文，设立华文补习班。此外，有些中心还设立了幼儿班，以及服务在职人士的华文速成班，以应付不同的需求。
* 在缅北地区，基于与中国的边境贸易需要，对华文教育的需求更高，诞生了许多非正规的华文学校，学生反应热烈。总体说来，上缅甸地区的华文教育水平，要比下缅甸来得高，成绩突出的学生还会到中国去留学。
* 2002年以来，中国国务院侨办每年派遣讲学交流团，到缅甸培训华文教师，当地也通过函授方式自己加以培育。昌华国际学院还与新加坡在课程上相配合，该院的毕业生能被保送到新加坡工艺学院去升学。
* 福庆语言电脑学校李祖清校长说：“如今，掌握了华文的毕业生前景相当乐观。根据就业市场的需求，一般缅甸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只懂缅语者月薪有2千缅元，掌握缅语和英语者则有3千多缅元，但同时掌握缅语、英语和华语者，月薪却可高达 5千缅元！"
* 为了孩子的将来，几乎所有的华人家庭都让孩子学习中文。他们通常会利用课余的时间，每周六天到华文班去上课。至于那些幼年时错过了机会的青年，往往也积极利用工余时间，到华文速成班去学习。现在，在清晨微凉的晨风中，或夕阳的余晖里，常常可以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熟悉的华语飘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 在上世纪的50年代，处于全盛时期的仰光曾号称“东南亚伦敦”。但近几十年来，缅甸与外界的联系却很少，予人一种在政治铁幕中，资讯十分封闭的印象。
* 前《缅甸阳光人民报》记者赖保罗感慨说：“当时华社兴盛，我们拥有四家华文日报和三家周刊。但国有化运动却使华文报章完全消失。”
* 直到1998年，缅甸才重新对华文报刊解禁。终于，经过几十载的等待之后，《缅甸华报》发刊了！当时，国内外的缅华无不对这难能可贵的消息感到雀跃。
* 遗憾的是，六年后政府又宣布禁止所有外文刊物的出版，结果《缅甸华报》也被迫暂时停刊。
* 2007年，终于又传来好消息——由缅甸政府出版的《金凤凰》华文月刊在2007年10月1日正式面世。缅甸华人都希望这一份华文报刊是一个美好的起点，除了作为缅华的精神粮食，还可以拉近华人和缅甸人民的距离，并联系起世界缅华同胞，积极推动回缅探亲、旅游和投资等方面的发展。
* 除了当地出版的报章外，缅甸华人若想阅读国外的报章或杂志，除了托人携带入境之外，还可以到仰光广东大街上的缅甸华侨图书馆去。这家图书馆大约有三万册藏书，华人都喜欢来这里借书、阅报、看杂志或卫视新闻。
* 图书馆馆长欣慰地说：“每日前来阅览的人数多达一百人左右。在这里，读者不但能找到新鲜出炉的缅文报章或泰国的《世界日报》，还能寻获一些过期的海外报刊，如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
* 超过60年历史的图书馆显然有些残旧，多年来靠华社各界人士出钱出力，确保这个小小的知识库能够维系下去。
* 近年来，电子媒体的发展弥补了平面媒体的不足之处。自从几年前缅甸政府允许人民安装卫星电视后，一般经济良好的华人家庭，都成了卫星电视的用户，享有一百多个频道的选择。有了它，当地华人就能即时掌握国外的新资讯。最受华人欢迎的是资讯台，而年轻人则偏爱中、港、台的娱乐节目，举凡海外华人所有的流行资讯，他们可是一点都不陌生。
* 此外，年轻一代也通过网际网络跟世界保持联系，信息封闭或匮乏的问题已不复存在。缅华互助会更一马当先，创立了部落格，其理事长陈民昆说：“缅甸华侨散居在各地，如澳门、台湾、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心底仍关心着缅甸华社的状况，因此我们的网站成了最佳的信息和感情交流站。”
* 在前首都仰光，华人俗称的广东大街，以及附近几条街道所组成的唐人街，估计住了15万名华人。华人曾在之里推动了唐人街的繁华，至今他们所经营的店铺依旧布满了整条唐人街。
* 这里有高高耸立的上海国际商厦、通街川行的二手日本车、还有那看不尽的人潮盛况。
* 仰光市禁止摩托车及脚踏车穿行，于是汽车就成了华人家庭的代步工具。在缅甸，一辆车龄十年的日本二手车，还要叫价五万美元，简直是天价！但经济能力好的华人家庭，通常都会拥有一部汽车，以方便出行。而仰光地区以外，就是自行车和摩托车的世界。
* 在唐人街，华人的金店最是显眼，数量多达几十家。店铺虽不大，但闪闪的金饰琳琅满目，使人眼花缭乱。
* 由于汇率浮动的关系，缅甸人总爱把金钱兑成金子来保值。金店老板表示：“当金价一攀高，许多缅甸人就会拿金饰到店里来典卖，那时我们就忙得不可开交。”此外，华人也经营手表、服装、眼镜、中药和五金等店铺，在这里中缅文并写的招牌随处可见。
* 唐人街上也有很多茶楼，华人都喜欢聚在这里喝茶吃点心。其实缅甸华人的饮食口味非常多样，连当地人的饮食风格都加以吸收。除了华人的粽子、肉包子令缅甸人食指大动，华人也同样热爱当地的鱼汤面、椰汁面和咖哩鸡饭。因此这里街道两旁的小食档总是高朋满座，热闹无比。
* 由于缅甸长期电供不足，各地恶作剧式地轮流停电，让人哭笑不得。因此，发电机就成了民生必备品。每当夜幕笼罩，家家户户一齐开机发电，电油味八面扑鼻而来，“风味”十足！
* 华人家庭里一日三餐仍以中餐为主。逢年过节，必定杀鸡宰鸭来祭祖，大家也习惯在饭桌上天南地北闲聊，联络感情。传统节庆一到，妇女们也往往大展身手，让一家大小品尝传统的美味。
* 曼德勒华侨妇女联谊会主席寸守斌说：“在大城市，很多家庭必须靠双收入才能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但在这里，物质要求很低，只要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加上房子便宜，三代人住在一起很平常，家里每天都很热闹。”
* 缅甸华人很重情义，逢工余或假期，他们就会跟家人朋友们聚在一起，或一起到茶铺去喝茶聊天。缅华青年也热爱各种球类运动，篮球、羽球、足球和藤球，都是他们喜爱的玩意儿。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在小巷里踢藤球，迎来大批围观者的欢呼助阵，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单纯的决乐。
* 缅甸华人说，这里淳朴的民风深深系住了他们的心；他们跟缅甸人也有着兄弟般的情谊。在长期的濡染和浸透下，他们都拥有知足常乐、随虽而安的温良个性。
* 尽管已经融入缅甸社会，华人大多还保留着传统的习俗和礼仪。他们一般都会在家里供奉祖先，门口还贴上红彤彤的对联。
* 在缅华心目中，春节还是头等重要的节日。除夕夜的团年饭外，春节期间各乡团举办的团拜活动及热闹的醒狮团等，都令大家万分期待。20世纪 80年代，缅甸慈善会还组织了缅华贺年团，从除夕到初九这段新春期间，派出花车和乐队，挨家挨户去拜年。收取的红包钱都作为慈善会的善款捐助给各界，以急人之难。
* 后来，贺年团改为室内团拜，大年初一在酒店开办一百多席，配合妇女会等单位呈现的文娱表演，大伙儿齐心合力，共庆佳节。
* 迈入新时代，缅华妇女也开始参与社会福利的工作。纷纷成立的妇女会，主要负责推动社会福利和文娱方面的工作。在缅甸，凡华人举办活动都不愁人手不足的问题，更不必担心遇上出席者寥寥无几的冷清场面。浓浓的同胞爱，就体现在含蓄而热切的氛围中，温暖了这块古老的土地。
* 除了春节之外，大大小小的传统节庆如清明、端午及中元、中秋等，缅甸华人也都欣然欢庆，毫不马虎。
* 每年的4月13日是缅历新年，俗称泼水节，华人也会与当地人一同欢庆，向路人泼水以示祝福，并享用风味独特的椰汁面和咖哩鸡饭。其他当地节庆，如瓦梭月盈节、点灯节，也少不了华人热心的参与。
* 缅甸的华人社团，多数是地缘性的宗亲团体。例如曼德勒就有著名的四大乡团，包括云南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及多省籍会馆。除了供奉祖先，会馆也是当地华人联谊的好去处。
* 此外，宗亲团也负责管理华人义山，协助会员处理丧葬事宜等。筹建会馆之外，华人往往也在同一块土地上兴建庙宇，以致馆与庙的数量成正比地发展，日益壮大。
* 缅甸全国佛塔林立，笼罩在一派佛光梵影的氛围中，被世人称作“佛塔之国”。长期在佛光的熏陶之下，缅甸人民大都有种善良淳朴的个性，在单纯的意念中，缓慢地度过悠悠岁月。
* 缅甸华人也是如此。他们的生活朴实恬淡，构建了一个重人情、爱传统的华人社会。生活在这治安良好、邻里守望相助的悠闲国度中，华人个个看来也都异常敦厚老实。
* 虽然这里也有基督和穆斯林信仰，但大部分缅甸人民，包括华人在内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华人佛教徒还有短期出家的风尚，他们一般会选在小乘佛教的大日子——泼水节期间出家，短则三五天，长则一个月，各完成其祈福、还愿的心意。
* 除佛寺外，缅甸也有很多华人传统的庙宇，其中不少还是超过百年历史的老庙，里头主要供奉观音、大伯公和土地公。在仰光唐人街就有两大著名的观音庙，分别是福建人建的庆福宫，以及广东人建的观音古庙。络绎不绝的信众带来鼎盛的香火与人潮，使它们成了旅游热点。此外，还有十方观音庙、十方极乐寺和中华寺等，也都各具特色，香火不衰。
* 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缅甸成了一个封闭、专制又落后的国度。外界一般会猜想，缅甸华人一定也在苦难中度日如年。然而，如果亲眼目睹了当地华人脸上的憨笑，这印象将不攻自破。
* 尽管“自由”对缅甸华人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梦幻，但他们早已学会如何在有条件的自由里悠然度日，随遇而安。
* 缅华用最低的生活欲望，成就了最善良的世界。发展的缓慢，让美好的华人传统都得以保存下来。浓浓的人情味，牵绊着多少华人离开的步伐。
* 然而，古城外有更精彩的花花世界在招手，不少年轻人终于咬咬牙，还是离开了。

文莱

     文莱在马来语中是“和平之邦”的意思。它位于加里曼丹岛的西北隅，北面临海，其他部分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Sarawak）接壤。文莱自1888年起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迟至1984年1月1日才取得全面的独立。

      自1929年发现了石油，寂寂无名的文莱顿时成了婆罗洲的一颗明珠。丰富的资源，使这个人口仅40万的小国人均年收入高达2万多美元，成为东南亚第三大产油国和世界第四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国，赢得了“东方科威特”的美誉。

      文莱施行“马来、回教、君主”的政治制度，苏丹（Sultan，即君主）身兼总理、国防部长及财政部长，拥有绝对的权威，备受全国子民的爱戴。

      华人就在这富裕的和平之邦过着安逸的日子。

      文莱和中国交往的历史十分悠久，近年来，在文莱河出土的唐宋文物，即为最佳佐证。根据《明史・渤泥传》，文莱国王加那（Maharaja Karna）曾经远赴明朝朝贡而不幸病逝于南京，当时的永乐皇帝还给予厚葬，并且立下王墓。

      15到16世纪期间是文莱的黄金时期，其贸易发展的蓬勃，黄金矿产的丰富、还有胡椒以及香料的资源引来了大批华人。不过，定居于此的华人并不多，他们大半是往来两国的过客。根据第一次人口调查， 1911 年文莱仅有736名华人。

      华人移民大幅度增加，可追溯到1929年，那一年在文莱发现油田。丰富的油藏使这个小国备受世界瞩目，并且吸引了大批华人涌入。1931到1947年间，不少砂拉越、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华人技工前往文莱从事与石油工业相关的工作，使这个国家的华人人口激增。

      二战之后，文莱开始积极展开国家的基础建设，制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因此又吸引了一大批华人迁入。1958年，金门发生八・二三炮战，致使一批金门人通过亲属关系移民过来。

      从1947至1981年，华人人口增长的速度十分惊人，1981年，文莱已有了近4万名华人，几乎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0%。不过，自此之后，移民人数就再也没有明显的增加。

      这些从华南来的移民，依旧习惯在他们本身熟悉的环境里生活。

      18世纪初，大部分华人皆聚居在一个名为甘榜苏丹拉玛（Kampong Sultan Lama）的水村中。由于那里有90%以上的居民都是华人，当地人后来便称之为“华人水村”。在兴盛期间，村内的住户多达250家，人口则超过两千人。

      村里的木屋一间挨着一间，住在此处的华人大多以闽南语交谈。在这里常能看见运载货品以及粮食的小舢舨在四处流荡兜售货物，摊贩与居民熟络地闲话家常，及小孩子在高脚屋下嬉水的情景。

      “逢年过节或邻家有喜事，华人一定给左邻右舍派送食品或礼品，彼此间感情融洽亲密，并且守望相助。”一名在水村长大的华人，对童年那段水上生活缅怀不已。

      华人快活无比的水村生涯，随着1981年一场无情的大火而结束，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华人水村也从此走进历史。而那些在水村从事流动贸易的商人，也只好逐渐将重心转移到陆地。

      文莱政府不轻易接受入籍，申请者必须在当地居住超过20年，并且通过马来文考试之后，才能成为合格的公民，而永久居民的申请条件也十分苛刻。

      “我们虽然有护照，但上面的国籍那一栏是空的，意即我们仍然没有国籍，很多华人住了一辈子都还是无法入籍。”一名持永久居留证的华人感叹道。

      国籍的问题，造成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华人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失。一些非公民华校留学生，毕业后也不愿再回到文莱。

      而今，四万多名华人之中，仅有大约23％是公民，另外一万多人为永久居民，其余的华人则是手持工作准证的临时居民。

      然而，华人也深深明白，除却无法入籍的缺憾之外，这里确实是一块营建理想家园的沃土。

* *当地华人习惯将文莱称作“汶莱”（读音同“文”），是因为他们相信“文莱”加“水” 会带来好运。*
* 文莱华社主要由福建人、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与海南人组成。如今，超过60%的华人集中在文莱一摩拉县城区（Brunei-Muara），其中福建、金门人多聚集在首都诗里巴加湾，客家、广府及海南人则多分布在马来奕县（Belait）。
* 在这富裕的穆斯林小国，华人过着如鱼得水的生活。文莱马来人开放、开明的胸襟令两族之间相处和睦，未曾有过种族纠纷。华人也毋须信奉伊斯兰教，而只要效忠苏丹即可。除此之外，当地华人也享有组织社团、发展华教的自由，完好保存了华人的传统习俗、思想及语言。
* 华人多年来勤奋打拼，在经济上取得杰出的成绩。他们大多经营家族式生意，多从事杂货业、迷你超市及百货业。此外，华人社团积极参与国家活动，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 随着岁月的推移，华人对文莱的情感日益深厚，尽管大部分华人仍然无法入籍，但他们已将这小国视为终老的归宿。
* “这里很太平，步调不快，工作也毋须太拼命。”当地华人如此形容这小国惬意的生活。
* 文莱面积不大，85%国土为原始森林所覆盖。这里空气清新，生活安适，多数人毋须为三餐而忙碌烦恼，整个社会的氛围悠闲惬意。华人也渐渐习惯把步调放缓，平衡而健康地生活。与其拼命工作，他们宁可多花时间在家庭、运动、休闲及宗教上，以追求素质较高的生活。
* “我们平时会多花时间在家庭成员和亲戚之间的互动上，例如经常举办家族活动。”来自大家庭的林芳芳表示，由于文莱华人家庭的凝聚力较强，无形中加深了年轻一辈对华人身份及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
* 当地华人在生活上仍保持华人的传统习俗，以中餐为主食。虽身在回教国家，但华人并未被禁止吃猪肉，每天仍可吃到从东马进口的新鲜猪肉。
* 此外，华人也融入当地，都能接受辛辣味浓的沙爹、椰浆饭、马来炒面、烤鱼等马来食物。
* 当地的房屋面积一般都很大，宽敞的空间令人感到相当舒适。在洋房周围还有很大的空地以供停放多辆汽车。富裕的文莱人拥车率极高，每户至少有两部车子，当地华人常开玩笑说：“文菜的水比汽油贵，在文莱开车最划算了。”华人因此也习惯以车代步，还打趣说：“商店要是开在不便停车的地方，肯定要关门大吉。”
* 文莱全国禁酒，娱乐场所也不多，因此民风比较淳朴，但生活相对较为沉闷些。华人平时的娱乐就是收看卫星电视节目或看影碟，几乎家家户户都安装卫星电视，通过收看电视新闻，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动态。
* 出了家门，华人不是逛街买东西，就是与家人朋友齐上馆子品尝美食，再不就到百货公司去吹冷气闲逛。华人兴致勃勃地说：“周末最大的娱乐就是跟家人朋友开车到邻国马来西亚的东部城市美里（Miri）或林梦（Limbang）去游玩，车程仅耗时一两小时，东西无论买的或吃的都很便宜。”
* 文莱地方不大，华人出门容易遇上熟人，彼此或多或少都有点亲戚关系，人情网络密实。此外，华社还有个有趣现象，即华人到餐厅里用餐时若碰上朋友或亲戚，彼此一定抢着替对方付账。这里还流传一种说法：“在文莱无论如何都不会饿死，因为一定有人愿意请你吃饭。”从中可体会到当地华人浓浓的人情味。
* 或许，正是这种亲切熟悉的感觉，迎合了华人心中对家园的向往。虽然国籍成问题，但他们懂得“有得必有失”，卸下了心中的疙瘩，眼前就是一片海阔天空。
* 和许多国家的华人一样，不少文莱华人也是由经商起家。
* 走出水村之后，华人涉足的商业领域很广泛，包括百货、医药、电器、机械、五金及钟表等。20世纪60年代，文莱大兴土木扩建基础设施，引进不少华人工程师、技术人员、机器技师、销售人员、建筑工人和经理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士，扩大了华人的职业范围。
* 到90年代初，华人已在批发、零售、饮食、旅馆及建筑等行业占了重要的位置，还有一些人从事金融、保险、地产、投资与服务工作。一名开杂货店华人说：“1997年那一波金融风暴，令十几万名外劳撤出了文莱，消费市场陷入一片低迷之中。”在金融危机下，生意人自是首当其冲。
* 然而，华人凭着不畏艰苦的精神，以灵活多元的手法度过了难关。
* 天然资源是文莱的经济命脉，而其90％的物品包括食品、日用品都需依赖进口。由此，华人很快看出了市场的需求，并抓住商机，迅速在百货、杂货业中站稳脚跟。
* 华人的百货公司与超市遍布各城镇，而金门人所经营的，多属于家族式的传统杂货店、迷你超市等更占了当地市场的50%。无论在大街或小巷，这些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或迷你超市随处可见，相隔几条街就出现一家。
* 一名百货公司经理指出：“百货业的竞争很激烈，大家各出奇招，使出特价促销、抽奖送礼、产品区隔等策略来吸引客人。”大规模的百货公司财力雄厚，市场庞大，能从中港台地区大量进货，提供较低廉的价格。至于传统杂货店或迷你超市则难与竞争，生存的空间日益窘迫。
* 华和百货及第一百货，是文莱家喻户晓的华人百货商场，成为当地人购置日用品的好去处。
* 现年80岁的金门人林国民，是文莱著名的“百货大亨”。1947年，他孤身一人过来投靠叔叔，从杂货店助手做起，凭着勤奋刻苦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并于1976年在当地最兴旺的商业区施丽开设了第一百货。如今，集团旗下已有16家子公司，在主要地区都设有分行。
* 林老先生以闽南语总结多年打拼的心得：“拼搏、积极和勤俭，是我们华人成功的原因。此外在文莱不用交税，生意比较好做。”由于国库不依靠人民税收，政府实施免缴个人所得税、企业免收营业税的政策，这对开店经商的华人无疑大为有利。
* 然而，身处这过于安逸的环境，也使文莱人缺乏创业精神，因此未有大企业家出现。
* 政府在经济上还是以扶持马来人的发展为重点，规定某些特殊行业或重要经济行业只能由马来人经营。此外，唯公民才享有土地所有权和买卖权，华人从事各行都须与文莱公民共同经营。因此非公民的华人若想开店就得找个“人头”，而往往遭对方“吃掉”的事也就常常发生。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华人在当地的经济活动。
* 不少年轻华人到外国念大学，毕业后有两三成会留在国外工作几年，家长一般上也非常鼓励他们留在国外，他们认为：“文莱就业机会不多，先吸取一些外国工作经验后再回来会更好。”
* 那些选择回国的年轻人，很少会愿意继承父母的传统生意，而会从事会计、律师、电脑工艺等专业工作，另外少部分人也会选择自行创业。
* 文莱的种种福利是依靠石油、天然气收入来支撑。意识到石油终有枯竭的一天，文莱苏丹在十几年前提出了经济多元化的发展计划，近几年更积极鼓励外商前来投资，但收效仍不明显。
* “取诸社会，用诸社会” 的道理，文莱华人了然于胸。
* “一直以来，文莱华团都积极响应国家的活动，出钱出力，参与程度绝不亚于马来人，以此表达对国家和苏丹的效忠。” 诗里巴加湾中华总商会代会长林再云的这番话，显示了当地华社已主动靠向主流社会。
* 当地华人社团现有50个左右，以业缘、地缘性的团体为主，比较活跃的则约有十几个。其中，成立超过60年的诗里巴加湾中华总商会是少数影响力较大的团体，对内调解华社矛盾，对外则代表华人权益。
* 另外，成立9年的福建会馆则拥有最多会员，在华社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会员大多来自金门。除了给会员提供服务外，它还大力配合政府推行的政策，积极参与华社或政府举办的活动。
* 福建会馆主席林成国屈指算道：“会馆近期参加的活动有王储世纪婚礼、苏丹陛下华诞庆典、国庆日庆典、华社新春团拜、开斋节贺年、捐助国家孤儿基金会，以及参与文莱苏丹陛下登基25周年纪念碑和60诞辰纪念碑的筹建。”
* 华团和政府间每年都有互动，固定参加一些国家重要活动，如每年1月1日的独立日，福建会馆必全力配合皇室的庆祝仪式；7月15日的苏丹诞辰，则由中华商会承接烟花燃放等祝寿节目。平时皇室有什么婚丧喜庆，华团领袖也都欣然出席，以表关心。
* 除了先辈的努力，只有靠更多华人不断为国家付出，主动融入社会，他们始能为下一代争取更多的认同以及更大的保障。
* 华人以“凝聚我族，贡献国家”的方式融入文莱社会。对于国家，他们奉公守法，积极参与，尽力回馈；对于华社，他们维护华教，寻根溯源，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 华团在支持华教、维护中华传统方面功不可没，大家都保持着“维护华教，支援华教”的精神，每年春节，不少华团都会颁发奖励金给会员的子女。
* 长期默默地付出，终于看到一丝回报。有九名长期为华社出钱出力，并对国家贡献良多的华人领袖，他们是林清注、方国珍、林德甫、方汶汀、黄迪福、温瑞祥、林玉成、吴景进和刘锦国，受到苏丹的表彰，被封为宫廷大臣（Pehin或丕显）。
* 只要能力许可，海外华人都会兴办华文学校，力保中华文化的根，文莱华人也不例外。
* 文莱目前有8所华校，其中5所是小学，另3所则同时开办幼儿园、小学部及中学部。为了配合国家教育政策，这些华校皆注册为非政府学校，但除了经费自主外，课程安排、教学时数及教员聘请均受教育部管制；小学、初中及高中毕业生，也都得参加教育部的统一会考。
* 这里的华校教学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大相径庭。除了华文及道德课以华文教学，马来文以马来语教学外，其他科目一律以英语教学，并且采用新加坡的英文教材。因此，这里的华校生都具备相当高的英语程度，毕业后只要考取剑桥A水准文凭，即可申请就读文莱大学或国外大学。
* 尽管目前华文已不是主要的教学语文，但由于学校前身是纯华校，学生也多为华人，因此华文学习的环境还算良好。下课后，学生多以华语交谈，学校的行政事务则以中、巫（马来语）、英三语并用。
* 汶莱中华中学许校长自豪地说：“华校生升学的机会与政府学校学生均等，甚至他们还多了一项优势——华文。”
* 如今，文莱华校生给当地社会大众的印象是：品学兼优。
* 华校重视课外活动，不仅要求学生拥有好的学业表现，还通过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组织及社交能力，使他们不仅在全国考试中脱颖而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一样可圈可点。醒狮、舞蹈、华乐等团体因表演水平高，多次获得政府和华团的邀请登台表演。
* 由于华校三语并重，并在政策上与政府相配合，加上华文的价值日益提升，如今华校的办学方针还得到了友族的认同。许多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土著纷纷报读华校，学生人数日增。例如，2007年报读汶莱中华中学的马来人就有612人，占学生总人数的18%.
* 当地华校生能享有今日的地位，是靠前人一点一滴地争取而来。华校曾度过一段艰难岁月。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政府策划将中学改制为国民型学校。经八校董事部长达18个月的积极争取，才总算保住了它，但从此却失去了政府津贴，教纲也须依循教育部的规定。当时，董事会与华社出钱出力，一同捍卫华教，这薪火才得以传到今天。
* 一路走来，身为校友的许校长眼见母校的壮大，欣慰地说：“虽然每月要付一百多元学费，华人普遍上还是乐意将孩子送到华校来。部分孩子较多、学费负担较重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读到小学毕业，奠下华文基础后再转到政府中学去。”
* 先辈们撒下的文化种子，如今都开成一朵朵艳丽的鲜花。随着中国的崛起，文莱华校也将拥有更多发展的契机。
* 尽管住在回教国家，华人依然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半数以上的当地华人信奉道教，家中一般供奉多尊神像和祖先。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数也占华人人数的25%.
* 在文莱首都，至今仍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华人庙宇——腾云殿。这座重建于1960年的古庙殿内供奉多尊神明，包括广泽尊王、玄天上帝、关圣帝君及保生大帝等。除了每月初一、十五外，每逢华人传统节日或各个神诞，腾云殿的香客总是络绎不绝。
* “广泽尊王虽是福建人的神明，但在这里不同籍贯的华人都会来拜祭。我们相信腾云殿的神不光保佑福建人，也保佑全文莱的华人。” 当地华人如是说。农历八月二十二的广泽尊王诞辰是腾云殿最热闹的一天，会重金聘请国外的歌仔戏团到文莱表演酬神戏，祈求善男信女永保安康，文莱国泰民安。
* 文莱是少数将华人新年列为公假的国家之一。当地政府规定大年初一为公定假日，举国放假一天。为了表示对华人传统的尊重，政府于2008年还宣布解除长达45年的燃放爆竹禁令，让华人能在新春时节开怀欢庆，为文莱增添几许热闹的新春气氛。
* 当地华人说：“文莱的春节气氛并不怎么浓烈，市区街道比平时还要安静，因为大家都利用难得的春假举家出国旅游去了。”其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文莱人最爱的旅游景点。
* 中秋佳节的气氛反倒较为浓烈，各大商家推出各种造型及口味的月饼，还有五色斑斓、神采各异的灯笼，营造出浓厚的佳节氛围。
* 国小，眼界却不能小，文莱华人明白当一只井底之蛙的危机。
* 文莱当地虽没有出版华文报刊，但马来西亚的《诗华日报》、《星洲日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华文报都在文莱设有办事处，每天发行文莱专版，一般在华人的书报社或茶室即能买到。
* 每天早上必到茶室喝早茶的陈先生，从手上的华文报中探出头来笑说：“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报纸，是这里许多年纪较大的华人的习惯。”
* 文莱华人每天都有阅读华文报的习惯，而且至少阅读一份，一些人家里还分别订购华文、英文报各一份。但一如其他国家的情形，这里的年轻华人也不太有兴趣阅报，多从电视、杂志及网络取得资讯。
* 有趣的是，这小国由于新闻不多，国民反而留意起邻国及世界的时事动态。譬如新加坡的华文报《联合早报》及英文报《海峡时报》，就有不少文莱的读者。
* 书报社老板透露：“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读者最多，因为资讯丰富，内容全面，是政府官员们最爱看的报纸。”此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发行的娱乐时尚或美食类的杂志也备受欢迎。
* 文莱的广播电台旗下，自1957年设立了一个中文台，至今开播超过50年，每天播放5小时的综合节目，丰富了文莱华人的生活。中文台的黎经理指出：“除了每天早晚各播出15分钟的华语新闻外，我们尽量制作较生活化的节目，提供实用的生活资讯，因此吸引了不少女性听众。”
* 此外，还有邻国马来西亚的国营中文广播电台“爱FM”和古晋中文台可供选择，让当地华人轻易就能收听到华语歌曲，并掌握邻国的最新动态。
* 说到网络媒体方面，则不得不提到[易华网](http://www.e-huawang.com/)。这是一个专为文莱华人开设的网站，集合了50多个华人社团的资料及杰出华人的成功史，让全世界轻易取得文莱华人的资讯。
* 多年来，文莱始终都有一批爱好华文文学的华人，在孜孜不倦地创作。虽然不如邻国马来西亚或新加坡文坛那般的成熟而活跃，但几名当地华人也凭着对华文文学的热爱，成立了“汶莱华人作家协会”，相互勉励。
* 该协会曾与厦门大学联合主办“第六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并于2006年在文莱承办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由此可见当地华人热爱华文文学的程度，并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华人。
* 文莱国情开明，这里的马来人对中餐的接受度非常高——这情况在其他回教国家相当少见。
* “马来人很爱吃中式料理，经常光顾华人餐厅，港式点心尤其合乎他们的胃口。”华人餐厅老板说。
* 为了吸引更多马来食客，一些华人还专门开设了清真式的中餐厅，采用符合回教规定的食材，以其他肉类取替猪肉，但菜肴仍保持中华风味，让马来人在兼顾教规的同时，也能品尝中华料理的美味。
* 例如，皇家汶莱饮食集团就在首都开设了几家清真点心茶楼，配合马来顾客的口味推出鸡肉烧卖，成了马来人最爱的点心。
* 2006年，是文莱华社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
* 华社与王室共庆农历新年，即始于2006年丙戌春节。自文莱于1984年取得独立以来，当地华人首次邀请苏丹出席华社举办的“华社新春联欢团拜”。
* 自2006年起，新春联欢团拜成了华社每年年初的重头大戏。为了将华族文化的精髓完美地呈献于苏丹和皇室成员面前，筹委们都尽心尽力，积极凝聚华社力量为此活动筹款，并精心安排节目。
* 除了一系列富有华人传统文化色彩的表演如舞龙、华乐及华族舞蹈外，筹委会每年还精心筹划一个以文莱华人为主题的展览。
* 2007年的“十二生肖”展览及2008年的“参与与奉献”图片展，加深了苏丹及皇室成员对华人传统文化的了解，以及华人从早期到近代对文莱所作出的贡献。
* 这项活动对华社意义极大，除了展现华社的团结及爱国情操外，更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了解与融合。

      从漂泊到扎根，华人对这个朴素、富裕的袖珍小国日久生情，渐渐爱上这与世无争、宁静和乐的生活。如今，虽身处安居乐业的顺境，华人的心灵深处却不忘居安思危，除了对文莱“贡献与参与”外，也同时壮大华族的实力，以期能继续享有眼前的好日子。

 东帝汶

 东帝汶地处东南亚努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西部与印尼相接，东南则隔帝汶海与澳洲相望。

        犹如世外桃源的东帝汶，却有着坎坷的身世。它自16世纪开始就被葡萄牙统治，二战期间曾遭日本入侵。1975年脱离葡萄牙之际，却被印尼的军队进攻占领，此后这里战火不断。1999年，人民公投决定自治，经联合国托管两年半后，于2002年正式宣布独立。

        饱经战火摧残的东帝汶，目前正处于重建阶段，社会和经济发展只能依靠外国援助推动。这里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却缺乏开采技术，超过70%的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下；咖啡、橡胶和紫檀木统称“帝汶三宝”，务农者超过总人口的80%，但粮食却无法自足。

        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但这里淳朴的民风，秀丽的景观、洁净的海滩、苍翠的丛林和绵延的山脉，都叫人流连忘返。有些华人，相信亦是因此而留在此地。

   虽然帝汶岛和中国远隔重洋，来往不便，但是华人却很早就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南宋的赵汝适在《诸蕃志》记载了华人曾经到这个盛产檀香的地方经商：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提及泉州吴姓家族到东帝汶从事贸易活动的事迹。当时的华人大多数选在顺风时节扬帆南下，上岸之后就与当地土著进行交易。东帝汶的商品价格极低，商人们往往都能获得巨利而返。渐渐地，华人便开始在此定居。早在殖民势力入侵之前，华人聚落就已经成形。

        根据资料显示，1511年，有3名广东人到东帝汶的欧库西砍伐檀木。3年后，又有两名华工随葡萄牙商人而来到东帝汶，并把檀香木运载回国销售。

        华人最早靠岸的地点，相信是东帝汶以西的力帝山市（Liquica）。1800年，当这里的首都迁到帝力之后，从广东省前来东帝汶做生意的华人人数更是大幅增加。1816年，荷兰的科尔夫少校从荷属西帝汶来到葡属东帝汶帝力的时候，就看到许多华人在这里生活。

        在东帝汶的华人，也有来自澳门的。由于两地同是葡萄牙殖民地，当时不少澳门华商都到东帝汶寻找商机。

        此外，东帝汶也曾是澳门华人囚犯的流放地。根据居留澳门的东帝汶裔神父弗兰西斯科·费尔南德斯（Francisco Fernandes）的说法，因为澳门地小，在殖民时代，葡萄牙殖民政府每年都会从首都里斯本开出一艘大船到澳门，将一批囚犯送往东帝汶服刑。大部分囚犯在恢复自由身之后，都会选择留在当地工作，甚至和当地土著通婚，落地生根，形成了早期的华人社群。

        20世纪初是华人移居东帝汶较为频密的时期，这时前来的华人绝大部分是粤东闽西的客家人。华人社团、庙宇、学校和坟场也因而纷纷建立了起来，华商的身份和地位越来越高。根据统计，1935年这里共有3500名华人，占了总人口49万的0.71%。

        在二战期间，日军侵占东帝汶作为进攻澳洲的跳板，华人遂无辜地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死伤无数，也导致1950年的华人人口减至约3100人。

        1975年，印尼政府派军入侵东帝汶，这里的华人世界自此便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华人一直以来都掌握着东帝汶的经济命脉，可是在印尼入侵之后，华人的财产或被摧毁，或被没收。许多华人更担心会遭受排华行动的迫害，纷纷迁移至澳门、葡萄牙和澳洲；那些走不了的中低阶层，只好留在原地静观其变。

        直至1999年的20余年间，东帝汶的华人人数已从高峰期的两万人骤减到数千人。

        然而，华人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就此完结。1999年，在东帝汶获得独立之际，印尼民兵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掳掠，帝力市超过90%的面积均烧成焦土，这对华商造成的冲击尤其巨大。许多华人即使后来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之下重返东帝汶，但是面对着满目疮痍的家园，重建之路并不平坦。

        独立之后，有些华人回来了，更有许多新移民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文莱、香港、中国大陆以及印尼等地前来寻觅商机。

        2006年，东帝汶爆发内战，受波及的华人再度逃亡，只剩下大约3000名华人。直至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并且平定局势后，华人人数才逐渐回升，帝力市的各行各业，也再次出现华人活跃的身影。

东帝汶华人失去了很多，但得到的也不少。尽管受尽磨难，他们对这片国土依然爱护有加，充满信心，有些甚至已经做好准备，决定要与它共同进退。

* *许多东帝汶土著至今仍然保存着中国的古钱币作为祭祀之用。这些钱币相信是在清朝时期，由来自华南沿海一带、香港或澳门等地的华人，到东帝汶来做生意时所留下来的。*
* 刚独立的东帝汶，百废待兴，在短短的几年里，各地华商蜂拥面来，雄心万丈试图在这里开创新天地，这些华人新移民，有的是来投资的，有的从打工到创业做生意，有的把这里当作跳板，住上一段时间就会称居到澳洲。
* 早期的新移民主要来自东南业各地，近年来则大多来是自中国大陆的鞋民，他们以福建人为主，其次是浙江人。在此开店经商的个体户，加上中资机构员工、私营企业外派和建筑工人等等，目前东帝汶估计有超过2000名新移民，大多居住在帝力市。
* 土生土长的老移民，有90%是广东梅县客家人。他们大多已在这里繁衍超过4代，有的甚至是第20代了。然而，超过90%的老华人，早在几次动乱中已移居国外，留下的10%，或许没有能力离开，又或许是为了不忍舍弃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而坚守至今。
* 3500名保留东帝汶籍的老华人当中，只有1000人左右定居于此，其余的则在澳洲和东帝汶两地之间来回穿梭。还有一小部分的华人，被老华人称为“新侨”，他们是在印尼入侵时代到东帝汶做生意的印尼华人，主要是客家人、潮州人和福建人。
* 中文学校、华人社团、中华文化，在印尼占领前曾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但这一切都在随后遭到严重破坏。复办中文学校仍在争取当中，而中华商会已重新开放为华人服务。对于华社的未来发展，华人还是相当乐观的。

        越乱的地方越多商机。许多华人秉持着这个信念，踏上这片土地。他们坦言：“这里使用的美金，看在眼里就是黄金了。”

        1999年经历暴乱后，东帝汶满目疮痍，犹如一座死城。灾后重建，物資严重匮乏，平常5分钱的泡面，那时竟然要价6美金。“一大货柜的物品，区区14天就被抢购一空。”来自马来西亚，经营Sunly贸易公司的何万财如是说。

一切从零开始，竞争小，吸引了大批新华人涌入，连土生华人也回返家园开创事业。脑筋转得快的华人，迅速控制该国超过90%的零售和杂货生意，大街上的店铺，几乎都是华人开设的。

        然而，他们今天的成就，却是冒着生命危险换回来的。

        2006年爆发内战，炮火连天，但有胆量留下来守护店铺的华人，都说那是最赚钱的好时机。New 88餐厅老板曾德源表示：“最乱的时候，滞留在东帝汶的联合国和大使馆职员都打电话来订购食物，然后系派配有手枪的人来领取。货源来得不易，食品价格当然也水涨船高。”

        如今，战乱时代过去了，局势渐趋稳定，华人经济如同枯木逢春。

手工、建筑、地产、贸易、零售业是土生华人的传统行业，他们大多开设超市、五金店、从事咖啡、布料等当地特产买卖。新加坡华人多数从事二手汽车以及汽车零件买卖生意，也有不少人在这里开餐馆和酒店。由新加坡华人经营的樱花酒店（Hotel Sakura）有5层楼高，为目前东帝汶最高的建筑物。新加坡华人也计划投资开设东帝汶首家购物广场，占地约19万平方公尺，并兴建拥有450间客房的酒店。

        大部分印尼华人经营电器店，而马来西亚华人大多开设杂货店和餐厅，杂货货源主要来自印尼，食品则经由新加坡和澳洲入口。生活必需品都依赖入口，这里生活水平之高可想而知。

联合国进驻东帝汶以后，常驻机构人员和驻军成了当地的消费主力。仅是维和部队的人数，就曾高达8950人，现今仍有数千人在当地执行任务。2000年至2003年期间，加油站数量一度暴增，而且大多张挂着中文招牌。后来，市场趋向饱和，加油站生意一落千丈，直到最近联合国驻军增加才有所回升。

        外资公司也是华人商家重要的生意来源。许多外国大企业都会在这里购入大量杂货，然后到贫民区派发给需要救济的人。

        在华人眼中，东帝汶就像是个新生婴儿，备受国际社会呵护，未来发展值得期待。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东帝汶政府也逐步放宽移民政策。

        近年来到东帝汶探路的，以福建人占多数。帝力市中心内，超过一半是他们开设的日常用品进口、批发和零售店铺，甚至形成了几条华人批发街。这些新华人有部分最初是建筑工人，后来开始摆摊子做买卖，租借店面当老板。建立起生意基础后，他们开始把亲朋戚友接到东帝汶来。家族式的大批移入，使东帝汶华人群体日渐庞大。

        对黑眼睛黄皮肤的华人，东帝汶人也总是怀有一份感激之情，皆因中国政府一直对东帝汶施予援助，中国曾捐赠超过8000吨大米和50吨食油，以解决饥荒问题。此外，中国还为东帝汶政府援建外交办公大楼、总统府，并派遣医疗及维和部队到当地服务，协助灾后重建。

        此外，当地人相当信任中医疗法。“身体出了毛病，他们都不愿意动手术，而向中医求诊。”华夏专科门诊黄连心医师如是说。目前，帝力市共有3家华人诊所，兼售中药和西药。

        至于饮食行业、华人除了开设传统的中式、葡萄牙式、东南亚式餐馆外，也经营西式快餐店、售卖汉堡包、炸薯条等套餐，颇受当地人欢迎。

        如何区别老华人与新华人的商店，有两种说法：一，老华人和土著一样有午睡的习惯，中午吃饭后是不开店做生意的，开店的都是新华人；二，挂上中文招牌的一般是新华人，走在印尼华人为主的电器城大街，则几乎看不到一个中文字。

        东帝汶刚走上经济改革之路，新兴行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华人登陆东帝汶的故事，相信还会延续下去。

* *葡萄牙时期所使用的东帝汶纸币上印有手写的中文数字，反映了当时华人在当地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东帝汶土著有着乐天知命的性格。他们可以到海边呆坐一整天，肚子饿了就投入大海，捕捉大自然赐予他们的鲜虾活鱼当食物。物质生活不充裕，有的还住在家徒四壁的茅草屋，孩子在烈日当空下赤脚行走，必须走上好几公里路去上学。

        “可能是个性使然，有些土著比较懒散，每天无所事事，男人们也不出外工作挣钱。发薪后，他们会买酒畅饮，或到高级餐馆大吃一顿，两三天内就把工资花光，然后预支下个月的薪水。”及时行乐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这令许多华人老板感到不解。

        不过，也正因如此，华人在这里找到了赚钱良机。“土著售卖蔬菜、水果、海鲜，都是以一堆两堆或一只两只，而不是以重量来计算，结果成交价可能还不到实际售价的一半。”华人笑说。

        在思想观念方面，华人和土著也大不相同。以手机为例，华人是为了生活所需，而土著却只为了炫耀之用。

        东帝汶3家手机店皆是华人开设、华人说：“当地人对手机这玩意儿相当着迷，有的甚至不惜花上整个月的薪水来购买，可是却没有多余的钱买手机SIM卡。”对一些土著而言，手机仿佛不是用来联系沟通。而是握在手中的装饰品。

        土著爱面子，也可以从他们办喜宴的方式看出来。即使经济情况不允许，土著始终坚持以烧猪、烧鸡、甜品等葡萄牙美食来招待客人，最终换来一屁股债，但他们总是这样回应：“明天的事，明天再打算吧！”

        土著追求悠闲游哉的生活，但由于长期营养不均，加上缺乏医疗设备，他们的存活年龄一般不到60岁。

        退休后到东帝汶从事酒店管理的新加坡华人郑汶昇曾有过啼笑皆非的经验。他笑着说：“有个土著员工对我说，老板你好可怜呀，这么老了还没死，还得在这里辛苦工作，很可悲啊！我听了之后无言以对，真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

        可是，跟土著相处久了，华人或许会爱上他们的善良和单纯。

        “他们非常介意别人用粗言秽语辱骂其父母。只要彼此以礼相待，凡事讲理和互相尊重，他们也会以诚相待，甚至以最好的方式回报你。”何万财贯彻这种相处之道，认养了几名土著员工当干儿女。

        面对思想差异的冲击，华人仍然努力寻找着最好的磨合方式。

        东帝汶法律制度仍欠完善，加上政局动荡不安，1999年到2006年间更接连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暴乱，留下来的华人心有余悸，只好把命运交给上天。

        “在帝力生存，必须要勇于面对现实。”这是许多新移民的心声。土著喜欢喝酒精浓度高的土酒，一旦醉酒就会行凶闹事，如向路过者抛掷石头、砸破车窗或闯进店铺抢劫等。“土著不喝酒时是好朋友，喝酒之后就翻脸不认人。”华人百般无奈，店铺打烊后只好乖乖呆在家中。

        庆幸的是，这里没有太多排华情绪，共同为国家打拼的精神反而更浓烈。

华人要面对的，还有致命的蚊症。据说，东帝汶70%的蚊子带有登革热（骨痛热症）病毒，其他的还会传播疟疾，令人闻之丧胆，但土著自有对策——以木瓜叶来治蚊症，尽管功效未经科学验证，但许多华人已纷纷跟进。

        东帝汶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华人说：“很多事情即使有钱都办不到，生活枯燥得像坐移民监一样。”多姿多彩的娱乐消遣是一种奢望，但是对一些华人说，只要能放开胸怀去感受这里的原始风貌与怡人景色，闲暇时唱唱卡拉OK、搓搓麻将，或爬山潜水、到海边烧烤、累了还可以飞到邻国的旅游天堂巴厘岛度假，日子过得还是挺写意的。

        这里年久失修的道路，华人开着四轮驱动车穿过坑坑洼洼的路面，电单车与贴上联合国标志的维和部队车辆呼啸而过，迎面而来的客货车挂满需要风干的海鲜，加上路旁猪狗成群，都是此处司空见惯的景象，也是华人眼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 *东帝汶华人大多数都在商界打拼，不过也有一些例外，这些华人则选择了投身政界，如基础设施部长黎世芳（Pedro Lay Da Silva）及旅游与商业部长Zil Aves*。
* 东帝汶中华商会成立于1912年，为当地首个华人社团，它后来还协助筹设当地唯一的华人义山及十多间中文学校等。除了商会之外，当时还有约15个不同性质的华人社团组织。
* 早期的东帝汶华人，中文水平还算不错，全国各县包括山区都曾开办中文学校。“那时，很多华人家庭一般有6个孩子，每个县平均有300名华人子弟学习中文，就连身边的土著朋友都会说上几句中文。”符孝勤如是说。最具规模的要数创校于1911年的帝力中华学校。它最初只是租用小房间授课，1962年通过募捐，合众人之力兴建校舍，全盛时期约有1000名学生。
* 当年的中文教育体系相当完整，可从幼稚园、小学读到初中、高中，毕业后还能到台湾深造。然而，1975年印尼入侵，实行同化政策，这一切便彻底被摧毁了。
* 印尼政府关闭中华商会及所有中文学校，并占据了会所与校所。中文教育不复存在，中文刊物也禁止流入东帝汶，华人子弟顿时丧失学习中文、传承中华文化的机会。此外，华人社团组织遭取缔，并终止一切活动。
* 随着东帝汶局势趋稳，中华商会于2003年重振旗鼓，开始从事一些文化及慈善活动，如在春节和独立日表演舞狮、捐赠救灾物资等，获得当地社会的赞赏。商会除了充当东帝汶经济发展的桥梁，也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并努力协助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
* “这里华人社群不算大，几乎做生意的华人都加入了商会，大家互相认识，也没什么争吵和摩擦。新老华人文化大致相同，但老华人因曾在这里经历过种种艰辛，知道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得来不易，所以希望新华人多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尽量与土著和睦共处。”现任中华商会会长符孝勤如是说，可见商会任重道远。
* 经过多番争取，政府已协议归还商会会所的拥有权，但目前仍需租借给政府作办公之用。商会紧接着要做的，就是索回帝力中华学校的校舍，并出版当地首份中文会讯。
* 目前，商会每星期开办3堂中文补习班，下午5点半开始上课，为时1小时。学生一般是华人子弟，在家里大多以客家话交谈，在学校学习的是葡萄牙文、英文和印尼文，唯一有机会接触中文的，就只有在补习班。
* 中文教育经历了数十年的断层，如今东帝汶有整整两代华人不会说华语，对中华文化不甚了解。
* “我们要复办中文学校，唯有向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取经，引进大量的中文教师。这条路很漫长、崎岖，但我们抱持希望，一定会坚持下去。”符孝勤踌躇满志地说。
* 建于1936年、位于帝力市中心的关帝庙香火非常鼎盛。“庙宇每天早上7点开门，一直到中午12点关门，至少有20多人来上香膜拜。华人一般只会在初一、十五来上香，平常以土著占多数。”74岁的庙祝方良遂说。
* 土著膜拜关帝的虔诚，华人常常自叹不如。有部分信奉天主教的土著甚至天天到关帝庙求签烧香，祈求神灵保佑。
* 当地人称关帝为中国神，他们深信，关帝保佑华人的同时，也对当地人一视同仁。这里流传着一个说法：二战时期联军向关帝庙投下两颗炸弹，结果竟然都没有引爆，令当地人啧啧称奇。“纵使国家多次遭受战乱破坏，周遭千疮百孔，但关帝庙丝毫无损。”土生土长的方良遂以粤语说道。
* 1977年，关帝庙旁增建了观音堂，面积稍小，加上庭院共占地1000平方公尺。红墙绿瓦，在众葡萄牙式建筑中显得独树一帜，也是帝力市内仅存的中华特色建筑。
* 较偏远的力帝山市，仍保留着超过百年历史的关帝宫和观音宫。“以前这个城市住了很多华人，关公像和观音像都是先人在上个世纪从中国带过来的。后来大家都搬走了，目前这里只剩下五六户客家人。”73岁的钟奇甫一直守着古庙，兄弟姐妹早已移民国外，唯独他与土著妻子和子女们不曾离开过。
* 帝力市近郊有座华人坟场，占地十多公顷，矗立着约1500座传统样式的华人墓碑。最古老的一座建于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印证华来到东帝汶的悠久历史。
* 立墓碑者以黎姓、赖姓和杨姓居多，而较具规模的墓碑，不少是来自澳门的成功华商。“这里不分宗教，而且免费提供墓地，只要死者家属出钱立碑即可，因此每座坟墓的设计和大小都不相同。”管理员说，春祭和清明节期间，大批华人都会前来拜祭。
* 华人在保留自身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忘欢度当地节庆，如元旦时举办派对和大跳西方舞蹈，圣诞节派发红包等等。
* 这里还是一个未定型的华社。
* 老华人大多眷恋这片故土，但年轻一代却伺机而动；有朝一日，老华人可能将跟随后辈移居他国。陆续到来的新华人，或许只是过客，又或许会像前辈一样，作长久居留的打算。
* 无论如何，华人依然细心灌溉，希望它茁壮成长，迎向更美好的未来，诚如该国所提倡的口号——“Goodbye the conflict, Welcome the develop”（告别纷争，迎向发展）。

 圣诞岛

    圣诞岛位于印度洋东北部，北距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约500公里，东南距澳洲的西北角约1565公里。四面环海，沿岸大多为悬崖峭壁，约70%的面积是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来自英国的威廉·迈纳斯（William Mynors）船长于1643年的圣诞节发现了这个岛屿，于是把它命名为“圣诞岛”。1946年起，它成为英属新加坡的领地；1957年，新加坡以290万英镑把它转让给澳洲，圣诞岛自此成为澳洲的海外领地。

        岛上族群由华人、马来人及欧洲人组成，多元文化兼容并蓄。早期华人远渡重洋来到这座孤岛，如今已成为该岛的最大族群。他们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习俗，在这里展开新生活，既逍遥又自在。

  根据记载，1898年有200名从广西来到这里的契约华工，和磷酸盐矿公司签了3年合约。当时，他们的右手背上都各有号码的烙印。

        在短短10年间，磷酸盐矿公司陆续从广东省以及海南岛引进更多华工，致使华人从最初的200人增至1100人。可是，由于物资匮乏，加上华工又长期缺乏营养，结果有超过一半的华工患上脚气病，客死异乡。此外，岛上的磷酸盐矿在1914至1918年间产量大减，更导致华工的人数急速下降。

        华工每天在日晒雨淋下以锄头和铲子挖掘磷酸盐，再以手推车将盐矿从山上运到山脚下，吃的是大锅饭，住的是茅寮，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在那个年代，岛上完全没有娱乐，只有随处可见的鸦片馆及赌馆，许多华工因而染上烟赌恶习，结果欠下了大堆债务由于债务缠身，合约只好一续再续，故而长期留下。

        来自海南岛的何达华于1930年踏上圣诞岛。根据他回忆，当时每天的工资是9毛新币，并被分配到一包米、4罐牛油、两罐牛奶，工作不算十分忙碌，生活也可说是颇为轻松。履行了3年合约之后，他便回到海南岛成婚，并将妻子接过来，之后的岁月都在这个岛上度过，从此再没有返回家乡。而今他已年过90，是岛上最年老的华人，口操流利的海南话。他的孩子则大多数已移居澳洲，只剩下幼女和他相依为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磷酸盐矿的开采工作被迫中断，员工受到战乱波及，也必须撤离到澳洲去。二战结束之后，磷酸盐矿的开采工程重新启动，盐矿公司开始通过代理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招聘大量华工。由于征聘启事列出优厚待遇，华人毫不犹豫便签下3年合约，决心到该岛打拼。

        抵步之后，华人始发现这个岛上除了磷酸盐矿外，就一无所有，异常荒凉。然而，合约都已经签订，后悔莫及，华人唯有硬着头皮留下来再作打算。

        华工们有的负责开车，有的推泥粉车，有的挖矿；而他们的薪金也有技术人员及劳工之分，前者每日有12元新币，后者则有8元新币。克勤克俭的华人在下班之后还兼职替人除草、煮饭、打扫等，希望能多赚一点钱。

        在这里，吃一顿饭只需要大约25分新币，加上根本无处可消费，华人要储蓄并不算太难。

        由于房屋有限，只有工头和技术人员可以申请房子，并获准将家眷带来；而劳工所居住的单身宿舍，则只有8平方米大的空间，能容下一张床及一个柜子，设备十分简陋，也没有热水供应。“当时我们每天用冷水洗澡，每天都是边跳边洗。”在岛上住了近40年的何胜光，对这一段过往的生活经历，好气又好笑。

        1970年代为移民浪潮的高峰期，岛上的华人约有三四千人，虽然人数很多，地位却非常卑微。当时白澳政策无孔不入，一些泳池和俱乐部都只限白人使用；华人只要一步入白人居多的银城（Silver City），警察就会前来干涉。此外，华人开车不可越过白人，华人与白人同工却不同酬，欺压华人的行为层出不穷。

        华人若是不慎逾越雷池，其工作证上便被盖上NTR(Not To Return，即不得入境）的字样，然后被遣送回国，永远不得重返圣诞岛。华人不想丢了饭碗，所以只能忍气吞声。

        直至1975年，圣诞岛职工总会正式成立，工人的权益才开始受到重视，经过许多次的罢工及谈判，华人终于得以享有同工同酬的待遇。之后，随着白澳政策的废除，圣诞岛才逐渐形成一个既包容又开放的社会。

        权益得到了提升，华人的生活也因此逐渐改善。但是到了1984年，磷酸盐矿公司减少开采活动，因而献议员工接受自愿被裁退的计划，自愿者每人将可获得2万3000澳元的赔偿金。当时，在澳洲购买房子只需要3万澳元，于是有许多华工都接受了这项献议，向一起打拼的工作伙伴告别，离开了这个生活多年的海岛。

        当时华工是分3批离开圣诞岛的，第一批有249人，第二批是百多人，第三批的人数最多，有500人左右。此后，就鲜少有新移民迁入，岛上华人人数有减无增的状况维持至今。

        圣诞岛华人从高峰期的三四千人下降至现今的400多人，其中以来自马来西亚的占多数，也有部分来自新加坡。由于少有新移民涌入，加上年轻一辈陆续移居澳洲，岛上华人人口老化的现象愈加显著。

        华人以打工为主，约200名华人在磷酸盐矿公司工作。经商的华人不过十多人，商铺屈指可数，只有3家杂货店、两家中餐馆、两家汽车修理中心、两家出租车公司、一家迷你市场、一家宾馆及一家建筑公司。另有华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包括两名华人警察及3名税务官员。

        圣诞岛地方不大，主要道路只有3条，华人每天不外乎上班、下班、休息，生活悠闲、有规律。华人社会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常相约聚餐，见面总是寒暄一番，那浓厚的人情味弥漫在整个海岛，是金钱也买不到的亲情。

        部分华人已入籍澳洲，并在当地置产，为孩子教育及日后的生活作好安排；有些保留原有的国籍，落叶归根，有些则在家乡与圣诞岛两地往来穿梭，漂泊不定。

        华人说：“有福份的人才会来到这里。”的确，这里赚钱不难，存钱更易，毕竟消费的地方不多。更重要的是，这里治安良好，那份安全感，叫人乐以忘忧。

        圣诞岛流传着一句话：“打工比当老板好。”

        的确，磷酸盐矿工的上班时间从上午7点至下午4点，工作9小时，扣除喝早茶、吃午饭及喝下午茶的时间，每天工作不过6小时。工作轻松，年薪却最少有3万多澳元，加上每月的生活津贴、每年的调薪，收入相当可观。这种优差，当然比当老板好。

        高薪以外，福利也很吸引人：每年6个星期年假，另加两张免费的双程机票，可选择回家乡探亲或到澳洲探望留学的子女。这些福利令许多打工一族称羡不已，因此在同一个领域、同一家公司服务超过30年的华人比比皆是。

        在这里永远不会出现手停口停的状况。万一失业，华工依然可以领取失业金和福利津贴。单身者，双周可领取498块澳元，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每月则可以领取千多块。换句话说，失业者不单生活费不成问题，还有能力出国度假。

        没有穷困潦倒的忧虑，没有负担和压力，华人的生活过得轻松惬意。

        “快快乐乐，有工做工，没工找阿公（政府）。”王益瑞在岛上住了32年，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怡然自得。

华工的奋斗历程也不是一路平坦。1980年代末，澳洲政府曾以环保为由，关闭了磷酸盐矿区，后来在职工总会的斡旋下，工人们群策群力筹集了300万澳元，于1991年接管磷酸盐矿公司，并在热带雨林资源不受破坏的条件下恢复开采活动。1998年，磷酸盐矿公司与澳洲政府签订为期21年的矿产开发租约，直至2019年。

        当地华人说：“少了磷酸盐矿，圣诞岛就什么也没有了。”的确，磷酸盐矿是圣诞岛的经济支柱，也基于此，才延伸出其他经营项目。该岛的杂货店及中餐馆数量，刚好能应付岛民的需求量，少一家问题不大，多一家则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万一开采合约不获延长，华人或许会因失去工作而离开，并引发骨牌效应，导致中餐馆、杂货店结业。

        除了磷酸盐矿，圣诞岛其实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那碧绿的印度洋、浩瀚的热带雨林、壮观的红蟹大迁徙、珍稀的野生动物，都有着过人的吸引力。

        每年11月尾至翌年2月，成群的红蟹从浩瀚的林海迁居到大海产卵，再从大海返回丛林的怀抱。千万只红蟹遍布岛上主要公路，宛如一张色彩亮丽的红地毯，蔚为奇观。当局为了保护红蟹，还特地建造一座桥让红蟹过路。

遗憾的是，该岛的旅游设施不够完善，往返该岛的机票价格高昂，始终无法招来太多游客。

* *圣诞岛早期移民多来自广东省，因此许多路牌都以粤语直译，如Tong Yan Loh（唐人路）、Xian Sang Loh （先生路）、San Mao Loh（山猫路）、Shang Zhai Loh（生仔路）等等，趣味十足。*

   起初，华人抱着淘金的心态到来，心想3年合约期满，挣够了钱就离开。或许是习惯，又或者是容易满足，合约续了再续，时间消逝，一晃眼黄金岁月都在这岛屿上消耗了，心里更衍生出一份归属感。

        “去到哪里都不习惯，还是回来了。”经营旅馆的陈森吉不是未曾离开过，只是这里的一景一物和人情味，让他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决定回来。“这个地方就是那么奇特，总是令人想念，来了就想待下来。”

        华人的休闲生活从下班后才真正开始。下午4点过后，有的华人相约打羽球、跑步、散步，晚上再到餐馆用餐，或者在家煮几道小菜。饭后，看看电视、串串门子、到酒吧解闷，或到半山公馆赌上一两把，生活清闲自在。

        纵使没有购物商场和娱乐中心，物质生活并不丰裕，精神生活却无比富足。

        “或许有人说我们和外界脱节了，不过，我们在这里一样看新闻，一样知道世界大事。这里生活平静、安全、无忧无虑、车子、房子不上锁，也从不担心。”杂货店老板娘黄梅心非常享受这里的生活，已把它视为第二故乡。

        周末，华人喜欢出海钓鱼、郊游、野餐、烧烤，节目非常丰富。也有的出席宗教聚会，洗涤心灵。聚餐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华人喜欢轮流请客，烹煮几道菜肴，邀约几个好友，边吃边聊，时间过得特别快。没有强大的竞争压力，日子轻松简单，胜过一切荣华富贵。

        华人、马来人及欧洲人在岛上和睦共处。这里没有冲突、歧视，大家尊重彼此的宗教、文化及语言。每逢节庆，各种族也打破藩篱，邀请友族同胞一同参与。

        身处在一个宁静的岛上，做事似乎不需要太急躁。在这里，工作气氛是轻松的，步调缓慢是可以被接受、被原谅。接到任务后，大伙都很有默契地等到第二天才去处理，不会赶在一天内完成。

“追不上时代的步伐，习惯什么事情都不紧张，还是留在本岛好。”家庭主妇谢水玉习惯了岛上的生活节奏，那清幽的环境更叫她难以割舍。

        圣诞岛四面环海，孤傲地伫立在海中央，华人形容它就像一座自由的监狱，可以在岛上自由活动，却不能随意离开，皆因该岛对外就只有班次有限的空运和船运。

        生活是自己选择的，享受与否在于心态，只要接受了，就会把它的优点放大、缺点缩小。在这座孤岛上，没有抢劫、没有勒索，犯罪率几乎是零，加上地方小，彼此互相认识，任你偷窃犯案，也无处可逃，最重要的是，大家丰衣足食，根本不必作奸犯科。难怪有人说：“警察只负责管交通就好。”

        生活素质好，不拘谨、不约束，烦心的事情不多，简简单单，华人感觉越活越年轻。“没有人能看出我们的真实年龄。”华人自豪地说着，眼神清澈，浑身充满活力。

        日子过得轻松自在，但由于岛上物资匮乏，吃的和用的都依赖进口，运输成本增加，导致物价高涨，消费水平甚至比澳洲还要高。

        进口食品主要靠空运或船运，不过，该岛的飞行航道短窄，降落时得花一番功夫，若遇上天气不好，可能须折返，致使食品无法如期抵步；至于船运的货品，偶尔也因浪大，船只无靠岸，而延迟交付。

        食品进口取决于天气，因此家家户户都有囤粮过日的意识。每逢星期一，飞机降落或货船靠岸后，大伙儿就一窝蜂涌到杂货店，选购新鲜的蔬果、肉类，以填满一星期的需求。进口的食品多来自马来西亚及澳洲，除了罐头食品外，都是一些冷冻食品，如包子、糕点、棕子、蔬菜、肉类等。

        人口少，消费市场小，摆在杂货店陈列架上的罐头食品有时候会囤放至过期、及时发现的消费者或许会要求业者退钱或换取其他货物，有些则把食品丢掉。基于此，华人购买食品或酱料时，都会特别留意生产日期及有效期限。

        位于半山（Poon Saan）的咖啡厅提供早午餐，是华人最爱光顾的地方。餐厅每天只卖一道面食作早餐：星期一咖哩面、星期二炒粿条、星期三云吞面、星期四卤面、星期五虾面；午餐是三菜一汤的套餐，每份十块澳元。没有眼花缭乱的选择，你只能选择吃或不吃。

        这里用餐按时按点，早餐从上午6点至11点，午餐从上午11点至下午2点，晚餐则从晚上6点至10点，岛民也因此养成有规律的饮食习惯。万一误点就得饿肚子，或者自己在家里烹煮。

        随着磷酸盐矿区重开，华人开始在当地置产，把原先租用的房子买下，以保障未来。华人集中居住在3个地点，分别是银城、半山及车头仔（Drumsite，又称山上）。

        银城是欧洲人留下的，设计具欧洲度假村格调，有前院、后院、客厅、饭厅、3间睡房、厕所，环境宽敞舒适；半山有3栋建于1960年代的组屋，具有新加坡特色，楼高3层，设计简单，内有浴室、厨房和两间卧室，空间虽小，但设备一应俱全；车头仔的独立式洋房，跟银城的很相像，只是可用面积较小。

        前院有神龛，摆放着一两盆富贵花，是华人房子的特色。客厅的天花板有一把大风扇转动着，墙上挂着日历，用金银饰品、佛像、中国结、扇子、山水画等加以点缀，即使换了新环境，华人还是依照家乡那套方式生活着。

华人出门习惯穿背心短裤，外加一双拖鞋，在气候干爽的海岛上，舒适自在的装扮最适宜。这里没有服装店，华人的衣物都是每年回乡或出国度假时购买的。

        圣诞岛的交通不方便，巴士每两个小时才川行一次，华人鲜少会顶着大太阳在候车亭等巴士。因此，每户华人家庭都至少拥有两台车。

        这些车都是澳洲的二手车，虽然有点残旧，但胜在价格廉宜，在岛内驾驶，问题不大。至于喜欢户外活动的华人，则必备一台四轮驱动车，方便开进丛林游山玩水。

        有人形容这是退休的好地方，也有人认为这里不适合退休生活，因为除了工作，就什么都没有。唯有长居于此的华人才明白，什么留住了他们的脚步。或去或留，他们早已心里有数。

* *圣诞岛盛产“山虾”（即椰子蟹），在岛上出世的孩子被称为“山虾仔”或“山虾妹”，老一代的移民则被称为“老山虾”，用来形容他们像山虾一样长居该岛。另外，山虾具有往后退的特性，比喻华人待久了，行为思想退化。*
* 圣诞岛社区学校，集学前预备班、小学及中学于一身，目前共有160名学生，其中华人子弟约占65%。一直以来，该校只提供初中课程，学生念完初中，必须到澳洲升学，或者转到岛上的技术学校就读；直到2002年，该校增设高中班，华人子弟可以在当地念完高中，才到澳洲升学。
* 学校按照澳洲教育体制教学，以英文为主，校舍面积虽小，但设施完善。由于华人学生众多，中文被列为外语，每星期共有两节课。
* 学习时间有限，成效不大，因此华人子弟大多只能掌握简单的中文字。相对来说，他们更重视到澳洲留学。“孩子以后步入社会，不懂中文，影响不大。”谢水玉在家和孩子以福建话沟通，认为孩子不懂得写中文没关系，会说就足够了，这也道出许多华人父母的心声。
* 即使孩子没受过中文教育，不少华人仍坚持在家中以华语沟通，和朋友交谈则以粤语或福建话为主。这里犹如马来西亚小镇的缩影，各种籍贯的人齐聚一堂，华语、福建话、客家话、粤语、潮州话不时会在耳际响起，既亲切又温馨。
* 为了方便孩子到澳洲留学，华人一般会在澳洲置产，母亲则充当陪读，同时替孩子打点家务。随着妻子及孩子离开，圣诞岛上也就出现许多“单身爸爸”。
* 这些“单身爸爸”留在岛上工作挣钱养家，为了孩子的前途，和妻子、孩子聚少离多，饱受思念之苦也在所不惜。一家团聚，必须等孩子放假或父亲请假，他们协议每半年往返澳洲或圣诞岛一次，为维系感情作出努力。
* 天底下也唯有父母亲，会无怨无悔为孩子奉献及牺牲。思念的煎熬化成前进的动力，苦尽甘来或许是华人所期盼的吧！
* 圣诞岛华人对维护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可说尽心尽力。岛上十多家庙宇被打理得井然有序，华人传统节日深获重视。
* 春节是华人最重视的节日，而澳洲政府也把春节列为圣诞岛的公共假期，岛民可享有两天假期。另外，该岛也配合春节推出生肖邮票，那一枚枚精致的邮票，除了说明春节的由来，也显示华人地位受到重视。
* 春节期间，华人有的回家乡团圆，有的留在当地。每逢除夕夜，华人吃过团圆饭后，都会到庙宇供奉神明，祈求家人平安，度过丰衣足食的一年。大年初一，舞狮团队到每家每户拜年，锣鼓喧天，一片喜气洋洋。社团也会在这天举行大团拜，华人互相拜年。
* 清明节及中元节也是岛上非常热闹的节日。华人一般会在社团负责人的带领下到先祖的坟墓祭拜。华人公墓有两个，一个位于大路旁，另一个则在深山，必须穿过崎岖险峻的羊肠小道。
* 位于深山的公墓原是一个乱葬岗，早期华人患上脚气病去世，为了避免病菌传染，都被埋葬在这里。由于没有确切的死亡人数及名字，华人公馆在该处立下逾百个墓碑，碑上刻有“圣诞岛开埠先辈之坟”的字样，除了纪念先辈的贡献，也希望先辈安息。
* 中元节也称为“鬼节”，华人公馆每年都会举行中元法会，从外地邀请道士来诵经，普渡往生的先辈。长长的桌子摆满祭品，焚烧一袋又一袋的冥纸，拜祭仪式从下午进行至晚上，几乎全岛的华人都会出席观看这一年一度的盛事。
* 至于其他的节日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及冬至，华人也不会忽略。应节的食品及礼俗，华人都依照家乡的传统，有时甚至保留得比家乡更完整。
* 华人的宗教信仰非常多元，有民间信仰、天主教及基督教等。其中民间信仰者占多数，他们家中摆放着供奉神明、祖先的桌子，门外设有神龛；早晚上香，祈求神明保佑，农历初一、十五则到庙宇上香。
* 圣诞岛面积不大，可是庙宇数量之多，叫人大开眼界。全岛共有13座庙宇，据说都是先辈搭建的。在那个物资不充裕的年代，先辈使用仅有的材料，盖了一间又一间的庙宇，虽然简陋，但至少让精神有个寄托。
* 每间庙宇都有一个管理委员会，负责策划每年的节日庆典，并且定期清理庙宇。庙宇庆典是岛上的一大盛事，华人都出钱出力。而香火最盛的庙宇首推位于八厂的顺天宫，该庙历史悠久，立在偏远的车头仔，背山面海，环境优美，华人不辞劳苦，周末或农历初一、十五都会开车到来上香。
* 民间信仰略带迷信色彩，但作为华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如何保留和传承下去显得更为重要
* 华人人数虽然不多，华人社团却有好几个，包括妇女协会、华人公馆及半山公馆。各个社团形象鲜明，各司其职。妇女协会由各大种族组成，重点放在慈善及妇女福利上；华人公馆则着重文化传统的保留，带动华人参与节庆；半山公馆则以娱乐为主，会所设有赌桌，供人们消遣之用。
* 有趣的是，也许是人口少的缘故，一人分饰多角在华人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事。
* 华人公馆是最早成立的社团，前身是业余阅报社，早在1940年代之前就已创办，目的是让华人有个可以阅读报章、杂志及下棋的地方，以杜绝当时猖獗的赌风。
* 在那资讯落后的时代，书信都通过华人公馆传送，而华人也全赖家书，才得以了解故乡亲友的消息，即使是片言只语，也倍觉温馨。
* “前辈传承下来的活动，会依样进行下去，群众发起的活动则会尽量配合。”曾担任13年公馆主席的王益瑞如是说道。
* 随着时代的变迁，华人公馆不再局限于让华人读书写信。为了加强华社的凝聚力，它和半山公馆达成共识，每年轮流举办或联办活动，以免出现活动重叠、资源耗损或抢会员的状况。
* 半山公馆于1970年代成立，其前身是亚洲人公馆。位于半山区的会所里头，摆放着许多赌具，下午供打麻将，晚上8点后则有赌局。不少华人抱着小赌怡情的心态玩牌九，也有人纯粹到来凑凑热闹，在旁围观。
* 成立于1989年的妇女协会可算是目前最活跃的社团组织，也是一个集合3大种族的组织。这个社团成立前，本来是学习中心，教导妇女语言、烹饪技巧，久而久之，人数增多，资金充裕，就形成了社团，宗旨是为了维护妇女权益及开扩妇女的社交圈子。
* 早期，部分华人沉迷赌博，家暴案件特别多，妇女协会介入调解，把妇女从家暴中拯救出来。“社团工作吃力不讨好，为了社群，会员努力地做出成绩，才令人刮目相看。”该会主席表示，在协助妇女的过程中，曾受到男性的指摘，但她们始终不言弃，坚持到底。
* 妇女协会也经常举办慈善活动，募款捐助天灾的受害者。2009年初，澳洲维多利亚森林发生大火，该会通过义卖会筹款，获得各种族的热烈回响，其号召力可见一斑。
* 华人对参政也相当热衷，在9名市议员当中，华人就占了6名，足见华人的影响力。4年一次的选举，华人总是踊跃地出席投票，以履行公民的责任。
* “市议员就是市政府的左右手，负责审核商业执照、投资申请，以及规划圣诞岛的发展计划。”市议员李国民是岛民选出来的代表，每个月都会出席会议探讨各项计划。
* 当地有个国营的民众广播电台，每周安排两个中文时段，主要播放中文金曲及岛上的活动讯息。周六有“晨光选曲”，从上午8点播放至11点半，周日则是“与你同在”。两位主持人都属义务服务，分文未收。
* 在简陋的播音室里，主持人从选曲、主持、播报新闻，都一手包办，听众偶尔也会叩应点唱。这里没有现代化的数码选曲，主持人只好手动转换唱片。收音机传来一首首悠扬的粤语、华语及福建金曲，而忠实听众则在缅怀过去的美好时光。
* 此外，圣诞岛每月推出一份《岛民简讯》，薄薄的一份册子，概括了岛上的活动通告、广告、电视预告及巴士时间表等资讯。顾及岛民的多元化，内容同时以英文、华文及马来文3种语文来呈现。
* 华人赤手空拳到来，一步一脚印，努力打拼，换来了今天的成果。这里没有奢华的生活，反而突显出平淡中的那份踏实感。
* 留下或离开的念头都曾掠过华人的脑海，要不移居澳洲和家人团聚，要不落叶归根回到故乡，要不留下来做个无忧无虑的快活人。只是一切都还没定夺，华人沉浸在静谧的氛围中，继续展开精彩的人生旅程。

 蒙古

蒙古是中国北方的邻居，这里的人以放牧为生，以草原为家，蒙古曾经是中国最亲密的兄弟，也曾经是中国最顽强的宿敌。

        元朝时蒙古族曾统治过中国，但于明初失去政权退回塞外。清朝时，蒙古各部逐渐成为清朝的臣属，不过，漠南（即今内蒙古）跟中国关系较密切，而漠北（即喀尔喀蒙古，或称外蒙古），则和清朝关系较疏远。1945年，中华民国曾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蒙古通过公投决定独立。不过，1949年民国政府在联合国通过《控苏案》，再次表明不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49年10月16日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1992年，蒙古推行多党制，实行议会制，国名改称为蒙古国。

        7、8月是蒙古美丽而短暂的夏季，到了9月，蒙古开始飘雪，进入漫长寒冬，温度达摄氏零下40多度，常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5度。在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影响下，畜牧业一直是蒙古的经济基础。不过，蒙古辽阔的大地之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自从9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矿业成了蒙古主要经济来源，也吸引了大批华商涌入蒙古采矿。

        蒙古地广人稀，国土面积156万6500平方公里，却只有区区260万人口，首都为乌兰巴托。在1956年蒙古人口普查时，华裔占了总人口的1.9%，而美国于1987年的报告则推测华裔人口占了2%，即约4万人。来自《中国侨网》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在蒙工作的华人超过万人，多在建筑领域。

    中国与蒙古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渊源。早在公元544年，蒙古先民室韦就曾经遣使东魏。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使蒙汉两族的命运从此交织在一起。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之下，蒙古族建立了庞大的帝国。1279年，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全军覆没，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全面统治中国，一直到了1368年，才被明朝所取代。

        因为戈壁沙漠以北的外蒙古并不适合农耕，所以早期很少华人移居到外蒙古。到了1725年，清政府勒令汉族农夫到蒙古种地囤粮，以协助清军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此后，外蒙古的鄂尔浑（Orkhon）、土拉河盆地以及科布多（Khovd）等地才出现了汉族的聚落。然而，在清代到蒙古去做生意的华商却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些华商大部分都集中在库仑（即今日的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他们长期在中蒙两地间频繁奔走，有者还娶了蒙古女子为妻。

        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于1921年宣布独立，蒙古境内的上万华人成了排华行动的受害者。

        之后，随着蒙古的局势逐渐稳定，开始有一些华人农民、商人以及手工业者再次进入独立后的蒙古谋生。这段时期过来的移民以河北人和山西人为主。与此同时，苏联的势力操纵着蒙古政局，蒙古开始了俄化的过程。

在1950年代，蒙古迎来了另一波华人移居热潮。那时，中国政府为支援蒙古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征召数万工人到蒙古去协助基建工作。这一些工人大部分来自靠近蒙古的阳原县，他们携妻带子定居于蒙古。

        从1957到1959年，是蒙古最多华人移民的一段时期。这时的华人人数多达8000人，他们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名为“一百户”的地方。

        1960年代，中苏关系宣告破裂，而以苏联马首是瞻的蒙古，与中国的关系也日趋恶化。当时的蒙古人对华人大多抱以仇视的态度，导致华工纷纷逃离蒙古。

        上世纪的50年代之前，多数蒙古华人是手工业者，如木工、裁缝、鞋匠、钟表修理师或银匠等，此外，也有商人、司机或工人等。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情况有所改变，大多数华人从事建筑装修业，一部分人则仍旧从事裁缝、种植蔬菜、司机、木匠等行业。

        1983年，蒙古再度发生了严重的排华事件，当时的蒙古政府指华人为社会寄生虫，于是大规模地驱逐华人，并不允许华人住在乌兰巴托，还计划在偏僻山区建立一个农村，将华人都安置到那里去。华人过去考察之后，发现那里环境太差，根本就不适宜居住，便大举迁回中国。

        今天在蒙古境内的老华人，就是那些当年留下来的华人及其后代。排华浪潮过去之后，蒙古政府没有再坚持要华人迁离，于是他们就一直留在乌兰巴托。其间，虽然蒙古政府不断积极地游说这些华人归化蒙古，但他们大部分还是坚持保留中国国籍。

        中蒙关系在1987年开始逐步恢复正常，加上数年后蒙古又实行改革，华人社会也逐渐恢复活力。华人成为中蒙经贸往来的重要媒介，处境自然也获得显著的改善。在90年代，这里的老华人开始开公司、办企业，经济实力已经大为提高。

甘登寺的清朝古鼎，见证了中蒙悠久的历史关系        中蒙两国陆地边界线长达4700多公里，两国人民皆可轻易进入对方国境。近年来，随着蒙古改革开放，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蒙古的华人，多得难以统计。根据《蒙古消息报》2008年的官方资料，蒙古有1819名侨民及3万2272名临时居留外国人。而这当中，高达90%是中国公民。

        华人大部分集中于乌兰巴托，还有部分华人散居在达尔汗（Darhan）、额尔登特（Erdenet）等地。这些华人中，70%祖籍为河北省阳原、怀安、万全等县和张家口市，其余则来自山西、内蒙古和山东等省份。

        蒙古共有两个华人社团。由老华侨组成的旅蒙古国华侨协会，是蒙古最活跃的华人社团。另一个则是2002年由华商成立的中华总商会，会员多是新移民。此外，蒙古也有一所旅蒙华侨子弟学校，提供小学至中学完整的课程，并受到当地政府承认。

        蒙古广袤无垠的大草原，给了无数华人辽阔而美丽的想象。可是，抱着这种美丽的梦想到蒙古的华人，恐怕飞机尚未着陆，幻想已先破灭。当飞机进入乌兰巴托上空时，乘客往下看，都看不见城市，因为整个乌兰巴托，已经淹没在层层烟霾废气之下。

        这也预示了华商们在蒙古的境况——前景难测，却也充满机遇与变数。

        从机场到市中心，道路坑坑洞洞，触目尽是简陋的房子与蒙古包。冬天时，从工厂到蒙古包，都冒着烧煤产生的黑烟，这便是空气严重污染的原因。

        蒙古基础建设很差，经常断水断电。市中心多座雄伟的俄式建筑，多已老旧失修。市内道路缺少修缮，而且到处塞车。虽然破车旧车不少，但豪华车子也很多，而且有的驾驶座在左边，有的驾驶座在右边，颇为奇特。这些景象，充分说明了蒙古社会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化，改革开放造就了新兴的富豪，但整个国家仍有36.1%的人生活在贫穷线下，贫富悬殊。这里一切百废待兴，欠缺严谨的市场规划与法律规范，于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犹如剽悍的垦荒者，来此赌一把运气。

        蒙古商机蓬勃吸引来的华商高达四五千人。这些新移民挟着雄厚的资本而来，在蒙古的经济发展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资料显示，蒙古的中资企业有700多家，投资额占外企在蒙投资总额的一半。

        其中，建筑业是华商在蒙古最耀眼的行业。蒙古经济近年突飞猛进，对建筑的需求大增，乌兰巴托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是建造中的民房与商业区。一般估计，蒙古几乎80%以上的房子都是中国人盖的。由于中蒙地理靠近，劳务输出方便，因此，不管投资方是否是中国，到最后施工的总是中国人多。他们生活在工地上，极少机会到外头走动，所以走在街上，很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曾经，畜牧与成衣业等是在蒙华人热衷投资的项目。近年，随着蒙古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华商转而关注房地产、矿业与石油开采这些大项目。矿业是个一本万利的行业，不少华商在此掘到宝藏而暴富。可是，花了上百万美元购买采矿证和探矿证却被骗得精光的案件，也时有所闻。

        “蒙古商场尔虞我诈。以前中国人欺骗蒙古人，后来蒙古人也学精了，倒过来欺骗中国人。中国人更是欺骗中国人。”现代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马工说，“不过现在情况比较改善了，慢慢有了规范。”

        “蒙古很像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不确定因素很多，办事效率也让人很头痛。”在蒙从事采矿与房地产已经3年的中国商人王孟泳说。因为国内市场饱和，又听朋友说蒙古矿业有发展潜力，他到蒙古考察了半年，并用几百万美元买下采矿权。矿业取得成功后，他又进军房地产。政策稳定是华商主要的忧虑，王氏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蒙古政策有变化。中蒙关系如果发生变化，对我们这些华商影响很大。”

        纵横在蒙古这片土地上，过人的胆识、有力的人脉、灵活的手腕，缺一不可。

        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在蒙古打拼，来自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也在蒙古发展的黄金时期前来分一杯羹。在蒙古登记的台资企业有40余家，不过，仍在运作的其实只有十余家，长期在蒙古生活的台湾人约30多名。

        为了更好地协助台商在蒙古进行投资，鼓励台蒙双边贸易，“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在乌兰巴托成立了乌兰巴托台湾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台贸）。台贸现任主任为古裕梁。古主任指出，2005年以前到蒙古投资的台商多是卫星电视、电脑买卖、纺织品生产等中小型企业。可是，由于纺织品配额取消，在蒙古设纺织厂已经失去优势，于是台商纷纷将生意转向大陆。2007年后，开始有台商在蒙古做房地产与采矿等大型投资，台蒙双边贸易近来突飞猛进。

        另外，蒙古也有约15名新加坡华人。新加坡大专学府莱佛士大学（Raffles University）和著名的虎牌啤酒公司（Tiger Beer）都在蒙古取得不俗的成绩。莱佛士大学蒙古分校于2004年成立。刚开始时，学院只有100名左右的学生。短短数年间，学生已增加到300多名，英语部更有200多名学生。目前，学院共有9名讲师，其中3名是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莱佛士大学把在新加坡办学的成功经验完全移植到蒙古，令蒙古多了一所现代化与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学府。

        蒙古人好酒，新加坡著名的虎牌啤酒很早以前就进军蒙古，并且销量颇佳。有鉴于此，新加坡总公司决定在蒙古设厂，以确保在蒙古销售的啤酒更新鲜，还可节省运输费、2006年6月，虎牌啤酒动工建厂，隔年正式投入生产。目前该公司共有两名新加坡籍和一名马来西亚籍华人职员，其他职员全是蒙古人。

        20世纪50年代，蒙古的华人移民人数达到高峰。他们在蒙古繁衍生息，如今已到第三代，约有2000多名。这批人与他们的后代，被统称为老华侨。

        当年，第一代华人赤手空拳到蒙古讨生活，经历亲华与排华两个时期，在两国的恩怨夹缝中求存，并寻求继续保存自身文化与身份，却又能融入主流社会的方式。凭着勤奋踏实的民族特性，几经艰辛，他们的生活逐渐安稳下来。尽管收入比起当年已经大为提高，这些老移民仍然不住豪宅，因为他们深明树大招风的道理，尤其在蒙古如此局势不稳的国家。

        一些精明能干、洞悉先机的老移民，已经借着蒙古经济开放的浪潮先富起来。现任旅蒙华侨协会会长白双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胆大心细，在蒙古还未掀起掘矿热潮之前，就看准了一块宝地，向蒙古政府买下采矿权，掘出金矿。此外，他也开设肠衣厂，生产羊肠制成的手术线及香肠，充分利用了蒙古丰富的羊资源。

        随着中国在蒙古经济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老移民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桥梁优势。他们有丰富的当地人脉资源，对蒙古文化了如指掌，更没有语言障碍，在商场上无往不利。有了他们牵线搭桥，中国公司到蒙古投资利得多。许多年轻一代也开始自己做起中蒙贸易，或是在中国公司当翻译。

        这些老移民对中国感情深厚，坚持不加入蒙古籍。中蒙关系不好时，蒙古政府曾找过侨界领袖，希望他们鼓励侨民加入蒙籍，但愿意入籍的华人少之又少。不过，一些老移民自小在蒙古长大，对蒙古同样充满感情。“我出国时想念的是蒙古。想蒙古的亲友、饭菜。我也习惯吃牛羊肉，不吃蔬菜了，到了中国，还要回过头来想念蒙古的饭菜。”在襁褓时期就随父母到蒙古的白双占笑说。

        比起父母，年轻一辈的华人更加认同蒙古。白会长坦承，许多蒙古年轻华人，到中国只是办公事，办完了就回蒙古，对中国感情没那么深。在蒙古，年龄层介于20至30岁的华人青年约有五六百人。和蒙古青年一样，华人青年大多早婚，18、19岁就结婚生子的大有人在。华人青年虽然和蒙古青年感情很好，却很少和蒙族通婚，结婚对象一般还是选择华人，近来也有一些华人到中国寻找配偶，华人青年白庆坤表示：“那是因为华人和蒙古人风俗、习性、生活理念等都不一样。我们从小看到许多和蒙古人通婚的长辈都离婚，妻离子散，因此引以为鉴。另外，我们父母也不会赞成。“

        老移民一般都认为，他们这个独特的社群还是会维持下去，不会被同化。“没必要完全变成蒙古人。我们现在更占优势，蒙古和中国两边通吃。”老移民们说。

        老移民在1950年就成立了一个旅蒙华侨协会，其会员主要是长期居留在蒙古，但仍持有中国护照的华人。会长白双占表示，他们几代人之间都互相认识，只要是蒙古华人，就自动是旅蒙华侨协会的会员。

        多年来，旅蒙华侨协会积极投入公益事业，发展华文教育，并负起沟通华人与中国驻蒙使馆，以及向当地政府传达华人心声与建议的责任。每当中国国庆、春节等节日，协会都会搞活动庆祝，夏天时也会组织郊游团，让大家联络感情。一些老弱病残的华人生活有困难时，协会也会伸出援手。

        许多海外华人社团都面临领导层青黄不接的窘境。可是，旅蒙华侨协会却一直积极培育下一代继承者。一年前，协会正式成立了青年会，让35岁以下的华人青年加入。

        另一个较为活跃，亦较有规模的华人社团当属中华总商会。商会于2002年成立，会长为张春山。中华总商会共有100多名会员，主要来自企业界。

        中文媒体方面，蒙古仅有一份华文报刊《蒙古消息报》。该报的前身是蒙古工会出版的《工人之路》。1964年，蒙古通讯社接管该报，并更名为《蒙古消息报》。《蒙古消息报》是蒙古政府机关对外宣传的工具，除了宣传国家政策，也把新闻焦点放在中蒙两国的互动上。除了中文版，蒙通社属下还有英、俄、日几个外文版本。

        《蒙古消息报》一周出版一期，每份400蒙图，一年订阅费2万800蒙图。目前，该报发行量为1500份，订户主要是中资企业以及学习汉语的蒙古人。此外，该报也有少量海外订户，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内蒙、台湾、香港，都是在蒙古有生意的华人。不过，当地华人很少阅读《蒙古消息报》，许多华人甚至不知道这份报纸的存在。

        该报报社共有5名职员。现任社长密·娜仁扎雅年方30，毕业自蒙古国立大学中文系。其余职员，包括一名责任编辑、两名翻译及一名排版设计也全是蒙古人。社长娜仁扎雅透露，蒙通社未来会为《蒙古消息报》建立网站，内容全面上网，不过上网阅读须缴费。

     真正在蒙古生活、定居的华人，只有区区2000多人。这2000多名华人，传承中华文化与中文教育的决心却坚如磐石。

        1950年代，蒙古有一所华校——培才学校。当时，中国大力支援蒙古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两国关系空前友好。中国送来大批华工协助从事铁路、公路等基建。为了让中国工人的孩子有个念书的地方，中国援建了培才学校。该校建设规模在当时可谓数一数二。学校共有5座大楼，宿舍、体育馆、教学楼、食堂、礼堂一应俱全，体育馆还是当时蒙古最豪华的体育馆。后来，中蒙关系转恶，培才学校于1973年被蒙古政府收回，现在成了蒙古国立大学经济系的大楼。

        相比之下，旅蒙华侨子弟学校当初的处境要艰苦得多。该校创办于1955年，赵廷源为第一任校长，现为蒙古唯一的华校。当时，该校学生全挤在一所四合院上课。在蒙古漫长的酷寒冬天里，学生必须带煤带柴到学校来生火上课。直到2001年，在国侨办、中国驻蒙使馆、香港浸信会联会、侨协等单位的援助下，才建成了一所1440平方公尺的新校舍。旧校舍后来成了旅蒙华侨协会的会所。

        1998年，江仙梅出任校长后，大刀阔斧改革华侨子弟学校。首先，因蒙古90年代初掀起汉语热，学校广收蒙族学生，招生不再局限于华人子弟，江仙梅乃将学校改名为旅蒙华侨友谊学校。

        另外，在此以前，华人子弟就读的学校没有向政府注册，学生毕业后，文凭得不到政府承认。江仙梅认为华人要融入当地社会，必须要精通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文化，因此把学校改为双语制。改制后的课程完全按照蒙古政府的要求，并以蒙文为教学媒介语，但每周仍有11至15节中文课。

        友谊学校的毕业生可分别获得蒙古与中国都承认的毕业证，出路更广。许多华人子弟毕业后选择到中国留学，有的学生还进入北大、复旦等名校，成绩骄人。至于蒙古学生则多数选择在蒙古念大学。

        友谊学校分全日制和周末班。全日制提供由小学至中学的完整教育课程。周末班则让在蒙古学校念书的学生上汉语课。目前全日制学生共有504人，周末班学生则有114人。有趣的是，友谊学校发展到今天，华人子弟只占全日制学生的10%，就连周末班也仅有半数是华人子弟，余者皆是蒙古学生。当地约有一半的华人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或蒙古学校，        另一半则把孩子送到友谊学校。送孩子到蒙古学校念书的家长，一般都把孩子送到周末班学汉语。

        蒙族学生的父母，许多都跟中国人有生意往来，知道中文的重要性，才把孩子送来。蒙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会对中国产生感情。不难预见，这些学子将成为蒙族与华人友谊的桥梁。

        友谊学校的学费每年50万蒙图，在当地收费较高。可是，学校不获任何补贴，经费全由自己承担，学生缴交的学费，仅够付教师薪水及应付各项杂费。友谊学校还面临校舍不足的问题。因为课室不够，学生必须分为上、下午部，每年还得拒收30至50名学生。不过，江仙梅校长表示，华人学生一定优先录取。

        盖一座体育馆，成了江校长的心愿。“体育馆除了上体育课，还能办活动，如节庆、周会等。每次学校办活动，都因为地方太小，必须把学生分成几组。”江校长无奈表示。

        “我热爱中华文化，坚持办华文教育。我虽然没在中国受教育，但能说这样的汉语，已经该满足了，我会尽自己的绵力，给下一代创造机会。”江校长短短的几句话，说出了许多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的心声。

      台湾儿童暨家庭协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家扶）隶属国际性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家扶联盟。蒙古是目前台湾家扶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直接服务当地社区的国家。

        家扶基金会蒙古分事务所代表李桂平介绍，家扶中心2004年在蒙古成立，共有22名工作人员，4名是台湾人，其余都是蒙古人。“在家扶工作的这些台湾人，都是志愿过来的。他们来到这块发展落后的地方，不是为了钱，可说全是为了一股热忱。”他说。

        家扶有两大工作，其中之一是社区工作，包括设立饮水器，让蒙古贫民有干净的水喝。他们也出资协助蒙古建立幼稚园，虽然家扶不参与直接管理，但却规定幼稚园只能录取贫穷儿童。此外，他们还建立了家扶村。村里有25个蒙古包，约100人左右，村民多是单亲妈妈。家扶给他们提供技能培训，等他们能自立后，鼓励他们向政府申请土地，并送他们蒙古包，让他们自力生。

        此外，家扶也进行经济扶助工作，每个月发放5000蒙图给贫童。约有4000多名儿童在这项计划下受惠。本来蒙古人对这些远道而来“到处派钱”的台湾人心存怀疑，可是，在家扶中心的努力下，他们疑虑渐消，相信这个公益团体，确实是真心扶助蒙古贫民的。

      蒙古对华人的政策随着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时有变化。蒙汉两族关系时好时坏，移居蒙古的华人，在历史的巨轮下颠簸前进，身不由己，唯有小心翼翼地活着。

         到了二十一世纪，蒙古华人的处境渐露曙光。虽然华、蒙两族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改进，可是，随着社会的开放与发展，中蒙两国经贸上的合作，必定越来越密切。蒙古华人期望，偏见与仇恨，将如蒙古严冬的积雪，在夏天初升的旭日下，慢慢消融。

 尼泊尔

这个位于南亚的高原小国，境内岗峦起伏，地势错落，耸立着8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巍峨高峰，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蜿蜒在尼泊尔和中国两国的边界上。

         作为古代亚洲主要的交通枢纽，它是商旅、香客们往来印度和中国的必经之路。今天，中、印文化仍深深地浸透着这块充满灵气的神秘土地。

         尼泊尔以农业为主，工商业发展缓慢而落后，属于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列。20世纪90年代，尼泊尔开始实行“自由、开放和出口型”经济政策，以吸引外资。然而，政局动荡、基础设施简陋，收到的效果却差强人意。

         目前，尼泊尔正积极推动旅游业，寄望那天赋的清奇胜景、幽古的人文气韵，再加上世界第一高峰的魅力，能招徕世界各地寻幽探胜的旅客，一同沉醉在古国的魅力之中。

 尼泊尔与中国号称千年友邦。尼泊尔的学者称，自6世纪以来，西藏便已是尼泊尔人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对象，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也极受重视。早在盛唐时期，两国之间的往来十分频繁，当时，尼泊尔的赤真公主千里迢迢地来到西藏和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唐玄奘西行求法时，也曾经遍访尼泊尔各地，包括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之地兰毗尼。

         到了元朝时期，尼泊尔著名的建筑艺术家阿尼哥远赴元朝的都城大都，监造北京白塔寺，这不只让他官运亨通，而且还名留青史。

         200多年以前，尼泊尔王国成立首个外交部门，主要任务便是处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尼泊尔也成了唯一在西藏的拉萨设有总领事馆的国家。

         1955年8月1日，中国与尼泊尔正式建交，使这一段源远流长的友谊更上一层楼。作为友好邻邦，从1965年开始，中国向尼泊尔提供了多次的无偿援助，且承担尼泊尔数十个发展计划的建设。中国的物资援助包括了卡车、无轨电车、粮食以及食盐等，这些慷慨义举，深入每一个尼泊尔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尼泊尔，那曾经举办不少大型国际会议的比兰德拉国际会议中心、农民浇灌庄稼的灌溉系统，以及加德满都最为重要的环城公路，都是在中国的援助之下营建起来的。

         长期以来，华人陆续到尼泊尔来投资，当中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特别多。他们终日奔波于中尼两国之间，但是真正定居于尼泊尔的华人其实并不多。

         尼共总书记尼帕尔就曾经指出：“长久以来，尼泊尔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都是深刻、全方位并且扎根在人民心里的密切关系。”在当地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而中国人则是最受欢迎的朋友。

         今后，尼、中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仍然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尼泊尔十分欢迎中国的商家们到这里来创建合资企业，让双方继续携手走向美好的明天。

   据官方统计，尼泊尔的华人有5万名左右。其中有九成多是持难民身份的藏族人。扣除了使馆和中资公司人员后，真正在尼泊尔生活的汉族华人只有1000名左右。他们主要来自青海、山西及四川等内陆省份，大多聚居在加德满都、博卡拉（Pokhara）这两个城市。

         当地华人主要从事贸易、餐饮、旅游、服装、中医、食品加工及建筑等行业，其中也包括那些在尼泊尔服务的华语教师、医师。跟当地人相比，华人的生活水平较高。

         在华人眼里，尼泊尔就像一颗未经雕琢的蓝宝石，有无穷的价值蕴藏其中。许多华人来此有一个明确的动机，就是挣钱，因此他们大半持商业签证逗留下来。经商之外，有些华人也在尼泊尔找到了另一半，于是在此安下了家，孩子也就在中尼文化的熏陶下长大。

         目前，仍处在发展阶段的尼泊尔华人，除了在经济领域小有成就外，其他方面的发展仍一片空白，在当地未成气候。不过，随着中、尼交往日益密切，来投资的华商越来越多，华人在尼泊尔的发展潜力令人瞩目。

   有部分华人，将尼泊尔视为进驻印度的一个驿站，在当地市场仅作牛刀小试，刺探行情而已。然而，有些华人却将尼泊尔当作生意基地。他们多数以进出口贸易开启尼泊尔的创业生涯。他们奔波往返于中、尼之间，在当地考察市场、经营生意。这个可能令他们发达的地方，却一般不会成为他们的家。个个华商心底抱定的想法是：生意能做就做下去，做不下去就卷铺盖走人，另谋出路。

         他们大多来自四川，在西藏樟木往往拥有稳定的家族生意。家人负责在樟木口岸把关，他们则到尼泊尔开发新市场。尼泊尔人谈不上富裕，但购买能力不错，渐渐地，也就留住了华商们的脚步。

         中国80年代开放初期，不少商人将中国的食品、杂货及电器等引进尼泊尔。近年来，竞争开始激烈，生意也越发难做了。许多与华人合作的尼泊尔人，在多次随同华人到中国去办货之后，自己也摸熟了贸易的门路，转而成为华商强劲的竞争对手。

         在尼泊尔耕耘多年，华商已成功开拓了庞大市场，中国电器如“美的”、“康佳”等品牌在尼泊尔非常红火，连当地人所吃的苹果、骑的摩托车等，都基本来自中国。近来，加德满都还开设了“中国商品城”这个大型的综合购物中心，占地一万多平方公尺。架上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大半源自中国。

         在当地，餐饮业是华人发展得最蓬勃的行业，入行的门槛也最低。随着尼泊尔的华人游客和投资华商逐年增加，无形中刺激了中餐的勃兴。其中，加德满都的金牛餐馆营业超过十年，吸引了无数中国使馆及中资公司的人员。如今，华人的中餐馆已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加德满都、博卡拉的大街小巷。

         讲究效率的华人老板，遇上了尼泊尔人这群慢郎中，往往叹息不已。大部分老板不是亲自掌厨，就是从中国招聘主厨。一名华人厨师洗、切、煮、炒都一手包办，20人的饭菜，半个小时便能利落上桌。若换作是尼泊尔厨子，客人可能要第二天才能用餐。

         随便翻开一本旅游手册，对尼泊尔总是满纸的赞叹，字里行间尽是迷人的描绘。然而，悠闲旅客的短暂陶醉，跟华商长期落脚当地所尝尽的滋味儿，完全是两码事。

         加德满都是尼泊尔华人最多的地方。十年前到达的前辈感叹，当时的加德满都悠闲从容、人口适中，是一个美丽的都市；今天，这里人口飚升了十倍，但基础建设却没有随之改善，结果它成了一个拥挤、脏乱的城市。

         尼泊尔并没有特定的华人住宅区，他们大多租赁当地人的房子，住在斑驳的木板、黯淡的石灰搭建成的房子里，屋内设施陈旧而简陋。一些经营旅馆、餐厅的华人，干脆就住在店里；经济较好的，则住在尼泊尔的高级住宅区里，错落有致的小洋房，精致而美观。

         生活在当地的华人，常常会受到种种困扰。这些困扰，渗透在生活小事当中，譬如洗澡。尼泊尔天气寒冷，有时达到零度以下。尼泊尔人可以咬咬牙，往身上浇淋冷水，或每星期只洗一次，但华人无法完全仿效，每当想洗个热水澡时，往往要大费周章。由于尼泊尔的热水供应器多用太阳能，如果当天不见太阳，家里也就只有冷水。虽有电热水炉备用，但因供电不稳定而经常无用武之地。

         提到尼泊尔严重的停电问题，当地华人往往大摇其头，心中万分无奈。他们对于当地的停电时间表，要比九九乘法表还要熟悉，否则生活作息必定大乱。除了停电，旱季还有停水的苦恼在等着他们，连用水也得小心翼翼，惜水如金。

         近几年，动荡的政局也扯痛了华人的神经，常有华人向驻尼中国大使馆求救。尽管外国人都不易在当地的动乱中成为代罪羔羊，但由此而来的担惊受怕，却是免不了的。此外，频频发生的罢工事件，也给华人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生活烦扰一言难尽。

         最显著的问题，就是罢工经常影响能源供应。加德满都及一些周边城市，常常一夜之间陷入燃料荒。汽油、柴油、煤气一下子都没了，路边停满了因缺油而瘫痪的车子，抢购燃油的人潮触目惊心。华人为了购买燃料，往往通宵大排长龙。经营餐馆的，煤气不可缺少，可怜的老板无计可施，只好将钞票大把地抛向黑市换取煤气供应，忍痛撑持着。

         然而，当地人友善、相敬如宾的态度，多少抚慰了华人于异域中的惶惑，烘暖了他们在忧患中受寒的心。

华人和尼泊尔人之间，虽无法完全跨过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然而一旦生活在一起，却总是守望相助、和睦共处。尼泊尔人的性情中，最令华人欣赏的就是温和及耐性，当地极少看到争吵、打架的场面。因此，尼泊尔政局虽然动荡不安，但社会治安却并不很混乱，华人终究还能拥抱一片和煦的安然，用心地生活。

         在这印度教盛行的国家，日常生活中有着形形色的宗教活动。华人的宗教观念虽然很淡，但好奇心却很浓。因此，初来乍到的华人，对于当地人友好的邀约，总是来者不拒。于是，他们不是天天忙着出席尼泊尔人的婚礼、宗教庆典，就是走访于尼泊尔大大小小的印度庙宇之间。

         不过，居住时间长了，初来的兴奋之情，就渐渐化为司空见惯的平淡。平日下班后，华人没有什么休闲活动。在没有卡拉OK、电玩中心等休闲场所的尼泊尔，他们的夜生活除了聚餐，就几乎没有其他娱乐。在这里，即使周末、假日，华人也没多少地方可去。

         除了日常生活的平淡，尼泊尔的华人圈中，也缺乏让大家热闹起来的喜庆活动。幸好，加德满都还有一家赌场，让华人在闲暇时还能去小赌怡情一番。否则，就只能邀三五好友，到家中打打牌、搓搓麻将，大不了再聚聚餐、逛逛街，或到当地的风景区去走走看看，生活可谓平淡如开水。

         然而，如果遇上了华人、尼泊尔人通婚的婚宴场面，就一定特别热闹。华人亲友白天出席尼泊尔式传统婚礼，晚上则参加人数过百的中式婚宴，宾主同欢共醉，往往兴尽而返。至于白事，尼泊尔华人一旦去世，家人会将遗体火化，将骨灰存放在家里，只有简单的仪式，并不张扬。

         即使最重要的春节，尼泊尔华人也没有盛大隆重的庆典，只会在过年期间，和亲友聚餐，简单地庆祝一番，华人之间也会轮流请客。一名华人说，每逢春节，他们一家人从初一到初八，都忙碌地出席朋友们的聚餐和联谊。身在异乡，华人的友谊变得更加真挚、更加牢固。其他节庆则是悄然地溜过。

         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每逢春节及中国国庆节、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和聚餐会，让漂泊海外的华人同胞，可以相聚一刻，共享丰盛的中式大餐，欣赏充满中华气息的文娱表演，在异地携手迎春

         尼泊尔华人总是难得与家人团聚在一起。为了教育，许多父母必须和孩子们分隔两地。由于尼泊尔的教育理念与华人大相径庭，华人父母多将孩子送回中国读书，交给亲友看顾，夫妻俩则留在尼泊尔打拼。

         华人对教育态度务实，强调按部就班及效率，希望孩子毕业后，能练就一身看家本领。尼泊尔的教育方式却很随性，孩子学习过程充满乐趣，但未必能看到具体的成绩。

         尽管对尼泊尔的教育不放心，但华人却普遍认同，这里是个学习英语的理想环境。英语作为尼泊尔的官方语言，使得这里几乎人人都能以英语沟通，塑造了一个广泛使用英语的大环境。

         至于中尼通婚的家庭，则多让孩子留在尼泊尔学习。在尼泊尔学校里，学生主要学习尼泊尔语及英语，华语则在家靠父母或补习老师的指导。由于缺乏完善的中文学习环境，因此有许多中、尼混血儿，即使能操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却往往一个华文字也不识。

         目前，正规的中文教育，仍在尼泊尔等待发展的机会。2005年，第一批来自中国各师范大学的志愿教师不远千里而来，走进尼泊尔各大中、小学校去教导中文。这些志愿教师，在教学上面对不少考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中文课本的短缺。学生们只能一字一句地抄写老师所教的内容。上课时，师生们在黑板及作业本上，认认真真，一笔一画地抄写。

         除了在尼泊尔开展中文教学，志愿教师们也联合一些当地团体，筹办许多有趣的文化活动，如“中国节”、“中国语言文化日”等，促进中华文化的普及，意义非凡。他们希望能在尼泊尔掀起一股汉语热潮，为尼泊尔人打开一扇通向中华文化的大门。

         尽管在尼泊尔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不容易，但这群年轻的教师却不轻言放弃，有些还申请留任，继续奉献。他们被看作是华人和当地人之间的文化使者，在尼泊尔展开了不一样的人生。

有很多华人，一开始的想法都是挣够了钱，或在市场不景气时就马上走人。然而，尼泊尔也并非坏到呆不下去的程度，那些还过得去的华人，也就一年年的留了下来。只是，华商们始终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往往认定自己是尼泊尔的过客，总有一天是要回家去的。

         能改变华人“归根”初衷的，或许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在尼泊尔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归根”的定义，也就有所不同了。

         华人若在尼泊尔安了家，心也就在尼泊尔扎了根，从此不离不弃。

         由于种姓制度观念在尼泊尔社会牢不可破，因此中尼通婚不但罕见，也特别珍贵。目前，当地中尼通婚的例子虽然不多，但基本上家庭幸福、生活美满。这些通婚家庭，大部分都有了第二代，甚至已经三代同堂了。

         华人男子娶了尼泊尔太太后，多半都自组小家庭。在父亲的影响下，孩子往往对华人的文化、身份都有强烈的认同。然而，在生活习惯、语言方面，母亲的熏陶则有更重要的影响。

         尼泊尔语是孩子的母语，孩子从小就跟随母亲，参加当地的宗教庆典。耳濡目染之下，不少中尼混血儿尽管肤色、长相像极了华人，但言行举止、生活习惯和打扮等，却极像尼泊尔人。中华文化对他们来说，既亲切又陌生；可尼泊尔的一切，却是从小就融入了他们生活的每一天。

         不过，如果是华人妇女嫁给尼泊尔人当媳妇，情况就有所不同。尼泊尔家庭保守而传统，儿子要讨外籍媳妇，就仿若要闹家庭革命一般，是件伤筋动骨的大事。多年来，不少到中国留学的尼泊尔男子，虽与中国女同学谱出恋曲，但成功踏上红地毯的却不多。一般而言，只有那些教育程度较高的尼泊尔家庭，想法开通，较能用平常心去接纳华人媳妇。

         远嫁尼泊尔的华人妻子，几乎都要学习融入丈夫的家庭，与公婆同住。尼泊尔人家庭观念极强，即使结了婚，儿子们仍需与父母、兄弟姐妹同住一个屋檐下，十分热闹。于是，华人媳妇要面对的，往往就是这么一个一家老小济济一堂的大家庭。

         如果嫁到经济条件较优渥的尼泊尔家庭，华人媳妇就不需要为家务操心，家中自有佣人负责打理，且会为一家大小准备三餐。简单来说，华人媳妇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会如何与尼泊尔家人和睦相处，并快乐地生活在这个由尼泊尔文化主导的新家庭中。与此同时，举凡尼泊尔的大小宗教庆典、传统服饰及食物等，新成员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融入。

         在教育方面，华人母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一般会教孩子一些简单的中文词语，如果丈夫也曾在中国留学，那中文就有可能成为家人沟通的语言。逢年过节，他们也会为孩子添购一些华人的传统服装。在成长过程中，孩子因为受了母亲的影响，尤其能感受到自身中尼混血的独特身份，也对中华文化有了一份微妙的感情。

亚公原名叶孟新，来自印度的大吉岭，在尼泊尔度过了悠悠40年岁月。现年74岁的他，每天准时到自己开设的“亚公中国鞋店”工作。亚公回忆，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印度富裕的华人都移民到欧美，囊中羞涩的他则因为太太是尼泊尔人，就带着妻小移居到这儿来。

         在尼泊尔小小的华人圈子里，一提起“亚公”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学徒生涯结束后，他开设了营业至今的“亚公中国鞋店”。鞋店规模不大，还保持着当年的模样，每天可生产十双手制皮鞋，月入两万卢比左右。一如典型的华人，他大部分时间都手脚不停地忙碌着。尽管过了退休年龄，亚公还是一星期做足7天，每天做足12个小时。

         忆起尼泊尔生活的点滴，他不但没半句怨言，还表示喜欢这里虽不富裕，却很安定的生活。善良淳朴的尼泊尔人，从来没有排斥过他，彼此结为好友的很多，一点也不寂寞。

         除了流利的华语，亚公的印度语、尼泊尔语也是很棒的。因此，“老叶翻译”是他的另一个身份，专为那些到尼泊尔投资的中国人当翻译。他乡遇见华人同胞，亚公总是非常高兴，彼此往来的信件他也一一珍藏。他偶尔也到佛教道场当翻译，让信徒能突破语言障碍，一同修行。

   在尼泊尔，一件不起眼的小东西，往往都有意料之外的商机。

         例如华人爱吃的豆腐，这种方方正正、白白嫩嫩的普通食品，在这里竟大有市场。尼泊尔人之前不知豆腐为何物，于是华人在此设厂，用简单技术制造出新鲜的白豆腐，如今已成为尼泊尔人的日常食品。在生意上，华人总是走在前端，除了引进新器材，更增制种类繁多的豆腐产品，把尼泊尔的这条商路继续深拓下去。

         此外，许多国外流行已久的小玩意，华人也陆续引进了尼泊尔。例如来自中国的大头贴机器，就摆在人来人往的商场中，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拍一次要价150卢比，约是在尼泊尔两顿饭的消费，但年轻的情侣、好友们花得毫不心疼。结果，一部小小的机器，竟曾创下一个月4万卢比的盈利，超过尼泊尔普通国民一年的收入，令人刮目相看。

         在加德满都，有两家华人经营的美甲中心。这个由日本人发起的美容热潮，是华人率先引进了尼泊尔。爱漂亮的尼泊尔妇女对美甲非常好奇，纷纷在尝试之后，深深爱上了它！华人美甲店所需空间小，设备也很简单，只提供基本的美甲服务，但天天门庭若市、顾客不断。如今，还有些当地女性要求老板娘开班授艺，亲自传授呢

   尼中两国往来日趋频密，在两国政府的友好合作下，似乎有更多的商机，陡然展现在华人的面前。

         然而，在这个高深莫测的国度里，华人老像是局外人。经济和生活上，总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永远都搞不懂他们的价值观，还有那宗教的热忱。」华人摊摊手，耸耸肩说。

         没人能预言，尼泊尔的华人社会何时才能形成。也许，中尼通婚家庭混血的新一代，将成为华人在这氤氲古国中悄然勃兴的起点。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以下简称吉国）和中国的共同边境长达1100公里，两国之间虽然有高耸入云的天山作为屏障，却阻隔不了两国人民互相迁移。

        吉尔吉斯曾是突厥汗国的一分子。840年时，吉尔吉斯族攻灭回纥，建立汗国。他们曾与西藏和阿拉伯势力组成联盟，阻挡了唐朝势力入侵。10至12世纪，在黑汗国的统治下，伊斯兰教在中亚迅速传播。随着成吉思汗的崛起，中亚被蒙古人统治达数个世纪之久。直到1758年，清政府打败卫拉特蒙古人，此区域始落入清政府势力范围。

        19世纪，沙俄势力伸入中亚。1918年，苏联成立。1924年，在民族划界的政策下，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成立，加盟俄罗斯联邦。1936年升格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91年8月31日，吉尔吉斯正式宣布独立，改国名为吉尔吉斯共和国。独立后，吉国政局仍然动荡不安，阻碍了经济与社会发展。

        吉国有四分之三的国土位于海拔1500米以上，畜牧业是主要产业；此外，农业也是吉国的经济支柱，主要作物包括小麦、甜菜、棉花、烟草、蔬菜及水果。吉尔吉斯有丰富的矿藏，唯缺乏石油和天然气。1990年代以前，98%的吉国产品出口到苏联其他地区。苏联解体后，吉国丧失广大市场，经济严重萎缩。1998年吉国经过经济改革后，加入世贸组织。近年吉国经济稍有好转，政府也意识到吉国山水优美秀丽，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

      有史学家推测，诗仙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就在今日吉国境内的托克马克（Tokmok）附近。碎叶古城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也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丝绸之路南北两条路线，皆在碎叶这个地方会合。自古以来通过丝绸之路而进入吉国，就此停驻下来并成为当地一分子的华商，不知凡几。

        清朝后期，宁夏、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反清，被左宗棠采取强硬的手段加以镇压。回军于清廷的围剿之下节节败退，为免被赶尽杀绝，回民分三批出走中亚。1877年，回族将领白彦虎以及其他将领，带领了千多人至3000多人不等的陕西、甘肃回民，在楚河的两岸定居下来，吉国的托克马克附近正是其中一个主要聚居点。1878年，又有千余名新疆与吐鲁番的回族从中国逃了出来，并在吉国南部的奥什居住下来。

        1879年，4000多名回民由新疆伊犁区进入中亚，并选择在哈萨克斯担的阿拉木图附近，以及吉国的伊塞克湖定居。这些移居的回民后来被称为“东干人”。

        这些进入中亚的回民不但没有遭到驱逐，他们后来还得到了俄国国籍。然而，他们没有资产，加上语言不通，刚开始的时候，生活并不好过。所幸这些回民都是庄稼能手，他们从中国带来了不少蔬菜与农作物的种子，辛勤地开荒种地，不但丰富了中亚的蔬菜种类，而且还把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中亚来，贡献不小。

        此后，这批回民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从20世纪初中亚反抗沙皇的统治，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再到二战时期阻止德军入侵，他们都积极地参与。其中，由回民马三成所组成的东干骑兵团更是威名赫赫。他们已经被当地社会所接受，甚至被视为多元民族社会的一部分。

        近代，从中国移居到中亚的汉族、吉尔吉斯族、维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在少数。他们大部分是为了谋生而来到此处，譬如在沙俄时期、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就有大量的华人劳工进入中亚，修筑铁路、建设基础设施。1962年，中国的伊犁和塔城地区，有大批居民外逃至苏联，史称伊犁事件。当时出走的华人人数高达6万余，他们之中后来定居于吉国的不在少数，并且形成吉国早期的华人社会；他们遍布各行各业，他们大多从事农业生产，也有许多人从事买卖。

        与当地人民一样，早期华人在这个历经磨难的国家之中成长、壮大，对吉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吉国到底有多少华人？是个连驻吉国中国大使馆也说不清的问题。据中国大使馆表示，他们能掌握的数据，就是去年共有1万2000名中国人搭飞机入境，而从陆路过来的则更多，估计每年有2至3万中国人入境。他们多数只持有旅游或短期签证，却逾期逗留在吉国赚钱讨生活。在吉华人中，福建人占了约三分之一，河南与新疆过来的也很多，此外，东北人也有一些；非法劳务则以陕西人居多。中国大使馆的领事粗略估计，吉国约有4万名中国籍人士。

        如果加上早期即从中国到吉国定居，并已入籍吉国的回、维、吉等少数民族，那更是难以计数。有资料显示，维族、回族（即东干人）已达17万之众。早期过来的少数民族华人各自成一群体，维族居住在该国的11个维族村，回族散居托克马克、小葫芦（Sokuluk）、亚历山多夫卡（Alexandrofka）、肯北洛夫（Kenbelov）和密梁川等地。他们成立社团、自己出版刊物，早已把吉国当成他们的家园。

        近期赴吉的华人虽然也有活跃的华人社团，可是，对大多数新移民来说，吉国毕竟只是个赚钱的地方，并无长居的打算。

爆发郁金香革命。

        近几年，一切乱象渐渐稳定下来，吉国经济与和平渐有起色，随之而来的，正是滔滔而至的华商。

        时代的巨轮轰隆碾过，在吉国首都比什凯克留下了数不尽的时代见证。采颐大道（Chuy Prospektisi）上，阿拉图广场、国家博物馆、音乐厅等俄式建筑，还有比比皆是的铜像，气势恢宏。可是，市区内的建筑以及道路，却大多老旧失修。而且，这里通讯与其他基础设施差，断水断电是家常便饭。和距离区区180多公里的哈萨克斯坦城市阿拉木图相比，比什凯克显得落后许多。

        不过，2008年的比什凯克和数年前比较起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华人虎玉梅回忆1999年刚到吉国定居的情况时说，比什凯克当时非常落后贫穷，城里没有多少商店，商店里的货架全是空的，街上空荡荡，毫无生气。每逢星期六、日，市区更成了空城，因为市民多来自乡下，一有假日就全都回乡去了。

        如此生活环境难免寂寞，可是，却是个赚钱的好地方。吉国17年前刚独立时，新疆一名年轻人白玺眼见到中国探亲或旅游的吉国人，回国时必带一台冰箱回去，心里便琢磨吉国的市场肯定不错。亲自到吉国一看，那里果然物价高昂，无论从中国发什么东西到吉国售卖，利润都能翻倍。于是，他毅然跑到吉国发展，成了吉国独立后最早进入的中国人。他曾在吉国做钢材生意，也开货运公司。

        “这里做生意与居住的环境都很不错，华人来了之后都不想走了。”白玺笑说。1994年，白玺还开起了餐厅。目前，他的北京餐厅是吉国规模最大的中餐馆，也是当地中餐馆里唯一的一级餐厅。吉国举行六国会议时，江泽民、钱其琛都在这里用餐。

        像白玺一样最早进入吉国的华人掌握先机，都赚了不少钱，在吉国打下了稳固的基础。近年来，越来越多华人进入吉国，可说中国各省市的人都到齐了。吉国矿产丰富，许多大型企业皆被吸引而来。中石油、中石化在此进行勘探，最近，华为也进来了。中国的建筑公司也不少，此外，中国政府也在托克马克投资造纸厂。

        不过，更不可忽视的是众多勇于闯荡的民间华商。这些小商人有的在此把原材料出口到中国，有的从中国运货过来做贸易。2004年，哈萨克斯坦开始严重排华，大批华商转到吉国发展。曾经，哈国的巴拉霍可是中亚最火红的批发市场。如今，吉国的中海批发市场，已经取代了巴拉霍可的地位，邻近国家的小商人都前来中海办货。中海的华商高达2000人，他们在此批发各种各样的货物，从电器、药品、化妆品到装饰品，不一而足。中海附近的多利多义，则是服装批发市场，华商也很多。

        此外，吉国还有一个叫“大唐”的购物商场，也聚集了200家左右的中国商户，主要以零售业为主。很多在中海做批发的华商，都在大唐租个单位兼做零售。

        据新疆阿凡提物流公司吉国代表曾庆贺的统计，单是大唐就有五六家物流公司。而中海的物流公司更有上百家，由此可见吉国华商的盛况。此外，吉国南部的奥什市也有5000至6000华商，以福建莆田人居多。

        像沈玉贵这样跟着货物跑的华商不在少数。他们这几年在吉国确实赚了不少钱。然而，政治的不稳定，是华人最大的隐忧。2005年，吉国发生郁金香革命，总统被推翻，全国呈现一片无政府状态。不管是中国人、土耳其人还是其他外国人开的商店，一律被打、砸、抢。2006年，吉国两度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中海被迫关门3天。由于这层因素，许多中国大企业到吉国考察后，最后都决定不投资。

        “如果我是大老板，我也一样只会在这里做灵活、短期的投资。中长期的投资行为如涉及固定资产、厂房建设等的投资，我不会去做。因为这里不稳定，投资环境也对外国人不利。在这里投资啊，进来容易出去难。”曾庆贺语重心长地表示。

        近两年，华商开始抱怨在吉国经商利润越来越低，以前可赚30%，现在只能赚15%或以下，甚至面临赔钱危险。

        问他们是否会在吉国就此安定下来，他们全都摇头。明天会在哪里？回国，或是另一个天涯海角？他们不知道。也许继续跟着货物跑，哪里更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当他们觉得累的时候，自然会找一处叫“家”的地方停靠。

在中亚五国中，唯有吉国的华人社团得以蓬勃发展。

        早在1991年，一群60年代到吉国、已经失去中国国籍的老华人，就办了一个吉尔吉斯华人协会。该协会当时共有会员300多人，成立至今，换过3任会长，第一任会长李德昇，第二任会长汪民昇，第三任会长石作山。由于老华人们年事已高，而年轻一辈的又不愿意接任，协会面对青黄不接的问题。

        2001年，另一个华人社团吉尔吉斯斯坦华侨协会成立了，会员是仍然持有中国护照，较晚期才到达吉国的新移民。2003年，会长白玺找上有丰富侨务与社团经验的华人

        虎玉梅出任常务副会长。虎玉梅为协会写章程，召开会员大会，并设置了各个机构，令协会正规化。

        后来，在中国大使馆的建议下，两个协会于2004年合并，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在联合会下，维、吉、回、汉、俄5个民族都有一个副会长，联合会会长由白玺出任。

        联合会在友谊宾馆租了一间办事处，虎玉梅天天在那里为华人处理问题。她表示，新移民还是以小商人居多，由于法律常识不足，常在吉国碰上问题，譬如护照被没收，被人欠货款、受骗，货物被扣押等等。

        为了提高新移民的法律常识，联合会每年召开两三次大会，请专人给会员讲解法律知识。联合会和中国大使馆配合无间，也是当地护侨工作做得特别好的原因。

        至于老华人，许多辛劳一辈子，老来生活条件还是不太好。联合会充分体现了华人孝亲敬老的精神，经常组织会员捐钱，给家境贫寒的老华人买油买米修房子，每年给贫困华人送救济金。

        联合会也曾经办过一份《华侨报》，请来一名当地老华人当编辑，再请一名留学生当采访记者。可惜，《华侨报》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办。联合会后来曾和新疆《经济报》联办《华侨报》，由于对当地缺乏深刻了解，内容不符合侨民兴趣，因此回响不大。

        2005年12月，吉国发生了一宗震惊华社的事件。一名从伊犁来吉生活已有十多年的华人刘柄超，住在比什凯克附近的一个小镇，平时种地为生。由于该年农作物歉收，刘柄超到比什凯克买机票想把妻儿送回国，却被人打成重伤，送院不治身亡。刘柄超家境贫寒，连治丧的经费也无法筹措，刘妻于是找上华人华侨联合会，向虎玉梅哭诉其遭遇。

        虎玉梅立刻写了一纸文情并茂的文告，影印后找来其他理事、副会长帮忙分发，吁请华侨解囊相助。文告一发出去，马上有人打电话捐献，3天内获3700多美元捐款。“当时，连一名货物被抢、断了腿的小伙子也来捐款，虽然只有20多索姆，却是他一天的饭钱。”虎玉梅回忆当时情况时表示。

        联合会顺利为刘柄超筹办了丧事，买棺材，并把遗体运回中国。在追悼大会上，虎玉梅念了悼词，感谢与肯定华人团结互助的精神，场面动人，许多人热泪盈眶。吉国华人本来如一盘散沙，这件事可说是改变吉国华社精神面貌的转捩点。它大大刺激了吉国华人的自豪感，也把吉国华人团结起来，令大家领悟到，人在异乡，唯有发挥互助的精神，才能度过种种难关。

     在吉国的大地上，住着一批既谦卑又骄傲的回民。130多年前，他们为逃避清军的追剿而进入中亚。多年后，又有更多回民因为政治迫害流亡中亚。这批回民从最初的数千人，开枝散叶，发展到今天，已有6万人左右。虽然仅占总人口的1.1%，可是，他们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民族特性，并没有被主流社会同化而消失。

        在人口普查中，他们被称为“东干人”。有一种说法，指回民从前住在黄河东岸，因此东干是“东岸”的变音。可是，他们更喜欢自称回民。世世代代，他们思念着遥远的家乡，对故土仍然怀着浓烈而深厚的感情。他们对文化、语言、传统的坚持，更令人动容。

        今天的东干语，其实就是甘肃、陕西口音的汉语。而东干文，则是以斯拉夫字母拼写的陕甘方言。有趣的是，由于长时间与汉语世界隔绝，没有随着时代演进，今天东干语的许多词汇仍停留在清朝时代。他们管政府叫衙门，称警察为衙役。把商店称为铺子，把女人或妻子称为婆娘。近代新发明的事物，他们不懂得汉语如何称呼，因此，他们把飞机称为风船。至于电脑、冰箱这些东西，他们多依靠俄语、阿拉伯语或吉尔吉斯语的音译。不过，随着近年东干人和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多，电视、冰箱这些新词汇也开始慢慢被东干社会接受了。

        许多逐渐失传的华人民间艺术与文学，东干人还保存着。他们爱唱曲子，如《孟姜女》、《绣荷包》、《高大人领兵》等等。口溜儿（顺口溜）、倒扣话（绕口令）、娃们的曲子（儿歌）、古今儿（故事）和猜话（谜语）等，更是一代代口耳相传。一句“千买卖、万买卖；不如地里翻土块”的口溜儿，传神地表达了回民早先重农轻商的传统。

        虽然城市里的东干人衣着和一般现代人的装扮无异，可是，去到乡下，还是到处可见扎着腿带子、穿着腋下开襟旗袍的女人。拉面、面片儿等等陕甘美食仍然是东干人的日常主食。由于受到俄罗斯族、维族等其他民族的影响，手抓饭、馕、罗宋汤，也成了东干人饭桌上常见的佳肴。不过，东干人也把拉面发扬光大，今天，在吉国任何一家餐馆，几乎都可点到拉面（Laghman）。

        “我们吃的和甘肃人吃的看起来是差不多一样，可是蔬菜种类不太一样。而且甘肃食物太麻辣，我们不会吃辣。”有个汉族名字的东干人王富英说。不同水土出产不同蔬菜，桌上的食物难免会有所变化，可是，华人饭桌上的标志——筷子，却从来没在东干人的饭桌上消失过。

        东干人婚嫁与传统节日的仪式，更是百年不变。新娘们穿的大红袍、高底儿鞋，仍然保留着清朝时候的样式。而新娘头上繁复的发髻“燕燕头”，在中国已濒临失传，吉国却还有老太太们会梳。开斋节和古尔邦节是东干人的两大节日。有经济能力的东干人会趁着古尔邦节到麦加朝圣，没能力负担昂贵旅费的则会宰牛宰羊庆祝节日。回族老先生哈琪哈赤曾去过麦加朝圣，不久又要再去一次。“到麦加朝圣的旅费一次就要2400美元，对我们来说是不小的开销。”哈琪哈赤说。哈琪哈赤有3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当司机，老二和老三在市场卖货，家庭不算太富有，可是还是坚持到麦加朝圣，由此可见东干人的虔诚。除了这些宗教节日，东干人也庆祝华人传统节日如端午节等。

        当然，正如其他国家，农村对传统民间文化的保存，总是比城市来得强。农村学校还有东干语课。反观比什凯克，年轻一辈都说俄语，有的甚至已经不会说东干话了。不过，近年中国在中亚越来越有影响力，年轻一辈又开始热衷学起东干语，甚至也有部分东干领袖主张开始尝试华语教学。

        跟吉国其他民族相比，东干人的教育水平相当高。他们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如今，大学毕业的东干人高达20%至30%。而东干人更遍布各行各业，不再局限于种地。目前，留在农村种地的东干人约占40%，其他的都开起公司。此外，东干人也出了很多科学家与学者。

        今天走到东干人聚居的村落，不难发现东干人的生活水准是相当不错的，家家有车有房。在通往东干村落小葫芦的路上，一群吉尔吉斯族少年蹲在路边。细问之下，原来这些吉族少年竟然是结伴到东干村来找工作的。刚在吉国定居下来时，东干人一贫如洗，只能给人干活、种地。今天，却轮到俄族和吉尔吉斯族给东干人开车、打工。

        东干人很少跟外族通婚。东干知识分子王洪山说：“家里管得很紧，不让年轻一辈和外族通婚啊。”问他为什么不鼓励年轻一辈和外族通婚，他解释说：“东干人很少。跟外族通婚，久了这个民族就消失了。”

        吉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东干人聚居在楚河两岸，两国东干人来往很密切，而且通婚频频。“你的妹妹嫁到哈萨克，我的儿子娶了吉尔吉斯的东干人，大家都是亲戚。”王洪山笑说。

        对东干人来说，民族身份认同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国家认同。他们深爱着生活了多年的吉国，但心里还是认为中国是第二个家乡。“心里很想念，可是，也只能去走走了。”木哈麦说来，无限惆怅。

        回民坚毅的生命力，就如他们耕种的田地，春天一来，就长出了满地绿油油的蔬菜。

 1962年，家在甘肃的尤苏波夫一家被划入地主阶级，受到批斗。尤苏波夫爷爷带着几名孙子逃到吉国。“刚到吉国时，我们语言完全不通，不过，这里已经有很多回民，他们更早就到这里了，我们便给他们种地。父亲一定要我们上学。当时我只有16岁，因不懂俄语，只好从小学一年级念起。不过，我只花了5年就念完了小、中学。”尤苏波夫哈密说起往事，语气毫无辛酸，更多的是骄傲。

        如今，尤苏波夫哈密家里兄弟几人，都已学有所成。老大尤苏波夫哈密的汉族名字叫王富英，毕业自农业经济系。老二尤苏波夫拉西德，汉族名字王吉山，是比什凯克人文大学的教授兼顾问，教国际经济。老四尤苏波夫木哈麦，汉族名字王洪山，则是物理系出身，曾给苏联军队设计飞机、电脑等。苏联解体后，他开了家公司，提供工业设备及软件等。

        兄弟几人之前都没有出版刊物的经验，却共同出资，办了一份《回民报》，一份《回族》杂志，两份刊物都使用斯拉夫字母拼写的东干文。《回民报》乃半月刊，共有8版，主要报导吉国时事与当地回族社区的新闻。《回民报》有一名编辑，4名记者，另有一名美编负责排版设计。《回民报》的订阅费一年为200索姆。由于东干人口本来就不多，因此报纸的发行量只有1500份。虽然如此，《回民报》却办得相当专业，排版大方，印刷精美，而且内容充实，不是一份浑水摸鱼赚取广告费的刊物，创刊以来，赢得极佳口碑。

        至于《回族》杂志则每年发行一次，内容包括经济、农业、商业、运动、文学等等，记录了吉国回族的生活与感情。杂志一本150索姆，发行量约500至1000本。《回族》杂志的主编正是王家老二王吉山。课余时间，王吉山就在办公室里处理杂志的编务工作。而老四王洪山，则是《回民报》的技术编辑，负责印刷等技术层面的工作。老大王富英为退休人士，闲时喜欢舞文弄墨，投稿到《回民报》与《回族》。兄弟几人齐心协力，不辞劳苦，但求属于东干人的报纸与杂志，能延续下去。

        “我们每年都在赔钱。每印一份报纸、一本杂志，都要自己掏钱出来补贴。”王洪山说，“可是，如果我们不干，就没人干了。久了，年轻人连话都不会说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慢慢就消失了。”

        兄弟几人还印刷东干文课本，免费派给农村的学生上课。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努力，一个人口仅占区区1.1%的族群，却能一代一代，在异地把文化和语言传承下去。

     未来，吉国还须面对许多挑战：国营企业私营化、西方势力的扩张、种族问题以及悄悄抬头的恐怖主义。凡此种种，皆令华人担心吉国政局的变化，会影响他们在吉国的投资。

        不过，无可否认的是，吉国仍是中亚五国当中，对外国最开放，对华人最友善的国家。也因此，吉国华人在中亚五国里，人数最众，也最为活跃。如果吉国在各方面能再加以改善，华人也能多些回馈当地社会，那么，资源丰富、风景壮美的吉国，不难成为华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国度。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下文简称哈国）曾是强大的匈奴帝国的一部分，盛况维持了数百年。继之而起的突厥人也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许多汗国。11至15世纪，契丹人和蒙古人的铁蹄又踏入了这片土地。留存下来的突厥蒙古后裔信奉了回教，后来再分裂出乌兹别克与哈萨克两族。哈萨克汗国于15末世纪建立，分为大帐、中帐和小帐。18世纪30、40年代间，中帐和小帐被俄罗斯吞并。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当地于1936年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名义加盟苏联，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宣布独立，并改国名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长期归属苏联的历史，令哈国多了许多俄罗斯人；今天，俄罗斯族是仅次于主体民

        族哈萨克族（下文简称哈族）的第一大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乌克兰族、乌兹別克族、德意志族、鞑靼族，维吾尔族等100多个少数民族。为了增加国内主体民族的人口比例，哈国政府曾呼吁世界各地的哈族回归故土，吸引了不少中国境内的哈族移入。目前，在哈国生活的华人不在少数，但是华人人口并没有被官方归入少数民族人口的组成部分。

        哈国天然资源丰富，石油、天然，以及煤、锰、铜、铅、锌等矿物，为国家带来庞大的收入，加上近年来政治稳定，该国经济成长高达8%以上，表现一枝独秀，成了中亚最富裕的国家。

     哈萨克和中国山水相连，一直以来，中哈人民在两地之间迁徙的情况，非常普遍。

        1877年，甘、陕、宁回民起义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余部被迫流亡至中亚，后来，他们在楚河两岸定居下来，逐步形成一个新族群，被称为东干人。

        清朝末年，民生困苦，有大批中国劳工远赴中亚谋生，其中以维吾尔族居多。1920年代，每年赴中亚的维族以及吉尔吉斯族就有多达2到3万人。而前苏联在这段时期所修筑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就凝结着许多华工洒下的血汗。

        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争爆发时，俄国曾强征哈萨克人做苦工，这引起哈人群起反抗。那时，至少有15万哈人死在俄国的残酷镇压之下，近20万人逃往中国。20世纪30年代，在苏维埃政权的强制集体化过程当中，哈国更有超过150万人死于饥荒，导致大量的哈族再度逃往中国，并且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了中国公民，却对故国念念不忘，为哈萨克斯坦于1991年独立后，大量中国哈族回归故国的情况埋下伏笔。

        在1966年前后，由于各种因素，不少中国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出走中亚，其中有一部分是回民。这些回族新移民在哈国受到早年过来的东干人照应，再加上本身的刻苦耐劳，他们很快便在当地扎下根来。在中国时，回族已是务农好手，来到哈国之后，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唯有以务农为生。哈族是游牧民族，因此对于农业不感兴趣，而回族人从中国带来大量蔬菜以及其他农作物的种子，大大丰富了哈国的农业生产。此后，当地菜市场的蔬菜，有60%以上都是回族人供应的。

        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来自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哈国生活得越来越好，尤其是东干人以及维族的生活水平更是大幅提高。新一代东干人所涉足的行业遍布各领域，当中不乏工程师、教授等知识分子。

90年代之后，也有许多汉、满族人被哈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吸引，而来到这里经商。这些新移民的人数曾高达数万人。

   由于中亚存在着许多从中国移居过来的哈族、维族等少数民族，而他们中不少人以华人自居，因此，在谈到哈国的华人时，不能忽略了他们。

        大部分华人，特别是汉、满新移民，在哈国活得小心翼翼，连出门都能免则免，更别提参加什么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了。哈国的华人到底有多少，迄今仍无精确的统计。据推测，哈国汉族华人人数最多的时期有几万人，目前只剩两千多人。他们大多在批发市场里做贸易，或在中资企业里打工。华人绝大多数集中于哈国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此外，哈国首都阿斯塔纳也有一些中资企业的华人职员。

        来自中国的回族与维族，经过数代繁衍，人数比汉族多得多。至于来自中国的哈族，由于入境或定居都很容易，因此人口极其庞杂，再加上许多人都是中、哈两边跑，流动量也大，所以无法精确统计。曾有一个说法称中国籍哈族高达60万人。

     “来哈萨克斯坦太危险了，没事千万别来。”若有人想到哈国生活或旅游，向哈国华人征询意见，都会得到这样的答复。

        若是一定要到哈国，那里的华人会特别叮嘱：“没事别出门，出门别说话，以免暴露身份。暴露身份就完了。”

        哈国华人，就是如此胆战心惊地过着日子。

        哈国是中亚最富裕的国家。阿拉木图道路笔直宽敞，行人道上种满葱葱郁郁的绿树，空气格外清新。这个俄式城市很宁静，也很少看到随意丢弃的垃圾。但是，平静安宁的外表下，掩盖着哈国严重的排华问题。哈国华人说，哈国普通百姓对华人虽然谈不上友善，但至少不会拳头相向。

        走在街上，中国人总是小心翼翼，最担心的是碰上假警察。曾有华人被自称便衣警察的人拦住，要检查他们的护照，然后“警察”一口咬定护照是假的，把不知所措的华人推上“警车”，载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洗劫一空。于是，哈国华人互相告诫：如果被警察查身份，要保持镇定，不要上所谓的“警车”，因为警察无权随便抓人。如果对方没有穿着警察制服，则更不要相信对方的身份。

        哈国自2004年开始出现大规模针对华人非法居留的扫荡行动后，华人就一直没有安宁的日子。这几年，华人成了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导致大批华商被迫含泪离开。今天，在哈华人（中国籍汉族）的人数，已经从2004年以前的数万人之众，锐减到两千余名。

   仍留在哈国的两千多名中国人，主要是中资公司的职员、在批发市场做民贸的华商，以及留学哈国的学生。

        在这3个不同的群体当中，中资公司的职员无疑是比较幸福的。中石油、中石化在哈国规模很大，都有常驻的中国籍员工。虽然他们也偶尔会遭受警察的骚扰，不过这些高级职员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清楚自身的法律权利，比较懂得如何应付。而且多数中资公司都有专门聘请的律师，中资公司职员若在路上被警察拦截，只要打通电话，律师就会过来帮忙处理。

        在大企业的保护伞下，中资公司职员不必心惊胆战过日子。在商场里，偶尔还能看见他们自在地闲逛。

        在哈国从事贸易的华商就没那么幸运了。华商大多数集中于阿拉木图市的巴拉霍可。那是一个长达数公里的批发市场，市场里有个亚联商场，曾是华商的天下。如今，到亚联商场转一圈，依然摆卖中国货；但店内，却已不再是中国人。

        问那些仍然留在巴拉霍可的华商生活过得怎样？“苦啊！苦啊！中国人在这里苦啊！”这是某个华商的第一反应。问他们既然生活与前景都不好，为何还留在当地？他们说每个华商刚到哈国时，都至少投资了几十万，这些都是他们的血汗老本，无论如何也要把货卖完才走，因此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呆在哈国。

        早在1990年代，就有华商进驻哈国。当时哈国排华现象并不严重，华商在此赚了不少钱。但自2004年开始，警察常到巴拉霍可不分青红皂白地捉中国人，搞得市场鸡犬不宁。“警察一来，中国人就跑。那场面啊！像拍港产警匪片。”一名华商说。

        现在，巴拉霍可只剩200名左右的华商。许多中国老板不敢露面，把货交给当地人卖，晚上才到店里收钱。如此做生意，终究不妥，当地员工偷货或卷款私逃的事件时有所闻。

        另一名华商则指出，当年巴拉霍可的华商有上万人，整个市场很旺，哈国周边国家的商人都慕名前来办货。随着华商的撤出，亚联商场的繁荣也一去不返了。

        在哈国，华商们成了走钢索的人，纵然危机四伏，却又无路可退，只能咬牙坚持走下去。

   同样是华人，持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护照的华人，受到的待遇却截然不同。

        哈国约有十名马来西亚华人和20多名新加坡华人，虽然同样必须面对其他华人所面对的困境，但是，新马华人至少没有受到粗暴对待。

        “哈萨克人确实不喜欢华人。我向哈萨克人介绍自己时，只会提自已是新加坡人，就算别人问起，我也会强调新加坡和中国文化不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一般都会接受。”新加坡华人郭国仲说。

        其他新马华人对此皆有同感，马来西亚华人甚至更感到自己在哈国受到礼遇。“我刚到阿拉木图那年，电视上经常播出有关马来西亚的新闻和纪录片。哈国政府把马来西亚视为回教国家的典范，有意朝马来西亚的方向发展。因此哈萨克人对马来西亚人很有好感。”马来西亚华人周惜珠说。

        新马华人人数虽少，却分布在多个不同的。哈国目前大约有5家新加坡公司，其中位于阿拉木图的新加坡科技电子有限公司（Singapore Technologies Electronics）、新加坡吉宝企业有限公司（Keppel Corporation Ltd），以及阿斯塔纳的新加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Singapore Technologies Engineering），都取得良好业绩。

        这些新资公司多聘用当地人，以新加坡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以培育当地人才为目标，平时只有两名新加坡职员，只有当进行大型项目时，才会短期外派十多名新加坡职员到哈国。

        新资公司在哈国展现了很强的企业责任感。“取诸社会，用诸社会。ST在哈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因此也希望能回馈当地社会。公司有个奖学金计划，提供给哈国教师，让他们能到新加坡进修。”新加坡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哈国分公司的董事长曾兆亮（Gary Chan）指出。

        这些到过新加坡的哈国教师，都对新加坡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眼中的新加坡，科技发达、犯罪率低、人民礼貌、环境干净、办事有效率，建国短短40年，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值得哈国借鉴。在新加坡的生活经历，开拓了他们的眼界，相信也许通过他们，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哈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

        旅居哈国的新马华人来往密切，对初来乍到的新马华人也特别照顾。大家经过互相介绍而认识，生活上互相扶持，并且常常举办餐聚以联络感情，只是缺少一个形式上的社团名称而已。不过，新马华人跟中国大陆华人几乎没有任何交往。新马华人坦言，他们和中国大陆华人文化差异较大，并且，也感觉大陆华人自我保护意识太强烈，难以接近。

        新马华人在哈国，并不全然以赚钱为目的。有一部分的新马华人，在非政府组织里工作。来自新加坡的郭国仲隶属神召会，在哈国当顾问。他很喜欢哈国：“哈国有一些新加坡已经失去的东西。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后来他还娶了当地哈族女子为妻，并育有一女。

        同样来自新加坡的黄来春，已经54岁了，却跑到哈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当社工。她在一家孤儿院服务，也在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小镇Taleykorgan办起一家让智障儿学习的学校。刚来时，她很不喜欢这地方，觉得当地人很傲慢、办事效率又低。可是，住下来之后，她却发现了哈族乐于助人、好客、善良、尊敬老人的美德，又渐渐喜欢上了哈国。

        还有一名香港女子卢淑英，在哈国创办了黄金种子公共基金会，宗旨是开启当地年轻人的视野，带给年轻人正面的影响。由于哈族青年酗酒问题严重，卢淑英希望通过教育，让他们改变坏习惯。她开办语言中心，让学生学习英语、俄语和汉语。中心还设有图书馆，藏书丰富。她的语言中心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哈族青年。他们在此学习俄语，互相鼓励，一起面对新的生活。

   上世纪前半叶，哈国人曾两次大规模逃往中国。他们在中国繁衍生息，后代都在中国出生、成长，且持有中国护照，是中国公民，但在心灵深处，部分人仍然认定哈国才是自己的家园。

        哈国独立后，总统号召全世界所有哈萨克族回国定居。于是，一场大规模“回归故乡”的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为了鼓励哈族回归，政府制订了《公民法》和其他措施，以优惠政策奖励哈族新移民，譬如回归家庭可申请生活补助金，一个人可得2000至4000美元等。条件是一个家庭里至少要有一个人放弃他国国籍，成为本国公民。

        哈萨克斯坦给了境外哈族一个玫瑰色的愿景。可是，海外归来的哈族，在哈国的生活却非从此一帆风顺。

        看似中性，其实带着贬义的词。回归者总爱对外宣称自己和本国哈族共享同一语言、文化、信仰，一切和本国哈族并无二致。可是，从思想、价值观，乃至衣着、口音和生活习惯，他们都和本国人有区别，很容易被一眼区分出来。

        另外，哈国哈族认为早年出走到中国的哈萨克人，都是民族的叛徒，国家有难时远走高飞，国家经济好了，就要回归。他们也不满回归者享受着政府提供的种种优惠和福利。

        在巴拉霍可市场卖胶带的波拉提夫妇，从中国迁回哈国已有十年之久。他们坦言在哈国受到歧视。波拉提无奈表示，很多出走中国的哈族家庭，当年都是因为受到政治迫害，才被迫背井离乡的。以他们家为例，当时被划为地主阶级，叔叔都被整死了，父母才逃到中国。

        虽然哈国政府近年大力提倡哈语，可是哈国的主要沟通语言仍是俄语，尤其在大公司及银行等机构工作，更必须懂得俄语。从中国移民过来的哈族不通俄语，因此很难找到好工作

另一方面、中资公司也不太愿意聘请回流的哈族。“他们认为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工作不勤奋。”一名中国籍华人雇主说。

        移居哈国的中国哈族，多数都是从中国农村过来的，教育程度一般都不高。当地哈族人看不起他们，中国公司也不愿聘请他们。因此回归者在哈国求职常常碰壁，经常面临失业问题。

        于是，为了生存，他们在哈国多从事劳力工作，如在餐厅打杂、在乡区放牧等。不过，他们在哈国的收入比在中国时高，可是近年哈国物价暴涨，生活成本大增，很多人又考虑再回去中国。

        来自中国木垒县的哈族青年吴轩，举家迁来哈国已有6年之久。当初，吴轩父亲因为不希望下一代被汉化，另外也考虑到事业与孩子的教育等问题，抱着回归祖国的心态来到哈国。目前，吴轩父亲在学院教中文，母亲在政府部门打杂，而吴轩本身则在阿拉木图经济学院（相等于职业高中）就读。吴家的情况，已是回归者当中属境况不错的了。

        吴家只有吴轩母亲持哈国护照，其他人都还保留中国户籍。不过，吴轩也在考虑明年是否要入籍哈国。他认为哈国才是祖国，中国只是他成长的地方。哈国赚钱多，消费高，中国虽然发展迅速但竞争激烈。中国籍哈族在两个国家之间举棋不定，许多人保持观望态度，静观两国未来的发展。

        每年都有大量回归者从中国到哈国定居、打工。有的从此扎根哈国，也有许多人返回中国。在中哈两国，他们大多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当中，有的更认同中国，有的却认同哈国，不过，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国家和身份认同模糊不清。也许，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友善、更平等的生存空间，比他们的身份认同更为重要。

        自建国以后，哈国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前来淘金。在高峰时期，一百三十多万人口的阿拉木图市竟然涌进了数万名中国人。如此庞大的异族大军骤然压境，任何国家都会备感压力。

        其实，华人移民许多生活上的焦虑，以及哈国人对华人的一些负面看法，当中，是存在着不少有待斟酌的地方，只要双方进行更多的沟通，在彼此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之后，相信大家还是可以在这片美丽的国土上相处得更加愉快。

土耳其

  位于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土耳其，领土横跨欧、亚两洲。它有97%的领土在亚洲，其余3%则在欧洲。

        土耳其一词由“突厥”演变而来，在鞑靼语中意为“勇敢”。它曾是东罗马帝国的中心。15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建立了奥斯曼帝国。16世纪末开始没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同盟国作战，战败后帝国瓦解。1919年爆发了革命，1923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它拥有6500年的历史及13个文明的历史文化遗产，古迹星罗棋布。

        这里四季分明，三面环海，散发东西方文化的独特风情。灿烂的文化，明媚的风光，热情的人民，使它具备了充足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外国旅客的到来。

        土耳其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工业基础扎实，经济增长迅速，极具发展潜力，理应会吸引很多华人前来谋生与发展。但基于种种因素，目前只有约3000名华人居留在这个国度。

      据说，第一个到土耳其来的华人是一名祖籍上海，成长于香港的朱姓人士。现年已90多岁的他，仍然在当地经营羊毛衫以及皮鞋工厂。

        而第二个到来的华人恰巧也姓朱，同样来自香港，华人分别称他们作老朱和小朱。小朱是一名工程师，逗留的时间不算长，在当地娶了一名希腊女子后就随妻到希腊发展，已于多年前与世长辞。

        第三人则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刘炳汉，有个别名叫刘大麻子。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他是蒋介石身边的军官。在土耳其留学时，刘炳汉与老师的女儿共结连理，婚后两人返回中国。之后刘氏夫妇迁居数次，从南京到上海、香港，最后在台湾落脚，结果还是因为刘妻无法适应台湾的生活而重返土耳其。

        1955年9月，来自中国重庆的王曾善一家9口踏上土耳其的国土。身为中国与土耳其交换学生计划的首批学员，王曾善过去曾因中国动乱而举家逃至巴基斯坦，后来因为伊斯坦布尔的一名教授同情他的困境，邀他到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文化课程，王曾善欣然接受邀请，于是携带家眷而来。

        那时的土耳其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阶段，不论电话通讯还是公共设施均不完善，加上言语不通，其生活之困窘可想而知。

        说得上一口流利土耳其语的王曾善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的生活，但对只懂家乡话的妻子和子女而言，却是个大挑战。如今，女儿王荷丽回忆说：“当时父亲只教了一句土耳其语‘什么’，让我们自个儿去学去问。我们便到家对面的水果档，指着各种各样的水果不断地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们也常与邻家小孩一齐玩要，不知不觉就从完全不懂土耳其语到学懂了它。”

        王曾善一家儿女多，开销大，除了教书之外，他也开中餐馆以补贴家用，而这家名为“中国饭店”的小餐馆，正是当地的第一家中餐馆。那时的土耳其物资匮乏，中餐材料和酱料奇缺，太太马昌玉就在家里培植豆芽，自制豆腐与酱料。

        那时候，当地人对中餐可说全然陌生，马昌玉不厌其烦地引导食客如何享用中餐。渐渐地，土耳其人不但开始不排斥中餐，还爱上了中华美食。

        土耳其并非移民国，除了血缘或姻亲等理由，并不接受外来移民，居留审核也非常严格，限制又多。因此，在两名朱先生、刘炳汉以及王曾善一家之后，极少华人前来定居。

        在1980年代，土耳其采取了对外开放的自由经济政策，于是华人企业便开始前来开拓商机，到了这时候，从中国及东南亚过来的新移民才逐渐增加。

   土耳其对外来移民并不抱持鼓励的态度。

        这些年，华人大多是通过婚姻或工作而来，人数在3000名左右。他们主要来自中国浙江、安徽及东北，少数来自香港或台湾，多数聚集在首都安卡拉及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Istanbul）。

        当地华人主要经营餐饮业、小型杂货店、服装店及礼品批发等，有些则从事导游、翻译、英语或汉语教员等工作。然而，政策的诸多限制，令华人的生意无法扩大。

        华商之间甚少往来，言行谨慎。因此，部分通晓土耳其语的华人以当地人为主要社交对象。然而，过埠新娘们却保持着紧密联系，每月还通过自组的妇女会举办餐聚，闲话家常。

        当地只有一家网络中文媒体，让华人相互分享生活资讯及情报。此外，华人子女一般都在国际学校接受教育，对英语、土耳其语的掌握比汉语好得多。

        土耳其气候宜人，治安好，华人生活总算安定。尽管单调了些，但只要刻苦耐劳，三餐温饱并不成问题。

      早期，人数不多的土耳其华人主要以经营中餐馆为业。中国国营企业于1980年代末姗姗而来，开拓了商机，于是纺织业、机械制造业开始进驻市场，华人的经济活动才逐渐走向多元。

        然而，土耳其政府对中国纺织品的进口诸多阻拦，中国货品要打入当地市场并不容易。因此，从事这行的商家无法持之以恒，只好转而售卖中国礼品。

        土耳其是全球节日最多的国家之一，几乎两三天就有一个节日，民众都互相送礼庆贺。几名华人看准了礼品市场的潜力，就在伊斯坦布尔的Sark Han批发城内开设礼品批发店，无论精美的餐巾、桌布、吊饰或首饰等，都广受当地人喜爱。

        礼品畅销异常，华人也就一窝蜂地投入其中。这些批发商大多来自中国安徽，原本在当地零售店里打工，凭自身工作经验在中国组织货源，再批发到土耳其。

        刚开始，礼品批发生意本小利大，前景大好，有些人甚至连开两家分店。但后来礼品店越开越多，货品大同小异，市场趋于饱和，再加上熟悉当地市场需求的土耳其商人亲自到中国去办货，竞争日益激烈。

        “一个馒头两个人吃，还能饱，20多人分一个馒头，岂能饱？”批发商叶云打趣的比喻，清楚显示了礼品生意的前景。

        生意难做，批发商只好压低价格。另外，当地政府实行反倾销，针对进口的中国礼品征收标准不一的进口税，令生意成本激增。此外，日益高涨的店租更重重压在当地华商肩上，使他们失去了信心。

        伊斯坦布尔有50多家中餐馆，菜式以粤菜为主，其中糖醋鸡、酸辣汤、铁板牛肉及宫保鸡丁最受顾客欢迎。中餐馆的档次及价格都稍微偏高，最低消费13至50美金不等。

        然而，中餐馆生意因受到非典型肺炎事故及金融风暴的冲击，一度跌入谷底，许多撑持不住的业者纷纷倒闭。其中，设于伊斯坦布尔的中国国营企业——广州远洋饭店首当其冲，被迫歇业；余者则凭着一股顽强毅力，苦苦撑持，才熬过了低迷的谷底。

        激烈竞争下，不少中餐馆改为自助快餐店，顾客只须缴付十里拉，即可开怀大吃。这种超前的经营方式广受当地人欢迎，掀起了一股崭新的饮食风气。其中，东方大酒楼沿用了这种经营模式，分行开了一家又一家，如今有9家分店遍布各大超市。

        这里的华人，若想如欧洲华商一般赚大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各行各业的华商们，都不愿眼巴巴看着辛苦经营的事业毁于一旦，再怎么艰难都想稳守岗位，撑持到底。

     “土耳其的政策，朝令夕改，使人难以适从。”当地华商怨声载道。

        大部分华人未曾入籍，一般持居留证。过去居留证每3年更新一次，2004年起，改为每年都要更新。而申请更新，往往不获批准，逾期居留者，常遭警方扣留。

        当局或批准了一家新公司的开业申请，但又以劳工保护条例加以约束，间接阻遏引进外国员工，业主不得不雇佣本地人，造成中餐馆员工多是土耳其人。

        这一切，都令华商对前景失去信心，不是有意离开另谋出路，就是回流中国重新发展。

        另外，过去只要跟当地人通婚，两年后即可入籍。如今条例较严苛了，结婚3年才能申请入籍，住满5年才能取得身份证及土耳其护照。

        也许少点抱怨，生活就能简单一些。尽管华人满腹牢骚，但这四季分明的国度，却以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留住了他们的脚步。

     当地华人，无论衣食住行都自成一格，某种程度上仍延续着家乡的生活习惯。

        以饮食为例，华人三餐都以中餐为主，炖煮式的土耳其菜始终无法符合他们的口味。土耳其菜讲究繁复的烹调，加入大量番茄酱及酸奶酪，味道甜滋滋的，主食则舍米饭而取面包，也难怪华人不太欣赏。跟土耳其人十分讲究饮食不同，忙于工作的华人用餐较随意，饭菜全摆上桌后，便各自端盘用菜，各取所需，一般用餐时间也不过半小时左右。

        华人的早餐有中、西式两种选择。中式早餐为稀饭或面食，西式则有面包、小黄瓜、蕃茄、干酪、腌橄榄、小香肠及热红茶。至于午餐和晚餐，华人喜欢在家烹煮，一菜一肉一汤配上香喷喷的白米饭，简单的菜式吃得有滋有味。他们偶尔也想念家乡的小吃，心血来潮时会自制包子、馒头、饺子等中式点心。

        由于当地政府对房地产买卖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华人一般都赁屋而居，住在租来的公寓里。小型公寓空间狭小，只有一个设在卧室里的小卫生间；较大型的公寓则有两间卧室、一间客房、两间卫生间及阳台，相对比较舒适。三房一厅的租金从600到1000里拉不等，租金较低的则是设施简陋的地下室单位，连藉以取暖、烧饭的天然气都欠缺，但总算是个栖身之所。市区租金贵，低收入的单身华人一般住在郊区。

        华人也注重起穿着和仪容，在这个穆斯林国家里，女性的服装绝不暴露，一般领口不低于锁骨、不用透明布料，以宽松的上衣配搭长裤；至于男性，平日多以衬衫配搭长裤，出席较隆重的场合，则西装笔挺。

        拥车的华人不多，市区有地铁、有轨电车、公车或出租车服务，交通方便。

        华人每天辛勤工作，休闲时刻不多。充其量不过是到购物中心、餐厅、咖啡厅及卡拉OK歌厅去；或去郊游、旅行；或跟朋友聚会搓麻将及观赏数码影片。

         当地没有中文学校，华人子弟一般都选读国际学校，也有些到土耳其公立学校就读。土耳其的教育制度是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4年，公立学校提供免费教育，而国际学校每学期学费约1000里拉。接受当地教育的华人子弟，都只学习土耳其文及英文。

        台北驻安卡拉办事处，曾于1998年开办过中文班，约有十名华人孩子报读，每逢周六上课一次，教材由台湾侨务委员会提供。后来，中文班因缺少导师而停办。家长们只好自己在家里想方设法让孩子们学习中文。他们让子女观看中文影片及连续剧，从中学习新词汇。一些富裕的华人，也趁暑假之便，将孩子送回家乡去濡染中华文化。

        当地没有中文报章，自2007年元旦起才有了一个中文网络媒体——《T号外》，负责人为中国新移民。《T号外》与当地服务机构相联系，为打算前来土耳其经商、留学或旅游的人士提供一个信息平台，也为华人打开一扇了解土耳其的窗口。

        土耳其的官方媒体广播电视总局“土耳其之声”，一向以26种外语广播。该局于1981年7月1日增设中文部，每日下午两点广播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内容包括十分钟当日新闻、5分钟土耳其各报摘要，以及各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人文、旅游及新闻等相关的介绍与评论。

        中文广播节目有5位工作人员，包括组长、副组长和3位编制人员。组长马赫穆德·费理哲是哈萨克族人，副组长是1989年移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人，3位编制人员则分别由两名华人、一名土耳其人担任。

土耳其是个伊斯兰教国家，却奉行宗教自由的政策，因此华人可自由决定宗教信仰。华人以信仰基督教、佛教者居多，也有少数归依伊斯兰教的华人，部分则属无神论者。由于当地没有华人庙宇，华人佛教徒多半在家中供奉佛像。

        基督教在当地发展稳定。2005年，新加坡的基督宣教士前来土耳其传教，并租用瑞典大使馆隔壁的楼房作为会所。目前有50多名信徒，包括商人、小贩、厨师及留学生，其中以温州人居多。教会经费主要来自教友捐献；每逢星期日，教友们便齐聚一堂，吟唱诗歌，聆听牧师布道。

        华人的社团组织，有土耳其华商会、中土商人友谊协会、伊斯坦布尔妇女乡亲联谊会及安卡拉妇女乡亲联谊会。

        华商会成立于2004年，主要目标是维护土耳其华人的商业利益，并促进华商的联系。华商会也负起排难解纷的责任。中土商人友谊协会是一个新成立的华人组织，致力于为中、土两国的商贸往来提供咨询。另外两个妇女组织，成员都是过埠新娘。她们每月聚会一次，分享各自带来的佳肴，在谈笑声中，促进了彼此的感情。

      尽管土耳其并非长住久居的理想地，但华人既来之则安之，无论如何，华人都会坚定地走下去。

        或许，有一天蓦然回首，发觉前路不通，华人也将毫不踌躇地毅然离去，另找出路。

伊朗

今日的伊朗，在1935年之前长期被称为波斯，是一个具有四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曾创造了灿烂的波斯文化。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向东挺进，一路势如破竹，波斯被划入希腊版图。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快消退，最后被安息帝国取代。萨珊王朝继安息王朝而起，被称为波斯第二帝国，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7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大举入侵，波斯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此后，波斯又先后落入蒙古人和突厥人手中。16世纪，伊斯兰教什叶派建立了萨非王朝，迁都依斯法罕，波斯成了中东重要的文化中心。

        到了近代，英、俄、德、土耳其逐鹿伊朗，以图控制波斯油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斯南部与北部分别被俄国与英国控制。1925年礼萨汗推翻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在美国扶植下，伊朗曾是中东强国。巴列维王朝推动白色革命，依照美国模式改革伊朗农业与工业，给予妇女选举权、工人参加分红并限制宗教势力等等。虽然改革初期工业产值大幅提高，但利益只被少数人掌握，导致贫富悬殊，又因经济结构不健全，最终经济陷入困境。

        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宗教领袖霍梅尼掌权，废除君主制，改国名为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义贯彻政治与法律各领域，国家权力由阿訇执掌，议会的权力有限。从此，伊朗奠定了宗教治国的政局，与西方民主体制抗衡。

伊朗的石油储量占世界储量的10%，天然气更占世界总储量的16%，居世界第二位，可惜却因与伊拉克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以及受到国际制裁等因素，国力难以强盛。伊朗近几年经济发展较快，地毯制造业举世闻名，也是中东地区唯一还制造汽车的国家。

古时候的中国与波斯，同样都是历史悠久的强大帝国，两国之间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各自的文化在亚洲两端互相辉映。在《后汉书》等史籍当中，描述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屡次提及的安息和条支，所指的正是波斯。在东西文化的交流史上，波斯可说是占据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波斯的来往就更为频繁。根据《魏书》所述，波斯使臣曾经多次到中国去觐见北魏皇帝。到了唐朝，阿拉伯帝国入侵萨珊王朝，末代国王的儿子俾路斯还曾经逃到中国，并请求中国的皇帝出兵援救。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元朝时期在波斯东北部建立伊儿汗国。伊儿汗国和元朝保持着密切来往，并且设置了驿站通道，使东西方的交通更为通畅，中国与波斯两地商人的往来也更加频繁。在这段时期，两地在科学、艺术和医药方面的交流，可谓空前兴盛。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期间，其船队曾经3次到达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也即是今日的霍尔木兹（Hormuz）。而郑和在斯里兰卡所立的石碑上，也是以中文、淡米尔及波斯3种文字所写成的，足见当时中国对波斯的重视程度。

        这两个文明古国在当时交通极为不发达的情况下持续交往，从文化到物产，都深深地影响着对方。到了近代，两国之间却是越来越陌生，就连近代中国出现的移民潮也未将华人带到伊朗。

        1971年，中伊两国正式建交。这十多年来，两国扩大经贸合作规模，尤其是天然气以及石油领域。2005年末，中伊之间签署价值1000亿美元的石油合作协议，中国自此成了伊朗至为重要的石油贸易伙伴之一。

        此外，在伊朗境内的通讯、五金以及汽车等领域，都有中资企业的参与。在工程承包方面，随着中资公司标得地铁、铁路、公路、桥梁等多项基础建设项目，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石化、中信等中资公司，皆成功在伊朗扎根。

        伊朗是个中东大国，总人口高达7000多万，而且和中国有着极深渊源，可是，华人却非常少。据了解，伊朗华人只有2000人左右，当中60%至70%来自中资公司，包括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工程师等等。不过，他们在此多是属于短期外派性质，很少人长期留在伊朗。

        个体经商者不多，大部分集中在德黑兰。自从霍拉姆沙赫尔（Khorramshahr）盖了一座中国商城后，又来了一批贸易商，目前商城内约有200户华商。小部分华人在伊朗公司及政府单位上班，这些通晓波斯语的华人一般负责翻译工作，接洽中国客户。

        嫁到伊朗的华人女性共有50多名，也有数名华人男性娶了伊朗女子。至于华人留学生，则介于150至200人之间。

伊朗有一家华语广播电台，隶属伊朗新闻部，电台内的职员大多数来自中国。

       伊朗在新闻媒体上总是和核子武器、恐怖分子、邪恶轴心国等名词扯在一起。政府扣留民运人士与外国记者的事件层出不穷；与伊拉克、以色列等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种种负面新闻，都令人对伊朗望而生畏。

        可是，问任何一个在伊朗生活过的华人，他们都会说，伊朗并不如外界描绘般局势动荡、安全堪虞。虽然核武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但是，伊朗百姓的生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社会也没因此紧张不安。事实上，许多华人甚至认为，伊朗治安良好，生活平静，比起许多国家，都安全得多。

伊朗，就是一个如此让人意外的地方。

        8年的两伊战争，令伊朗百姓倍加珍惜和平，首都德黑兰的街上，没有到处持枪巡逻的警察，也不见神色木然、语气冷漠的路人。相反地，伊朗人热情开朗，对外国人尤其充满好奇与好感。华人不管是出外逛街、吃饭或搭地铁，常碰上伊朗人前来搭讪。

        伊朗人乐于助人，更是讲究礼貌的民族。中国南方航空德黑兰办事处总经理王歌帆表示，伊朗人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优点，就是特别彬彬有礼，待人接物让人很舒服。另外，德黑兰拥有1400万人口，却没有大都市常见的脏乱，卫生环境不错，这一点，也令许多华人叹服。

        德黑兰的伊朗女性一个个穿着合身及膝的外套，头上仅松垮垮地围一条五彩缤纷的丝巾，露出一张张高鼻深目的脸。身穿大黑袍，蒙着面纱，把全身严密地包起来的女性反而不多见。这一切，都和一般人想象中的极权宗教国家大相径庭。

        可是，阿曼、科威特、卡塔尔这些中东国家，虽然要求本国女性出门时要穿黑袍戴头巾，却不会把相同的要求强加于外国女性。而在伊朗的华人女性，则一律被强制要求戴上头巾，衣着也不许暴露，上衣下摆必须把臀部遮盖起来。换言之，伊朗人怎么穿，外国人也必须怎么穿，没有特别待遇。男女之间举止也不能过于亲密，否则很可能被宗教警察找麻烦。

        伊朗也没有过多的娱乐场所，只有一些小型俱乐部和咖啡屋。喜爱热闹的华人，难免觉得伊朗沉闷。不过，伊朗到处有青翠的公园，到了春暖时节，更是百花齐放，赏心悦目。久而久之，华人也养成了闲暇时间到公园散步运动的习惯。德黑兰北方还有厄尔布尔士（Alborz）山脉，峰顶白雪皑皑。冬季时，前往山上滑雪成了华人少不了的活动。

        华人与伊朗人和平共处。中华饭店的主厨王国兴表示，伊朗人常说中国和伊朗一样，是文明古国，因此对华人相当有好感。穷人基金会的范跃铭则表示，伊朗人对华人的普遍印象是勤快、办事效率高。另外，由于中国对伊朗没有劳务输出，在伊朗生活的华人，大都是中资公司的高级行政或管理人员，层次比较高，也普遍受伊朗人尊重。

        虽然对外国人友善，可是，伊朗人普遍存在”外国人的钱，就该多赚一些”的观念。不管是酒店、出租车或餐厅，只要不是伊朗人，顾客都要付双倍或更多的钱。令华人感叹，要在精明的波斯人的土地上讨口饭吃，还真不容易。

* *为了解决德黑兰的塞车现象，伊朗政府在1970年代便计划建造地铁。地铁后来因为两伊战争而搁置。直到1995年，伊朗政府才和中国中信集团合作，重新启动了地铁建设计划。德黑兰市民引颈期盼的地铁于2000年开通后，获得了普遍肯定，华人的形象在伊朗也相应提升。*

在伊朗2000多华人里，中资企业员工占了绝大部分，个体华商可说少之又少。德黑兰有千多万人口，中餐厅却只有3家，其中两家还是伊朗人开的，真正由华人开的中餐厅，只有一家。

        其中缘由，从4名华人青年在伊朗的创业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两年前，陈思远随父亲到伊朗考察市场，和伊朗客户交流后，萌生了在伊朗搞餐饮业的念头。“伊朗没什么娱乐，人们平时的休闲活动，就是到餐厅吃吃饭，因此在这里开一家有格调的餐厅，肯定可以吸引人。”陈思远说。不过，更主要的是，他想把餐厅当作一个发展平台，通过餐厅认识当地商界人士，建立人脉，寻找商机，以方便日后做生意。

        回到杭州后，陈思远向几名朋友提起这件事，大家都很感兴趣。于是，王晶解、张劢勋、沈弋、陈思远4名20多岁的年轻人，大胆地跑到伊朗，展开了创业大计。

        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一样，规定外资公司必须让伊朗人占51%以上的股权。不过，机缘巧合下，陈思远通过当地朋友，知道伊朗有个外商投资部门，能发出外商投资许可证。有了这张许可证，就可独资经营，不必找伊朗人当股东。要申请这张许可证，他们得向当局证明自己的生意对伊朗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并且对当地人的产业没有冲击。几个年轻人写了很久的报告，最后成功获得许可证。他们的公司，成了伊朗第一家中国人拥有100%股权的公司。

        虽然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不过在伊朗做生意，却没有他们想象中简单。单单是要找个合适的铺位，他们就看了四五十个地方。“有时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价格都谈好了，和房东提出要将老旧的店面重新装修一番时，房东却不愿意。伊朗人不容易接受外来事物，总觉得自己的东西比较好。”陈思远苦笑。

        餐厅取名茶怡，装潢由中国公司负责设计，伊朗承包商负责执行，餐具等其他用品全从中国进口。餐厅的装修格调高雅，在伊朗算是相当高级的餐厅。茶怡初期投资成本高达300多万人民币，开了一年多，生意没有想象中火爆，不过总算收支平衡。

        王晶解表示：“在伊朗做生意最大的困难是租金太贵，而且每年都在涨。硬件软件都跟不上。办理清关速度很慢，办签证也很困难，请外国员工需要办工作许可证，一张许可证每个月最低要缴500美元，如果是经理级的，更要1000美元。”

        为了节省成本，茶怡餐厅除了一个烧得一手好菜的杭州厨师，其余都是伊朗籍员工。王晶解表示，当地员工比较散漫，需要特别花时间培训与沟通。茶怡还曾发生过因为开除表现不佳的员工，而被员工告上劳工部的事情。“伊朗人和中国人也有文化上的差异。伊朗人很友善，和他们谈生意，什么都说没问题。不过，接下来，问题就接二连三浮现。”王晶解说。不过，几名年轻人都乐观面对种种挫折，“在伊朗创业的这段经历，就当锻炼、学习。不管这里能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值得的。”王晶解表示。

        除了餐厅之外，4名年轻人也在伊朗做起贸易，并且开始有了一些成绩。在伊朗的生活诚然没有中国那么舒适，可是，陈思远表示：“只要有钱赚，没生命危险，到哪里都一样。我们父辈都在做生意，影响了我们这些下一代，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干出一番事业。”这几个年轻人成长的环境比父辈优越，但华人飘洋过海打天下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泯灭。

        伊朗的华人企业，不管是中资企业或民间华商，多集中在德黑兰。不过，自从阿巴丹市（Abadan）开了一家“伊朗中国商贸城”后，许多华商纷纷被吸引到这个地方来。

        阿巴丹市在两伊战争前曾是繁华港口，2005年，伊朗国会通过在阿巴丹市开辟阿尔万德自由区的决议，允许外国人在此经商，并给予工作许可签证。这项计划吸引了杨平源、陈志中等几名华商。他们知道伊朗的货物向来从中国进口，而且阿尔万德自由区和伊拉克又只是一水之隔，等于面对着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巨大潜在市场，因此决定在此建立一座商城。

        经过3年的努力，“伊朗中国商贸城”终于正式开业，经营期限为30年。这是一座集批发、仓库、物流、公寓、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城。商场计划设1500个铺位，目前只完成了第一期，有500个铺位，已经入驻的商户约有200多家，他们多是来自江浙一带，或在迪拜、俄国有经商经验的商户。

        商贸城刚开张时，生意非常火红，而且利润很高，华商都赚了一笔。伊朗政府原本是将阿尔万德自由区划为保税区，可是，一段时间后，由于各种原因，伊朗政府取消了保税政策。如今，华商的货物要进入伊朗，都要缴付关税。伊朗的关税特别重，令华商压力大增。

        除了经常会因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而头痛外，在伊朗经商还需了解当地的文化。王歌帆分享他在伊朗设立公司的经验时表示，“伊朗因为受美国制裁，社会相对比较闭塞，规矩、文化也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伊朗很保护自己的市场，不是开放型经济。伊朗人自古即有经商传统，善于赚钱，团结对外。因此外国人在这里做生意，容易和当地社会产生冲突。”

        在经商文化上，华人重视口头承诺，因此常感伊朗人出尔反尔。王歌帆表示，“在伊朗，一切都要白纸黑字，仔细地设定条款。入乡随俗，我们既然到了伊朗，就要照这里的游戏规则去玩。了解当地的文化，是成功经营的基础，特别是在伊朗。”他说。

        层出不穷的问题让华商却步，因此，尽管中国是伊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前景看好，但在伊朗经商的华人依然不多。

* *中华饭店是伊朗第一家中餐厅。从巴列维王朝时期开始，这间餐厅就存在了，到如今已近50年。那时候，有很多港台商人在德黑兰经商，这些华商大都是中华饭店的常客。不过后来两伊战争爆发，华商都撤走了，中华饭店生意额大受影响。20多年前，对中餐情有独钟的伊朗人Morteza Talbi买下了中华饭店，一直经营到现在。中华饭店未转手前就在那里工作的香港主厨许福隆，在伊朗工作了34年，后来加入伊朗籍。许福隆几年前过世，享年75岁。*
* 伊朗政府深知自身国际形象不佳，因此近年努力通过媒体扩大对外宣传。隶属伊朗新闻部的伊朗华语广播电台，宗旨便是向世界解释伊朗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立场，以及让全世界的华语听众都能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教义。
* 华语广播电台共有9名职员，其中7名是中国人，负责翻译新闻、播音的工作，此外也翻译一些时事评论。该台的新闻主要来自伊朗广电总局新闻中心，也透过路透社、新华社等新闻网获取新闻。
* 台长马生贵于1989年到伊朗留学，是第一批留伊中国大学生。在马什哈德（Mashhad）的大学毕业后，他继续在德黑兰大学研究所深造，学习伊斯兰和波斯的历史文化。原本他打算毕业后回中国找工作，碰巧当时伊朗有意委任他创立华语广播电台。于是，1995年，他正式上任为伊朗华语广播台台长。
* 这个电台也设有一个网站（http://chinese.irib.ir/index.php），内容甚为丰富，除了有新闻报道、时事分析、古兰经、领袖讲话、书籍园地等栏目外，也积极和听众交流，回答听众对于伊斯兰教和以巴问题等时事的疑问。
* 马生贵表示，还未办电台前，中国人对伊朗的了解很肤浅，只能通过西方媒体间接了解伊朗。“伊朗华语电台为中国人打开了通向伊朗的窗口。中国人曾经误以为伊朗支持疆独，对伊斯兰教不理解。通过电台，听众了解到原来伊斯兰教内部也有很多派别，疆独和伊朗没有关系，也逐渐明白穆斯林里也有理性、温和的，不全是塔利班那样的。”他说。
* 除了马生贵，在伊朗政府机构办事的还有穷人基金会国际旅游组织的范跃铭。这个组织负责开通伊朗与全球的旅游互动。近年伊朗意识到华人旅客市场的庞大，于是找上范跃铭创建了中港台组，负责伊朗文化宣传、旅游宣传、地接等工作。中港台组刚成立时，半年都接不到一个团。经过一番努力，中港台组业务今年大有起色，每个月平均有100个中国人到伊朗旅游。
* 中伊两国自古交好。今天，华人对世界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但是对伊朗反而生疏起来。许多华人热衷学阿拉伯语，但学习波斯语的，却少之又少。
* 目前，在伊朗留学的中国学生介于150至200人之间。他们选择到伊朗留学，一是因为伊朗许多宗教色彩浓厚的大学会给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二是掌握波斯语的人不多，而中国和伊朗两国经贸合作又越来越紧密，因此许多华人学生都看好学波斯语的前景。据悉，目前在义乌批发市场，波斯语翻译员非常抢手，收入也很高，一天可赚200美元。
* 华人留学生大部分选修波斯语文学系，也有一些选择会计、音乐、艺术及神学系。来自河南的留学生王超是一名穆斯林，曾在中国学习阿拉伯语，目前在伊玛目霍梅尼国际大学进修波斯语。这所大学坐落于德黑兰附近的城市加兹温（Qazvin），大概有30名左右华人学生，以男生居多。
* 王超表示，在伊朗求学的日子，悠闲自在，除了学习没有太多的事做。由于这里没有太多的娱乐场所，所以留学生课余时间，就上网聊天、给家人朋友打电话，或是看看小说、打牌下棋，偶尔和朋友们逛逛街，到伊朗餐厅吃一些风味独特的食物。
* 有时候华人留学生也会组织一些活动，“在这里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第一次和学校里的中国人去山脚下烧烤。大家准备好材料，包车去那里一边抓螃蟹一边吃烧烤。那时我才刚到伊朗两个月，还没适应外国生活，这次烧烤会令我烦闷的心情舒缓不少。”王超说。
* “朋友们都羡慕我能够出国留学，但他们不知道在外求学的苦况。在这里两年，我学会了独立生活，原来在家里的陋习全都改掉了，毕竟在外求学凡事都要靠自己，只有学会独立才能不依赖别人而活。”王超说。
* 毕业后，王超打算回国，他说：“无论以后是打工或自己开公司，都不想留在伊朗发展。外国人在这里开公司受到很多限制，所以大部分中国人都选择回国。”
* 虽然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未必会留在伊朗，但这些在伊朗生活过的学生，对伊朗肯定有更深层的了解。他们将成为未来中伊两国间的桥梁，不论是中国人到伊朗发展，或是伊朗人到中国寻找商机，他们都将起着重要作用。
* 伊朗和中国在经贸上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在伊朗市场上，中国货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遗憾的是，伊朗市场上的中国货，多由伊朗商人前往中国采办，或通过迪拜转口到伊朗。直接前往伊朗开公司的个体华商，相对来说少之又少。
* 进入伊朗的华商不多，但为了爱情而来到伊朗的华人女性却不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她们来到伊朗，重新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并渐渐爱上这个热情而有礼的国度。回首千年风霜，这段由迢迢遥遥的丝绸之路串连起来的情缘，原来不曾断绝。
* 在阿拉伯文中，科威特意为“近水的城堡”。但是，科威特绝大部分国土被沙漠覆盖，国内全无河流，极缺淡水。夏季气温高达50℃，夏长冬短，炎热干燥，湿润多雨。
* 多年来，这个海湾六国中最北端的国家，一直强调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可是，夹在伊朗和伊拉克两大强邻之间，科威特注定难以独善其身，常保安宁。
* 7世纪时，科威特原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1756年，萨巴一世（Sabah I bin Jaber）被推选为科威特第一任酋长；至今统治着科威特的酋长，就是萨巴一世的后代。1871年，科威特成为奥图曼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61年，科威特宣布独立，并于同年成为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成员国。
* 自1930年发现油田后，科威特的经济开始腾飞，成了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均生产总值全球排行第四；截至2007年，科威特已发现油田的储存量位居世界第5。石油、天然气工业是科威特的经济命脉，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国家出口收入的92%。
* 科威特于1971年和中国建交，是海湾六国之中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两国之间的交流也分外密切。科威特一直都把中国视为重要的外贸合作伙伴，并于1980年代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以促进两国的经贸关系。
* 虽然中国与科威特有许多方面的经贸交流，但是真正将大批中国人带入科威特的还是工程及劳务承包。早在1970年代，中国就已经有对科援建项目，以协助科威特建筑民宅。
* 80年代是中国工程及劳务承包在科威特的全盛期，中国公司的人力成本低廉，技术水平又良好，在科威特极受欢迎，当时来自中国的建筑劳务人数高达1万5000人。
* 至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在科威特的中国工程劳务承包公司至少有14家，所承包的项目以政府投资的普通民宅为主。当时中国公司并不是总承包，只是纯粹提供劳力而已。中国人盖起房子来又快又好，科威特的住房有75%以上都是他们所建。
* 科威特今日的繁华，说是由中国劳工的汗水灌溉出来的也不为过。
* 海湾战争爆发期间，外籍人士纷纷撤走，包括大部分中国籍及其他国籍的华人。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华人不得不留下来，在受到严重污染的科威特工作。
* 部分留下来的华人，由于受到贫铀弹的核辐射，加上其他不知名的化学武器的影响，结果患上了“海湾综合症”。海湾综合症的患者会产生染色体变异，神经、免疫、呼吸、内分泌和生殖系统等都会受到破坏。这些不幸的华人当中，就包括了从1989年开始便在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工作的孙渤。他在战时留在科威特，曾经帮助过240多名中建公司的中国人及时安全地撤离，并负责清理战场和搜集材料等工作。
* 海湾战争结束之后，来自中国的工程与贸易公司是国际间最快重返科威特，并参与战后重建工作的企业。伊拉克在撤退之前，纵火点燃科威特的多处油井，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也及时派出灭火队，给予科威特极大的帮助。
* 在海湾战争以前，中国工程以及劳务承包多数为低端承包。但是在海湾战争之后，因为西方公司不敢贸然回到海湾，中国工程和劳务承包公司便趁此时机，标到了许多战后重建工程的总承包合约。
* 由于中国工程承包公司已经发展到全方位及更专业的阶段，因此出现在科威特的中国人也不再是建筑民工，而是多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建筑师、研究人员等专业人士。
* 美伊战争在2003年爆发之后，造成波斯湾一带人心惶惶。科威特与伊拉克的距离最为靠近，与伊拉克积怨极深，科威特华人无不担心美伊战争会波及科威特，因此能走的都走了。但是，一些到科威特工作的华人都已经签署了合约，若是合约未到期就擅自停工，多个月的薪水便将付诸东流，因此，这些华人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留守。后来察觉局势并没有怎么恶化，离开的华人又纷纷回到这里。
* 科威特小国寡民，又曾经发生多次变乱，可是不管局势如何，华人始终对这个地方不离不弃，每一次危机过后，华人总是会回到这里重新开始。
* 科威特的华人人数，经几次剧烈变动，至今有5000人左右。根据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统计，科威特的华商约有150至200人左右，护士约20人，体育教练约25人，工程与技术人员约50人，大学教授与研究员等专业人士约30人，保健按摩与美容院从业者约150人，中餐馆从业者约60人，民营劳务承包公司的劳工约300人。这些来自民营小型公司和以个人名义到此打工的华人加起来不超过1000人。其余的华人，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国有企业及相关公司带来的员工及劳务人员。由于华人稀少，工作单位也各不相同，科威特没有明显的华人聚居地，在全国6省，都可找到他们的踪影。
* 和其他海湾国家一样，科威特不接受移民，甚至不发永久居留证。同样是宗教色彩浓厚的阿拉伯国家，这里禁酒、禁猪肉，也缺乏其他城市多彩刺激的娱乐生活。
* 快乐也许难以实物衡量，不过，有许多华人愿意把孩子接到科威特受教育，更多华人愿意长居于此，也愿意聚在一起分享生活，从这些实况可以看出，相较其他海湾地区的华人，科威特的华人似乎有着更高的快乐指数。
* 不久后的将来，科威特皇宫旁，将矗立起一座240公尺高的壮观新地标——科威特中央银行。作为科威特最重要的金融机构，科威特中央银行的图样也将被印在科威特的钞票上。而负责把这座地标性建筑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正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 科威特中央银行的合同总额高达4.06亿美元，这次获标，说明了中国工程承包公司已经开始进占高端建筑工程的总承包业务。除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冶集团也成功获标承建奥林匹克大厦的结构工程。其他在科威特取得不俗成就的中资公司尚有葛洲坝集团、中交集团（前中中港）等。
* 这些规模浩大的建筑工程，除了需要大量的劳工，也把中国建筑、石化、工程等专业人才带到科威特。单是科威特中央银行一个项目，就引进了800至900人。不过，随着中资公司进军总承包项目，这些高端项目的建筑团队也越显国际化。科威特中央银行的建筑团队里，虽然从最低层的工人到最高端的管理阶层和工程师都有中国人，可是，外国籍员工也不少。中建总公司副总经理杨春森指出，在国际化的市场，一个多元化的团队有助中资公司在当地站稳脚步。
* 和1980年代中资机构初进入科威特市场时比较，现在中国籍的工程师待遇好多了。当时，中国籍工程师一个月薪水只有130多美元，而当地及欧美籍的工程师则享有至少1000美元的薪水。今天，拥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的中国籍工程师有2000多美元的薪水，5年以上的则在3000美元以上，虽然仍然和外国工程师的待遇有一两倍的差距，但差距已明显缩小。
* 杨春森表示，中国籍工程师做事比较有系统，而且对建筑规范的理解很全面。可是，由于不了解科威特的惯例，跟业主打交道需要时间才能慢慢上手。“这些都是经验的累积；只要肯努力，中国工程师能比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做得更好。”杨春森表示。
* 中建总公司的工程师李彪抱着到国外学习的心态来到科威特。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中国年轻人勤奋好学，很得上司赞赏。对科威特酷热的天气，李彪不以为苦。“我们语言（英语）比较不行，趁着在国外的日子好好学，对将来有帮助。”李彪说。
*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人均收入提高，中国工人的薪水也水涨船高。不过，中国工人的工资虽相对较高，却比印度、巴基斯坦工人更有效率和经验，因此，很受劳力市场欢迎。此外，中国工人喜欢承包制，按量计算工钱，而印、巴籍及越南籍的工人，则习惯按日计算工钱。
* 中国工人在中东曾屡次发生罢工示威事件，不但延误在建工程的进展，也严重影响中资公司的形象。为了避免工人被不实宣传误导以及受到中介公司欺诈，中资公司近年已经逐渐采取直接面对工人，直接跟工人签合同、付工资的策略。而随着经验的积累，建筑公司也发现，输入工人最迟必须赶在三或四月份前，让工人逐步适应科威特的天气。如果工人六月才抵达科威特，一开始就得承受科威特夏天惊人的高温，又以为科威特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的天气，难免怨气满腹，觉得自己被骗到人间炼狱工作，因此很容易闹事。
* 除了中资公司，来自中国的民营小型工程公司也在科威特取得不错的发展。这些民营小型公司多数来自江苏东海县，在中国是股份制的劳务中介公司。他们获得分包后，就自己组成建筑团队，从中国输入大批民工。
* 到科威特的工人一般都签两年的合同，两年能赚1万2000美元左右。许多中国工人都迫切希望，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上调，他们的工资也能提高，但这样的工资水平，从上世纪90代到现在都没有调整过。不过，由于赴科工作的手续费比较低，而且不必经过考试和培训，因此还是有不少中国工人愿意到科威特工作。
* 1997年就到科威特发展的民营工程公司代表葛宜兵表示，在科威特工作其实没有比在中国累，这里机械设备先进，所以工作起来没有太吃力。虽然科威特温度高些，但是，由于气候干燥，工人工作起来反而比较舒服。夏季时，也会避开最高温的时段，甚至改在夜里施工。工人生活的环境比较好，闹事的情况便也减到最低。
* 经过去芜存菁的过程，目前在科威特的民营工程分包商多是信誉比较卓著的，譬如马俊坤与葛宜兵等。葛宜兵表示，做工程就跟做生意一样，有时也会赔。但是，一定要维持信誉，以后才有做下去的机会。
* 在海湾六国中，科威特发展得比较早，保护劳动工人的制度也比较完善。科威特的建筑工人一天工作9个小时，每周休息一天。如果超过9个小时，资方需要征求工人的同意才能加班，并且给予双倍酬劳。科威特政府也会通过监理公司调查工人的施工与生活环境，风沙眼镜、安全帽等设备都要齐全，以确保工人的安全，宿舍里也要有冷气等设备。
* 中国建筑劳工在科威特的基本生活条件获得一定保障，唯一的无奈，也许就是生活比较单调。每周的休息日，他们的活动不外是洗衣、打扑克牌、看电视、逛超市。许多工人工作的工地，就在大沙漠中央，要上哪儿都不方便，生活的范围，就只有那窄小的宿舍。举目四望，滚滚黄沙无边无际，想到家乡妻儿，难免倍感寂寥。
* 每当沙尘暴来袭，人的身影在漫天风沙里显得格外渺小。可是，撑起科威特半边天，令这个沙漠上的富国得以持续繁华的，正是这些渺小的身影。

      除了中资机构和民营工程公司，科威特也吸引了不少华人专业人士。这些白领精英，主要分布在石油与电信服务两大行业。科威特人力资源非常匮乏，加上科威特希望在2020年可以增加一倍石油生产量，达到日产石油400万桶的目标，因此，在未来十几年内，科威特的工作机会还是很多。

        为了吸引全球精英，科威特提供优渥的薪金与福利予顶尖专业人才。可是，对华人专业人士来说，科威特最吸引他们的，其实不是工资，而是机会。

        很多华裔专业人士毕业自欧美国家的大学，他们在欧美工作所得工资和科威特相比，其实差不多。可是，在欧美国家，华人往往只被赋予执行与技术上的工作，要坐上负责“决策”与“管理”的职位，还是比较困难；来到科威特，他们却能进入公司高层，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事业上的突破。

        就算不想长期呆在中东，有了这些履历，他们以后在别的国家求职时，要坐上管理层的位置，也比较容易。比如从加拿大应聘到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叶林，不到两年内，在石油勘探分析领域里有新的突破，大为公司赏识，并加级奖励，成为其他华人白领们的楷模。

        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海湾国家的工资已算很高。而在海湾国家中，科威特的工资似乎更为优渥。大学生的基本月薪从600至700第纳尔起跳；普通小型公司的秘书也可拿到200至400第纳尔的月薪，大型石油公司的秘书月薪可高达600第纳尔；一般的行政级人员，月薪介于2000至4000第纳尔之间。如果是管理阶层或专业人士，薪水更是远远高于此数。

        此外，科威特尚有许多华人技工分布在全国各家工厂里，譬如在Al Meer石油天然气控制台生产与销售商工作了两年的苗俊昌与莫建龙。在Shamlan制管厂，也有6名来自中国的工人团队。

        这些中国技术工人虽然英语不好，可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属于技术性质，因此沟通不便对工作的影响不是很大。事实上，科威特的雇主对华人员工的表现一般都非常满意。工作认真是华人员工最大的特点，Shamlan制管厂的中国工人，有的因为气候不适皮肤长了肉瘤，有的被硫酸灼伤，可是，他们仍然坚持上班完成工作。

        Al Meer公司的生产经理Reda E.Ahmed对他厂内的两名中国员工更是赞不绝口。Al Meer厂内的大型精密机械购自中国，中国供应商委派莫建龙协助Al Meer使用与维修机械。Ahmed非常欣赏莫建龙的工作表现，于是向中国厂方强烈要求，把莫建龙留了下来。他表示，中国人从不请假，学习能力强，且非常聪明，总是能解决生产线上的疑难杂症，还懂得利用电脑来改善生产程序。

        和许多海湾国家的华人比较起来，科威特华人显然是对居留国家更为乐观。到其他海湾国家如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经商或工作的华人，都把妻小留在原居国，或把孩子送到欧美国家受教育，忍受两地分隔的痛苦。可是，在科威特的一些华人，却愿意把家人接到科威特，让孩子在科威特受教育。这一现象，不局限于领着高薪的专业人士，连当护士的、开小饭店的华人，都把孩子接过来。他们有钱的就把孩子送到英国人、美国人办的国际学校；没钱的，就把孩子送到菲律宾人、巴基斯坦人办的国际学校。

        在科威特国家科学院工作的赵永平，曾在美国生活多年。比较起科威特与美国，他认为科威特是个更适合家庭生活的地方，除了待遇好、免税，公司提供住房、孩子教育的津贴，生活与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科威特是个福利国家，隐形福利已经涵盖了生活的基本需求。在美国，太太需要工作，收入才能和在科威特的所得持平。”赵永平说。赵永平也和其他华人一样，忙着送孩子上才艺班。由于科威特是个富裕的小国，因此，要为孩子找到一流的老师并不难。在其他国家如美国，父母往往需要挤破头，才能把孩子送到比较好的学校及才艺班。有的父母甚至还笑说：“科威特诱惑少，不必担心孩子学坏。”

        哈萨阿布瓷砖加工厂的工人霍海营，在科威特生活了7年。除了收入不错，他在这里也有许多朋友，大家通过科威特伊斯兰教宣传中心及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办的活动认识后，保持良好关系，互相扶持。他每个星期五都到伊斯兰教宣传中心，还成了虔诚的回教徒。由于深深觉得科威特是个好地方，所以，他不但把妹夫、弟弟都接到科威特工作，不久前，还把大儿子也接到科威特来，并为儿子安排了一份按摩的差事。

        科威特没有五光十色的生活，但是，住下来后，许多华人家庭，渐渐喜欢上这里平淡安稳的生活。

* *成立于1983年的“孔雀餐厅”是科威特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餐厅。它坐落于丽笙酒店（Radisson SAS），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奢华，格调最高的中餐厅之一，顾客以科威特皇族与商贾为主，中国大使馆有时也会在此宴请贵宾。餐厅的招牌菜如炸虾土司、四川辣酱鸡、北京烤鸭等，陪伴许多科威特有钱人家的孩子长大。由于顾客对这些菜式都很熟悉，点菜时可以直接叫出这些菜式的号码，所以中餐厅的菜单一用就是20多年，不敢随意更换。*

       科威特的个体华商不多。他们多是夫妻档或由二三个亲戚，一同经营着微型贸易公司。其中，贸易商余美娟，已经是相当成功的玩具供应商。为了节省开支，余美娟没有租店面，甚至没有住房，夫妻俩和大伯一块住在仓库里，开着小货车到处卖货。由于看准在这里做生意的人不敢倒账，她是少数肯赊账给顾客的供应商。余美娟认为，科威特打击商业罪犯严厉，如果顾客倒账，只要发货单上有顾客的签字、店名、地址等，把发货单拿到警察局，对方就不能出境。由于她生意手腕灵活，经过磨合，跟科威特各路客人关系都很好。

        除了余美娟，床具贸易商王素霞和首饰批发商申志江也都在科威特闯出了春天。“在科威特做生意，规模很难做大，一个产品如果发两个货柜的货，肯定卖不出。所以别指望能发大财。不过，要养家糊口，不是问题。”申志江表示。

        对许多华商来说，科威特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而是出于偶然——碰巧有这样的机会，就过来姑且一试。申志江在科威特安定下来前，曾在俄罗斯做过生意，王素霞也曾在迪拜做过买卖，他们都深觉科威特不似其他地方政治腐败，商场凶险。这里没有苛捐杂税，政府廉洁，商场稳定，生意虽然很难做大，但竞争不至于太激烈，加上这里治安良好，生活有安全感，因此都爱上了这个地方。不过，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很多科威特的商家已经开始直接到中国订货，科威特华人进口商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

        虽然如此，科威特华商仍然不轻言放弃。伊拉克的局势已经趋向和平，重建伊拉克，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而科威特就是进入伊拉克的门户。这就是科威特华商的契机所在。只要守得下去，就会遇上这个契机；只要守住科威特，就能得到伊拉克这个大市场。科威特华商相信，终有一天，科威特会成为繁华商埠。

      科威特的华人是幸运的。有一群降临人间的天使，总会在他们碰上病痛时，适时出现，为他们解困。这群天使，便是科威特的华人护士。虽然只有区区20多名，华人护士却是科威特华人社群里的灵魂人物，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来自港台的护士只有三四名左右。

        1990年，中国政府鼓励劳务输出，于是卫生部搞起护士劳务项目，从全国选派了35名护士到科威特。于玲英是这35名护士里的其中一人，回忆当时的情况，由于选拔后就碰上海湾战争，他们是等到科威特解放后，于1991年9月才到达科威特。当时，科威特黑烟熏天，不利一些慢性病如糖尿病、哮喘病等病人的健康，医院里病人很多，但许多外籍护士都还没回来，护士短缺，所以他们连培训的时间都没有，就直接上岗。那段时间，护士们工作非常紧张，上了早班又要上夜班，而夜班只两名护士，工作量非常大。

        今天，首批来到科威特的中国护士，只剩她一人。不过，此后陆续有许多批中国护士来到科威特，顶峰时期曾达到300多名，可是，他们大部分都在数年后选择到别的国家或回国发展。目前仅剩的20多名华人护士，散布在全国6个行政区不同的医院里。资历较久的护士，除了于玲英，尚有1995年到达科威特的刘芳和1996年到达的臧凤。中国护士在整个科威特护士群体里，还不到1%，他们绝大部分是通过国家派送到科威特的，只有极少数几个如刘芳，是自己来到科威特申请工作的。

        刚到达科威特的华人护士，英语明显比菲律宾、印度籍的护士差，由于面对语言障碍，电话响了不敢接，交班的时候，和其他护士也难以沟通。可是，经过几个月勤学苦练，他们都能克服语言障碍。有些华人护士如臧凤，不但练就了流利英语，还学会阿语。

        虽然语言能力不如其他国籍的护士，但华人护士却赢得科威特社会一致赞赏。阿拉伯人性子急燥，可是，当他们一看到中国护士，态度马上变得很好，不敢乱发脾气。医生对中国护士的态度，和对待印度、菲律宾籍的护士比较起来，也明显特别尊重。

        这是因为中国护士比较逞强，希望各个方面都做到最好，专业水平也最高。也因此，中国护士往往被挑到特殊护理病房去，病人要打针时，也常指定要中国护士代劳。刘芳表示，中国护士少，只要一出错，就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她们更要自强。

        不过，科威特却也不特别热衷聘请中国护士，第一，中国护士英语较差；第二，很多中国护士都把科威特当跳板，英语练好了，培养好了，就跑到欧美国家；第三，中国护士比较认真，医院或上级有什么不对，都会直接反映出来。也因此，在科华人护士的数量，大不如前。

        在科威特华人社群里，华人护士深受大家敬爱。这里看病手续繁冗复杂，医院又分区域和等级，从一个等级的医院转到另一个等级的医院，需要介绍信，因此有时看个病得拖上很久。许多华人英语不好，因此看病时备感困难。华人护士总是尽自己的能力，义务当华人病人的翻译，帮他们处理看病手续、拿报告等，甚至想方设法为经济有困难的华人筹款治病。许多华人一生病，不直接到医院挂号，反而先给护士们打电话。

        这群白衣天使虽不是有钱有势之辈，却是尽了他们的力量，守护科威特的华人。

  和海湾地区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科威特华人无疑更有凝聚力和归属感。而把科威特华人串连起来的，正是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这是科威特唯一的华人社团，比起邻国阿联酋的众多华人社团，在数量上虽较逊色，可是好的社团一个就够了。

        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成立于1997年，是一个由民间和官方共同创立的社团。当时，科威特的华人体育教练碰上一些麻烦，于是请来资深华人董泰康帮他们向大使馆反映困境。经此一事，中国驻科威特大使张志祥意识到科威特需要一个民间华团组织，作为大使馆和在科华人的桥梁，因此提议并协助董泰康成立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

        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创办人董泰康一直担任会长至今。十多年来，该协会办过许多活动，譬如2005年，与景德镇陶瓷工厂合办了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展览会，向科威特介绍中国陶瓷之美；非典、南亚海啸、四川大地震等灾难发生时，发动筹款运动等等。

        每年的春节联欢会更是科威特华社不可或缺的盛事。近年来，春节联欢大会由科威特华华人协会与科威特宗教福利部联合举办，2005年举行时，共有300人出席；到了2007年，人数已增加到600多人，出席人士上至科威特宗教部次官阿迪勒 法莱赫博士、中国驻科威特大使吴久洪，下至中资机构、华人华侨、留学生代表等等，一些当地科威特人士也应邀出席，科威特国王Amir特发贺电祝中国人民幸福。

        不仅出席率逐年升高，春节联欢晚会也办得一年比一年精彩。联欢会现场挂满红灯笼，丝竹之韵夹杂着噼里啪啦的爆竹声，春节气氛非常浓厚，远离亲人与故乡的华人在热闹喧嚣中，重新感受故乡的温暖人情。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文化处曾经在一个晚会现场举办一个以“春节”和“窗花”为主题的展览。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还特地请来新疆杂技团，为嘉宾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演出；而生活在科威特的华人华侨子女以及科威特阿拉伯俱乐部的青少年朋友，则表演了歌曲、中国功夫等节目。当晚的“年夜饭”，是一顿丰盛的饺子宴。晚会结束前还有中科友好关系知识竞赛和幸运抽奖。

        春节联欢晚会获得科威特国家电视台、科威特通讯社、舆论报、消息报等当地媒体报导，说明了这项晚会已经受到当地社会重视。春节联欢晚会除了让平时难得聚首的华人得以共聚一堂，更提高了华人在科威特的知名度，让科威特人得以体验华人春节的喜悦，促进了中科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不过，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成为在科华人心目中一盏明灯的原因，并非这些官方活动，而在于协会会长与理事们对会员私底下的帮助与付出。该协会的理事来自各个领域，包括医护人员与熟悉当地法律的公务员等，举凡华人碰上困难，无论是生病、签证出现问题、遇上法律麻烦等，协会的理事们都会尽量帮忙。十多年来，部分理事足迹走遍了当地警局、监狱、法院及机场，为近600多名华人排难解纷，捍卫着华人在科威特的正当权益，甚至坚持数年为突发车祸而丧身的侨民家属争回应得社会索赔或保险费用。

        除了大型活动，协会也常常举办茶会，有时邀请小型公司的商人们，有时邀请建筑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让有相同背景，相同话题的一群人聚在一起，联络感情，交换生活讯息，认识新来乍到的朋友。这些小小茶会，虽然规模不比大型活动，却实实在在地把散布在各个领域、地方的科威特华人串联起来。

和其他海湾国家的华人社团比较，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显得特别有活力。虽然同样是非移民国家，但因为有了社团积极地把当地华人联系起来，科威特华人的生活，也因此仿如枯燥的沙漠里，多了一股汩汩温泉般，生气盎然。

        除了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IPC（Islam Presentation Committee，伊斯兰教宣传中心）也是一个深为科威特华人熟悉的机构。IPC隶属科威特宗教部，是一个文化交流机构，为各国侨民提供文化咨询，亦开办阿拉伯语文班，免费让侨民学习阿语。除了和华侨华人协会联办春节联欢会，IPC办的活动还包括带工人去郊游等，因为体谅工人收入低，参加郊游的工人甚至还能获得IPC的交通补贴费。IPC有几位中国老师，熟悉法律事务，精通阿语，中国人遇上什么困难，尤其是法律方面的难题，都会向他们求救。多年来，马俊坤、陈道亮这些中国老师，为华人到处奔走，帮工人办工伤保险，深受爱戴。

       在小小的科威特华侨华人群体中，有一群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他们秉承着父辈的优良传统美德，又怀着自己的青春梦想；他们在学校品学兼优、名列前茅，还具有出众特长，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文艺演出。

        他们当中，有优秀少年武术运动员、有朗诵可兰经的最优秀获奖者、有芭蕾舞和民族舞的尖子，更有乐坛的新秀，例如：冯梦竹于2008年，获英国皇家音乐学院8级证书，并连续得到海湾青年音乐大赛木管乐器冠军，现已进入英国大学深造。

        又如：15岁的李飞雪，自幼学弹钢琴，成绩优越。她获得科威特肖邦钢琴比赛第一名、海湾肖邦钢琴比赛第一名、波兰大使特殊奖，科威特宫廷事务大臣特殊证书、阿拉伯金帆船奖、2010年海湾肖邦钢琴大赛总奖，被报界普为中国的金凤凰。她还应邀参加2010年8月在波兰举办的伟大音乐家肖邦诞生两百周年的盛典！而她6岁弟弟李海威，学习钢琴才一年多，就获科威特肖邦钢琴大赛（9岁以下级别）第一名，海湾肖邦钢琴大赛波兰大使特别奖，公评为小神童。

        如果说，有一双手，把散落在各个领域的科威特华人，穿针引线，编织成紧密的一个团体，那么，这一定是董泰康的手。如果说，有一双眼，见证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历史，看尽了华人在科威特的跌宕起伏，那么，这也一定是董泰康的眼睛。

        董泰康是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的创办人与现任会长。早在1985年，董泰康就接受妻子姑父的聘请，到阿联酋阿布达比打理红木家具的生意。1987年，董泰康被调往科威特开拓红木家具的市场。当时，中国的红木家具深受阿拉伯人的欢迎，因此公司赚了不少钱。可是，董泰康看到了科威特庞大的石油、建筑市场，加上本身的大学专业是自动化控制，希望能学以致用，因此，两年后，他和担保人各拿出1万5000美元，组成了一家贸易公司。

        岂料，1990年，公司刚成立不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后，许多商人不敢踏足中东，董泰康却趁着科威特百废待兴的时机，迅速拓展生意，公司从此上了轨道。

        1997年，董泰康成立了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在董泰康积极经营下，该协会成了中东地区最活跃的华人社团之一，为当地华人作出许多贡献。该协会的理事孙亚茹女士表示，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能办得如斯成功，主要是因为领导人董泰康特别热心，该协会办活动，很多时候都由会长一个人掏腰包出经费。“没有董先生的努力，就没有今天的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她说。

        董泰康育有二女。两个女儿都在科威特念中学，并先后到加拿大念大学。目前，一个女儿留在加拿大发展，另一个则到了深圳，只有太太留在科威特陪伴他。

        虽然已经有点年纪，可是，身为Zahra-MAPCO公司董事总经理的董泰康，仍然充满雄心壮志，他期待着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的商机，把他的事业带上另一个高峰。

        酷热的气候，加上文化差异，令许多在海湾国家生活的华人无法适应，因此流动率很高。可是，许多来到科威特的华人，虽然明知道不能入籍，却有长住下来的迹象。

        不管是长居或短住，他们对科威特的怨言，都比其他海湾国家的华人来得少，更能享受异乡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科威特有个很活跃的华人社团，把科威特华人连接在一起；也许是因为科威特健全的社会制度，令外来者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也许，这更是因为，科威特的华人，肯用心去生活，发掘平淡日子里小小的快乐。

      卡塔尔是个从沙特阿拉伯向北延伸至波斯湾的小小半岛，南北全长仅160公里，东西宽80公里。属热带沙漠性气候，夏季酷热干燥，气温高达摄氏50度以上，冬季比较凉爽，最低气温达摄氏7度，年降雨量仅125毫米。

        公元7世纪时，卡塔尔属于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1555年并入奥斯曼帝国，被土耳其统治了200多年。1846年萨尼·本·穆罕默德建立了卡塔尔酋长国。1882年沦为英国保护国，直到1971年9月3日宣布独立。

卡塔尔

卡塔尔曾是个靠渔业和珍珠养殖业支撑全国经济的贫穷小国，直到1940年代发现石油与天然气后，经济才开始起飞，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1995年，埃米尔（酋长）哈马德·本·哈立法·阿勒萨尼发动政变，从父亲手中夺取政权。在他的统治下，卡塔尔开始一系列现代化改革，社会开放，妇权提高，而代表阿拉伯势力与西方抗衡的半岛电视台也随之诞生。他也建立君主立宪制，任命内阁首相。

        为了减少对石油与天然气的依赖，卡塔尔近年致力把首都多哈发展成区域金融之都，又建设科学技术公园，鼓励发展知识经济与商业活动，开始向外国人打开大门，吸引了近5000名华人的到来。可惜卡塔尔的发展始终不及邻国阿联酋迪拜般，举世瞩目。  卡塔尔与中国自汉唐时期就已经有来往。特别是在唐朝时期，两地商贸往来频繁。卡塔尔曾盛产珍珠，多哈则是珍珠的聚散港，当年郑和极有可能是为了取得历史上著名的“湾珠”而来到阿拉伯半岛北岸。

        1988年7月9日，中国和卡塔尔建交。那时卡塔尔仍然未大事发展，市场更暮气沉沉，只有6名中国人在此居留。1995年，在埃米尔哈马德·本·哈立法·阿勒萨尼夺权上位之后，他积极地利用石油及天然气所带来的资金，大力发展国家的基础建设，改革国家的经济，在推动商业活动方面不遗余力。

        然而，快速的城市建设是需要大量劳工的，但卡塔尔国小民寡，所以建筑劳工需从国外大量引进。于是，除了印度人及巴基斯坦人外，华人劳工也开始在卡塔尔出现。

        从1997年到2007年，卡塔尔的华人人数从60人增长至大约5000人，除了大量的建筑工人，也有一些是工程师、空服人员、体育教练等。

        2004年，新加坡积极地发展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政府鼓励之下，许多新加坡公司纷纷在卡塔尔设立了子公司，因此，在卡塔尔的土地上，逐渐出现了大批以华裔为主的新加坡人。

* *卡塔尔的建筑没有门牌。寄信时，所有住宅或商用建筑都用“P.O.Box”。就算某条路在地图上标有路名，路人或司机也不会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因为这里的路名常常改变。所以，告诉出租车司机自己要上哪儿时，最好能说出目的地附近的一个地标，譬如某家大酒店或商场。当地华人邀请朋友到自己家，都必须亲自给朋友带路一次，以后朋友才能告诉出租车司机怎么走，不然很难找到。*

      虽说卡塔尔有约5000名华人，可是，要发现华人的身影，不是件易事。主要是因为占了这数据绝大比例的建筑劳工，日常多呆在工地里，鲜少到街上走动。而这5000人的数据，也只是当地华人的粗略统计。上千名华人劳工随着工程的开展而来，亦将随着工程结束而离去。因此，人数的起落颇大，往往在数个月间相差好几千人。

        近年卡塔尔加速经济与城市建设，世界各地的华裔理工精英，如工程师及建筑师等，也纷纷被卡塔尔提供的高薪优职吸引而来。此外，卡塔尔的华人还包括商人、餐饮业者、空服员、技术工人等。

        外来者占了卡塔尔人口结构很大的比重。据统计，未来两三年内，移居到卡塔尔的家庭数量将达到20万户，至2012年，这个数字预料将攀升至50万户。为了吸引更多人到此就业，卡塔尔法律允许持有工作准证的人把家人都申请到卡塔尔来住；一家人不但可以到移民局申请身份证，获取健保卡，考取驾驶执照，还能把孩子送到学校念书。可是，外国人无论在卡塔尔住上多久，即使是在卡塔尔出生的孩子，都很难成为卡塔尔公民。换句话说，卡塔尔欢迎外国人，却不接纳外国人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卡塔尔原是个贫困落后的沙漠国家，完全引不起华人的兴趣。十几年前、卡塔尔政府几近破产，虽然天然气储存量居世界第三位，却必须向他国贷款才能开采。直到2000年，卡塔尔掌握液化天然气技术后，经济腾飞，成了暴富国家，才开始引起华人注意。根据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的资料，2007年卡塔尔的人均收入已达7万2795美元，位居世界第五。而卡塔尔现任埃米尔也有意走迪拜的路子，积极发展金融业。在两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中，阿联酋暂时占尽上风，成为全球瞩目的钻石，形成华人大量涌进阿联酋的局面。

        然而，也有小部分华商，看准卡塔尔庞大的消费潜力，市场竞争不似迪拜般激烈，虽然人口少市场小，但市场还未被过度开发，进入市场的门槛较低，比较容易生存，因而到此寻求商机。

        中国金信商店的老板张胜育就是一例。7年前，他来到卡塔尔做起百货批发贸易，从2002年到2003年，他在多哈连续开了4间店，生意扩展得很快。今天，他已经是卡塔尔规模最大的华人贸易商，产品以服装为主。

        卡塔尔店租近年涨幅惊人，而且由于房屋短缺，要找间店面也难，因此，像张胜育一样有店面的华商，只有3人。其他的华商，多数都是近期才从迪拜过来碰运气、探市场的。没有根据地，他们就在街头兜售；这些华商来来去去，流动量很大，难以计算。

        卡塔尔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做生意不必缴税，入口货物报关方便，只要无知识产权问题，一般不会有什么麻烦。没有复杂的报账程序，做生意变得很简单，连会计都不必请，任何收入支出，只要抄一抄自己明白就好了。

   华商的货一般都批给在附近做生意的印度人、孟加拉人、索马里人。可惜的是，卡塔尔市场有限，吞吐量不够，不能把生意做大。像张胜育一样一年营业额达到1000万人民币以上，利润有100至200万人民币的华人小型企业，在卡塔尔并不多见。

        在这里经商，最叫华商头痛的，还是卡塔尔的担保人制度。卡塔尔法律规定，外国人在当地开公司必须有卡塔尔人做担保，而且担保人必须持有至少51%的股份。为了开公司，许多华商于是和卡塔尔人签下协议，生意由他们完全出资、操作、卡塔尔人只需挂名，赚来的利润大家分享。此外，当地的经营审批、租房、引进劳工、办理驾驶执照、开通电话或有线电视、个人离境等一切活动，都需要一个卡塔尔人做担保签字。因此，

        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担保人，成了华商生意能否成功的关键。

        由于卡塔尔人在法律上占有51%的权益，加上卡塔尔法律完全偏袒当地人，要是双方闹翻，最终吃亏的只会是华商，而且大有可能连血本都要不回来。尽管卡塔尔人恶意欺诈的情形并不多，这种担保人制度还是令华商不安，尤其小型华商，更不敢在此地做大手笔的投资。

        囿于市场发展空间，再加上对外来投资者不利的担保人制度，华商皆无长期在卡塔尔发展的打算。卡塔尔，只是他们的一个跳板，许多华商坦承，他们都在其他国家找着投资的机会，就连已在卡塔尔基础稳固的张胜育也不例外。

  卡塔尔热衷体育。国土虽小，卡国的足球队却足以和中国队抗衡，十几年来，多次成了中国进军世界杯的绊脚石。确定承办2006年亚运会后，为了在亚运会上吐气扬眉，卡塔尔更是重点发展体育运动，重金礼聘外籍运动员和教练加盟。

        身高体健的非洲裔球员最受卡塔尔足球队青睐。而经验丰富的中国籍体育教练，则是卡塔尔体育局频频招手的对象。目前，卡塔尔共有11名中国籍体育教练，排球教练占了4名，乒乓教练占了6名，还有一名是射箭教练。其中两名最资深的中国体育教练，分别是排球教练虞重华和射箭教练李玲娟。

        61岁的虞重华在卡塔尔当排球教练已经11年，是体育总局公派卡塔尔的援外教练，目前在阿赫里排球俱乐部当技术指导。2006年，阿赫量俱乐部在虞教练的率领下，获得卡塔尔全国联赛第3名，这也是该俱乐部历来最好成绩，唯虞重华谦虚表示成绩仍可更好，可惜俱乐部给的资金有限，很多训练方案难以实施。

        虞重华在卡塔尔生活多年，为人热心，俨然成了当地华人心目中的侨领。许多初到卡塔尔的华人，都受过他的照顾。其实，虞重华早萌去意，只是每次合约期满，都受到盛情挽留，只好一年又一年地留了下来。

        在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代表中国拿下射箭银牌的李玲娟，则是卡塔尔体育界的彗星。卡塔尔近年才开放让女性受教育，很多女孩长到20多岁了，还是很少出门，甚至一生只去过四五次购物商场。卡塔尔申办亚运成功后，有意成立一支女子射箭队，于是，大力宣传体育，鼓励家长把孩子送进国家队训练，因此那些少女们才有了接受体育训练的机会。

        2002年，李玲娟受聘来到多哈后，一手创立了卡塔尔第一支女子射箭队。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卡塔尔射箭女队一举拿下团体铜牌。翌年，在开罗的泛阿拉伯运动会上，卡塔尔射箭女队又获得金牌，举国欢腾。由于卡塔尔射箭女队没有专业选手，队员多是学生、护士、教师，只在下班后训练两个小时，能在亚运会得到如此成绩已算难能可贵。

        回忆起刚开始训练这些女孩的情形，李玲娟笑说，一点也不容易。男孩子好胜，训练时还比较认真；女孩子却把训练场当成玩乐的地方，爱来就来，不爱来就不来，令她很头痛。不过，李玲娟敬业乐业，以身作则，渐渐赢得队员的尊敬。

        卡塔尔并非华人体育教练的热门选择。除了虞重华和李玲娟，因为成绩特别杰出，又和当地社会相处得不错，屡次受到热切挽留才在此工作多年之外，多数教练都和在其他领域工作的华人一样，少则两年，多则四五年，很少人愿意长留。

        在卡塔尔当体育教练，不如在中国风光。在这里，体育教练被视为工作人员，在训练场上权利不大。卡塔尔想怎么处置国家队，教练无权过问。各国教练的待遇又不平等，来自欧美的特别受尊敬，待遇工资特别高；东欧与中国的教练同一个档次，菲律宾教练的待遇更差。卡塔尔体坛完全不是看成绩，而是视国籍来决定待遇，这令许多中国籍教练心灰意冷。

        无论如何，中国籍教练对卡塔尔的贡献，还是慢慢受到了认可。卡塔尔奥林匹克委员会体育部主任哈利勒·伊卜拉欣·贾巴尔给予中国体育教练高度评价：”中国教练的教学水平有目共睹，他们为卡塔尔奥林匹克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卡塔尔航空近年开始意识到华人市场的重要性，因此频频在中、港、台、新等地招募懂华语的空服员。如今，卡塔尔的华人空服员已达200多人。这些年轻华人男女都是大学毕业生，时尚漂亮，在卡塔尔自成一个群体。

        卡航空服员首两年的基本月薪加上其他津贴，约有1500至1800美金，视航班多寡而定。在消费高昂的卡塔尔居住，这样的收入不算太高，不过，因为税务全免，加上住房、水电、来回机场的交通都是免费的，收入还算颇有余裕。

        他们热爱工作，喜欢飞行生涯，可是卡塔尔这个地方，对这些年轻男女来说，实在太无聊了。“台湾或香港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每一天都发生很多事，见了很多人。可是，在卡塔尔，每一个人都可以三言两语就把每天的生活交待完毕。”来自台湾的刘瀞璘说。

        没有飞行时，他们在宿舍里自己做饭，上网聊天，很少出门。这里交通很不方便，不但出租车难截，车费也很贵。在外头吃饭，消费一样高昂，且不合胃口。他们也很少到中餐厅用餐，中餐厅为了配合中东人，味道都变样了。问10个卡航的空服员，他们最喜欢到卡塔尔哪个地方玩，10个都会面有难色，想半天才答：“自己的房间。”

        在卡塔尔，空服员住在不同的宿舍，飞机航班表各不相同，很难碰在一起。他们也很少和当地人交上朋友。一些中东人对华人不太尊重，并且存有错误观念，一看到华人女子，就趋前“问价钱”，把他们当成妓女，更放肆的，甚至还会对他们“动手动脚”，台湾空服员郭秀娟就曾被一名中东男人跟到家门口，还企图伸手抓她，吓得她掉头就跑。不只女生，男性空服员被性骚扰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有的空服员一坐上车子，司机的手就放到了他们的大腿上。

        许多港、台华人空服员，工作满两年就离职。进入卡航时，空服员签的都是3年合约。工作首两年，卡航每个月都会扣押他们一部分薪水，直到做满两年，才一次过发回给他们。这也意味着，两年后这张合约就没有约束力了，因此空服员都选择此时离开。愿意在此呆上两年，只是为了拿回全部薪水，由此可见他们多渴望离开卡塔尔。

        沉闷的生活，令许多卡航空服员热衷写起部落格。今天，网络上留下了许多这些空服员的生活印记。这群年轻人的部落格，仿佛沙漠里掠过的微风，掀开了中东世界神秘面纱的一角，使广大网友得以一窥华人在多哈的生活实况。

   如果说，卡塔尔有哪一群华人是较为快乐的，那一定是新加坡华人。

        据卡塔尔新加坡社交组织“Red Dotters”估计，来到卡塔尔工作的新加坡人约有400多名。他们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月薪至少有2万至2万5000里亚尔，月薪高达五六万里亚尔的也不少，生活优渥。他们主要分布在工程领域，土木工程师占最多，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师也不少。当中，华人占了80%以上。由于人数众多，加上生活背景接近，新加坡人自成一个圈子，相处得很融洽。

        五六年前，卡塔尔的新加坡人其实也不多。2004年，新加坡积极和中东国家建立经贸合作，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率团访问卡塔尔开拓商机，并探讨签署自贸协定。李显龙总理也随后和卡塔尔酋长哈马德、首相阿都拉会晤，签订避免双重课税等3项协定。在新加坡政府的鼓励下，新加坡公司纷纷前往卡塔尔设立子公司，做为进军中东的基地。

        2005年可说是新加坡人在卡塔尔的分水岭。此前，赴卡工作的新加坡人不多，而且大部分都是被卡塔尔公司聘请过来的。2005年后，新加坡公司纷纷涌现，新加坡人人数激增，新加坡总公司外派过来的员工成了主流，占了80%至90%。

        被卡塔尔公司聘请的新加坡人，除了丰厚的薪金和福利外，通常还可获得家庭配套，把配偶、孩子接到卡塔尔生活，所有费用由公司承担，包括孩子的教育费。而被新加坡公司外派到卡塔尔的，通常都是只身前来。不过，他们的待遇也不差。由于愿意远赴卡塔尔工作的新加坡人不多，一般上，愿意来的，都能获得加薪50%以上，还不包括汽车与房屋津贴。不过，对他们来说，接受调派卡塔尔最大的动机，还在于出国工作的经验，对工作履历很有帮助。

        无论有家人陪伴，或是只身前来，新加坡华人在卡塔尔的日子，一般都过得相当惬意。这里的工作压力没有新加坡那么大，上班时间一般为早上七八点至下午三四点，很少加班，而且，也不必像在新加坡一样，每天把大量时间花在塞车或地铁上。周末时，不必奔忙于亲戚朋友间的应酬，可以静下心来和家人度过悠闲的一天，或是参加派对，好好享受异乡生活。

        当然，工作上的烦恼与冲突，还是免不了。中东的企业文化和新加坡很不一样，新加坡总部依循新加坡效率制订的工作进度表，卡塔尔往往赶不上，令总部大发雷霆。可是，卡塔尔子公司又不予配合，在卡塔尔的新加坡人，就成了两地文化差异的夹心饼。

        新加坡人也不满中东国家种族歧视的现象。在卡塔尔，欧美人和阿拉伯人备受尊重，亚洲人遭到歧视。有些场合如娱乐场所，明文规定亚洲人不许入内。商场或海滨公路办起家庭日时，也规定亚洲人，尤其是亚洲单身男子，不准入内，阿拉伯或欧美单身男子入内却没有问题。对重视平等的新加坡人来说，这种堂而皇之的种族歧视，令他们难以忍受。

        在卡塔尔，来自新加坡的高薪上班族得以过上一段优游自在的日子。可是，他们心里明白，这里只是他们生命里的一个驿站。两年，是一般新加坡人给自己的期限。

* *多哈中餐厅近年欣欣向荣。北京饭店与长城饭店是多哈的老字号，北京饭店在卡塔尔历史最悠久，于1998年3月开张，老板丁学超是巴林国王的医生。另外，开在Villaggio的香锅饭店和开在City Center的上海花园，则显示着中餐厅已经进驻高级购物商场，成了时髦的选择*。
* 在卡塔尔工作的新加坡人成立了一个社交组织，这个组织，就叫Red Dotters。Red Dotters成立于2006年新加坡国庆日当天。同年11月，新加坡总理到访卡塔尔，为Red Dotters主持了正式的开幕仪式。当时，卡塔尔连新加坡领事馆都没有，Red Dotters在有心人的推动下，应运而生，让新加坡人认识彼此，互相帮助。刚抵达卡塔尔的新加坡人，只要和Red Dotters联系上，该组织都会带他们到各部门办理居留证等证件、考取驾照等等。后来，新加坡领事馆成立了，Red Dotters就成了纯粹社交联谊的组织。
* Red Dotters经常举办一些周末聚餐、节日聚会、打保龄球、出海钓鱼等活动，甚至还办过瑜伽课，请一名修习瑜伽多年的会员给其他会员免费授课。每逢农历新年及圣诞等节日，策划一个大型派对更是不可少的节目。
* 目前，正式注册成为Red Dotters会员的新加坡人共有200多名。Red Dotters的现任会长曾春生，也是该会创办人之一。他指出，Red Dotters的管理层，正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很多人告诉他，Red Dotters要是有活动，他们愿意从旁协助，可是，却没人愿意担任主席、财政、秘书等职。也因此，从创会至今，几个会职，都是由他们人轮流担当。这除了是新加坡人个性低调使然，也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工作之外，给自己平添更多责任。
* 在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占了近四成人口的卡塔尔生活，华人显得格外孤独。除了劳工之外，华人分散在各处，联系不多，生活低调而平静，虽然偶尔也会和其他华人朋友聚在一起，聊聊天、打打牌，但基本上，都过着各自的生活，没有形成明显的华人社区。大家抱着过客的心态，凑合着过日子，只等时间一到就走。
* 华人会否在这片土地开出繁盛的枝叶，华人又将在这片沙漠写下怎样的历史篇章，
* 全看卡塔尔以后的发展和政策，是否能留住更多华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部，除了赫赫有名的迪拜（Dubai），尚有阿布扎比（Abu Dhabi）、沙迦（Sharjah）、哈伊马角（Ras al-Khaimah）、阿吉曼（Ajman）、乌姆盖万（Umm al-Quwain）、富吉拉（Fujairah），共7个酋长部落。阿联酋境内除最东部为哈贾尔山地外，其余多为低平沙漠，属热带沙漠气候，年降雨量仅75毫米左右，夏季气温高达40至50℃。天然环境虽然恶劣，阿联酋却盛产石油，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

* 公元7世纪时，此区域属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16世纪，殖民主义抬头，波斯湾各小国迭遭葡萄牙、法国、荷兰等国相继入侵。19世纪初英国人开始侵入波斯湾，各酋长国逐步沦为英国的保护国，直到1971年，它们才摆脱英国统治，6个酋长部落组成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翌年，哈伊马角加入，形成今天的阵容。
* 各酋长国保持相对独立性，在经济、司法、行政和外交上有一定自主权，但7个酋长国之间可自由往来，无需签证。石油产量最丰的阿布扎比是阿联酋的首都，迪拜是享誉世界的国际贸易城市，沙迦则被定位为穆斯林宗教与文化城市。联邦经费主要由阿布扎比和迪拜两个酋长国承担，阿联酋境内的华人也多集中在这两个酋长国。
* 远在汉代时期，西域都护府名将班超就曾经派遣副将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并且途经波斯湾地区。那时，波斯湾地区已经有不少商埠，包括迪拜与豪尔费坎（Khor Fakkan，即今日的沙迦）等。在哈伊马角城北的沿海地区，还曾经挖掘出聚勒法尔城的遗址。自十世纪开始，这座城即与东亚地区有商贸往来，而且一直持续到17世纪。聚勒法尔城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即可证明当时已有很多人来往于中国与阿拉伯之间。可惜的是，17世纪后，两国之间却再无交往。一直到了1984年，中国与阿联酋才正式有建交关系。
* 之后，中国在海湾地区设立不少以工程为主的中资机构。直至90年代，在阿联酋已大约有十多家小型华资贸易公司，其中较早进驻阿联酋并取得成功的是台湾厂商。台湾的宏基电脑公司于1992年在迪拜的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Jebel Ali Free Zone）建立装配厂及发货中心，两年后，该公司的营业额即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市场占有率在多个海湾国家中排第一。1995年，台湾的神脑无线电公司也在阿联酋成立分公司。但是，这时候阿联酋华人还不足100名。
* 那时，阿联酋已凭着石油而暴富，但却缺乏物产，大部分商品只能依赖进口。按理说，这段时期本该是商人们最佳的进场时机，可是，由于当时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战争导致中东局势极度不明朗，加上阿联酋又具有十分浓厚的保守宗教色彩，以致态度谨慎的华人存有疑虑，结果错失了这段黄金时期。
* 90年代末，迪拜酋长穆罕默德·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ad Maktoum）开始积极地把迪拜提升为中东地区的商业、文化、旅游和金融中心，大刀阔斧地建设迪拜，并提供外资许多优惠。
* 从1998到2002年，迪拜的中资机构激增至100家以上，单是拥有居留签证的中国人就多达两万人。
* 最先到阿联酋做生意的是福建人及浙江人。他们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在阿联酋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基。台州和温州商人尤其众多，在商场上甚具影响力。温州人初到迪拜之时，大多数都从事皮鞋和服装业。到了今天，他们的身影已经遍布房地产、机械设备、五金工具等领域，可说在温州有的行业，在迪拜也几乎都有了。
* 上海人则大部分从事零售业，早期在迪拜沿街兜售手表或墨镜等小商品的，多数便是他们。至于东北人，就以从事餐饮业为主。不过，由于少数害群之马在此从事诸如当蛇头等非法勾当，以致阿联酋对东北人的入境管理比较严格。
* 近几年来，阿联酋华人增长率更是惊人，保守估计已经超过16万。在历史上，很少国家能像阿联酋这般，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吸引了那么多的华人。而且，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端。
* 远在汉代时期，西域都护府名将班超就曾经派遣副将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并且途经波斯湾地区。那时，波斯湾地区已经有不少商埠，包括迪拜与豪尔费坎（Khor Fakkan，即今日的沙迦）等。在哈伊马角城北的沿海地区，还曾经挖掘出聚勒法尔城的遗址。自十世纪开始，这座城即与东亚地区有商贸往来，而且一直持续到17世纪。聚勒法尔城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即可证明当时已有很多人来往于中国与阿拉伯之间。可惜的是，17世纪后，两国之间却再无交往。一直到了1984年，中国与阿联酋才正式有建交关系。
* 之后，中国在海湾地区设立不少以工程为主的中资机构。直至90年代，在阿联酋已大约有十多家小型华资贸易公司，其中较早进驻阿联酋并取得成功的是台湾厂商。台湾的宏基电脑公司于1992年在迪拜的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Jebel Ali Free Zone）建立装配厂及发货中心，两年后，该公司的营业额即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市场占有率在多个海湾国家中排第一。1995年，台湾的神脑无线电公司也在阿联酋成立分公司。但是，这时候阿联酋华人还不足100名。
* 那时，阿联酋已凭着石油而暴富，但却缺乏物产，大部分商品只能依赖进口。按理说，这段时期本该是商人们最佳的进场时机，可是，由于当时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战争导致中东局势极度不明朗，加上阿联酋又具有十分浓厚的保守宗教色彩，以致态度谨慎的华人存有疑虑，结果错失了这段黄金时期。
* 90年代末，迪拜酋长穆罕默德·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ad Maktoum）开始积极地把迪拜提升为中东地区的商业、文化、旅游和金融中心，大刀阔斧地建设迪拜，并提供外资许多优惠。
* 从1998到2002年，迪拜的中资机构激增至100家以上，单是拥有居留签证的中国人就多达两万人。
* 最先到阿联酋做生意的是福建人及浙江人。他们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在阿联酋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基。台州和温州商人尤其众多，在商场上甚具影响力。温州人初到迪拜之时，大多数都从事皮鞋和服装业。到了今天，他们的身影已经遍布房地产、机械设备、五金工具等领域，可说在温州有的行业，在迪拜也几乎都有了。
* 上海人则大部分从事零售业，早期在迪拜沿街兜售手表或墨镜等小商品的，多数便是他们。至于东北人，就以从事餐饮业为主。不过，由于少数害群之马在此从事诸如当蛇头等非法勾当，以致阿联酋对东北人的入境管理比较严格。
* 近几年来，阿联酋华人增长率更是惊人，保守估计已经超过16万。在历史上，很少国家能像阿联酋这般，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吸引了那么多的华人。而且，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端。
* 阿联酋可谓近代华人人口膨胀得最快的国家。全球华人工程师及其他专业精英，纷纷被丰厚的薪水和优渥的福利吸引而来。而数以万计的华商，更被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巨大的商机吸引，前仆后继到此拓展业务。
* 大部分的华商集中于迪拜的德拉（Deira），从事批发贸易，纺织品、生活用品、建筑材料、汽车配件等。夫妻或几名合伙人组成的迷你型企业，成了德拉批发市场独特的商业景观。这里的华商主要来自浙江、上海、福建、江苏、广东、新疆及东北三省。除了批发贸易，也不乏华商从事零售业、旅游业及饮食业。
* 阿联酋虽然投资政策开放，对移民问题却很保守。非阿拉伯人要拿到阿联酋的公民权，非常困难。也因此，这里的华人，犹如匆匆过境的候鸟，只想赚够就走，很少人在此建立家园。
* 阿联酋的迪拜，是现代华人心目中的“金矿”。华商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只要脑子没问题，到迪拜做生意，准能发达。”近20年来，迪拜在酋长谢赫穆罕默德·马克图姆致力打造下，成了整个中东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而迪拜能如一颗超级磁石般，把华商吸引到阿联酋，不是没有原因的。
* 首先，阿联酋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中东、南亚、非洲、欧洲之间的心脏地带，迪拜的拉昔（Rashid）港和杰贝阿里（Jebel Ali）港被超过125条世界主要海运航线列入站点，运输方便，有利国际贸易发展。再者，迪拜是个名副其实的免税天堂，公司和个人所得税全免。贸易商进口一般商品，只征收5%的关税。至于在此设厂的生产商，进口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时，不必缴关税，出口商品亦同样免关税。
* 迪拜的经济政策非常自由，资金的流入与流出没有限制，这也表明，华人企业的资本和所获利润可随时汇回本国。而且，政府部门廉洁，贪污、商业欺诈等问题比较少。
* 迪拜也是充分国际化与现代化的城市，公路、电信网络等各种基础设施水平很高，世界各大银行都可在阿联酋找到，大型展览中心等种种设备提供了优良的商业环境。此外，阿联酋出入境方便，办理签证容易，尤其对大陆华人入境的审核，不像欧美般严苛。这也自然造成华人把阿联酋视为拓展公司业务的最佳据点。
* 迪拜港（Dubai Creek）以东的一个老城区——德拉，历来就是中东知名的批发市场。在华人进入这个市场之前，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早已在此经营买卖，势力稳固如老树盘根。华人近十年才进入市场，可是，走在德拉的下城区，不难发现华人也已占一席之地。穆沙拉大街上，“中国贸易城”5个字老远就可以看到。中国贸易城隔壁还有一座中国轻工城，再加上邻近的志远鞋城，形成了一个全华商的批发市场。这片市场背后的推手，就是温州商会会长陈志远。
* 除了商场，整个德拉的大街、巷弄里，都有不少华商夹杂其中，尤其木须巴扎市场以及纳莎广场附近，更是华商集中地，挂着红灯笼的小店到处可见。夫妻小店成了整个德拉贸易市场的主调。别看这些店铺面积小小，一间不到20平方公尺的小店，一年租金至少要16万迪拉姆。不过，木须巴扎是个远近驰名的老市场，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者都汇聚在此，一个月要达到100万迪拉姆的营业额并不困难。
* 华商的涌现，难免对当地的劳工就业市场以及贸易市场造成冲击。中国产品也逐渐取代了印度、巴基斯坦产品的位置。华人人数虽然不如南亚人，但华人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勿庸置疑。
* 迪拜淘金的热潮方兴未艾，可是，每一名受访华商皆异口同声表示，进场的黄金时机已过去了。“竞争太激烈了，生意越来越难做啊。”他们纷纷摇头感慨。
* 90年代初，迪拜华商不足100家，中国商品奇货可居，利润可达成本一倍以上。可是，这两年来，华商大量涌进迪拜，引发激烈削价战，中国商品的利润往往只剩下3%至5%。而实力雄厚的企业，为了垄断市场，甚至在短期内亏本卖货，以把对手逼出市场的做法，也时有所闻。在迪拜，商场成了名符其实的残酷战场，“这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地方，没有实力的企业，还是不要进来。”迪拜华商说。
* 高昂的营运成本也使华商压力越来越大。来自温州的许佩佩和丈夫张荣在木须巴扎批发牛仔裤，因为租金涨得太厉害，3年间，他们搬了又搬，一直寻找着便宜的地方。像许佩佩那间仅跨几步就能走完的小店铺，一年租金就高达18万迪拉姆。仓库费、住所等，又是另一笔庞大费用。根据《绿洲报》报导，2008年迪拜一间两室的公寓，平均年租金为12万，比过去一年涨了50%，涨幅惊人。

         阿联酋华人主要是商人。可是，到此谋职的华人也为数不少。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在7个酋长部落中石油产量最丰，石油工业最集中，许多华人白领精英在此从事石化工作。而迪拜是中东区的金融与商业中心，自然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年轻华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能说流利英语，并且都是相关领域的杰出人才。

         迪拜可说是一个大工地。4座世界最大的人造岛（朱美拉棕榈岛、杰贝阿里棕榈岛、德拉棕榈岛、世界群岛），耗资40亿、占地460万平方公里的运动城，建在海底的酒店，高度已经超过688公尺并且还在继续往上建的世界最高楼迪拜塔，高科技智能大楼The Pad，都在如火如茶地建筑中。

         除了这些举世瞩目的建筑项目，全城各处都在发展新的商业区、住宅区，可谓到处有建筑工程。这波建筑热潮预料会持续多十年，目前迪拜的人力市场中，需求最殷切的当属建筑师、工程师。除此之外，华人子弟的身影还出现在金融业、电信业等各个领域。他们的月薪高达三千至两万美金，还可获住房、车子津贴等优厚福利。

         另外，由于阿联酋的华商与华人旅客直线上升，成了阿联酋酒店的十大客源国之一，阿联酋的酒店与餐厅乐于聘请华人当服务员。全世界最奢华的七星级帆船酒店的中国籍员工，就高达10%至20%。

         此外，许多酒店与餐厅集团，也和中国旅游学院合作，录取中国学生到阿联酋实习。董云菲与丁文婧是来自山东旅游职业学校的大专生，阿联酋朱美拉集团（帆船酒店与Al Qasar Hotel等，都是该集团旗下的酒店）与该校有实习生课程合作。每年，朱美拉集团都会派人到中国面试学生，甄选出十来名赴阿联酋。

         被选中的学生等于是酒店的正式职员，可以一直在酒店工作下去。可是，新一代的中国学生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知道，只要有了一纸文凭，再加上在朱美拉集团工作的资历，他们可以轻易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找到好工作，直接进入管理层，因此，绝大部分学生都会在实习结束后，回到中国。

         在这些大酒店当最低层的员工，一个月薪水有1000迪拉姆。有趣的是，懂得中文的学生，还可得到每个月300迪拉姆的语言津贴。迪拜的星级酒店，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国的人才，“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不同国家的人，第一次接触到国际化的工作环境，并学习先进的酒店与餐饮业管理系统。这经验太宝贵了。”董云菲说。

         她初到迪拜时，英文不好，无法和人沟通，非常寂寞，再加上工作辛苦，有几度很想放弃。可是，坚持下去后，她发现自己英文进步了，眼界开阔了，人也成长了。

* *阿联酋另一酋长国沙迦，距离德拉只有20公里，公寓租金却只有迪拜的1/3，因此一些把店铺开在迪拜的华商，都住在沙迦，每天两地来回。近年也有华商开始在沙迦开拓市场。这里的家具、建材市场，本来多由印度人经营，中国人来了之后，看到印度人卖的都是中国货，还那么好赚，于是也纷纷到这里开店，令沙迦成了远近驰名的家具、建材市场。还有一名温州人魏建亮租下沙迦Rolla Mall二楼走道，设立柜台售卖电子产品，令该购物中心成了颇有名气的中国香港科技数码城。*
* 和所有高速发展中的国家一样，阿联酋贫富悬殊严重。迪拜是富人的天堂，却也是贫者的地狱。
* 一条迪拜港，把华人分成两个世界。迪拜港以西的朱美拉（Jumcirah），是所有国际大企业的所在。这是一块新开发的地方，马路宽敞，现代化大楼林立。
* 在这里，生活节奏不像其他国际大城市股紧凑，人们可以享受一切物质所能带来的快乐，大量国际时尚品牌在此汇集，从名牌服饰到名牌家具，应有尽有。Mall of Emirates、Ibn Battuta Mall这些购物广场几乎可以满足所有人的购物欲望。除了猪肉，他们可尝到世界各国的高级美食，还可以到各大酒店的舞厅、酒吧饮酒作乐，气氛不亚于其他国际大城市。这里的迪拜，是个享受人生的地方。
* 迪拜港以东，也就是华商云集的德拉区，和朱美拉形成强烈的对比。这里发展较早，建筑物非常密集，市内交通堵塞严重，夏天空气粘滞闷热，除了一些正宗的中餐厅能吸引白领华人偶尔光顾，就没有其他吸引人的地方了。“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我不会踏足德拉。”一名在跨国企业工作，领着月薪数万迪拉姆的中国籍人士说。
* 德拉的华商们，抱着淘金心态，勤奋地工作，刻苦地过日子。在这边苦个数年不要紧，最重要是能尽量多赚，回国后再过好日子，是当地华商的普遍心态。由于迪拜消费高昂，他们平时也不太舍得花钱。
* 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少享受可言。以在伊朗市场从事眼镜批发的罗丁海与张淑卿夫妇为例，他们下班时已是晚上9点多，回到沙迦的公寓，夫妇俩一起做饭，11点左右才能吃上晚餐，第二天9点又要准时开店。至于午饭，也都是自己准备的便当。

     在中国贸易城附近开上海超市的白大婶，虽然年纪颇大，可是，为了帮女儿看管超市，一样过着早出晚归的生活。白大婶每天7点多就得起床准备开店，然后一整天守在小小一家便利店里，直到晚上11点多关店。回家后一家人一起做饭，晚饭吃完，一般已经是凌晨2点了。  德拉市场的老板，总算还有自己的一套公寓，而德拉市场的打工仔，则住在称为“大家”的廉价宿舍。这种公寓一般有三四间房，每间房住上7至12人，这类室内充满油烟味、汗酸味的公寓，一个床位，月租也要700迪拉姆。不过，艰苦的环境并没有击垮年轻华人，他们把这视为磨练，并且尽量保持乐观，住在“大家”的林元说：“中国人算不错了，印巴人还要睡马路！”

         阿联酋还有一些活在社会边缘的民工。由于整个迪拜市到处都是建筑工程，因此这里也涌现了大批华人建筑工人。沙漠夏季气温高达40至50度，在这里铺路盖房，宛如在烤箱里工作，如果忘记戴手套，一接触到金属，皮肤马上被烫出水泡。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周末还要加班。有人形容，这些华工是“住在‘集中营’，吃的食物连狗食都不如”。恶劣的生活条件，犹如现代版的“卖猪仔”。

         工人被中介公司欺诈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据一名在工地当管工的中国人透露，当初他来迪拜时，中介公司告诉他两年能赚十万迪拉姆，但他只拿了6万迪拉姆，那还是主管级的薪水，技术工人薪水更低。再加上这一两年中国汇率升高，兑换后他们赚的钱无形中变得更少。华工也没有获得医疗福利的保障，该名管工患肾结石，却因医疗费用太高无法就医，只好痛到无法忍时才自己掏腰包到医院打一支上百美金的止痛针。生活没保障，环境不好，消费又高，不少华工情愿回国工作。

         问他们为何不一走了之，他们说护照被中介公司扣着，哪里都去不了。该名主管申请回国就医，却不获上级批准。据了解，在阿联酋，扣押工人护照属于违法行为，可惜，因为大部分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不了解自己的权益，只好任人欺凌。

         这些华工是被遗忘的一群。曾在迪拜工作的白领华人陈裴瑶说，他有时在街上看见这些民工，只觉他们犹如动物般，一脸木然。他们出现在迪拜每个角落，却又仿佛是隐形的一群。今天，迪拜在向世界夸耀他们最耀眼的建筑奇迹时，这些华工的血汗，实在不容忽视。

         另外，华人性工作者也在阿联西悄悄滋长。许多中国劳务公司为谋私利，对迪拜作出不实宣传，宣称这里工作机会多，报酬高。交了大笔中介费来到迪拜的中国女性，却完全找不到工作。为了出国，她们已经欠下大笔债务，不能就此回国。许多人迫于无奈，只好卖身。由于华人性工作者的数量，在阿联酋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对当地华人的形象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开始引起当地华社的关注。

* *阿联酋阿吉曼聚集了许多跑展览会的华商。他们在展览会摆小档位，哪里有展览会，他们便往哪里跑。选择阿吉曼落脚，是因为那里房租便宜，他们租了楼房，既可住人，又可放货。*

    阿联酋华人多，华人社团更多。这些社团多是地缘性商会，譬如温州商会、台州商会、河北商会、徐州商会、义乌金华同乡会等等，此外，在龙城营业的商家也组成了龙城商会。大大小小的商会多不胜数，可惜除了少数商会外，多数商会并不活跃。

         华人在阿联酋历史尚浅，而且，不同于其他移民国家，华人并没打算在此长留。许多长袖善舞的华商，找了几名志同道合的同乡，就办起一个社团，联络乡谊，开拓商机。不过，既然只是过客，搞起社团也就不太认真，缺乏长远规划。商会成立之后，只是联谊吃饭，接待外宾。由于社团注册手续非常繁琐，又要每年更新执照，因此，很多社团甚至没有注册。由于这些小商会并没搞什么大集会，因此倒也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

         目前，阿联酋办得最出色的商会，当属温州商会与台州商会，此外，中国商会虽然不如以前活跃，却也相当有名。温州人最早到达迪拜，人数也最多，约有一万名。有鉴于温商多是中年人，外语不好，又不熟悉当地文化，做生意常碰到困难，温州商人陈志远于是萌生了创立商会的念头。2004年，温州商会正式成立，陈志远出任会长至今。当

         商会成员和当地政府发生纠纷，或当同行间互相杀价，产生矛盾时，商会都会介入调停。

与其他国家的商会相比，阿联酋华人的商会力量小，结构也松散得多。当地华商最迫切需要的，也许是一个强势的商会，规范华商的市场行为，通过价格约束、品牌塑造等方面，提升华商的地位，并把华商团结在一起，争取华商在阿联酋的权益。

         除了商会，迪拜尚有一家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对当地华社贡献很大。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是一家非营利民间组织，由TT特快汇款的老板何家财出资成立。社区中心每星期五都有一个免费让会员参加的英语沙龙，协助会员提升英语能力。此外，社区中心还开办了收费的阿语和英语培训班。

         负责该中心运作的，正是TT特快汇款的员工。在这群充满热情的年轻人的带领与协调下，社区中心成了阿联酋最活跃的华人社团之一。他们办过文艺晚会，也办过群英会，邀请成功的商业人士聚会，讨论市场状况，华社前景等。

         不过，该中心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帮助落难华人。该中心提供咨询服务，为华人解答法律、宗教、投资经商等方面的问题。当华人遭遇劳资纠纷、商业欺诈、意外事故时，也可直接到该中心求助。中心内有个法律顾问阿都拉曼（Abdureheman Wubuliyasheng）,协助华人进行翻译，及到相关部门立案、辩护、调解纠纷等。

         该中心自成立以来，每年受理200至400多宗案件。阿都拉曼表示，该中心受理的案件以劳务纠纷、签证等为多。

         到社区中心寻求咨询服务，每一次只象征性收费20迪拉姆，和外头律师每小时数百迪拉姆的收费比较，非常廉宜。当碰到完全没有能力，又迫切需要帮助的华人时，社区中心还会提供免费帮助。阿都拉曼说，能看到别人的笑容就是他最大的酬劳。

* *根据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的统计与分析，缺乏法律常识是华商的最大弊病。华商相信口头承诺，总是不找律师打一份正式的合同，或是随便乱签合同，等到有麻烦才后悔。华人也不看管好自己的重要文件，有一名华人曾把护照借给同事，该同事又用他的护照到银行开户口，并开出了21万迪拉姆的支票，结果该华人被银行追债。*
* 和其他海湾国家一样，回教在阿联酋受到绝对保护。尽管如此，迪拜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迪拜的杰贝阿里（Jebel  Ali)工业区，就有个地方专门让其他宗教进行活动，天主教、基督教、锡克教等教堂，全都集中在这个特定的园区内。不过，法律也规定，外教人士不得向本地人宣教，一旦走出教堂大门，也不准有任何非回教的宗教活动。
* 佛教在阿联酋并不活跃，迄今并无寺院或佛教徒的聚会出现。基督教近年在迪拜却发展蓬勃，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教徒一起在教堂内进行崇拜，有的还自动自发在家里办起圣经研究班。
* 阿联酋华人教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当时，有一名虔诚的华人基督徒欧阳仪珠，眼看迪拜其他种族的基督徒都有教会，于是，就和一些来自新加坡及其他地方的华人姐妹，在家里举办祷告会。1997年开始，每逢星期二，基督教徒开始聚集在欧阳家里祷告查经、唱赞美诗歌。2002年，在美国大使命中心的王永信牧师及欧阳仪珠的推动下，沙迦举行了第一届波斯湾华人宣教研讨会。会后，华人信徒在United Christian Church of Dubai （UCDD)国际教会开始礼拜，华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教会。2003年2月，会众正式以“杜拜华人基督教会”（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Dubai）为名，成立了迪拜第一家华人教会。
* 目前，迪拜比较有规模的华人教会共有3家，分别是由刘得贵牧师带领的杜拜华人基督教会、海湾华人基督教会以及由施约瑟牧师带领的华人福音普传会。
* 杜拜华人基督教会大概有200多名教友，每个星期在杰贝阿里的迪拜福音教堂中心（Dubai Evangelical Church Centre）有早晚两次崇拜聚会。有趣的是，为了配合当地的周休时间，基督教的主日崇拜，一律改为星期五，而非星期日。
* 华人基督教会常向当地的华工分发食物和传福音。这些华工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农村的年轻男子，生活苦闷，生活条件也不好，因此比华商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由于工作时间的关系，他们只能出席晚上的主日崇拜。住在附近的工友自己走路过来，住得远的，则有教堂派巴士接送。信教后，他们的精神有所寄托，打架斗殴的事件也比较少了。

         阿联酋的华人超过16万，对资讯流通需求迫切，掀起华文报刊创办热潮。

         每隔一段时期，阿联酋就有新的华文报刊冒出来，但很多发行了几期后就销声匿迹，也有些消失了一阵子又复刊。这些报刊当中，多数缺乏长远规划，也没有阿联酋新闻部发出的出版准证。不过，也有几份报刊，办报态度较为严谨，始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绝大部分华文报刊以商业资讯与广告为主，新闻与休闲娱乐内容的比例小于50%，可于各大小超市、华人经营的旅馆及中餐厅等地方免费索取。

         几家拥有高发行量和知名度的报刊分别是《绿州报》、《新民商报》、《华人时报》、《华人之窗》与《东方商报》。近期在阿联酋创刊的刊物还有《大家文萃》、《名报》等等。

         《新民商报》创刊于2004年，是第一家获得阿联酋新闻文化部出版准证的当地华文报刊。据统计，《新民商报》在迪拜及阿联酋北区每期的发行量高达一万份，另有5000份发行到其他国家，是海湾地区发行量最高的华文周报。

         《新民商报》的内容包括阿拉伯文化介绍，与侨民相关的当地政策、经济与商业情报、当地华社动态等等，跟其他当地报章比较，内容算是比较齐全，编辑方针也较严谨。难得的是，把这份报刊搞起来的，正是TT特快汇款和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的职员。他们利用工作空档，收集与整理新闻，再把资料发到中国去排版。

         此外，《新民商报》也和上海的《新民晚报》合作，推出了《新民商报·新民晚报阿联酋版》。这个合作版每周一期，每期两版，内容与排版，全由《新民晚报》供应。为此，《新民商报》的排版设计，也尽量依循《新民晚报》，以统一风格。在阿联酋拿起一份《新民商报》，恍惚中，有种回到上海的亲切。

         中东区最早创刊的报纸是2001年问世的《绿洲报》。该报创办人为湖北省的李明，曾在中国政府机关工作。因为历史最久，《绿洲报》知名度也比较高，发行量达到5000份，版面虽只有杂志大小，却高达44版。

         另一份办得颇出色的报刊是《东方商报》。这份每月逢5、20日出版的报纸，由阿联酋东方投资顾问展览公司创办。内容包括中东地区的金融与物流、投资建设、中东贸易、房地产以及全球的经济新闻为主，特别适合中东地区的华商与投资者。这份报纸也是海湾地区投资最大、最有企图心的华文报。该报有一个正规的编辑团队，记者持有阿联酋政府颁发的记者证。

         不过，在阿联酋，传媒并无太大的出版自由。华文报刊在出版前必须把所有的标题翻译成英文，让政府审查。任何有违当地宗教、法律、风俗的新闻以及敏感题材，都不会刊登。

         虽然华文报刊越来越多，可是，《新民商报》负责人肖琼小姐说：“市场是无限大的，华文刊物没有达到饱和的说法。能不能经营下去，要看你怎么去开发市场，和你自己的利益点在哪里。”

         网站方面，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管理的www.enterwto.com，以及温州商会副会长王伟胜和朋友刘海涛创办的迪拜华人网www.dibai.com，都是服务华人的网站。这些网站张贴了许多关于阿联酋的资料，从领事馆讯息、海湾新闻、商业资讯乃至餐饮购物资讯等，让投资者得以进一步认识这个地区，也让当地华人有个交流的空间。

* *2006年8月1日，中国人王伟胜和刘海涛收购的电视台“亚洲商务卫视”（Asia Business TV）正式开播。该电视台覆盖中东及北非地区21个阿拉伯语国家的4亿观众，节目包括《品位中国》、《周游中国》、《中国著名品牌》、《中国百业之窗》等，把中国与中国商品介绍给阿拉伯观众，协助中国商品在阿拉伯国家建立品牌知名度。*
* 1998年，中国大使的太太在一场饭局中向欧阳仪珠提议开办中文班，几个月后，迪拜第一个中文班便宣告成立。
* 今天，欧阳仪珠办的中文班共有40名学生，5名老师。学生多是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华人的孩子，每周上两个小时课。中文班因为得到迪拜学院（Dubai College）赞助，可以免费使用课室，因此学费不高，3个月共550至600迪拉姆。
* 2007年，迪拜又出现另一个由中国人闯海鸥与新加坡华人潘惜娇开办的中文班。目前，该中文班共有50多名儿童与少年学生。
* 闯海鸥表示，家长送孩子来学中文，主要抱着两种心态，一种是让孩子多学习一种国际语言，另一种则要孩子把母语学好。如果是为学好母语而来上课的，她会采取新加坡小学的教材，不但要求小孩懂得用华语沟通，还得会写中文。如果只为兴趣而学华语，
* 课程就以趣味性为主，以激发和保持孩子对中文的兴趣。
* 除了中文，闯海鸥也希望孩子对中国和中华文化有一定的认识。譬如四川大地震时，她要求老师向同学解释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并发动筹款活动。北京奥运期间，老师们也会分享奥运的消息，以期激发华人孩子的民族自豪感。
* “师资是我比较头痛的问题。”闯海鸥表示：“迪拜华人虽多，但都是做生意或工作的，不像欧美国家有很多中、英语都很好，又有教学经验的大学生。在迪拜上国际学校的孩子完全不觉得学中文是种责任，因此中文班的老师要懂得生动教学，否则难以保持孩子的兴趣。”
* 在这些有心人的努力下，随父母来到迪拜生活、受教育的孩子，有了学习自己的母语与文化的机会，中华文化也得以在阿联酋的土地上，延续下去。
* 德拉人满为患，许多有意进军迪拜的华商欲求一店而不得，于是，龙城商场应运而生。龙城是中阿两国政府合作发展的项目，刚开始时，号称是中国在海外建立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中国商品集散中心。龙城坐落在国际城（International City）内，从德拉开车前往龙城，须经过一片漠漠黄沙，约半小时才能到达。国际城是个新开发的区域，到处是未竣工的建筑工程。
* 龙城长达1.2公里，可容纳近4000家店铺。一眼望去，约30%还是空铺。这是个干净敞亮的地方，里头除了餐厅、小超市，还有长椅让人休息，和木须巴扎那些小巷弄里的华人商家相比，环境舒服多了。龙城在招商时，强调这里是做批发的贸易城，开业后却似乎成了零售式的购物广场。
* 龙城开业之初碰上不少问题，如装修没弄好，店铺内连电源都没有，只能靠走廊上的灯做生意，加上地点偏远，宣传不足，生意很清淡。坚持了3年多后，龙城生意开始上轨道，许多外国商家也慕名前来采购货物。当地商家坦诚这里的生意尚远远比不上德拉，但对龙城的前景非常乐观，认为只要守多几年，龙城生意会更火红。
* 在龙城经商与打工的中国人约有四五千人，不过，在国际城定居的华人可不止此数。由于这里租金便宜，所以在德拉工作的华人也跑到这里来住，每天开车来回。迪拜政府发展这个区域之初，本意是要把来自世界各国的人集中在这里，故名国际城。谁知，这里竟然成了一座唐人城。
* 今天迪拜的情况类似当年的纽约。这里汇聚了全球形形色色的人，尤其华人，更遍及了各个领域。有的华人用血汗建筑起这城市的一砖一瓦，有的华人则以丰厚资本与商业经验为这城市带来繁荣。和纽约不同的是，来到迪拜的华人，始终没有视此为家。在一块肯拼搏就有希望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理想家园是美国华人的梦想。迪拜华人也有一个迪拜梦——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取最多金钱，然后离开。也因此，迪拜梦和美国梦，有了不一样的深度。
* 阿拉伯半岛的南端，有片宁静的土地。它名气不大，却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这个被古代中国称为祖法尔的地方，如今就是富庶的阿曼苏丹国。
* 早在公元前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阿曼就有乳香交易的出现。它更曾是该区域的造船中心，海上通商贸易非常繁盛。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被引入阿曼。从1154年至1624年，阿曼进入巴尼那巴汉王朝（Bani Nabhan Dynasty）。由于苏丹与部落之间长期战争，葡萄牙势力乘虚而入，阿曼多个海港城市被葡萄牙占领。经过多年不屈不挠的抵抗，阿曼最终在1624年，逐出外国军队，建立亚里巴王朝。18世纪建立的赛义德王朝，更将势力拓展至非洲海岸，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一些地方。1920年，阿曼分裂为马斯喀特苏丹国和阿曼伊斯兰教长国，长期的内战使这个曾经与欧洲争辉的强大王国，陷入贫困落后的窘境。
* 把阿曼带上现代化道路的君主，是苏丹卡布斯。在苏丹卡布斯上台之前，阿曼只有两所小学，连一所中学都没有。1970年，苏丹卡布斯发动不流血政变，废父登基，从此，阿曼渐渐迎头赶上富裕的邻国，如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
* 阿曼大部分国土属热带沙漠气候，热季时气温高达40℃以上，凉季清爽宜人，平均温度约为24℃。约40%的阿曼人从事农渔牧业。乳香是阿曼名产，此外，阿曼也出产大麦、椰枣、棉花等作物，煤、铜、金、铬等矿物产量也很丰富。阿曼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开采石油，如今，石油与天然气已成了阿曼的经济命脉。石化工业的发展，吸引了许多华人专才到此就业。由于发展较晚，虽然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如科威特等国，仍不失为一个富足康裕的国度。
* 乳香是中国古代的贵族所钟爱的熏香。乳香来到中国之后，还成了一种功效极多的中药，适用于内科和外科，能活血行气，通经止痛，消肿生肌。公元11世纪，阿曼每年都向中国出口数十吨、甚至上百吨的乳香。而阿曼的佐法尔（Dhofar），在古时候就被中国昵称为香岸。
* 唐朝时期，中国的航海业和海外贸易极其兴盛，广州、泉州和扬州等都是知名的商港。那时中国的商船已经能够远航至阿曼湾以及波斯湾一带。中国海上商队将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卖到海外，同时也把阿曼的乳香带回中国。阿拉伯的历史学家麦斯欧迪曾在《黄金草原》中提及：“很多中国船只多直航阿曼。”
* 据《星槎胜览》及《瀛涯胜览》二书的记载，郑和下西洋期间，也曾三度到达祖法尔。那时，郑和的船队一停泊在港湾，当地的居民就齐聚码头，敲着阿拉伯大鼓欢迎中国朋友的到访。
* 另一方面，阿曼人也同样曾远渡重洋访问中国。在公元8世纪时，阿曼的航海家奥贝达驾驶一艘名为“苏哈号”的双桅木船，历时两年抵达广州。在《一千零一夜》中有关辛巴达的海上历险记，就是取材自奥贝达的故事。在宋朝时期，还曾经有阿曼富贾在中国官府当过差，官至广州“蕃坊蕃长”。
* 中国和阿曼两国民间频繁的交往，直至清朝，才随着日渐保守的政治趋势嘎然而止。
* 到了近代，华人大胆走向世界各地，到海外追求事业上的理想以及梦寐以求的生活。尽管如此，到达阿曼的华人却少之又少。最早来到阿曼的华人，包括中医师、护士、体育教练和一些华商。1986年，一名来自上海的医生在马斯喀特（Muscat）开了一家诊所。他是如今阿曼华社所能打听到的最早在阿曼落脚的华人。
* 90年代，中国卫生部在全国各地征选专业能力出色以及能说英语的医护人员，派遣他们到中东地区工作。1995年，中国卫生部派出第一批为数14人的医护人员抵达了阿曼。在这队医护人员当中，有两名是中医师，其余全是护士。两名中医师一男一女，分别负责为男女病人看病。当时，女中医师李晓桂被任命为队长，负责跟卫生部及使馆联系。目前，仍然留在阿曼的，只剩下李晓桂和护士张小燕二人。
* 2001年及2003年，阿曼又分别来了两批护士，不过，目前他们也大都已经离开。这些外派的护士皆正值花样年华，除非愿意嫁给穆斯林，否则，在阿曼很难找到对象。为免耽误青春，她们一般在合约期满之后就回国；再不就是练好英文之后到别的国家去当护士。
* 2003年以后，中国开始重视阿曼市场，许多国有企业纷纷在阿曼设立分公司，自此，阿曼的华人人数才随着中资公司的入驻而有激增。
* 阿曼是个富裕的国家，人均收入高达1.43万美元。加上这里政局稳定，治安良好，投资环境稳定，因此也吸引了一些勇于闯荡的华人到此经商，从事餐饮、家具、服装与小家电等行业。此外，也有不少华人在阿曼的中医针灸、按摩、医疗护理等领域工作。
* 不过，阿曼华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中资公司的职员。中石油、中水电、华为、中石化、中铁、中建材等中国大型企业，皆在阿曼设立了分公司。根据阿曼中资企业联谊会的统计，阿曼中资企业中方员工的人数已经达到1500名左右。
* 加上到阿曼经商或在私人企业打工的华人，阿曼华人的总数保守估计已达2000多人。绝大部分的华人来自中国大陆，来自台湾的只有十名左右、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人则有20多名。
* 虽然华人人数不多，可是阿曼却有一个阿曼中资企业联谊会，以及一个完全由华人自发组织的阿曼华人华侨协会。虽然这个民间社团还很年轻，却已经改变了当地华人社会的面貌。
* 在华人迁徙的地图上，阿曼是最新的热点。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不像邻国卡塔尔、阿联酋那般拼命地发展、建设。在阿曼的首都马斯喀特，看不到迪拜、多哈那种到处是建筑工程的蓬勃景象。阿曼对于外资，更是采取谨慎态度，有条件地对外开放。华人对这个国家所知不多，阿曼对外资企业的挑选，也非常严格，因此2003年以前，阿曼只有零零星星的华人。
* 2003年可说是中国企业在阿曼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这一年，中国企业在石油钻探、油田服务、通讯、道路建设等等项目上纷纷中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旗下的数家公司，还有华为技术、中铁18局、中水远洋渔业等等先后在阿曼设立了分公司。中铁18局集团有限公司标得苏尔一古赖亚特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这项总投资5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有多达300多名技术人员参与。而华为技术则标得阿曼全国骨干网项目，中水远洋渔业公司也获得合作捕捞项目。
* 于是，2003年以后，阿曼华人以倍数增长。“2005年，我出席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时，只有4个家庭的华人出席。2006年使馆办的招待会，已经多出了好多中国人。”阿曼华人华侨协会的会长王志梅说。
* 除了中资公司外派的中国籍职员，阿曼也有不少华人在外国公司任职。石油是阿曼经济的支柱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43%来自石油工业，石油占出口总值的90%。这些在外国公司上班的华人，多投身于石油领域。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已经取得英、美、荷、日等国的国籍，譬如在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 Corporation）工作的美籍华人杨先洪、王薇夫妇，以及在阿曼石油开发公司（Petroleum Development Oman LLC）上班的美籍华人莫涌、朱富萍夫妇等等。
* 这些外籍华人凭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专业知识，在各自领域内取得耀眼成绩，是石油工业里不可或缺的顶尖人才。他们很早即从中国移民到美、欧等地。在接受公司外派到阿曼来之前，他们都做过慎重考虑。经过多番打听，他们发现阿曼社会安定，生活环境相当不错。孩子还在上学的家庭，甚至连当地的学校都细心比较过，才做出决定。朱富萍夫妇申请外派空缺时，有几个选择，马来西亚和阿曼都在考虑之列。夫妇俩颇为喜欢马来西亚丰富多元的文化，可是由于该国没有特别优秀的国际学校，反观阿曼的国际学校则办得很好，名牌大学录取率很高，因此最后选择了阿曼。
* 这些白领精英们在阿曼领着优渥的薪水，过着丰裕的生活。
* 和白领精英们一样，华商同样很满意阿曼的生活和投资环境。阿曼的华商非常少，50名都不到。他们多数从事纺织品、家具、建材等行业，也有一些从事餐饮业等。阿曼并不是他们最初的目标；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先到迪拜做生意，后来才转战阿曼。在阿曼批发窗帘、沙发套的华商李向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李向东1995年就到迪拜打工，1998年自己当上老板。在迪拜站稳阵脚后，2003年他第一次到阿曼考察市场。结果，那短短的几天内，他量布量到手都举不起来。既然货物在阿曼这么受欢迎，他干脆就把生意扩展到这里。现在，为了兼顾两边的生意，李向东每个月都在两地之间来回奔忙。这也是许多阿曼华商的生活写照。幸亏，迪拜和马斯喀特之间不过数个小时的车程，还不至于太累人。
* 比较迪拜和阿曼两个地方，他认为阿曼的投资环境对外国人更有利。“在迪拜，外国人占的股权一定要低于本国人，也就是最多只能占49%。在阿曼，15万以上投资额的生意，外国人则可拥有高达70%的股权。此外，阿曼竞争远低于迪拜，因此利润比较高，但生意量不大。而在迪拜做生意，生意量虽然大，不过利润少，开销大。”
* 此外，阿曼也更适合小资本企业的生存。迪拜有个批发聚散中心，市场往往被大型批发商垄断，大鱼吃小鱼，资本不足的商人难以生存。而阿曼的商人分散全国，因此批发商很难垄断市场。
* 除了以上种种，阿曼还有一个更吸引李向东的原因：“阿曼除了投资环境更佳，也是个适合生活的好地方。这里人心纯朴，华人之间也没有利益冲突，因此沟通比较简单，不像迪拜，太商业化，人和人之间无法放心交流。”也因此，在阿曼和迪拜都买了房子的李向东，更愿意呆在阿曼。他还积极参与阿曼华人华侨协会，并担任华协的社会事务理事，和当地华人相处愉快，享受着迪拜华社所欠缺的浓郁人情。
* 阿曼发展虽然比其他海湾国家慢，但前景更为乐观；它开始大力发展经贸，但却不急不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做，它对外资控制得很严格，经题，一旦批准了外资进入，对外资还是比较公平的，阿曼华商稀少非因为华商不愿意来。如果不是签证难办，相信会有更多华商涌入阿曼。
* 1995年，中国卫生部向阿曼派出的第一批医护人员中，包括了两名中医师。从那时候起，中华医学就渐渐在阿曼扎根。虽然在此之前，阿曼就出现了数名中医师，不过，他们一般都在私人诊所行医，譬如大约在1994年抵达，至今仍留在阿曼的中医师施有奇。直到1995年，阿曼的政府医院，才开始有常驻的中医师。
* 这以后，又有数批中医师与医护人员被派到阿曼。在政府医院行医能更全面地接触到来自各层面的病人，而且也更容易获得病人的信任，因此是个把中华医学介绍给阿曼普罗大众的绝佳平台。不过，在政府医院上班的中医师只能给病人做针灸、拔罐，不能施药。
* 李晓桂是1995年第一批被公派到阿曼的中医师。在阿曼政府医院工作了一年，她曾给阿曼国王的妹妹看病。她笑说，当时皇家医院的院长亲自把她带到阿曼南部撒拉拉（Salalah）的另一所皇官，给国王妹妹做治疗。刚开始时，她压力很大，担心国王妹妹排斥针灸，也忧虑自己针扎得不对。很快地，她就发现公主非常平易近人，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 “我很高兴能在阿曼传播中医医学，让阿曼人认识针灸。”李晓桂说：“我刚来时，敢针灸的阿曼人不多，现在他们都接受了。在其他中东地区如阿联酋，大家多做按摩保健，不敢扎针，可是阿曼人却没问题，有的还主动要求。”
* 李晓桂有感中医师在阿曼比在中国受政府重视，感觉自己仿佛成了中医权威，很受尊重。许多部长夫人生病，都到医院让她看病。
* 多数政府外派的中医师在合约到期后，都选择回国。像李晓桂留那么久的非常少。目前阿曼中医师共有十几名，大多数都自己开私人诊所。要申请在阿曼开诊所的中医师，都由李晓桂负责面试评估。
* 张新平于1997年抵达阿曼。和李晓桂不同的是，他是私人诊所的中医师。他工作的那家诊所可谓“老字号”，从1986年就开始经营，担保人是Sheikha Mohammed Hamed Al Ghazal。这位当官的阿曼人到过中国，看过中医，对中华医学很有信心，眼看其他海湾国家纷纷有了中医诊所，因此起了在阿曼开中医诊所的念头。1997年张新平来到阿曼时，只是以打工的身份在这里当医师。2000年，张新平辞去工作，回中国发展。几个月后，担保人找上了他，提出让他当老板经营这家诊所，他答应了。
* 如今，张新平既是诊所的医师，也是老板。诊所规模不大，有两名医生和两名助理，但多年来，已经建立了忠实的顾客群。未来，张医师还想拓展推拿业务。
* 目前，阿曼的私人中医诊所达十几家。和政府医院不同，中医诊所能用中草药。在阿曼，草药属于灰色地带，没有明确的审核标准。张新平希望将来中草药能正规化，不过，他也表示，由于手续繁杂，以他个人之力，不容易办到。
* 在欧美国家，曾发生中医师因为给病人进行刮痧、拔罐等治疗，而被控告虐待病人的事件。不过，张新平表示，类似的医疗纠纷，在阿曼从来没有发生过。“阿曼人对中医的接受度很高，也很相信自然疗法，因为两地的医学系统相当接近。当地的Hajama和中医的拔罐就很相似。因此，中医并没有碰上很大的阻力。”张新平表示。
* 虽然中医的前景在阿曼一片光明，不过，阿曼中医师却有隐忧。这是因为近来坊间开始出现一些“推拿中心”与“按摩中心”，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色情场所，令阿曼人对中医有了负面印象。
* 最近，阿曼又来了一批天津中医学院的中医师，他们都在阿曼的第凡皇家医院服务。天津中医学院是中国顶尖的中医学府，阿曼的华人都认为这批年轻的中医师必然也相当杰出，因此对他们抱以极大的期望。阿曼对中医的接受度本来就相当高，在所有阿曼中医师的努力下，中华医学不难在阿曼发扬光大。
* 对早期在阿曼生活的华人来说，阿曼这地方正如它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一样，是一片“宁静的土地”，可是，宁静得过分，未免成了枯燥。
* 直到阿曼华人华侨协会的出现，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华人的生活。
* 2005年，王志梅与朱富萍于同一天抵达阿曼。这两人原本素不相识，也在不同的公司上班。可是，在阿曼的相遇，注定了这两名女士，要携手成就一些事情。
* 朱富萍与丈夫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石油公司工作。王志梅的丈夫是石油公司的高层职员，夫妇俩在荷兰与英国等国家待过多年。在欧美国家生活了多年，他们早就习惯了欧美庞大而活跃的华人社群。来到阿曼，发现这里虽然华人越来越多，却是各自为政，鲜少有机会聚在一起，两人于是决定为阿曼华社做一些事。
* “另外，我们也感到华人在阿曼的形象似乎不是太好，尤其是华人女性。这几年，不少‘小姐’从迪拜涌到阿曼，搞到华人女性常被人‘问价钱’。我们希望通过社团，提高华人形象。”王志梅无奈地表示。
* 两位女士都在欧美受过高等教育，非常重视法纪，她们可不愿意随随便便找几个人开个会就当成立了社团。为了令社团有个合法地位，她们经历了不少波折。首先，阿曼政府规定一定要有40名以上的会员，才能申请注册。两人好不容易收集了足够签名，政府又把最低人数的门槛上调到100多名。“刚开始时找会员确实很不容易，大家都不看好，还有人泼冷水。”王志梅说。
* 后来，他们打听到阿曼石油开发公司（PDO）的外籍职员能在公司内成立社团，而朱富萍又刚巧是PDO的职员，于是，就先在PDO成立了阿曼华人华侨协会（以下简称华协）。不过，朱富萍想到自己迟早会离开阿曼，因此，两位女士和几名理事，不辞劳苦，到处拜访华人争取签名，好向政府申请注册。
* 华协的第一届会长是朱富萍。第二任会长（现任会长）是王志梅。除了有正副会长、秘书长与财务，华协还有体育、社会服务、公关、旅行等等理事，分别负责不同事务。会员由最初成立时的20多人发展到今天，已有140多人，包括中国、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荷兰等国籍的华人。
* 除了中秋晚会、元宵聚会等等“例行公事”之外，在王志梅的带领下，华协还举办过许多活动，譬如在国际市场日开设中国美食摊，大家亲自动手做了饺子、春卷、包子、炒饭、茶叶蛋等，让各国人士品尝。这次义卖的收入，部分交给国际市场日组委会用于阿曼的慈善事业，部分用于中国的慈善以及帮助在这里陷入困境的中国人。
* 马斯喀特的奥运火炬境外传递是阿曼华社的盛事。由于前几站遭到政治异见人士的破坏，阿曼华社对此严阵以待，华积极配合中国大使馆，把华人组织起来到现场助威，并为保安情况做了一些部署。在那段期间，华协也给当地报章发了新闻稿，向阿曼社会介绍中华文化以及在当地生活的华人社会。
* 2008年除了奥运圣火传递，中国还发生了南方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等事件，华协积极号召华人和其他社团人士为灾区人民踊跃捐款。
* 把小孩也带到阿曼一起生活的华人父母不多，主要以已经移民欧美或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人为主。可是，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华人家庭，对孩子的中文教育丝毫不敢松懈。华协会长王志梅为了还在国际学校念小学的女儿，也为了其他的华人小孩，毅然挑起了百年树人的重责，在家办起免费周末中文班，亲自上阵教孩子们中文。中文班在家长们的坚持下一直办了下来，并另外找了课室和曾当过老师的华协会员来教。可是王志梅也没歇下，在一些对中文很感兴趣的老外要求下，又义务开了个成人中文初级晚班，还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上班的公司开设中文课。
* 华协成立不过两年多时间，却对当地华社颇有建树，除了使华人渐渐凝聚起来，也促进了华人和阿曼其他族群的交流。
* 华协的成立，在生活上对阿曼华人之间的互动起了推动作用。首先，除了元宵、中秋这些大型晚会，其他大大小小，正式与非正式的聚会也多了起来。在华协一众理事的撮合下，来自社会各层面的华人，得以经常聚在一起，大家变着花样做几道菜，为思乡的胃解馋。老华侨李晓桂的家，是阿曼华人的其中一个聚会场所。在她家的聚会里，谁都可以轻易感受到阿曼华人融洽相处的情况。参加聚会的华人，既有石油公司高层，也有中医师与护士，既有在欧美生活多年的华人，也有第一次踏出中国的华人。大家的人生经验与社会背景都各不相同，但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却能齐聚一堂，过得很开心。

  热爱运动是阿曼华人的特点。阿曼华人常有篮球比赛、网球比赛，为平淡的生活带来不少乐趣。

        华人之间固然和睦，和阿曼人也同样相处愉快。许多华人都表示，阿曼人是个热情好客的民族。29岁的中国小伙子熊飞，就表示阿曼人情味很重，给了他一个家的感觉。“路边等车时，偶尔还有人停下来载你。去乡区旅行时，向当地人问路，他们会亲自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有的甚至带你到处参观，以尽地主之谊。”熊飞说。

        华协有一次办了个假日团出发到阿曼海边看海龟产卵，向路人问路时，生性好客的阿曼人就带他们到处游览，还把他们带回家里做客。临别时华协为了聊表谢意，想给他们一些酬劳，他们还坚决不收。

在这方宁静的土地上，华人享受到了久违的慷慨和仗义之情。

* *2003年，一位英国人Peter Copperwheat开始在阿曼传教，用中英对照的圣经教华人护士英文。一个中文教会渐渐成形。Copperwheat离开阿曼后，中文教会由其他人接任，不少华人受洗。2009年3月13日星期五，在热心的基督徒朱富萍的组织下，华人基督徒在Protestant Church of Oman提供的一间小课室内，开始了第一次中文查经班。*
* 阿曼社会近年发展迅速，而马斯喀特的面貌，年年在变。
* 1995年，被中国卫生部外派到阿曼的医护人员刚到马斯喀特时，整座城市静悄悄的，道路很窄，车子很少，没什么高楼，都是传统阿拉伯式白色房子。当时没有大型的购物商场和超市，买菜要到蔬菜店，买牛肉要到牛肉店。
* 阿曼国王卡布斯非常重视古迹与传统文化，就连对于城市楼房的高度，都有法律限制，以保留马斯喀特的特色。在竭力保护自身文化古迹的同时，阿曼近年亦不忘加快现代化进程的脚步。“近几年变化很大，道路拓宽，到处都有大型的百货商场。”在当地生活过一段日子的华人纷纷表示。
* 台湾人胡耀文回忆3年前刚到马斯喀特时，公司附近还是一片荒芜。可是，短短时日里，公司附近就开了又大又气派的购物商场和超市，生活方便了很多。
* 阿曼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比起来，算是相当开明的。虽然阿曼人不吃猪肉，但也不严加禁止，在特定地方还是可以买到猪肉。这里也允许女性独自开车，在中餐厅还能偶尔见到阿曼女性单独或数人一起用餐，无须男性陪伴。
* 华人女性大可随心所欲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像沙特阿拉伯，规定外国女性也必须戴头巾。不过，华人女性一般还是“入乡随俗”，到哪里都穿得端庄得体。嫁给阿曼人的华人女性一般更是把自己包得密密实实，也不太参与社交活动，非常尊重夫家的宗教与文化。驻阿曼国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李自正认为：“这应该是华人女性的自我设限。同文同教的女人，如黎巴嫩、埃及这些地方嫁过来的，反而敢穿短袖短裤。”
* 在如此一个治安良好，开明友善的地方生活，许多华人开始对阿曼心生眷恋。朱富萍表示，很多外派人员都和他们家一样，爱上了阿曼。他们公司的外派合约，一般一签就要签4年，可是一般外派人员在合约到期后都选择续约，以便在阿曼多待几年。朱富萍和丈夫莫涌，就已经续签了两年合约。
* 对华人来说，阿曼生活纵使有些枯燥，他们还是可以找到娱乐的方式，因此普遍上不会觉得日子太难过，甚至有的人还觉得，这里赚钱多压力小，可说是个天堂。可是，在一个回教国家里，当华人人数太少时，始终还是难以长期留住年轻华人。对单身华人来说，除非你愿意嫁给穆斯林人，否则，择偶始终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因此，单身华人留在阿曼的时间，往往比把家人带过来的华人短得多。
* 在阿曼留了13年的李晓桂，愿意留在阿曼那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因为工作表现得到上级认可，她多年前获准把儿子韩绪龙接到阿曼一起生活。儿子今年16岁，在American British Academy国际学校上学。李晓桂表示，在国际学校上学没压力，着重于启发孩子的思考能力，他希望儿子能在阿曼完成中学教育。当儿子上大学后，她才会开始考虑回国的问题。
* 阿曼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外籍人士很难在此获取公民权。再者，阿曼消费高昂，如果没有工作，在这里退休也是难以享受生活的。也因此，再怎么喜爱这个国家，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地方只是生命中的驿站，不可能在此落地生根。
* “阿曼一直属于欧美的势力范围，这里有很多欧美公司，来自东亚的公司很少。我想要把更多东亚的公司带到阿曼。”Seven Seas Victory Knights Company LLC的董事经理许建章（Nicholas Koh）说。
* Seven Seas Victory Knights Company LLC是一家市场发展顾问公司，旨在协助有兴趣前来阿曼发展，而又不了解阿曼国情，缺乏实际经验的外国公司。据悉这也是阿曼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新加坡公司，除了新加坡籍华人，公司还有台湾和中国大陆员工。
* 许建章几年前来到阿曼，就发现阿曼和新加坡刚开埠时的情况很相像，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只要好好发展，很有可能成为中东区的新加坡。因此，他想把新加坡的经验，移植到阿曼。
* 他从2005年开始到阿曼研究当地政策、商情与投资环境，积极建立人脉与商业网络，并深入了解当地文化、思想、政策。“我们会告诉客户公司这项业务是否适合在阿曼发展，如果成功的几率很低，我们会直接告诉他不合适。除非成功几率高，我们才会鼓励他前来投资。”许建章说。他也表示公司不只提供情报与咨询服务，也积极参与客户公司的运作，担任客户公司与当地担保人之间的协调者，确保客户能在阿曼取得成功。许建章的公司于2007年正式投入运作。阿曼亲王Shihab al Said是该公司的董事，有亲王做后盾，因此很占优势。
* 阿联酋的迪拜是全球商家必争之地，而卡塔尔也努力吸引外商，不少新加坡公司都把区域分公司设在多哈。问许建章阿曼和前两个国家相比如何，他认为阿联酋及卡塔尔竞争太激烈，新公司要在那边发展比较困难，营运成本也太高。而阿曼还是个有待开发的新市场，充满潜能。
* 近代华人闯荡天下，可说很晚才到达阿曼。直到二零零三年后，一个华人社会才逐渐在阿曼成形。
* 因为社团活动办得不错，仅有数千人的阿曼华社，却展现了海湾区华社少见的活力。华协成功地把各个国籍以及各种不同背景的华人，凝聚在一起。各方华人摒弃成见，在异乡同欢共乐。
* 其实，想到阿曼发展的华人不少，可是阿曼未必肯全面开放，让那么多华人进入。阿曼要是对中国有多一些了解，肯开放给中国人进来，这里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因此，阿曼的华社会不会继续壮大，取决于中阿之间的对话有没有进一步展开。

也门

* 3000多年前，阿拉伯半岛南端，濒临红海与亚丁湾的也门，已有关于乳香等事物的文字记载。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525年，这个中东古代文明的摇篮曾先后出现过麦因、萨巴和赫米叶尔3个辉煌的王朝。7世纪时，一股新的势力入侵也门，从此彻底改变了也门的文化、宗教与政治风貌，这股势力，便是至今仍深植也门的伊斯兰教。
* 富饶强盛的也门曾多次遭受外敌入侵，奥斯曼帝国从1535年开始占领也门部分地区，1918年才被彻底逐出也门。英国于1839年控制了也门南部区域，繁华的亚丁成为英国保护地。1934年，英国趁也门发生内乱，迫使也门王室承认其对南部的统治权，也门被分割为南北两区。北也门于1962年成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也门于1967年驱走英国殖民势力，成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3年后改名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成了阿拉伯第一也是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虽然南北也门人民渴望统一，但因为政治的分歧，以及内外势力的角力，两边关系紧张，数度发生血腥冲突。经过多番幹旋，1990年南北也门终于宣布统一，也门共和国诞生，定都萨那。统一后的也门，政治比以前稳定，但恐怖袭击事件时有发生，国际形象也被盖达组织蒙上阴影。也门至今仍是最贫穷的阿拉伯国家之一，约半数人不识字，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因为经济落后，到也门从商的华人不多，来到也门的华人多是中资公司的公派职员或医疗队的医护人员。
* 公元650年，阿拉伯帝国势力如星火燎原般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擅长远航的阿拉伯人从世界各地收集并整理了各种知识，数学、医学、科学都极为先进。当时，也门已懂得进行精细的手术，对麻醉以及消毒都很在行，对眼科等疾病也都有丰硕研究成果。
* 从那时起，唐朝便不断派出医师到阿拉伯世界去学习精湛的医术。而这段历史，不论是在也门或中国的各种文献，如公元659年的阿拉伯文献《药材》，或穆斯林医师李锡旺的《草药》中，均有清楚的记载。那期间，中国人单单从亚丁采集的药材就多达41种，在整个也门，更收集了142种药材。今天，很多华人耳熟能详的中药如没药、茉莉、乳香、红花及指甲花等，皆源自阿拉伯。两国的医药交流，大大地推动了中华医学的发展。
* 除此之外，两国的商贸来往也是古已有之。阿拉伯世界刚被伊斯兰教统一的那段时期，中国正处于大唐盛世，双方的文化、商贸都空前鼎盛，而且来往频繁。当时，也门的亚丁是国际大港，世界各地的商人都到此开设商店，许多商人还与当地人通婚，落地生根。一位其亚德王朝的国王在他的著作《国家》中，也有提及亚丁湾上处处停泊着中国船只的情况。中国商人在此贩售丝绸、瓷器、麝香，并从也门购得香水及香料。两国之间的商贸往来直至宋代仍然非常频繁。
* 明朝初期，明太祖与明成祖皆十分重视海上商路和对外关系。郑和七下西洋期间也曾经走访亚丁等地，进行外交以及贸易活动。
* 亚丁被英国占领后，依然保持其国际大港的地位。当时，英国各殖民地的人民皆可自由往来，因此有许多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地的华人途经此处，或在此地做生意。但是，由于当地气候炎热、加上语言不通，很少人愿意长期留下。
* 到也门独立以前，在亚丁的华人约有300名，他们大多数来自印度，主要从事电焊技工、钟表修理等行业。当时，曾有一位叫作顾锦模的中国人在此开设船员宿舍和餐厅。独立初期，中国人入籍也门并不困难，顾锦模的数名孩子都已入籍也门，并在也门生活至今。
*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交通部对外援助办公室（即中国路桥公司的前身）派出了一队工程人员，协助也门建筑一条从荷台达（A1Hudaydah）通往萨那的公路。这是中国在也门最早的援建项目。当时，西方的建筑公司曾估计艰险的荷萨公路需要20年时间才能竣工，但中国援建项目组仅仅用了4年时间便完成。
* 公路建成之后，埃及军队曾经通过这条公路增援也门革命军，推翻了伊玛目时代的封建政体，建立共和国，故此，荷萨公路也被称为革命之路。
* 今天，荷萨公路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用。萨那属于山城，没有工业，物资均靠进口，荷台达港口的所有货物通过荷萨公路进入萨那，大大地缩短了运程。
* 从1979年到1998年之间，中国公司于也门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有近12家中国公司到也门承包工程，并且建立合资企业。
* 除了协助也门建设公路、医院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之外，1962年，中国也开始向也门提供医疗援助，派遣医疗团队到也门去照顾于战争中受伤的也门士兵。曾经有一次，伊玛目的势力包围了萨那，其他国家的医生都已经撤走了，只有中国医疗队义不容辞，坚持留下来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救助伤者。
* 此后，中也两国又在1972年、1977年、1979年和1981年，于萨那签署了卫生议定书。直至今日，中国仍不断地向也门派出医疗队，以改善也门乡村和城市的医疗卫生服务。
* 一千多年以前，中也两国便开始了医学方面的交流。今日，双方重续这一份情缘，让可贵的人道和互爱精神流传下来。
* 也门北方雨水充沛，是阿拉伯半岛上少数能发展农业的地区。也门南方地理位置优越，水产资源也丰富，亚丁自古就是重要港口。可惜到了近代，也门成了阿拉伯半岛上最贫穷的国家，对华人的吸引力也一直不如其他阿拉伯国家强。也门人口超过两千万，华人却只有1000人左右。
* 也门华人主要来自中资公司和医疗队。中国医疗队自1960年代起，就一直留在当地，为也门人民提供医疗服务。萨那、亚丁、塔兹（Taiz）、荷台达、木卡拉（Al Mukalla）和赛永（Sa'yun）都有中国医疗队，每个医疗队大约有20人左右。医疗队里的医生护士们，一般都服务数年后回国。
* 华人在也门从事的经济活动，以大型企业为主，主要集中在石油、电信、矿业、工程几个领域。这些外派到也门的企业职员，一般只会在也门逗留几年。民间消费能力不高，搞贸易的民间华商，自然也不多。
* 虽然华人稀少，萨那倒是有7家中餐厅。这大概说明了中餐在也门还是相当受欢迎的。
* 一般华人初到也门，心情恐怕都得先经历数次起落。从机场到萨那市区的路上，触目俱是残破不堪的建筑，小贩沿街摆卖旧书报或旧鞋，蒙面纱穿黑袍的女人用力拍打每一辆停在交通灯前的车辆，乞讨一些施舍。“也门连一国之都，都破落至此吗？在这地方日子要怎么过？”到此打工的华人想到将在此地生活好几年，难免心里起了疙瘩。
* 不过，要爱上也门，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来到也门的华人，绝大部分都住在萨那。不用多久，他们就会发现，其实生活必需品在萨那都可买到，生活不至于太不方便。这里没有其他富裕海湾国家美轮美奂的购物中心，却有密密麻麻的小店铺、小饭店，贩卖各种小吃的路边档也到处都有。也门人摩肩接踵，在嘈杂的街道上寻找他们需要的物品。他们贫穷，但是快乐。
* 萨那是座美丽的城市。它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据说洪水退却后，诺亚的长子闪决定在此建城。萨巴王朝时，这里就是繁华的都市，赫米叶尔王朝也定都于此。今天，萨那老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城里1万4000多座土楼，每座都有千百年历史。在这世界上最早出现摩天楼的城市里，现代文明的浪潮还未席卷过来，也门人仍然过着俭朴生活。大人们做着小买卖，小孩在巷子里戏要，当地华人闲来到老城区逛逛，很容易就感染上也门人的快乐。
* 也门人对外国人友善而热情。看见亚洲人，也门人会微笑着尝试用日语问好。日语行不通，他们马上改成华语：“你好。”在一个华人如此稀少的城市里，也门人能用华语打招呼，可见华人在也门人心目中的分量。
* 萨那位于阿邦山和纳卡木之间的盆地，海拔2200米，气候温和。阿拉伯半岛上大部分地区夏季时热如烤炉，萨那夏季温度却很少超过30度。海拔高、气压低、氧气稀薄这些现象虽然存在，不过因此产生高原反应的华人不多。一些健康欠佳的华人初到萨那，会感觉头痛、头晕、胸闷、厌食，但只要多休息多喝水，一般数天后都能适应。
*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08年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index），也门在170多个国家里排名138。虽然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可是，和附近其他同样贫穷的国家比较起来，也门的治安无疑好太多了。
* 不过，小型犯罪不多，不代表也门的华人就可以高枕无忧。2001年，曾有一位中资公司的职员马卫东被恐怖分子绑架。自此，每当发生恐怖袭击或绑架事件时，华人不忘互相提醒，出门要小心。
* 自从中国交通部对外援助办公室于1958承建荷萨公路之后，中资公司就在也门占有了一席之地。虽然荷萨公路是援建项目，可是，高质量的工程却为中国赢得了信誉，自此，中国公司在也门的投资日渐增加，发展稳健。
* 1979年，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简称路桥公司），开始承包对外项目。由德国政府提供资金的“1986-1990年萨那一塔兹道路修复项目”，是路桥在也门的一个亮点项目。这条道路连接萨那与塔兹两个新旧首都，自1990年修复完成后至今，路况仍然非常良好，令中国的工程再次受到也门一致好评。
* 此外，亚丁海堤路修复项目、亚丁污水项目、也门伊卜扎马尔给排水工程，阿木兰一哈贾援建项目等工程，也为路桥公司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 路桥驻也门分公司全盛时期，员工人数高达1400多人，单是办公室就有20多人。路桥目前正进行着全长14.8公里，双向8车道的“萨那一阿木兰”道路拓宽项目。该项目的工程师、工头等都是中国人，不过，由于也门劳力市场的工资比中国低廉，因此民工都是当地人。
* 中国在修桥筑路以及建筑方面，占了相当的市场份额。此外，中资公司在通讯领域也有耀眼表现。而中国CMEC公司在亚丁承建了哈斯沃电站扩建工程，中国石化则在也门进行石油勘探。
* 不过，据了解，近年有不少外资公司，由于对市场了解不足，不了解也门政府的付款能力和办事效率等，因此都亏了钱，最后黯然离场。
* 路桥公司总经理范振江表示：“也门本土工程企业发展很快，工程承包市场竞争激烈，利润下降，在工程承包市场赚钱已经越来越困难。不过，路桥属于老公司，对也门风俗、市场相当了解，而且声誉好，因此能生存下去。”此外，物价疯狂上涨也是导致许多公司亏的原因，他补充说：“从2007至2008年，沥青就涨了60%。”
* 从1960年代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对也门的医疗援助计划。1962年，第一批到达也门的中国医疗队人员，经历了惊险的北也门革命，救助了无数受伤的士兵与平民。此后，中国又与也门签订了多项合约，一批又一批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不断到达也门，服务当地百姓。根据这些合约，中国政府向也门派出的医疗人员，每批高达100多人，累计到今天，曾在也门服务的医护人员已有约3000人之众。医生护士们必须留在也门服务两年或数年。
* 目前，萨那、亚丁、塔兹、荷台达、木卡拉和赛永都有中国医疗队，每个医疗队大约有20人左右。这些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相当艰苦，被分配到萨那、亚丁等城市的还好，被分配到偏远地区的医护人员，需面对更大挑战，这些地方通讯设备落后，生活条件差，且交通不便。从萨那乘车前往一些坐落在乡区的医院，要在弯曲破烂的山路上走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才能抵达。可是，这些华人医护人员，还是秉承着救人济世的精神，尽力向当地的穷困百姓伸出援手。
* 2006年9月12日，也门总统大选的演讲现场，发生了踩踏事件，一时间伤者无数。中国医疗队的全体人员紧急动员，抢救了伤者近百人。这次事件令中国医疗队受到当地社会广泛赞赏。
* 根据2007年的一项统计，分布在也门12家医院的163名中国医疗队医护人员，共诊治病人13万人次以上，实施了2万2000多宗大小手术，抢救了严重病患3177人次。
* 因为中国医疗队对当地的贡献，华人赢得了也门人真诚的尊敬。
* 也门不是富裕国家，国民消费能力不高，难以成为华商看重的市场。可是，也有一些独具慧眼的华商，努力在也门贫瘠的土壤上，寻找利益点。
* 也门本来连一家外资开的旅行社都没有。一位姓雷的华商由于经常需要到也门处理公务，发现当地旅行社的服务、效率和信誉都欠佳，因此萌生了自己开旅行社，以后自己订机票的念头。2007年11月，也门第一家外国人投资的旅行社——康辉旅行社，在萨那正式开张。
* 旅行社开张没多久，也没多做宣传，就已有不少外国人自己找上门来订购机票，甚至还有一些国际大公司主动要求合作。近来，康辉的顾客也多了不少也门人。康辉决定乘胜追击，计划下半年在多哈和迪拜开分社。
* 陈媛是康辉旅行社的助理主席，旅行社大小事务全由这位年龄仅20多岁的中国女孩负责。她刚到也门时，在石油领域的公司工作，后来老板决定开旅行社，才调派她管理康辉。在此之前，她对旅游业一点概念都没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学。经过一年摸索，康辉业务竟然很快就步入正轨。
* 为了响应员工当地化政策，康辉的职员除了陈媛，全是也门人。陈媛表示，聘请也门人也有不少好处，也门人的工资只需中国人的一半，而且中国职员不会愿意长期留在也门，流动性大，每年要放长假回中国，又要顾虑他们不适应也门环境。
* 可是，聘请也门员工，也有意想不到的烦恼。“也门员工的水平高低不一，而且工作理念和公司不太一致。中国人对服务品质的要求高些。”陈媛说。为此，康辉花了很多时间培训员工，并提供不同的课程给员工进修。
* 海默油田服务公司是来自中国的民间企业，主要业务是为石油天然气工业提供测量数据、石油天然气设备和整体解决方案，以及优化生产等服务。在国际油气井多项测试技术领域中，海默以短小灵活的民企姿态，傲然与多家历史悠久的大品牌争雄。
* 海默在阿联酋和阿曼都有分公司，而该公司进驻也门，只不过一两年时间，却已经取得亮丽业绩，成功争取到壳牌、康菲、道达尔、中海油等客户，成了也门最成功的中国公司之一。法国道达尔公司曾给他们写过推介信，盛赞他们的环境安全与健康措施的标准、数据质量以及专业服务都有过人之处。
* 49岁的丁美玲，是相当早到也门发展的华商。她原本在中国开领带厂，有一次，朋友拿了她的货到也门卖，卖了个满堂红，两人于是决定跑到由门做贸易，2000年，两人来到也门，当时也门市场上很少中国货，全都是廉价印度货。丁美玲经验不足，不知道当地市场具能接受低档次的货物，结果，她从中国进口的高档货，全部滞销。
* 可是，她并没有打退堂鼓。“我抱着中国人不服输的心理，哪里亏了钱，就要从哪里赚回来，坚持继续做下去。”她说。经过几年时间，她摸熟了也门人的品味，在中国大使馆附近开了一家中档的服装、婴儿床零售中心。
* 零售生意做稳后，丁美玲又做起废塑料回收的生意。另一名华商戴建克经营的塑料回收厂是也门规模最大的工厂。丁美玲和戴建克两家中国公司，就占去了也门塑料回收很大的市场份额。
* 丁美玲到了也门不久，就把大女儿、大女婿和小女儿都接到也门。大女儿和女婿帮她打理生意，而小女儿陈吉正上着当地政府办的学校。“不选国际学校，是因为要学好阿拉伯语，还是在当地学校念书较好。”丁美玲解释说。一家人经过几年打拼，生意已经有了根基，和各方面也建立了关系，展望未来，也门商机也还不错，丁家母女都有长期留下发展的意愿。
*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从商，安全是华人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关于这点，丁美玲认为问题不大。“也门人对中国人不错，一般不会骚扰外国人。不过因为国家贫穷，小偷小摸是难免的，但不会破门打劫或半夜入贼。我们店里装了防盗器。抓到小偷，也不报案，只要他们乖乖把偷的东西交出来就放他们走。”她说。
* 2008年末金融海啸后，也门的中国人骤然增加了不少。许多其他国家的华商在当地做不下去，纷纷跑来也门寻找活路。
* 已经年届50岁的安徽人韩明生，和几位朋友下岗后，想到国外闯一闯。他们曾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待过一阵子，但有感非洲市场太零散，生意难做大，且非洲太多中国企业，竞争激烈。经过仔细比较，他们发现也门虽小，但是萨那人口稠密、政治稳定，因此结束了非洲的生意，转到也门发展。
* 他们打算在萨那开一家汽车修理厂。“萨那到处都是旧车子，但这里的修车厂技术很差。在这里开修车厂，肯定好赚。”韩明生信心满满地说。修车厂还在筹备中，没能那么快开张。可是，商业嗅觉灵被的韩明生，很快又发现了一门生意。“在萨那买不到豆腐！”韩明生说：“一斤豆腐在中国只能卖人民币几块钱，在这里我可以卖到人民币15块多。阿拉伯人不吃豆腐，但可以卖给欧美人。”
* 于是，他们又“顺便”开起了豆腐厂。豆腐厂的筹备过程比较简单，于是，修车厂还没开，豆腐厂倒是先开了起来。豆腐厂投入生产的第一天，韩明生带着一名翻译和一袋袋豆腐、豆干，一家一家找客户，卖给各大超市。“在也门开工厂虽然成本比中国高，但收入相对也高。”韩明生说。
* 萨那还有一家中国人开的中也文化麦尔佳交流中心。这家中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也门人，涉及的业务相当广泛，包括汉语培训、帮也门人办中国签证、中阿语翻译等等，最特别的是还开办武术训练班。创办人吕鹤松是中国回族，曾在也门科技大学和萨那大学上学。他发现也门人热衷学习汉语，而且随着中也两国商贸来往日增，对翻译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萌生创业念头。
* 武术班由他亲自开班授徒，教也门年轻人心意拳和回族的查拳。高峰时期，武术班的学生曾高达60人，暑假班更有上百人的纪录。
* 交流中心自2005年7月开办至今，知名度渐高。回想刚开始时面对的种种问题，吕鹤松不胜唏嘘：“刚开始时资金窘迫，办公设备、租金等都没有。好不容易开成了，又不断有安全局或税务局等的人员来找麻烦。中国人在此创业，这方面还是比较需要领事保护的。”
* 也门虽然不发达，但不缺商机，留下来的中国人都找到了一条活路。
* 也门原来规定，外资公司须让当地人占至少51%股份。现在，也门出台了最新政策，允许外国人独资，无须担保，而且只要六七万美元的资金就可获准经营。这项政策实行后，相信将吸引更多华商到也门开辟市场。
* 萨那近郊山坡上，有一处埋葬着华人先贤的墓地，俯瞰着整个萨那城。这座墓地，就叫张工墓。墓地旁那条蜿蜒盘旋在崇山峻岭中的公路，正是闻名的荷萨公路。
* 1962年，荷萨公路建成，一名叫张其弦的工程师，在检查施工现场时，不幸因车祸过世，英年39岁就客死异乡。也门政府感念中国工程队的贡献，在荷萨公路旁拨了一块地，让中国驻也门大使馆在这里修筑一座墓园，把张其弦葬于此处。墓园里一块硕大的碑文“张其弦工程师之墓”，由时任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题字。从此，这块墓园就成了当地华人口中的“张工墓”。
* 每逢清明节，驻也门中国大使馆、各中资机构以及医疗队的代表，都会到这里扫墓，以鲜花和美酒祭莫英灵。
* 5000多平方公尺的墓园处处栽满鲜花，芳草萋萋傍碧亭。40多年来，在也门亡故的华人超过100名，其中50多名葬在此处。这些华人，有来自路桥、中建等公司的工程队人员，有也门各地中国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也有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不管来自什么领域，他们对也门的发展，都有过贡献，也在此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 在亚丁机场，只要告诉出租车司机，你要到“中餐厅”，他们就会直接把你载到众胜餐厅（Chinese restaurant）。众胜餐厅如此深入人心，不只因为它是亚丁唯一的中餐厅，更是因为它从亚丁还是英国殖民地时就开始营业，见证了也门争取独立，步入统一，走向共和的过程，陪伴也门人度过了几十年岁月。
* 这家餐厅简陋得令人意外。陈旧的桌椅、冰箱、灯、电风扇，以及几盏蒙尘的灯笼，昭示了一段悠长的岁月，令人霎时时空错乱，仿佛回到战前的时光。
* 餐厅老板顾升贤62岁，出生在中国大陆，潮州汕头人。1948年，父亲把他和母亲接到也门；那年，他两岁。父亲顾锦模是船员，由于当时打仗，船停在亚丁开不了，于是就留了下来。1950年至1963年，顾锦模开始在亚丁经营船员宿舍。每当有船入港，他就亲自到港口招徕生意，他的宿舍包吃包住，费用廉宜，因此很多中国船员都到他那里下榻。
* 顾锦模过后再陆续把弟弟和母亲也接到亚丁。他后来再娶了一位也门太太。二太太的父亲是印度迁来的华人，母亲则是也门人。顾锦模和这名太太，共生了3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 后来，亚丁船务骤降，港口萧条，船员宿舍的生意一落千丈。顾锦模决定改行，1963年6月15日众胜餐厅正式开张。隔年，中学毕业的顾升贤就在爸爸的餐厅帮忙，然后继承父业，一直到现在。顾升贤在英国殖民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说得一口流利英语。
* 餐厅的厨师是香港聘来的，主要做英国人生意。由于父子没有经验，刚开始时餐厅一直亏钱。南也门独立后，英国人走了，餐厅生意反而更兴隆。当时众胜餐厅在也门算是比较高级的，也门官员要请客，一般都会到他的餐厅。
* 多年过去，众胜餐厅的辉煌已在时间里褪色。现在，众胜餐厅只是亚丁一家毫不起眼的小餐厅，是也门人不忍挥别的记忆。餐厅的顾客一半是忠实的也门顾客，一半是慕名而来的华人及欧美人。曾有一些中国人在此开中餐厅，不过没几个月就关门大吉了。“有我在，别人开不了，他们无法和我竞争。”顾升贤自豪地说。
* 不过，他没打算扩张营业。“不能太贪心，有赚就好了。正如阿拉伯语说的，用两只手吃饭会噎着。”他说。
* 顾升贤晚婚，娶了一个香港太太。他的父母有感二太太所生的两个小儿子都不像中国人，不会说华语，完全阿拉伯化了，因此坚持要顾升贤娶中国媳妇，把血统保留下来。目前，顾太太和3个女儿都在香港，只有他孤身在也门。“女人在这里没地位，我不想女儿嫁给也门人，这里也没有别家中国人，所以女儿到了开始上学的年龄，就叫太太回香港，让女儿在香港接受教育。”他说。
* 独立前亚丁曾有约300名中国人，现在全都走光了。他的父亲、母亲、奶奶都过世了，叔叔也回中国了。亚丁常住的中国人，只剩顾升贤一人，其他的都是在此短暂逗留的中资企业员工。他说自己不太留恋亚丁，打算退休后就回香港。“会一直留在也门，只是因为经济问题。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感觉自己还是个外国人。脸孔不一样，去到哪里，都还有人要查看我的护照，很没意思。”他说。
* 他的店面是租的，租金每年上涨，餐厅利润逐年下降，令他意兴阑珊。到他决定离开也门那天，屹立多年的众胜餐厅，也将走入历史。
* 在阿拉伯半岛上，也门是如此与众不同。也门曾是阿拉伯半岛的文化与经济中心，如今，却是最贫困的国家。当生活在其他海湾国家的华人，出入于五星级酒店、豪华阿拉伯风洋宅、大型购物商场时，在也门生活的华人，穿梭于古老建筑林立的小巷里。他们无法享受现代化城市的便利，却能沉浸于也门独特而浓郁的文化氛围中。
* 在也门，华人真正受到了阿拉伯人的接纳，没有歧视，没有敌意。这除了是因为也门社会贫穷，人心单纯，也许，也因为近代华人为也门作出了不少贡献，而也门人和华人之间，更有一段千年前深植的情缘。

约旦

* 上亿年前，这里曾经是被海水覆盖的大洋深处。随着地壳的隆起，海洋变陆地，奇迹般的地貌，赋于了约旦独特的美丽——红色的岩石、连绵的沙丘、辽阔的荒漠，仿佛讲述着这片国土所曾发生的故事。
*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约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佩特拉王国，这里曾是当时的陆路交通
* 要塞。从历史遗迹中，往日的繁华，依稀可见。经过世代的变迁，原是巴勒斯坦一部分的约旦，先后被亚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统治，如今是由哈希姆家族统治的独立王国。
* 约旦只有4%的土地可以耕种，其余都是戈壁、沙漠，水资源严重缺乏，而且充斥着数量极大的巴勒斯坦难民。现实的贫困与失业问题，让很多约旦人纷纷到他国打工，这些侨民的汇款是约旦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 有人走出去，同样也有人走进来。虽然约旦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是社会较为稳定、安全，这吸引了一些人来到约旦谋生，其中也包括近万名华人。
* 最早定居于约旦的华人，来自台湾。
* 在1977年，即约旦和中国大陆建交之前，它长期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那时，出现在约旦的华人，基本上全都是来自台湾的政府官员、工程人员或商人，他们在约旦、台湾之间往来穿梭，待工作结束之后便离开。
* 其中，有两家华人因与约旦王室的不解之缘，决定安顿在这个遥远的阿拉伯国家。
* 20世纪60年代，蒯松茂以台湾大使馆武官的身份来到约旦。两年之后，他的妻子杜美如，即当年上海滩传奇人物杜月笙的女儿，也获准前来定居。由于约旦王室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蒯松茂在这段时期和王室成员交上了朋友。一次闲谈中，他们聊到世上许多国家都有中餐厅，为什么约旦却没有？但是，当时他们只是一笑置之，双方都没有认真看待这个现象。在约旦与台湾断交之后，蒯松茂回到台湾去，然而，已经适应约旦生活的他，开始感到迷茫，于是又返回了约旦。
* 这时，叫他意想不到的是，王储哈山居然将“约旦之星”的称号颁发给他。这在当地是最高的荣誉，作为一名外国人的蒯松茂，感到光荣之余，自是感动不已，更是坚定了留在约旦的心愿。于是，蒯松茂在退役之后，一次过取出了自己所有的养老金，然后在安曼开设约旦的第一家中餐厅——中华饭店。
* 随着经济的衰退，华人制衣厂纷纷关闭，一些华商也撤退了，如今约旦华人人数已经回落到一万左右，这其中有七八千人是在制衣厂工作的女工。她们来自中国各地，以江苏居多，居住在约旦的3个工业区；伊尔比德（Irbid）、沙哈（Sahab）和卡拉克（AI Karak）。而以浙江人为主的华商都聚集在亚喀巴，数量有100多人，流动性较强。除此之外，真正长期居住、生活在约旦的华人，计有200余人，大部分安家在首都安曼。
* 真实的约旦与人们对中东国家的印象大相径庭，这里平静而安全。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华人总是这样安慰初来乍到的华人：“约旦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经济颇为繁华的免税区——亚喀巴，更是一派悠游、闲适的景象。那里的商人说：“即使你手里拿着十万块走在街上，也没有人抢。在穆斯林的脑海中，没有‘眼红’这个词。”
* 不同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在约旦的华人移民中，入籍并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因约旦皇室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浓厚，与王室往来，对于一些华人来说，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遥不可及。有的华人也因此得到了约旦的国籍，为他们在当地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 约旦的相对宽容，也使华人的佛教和基督教组织在当地出现，并且与当地人有着深入的互动。如此情况即使在很多非穆斯林国家也是不多见的。
* 在约旦安家置业的华人，数量不多，但日子都过得很惬意。虽然谈不上豪宅名车，但至少居住宽敞、出外方便。其实约旦的贫富差距颇为悬殊，能够留下定居的华人，都较富裕。不过他们并不是做什么大生意，而是个体户的业务经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因为约旦华人少，做什么都能赚钱。不过赚的钱也只是够过我们的小日子，供孩子读书，为自己养老。”
* 因为国家小、经济欠佳、市场有限，约旦的华人都是身兼多职，事必亲躬。“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大家的口头禅，因为一种生意总是做一段时间就淡了。为了保持收支平衡，一定要做多重准备。
* 无论是留下来的华人留学生，还是因为机缘巧合停驻于此的外派人员，每个人几乎都做过华人能够从事的所有行业：贸易、中餐、翻译、制衣厂、承包工程、中医推拿等，事业起起落落、生活忙忙碌碌，倒也都赚得一份安稳、平静的好生活。
* 陈士忠十年前来到约旦。曾经在中国江苏国有皮鞋厂做厂长的他，因为工厂倒闭，带着一批员工到海外的华人工厂“再就业”。在公司打工的5年里，他前后换过15个岗位。现在已经有了自己公司的陈士忠，既经营工厂食堂，又为其他工厂提供食材，还代理劳务公司的管理业务。只要所属劳务公司的中国工人在约旦出现任何纠纷，不论罢工还是交通事故，都由他出面处理。“我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陈士忠虽也做中餐生意，但生活却很阿拉伯式，他说这是因为公事繁忙，“一边开车，一边吃大饼，就当做一顿饭了。”如今陈士忠的“梦想”都已成真：买房、买车，送孩子到美洲读书。“我没有白来约旦，出国前为自己制定的5年计划，都已经实现。现在，我在为实现第二个5年计划努力。”
* 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约旦华人觉得经商的限制并不算大。“我们都是小本生意，所以没人管。”尽管如此，人在异乡还是难免要受委屈。像很多国家一样，在约旦做生意也是必须与当地人合伙经营，人地生疏，自然要付出高昂的“学费”。
* 在约旦已经15年的俞舟，前后被合伙人骗光了10多万美元。做贸易被骗货，做餐馆被骗走厨师和场地，开公司被骗钱。他曾一气之下，远赴塞浦路斯摆摊卖货，几年后才又卷土重来。
* 在俞舟第三次东山再起，创立了约旦的第一份华文、阿拉伯文、英文3语商业报纸——《金桥商报》，以3种语言为中、阿商家刊登广告。让他感到又惊又喜的是，第一期报纸就已经取得盈利了。报纸不但摆放在约旦的商铺、饭店内，在中国义乌阿拉伯人聚居的阿拉伯村也能看到，而这些都是俞舟一个人张罗。虽然他有自己的公司，但是约旦员工只负责拉广告。其他所有的排版、印刷、发放，他都一个人一手操办。每天俞舟把报纸放在车子里，谈生意、办事情，哪怕只是吃顿饭，临走前，总会向店主询问，可否放一些自己的报纸在店里。不过他现在再也不担心被欺骗了，因为“我的合伙人就是我太太”。此外，他还同时兼做旅游、贸易、工程等多个项目。
* 坐落在红海边上的亚喀巴，风景秀丽，港口风平浪静，是约旦唯一一个出海口和贸易进出口集散中心。自从2000年这里设立了免税区开始，擅长靠中国货打天下的华商也开始挺进亚喀巴淘金。他们有的直接来自中国浙江、福建，有的是之前的华人留学生，有的则从东欧、迪拜一路下来。
* 陈先生是第一个到亚喀巴开店的华人。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都闯荡过的他，第一次到约旦考察，就被这里的安宁与平静吸引。“这里的警察不贪污，给钱都不要。虽然约旦的市场有限，但对比之下，仍比为了赚钱搭上性命的环境好上百倍。”陈先生当时就决定把大本营转移到亚喀巴，并选择了市中心办公楼下层的门面作为自已的店铺。
* 其实做生意都不会一帆风顺，陈先生也不是一下就掌握了这里的生意秘诀的。初到约旦，习惯了欧洲进货方式的陈先生一次进了几货柜同样的商品，结果夏季摄氏50多度的高温，热得所有的鞋子都开胶了。“而且约旦人口稀少，这么多的货哪里卖得出去。”
* 那时他和太太只能每天看着满屋子的鞋子干着急。后来经朋友指点，陈先生才开了窍，在约旦上货，一个货柜至少要有几十样货品，以零售为主。他开始针对上班族的喜好，主打品质好、价格适当的商品，生意渐渐好转，也积累了不少回头客人。开始几年，他的年收入可以达到六七十万人民币，颇为可观。现在，由于整个贸易环境的萧条，年收入降到了三四十万人民币。
* 不久后，华商的主力军——浙江人也来到了亚喀巴。他们看中了市中心平民价位的闹市区，租下一幢店屋，楼下卖货，楼上住人。七八家华人商店，就这样分散在阿拉伯人的商铺里，没有华文招牌，没有特色服装，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与其他店铺的差别。但是当地人还是喜欢进去逛逛，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是华人卖的货，价格一定不会太高。“我们的脸就是招牌。”华商们指着自己说笑。
* 2006年，亚喀巴出现了中国城。其实，这个中国城只是一座3层小楼，外面有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的“中国城”字样，里面有25家华人商店，都设在一层。因为华商知道阿拉伯人懒得爬楼梯，所以没人愿意租用二三层的商铺。虽然商城只有一层有商家，但每到周末，客流量还是相当庞大，很多客人从安曼特地过来血拼。中国城的老板是一位约旦的地产商，华商多来自中国义乌，几年经营下来，在约旦已经逐渐为人所知。
* 在亚喀巴，华商们除了琢磨生意，担心的事情并不多。安定的治安和纯朴的民风，让华商们感到“约旦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华商小王19岁刚到亚喀巴时，不懂阿拉伯语也敢到街上看市场、找店铺，他说：“这里95%都是好人，即使是坏人也坏不到哪里去。如果遇到事情，10个人中至少有9个人会来帮忙，那你还怕什么？就算有时你自己生气，约旦人还会来劝你不要生气、不要着急。”
* 对于这些商人来说，惟一不能忍受的是天气。每到夏季，亚喀巴的平均温度就要高到50度左右，天干地燥，十分不适合人类居住。在室外暴露3秒钟，皮肤就有焦灼的感觉，走上100米路更是不敢想象。这些华商们每天在太阳升起前就要把空调的冷气开足，等到太阳落山，才会把当天卖出的货补上。
* 虽然大家总抱怨约旦人少、收入低、购买力差，但是和其他国家危险又饱和的贸易环境相比，华商们还是不会轻易离开亚喀巴这块平静、悠闲的好地方。
* 华人移居他国，经常是凭借着这个国家的某些看似不足称道的政策。当年的一个“零配额”，就使约旦的华人人口因华人制衣业的发展而激增。如今，约旦的华人有八成都生活在工业区的制衣厂内。他们中有港台的工厂老板和管理人员、大陆的技术和后勤人员，以及数量庞大的女性工人，大家称之为厂妹。
* 制衣厂刚刚进入约旦的时候，可谓困难重重。约旦最大的华人制衣厂富绿公司的负责人吴厂长说，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使生意步入正轨。“刚来时很苦，什么都没有，都是自己慢慢建起来的。而且语言不通，出货、招工都有困难。尤其是生活适应很难，别说适应文化，就是华人工人适应水土都要一段日子。那时全厂从上到下，大家常常生病。”
* 在工厂，一般的管理人员每4个月可以回国一次，探望亲眷；而厂妹们为期两年的合同，虽有春节探亲，但是大都舍不得昂贵的机票和高额的加班费用，一干就干满两年。这些女孩子们非常年轻，多数在20岁左右，“想出来看看世界”是她们选择来到约旦的最大原因。然而她们工作在工厂，吃住在宿舍，工作朝八晚五，有时还有2到4个小时的加班，每天下班后已经很疲惫，洗漱后就快要到凌晨了。只有周末的时候，工厂的大巴才会载送她们到附近的市区去买些生活所需。
* 两年下来，别说世界，就连约旦对她们来说，都还是陌生的。即使有少数大着胆子毁约偷跑出来的，也很难找到生存空间。好在她们每月收入最低的也有400美元，如果努力加班可以拿到七八百元，平日里又没什么花销，大部分都可以存起来做积蓄。
* 制衣厂老板都喜欢聘请华人员工。“约旦人虽然纯朴，但是没有技术，而且出勤率低，做事拖拉，每天喝茶、上厕所、聊天、打扮就要占去很长的时间，加上当地法律规定，穆斯林女子不可以加班。反之，华人吃苦耐劳，出来了就是为了多赚钱，都喜欢加班。”
* 作为厂主，近年来的管理压力越来越大。欧美的订单客户会定期来工厂检查工人的工作环境，食堂饮食、居住条件、休闲生活都成为衡量厂方是否压榨员工的标准。富绿制衣厂就在厂区内为员工设立了电影室、图书馆、棋牌室、卡拉OK厅和长途电话房。他们还从大陆聘请了一位大夫，每日与员工一起上班，以防某些工人突发疾病。
* 随着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中国薪水的提高，使制衣厂招工越来越艰难。大多是独生女的女工，也不如以前的工人受得委屈，维权意识也越来越高。工作时间稍长、汇率下降，都会引起工人的罢工，但是毕竞异国他乡，她们还是受制于雇主，不敢随便卷铺盖走人。谈起这里的生活，女工们说：“满意度还算可以，就是有些枯燥，工作压力不小。”
* 在保守的穆斯林国家竟可以找到华人基督教和佛教的踪迹，并发展得颇具规模，是约旦华人社会的一个惊喜。
* 在约旦，大部分长居此地的华人都安于经营自己平淡的家庭生活，很少有人抱有弘扬中华文化的远大目标。因此，除了台湾驻约旦的经济文化办事处组织的旅约华侨联谊会和每周一次的华文补习班外，约旦鲜有民间的华人团体。
* 但是华人基督教会的信徒在约旦却有250余人之多，主要是制衣厂的工作人员，主持者是来自新加坡的徐君华牧师及其夫人。
* 教会的礼拜在伊尔比德市一间阿拉伯人的教堂内进行。每到周五的傍晚，这间教堂都被华人挤得满满的，偌大的教堂，一时之间非常热闹。传到街道上的赞美诗的声音，与清真寺的祷告声，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约旦的基督信徒不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因此当地的阿拉伯基督徒十分乐意把教堂借给华人使用。他们说，这样可以鼓励当地人参加礼拜。
* 工厂女工参加基督教会，起初都是因为约旦的工厂生活实在太枯燥，出于好奇或者无事可做，过来看看。她们在这里畅吐心事、祈求祝福。平日里徐牧师与他的太太还会到各个厂区的宿舍去探望、讲经，久而久之、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空虚，因宗教的渗入而得到了舒缓、解放，寂寞的心灵也得到了鼓励和安慰。
* 徐牧师和徐太太从新加坡来到约旦已有七八年之久，一直居住在离工业区较近的伊尔比德，为工厂女工们传播福音。开始的时候，他们对这里的饮食、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不适应，“新加坡人很直接，这里的人却很含蓄；新加坡人很守时，而这里5分钟就是半天。”
* 不过这么多年下来，早已入乡随俗的徐牧师感到自己十分幸运，“在穆斯林国家传播基督教有很大压力和困难，但是这里华人基督教会的土壤非常好，当地的阿拉伯基督徒也十分友善。”
* 而在约旦活动了十余年的慈济，更是深为当地人所接纳。在约旦，为慈济工作的志工有45人之多，他们不分宗教、种族、国籍、天主教徒、回教徒、台湾人、大陆人、约旦人，甚至连约旦的公主都是他们的会员。
* 而约旦慈济的负责人，正是老华侨陈秋华。他与太太和弟弟陈得雄，每月都深入到当地生活最困苦的贝都因人、巴勒斯坦人的家庭，送上生活用品，询问是否有困难需要帮助。
* 他们每到一户，都双手合十，行礼问候，而当地人虽然是穆斯林，也跟着以双手合十来回应。小孩子们还模仿说“阿弥陀佛”，然后亲热地互相亲吻脸颊。供养孩子读书、提供医疗费用、帮助生活所需，都是约旦慈济对当地社会的回馈。
* 陈秋华说：“一个月探望一次，根本不能够解决他们一个月的生活困难。我们做的就是陪伴他们生活，传播爱。很多困难的家庭，我们都是一直陪到老人往生。”
* 知足、感恩、善心、包容是约旦慈济人一直在传达和自勉的精神。陈秋华说，“我们做这些，其实是让自己得到更多，更加欢喜。”
* 在约旦，华人间总是笑说，俞舟是约旦华人“第一人”。这个“第一”并不是指他来得最早，也不是说他是华人首富，而是指他开创了华人与当地妇女通婚的先例。
* 十多年前，俞舟的父亲来约旦出差，看到几元钱的中国商品，在这里都可以卖出上百元的价格，感到阿拉伯国家商机无限。回国后，便把还在读书的儿子送到约旦留学。
* 毕业后，俞舟就操着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和英语开始在约旦做生意。但是由于几度合伙人选择失误，让他亏得血本无归。正当对约旦彻底失望，打算返乡回国时，俞舟认识了现在的太太苏哈。
* 苏哈说：“我可能是约旦唯一一个嫁给华人的女人。很多人都不理解我的选择，包括我家人，直到结婚一年后，他们才接受我的丈夫。”与穆斯林结婚必须要加入伊斯兰教，俞舟因此也成为了穆斯林，把家永远地安顿在约旦。
* 两种文化因为爱情而结合，看到的更多是对方文化中的传统美德。“阿拉伯女孩内心善良单纯，人好、勤劳。我们是在我最失意的时候结婚的，因为生意刚刚失败，所以也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只在家里请了几个朋友，喝喝茶、吃吃中国带来的瓜子，但我太太没有一点怨言。”俞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觉得心存亏欠。
* 而在苏哈眼中，她的丈夫就是真主赐予的礼物，善良、能干、英俊，做饭一流、做生意也是一流。“当时我惟一的烦恼就是，他是不是一个好人。我们在药店相识，直到决定结婚以后，我才知道我的丈夫有很好的房子和自己的生意。”按照苏哈的说法，穆斯林认为，别人的金钱是别人的，与己无关，即使已经拥有的钱财，也可能随时消失，因此是否富有，并不是她选择丈夫的标准。惟一让苏哈有一点小小的不满的就是，华人很难接受阿拉伯人向往的12个孩子的大家庭。
* 如今他们的二儿子已经开始咿呀学语，俞舟的生意也很平稳，苏哈便与丈夫合作，成为约旦第一份华、阿、英3语报纸的老板。虽然家庭内外、大小事情都要两人亲自动手，但是两种文化的融合，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 这个中阿合璧的家庭生活方式很华人化。约旦物价奇高，因此平时的生活用品、中餐调料等，大到家具电器，小到文具用品，都随着俞舟的集装箱从中国运来。平日的三餐，也是中餐居多，就连他的太太做起中餐来，味道也很地道。
* 他们的两个儿子，都有着中、阿两个名字，对中华文化充满了亲切与好奇。字正腔圆的“这是什么？”是他们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苏哈说：“我希望他们从小就学习华文，因为他们是华人。”
* 跆拳道是约旦在世界竞技比赛中，成绩最好的项目，也是约旦人最喜欢的全民运动之一。现在全约旦约有十万人学习路拳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仪式上，在为数不多的约旦代表团团员中，有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团员，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台湾华人陈得雄——约旦国家队路拳道的教练。
* 跆拳道传入约旦仅有30多年的时间，它能在全国普及，要归功于陈秋华。当年陈秋华因跆拳道来到约旦，从事跆拳道的训练工作，约旦的许多军警都是由他训练出来。
* 从1977年，陈秋华成立约旦第一家道馆——安曼道馆到现在，约旦已经有了近百家跆拳道馆，影响巨大。
* 因陈秋华与陈得雄两兄弟都是慈济的成员，跆拳道也成了他们喜结善缘的桥梁。不少贫困家庭的孩子都在陈秋华的道馆免费学习。不仅如此，他还每月支付他们20第纳尔作为每次来学习的交通费。“车费足够让孩子们从家里往返市中心，但是从市中心到山上的道馆，我要他们自己走路来，不能让孩子们太娇气。”陈秋华不仅传武，也育德。同时道馆也提供一些清洁和看守的工作机会，让生活困难的家庭有一些收入。
* 在陈秋华的道馆中，最年长的学生已年逾花甲，最年幼的才3岁。学生中既有达官显贵，也有贫困的难民，所有的学生若聚在一起，可以称得上是约旦社会的缩影。
* 很多约旦华人都说，自己没有白来约旦。外人眼中保守的穆斯林国家，能做到让外来移民对它心存感激，必有它的迷人之处。
* 尽管在小小的约旦没有华人巨商富贾，也没有华人州长议员，但是一介平凡百姓能够实现自己的小小愿望，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就是一种成功。这些平凡的成就，华人在约旦做到了。

 叙利亚

叙利亚可能是被外界误解最深的国家。它地处伊拉克与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冲突不断的地区之间，又一直被欧美一些国家冠以“邪恶轴心”的称呼，这让大部分人对它感到既陌生恐惧，又难以接近。

        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居住。它的首都大马士革，传说中曾是犹如天国一般的玫瑰之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首都之一。叙利亚拥有多种文明留下的遗迹，《一千零一夜》的古老传说、罗马帝国时期“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帕米拉（Palmyra）、阿拉伯帝国的伍麦叶清真寺等，数不尽的历史在这里交汇，见证着人类的文明。

        作为阿拉伯半岛历史上最为繁荣的区域，在7世纪以前，叙利亚是基督教的发祥地和传播中心。而后，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的扩张，特别是在因反抗十字军东征而名垂青史的萨拉丁统治时期，大马士革更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

        正因为文化底蕴的深厚和历史的辉煌，大马士革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为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阿拉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中心。而在之后的反对侵略、殖民和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叙利亚也是阿拉伯国家中的急先锋。

        对西方文明的强硬抵制，使很多人对这个阿拉伯的文明中心望而却步。只有走进叙利亚并生活在其中的人才会真正了解这片土地的浪漫神秘和多姿多彩。而在叙利亚为数不多的华人，对这里也是赞美有加，被天方夜谭的神话彻底征服。

  叙利亚作为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华人在唐代便已经踏足于这片土地。叙利亚的沙漠绿洲帕米拉，以及丝绸之路最西端的阿勒颇城（Aleppo），也都曾被记载于中国历史文献中。

        尽管两国之间很早就已经有了通商往来，但是，对于大部分华人而言，叙利亚一直都只是存在于天方夜谭的神话传说中，犹如阿拉丁神灯般神秘莫测。即使到了1956年，叙利亚和中国建交，两国有了商业往来，也因当地的诸多限制，没有华人愿意到这里定居。

        第一个真正移居叙利亚的华人，直至1963年才出现。她是为了爱情而放弃一切，跟随丈夫来到叙利亚的香港华人谢丽霞。她与叙利亚第一个被派到中国的留学生亚谷在武汉大学相识，他们俩既是邻居，又选修同一科系，双方因而有着共同的语言，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一切都仿佛是那么顺理成章。

        在那个年代，他们的爱情受到家人、朋友、校方的重重反对及阻难，最终乃是通过当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批准，始得共结连理，并在亚谷毕业后移居叙利亚。“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谢丽霞在回忆这一段轰轰烈烈的往事时这么说。因为这段婚姻，家人也与她断绝了关系。一直到了1967年的中东“六日战争”，远在香港的父母因惦念女儿的安危，才与谢丽霞恢复了联系。

     从1963年到1980年间，定居于叙利亚的华人一直就只有谢丽霞一人。直到1981年，才开始有来自台湾的华人女性，跟随在台经商的叙利亚丈夫返回叙利亚生活。她们陆陆续续来了大约有好几十个，有些因为后来孩子在台湾求学而往返两地；有些则移民至其他国家，如今长期扎根叙利亚的只有十几个而已。

        随着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叙利亚商人也开始到中国大陆去经商，因此，在90年代之后，有更多来自大陆各地的妇女嫁到叙利亚。同时，一些华人也通过留学或餐饮业的劳务输出等方式来到叙利亚。

        到了1995年，这里已经有三四间中资公司，华人总数达到100多人。2004年，个体贸易华商也开始进入叙利亚的市场大展拳脚。

    如今生活在叙利亚的华人约有2000多人，其中中资企业的员工就逾千人，其余的则是通婚女性、回族华人留学生和少数的商人及餐饮业业主。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及台湾，在叙利亚主要聚集于大马土革，在阿勒颇（Halab）和塔尔图斯（Tartus）等城市也散居着少量华人。

        通婚的老华侨都是女性，新来的华商还不成气候。因此叙利亚华人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当地，显得少之又少。正因为稀少，大家来往频密，仿佛家人一般。他们曾经完全不相识、隔着海峡、来自五湖四海，甚至不同国度的华人，因为这个陌生的国家，而相知相伴。他们间没有经济利益的冲突，有的只是共同的华人血液。

        出生在毛里求斯的克莉斯汀（Christine），在叙利亚已经生活了13年。她从没去过中国，不会讲华语，也不清楚自己的华文姓氏，但是纯正的华人血统，让她肯定自己是华人，并热情地参加每次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举行的中秋、春节联欢会。而中国使馆也仿佛变成了华人的“娘家”，有些老华侨子女的婚礼，使馆人员还作为亲友代表出席，并陪同主家迎娶新娘。

        在宗教开放、自由的叙利亚，华人虽身处穆斯林国家，却感到自在随意。女性不但在生活上可以行动自如，在事业上，只要愿意，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这是一个任何人都能生活得很好的地方，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这里没有枪林弹雨，有的只是平静、友好。”远嫁到叙利亚的华人太太们几乎没有人说这里不好的。

        作为叙利亚华人的主要群体，这些异族通婚女性，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但都像谢丽霞一样，有着同样为爱走天涯的爱情故事。“我们都是随缘来到这里，因为遇到了一个叙利亚男人，结了婚，有了孩子，孩子当然要了解自己父亲的国家，我们就跟着来了。”在叙利亚生活了十多年的邬凤娥如是说。

        到了叙利亚，发现这里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糟糕。古老传说中的繁华景象，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古宅深巷里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嬉笑追赶；密集的商铺中贩卖着大马土革著名的玫瑰香料；茶馆内外总是坐着悠闲的阿拉伯老人，一边吸着水烟，一边下着阿拉伯棋；清真寺定时传出绵延不断的祈祷……一切安详平静得仿佛千万年未曾改变，让来到这儿的华人太太们竞有一种误打误撞地发现了世外桃源的暗喜。

        “每天早上起床后，我会和先生一起喝咖啡，然后游泳、健身；下午有时去朋友家串门聊天，有时自己开车出去逛逛，但最多时间还是和家人在一起。”这就是来自台湾的张淑萍的日常生活，很是舒缓惬意。除了叙利亚，她在埃及、约旦和美国也生活过不短的时间，但最后还是觉得叙利亚最好。“这里更有生活的感觉。”素养良好的人民，节奏缓慢的生活，对华人友善的态度，赢得了不止张淑萍一名华人的心。不少华人都是先到叙利亚，再到别国生活后，最终又选择回到这里。

        因为这些华人妇女的丈夫不是商人，就是曾留学中国的专业人士，所以她们在叙利亚的生活还算富裕，而叙利亚人热情、有礼、正派、宽容，社会风气纯良，宗教观念开放，让她们感到心舒气爽。唯一需要适应的就是语言，虽然她们和丈夫可以用英语或华语交流，但是在与婆家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中，阿拉伯语还是很重要。

        在叙利亚有90%的人口为穆斯林，因此华人与伊斯兰教徒组建家庭后，学习阿拉伯语、加入伊斯兰教便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华人基督徒，除了周日的基督教礼拜外，每天的社交、工作也还是要融入周围的穆斯林文化。

        虽然在叙利亚这样的阿拉伯国家，宗教是一切的基础，但是这些因婚姻而加入伊斯兰教的华人，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束缚。他们对穆斯林文化从陌生到了解，反而发现了它与传统中华文化的共通之处。

        这些中阿合壁的家庭，房间不论大小，大厅里一定摆放着一大圈沙发。当地人说，这是回拉伯人大家庭观念的表现，在叙利业，人人重视家庭，讲究考敬老人，孩子要和父母一起分担家务，这些和传统中华文化中提倡的伦理观念不谋而合。“现在越来越国际化的大城市里逐渐丧失的美德，在这里还郑重地保留着。所以定居在叙利亚，对家庭的经营和孩子的成长都有利无弊。”古老的传统，让这些华人妇女们得到很多精神上的满足。已经习惯了以物质衡量一切的现代女性，在可兰经和阿拉伯的生活习俗中，又找回了心中最美好的本质。

        加入了伊斯兰教后，更为她们的生活提供了说不尽的方便。尤其是对一些还在兼顾生意的华人太太们，谈判时，只要说上一句“真主保佑”，对方马上会问你是不是穆斯林，如果得到肯定的答复，立即就亲热起来，如兄弟姐妹般的对待。曾经有一名异族通婚的女华商，在与欧洲的竞争对手旗鼓相当时，就因为这句话，最终拿到了竞标项目。

        叙利亚学习语言和宗教的百余名留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回族。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倍感亲切。有的人本来对宗教仪式已经淡漠了，来到这里，因为环境的熏陶，每当清真寺的祷告声通过喇叭传来，他们便和当地人一起走进附近的祷告场所，虔诚地礼拜，每天5次，毫不含糊。有些女孩子，在中国没有戴头巾的习惯，来到叙利亚后，也入乡随俗，漂漂亮亮地用各种颜色的头巾把头发包裹起来。“有种找到家的感觉。”她们发自内心地说。

      华商在叙利亚历史短浅，只不过五六年，总人数仅有几十人。这些华商既然敢把宝押在这个冷门国家，就有着超乎常人的沉着与本事。

        其实每年到叙利亚考察的华商，一直以来从未间断。但是叙利亚消费能力不高，在外界媒体报道中，又政局混乱，因此绝大多数人都不看好这个被美国“制裁”的国家，看上一眼，就匆忙走人。不过，还是有人看好这个市场，成为第一个勇于“吃螃蟹”的人。

        这个人就是来自中国浙江的女华商周东云。来叙利亚之前，她在中国、迪拜、阿根廷、意大利、利比亚等众多国家都有经商经验。2004年，周东云本是来谈一单生意的，却被这个鲜有华人问津的市场吸引了。

        阿德拉自由贸易区对21个阿拉伯国家实行零关税的政策，又地处叙利亚通往伊拉克唯一一条高等级公路旁。贸易区距伊拉克边境城市仅200公里，公路上每天奔驰着成百上千辆伊拉克的卡车、巴士、集装箱车，从叙利亚发往伊拉克的所有货物均在自由区办理出关手续，而正值战后重建中的伊拉克又潜藏着巨大商机。这里旺季时每天约有150个货柜转口至周边国家，就算是淡季也有50来个货柜的交易量。而这些货物，大部分都是中国商品。“为什么华人不自己来做？”周东云立即决定在自由区内买地盖房，建一座叙利亚中国城。

        因此，先有中国商城，再有移入的华商这种特殊情况便在叙利亚出现了。

        2006年，中国城顺利建成，占地一万平方公尺，可容纳150家商户。可是叙利亚的左右邻居伊拉克和黎巴嫩都陷入了混战。虽然叙利亚绝对安全，但是来考察的华商们，无论怎样都对局势不放心，再看到周东云只是一个温婉的女子，都打起了退堂鼓。很多人暗自替她惋惜，怪她为何这样“傻”，把钱砸在如此危险的地方，倘若一个炸弹落下，一切都将成了泡影。“这里真的很安全，只不过是叙利亚的国际形象被曲解了，中国城也就受到影响，我便跟着倒霉。”无人信任，让周东云感到很无奈。

    但是最后还是有些华商愿意冒险一试。一些来自中国江浙沪地区的商人，因中国城而来到了叙利亚，成为当地的第一批个体批发贸易商贩，多出售纺织品和床上用品。“真正来了，才知道这里也没什么可怕的，比哪儿都安全。”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后，华商终于相信了叙利亚的稳定。

        不过毕竞市场刚刚起步，华商数量少，影响也小。他们坐在店里守株待兔等不到生意，只好自己去开拓市场。分别来自江苏和浙江的胡先生和胡太太，回想初到时，不是没有后悔的。“一开始很辛苦，没有客户。在这么陌生的市场，语言又有障碍，建立客户资源太困难了。那时我们只能一家一家店铺地上门推销。

        出乎意料的是，叙利亚人对华人充满了好感和好奇，每一家都客气地请我们进去喝茶、聊天。很多时候，坐了半天，虽然生意没有做成，但还是相谈甚欢。”两三年下来，他们积累下固定的客户，短期内也不打算回国了。

        原来在上海做生意的胡太太，来到叙利亚后，压力一下子不见了。“刚来时最痛苦，因为太闲了。”货物迟到，叙利亚客户也不催促；货到了，和客户约好见面，他们又迟到得离谱。早上醒来，想出去逛逛，店铺都未营业；到银行、车行交款办事，也要折腾上好几回。“没有压力，反而更着急，自己每天的计划无法完成，急得夜夜失眠。”

        渐渐地华商们发现，只有自己急是没有用的。再怎样焦虑，当地人不配合你的办事节奏也无济于事，还不如索性迁就他们的习惯，按照阿拉伯人的作息时间行事。早晨11点起身，下午两三点吃午餐，晚餐推迟到八九点，凌晨两三点入睡，所有的会面都安排到下午四五点或晚上十点以后。

        无聊的时候，有的人就重返校园，花上几百美元，报一个阿拉伯语课程，学学外语。另一项有趣的休闲就是洗澡。在叙利亚窄窄的街道旁，还保存着不少正常营业的地道土耳其浴室。整个人被包裹得密密实实地送进浴室蒸烤、洗刷，让本来压力就不大的华商们，更是放松到了极点。

        虽然叙利亚国民的人均收入不高，但是当地人没有存钱的习惯，只要有钱就花掉，因此华商在这里还是有生意可做。华商的生活条件虽不比家乡，但相对于当地居民，要好得多。租住一套不错的公寓只要三四百美元，车子虽然较贵，不过华商也都负担得起，就是缺少蔬菜，在市场上所能买到的，不外乎土豆、番茄、腌橄榄加大饼的老搭配。

目前在叙利亚只有5家中餐馆，其中两家是叙利亚酒店里的中餐部门，另一家则规模很小，业主是叙利亚人，所以真正的中餐馆就只有龙餐厅和家餐厅这两家。

        虽然当地华人不能独自经营餐厅，但是这两家餐厅里的华人与他们的叙利亚合伙人都是多年交情的老朋友，餐厅也以华人厨师的手艺、纯粹的中华文化气氛而闻名。

        龙餐厅走高档路线，它的叙利亚老板以前就在五星级酒店管理中餐部门，他与大厨程兆如从1995年饭店开业就一直合作至今。饭店在营业之初，并不被当地人接受，叙利亚客人仅占三成，其余都是各大使馆或者国际公司的外国职员。随着叙利亚与中国生意往来密切，叙利亚人对中餐的认识也越来越多，龙餐厅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程兆如说，现在的客人比例正好相反，本地人占了七成，甚至连叙利亚总统都是这里的熟客。

        家餐厅走的是中档路线，叙利亚合伙人几乎不参与餐馆的管理，因此它可以说是当地唯一一家华人经营的餐厅。家餐厅为来自中国南京的丰雷和他的好朋友共同拥有，目前只有丰雷一个人在叙利亚打理生意。它坐落在大马士革古城的基督教区，开业已有四五年了。一个人撑起整间餐馆是十分辛苦的事，丰雷自己既做老板，又做厨师，只请了两名服务生和一名帮厨帮忙洗碗、备料，每逢吃饭时间，丰雷在闷热的厨房里，总是炒菜炒到大汗淋漓。

        竟受叙利亚的生活条件所限，做生意的华商们不会选择把家人带在身边，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在外打拼。他们工作虽然辛苦，但是与无法填补的亲情相比，算不上什么。好在这里的华商少、没竞争，大家无事便聚在一起，让异乡的生活不再那么无聊。

        华人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找中餐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来到叙利亚也是如此。因为华人少，所以这几家中餐厅的华人厨师，和当地华人都成了朋友。尤其是相对独立的龙餐厅和家餐厅，华人客人一进门，不用服务生领位，就直奔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可吃的”。而家餐厅更成了华商们的“家”，一周里有5天，他们都在这里聚餐，有时想吃什么，他们干脆自己买好材料，或者发货时随集装箱从中国运来，送到厨房，让丰雷为大家解馋。“我们天天在一起吃饭、打牌，感情像亲人一样。”而在叙利亚，即使同是做餐饮业的同行，也不存在竞争，大家总是在一起互通有无。

        丰雷说，餐馆起名字叫“家”，就是想给人“家”的感觉，这里的装修既强调东方特色，但也力求亲切感，比如外国人并不陌生的京剧剧照和通俗简单的华人流行歌曲，都特别受当地人的欢迎。不过丰雷没想到，最令他喜爱的，还是在叙利亚偶遇的这些华人朋友。而龙餐厅在当地的名字发音是“Canoun”，意思为大家围坐烤火，这种温暖、团聚的意境其实与家餐厅殊途同归。

        谢丽霞不但是移民叙利亚的第一个华人，还是叙利亚哈萨省的第一个女工程师和第一个华人公务员。

谢丽霞来到叙利亚后，语言不通，气候和饮食皆不习惯，人一点点瘦下来。但是生性好强的她，不愿意像大多数阿拉伯妇女一样，在家相夫教子，而是迫切地想出外工作。她的丈夫来自当地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不但支持她工作，还主张谢丽霞一定要做自己的本行，让所学的专业得以发挥。不过，对于一个外籍女子来说，在阿拉伯国家从事土木工程谈何容易。首先是要过语言关，然后再经过多道繁琐的手续公证学历文凭，最后还要通过考核，才能加入当地的工程师协会。而这些只是找工作的第一步。为了能顺利地申请到政府建筑工程部的土木工程师职位，她加入了叙利亚国籍。

        用了6年的时间，谢丽霞终于在1969年成为了叙利亚哈萨省建筑工程厅工程师。“找工作虽然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一做就是30年。””在这几十年间，谢丽霞工作得十分卖力，“尽管我入籍了，可我的脸还是华人，就算生活100年，当地人也觉得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不希望给中国人带来不好的影响，一定要表现得很出色才行。”就连很多男性都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任务，谢丽霞也会毫无怨言地去执行。一次她要爬上30公尺高的水塔检查工程，大家都说太危险了，直接盖好章就算了，但是她最后还是一个人蹬着梯子上去了。“我心里也很矛盾，但是这是我负责的工程，一定要看过才可以盖章通过。建筑工人能上去，我也能，只要当天没有风就可以。因为我太瘦了，担心会被风刮下来。”

        幸运的是，正因为谢丽霞在叙利亚人眼中，永远都是“外国人”，她的女强人作风在穆斯林为主的社会并没有受到排斥。

        在叙利亚生活了近50年，谢丽霞对这里饱含深情，不仅是因为叙利亚人的修养与热情，以及对华人的友好，让她感到没有来错地方，更因为自己在叙利亚设计、监管的无数工程散布各处，让她对这里的每条路、每座桥都充满了感情。

        现在已经退休的谢丽霞，从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她的大半生既轰轰烈烈地爱过，也兢兢业业地努力过。如今她和先生亚谷居住在大马士革知识分子区域的公寓里，平静地享受着阿拉伯式的晚年生活，爱情、亲情、家庭、事业，都美满得无可挑剔。当儿科医生的长女、当内科医生的长子和担任物理教授并掌握9种语言的次子是她最大的欣慰。因为家庭语言是华语，她的孩子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称自己是“半个华人”，而孙子们则调皮地说：“我是四分之一华人。”

  叙利亚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昔时曾有各国商旅带着五花八门的物品汇集于此进行交易，促成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几千年后，发达的国际贸易取代了这种极具冒险和传奇色彩的贸易形式，往日的繁荣和神秘只能在一座座古城废墟中寻找踪迹。

        在今天的叙利亚，这种边走边卖的流动市场依然存在，而且里面竟然还有华人的身影。

        俄罗斯有一批穆斯林每年去沙特阿拉伯朝觐。出发前他们装满集装箱车，在朝觐的路上，遇到城镇便停下卖货，货卖光了，便就地取材，在当地上货，继续前行。每到一月的时候，朝觐车队都会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停留一个月，组成暂时市场兜售商品。当地人叫它“扎哈拉”市场。

        此时在叙利亚留学的华人学生正值假期，灵敏的商业嗅觉，让他们很快就加入了这个队伍当中。租上一辆敞篷货车，从当地华人批发商手中进些服装、鞋帽和床上用品，来到市场，找好地方，铺上一块垫布，就开始和俄罗斯人一起摆地摊。

     因为是来学习语言和宗教的缘故，这些留学生中既有20岁不到的青年，也有40多岁的中年。有的女人头戴头巾、男人头顶毡帽，用阿拉伯语吆喝着，难辨他们究竟是哪国人。“来到这里就要融入当地，和他们穿的一样、吃的一样、说的一样，才能做成当地人的生意嘛。”曾经自己读书，现在陪女儿学习的一名云南华人这样分享她在叙利亚的生存心得。

        一个月后，朝觐的车队便离开，赶往下一站，学生们的假期也结束了。下一次摆摊，就要等到穆斯林的斋月了。虽然一年只有两个月的赚钱时机，但是如果赶上好时机，每次都可以有六七千美元的收入。这些钱，足够支持他们在叙利亚一年内的所有开销。

        来到叙利亚定居的华人都有着异于常人的勇气，无论是对家庭、爱情的付出，还是事业上的魄力，华人发挥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对这个国家的充分信任。因为这份难得的信任与勇气，叙利亚用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来回报他们。纵然外界把这个国家形容得万分可恶，但是它给予当地华人的却是平静的生活、可贵的美德、丰富的文化。决定留在叙利亚的华商们坚信，这里的市场总有一天会为他们带来惊喜

黎巴嫩

在人们的印象中，黎巴嫩是一个战乱不断的地方，多年内战，黎以（以色列）冲突、黎叙（叙利亚）恩怨，形形色色的教派与政党、盘根错节的国际关系，使这个弹丸小国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的战场。

        硝烟弥漫的战场，掩盖了黎巴嫩曾经的辉煌与灿烂。黎巴嫩人的祖先——腓尼基人，曾以发达的航海业和丰富的雪松资源，使黎巴嫩成为地中海的贸易大国。他们发明的腓尼基字母，是如今希腊语、拉丁语和斯拉夫语字母的起源。黎巴嫩曾被许多民族占领过，最终于1943年脱离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之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中东的贸易、金融、旅游和文化中心，首都贝鲁特更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繁华风光堪比日后的中东贸易中心迪拜。

        1975年以后，连年内战、以色列轰炸、叙利亚驻军、游行及爆炸事件，导致黎巴嫩元气大伤。连绵的雪山、茂密的森林及碧海的蓝天依旧，但散落四处的残垣断壁，无不使黎巴嫩人对往日的繁华扼腕痛惜。很多人选择了离开，以致现在生活在海外的黎巴嫩人超过本土人口的两倍。但是，黎巴嫩却也汇集了来自各国的人民，包括短期居住的年轻记者、上了年纪的欧美商业顾问、菲律宾女佣、周边经济稍差国家的打工者。这当中也有少部分华人，他们长久生活于此，已经以黎巴嫩为家。

        中国和黎巴嫩自古以来的交往历史可回溯到千年以前，中国的陶瓷及丝绸曾经通过黎巴嫩口岸运往欧洲各国，黎巴嫩的空心玻璃器皿制造工艺和紫色颜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不过，华人真正定居于黎巴嫩，则是从1980年代初才发生的事。

        最早来到黎巴嫩的一批华人，是从台湾及香港过来的女性。她们嫁给在海外经商或留学的黎巴嫩人，并随着丈夫返回黎巴嫩。

        根据当地华人的说法，来自台湾的罗宝珍是第一个定居于黎巴嫩的华人。1980年代初期，她随着从商的丈夫从台湾来到黎巴嫩展开新生活。那时，内战还没结束，炮声时而从不远处传来，导致他们每日出门都提心吊胆，只能尽量留在家中。罗宝珍和丈夫在黎巴嫩生活了一段时日之后，基于安全理由，唯有无奈地返回台湾，直至内战结束，才又迫不及待地回到黎巴嫩。罗宝珍的丈夫开了一间大型超市，会说流利阿拉伯语的她，每天都到超市帮丈夫打理生意，而且还特别在超市开辟了一个角落，专门出售中餐的食材。目前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黎巴嫩。还有好些像罗宝珍一样早期嫁来此地的华人太太，待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也都移居他国去了。

        如今依然生活在黎巴嫩的华人当中，经敏敏算是来得最早的一个。她是上海人，自幼在香港长大，中学毕业以后就被家人送到美国去深造。她与丈夫在大学校园内相识，由于丈夫在毕业之后一定要回到黎巴嫩接管家族的果园，于是，出嫁从夫，习惯了都市生活的经敏敏就跟着丈夫去到黎巴嫩北部的乡下果园。

        经敏敏于1982年12月抵达黎巴嫩，虽然那时内战尚未熄火，但是生活在千亩果园旁的百年大屋中，她并没受到太大的影响，只是频繁的停电及湿冷的气候常常让她感到不适。经敏敏表示，她几乎是用了5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习惯这里的生活。

  如今，经敏敏全家居住在的黎波里（Tripoli）市区，并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看着一对儿女都长大成人了，她感叹道：“开始时，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现在看孩子们，才感到当初的决定是对的。这里的青年比较保守，不像美国或香港那样随意和自我。对于培养下一代而言，黎巴嫩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可惜局势不太稳定。另外，孩子们在长大以后都喜欢到国外去工作，很难继续留在父母身边。如今当了人家的母亲，我才能理解自己当年来黎巴嫩时，我的母亲为什么会那么生气了。”

        除了这些嫁到黎巴嫩的华人太太之外，来自北京的姜俊升则可说是第一个到此工作创业的华人。在1980年代初期，他被公派到黎巴嫩负责建筑工程，结果一干就是8年。在这8年期间，黎巴嫩的内战未曾停息过，可是姜俊升却喜欢上这里秀美的景致，以及那热情的人民。回国之后，待战争平息，他便让儿子姜浩到黎巴嫩来经营中餐厅。随后，他再次踏足黎巴嫩，并且还开设了一间公司，承包交通系统的各类工程项目。姜氏家族无疑是黎巴嫩来得最早的华人家庭，之后，有很多从事餐饮业的华人，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来到黎巴嫩的。

        到了1990年代，在内战结束了之后，从事贸易、异国通婚、经营餐厅、中资公司的华人都陆续进入黎巴嫩，只是人数稀少。而那些从事贸易的华人，曾经尝试开拓服装、空调以及发电机的市场，但是却面对黎巴嫩极为严格的商品入境检验，以及一些无良黎巴嫩商人的刁难。

        从2000年至2005年间，黎巴嫩的局势十分稳定，这时的华人人数就达到了两三百人。2003年，也曾有一两百名华人从迪拜来到黎巴嫩，他们摆地摊、卖领带、并且开设按摩院，但是由于后来涉及一些不法行为，没多久以后就被驱逐出境。

作为一个异乡人，能对这样一个随时都可能被狂轰乱炸的国家不离不弃，若不是已经以此为家，便是因为对这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现在居住在黎巴嫩的约200名华人，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各地的华人太太，个体创业者和打工者，以及中资公司员工和中国政府公派教师。黎巴嫩的华人分散而居，只有贝鲁特较集中。

        黎巴嫩华人胆敢选择在此地长久生活，肯定拥有超出常人的勇气。事实上，除了适应动荡社会的生存能力外，他们还具备乱世中永不消极、发掘美好的豁达心胸，以及历经危难依然重情讲义的真挚性情。

        人数过于稀少，局势动荡不安，使这里的华人社团无法正常发展。华人的社团组织和宗教团体还是一片空白。有一些台湾太太曾经组织开办华文班，但由于华人孩子太少，坚持了一两个月后就仓促解散了。

    黎巴嫩局势动荡不安，但社会却相对开放、包容，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在这里皆通用，为华人融入当地、寻找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正如一名华人太太所说：“自己就像一颗种子，在哪里都能发芽。”生活在黎巴嫩的华人太太，从家庭主妇、华文教师、音乐教师、瑜伽教练，到建筑师、商人、美容师、中医师，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仿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将自己的十八般武艺发挥得淋漓尽致。

        来自北京的赵颖，现在是黎巴嫩孔子学院的协调人，被大家称为黎巴嫩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一人。2001年，她随在中国留学的丈夫返回黎巴嫩北部的家乡生活。刚到的第二个月，赵颖便在当地的健身中心找到瑜伽教练的工作。性格开朗的她，工作不但比丈夫先一步稳定下来，还为丈夫的中医诊所招徕不少客人。

 华人积极进取，赵颖也不满足于住大房、有工作的生活状况，反而鼓励丈夫去贝鲁特发展事业。“首都人口密集，人们容易接受新事物，中医诊所才会有更多的顾客。”当时正怀有身孕的赵颖，帮忙丈夫到贝鲁特为诊所选址、装修。孩子出生后，她到贝鲁特一家健身中心当起瑜珈兼游泳教练，之后还教起了华文。渐渐地，丈夫的诊所在当地有了名气，从开始的一个月一个病人到现在的一天几十个病人，身后的太太功不可没。

        2006年，在一次中国使馆的活动中，她得知孔子学院打算在黎巴嫩创办，便开始积极参与筹划。如今，孔子学院已经运作了几年，招收的学生逾百人，成绩超乎预期的好。不仅如此，赵颖还成为黎巴嫩与中国交流的桥梁，她不但写文章介绍黎巴嫩的文化和美景，还帮助两国商人寻找各种商机，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时局不稳定，使黎巴缴人习惯了做多重准备，如持双重国籍、做多份工作等，华人自然也受到影响，虽然稍有动荡，就可能失去工作，但是这些华人太太们相信，只要自己有一技之长，就不怕找不到工作。

        学习中国民乐的何笑静从上海嫁到黎巴嫩，几经波折，找到了一份英语学校音乐老师的工作。她说：“像当地人般工作，压力很大，不但面对语言的挑战，还因为我的亚洲面孔，必须承受更多能力上的质疑。”进入学校后，她的考察期比当地任何一个老师都长。何笑静通常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出门，从比布鲁斯（Byblos）开车赶到贝鲁特上班，晚上有时还要兼职教华文，或去高级酒店演奏，回到家常常已是晚上七八点。

        其实，华人太太们大可不必如此操劳。很多嫁给有钱人的全职太太，家用十分宽裕，即使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基本生活也不成问题。太太们需要的，不过是事业上的成就感。

        曾在上海同济大学和比利时学习建筑的何彬嫁到黎巴嫩前，曾在上海最好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来到黎巴嫩的两个月后，她便到自己丈夫的设计公司上班。不久后，她就在当地数一数二的建筑师事务所任顾问，并在一所大学授课。

        即便如此，何彬仍感到事业发展的限制，她说：“黎巴嫩土地都是私人所有，无法规划，所以想承包公共建筑的规划项目是不可能的。况且作为华人，在这里并不容易受到承认。”

        不过，有的人还是从工作中得到了满足感。来自中国东北的王薇，1990年代初随中国医疗队公派到黎巴嫩做英语翻译，与黎巴嫩籍丈夫结婚后，便定居当地。她发现黎巴嫩盛行美容、整形，有人甚至向银行贷款整形。直觉告诉她，这个行业绝对潜力无穷，于是她马上开始学习纹眉。十多年下来，她的技术在当地已经声名远播，很多歌星和政界夫人都成了她的客户。只要一打开电视，就会看到王薇的作品。“这个眉是我纹的，那个唇线是我做的”，满满的成就感溢于言表。

   长年的战乱，使黎巴嫩的经济大幅度下滑，但由于黎巴嫩是个小国，恢复起来也较为容易。另外，黎巴嫩国穷民富，大量的海外侨汇和一代代的祖传财富，还是让当地人维持着相当的消费能力。

        黎巴嫩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汇集世界各地风味的餐馆。喜欢享受生活的黎巴嫩人，几乎人人都是美食家。他们平日很少在家用餐，而是喜欢到外面的餐厅品尝美食。

        在当地成百上千的餐厅中，有二三十家是中餐馆。这些餐馆大部分由当地人经营，雇用来自中国、菲律宾、苏丹和埃及等地的厨师。真正由华人经营、华人掌勺的只有“小中国餐厅”、“熊猫餐厅”、“好好中餐”3家。这3家高、中、低档餐馆定位不同，互不竞争。

        小中国餐厅坐落在繁华的贝鲁特市中心，旁边就是当地最有名的酒吧街，店内氛围古香古色，墙壁上挂着清朝皇帝图，烘托出餐厅的尊贵之气。小中国老板徐祝明还记得十多年前刚到贝鲁特的情景，“那时，这里的马路坑坑洼洼，楼房都是弹孔。我根本没想长呆，打算一年的合同到期后，马上背包回家。”谁知他一做，便做了十多年，不但从伙计变成老板，还把太太和孩子都接到了黎巴嫩。“黎巴嫩越住越美，环境干净，百姓单纯。因为我们开中餐厅，所以周围很多邻居都认识我们这家人，走在街上，常常就被陌生人邀请到家里喝茶、做客。”

        即使在2006年以色列轰炸得最为猛烈的时候，徐祝明也没有离开黎巴嫩。他独自一人留下，以确保餐厅正常营业。那时，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出门吃饭，他的工作就是为华人记者做晚饭，有时给使馆送些食物。每天打烊后，在没有一盏街灯的道路上，除了自己的汽车外，徐祝明再也看不到别的车子。“未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我不会离开黎巴嫩，不会扔下小中国，毕竟我十多年的心血都在这儿了。”

        其实，这次战争爆发前，黎巴嫩的连环爆炸案就层出不穷，连当时的总理哈利里和几名政要都相继被炸身亡，战争之后，黎巴嫩又开始闹静坐、搞游行。接连几年下来，小中国的生意备受影响。不过，徐祝明总是对自己说：“明年就会好的。”

        让徐祝明一家更加坚定留在黎巴嫩的原因，是孩子的教育。黎巴嫩语言环境得天独厚，在这里读完高中的学生，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一般都不成问题，而且还可以直接进入欧美的大学。“因为华人少，孩子在学校里就像中国熊猫一样宝贵，老师、同学都喜欢。孩子开心，我们也就安心留下，尽全力为他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每当看到孩子能用4种语言和不同的人交流，就是徐祝明和太太最大的安慰。

        熊猫餐厅的苏晓岚，也是从当年的餐厅打工族做到老板。她的餐厅开在贝鲁特北部的亚美尼亚基督教区，受到战火的威胁较小。苏晓岚并不觉得在外打拼有什么辛酸，对近在身边的战争也不感到有多可怕，“仿佛就是听别人讲了一个故事”。对于苏晓岚来讲，黎巴嫩就是气候好、人漂亮，虽然餐厅的营业只能度日，不能发财，但是生活了十多年、她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悠闲。

        在比布鲁斯帮助黎巴嫩人经营中餐厅的冯予捷，就算2006年身陷枪林弹雨中也没有离开。黎巴嫩面积很小，以色列的飞机在上空盘旋，很快就飞完一圈，飞机的嗡鸣声不绝于耳。餐厅新来的中餐厨师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害怕，表示“像苍蝇一样，简直没办法工作”，没几天就辞工走掉了。看着自己精心布置的餐厅摆设、亲手绘画的壁画，冯予捷实在舍不得走，而且餐厅老板当时已经去了美国，她再离开的话，餐厅就必须关门。况且，战时很多人都躲到餐厅所在的基督区，因此生意特别好，冯予捷只好自己亲自上阵，又当厨师，又做服务员。现在，她已经在这个小城生活了近十年，走在街上，到处都能见到相识的老朋友，很多当年在餐厅里玩耍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要是真的回去了，还真有些不舍。”冯予捷已经渐渐变成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在黎巴嫩，如果问当地人明天有什么计划，一定会被视为笑话。在一个不安定的国度里，“谁知道明天会怎样”成了黎巴嫩人的口头禅，他们能够确定的只有今天。

        “经历过战争的人，对生活的理解就会不同。”这是华人走过黎巴嫩战火的心得。战争让黎巴嫩人的心灵变得更加单纯，他们只为拥有生存的机会欢呼，不会为不可测的死亡杞人忧天。在生死的考验中，黎巴嫩人泰然对待战争，豁达看待生命，比谁都能轻松享受生活。就如他们自己所说：“不管发生了什么，太阳还是要晒的，咖啡还是要喝的。”

        当地普通人每月收入介于500到700美元之间，但电费、汽油费和通讯费偏高，连外出吃一餐饭也要花上二三十美元，很多人都入不敷出。即便如此，黎巴嫩人还是该喝酒时喝酒，该唱歌时唱歌，一个周末就会花掉一周的薪水。每个黎巴嫩人的家里，不管房子好坏，室内的装修几乎都很富丽堂皇，而且每家一般都有儿辆汽车，差别只在于富人的座驾是名车、新车，而穷人开的是普通车、二手车。这种“没有明天”的生活方式，说是浮夸也好，说是浪费也罢，但不管怎样，都是快乐的。

        黎巴嫩人这种乐观坚强的精神，深深吸引和感染着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华人。大家都不能预知明天，但都相信明天会好起来，战争总有打完的一天，每个人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享受今天。

        因此，这里的华人也更懂得享受生活。尽管黎巴嫩处处都有战争的痕迹，城市中遍布着被炸毁的房屋，街道拐角处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着坦克，但是黎巴嫩华人几乎都把当地的景点玩遍了。从比布鲁斯腓尼基古堡到巴尔贝克（Baalbek）的罗马神庙，从白雪皑皑的雪山到海风习习的沙滩，从北卡（Bekaa）山谷的酒庄到雪松环绕的纪伯伦故居，黎巴嫩秀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古迹，让每个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心醉不已。

        “上山滑雪、下海游泳可以在同一天实现。”人们总是这样形容黎巴嫩。山海相接的地理位置，让黎巴嫩拥有完全不同于中东国家的秀丽景色。住在北部的冯女士经常沿着海边的高速公路往返贝鲁特，“车子一边是碧海蓝天，一边是雪山丛林，我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黎巴嫩更美丽了。如果没有战争，这里就是天堂。”

        一些全职的家庭主妇会不时相约喝下午茶，聊聊煮饭买菜的话题。饮上一杯花茶，吹吹海风，她们在黎巴嫩就是这样消磨时间的。

除了照料家庭，一华人太太也会帮助丈夫处理生意上的信件和订单，或者潜心于宗教，常到清真寺上课修行、定期斋戒。来自台湾的华人太太施女士，因对伊斯兰教怀有浓厚兴趣而深入钻研，还设立了古兰经教学网站。她说：“在黎巴嫩就是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 *停电，是黎巴嫩华人的共同话题之一。由于当地政府电力供应不足，因此黎巴嫩所有的用电设施都需要私人发电机与政府供电相互配合使用。一般上，一个区域内的普通居民用电，都由一户富人家庭的发电机提供，而不少华人家庭也拥有自己的发电机。不过发电机每隔几小时便需要更换一次内芯，所以在黎巴嫩突然停电两分钟，是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事情。*

除了照料家庭，一华人太太也会帮助丈夫处理生意上的信件和订单，或者潜心于宗教，常到清真寺上课修行、定期斋戒。来自台湾的华人太太施女士，因对伊斯兰教怀有浓厚兴趣而深入钻研，还设立了古兰经教学网站。她说：“在黎巴嫩就是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 *停电，是黎巴嫩华人的共同话题之一。由于当地政府电力供应不足，因此黎巴嫩所有的用电设施都需要私人发电机与政府供电相互配合使用。一般上，一个区域内的普通居民用电，都由一户富人家庭的发电机提供，而不少华人家庭也拥有自己的发电机。不过发电机每隔几小时便需要更换一次内芯，所以在黎巴嫩突然停电两分钟，是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事情。*
* 2006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境内持续轰炸，当地近200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华人，大部分跟随中国大使馆组织的撤侨行动，暂时离开黎巴嫩。选择留下的，不是居住在未直接受战火影响的地区，就是不愿意离开丈夫与孩子的母亲，以及几名放不下黎巴嫩事业的创业者。
* 一名留下的华人太太，丈夫是当地医生，因有很多重症病人需要持续治疗而无法离开。面临战争的危险，作为人妻人母，她不愿意扔下丈夫一个人在黎巴嫩，更不能在几岁的孩子面前显出一点恐惧。“当地人已经不把战争当作一回事了，我们只要不看电视，就没有太大的感觉。”每次爆炸声响起，她总是平静地告诉孩子，这是在放烟花，设法不给孩子留有一丝阴影。
* 那些选择撤离的华人，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心有余悸。以色列轰炸黎巴嫩的机场和主要公路，也封锁了海港，使馆只能花高价租用客车载送他们，从偏僻小路辗转撤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穿着防弹衣，四处奔走，联络分散居住的黎巴嫩华人。陆路交通已经十分不安全，大家只好用中国国旗遮盖着车顶逃难。
* 有的华人不巧正在其他城市出差，为了赶回贝鲁特随使馆撤离，花了上千美元才租到一辆车子。“车子在山里蜿蜒行驶，为了安全又不能开车灯，只要有爆炸声就要停下来，手抱住头部等着轰炸平息。平时两三个小时的路程，足足走了一夜。”回到贝鲁特，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被吓出的冷汗浸透了。
* 随着战事的恶化，陆路的安全已经无法保障，使馆只好借助希腊的撤侨船只，让最后的20多名华人从海上撤到塞浦路斯。
* 幸运的是，没有一个华人在这次黎以冲突中受到伤害。然而，不管是对黎巴嫩人还是当地华人而言，战争还是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伤痛。
* 2002年，出身于北京什刹海武术学校的武术高手陈朝阳，听朋友说黎巴嫩没有人教武术，搞个中国武术俱乐部应该很有发展。于是，他心血来潮，带着两个集装箱的货物就闯到了黎巴嫩。
* 由于考察不足，来到以后才发现，个人投资办俱乐部并不容易，而且带来的货物根本卖不出去，最后都砸在手里。无奈的他只好自己碰碰运气，到各个健身中心寻找当武术教练的机会。
*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陈朝阳在自己住处附近找到一家当地的武术俱乐部。俱乐部对这名送上门来的中国武术高手欢迎之至，马上就聘请他在此授课。他的加盟，让俱乐部一下成为贝鲁特最有名的武馆。很快地，陈朝阳受黎巴嫩武术协会之邀，担任国家武术队的总教练。
* 他的幸运只是刚刚开始。“好教练遇到好学生，和好学生遇到好教练，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陈朝阳在众多学中发现一株习武的好苗子——瓦池。孩子的父亲全力支持，甚至把自己工厂的厂房改装出一个房间，专供陈朝阳训练和居住。
* 经过教练、孩子、家长的共同努力，瓦池在2006年的欧洲武术锦标赛中，获得少儿组的长拳、武术和棍术3枚金牌。他在多哈亚运会上的精彩表现也引起各界瞩目，被誉为阿拉伯国家武术界的明日之星。
* 然而，在这些成就的背后，陈朝阳也有很多无奈。由于黎巴嫩战事不断，很多重要的国际比赛，国家都无暇支持，所以很多时候都要教练和学员家长自掏腰包去参加比赛。“出国比赛，住宿、饮食经常自己贴钱，但是没有办法，谁叫我在黎巴嫩呆了这么久，教了这么多学生。现在已经离不开了，因为这就是我的事业。”
* 让陈朝阳感到安慰的是，他和弟子们已经亲如父子。尤其是瓦池，由于常常去中国集训，生活饮食已经很中国化了。“没想到来黎巴嫩同化了一个当地孩子。”陈朝阳开心地说。不过，他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华人孩子习武的太少，目前只有华人太太赵颖的儿子在学习。“毕竟血液里有中华文化的因子，如果用心培养，成绩将不可限量。
* 黎巴嫩华人说，有时候天堂与地狱只是一步之差。在这个既美丽又动荡的地方，愿意不离不弃而留下的华人，都是因为对黎巴嫩有着真挚的喜爱。
* 无论是华人太太，还是意外留下创业的华人，他们心中永远有着「自己的黎巴嫩」，尽管没人知道这里的明天将会如何。

“日出之国”——日本

    提起“日出之国”——日本，总让人联想起勤奋、自律的日本人民。日本，如今已成为世界人口排行第十的国家，地狭人稠，平均每平方公里住着337人，最繁华的东京圈人口则高达3千万。

      国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日本在二战后迅速摆脱了“战败国”的形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超过10%。此后，日本经济一直稳健发展，特别是在汽车制造业、电子产业等领域表现卓越，傲视全世界。

      2007年，日本更创下4385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可惜好景不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与此同时，日本人口老化现象继续恶化，劳动力短缺，但日本政府却始终拒绝接纳大规模的移民。

      如今在日本两百余万名外国人当中，华人人数已超过70万，成为在日本的第一大外来族群，其中11万左右已入日籍。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之间在历史上的两场人尽皆知的战争，是两国人民心底的疙瘩，尽管如此，也磨灭不了他们这两千多年交往所建立起的深厚情谊。

      华人迁移日本最早的记录可追溯至秦汉时期。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命令徐福率领3千童男童女以及能工巧匠东渡，以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倘若“徐福东渡”的事迹属实，那么徐福就成了最早旅居日本的华人。

      南北朝时代，中国政局动荡，出现了集体东渡的现象，不过自隋唐开始，集体东渡的现象便有所减弱，大多数华人用个人身份迁移日本，其中以商人及僧人居多，他们主要是到日本经商和弘扬佛法。此外，也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与学者侨居日本，他们将中国的农耕、制陶、建筑、炼铁和纺织等技术引入日本。同时，日本也派遣了“遣隋使”和“遣唐使”到中国观摩学习，将中国的礼仪以及制度传回当地。中日的频密互动对日本的文明进程起了关键作用。

      宋元时期有更多的华人抵达日本。当年，他们大多都聚居于福冈市（Fukuoka）的博多（Hakata）。12世纪50年代，居留在博多的宋人已经高达1600人。当时，宋人聚居的博多笤崎宫前一带建了许多中国式的房屋和祠堂，被称为“宋人百堂”。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开始动荡，沿海一带有不少百姓逃往日本。他们和大部分旅居日本的明朝商人一样住在长崎（Nagasaki）。 17世纪，华人在长崎先后建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和圣福寺，合称“唐四福寺”，四福寺成为当时两千多名华人的礼佛以及联谊中心。

      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实行了“开国”政策，解除海禁，到长崎进行贸易的清朝商人因而逐年增加。接着，日本也开始“安政开国”，先后开放横滨（Yokohama）、长崎、神户（Kobe）和大阪（Osaka) 这些港口城市，吸引了许多中国以及欧美商家前往经商。欧美商家鉴于与日本社会之间的语言及文化隔阂，经常雇用华人充当买办或代理商。此时，在各开放的港口城市均出现了华人聚居地，横滨自1859年正式开埠以后，便迎来了大批的外国商社，在开埠初期，大约有四五十名华人在此居住，1870年，登记在册的华人人数已超过一千人，成为华人人口最密集的港口城市。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登陆日本的华人多数来自广东、福建、山东、浙江、江苏及江西三省（在日华人社会统称为“三江”）等地，他们大多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其中也有不少是“三把刀”业者（即厨师、理发师和裁缝）。

      自1871年，中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后，旅日华人的人数便开始激增。虽然名义上华人可以自由进出并进行贸易活动，但现实中，华人在居住和经商时都受到了不少的限制。为了生存及发展，在长崎、神户、大阪、东京、横滨、函馆（Hakodate）等城市的华人便基于地缘和血缘建立起各自的乡团组织，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尽管日本政府制定了各项法令限制华人在日本的活动及就业，但是当地华人人口仍然不断地增长。

      19世纪后期，日本奉行军国主义，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便开始对中国进行多次侵略。此外，日本也极力限制华人入境，且对在日华人加以羞辱。华人人数在动荡的局势中缓慢增长，1930年，全日华人人口约 2万7千余人。东京后来居上，华人人口超过一万人，成为华人最密集的地区；神户华人人口约有八千余人，位居第二；横滨5千余人，位居第三；而华人早期的聚集地——长崎的华人人口却只有两千余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在日华人社会的发展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华人经济一蹶不振，社团被强行解散，侨校也被下令停办。在日华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期间，有逾一万名华人放弃在日的家业，返回中国投入抗日的洪流。

      二战结束以后，有不少华人前往日本寻亲、经商、工作，并定居下来，导致华人人数大增。旅日华人以“战胜国”侨民的身份得到了优遇，不论是在经济或是社团组织等方面，都迅速恢复元气，发展也颇为顺利。

      20世纪60年代，有不少在日华人迁居至欧美等地，导致在日华人人口滑落。直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华侨华人的人数始终保持在5万人左右。

      从1980年开始，以留学、研修等名义前来日本的华人迅速增加，日本华人社会呈现出一番全新的景象，朝气勃勃。有人将1980年以前旅居日本的华人，称为“老华侨”，而1980年之后才登陆的，则称为“新华侨”。

      虽然华人社会在日本的历史悠长，但在中日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华人社会发展始终受限，影响力也不会太大。中日两国的关系至今仍然十分敏感，两国的人民均无法完全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彼此之间的关系既亲密又疏离。

* *孙中山深受中、日两国人民爱戴，他的革命事业，获得了日本华人和神户不少日本企业家的支持。当年他于革命期间多次流亡日本，前后造访神户市达18次之多。在神户舞子公园处，就有一座由该市市政府管理的孙文纪念馆。*
* *1995年1月17日，爆发了阪神大地震，当地华人很快成立了神户华侨赈灾对策总部，与日本当局戮力合作，积极展开抢救和善后行动。唐人街严重毁坏，但不少中餐业者仍在短时间内，冒着寒风，为灾民送上热腾腾的食物，显现出中日人民同舟共济，团结奋斗的精神。（神户华侨博物馆提供）*
* 站在东京最繁华的涩谷街头，熙攘的人群里，实在难以辨认谁是华人，谁是日本人。
* 华人说：“只要不开口，很少人会怀疑你不是日本人。”由于华人和日本人外形相似、文化相近，因此，华人在日本社会中，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 华人主要聚居在东京、横滨、大阪和神户。另外，在名古屋（Nagoya）、长崎甚至北海道（Hokkaido）也有不少华人。换言之，华人的足迹已遍布日本各地。
* 如果说日本的经济是一台精密又复杂的机器，那华人就像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和别的部件一起默默维持着系统的正常运作。这些年来，华人无论是为了融入当地，还是为了中日友好，总是不懈地努力着。他们涉足各行各业，与日本人一样长时间埋首工作，敬业乐业。
* 日本消费水平偏高，人人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华人自然也不例外，但他们坚信只要肯努力付出，安定、舒适的生活并不难求。中产阶级的华人最多，其他多半是工薪一族。他们不刻意追求物质享受，较重视生活的质量，华人家长更是全力让子女接受优质的教育。
* 今天，大部分“老华侨”在日本已经扎稳了根，安享丰收时刻。“新华侨”则仍处于挥汗撒种的耕耘期，他们坚信，只要肯努力，终有一天，他们也能像“老华侨”一样，在日本安居乐业，成为这大家庭的一员。
* 早期定居日本的“老华侨”，几乎都与“三把刀”行业扯上关系。
* 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加上当年日本政府严格限制外国人的职业选择，他们唯有依靠劳力谋生。“三把刀”中，剃刀（理发业）、剪刀（洋服业）已为时代所淘汰，仅有菜刀（餐饮业）留存下来，还在日本各地发扬光大。
* 如今，餐饮业成了新老华侨奋斗的领域。日本的中餐馆总计有多少家？很多人都答不出来。有人这样比喻：“日本中餐馆的数量可比得上日本人最爱的‘帕青高’游戏中心（Pachinko）的数量。”
* 中餐魅力大，受到日本社会的欢迎。忙碌一天之后，很多日本男人都爱到中餐馆来吃顿饭，喝杯酒。每当傍晚霓虹灯亮起，中餐馆便开始觥筹交错、高朋满座。
* 华人、日本人的饮食习惯，相似之处很多。例如，日本人的拉面、馒头及糯米等，近似华人的饮食风格。中国的普洱茶、乌龙茶、烤鸭、上海螃蟹等，如今也广受日本社会的欢迎。随着华人人口的上升，上海菜、四川菜、广东菜和北京菜，在当地都有了市场。
* 华人笑道：“日本人、华人饮食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日本人吃的，华人都吃；日本人不吃的，华人照样吃。”如今，普通华人超市售卖的中式速食越来越多元，如冷冻馒头、汤圆和饺子已成畅销食品，华人和日本人都喜爱。一些大型华人超市还售卖起中式熟食如红烧猪蹄、炒猪耳等，华人视为珍宝，但日本人则不敢恭维。
* 日本人做事细心，对吃很讲究，要求色、香、味俱全。因此，日本的中餐一般手工精致，卖相极佳，水平、价格都位于中上标准。
* 除了餐饮业，“老华侨”也活跃于商业贸易领域。“老华侨”创业经商最讲求信誉，作风踏实，曾创出不少知名品牌。不过在日本素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日本中华总商会一名理事指出：“政府征收的遗产税偏高，遗产越传就越少，到了第三代，往往就所剩无几了。”正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能继续发扬家族企业的例子并不多。不少由华人创办的企业，最终都渐渐演变成上至董事，下至生产操作员，几乎清一色是日本人的情况。
* 一些土生土长的“老华侨”后代，对继承家族小生意缺乏兴趣，倾向自行创业，一些则选择在大学毕业后，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过安稳日子。另外，从事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职业的华人专业人士也为数不少。
* “老华侨”刻苦耐劳、勤奋谦虚，为整个华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他们受到日本民众的肯定与尊重，是华人与日本社会沟通的主要桥梁。
* 近二十多年间，“新华侨”通过留学、研修、经商、公务、文化交流等渠道，陆续登陆日本。其中，以留学生身份入境的人数最多，完成学业后，他们一般就在日本工作、安家，扎下根来。
* 住房问题，成为所有在日的“新华侨”所要面对的第一件事。当过留学生的华人回忆道：“大家都有过挤四迭半的苦日子。那小小的空间，总是潮乎乎、软塌塌的。”
* 所谓四迭半，就是相当于9平方米左右的空间，约有4张半榻榻米面积大小。许多单身赴日的华人，尤其是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都曾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度过了在日本最初的岁月。日本的房产价格奇高，不少人奋斗了大半生，依旧没能力拥有自己的房子。约90%的在日华人，都住在租来的公寓或政府组屋里。
* “新华侨”大多是单枪匹马到日本闯天下。他们散居在日本各城市，以东京首都圈人数最多。东京的池袋，更已成了“新华侨”的聚集地。在池袋，华人的杂货行、旅行社、食品公司、书店及报馆等，各处林立。穿梭在街上鱼贯的人群中，耳际不时传来熟悉的华语。
* 近几年，涌入日本的“新华侨”不乏高学历、高收入的青年才俊。选择创业的“新华侨”，除了驰骋于商业贸易、餐饮业等传统行业外，还进军科技、信息和文化等领域。华人在日本创立的数百家软件公司，几乎全由“新华侨”创办。此外，他们也出版中文报及中文杂志，开拓华文媒体的市场。
* 与“老华侨”低调、朴实的作风相比，“新华侨”显得更具信心和野心。“老华侨”一般稳守江山，“新华侨”则努力进军、开拓新市场。“新华侨”善于利用各种宣传渠道，注重包装，积极树立品牌的口碑、形象。因此，他们特别喜欢经营连锁店，企盼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市场，赚取高额盈利。目前已有几家“新华侨”创办的企业在日本成功上市，这些上市企业，一般都拥有数千名员工，全年营业额超过百亿日元，业绩骄人。
* 随着中国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一些赫赫有名的中国企业，如中远集团等，都已经进驻日本。此外，中国的一些银行，也纷纷到日本来设立分行。
* 1999年，由新老华侨，以及拥有中资背景的日本企业共同组成的日本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这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华侨华人经济团体，拥有百余名会员，定期举办各种经营管理讲座、交流会和经济论坛等。日本中华总商会成立至今，不断发展壮大，努力推动着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促进中日友好关系。
* 新老华侨中人才辈出，除了在经济领域表现出色，更有不少华人学者、专业人士在大学、研究机构中任职。如今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中已有超过3千人取得博士学位，约2千人在日本大学担任教授和副教授。
* 由华人博士、教授创立的“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组织在日华人学者，自资结集出版了中、日文学术报告，也定期举办交流会，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日商贸合作日益紧密，中文热潮也在日本蔓延开来。在密密麻麻的外语招生广告中，“中文班”的招生广告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显眼。不少华人父母都认为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掌握中文和日语的双语人才必定最吃香，因此，他们都鼓励孩子学习中文。
* 目前在日本约有2万5千名年龄介于5至14岁的华人儿童及青少年，但仅有五所全日制的华侨学校。它们分别位于神户、横滨、大阪和东京，总共只能容纳约2千名学生，供不应求，故入学竞争非常激烈。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近几年，那些为新移民子女特设的周末中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解决了“新华侨”子女学习中文的问题。
* 由于华侨学校在法律上不受日本政府承认，得不到教育部津贴，主要依赖华侨社会的捐献、学生的学费及各单位提供的补贴，故校方在短期内根本没能力扩建校舍来容纳更多学生。
* 神户同文学校校长金翼无奈地说：“报读人数逐年增加，我们唯有通过小学入学考试的方式，让学生公平竞争，以获取入学资格。”
* 华侨学校主要提供小学和初中教育，有些还设有幼儿园。在小学阶段，课程内容都是根据中国大陆、台湾的教材编写，让孩子从小接触中华文化，了解民族的历史。一名老师说：“上课时，我们中、日语交替使用，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把日语当母语，孩子完全没有中文基础。”
* 对这些小学生而言，中文比日文难学得多。尽管在听、写方面还能应付，但一开口说起中文，却又信心不足。一个华人少年，操着不甚流利的中文道：“小时候，身边的朋友都说日语，中文没人听得懂，所以我觉得中文没什么用，就不太愿意去说了。”大部分年轻人是在升上大学之后，才体会到掌握双语的好处，并开始自动自发，重新学习中文。
* 由于华侨学校的文凭不受承认，学生念完初中后，必须到日本学校继续念高中。为了让学生们顺利升学，华侨学校的初中课程，完全采用日本初中教育的教材。
* 神户华侨学校的训导主任杨震雄说：“无论黑板上、课本上，或是学生的笔记，写的都是日文。只不过，老师们仍用中文讲课，让学生始终能有鲜活使用中文的机会。”
* 大部分华侨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能顺利考入日本高中，例如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高中升学率为100%。因此，华侨学校成了日本社会眼中的名校，不少日本家长都想送孩子前来报读。
* 华侨学校向来也是华侨社会相互联系的纽带。在日本，凡有华侨学校的地区，华人子女大都毕业于该校。华人即使初次见面，只要说出自已是华侨学校的校友，彼此马上熟络起来。在神户同文学校执教超过30年，退休后担任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的蓝璞走在神户街上，总有许多受过他教诲的学生亲切地唤他一声“蓝璞老师”！有些还恭敬地90度鞠躬呢！
* 对 “新华侨” 来说，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最大的烦恼。华侨学校不多，收生名额少，他们年幼的孩子大多就只能接受当地的义务教育。中文虽是家中沟通的语言，但一旦踏出家门，便无用武之地，中文水平也就难以提升。
* 日本的周末中文学校，主要就是为这些“新华侨”的子女而设，让他们通过每周约90分钟的时间来学习中文。目前，拥有12年历史的同源中国语学校，已成为东京规模最大的周末中文学校，分布在东京十个不同的地区，学生人数达1千人左右。理事长杨林说：“父母的表现很积极，风雨不改送孩子来上课。然而小孩的兴趣、耐力不足，程度一加深，就想放弃了。”
* 日本的华侨华人，始终在困境中认真办学，华社热切希望日本政府，能及早予以华侨学校应有的法律地位，让它能突破重重困难，造福更多的华人子女。
* *1898年成立的大同学校是在孙中山首倡、梁启超和康有为协助下，在横滨由华侨创办和独自经营管理的全日制学校，可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所近代华侨学校，也是今天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前身。*
* 日本社会总给人一种守礼、严谨的印象。平日电车门一开，一大群西装笔挺的男士、套装齐整的上班族一拥而上，个个脸上神情冷静，营造出日本社会严肃、低调的整体形象。至于那些“老华侨”、土生华人，或居住超过三五年的“新华侨”，无论气质或生活细节上的表现，已俨然是一个“日本人”了。
* “日本社会讲究团体精神，华人的融入，可说是很自然的，而顺着主流社会的方式去生活，也轻松得多。” 这是在日华人最大的体悟。在日华人受日本文化影响的部分还真多。例如，彼此碰面或告别时，以鞠躬代替握手，说话时语调轻柔，与人相处不过分热情，学生和上班族都习惯带便当出门等。
* 此外，华人也跟日本人一般，开始讲究 “空间文化”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华人说：“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正是这个意思。” 举凡串门子之类的活动，在当地华人社会并不多见，他们尊重彼此的隐私，公私分明。平日也都忙着各自的工作，往来不多。
* 欣然融入当地生活是一回事，归化为日本国民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中日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让在日华人在选择时多了一层犹豫和顾虑。
* 目前，日本政府希望透过教育，以及更宽松的归化条件，吸引华侨归化为日本公民。不过，一些早已落地生根的老华侨，却始终不愿入籍日本。
* “他们贡献良多，单是长期缴纳的税务就是天文数字。不过不入籍，他们就永远没有参政的权利。” 年轻华人惋惜地说。
* 近年来，入籍的华人越来越多，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本身对日本没有深厚的情感，纯粹是为了旅游、事业及生活的方便等因素，而选择归化；第二类则是因为打从心底喜欢日本，才毅然选择归化。一位入籍日本的华人说：“归化前不知道何去何从，归化之后，家就在这里了。”
* 但无论入籍与否，华人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还是会深埋在心底。一些传统节庆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依旧会激起在日华人的热情。对华人而言：“形式上是元旦热闹，但内心深处，还是春节最重要。”
* 由于春节并非公假，大多数华人仍须照常工作、上学。结束忙碌的一天后，有些人回到家边吃饭边收看电视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感受热闹的过年气氛；也有人通过长途电话向远方的亲友拜年。
* 许多国际婚姻下出生的孩子，或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华人子女，对春节并无深切的感受，甚至缺乏具体的想像。因此，有些父母会带孩子去逛一逛春节色彩浓厚的唐人街，顺便向孩子解释华人传统春节的点滴。
* 近年来，日本政府也费尽心思在华人春节期间举办一些旅游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日本观光，营造热闹的春节气氛。尽管整体而言，日本的年味是淡了些，但每次春节的来临，还是让许多在日华人深感温馨。
* 至于元旦，则是日本社会最重视的节庆，举国放假一星期。国情如此，许多在日华人干脆就把元旦当作春节来过。不少华人家庭全家聚集在一起包饺子，吃中式烹调的日本年糕，有些父母也会给孩子发压岁钱。
* 此外，华社之间也会互相拜年祝贺，往往还有热闹的团拜活动。横滨的中华街及神户的南京盯，每年都呈现舞狮舞龙，以及传统中华舞蹈、杂技等表演，与日本社会一同欢度新年。
* 此外，每年清明节也是 “老华侨” 非常重视的节日。在神户，华侨拥有自己的中华义庄。清明这一天，中华会馆就在义庄的祝堂举行公祭仪式，而其他华侨家庭，也会在清明前后的一个星期，到义庄来扫墓，以寄孝思。
* 目前， 在日本约有60多家平面、电子中文媒体，其中90% 都是“新华侨”在经营。自《留学生新闻》于1987年创立以来，日本中文媒体圈越发热闹，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营运超过15年的《东方时报》和《中文导报》，称得上是实力强，表现突出的中文报。
* 近年来，日本东京的池袋，成为新一代中文媒体的集中地，《半月文摘》、《华人周报》、《阳光导报》等中文报都在此营运。
* 身为传媒大国的日本，日本大报——《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每日发行量超过1千万份。相比之下，中文报在当地可谓小巫见大巫，微不足道。《中文导报》的主编杨文凯坦诚地说：“日本政府从不严加管制中文报，因为它对当地主流社会的影响微小，没有任何威胁力量。”
* 如今 “新华侨” 已成为中文报的主要读者群，陪伴报馆一起成长的老读者越来越少。一部分 “老华侨” 平日已习惯阅读日文报，听日语新闻，另外通过华侨总会或各宗亲团体发行的会讯、月刊来掌握华社发展动态。不过在进入科技时代后，日文或中文报纸对年轻人而言都不重要，他们能吸收资讯的渠道太多了。
* 读者群的流失，对中文报的收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更大的威胁，却来自于免费报。不少企业集团纷纷办起免费报，给传统报业带来了激烈的竞争，更影响了传统报业的发展。
* 现在，大多数办报人已将办报看作一门生意，而非文化事业。坚持内容质量的报人不得不感叹：“文人办报，已成过去。”大多数的免费报纸都以广告为主，如同广告合订本，正如一名中文报记者所说：“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的资讯，大家还能要求什么呢？”
* 随着近年来日本的中文热不断升温，有人相信中文报业必定能找到生存的空间。目前，中文报除了为华人读者提供讯息外，对学习中文的日本人来说，更是最生动鲜活的教材。
* 横滨规模最大、最繁忙的中华街，就坐落在横滨中区的山下町。岁月悠悠，它见证了老华侨在日本创下的辉煌成就。
* 横滨开埠140年，中华街风雨相伴，对横滨的发展影响很大。
* 如今，山下町住着3千名左右的华人，中华街是他们生活、工作、休憩及休闲玩乐的所在。
* 2004年，横滨的高速铁道开始运作，不但“元町 – 中华街站”被设为终点站，还有电车直达中华街。交通网络发达，使中华街的知名度大幅度提升。除了年均游客增至1800万人次外，直接的经济效益更高达500亿日元之多，令人刮目相看。
* 中华街各处，色彩鲜艳、古典精致的牌楼林立。走过牌楼的霎那，人仿佛坠入了神秘的时光隧道，来到了繁华的旧上海。两旁街道上尽是中餐馆、杂货行和会馆等，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鳞次栉比，散布在中华街的各个角落。
* 漫步街头的游人，偶尔抬起头来放眼望去，还会看到那传播中华文化的展览空间——“九龙陈列窗”，将中华街的特色展露无遗。
* 这条街上，不但洋溢着浓厚的华人色彩，还充满了生命的热力。
* 横滨唐人街团体联合协议会副会长曾德深指出：“这里的惯例是华人开餐馆，日本人供应食材。”多年来，中、日双方合作密切，打造了这条和谐繁荣的中华街，横滨市民更一致推介中华街为不可错过的旅游景点。“日本人一直都是中华街的主要消费群。”一名华人商家说。
* 在不少国家，宗教团体总是华人圈子里最活跃的团体。然而，在日华人中的“新华侨”，却多数没有宗教信仰，只有部分华人信仰佛教、基督教、道教或神道教。“老华侨”们则大多对于民间信仰较为重视。
* 由日本华侨建立起来的关帝庙，在当地名气非常大。在日本列岛上兴建关帝庙，已有120多年的历史。目前，在神户、横滨、长崎和函馆，都耸立着富丽、庄严的关帝庙。
* 其中，位于横滨中华街上的关帝庙，不仅作为横滨华人的守护神，也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尽管它曾多次毁于火患，但华人却一次次合力将它重建。位于神户的关帝庙，也曾遭受空袭、火灾、地震等摧残，但每一次也都在华社的协力襄助之下，重新修复起来。
* 横滨关帝庙，经年香火不断，除了华人信徒的膜拜，来访的日本、外国游客，也总是络绎不绝。每年的关帝诞，横滨关帝庙都会举办盛大的庆典，中华街上的每一户人家，每一间商店，都热烈地参与。热闹的游行，精彩的舞狮、舞龙、踩高跷、民族舞蹈等表演，吸引了大批群众围观，连日本电视台都特地前来拍摄。
* 每年8月中旬，神户的福建同乡则会在神户关帝庙里举办“水陆普渡胜会”，超度亡魂。诵经之余，大会上也焚烧金银纸品，祭奠十方冥灵。1997年，“水陆普渡盛会”还被列为“神户市地域无形文化财产”，受到充分的肯定。“不过，传统上必定出现的纸扎‘鬼王’却没了，因为日本人觉得鬼王的造型实在太可怕了。”当地华人笑着说。
* 近年来，神户关帝庙也成了华人、日本人赏月的好去处。烟霭氤氲的庙宇，显得古色古香，空气中飘扬着悠扬的二胡声。人们一边欣赏着素色流辉的月华，一边品尝月饼和中国茶，过个不一样的神户中秋节。
* 一位日本老华侨给儿子地出了这么个问题：“一场足球赛，若碰上日本对垒中国，你会支持哪一方？”儿子想了想，答道：“我心里支持中国。不过中国赢了，我也不会表现得太兴奋，还要顾及日本朋友的感受嘛！”这个回应，也是大多数华侨内心深处，最真切的答案。
* 如今，日本华侨社会正逐渐转型为华人社会。然而，许多华侨在归化后，心理上却从未放弃“华侨”的身份，这份矛盾的情感总是难以厘清

韩国

  大韩民国简称韩国，位于亚洲朝鲜半岛上，北部以北纬38线与朝鲜相隔离。由于朝鲜与中国大陆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人民互动频密，经常越境进入他国。有学者更认为朝鲜半岛是世界上最早有华人的国家。

       首都首尔（旧称汉城）人口大约为1063万，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朝鲜半岛最大的城市。20世纪60年代的贫穷国家韩国，通过高储蓄率和高教育水准，在短短的40年间，经济迅速起飞，跻身经济发达国家之林。

       虽然在1997年因金融风暴而受到挫折，但是经过国民同心协力，韩国在短时间内克服了危机，重整汽车、造船、电子等主力产业，恢复了国家竞争力，表现杰出，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华人正式以侨民身份定居韩国，是从1882年壬午兵变的那段时期开始的。那时候，山东登州的吴长庆将军受清廷的指示，率领3千名士兵前往朝鲜协助平息兵变。随行的还有40名商人，而他们也正是最早抵达韩国的华商。

       那一年，朝鲜和中国还签署了《朝清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国商人开始大批涌入朝鲜。当时选择移居到韩国的华人主要来自山东，也有一部分华人来自河北及江浙闽粤等省份。

       嗣后，华人在汉城的商业活动范围从观水洞和水标洞，逐渐向南大门一带扩张。在汉城商业集中的中心区——钟路市场，也可看到许多华商经营的店铺。这些华商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商品包括麻布、棉织品、丝绸、麦粉、烧酒及金属铁器等。

       除了商业活动，也有部分华人在韩国从事农业耕种。后来因为中国的局势动荡及经济衰败，导致不少华人到韩国去当土木建筑业工人。华人在各领域皆勤奋刻苦地工作，因此很快便在韩国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实力。

       然而，日本发动战争并进一步控制朝鲜之后，韩国华侨社会蒙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1894年的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不断诱导韩国人仇视华人，借故在群山、仁川（Incheon）等地发动排华运动，并成功利用韩国人来打击当地的华人。

       在排华高峰期，超过16万的华人仓皇逃往中国驻汉城领事馆寻求庇护。在许多老华人的心灵上，这段悲惨的过去是无法磨灭的伤痕。

       1945年，朝鲜摆脱日本的统治，当时物资匮乏，华人抓紧机会从香港、澳门等地输入各类杂货以及日用品。因为贸易的蓬勃开展，华人人口开始直线上升，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中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在韩国发展起来，而专为中餐馆提供食材、炊具等用品的供应商也趁势崛起；为华人提供服务的理发业、裁缝业等同时受惠。这时，华人享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并称自己为“一等公民”。不过，这段繁盛的经济复苏期却仅是昙花一现。

       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当地华人的地位便开始直线滑落。为了保护本国的公民，韩国政府颁布许多限制外国人发展的政策，其中尤以《外国人土地管理法》对华人的打击最大，该法律规定华人不得拥有土地，不少华人只好忍痛出售家族好几代人曾经住过的房子和土地。

       有些华人被迫请韩国人代为注册，结果财产却遭人私吞，血本无归，申诉无门。此时，华人除了觉得生活毫无保障之外，更深感前路茫茫。离开，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约有两万多名华人离开韩国，美国成了这批华人的首选，有些则移居澳洲、加拿大等国。他们大多数拥有雄厚的资产，虽然已经身在国外，却仍然极关注韩国境内华人同胞的权益和发展。

       后来，华人外流的现象逐渐减缓了下来，但是韩国华人的经济发展仍然处处受限，因此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目前定居韩国的华人有两万多人，大部分散布在首尔、仁川和釜山（Busan）。他们通常以定期居留的身份在韩国居住，选择入籍的并不多。另有数十万中国朝鲜族长期旅居韩国，不过他们与汉族华人社会缺乏交流和联系，多数已逐渐融入韩国社会。

       华人在经济上的表现并不耀眼，从事小本生意者居多，在韩国几乎找不到华人创办的大企业。年轻华人则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在韩国企业或机构打工。曾经辉煌一时中文教育在华人外移潮后也面对华人学生生源不足的问题，年轻华人的中文水平偏低，华语说得流利的年轻人寥寥可数。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从大陆入境的华人人数每年都急速增加。2007年，中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已经突破3万人。新登陆的中国大陆移民已大大超越原本定居在韩国的华人人口。

       新老华人的相互配合，期盼能为华人社会注入新活力，进而扭转长期不振的颓势。

     中餐馆是韩国华人从事的传统行业。正如当地华人所说的：“如果说华人把生与死都寄托在餐饮业上，一点都不为过。”

       韩国中餐馆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才算真正兴盛起来，在五六十年代的巅峰期，大约有58.2%的华人从事餐饮业，中餐馆共有2300多家。当时人们认为上中餐馆用餐是一件体面的事。

       从70年代开始，因政府法令限制，很多中餐馆难以为继。不少韩国人学徒在学满之后，也纷纷自立门户。到1999年，华人经营的中餐馆只剩下680家，而且规模一般都不大，通常只能招待6至10桌的客人，稍具气派的中餐馆更是屈指可数。

       唯一不变的是，炸酱面依然是韩国人最爱的中华料理，甚至成了“镇馆之宝”。仁川的中餐馆是这种韩式炸酱面的发源地。早年仁川开港，大批苦力到来，为苦力们提供三餐的华人餐馆，创出这经济实惠且可口的韩式炸酱面。

       炸酱面的成本很低，如今售价也仅约三四美元，可算是最便宜的一道中华料理。一般受薪人士每周会吃上4至5次。虽然一些韩国人把华人戏称为“炸酱面”，但薄利多销的炸酱面还真是养活了不少华人。如今就连在美国，也有很多来自韩国的华人在中餐馆出售这独一无二的“韩式炸酱面”。

       中餐馆主要的客源都是韩国人，因而口味都较为清淡。无论是炸酱面、小笼包或饺子等，上桌时都一定会附上韩国人最爱的泡菜和其他酸菜。韩国人曾千方百计地拒绝外国人和外来文化，但华人却把中华美食融入韩国的日常生活，进而征服了韩国人的味蕾，可说是华人在韩国的一大成就。

       年轻一代的韩国华人一般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因而不像父辈一样局限于餐饮业之类的传统行业里。

       一名年轻的华人大学生说：“华人子女在韩国升学时压力并不大，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外国人’，可以以优惠分数进入不少热门科系，比如医科。”不过，外籍身份让他们在择业时受到颇多限制，华人绝少有机会担任律师、教授或公务员等职位，大多专注于传承和发展家族事业，或自行创业，或加入其他企业机构成为工薪族。

       华人的就业圈其实非常狭小，可供选择的职业并不多，中医在韩国被称作“韩医”，是华人社会中的常青职业。韩国人对韩医学的接受度相当高，并且深受影响，就连畅销韩剧《大长今》也大力宣扬韩医学。由于“韩医”书籍都以汉字书写，掌握汉字的华人子弟就占了优势，学习起来更省功夫。在韩国由华人经营的韩医院超过百间，药房也有数十家。华人当“韩医”，一般都拥有不错的收入，也受到社会尊重。

       除了“韩医”，一小部分成绩优异的华人子弟，则成功考上韩国大学的医学系或牙科系。从医的华人可以晋身上流社会，过舒适生活，也容易被韩国社会接受，甚至受到重视，他们可算是最不想离开韩国的华人群体。

       旅游业是另一个受华人欢迎的行业。近年来，韩剧风靡亚洲，慕名前来观光的华人游客不断增加，兼通韩语和华语的韩国华人就成了最佳的导游人选。拥有足够资金的韩国华侨则开办旅行社，除推出吸引华人的韩国旅游配套外，也为韩国人设计中国观光团。随着两国人民的往来日渐频密，不少华人旅行社仅以代购机票为主业亦能生存。

       此外，随着韩国流行文化在各国大受欢迎，亚洲华人对韩国商品如服饰、礼品、化妆品等青睐有加，有些韩国华人看准时机，成立了包装公司，为来韩国选货的商家包装商品，然后寄往海外销售。

       与此同时，“中国风”也吹向韩国，韩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在不断高涨。为此，许多韩国华人或华人留学生做起中文辅导老师，向韩国人传授中文。不少从台湾留学归来的韩国华人也投身教育，把所学知识传授给当地华人，继续推广中华文化。有些华人更在大学里任职中文系讲师。

* *旅居韩国的中国朝鲜族使用韩语沟通，生活方式与韩国人一样，非常容易融入韩国的社会。如今，华人社会仍在辩论是否要将朝鲜族归为新华人移民统计，若是加上这些朝鲜族人，韩国的华人总人口可能已经超出了十万人。*
* 与韩国华人谈起生活，他们总是欲语还休，眼神中有矛盾，语气中有些许失意。他们在经济上没有骄人成就，最叫人困扰的是模糊的身份。他们生活安稳，却总觉得不踏实，当然也就无法真正地快乐起来。
* 华人中，约90%祖籍山东，持台湾护照。他们生活的重心都在韩国，有些已经在韩国繁衍至第四代，但家族中却无人申请入籍。在韩国他们被当成中国人看待；到台湾或中国大陆，他们则被看成韩国人。华人苦笑说：“真是生的不亲，养的不爱。”
* 未取得韩国国籍的华人在生活上面对不少障碍。经过多番争取后，在2002年3月，韩国政府终于给他们颁发永久居留权。在这之前，他们只能以“定期居留”的身份在韩国生活，每三、五年必须更新居留申请。有些人因错过了申请期限，而离开韩国。
* 现在华人申请入籍的条件放宽，程序也已经简化，比如不需要参加韩文考试，入籍时也不需要宣誓效忠韩国。不过，许多华人并不积极申请入籍，从1992年至2006年，入籍的仅有2004人。
* 获得永久居留的身份之后，华人所享受的福利并没有提升，比如无残疾福利和医药福利。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网站和手机服务依然把永久居留者当成外国人，而无法注册和使用相关服务。华人无奈地说：“虽然可以永久居住，但我们依然只是个外国人而已。”
* 虽然华人都要像韩国公民一样，定期缴纳各类税金，但却没有被给予参政的权利。2006年，韩国政府终于让居留三年以上的华人拥有地方选举投票权。不过，不少华人却认为，华人居住地不集中，零零散散的华人选票，在地方选举中发挥不了作用，也难以为华人争取到任何福利。
* 人数不多的华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密集的华人住宅区，他们大多分散居住在韩国各地。不少华人碰面时，总会讨论起哪一处的房子比较好，哪边的房子价格便宜等，从而推荐亲戚朋友一起居住，当起邻居，形成小小的华人圈子。与许多韩国中产阶级一样，华人大都有能力买房子，最多人选择在公寓的小单位里，筑起自己的安乐窝。
* 其实，韩国的房价不算贵，一般中等收入的华人家庭，都有能力购买房子。但由于之前政府对外国人购买房地产加以管制，即使再富裕的华人，也无法拥有太多的房地产。“现在虽然政策已经开放，但多数华人的经济状况并不允许我们把钱花在房地产投资上。”一名年长华人透露。
* 华人虽然保住自己的国籍，但要保住中华文化却不容易。许多华人家庭虽仍吃着中餐，但餐桌上无时无刻不能缺少的，是韩国人最爱的泡菜。许多华人离开韩国去旅行或探亲，最挂念的就是韩国泡菜。他们说：“对泡菜，从一开始的不能接受，到现在不能割舍，我们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泡菜文化的入侵，其实象征着韩国文化早已一步步入侵华人生活的各层面。
* 走在韩国街头，男性上班族都穿着西装大衣；女性则化上亮丽妆容，装扮优雅，大家都穿上最流行的服饰，画面和谐，乍看之下，根本分不清谁是韩国人，谁是华人。居善堂文化协会主席毕可信说：“韩国社会不喜欢大红色，所以即使过春节，也甚少看见华人穿上大红衣裳或传统服饰招摇过市，我们的品味，也与韩国人越来越接近。”
* 华人较为坚持的就是红白事的习俗。比如每逢婚宴喜庆，韩国人爱用高雅白色为主色，华人却喜欢以热闹的红色增添喜气。红彤彤的请柬、红包封，和韩国人的全白装饰，正好形成强烈的对比。至于殡葬礼仪，也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简化，如今选择火葬的华人比土葬的多，但许多华人仍坚持出殡当日，灵车须绕过往生者住宅，才送往坟场或焚化场。
*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华人已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但潜意识里，华人并不希望自己变成韩国人。“要我们穿上传统韩国服装过韩国节庆是绝不可能的事！”一位华人男子坚决地说。中韩两国的历史包袱，经过百年的岁月洗涤，似乎还没完全放下。
* 在这个提倡自由恋爱的年代，即使许多父母对韩国人没有太大的好感，他们却阻止不了下一代与韩国人恋爱和通婚的情况。
* 浪漫的韩剧风靡全世界，然而，生活在韩国的华人女性却感叹：“现实与电影的落差实在太大了！”韩国社会还保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一名家长说：“我们通常不反对儿子讨个韩国媳妇，但却不希望女儿嫁给韩国男人。”大多数华人父母都不忍心看着心爱的女儿嫁入韩国家庭。在韩国家庭里，太太必须为家人准备三餐，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把小孩照顾得无微不至，还要对长辈千依百顺。
* 繁重的家务把妇女压得喘不过气，而与韩国婆婆的相处之道，更是令许多华人媳妇费尽心思。每年多次的祭祖活动，媳妇都必须参与准备工作，如果是长媳更责无旁贷，一般必须扛起祭祖的重担，为此媳妇们必须向婆婆学习祭祖的每一个细节，小至贡品摆设，都要依照婆婆的指示，令华人媳妇头痛不已。
* 一名从台湾嫁到韩国的太太说：“韩国男人一般只负责挣钱养家，家里的大小事务，包括孩子的教育问题都由妻子打理，许多男人连孩子念几年级都答不出来。还有，韩国人嗜酒如命，丈夫下班后若有工作应酬，常常都要喝个通宵，太太也不能过问或抱怨，只能默默为丈夫守门。”
* 从相识相爱到相守，不少中韩通婚的家庭都面对了重重考验。台湾新娘游晴惠由衷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都摒弃各自的文化包袱，找到属于每个家庭独有的文化，才能拥有幸福的婚姻。”
* 韩国华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休闲活动很单调。空闲时，他们最爱的消遣就是搓麻将、和三五知已小酌聊天、唱卡拉OK、打高尔夫球、或在家中追看中国和韩国电视剧。韩国的科技和网络非常发达，年轻人都非常喜欢上网，玩线上游戏、聊天、听歌、写部落格等等。
* 随着网络日趋发达，年轻华人和海外的中文流行文化完全接轨。华人世界流行的综艺节目、歌曲、电影、偶像剧等，他们都了如指掌。不像以前，香港“四大天王”和台湾F4走红的年代，网络还不发达，追星族要到一些华人开的书店才能买到相关的光碟。中华书店的老板回忆：“当年香港的四大天王当道，每天都有歌迷排队等着买光碟、杂志等。F4也不赖，在这里的华人圈中足足红了两年。”不过，近年韩国娱乐圈和流行文化走势凌厉，不少年轻华人转而崇拜韩国偶像。
* 曾经，仁川是华人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由早期华人筹办的仁川华侨学校，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至2007年，韩国共有24所华侨小学和4所华侨中学。大多数的华侨学校创立于华人社会最繁盛的时期。各校采用的教材全由台湾侨务委员会提供，除了韩文和英文课之外，所有科目都以中文授课。
* 韩国政府不承认华侨学校，因此不给予津贴。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学生学费及华人的捐助，台湾和大陆方面则不定时给学校增设硬体设备或财政补助。学生人数较多的汉城华侨小学及汉城华侨中学，校舍以及硬体设施都健全，但一些地点偏远、人数又少的华侨学校，学习环境则不太理想。汉城华侨中学校长孙树义说：“华侨学校给教师的待遇不俗，所以优秀的教学人才并不难求。”毕业自台湾或韩国大学的华人教师占大数，也有少数韩国教师。
* 近几年，各华侨学校内中韩混血儿的比例不断增长。在汉城华侨小学和中学，大约40%的学生母亲都是韩国人。此外，一些韩国家长把孩子送到华侨学校来学汉语。如今，华侨幼稚园和小学的韩国学生比例也逐渐超越华人学生。
* 在釜山华侨小学，韩国学生占了该校总学生人数的80%。釜山华侨小学校长说：“虽然看似越来越多韩国家长选择了中文教育，但这并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华侨学校‘学生荒’的困境。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学好韩语，以方便日后升学，往往会在小四时把孩子转到一般的韩国学校学习。结果，华侨学校总会突然流失大量高年级学生，这情况不止打乱班级编排，还影响教学进度。”
* 除了汉城华侨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人数符合理想外，仁川华侨学校的中、小学加上幼稚园的总人数不足500人，和高峰期的千多名学生相比，相差甚远。其他华侨学校更是惨淡经营。
* 华侨教育之路真是困难重重，家长对华侨教育的信心也开始动摇。大多数家长希望孩子掌握好中韩双语，了解中华文化，加强孩子对“华人”的身份认知。可是也有一些家长认为华侨学校的中文教学水平偏低，无法媲美中国大陆或台湾。为了提升学生们的中文水平，校方不得不规定学生在校园内不许说韩语，但每次下课钟声一响起，同学、家长就自然地以韩语交谈。华语的使用，仅局限于课堂上。
* 家长感叹，连小朋友最爱的卡通人物都讲韩语，孩子又如何能抗拒韩语和韩国文化呢？在韩国，最缺的正是一个鲜活使用华语的环境，孩子们在家庭、邻里、朋友圈内，主要都以韩语沟通。一名家长说：“很多年轻华人虽说懂中韩双语，但说韩语时突然出现华语词，说华语时又夹杂着韩语词汇，非常混乱。换言之，双语的整体水平都下降了。”有些家长为避免孩子两种语言都学不好，干脆把孩子送到韩国学校去，专心学好韩语。
* “汉语热” 在韩国慢慢升温中，不少大型书店内售卖的汉语学习教材也越来越多元。至于华人经营的小书店，对汉语爱好者来说，更是个小宝藏，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等书籍一应俱全，比许多韩国大型书店的中文图书更丰富多元。一位书店老板说：“最受韩国社会欢迎的还是汉语教学和玄学之类的书籍。”

       华人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以韩语为主的环境。韩文书报、电台和电视节目，是华人社会吸收资讯的主要管道。华人经营的中文报章《韩中日报》因经费短缺，于2007年7月停刊，然而这对华人社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华人几乎都能从韩文报章中吸收最新资讯。韩国电视节目精彩多元，也满足了大部分华人的需求，少数华人则透过卫星电视收看中国电视台。

       近年，韩国当地报章如《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开始在各自网站设立中文版，希望华人能更了解韩国的各大政策，也希望韩国人民更清楚中国的发展动向，以加强两国的联系和交流。

       2007年11月28日，韩国第一份由韩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亚洲日报》正式出版发行，主要以报道中韩两国经济、产业和文化新闻为主，还设有华语学习栏目，为了突出中文报纸的特色，《亚洲日报》在韩国招聘了50余名经验丰富的新闻从业员，其中在韩华人占了大部分。驻韩的中国人、华人团体，以及关注中国的韩国人都是该报锁定的主要读者群。

       中文媒体既无法负起宣扬文化的责任，华人社团就扛起了这个使命。1949年后，各地纷纷成立华侨协会。目前运作尚好、规模较大的有汉城、仁川、釜山等地的华侨协会。华侨协会具有一定行政职权，比如帮助华人登记户籍和办理结婚书等。

       近年来，不少新的华人团体陆续诞生。其中，华商团体最为突出，如1999年成立的韩国华侨商人协会和2004年设立的韩国中华总商会。后者2005年在首尔成功主办了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此外，2002年2月，华人正式成立韩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不过，总的来说，华人对社团活动不甚热衷，许多团体在成立后就渐渐沉寂，活动很少。

* 韩国曾把佛教列为国教。源自台湾的佛光山在首尔设立了会所，成为华人及韩国佛教徒礼佛交流的平台。每年韩国社会隆重庆祝佛诞节，华人佛教徒也积极参与这一庆典。战后基督教在韩国发展迅猛。在华人较多的地区，宣教人士用华语广播来宣传教义，吸引华人聆听。长期以来，华人都有稳定的信徒人数，同时不少地区也开设华人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有人预言未来华人基督徒人数会不断攀升。
* 中韩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影响深远。反映在节庆习俗上，春节和中秋节，成了华人和韩国人同庆的佳节。
* 农历新年是韩国华人最期待的传统节日。春节举国放假三天，韩国人都赶回家和家人团圆。除夕夜里，华人家庭成员聚在一块，包饺子，吃团圆饭。一些熟知传统的华人笑说：“如果新年正好赶上本命年，那么就要在除夕夜穿上大红内衣裤来冲喜。”长辈在除夕夜会给小辈派发压岁钱或红包。初一到初三，华人要么到亲友家拜年，要么参与华人社团主办的春节团拜活动。这里的春节没有传统的放鞭炮，不过小孩仍可点点烟花，增加欢乐气氛。
* 中秋时节，韩国举国上下同样休假三天，华人对中秋节的重视程度不如韩国人。一名华人说：“除了中韩通婚家庭外，一般华人家庭最多吃月饼庆祝，但韩国人一定要赶回家团聚，并举行祭祖仪式。”韩国人喜欢在中秋节送礼给亲友，不少华人也入乡随俗，在佳节期间赠送礼品给家人或韩国朋友。
* 坐落于首尔明洞中国大使馆旧址前的馆前街，是早期华人聚居和经商的地方，一度被称为“唐人街”，但现在街上大部分都是韩国人经营的商店，华人店铺已所剩无几，汉城华侨小学、汉城华侨协会以及居善堂文化会是馆前街上最具活力的华侨组织。
* 首尔之外，在仁川的善邻洞，有一条“中华街”。华丽的牌楼上写着“中华街”三个大字，穿过牌楼，映入眼帘的是红彤彤的建筑物、汉字招牌及大红灯笼等华丽的装饰，与寂静的大街形成强烈对比。只有在周末，这里才会显得较热闹。很多韩国人为了品尝中华料理而来，另有不少是随旅行团到来的观光客。这被精心打扮过的中华街，万事俱备，却缺少了最重要的元素——人气。
* 在釜山亦有一条唐人街，因釜山与上海结为姐妹城市，所以政府在釜山开辟了一条“上海街”。“上海街”经过翻修后，韩国政府还特别举行了启用仪式，不过街上只有少数由华人经营的餐馆、杂货店及卡拉OK歌厅，而半数左右的商店几乎都由俄罗斯人经营。看到迎面而来的俄罗斯人比华人还多，不禁让人叹息：这真是一条名不副实的上海街啊！
* 2005年，中韩双方签约，决定在首尔西北的京畿道（Gyeonggi-do）高阳市（Goyang）建造一个新的中国城，首期工程耗资1.2亿美元，在2007年启用。可是在所谓的中国城里，韩国人经营的商店远远超过了华商经营的店铺。
* “要发展成一个真正的中国城，我们必须让那些离开的华人回来，或者带来新的华人。如果没有华人，我们怎么能叫它中国城呢？”这是中国城内一名华商的心声，相信也反映了其他华人的看法。
* 居善堂文化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华人团体。它的前身是华人礼佛拜仙、祈福保平安的寺庙，也是华人举办红白事的地点。1982年，居善堂在原址修建成6层现代大楼，并将原本供奉的神祗迁至五楼，每天都准时开放给华人礼拜。可惜信奉道教的华人日益减少，楼层高又不方便前来烧香，殿堂内总显得寂静冷清。
* 居善堂从早期华人的宗教场所，演变成今天的居善堂文化会，除延续早期供奉神祗的功能之外，还每月出版会刊，定期颁发奖学金给家境清寒的华人学生，以及每年年末举办大型同乐晚会。如今，道教在华人社会日渐没落，居善堂里保存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神龛、神像、香炉等，显得更加珍贵。
* 在国外的一些韩国城一带，许多韩国料理、超市的经营者，都是韩国华人。华人在韩国与韩国人的关系疏离，但到了海外，彼此却延续着一种微妙亲密的关系。
* 韩国华人对韩国的情感是矛盾复杂的。历史上两国之间的关系、上一代的境遇，都成了华人肩上无形的包袱。曾在仁川华侨学校执教的孙老师说：“也许我们应该想想能如何为这个国家付出，如何去回馈当地社会，不是一味把自己当外人看。”
* 韩国政府目前开始颁发永久居留证给华人，留学韩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在直线上升，中韩两国贸易日益繁荣，未来华侨社会是否能摆脱之前那抑郁不得志的形象，重新出发，着实叫人期待

 印度

   印度具有极其浓郁的宗教人文气息，这种独特的气息使它蒙上一层谜样的色彩，并且散发出慑人的魅力。此外，印度的美食、手工艺品、庙宇及娱乐业，也都一直引起国外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印度的农业和工业都有迅速的发展。只是，几千年的种姓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贫富悬殊仍是无法跨越的鸿沟。加上近年来失业率、文盲率高居不下，传染病频频肆虐，这一切，都拖缓了印度前进的脚步。

       华人移居到这个荷花、孔雀和菩提树的国度，已经超过两百年。然而，随着传统行业的没落，华人纷纷移民国外，如今只剩下3千人左右，显得分外渺小、脆弱。

       于是，一种寂寥、落寞之感，笼罩着整个印度华人社会，更弥漫在当地唐人街萧瑟的大街小巷之中。

 1770年，一位名字叫作杨大钊的广东茶商，由于在海上遭遇风浪而迷航，结果鬼使神差地漂到加尔各答（Calcutta）下游的胡格利河畔。杨大钊将错就错，干脆在当地定居下来。

       与时任孟加拉总督华伦·哈斯丁（Warren Hastings）经过几番交涉之后，杨大钊把河畔周围的土地开辟为甘蔗园，再从中国引入数百名劳工到园子来工作。这批中国劳工均有幸获得当时英国殖民政府的承认和保护。

       不久后，杨大钊在印度逝世，其员工继承了他的甘蔗事业，不过业绩却差强人意。最终他们只好把甘蔗园、土地及机器都转卖掉，大伙儿一起移居加尔各答，迎向新生活。

       在当时的加尔各答市中心，也聚集了许多中国水手以及船务工人。船只停泊期间，他们往往必须在印度呆上几个月，而边等边打工，则是最实际的做法。船员们凭着木工和机械维修的手艺，逐渐于当地闯出了名堂。一些华人在获得稳定的工作后，决定终结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活，自此在印度定居下来。

       早期的印度华人，辛勤工作，所赚足资糊口。有不少远在中国的华人风闻在此的境况而蠢蠢欲动，尤其是那些具有特殊技能的华人，便从动荡的中国南来，到这里投靠亲友，展开新人生。

       1930至1940年间，是华人移居到印度的高峰时期，那时华人人口一度高达5万人。主要原因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许多华人携带家眷涌入印度来避难。此外，一些不愿意受日军操控的缅甸华人也移居到这里来。

       印度华人日益增多，而加尔各答也成了华人扎根印度的集中地。据印度独立时的官方记录显示，当时全印度总共有3万名华人，单是加尔各答就已占了三分之一。

       那时，华人大多数都抱着落叶归根的观念，待时机成熟了，就携带家眷重返中国。但是，二战结束之后，国共之间的激烈内战，导致境内满目疮痍，风声鹤唳，华人返乡的心愿于是纷纷落空。然而，华人并没有就此怨天尤人，反而卯足全力打拼事业，决心在印度建立起美好的家园。

       在这里，各籍贯的华人都各有所长，称霸于不同的经济领域，也渐渐形成稳定的传统行业。客家人对皮革加工情有独钟；广府人擅长于机械维修以及木器制作；手艺出色的湖北人就擅长镶牙、纸花制造；人数比较少的上海人则从事洗衣业。

       大多数华人都经营家庭式的小生意。异地创业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华人还不至于如同贫困的当地人般露宿街头。他们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房子，生活简单而安定，孩子们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度里，华人可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之战，两国原本的友好关系顿时生变，并且导致一连串的排华事件，使华人深受折磨。不但商店屡遭查封，数以千计的华人还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那拥挤而脏乱的营房中，健康、自由和意志几乎都被磨灭殆尽。

在排华期间，有两百名左右华人被驱逐出境，其中包括中文教育工作者。最终，约有五分之二的华人含泪离开此地。

       至于那些自愿，或者由于个人因素而留下的华人，至今仍然在印度过着平静的生活。时移境迁，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逐渐和缓，双边贸易也开始增长。然而，在许多长辈的心底，排华事变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偶尔夜半扪心暗思量，结疤的伤口仍然在隐隐作痛，每每忆起这段往事总会令人黯然神伤。

* 后人为了纪念杨大钊，把他所开发的胡格利河畔平原命名为阿钊坡，并立下墓碑和土地公祠
* *加尔各答Cheenapara的唐人街附近，有一条中山街，以及一条鲁迅街，这两个街名均沿用至今。近年来，印华文化发展协会积极向政府争取在唐人街设立路标以及牌楼、打造美食街、兴建文化馆等等，为未来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 *穿梭于加尔各答大街小巷的三轮车以及黄包车，最初都是由华人传入的，如今，已经成了印度最廉价、最传统的一种交通工具。*
* 区区3千名华人，在印度犹如沧海一粟。
*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后，印度华人在经济、生活上遭受沉重打击，移民热潮开始在华社延烧。短短数十年间，华人人口大量流失，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成员在海外生活。“希望下一代能拥有更好的将来”，往往是华人选择离开的原因。
* 祖辈们最早落脚的加尔各答，至今仍是华人最密集的地区；塔坝中国城，更是客家人稳守多年的堡垒。至于孟买（Bombay）、新德里等城市，只有少数华人定居。
* 客家人乃是印度华社最大的群体，其次是广府人。华人们大多跳不出传统经济的框框，恪守着多年形成的传统行业，各自谋生。
* 近几年，由于传统行业的发展出现瓶颈，华人开始尝试开拓新兴领域。餐饮、时尚、美容业纷纷崛起，犹如一股新气息，注入疲态毕露的华社。
* 年轻一代的华人，终于摆脱了挥汗卖力的生涯，一般拥有高中以上的学历，成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 华人坦承，自身在印度的发展空间太有限了。年长的一辈曾经沧海，对生活早已无所奢求，情愿终老印度，留守着一辈子建立起来的事业和家园。然而，长辈们都会鼓励朝气勃勃的年轻一代，勇敢走出印度，到外头更辽阔的世界龙腾虎跃一番。
* 印度华人曾以皮革业闻名全世界，而印度最大的华人皮革中心，就坐落在加尔各答市的东向边缘，一个叫塔坝的地方。
* 19世纪初，一名熊姓商人开始在此设厂。从此，一代代广东梅县客家人，在这十多平方公里的沼泽地上，创建了第一代皮革王国。
* 今天，在塔坝社区入口处，立起一个以中文、英文、印地文和孟加拉文写着“塔坝中国城”（Tangra China Town）的路标。高高的城墙，将塔坝中国城与四周的贫民窟相隔开。然而，城墙外的破旧、脏乱，却一路延伸到城里。
* 那狭窄而长年失修的街道上，汽车、牛车、摩托车、自行车一路颠簸，行驶途中，还忙着闪避坑洞和积水，险象环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恶臭味，被皮革厂化学染料渍成浅蓝色的沟渠水，缓缓地流动。
* 灰色的围墙，搭配红、蓝色的大铁闸，是皮革厂数十年来不变的形象，也是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皮革厂是塔坝客家人挣钱的地方，而房子通常与皮革厂毗邻而建，仿若他们的命运，始终与皮革业浑然相连，紧密难分。
* 种姓观念强烈的印度，对皮革业成见很深，普遍认为最低贱的人才会去从事这种肮脏、低贱的工作，但华人始终用心经营这被当地社会唾弃的行业。华人皮革厂一般属于家庭式经营，多由男性参与其事。它不仅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当地华人，也为无数印度贫民提供了工作机会。
* 1980年代是皮革业的全盛时期，塔坝共有超过230多家的皮革厂，生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然而，基于皮革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大理院法庭于1995年4月谕令塔坝皮革厂一律迁往新工业园，而皮厂所占之土地将不获赔偿。正当彷徨无助之际，加城华人联合会于同年7月成立，代表全体皮革厂业主，向政府提出上诉。最终，土地归业主所有，惟往后不得经营污染环境的行业。
* 对大规模的皮革厂而言，迁厂所需的费用虽不成问题，但对于新环境的设备及未知的将来，始终心存疑虑。小皮革厂则因为资金短缺，陷入了动弹不得的窘境。幸亏西孟省政府对迁厂之事抓得不紧，皮革厂主才得以苟延残喘，有的仍悄悄运作，直到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另一些皮革业主，早已万念俱灰，将生意结束或转让，举家移民到国外。
* 如今，皮革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连印度穆斯林也开始在制革领域大展拳脚。跟华人相比，他们资金更雄厚、技术更先进，可谓来势汹汹。
* 于是，55家迁到新工业园的华人皮革商，联合成立了“环保制革商会”，旨在捍卫华人皮厂的权利，向政府争取更多的福利和援助。此外，他们希望能与中资企业合作，因为无论资金或技术方面，中资企业都能给予印度华人很大的支持与协助。
* 然而，皮革业主们认为，这一行的前景仍不明朗，“印度政府非常善变，很多政策都不明确。除了等，我们也不能再多做些什么了。”言毕，犹疑与无奈交织在他们的脸上。
* 塔坝中国城是全印度华人最集中的地区。在这座快被世人遗忘的客家村里，华人在熙攘的人潮中，用高墙筑起了自家的文化堡垒。
* 高墙外，世界天天在变；高墙内，客家人过着怡然自得的淳朴生活。
* 华人将皮革厂的大铁闸，漆上象征吉祥的大红色，门口还有大红灯笼高高挂、大红对联两旁贴，那艳丽的姿态，与灰蒙蒙的街景形成强烈对照。
* 华人的皮革厂或住家，一般灯光昏暗，只有祖先灵位、神龛上的电蜡烛，不分昼夜地闪着小红光。大部分家庭都还保留着供奉祖先的习俗。除了早晚上香外，华人在春节、清明节等传统佳节，也不忘杀鸡宰鸭，敬祭先人。
* 塔坝中国城也许不能跟世界各地派头更大的其他唐人街相比，但它那淳厚、道地的客家文化，总是散发迷人的魅力。在客家家庭，从长辈到幼童，一般都能操一口纯正的梅县客家话。尽管抗拒不了印度咖喱的香气，但一日三餐，仍以正宗的客家菜为主。
* 自从卫星电视、网际网络进驻小城后，年长的华人终于找回了听中文歌曲、看中文戏剧的记忆。“不过我们的子女，就比较喜欢印度和西方的流行文化！”他们不得不承认，高墙挡不住那无孔不入的主流文化。
*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华人外移，中国城内盛景远逊当年，但凝聚力丝毫未减。每逢婚丧喜庆，更是邻里互助，全城参与。“每年回来除了拜年，还忙着喝喜酒呢！”一名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兴致勃勃地说。
* 长年散居各地的亲友，难得在春节千里团圆，新人们便趁着花好月圆、亲朋戚友济济一堂之际，共结连理，大宴宾客。如今，印度的春节，已成为华人的结婚旺季。
* 此外，春节也是华人相亲的好日子。移居国外的华人，新春返乡过年，也顺道物色佳人快婿。“我们希望另一半也是同乡，那么生活及文化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隔阂。”华人笃定地说。
* 在塔坝，许多华人仍旧将终身大事交由父母决定。相亲与自由恋爱结合的比例，大概是6比4。“我们这些50多岁的，多数通过相亲而结合，家庭也都很美满呀！”言罢，客家阿叔神采飞扬。
* 皮革业衰退之后，塔坝城渐渐岑寂了下来。塔坝位于加尔各答的黄金地带，若发展起来，必定是块福地。印度政府也曾在报上大事宣扬，要将塔坝打造成崭新的中国城，然而，华人对这套说辞，只是姑妄听之：“政府只是提出建议，资金和策划等一切事务，都要靠华人自行解决。”
* 面对印度政府的善变、高深莫测，塔坝华人摇摇头说：“这是一个梦，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 近几年来，人们对塔坝的印象已不仅止于皮革厂。更多时候，他们想到的是菜香扑鼻，令人食指大动的中餐。
* 中餐馆的崛起，与皮革厂的没落息息相关。许多没有能力迁厂，却又不想移民的旧皮革厂业主，干脆把心一横，将皮革厂改建为中餐馆。
* 目前，塔坝区的中餐馆至少有50家之多，高低档次都有。塔坝摇身一变而为美食天堂。每逢周末，城内车水马龙，名流使节纷至沓来。
* 大半辈子在皮革厂挥汗操持的华人，如今纷纷手握锅铲，凭着对印度人的了解，新创出美味别致的“印度中餐”。菜单中最热门的几道菜，不外是炒饭、炒面、酸辣汤、辣椒鸡和炸虾。“这当然不是正宗的中餐啦！印度人口味很重，因此我们的菜肴以香辣为主调。”
* 塔坝城内，倒也还能找到几家数十年历史的正宗客家餐馆。顾客主要是客家人，他们说：“传统的客家菜，让我们吃出家乡的味道！”
* 中餐馆唤醒了印度食客的味蕾，华人美容院，更俘虏了印度美娇娘的心。
* 走在印度的大街小巷，会发现许多店铺的招牌上标志着“Beauty Parlour”，而有些美容院更挂上中文招牌，如王后、月宫、兰花等。
* 华人妇女说：“印度女人比我们更爱美。我们通常在家里动手修眉护肤，印度妇女却舍得花钱，请别人将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
* 华人美容院在印度有着悠长的历史。远在英国殖民时代，它主要为英国人及华人服务，今天的主要客户则是印度女性。关注仪表的印度女性，一般从十二三岁起，便到美容院进行手部、足部除毛。此外，华人美容院提供的美发及美白服务，也大获她们的青睐。
* 当世界各地的美容院都靠采用先进仪器来吸引顾客的当儿，印度华人美容师只需一条细长白线，就能替顾客修眉、除毛、美肤。这种称为“挽脸”的传统技艺在中国大陆已渐渐失传，在印度却流传、盛行至今。
* 皮革业衰退之前，许多在美容护理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华人太太，都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然而，随着皮革业发展逐渐走下坡，不少华人美容师毅然重操故业，帮助丈夫分担经济上的压力。
* 近年来，印度人也开设了不少美容院，一般装潢高雅，收费昂贵，主要为上流社会服务。华人美容师说：“我们的收费更加合理，平民都能负担，加上采用传统的美容技术及天然护肤品，还是大受当地社会欢迎。”
* 在传统皮革、制鞋业日薄西山的今天，中餐馆和美容院，已成为印度华人经济的新宠。他们迫切希望能从中看到振兴的曙光，重拾华人当年的风采，再现昔日辉煌。
* 华人经济不振，使中华文化的传承更加艰难。这几年，印度华人社会日渐岑寂、清冷，年轻人一批批如燕雀离巢，远走高飞，新生儿的出生率也偏低。
* 曾几何时，那些盛满华人子弟欢快童年回忆的中文学校，不是一家接一家地关闭，就是体制轮替，今非昔比。
* 印度第一所中文学校——建国学校，如今虽仍归华人所有，但已改用英文教学。学生以印裔穆斯林孩子为主，一张华人脸孔也没有。此外，华人创办的圣心学校，也改由基督教会管理，以英文教学，同样以印裔学生为主。另外，由客家人创办的梅光学校，已于1989年关闭，校舍一直空置到现在。
* 坐落在塔坝城里的培梅学校，是现今全印度硕果仅存的中文学校。它由客家梅县人创办，取 “培梅” 之名，意在 “培育客家梅县子弟”。
* 学校的全盛时期，是在中印战争爆发之前。校友们回忆，当时的培梅设有小学、中学部，学生人数高达数千，每个年级三个班。楼高三层的校舍，每间课室挤满了学生！
* 此刻，崭新的校舍，犹如失去了玻璃鞋的灰姑娘，弥漫着人去楼空的苍凉。偌大的校园，再难听见朗朗的读书声，以及成群孩子的嬉闹声。校园里，只剩下幼儿园和小学部，学生寥寥50人左右，加上校长，华人老师总共只有3名。
* 由于学生人数有限，两个年级的学生因此凑在一起上课，却仍无法将所有座位填满，场面稀落。华人说：“只有塔坝华人在校园举行春节联欢会等活动时，校园才恢复勃勃的生气。”
* 一名华人父亲感慨道：“我们没有忘本，只是必须考虑到孩子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如今培梅只剩小学部，毕业后我们就要四处奔波为他们申请中学。印度人口那么多，样样都得抢，孩子们若想升上优秀的英文中学，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小让他们报读英校。”
* 如今，90%以上的华人子弟，都在英校或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中文一般可作为第二语言供选修。为了应付考试，孩子们大多会报名中文补习班。培梅学校每天下午，也会为孩子补习中文，离校较远的孩子，则参加假期期间特设的补习班，平日多半自修，整体水平有待加强。
* 近几年，中印的双边贸易蒸蒸日上，中文的价值在印度提升了许多，许多印度华人开始重视中文，就连印度政府，也让一些驻守中印边界的印度军官学好中文。
* 此外，印华文化发展协会，也为印度政府策划、推动军官的中文速成班，将其中的盈利，用作推广华人学习中文的资金。如今，协会在圣心学校开办中文会话班，收费廉宜，任何年龄层的华人学生，都欢迎前来上课，学好中文。
* 整体而言，汉语热潮目前仍处于逐渐升温的阶段，还未完全在印度蔓延开来。但当地华人深信，随着中国的腾飞，中文教育及中华文化在印度发扬光大的那一天，应该不会太远。

       在印度，年轻一代的华人主要用英语沟通，大概五六十岁以上的华人，才有读、写中文的能力。硕果仅存的中文报纸《印度商报》，是这群华人的集体记忆、精神寄托。

       《印度商报》于1969年3月问世，每日4版。几十年来，物价翻腾了几倍，但这份报纸的售价，仍然维持在2.5卢比。

       《印度商报》一度是全世界仅存手抄的中文报。耐心的编辑仔细抄写，再付油印，手抄一版耗时4小时。直到2005年4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访问加尔各答时，送了一台电脑给报社，才结束了“手抄”历史，迈入电脑排版的时代。《印度商报》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报馆里只有编辑，没有记者。编辑杨小红笑道：“加尔各答的每一名华人，都是我们的记者。”华人圈中无论发生任何大小事情，例如婚丧喜庆等，人们都会主动将“新闻”送到编辑室。有了电脑和网络后，《印度商报》还能转载新华网的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充实。

       然而，报上刊登最多的，依然是华人的婚丧广告。春节前后是报馆收入最丰的时候，华人结婚广告特多。此外，华人也喜欢在报章上刊登春节贺词，让各方共享温煦的祝福。

       《印度商报》目前共有三名编辑、两名派报员。前主编逝世前，曾说：“印度华人需要一份中文报，让大家了解外头发生了什么事。”持着这个单纯而坚定的理念，《印度商报》在这片中华文化沙漠上，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如今，除了春节大年初一至初五例常休假日之外，每天早上8点左右，《印度商报》总是风雨不改地送达订户们的家。1970年代，每月的发行量曾达五百多份，如今只剩下两百份左右。华人不断移居国外，读者人数逐年下降，加上办报主力日渐老去，这份报纸，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 *印度的华人若在春节前不久逝世，丧礼通常就会选择在春节期间举行，好让回来过节的亲友们送往生者最后一程。因此，往生者的遗体将在太平间冷冻一段时间，出殡当日才运到灵堂入棺。*
* 早期抵达印度的华人，一般都是在加尔各答的中心地带落脚的。当时在这里聚居的华人当中，人数最多的是广府人，其次为客家人，及少数的湖北人和上海人。他们在这里安家，也逐渐构筑了印度的第一个唐人街。作为传统华人社会的缩影，唐人街也是窥探华人生活的一扇窗口。
* 自1940至1962年间，是唐人街的全盛时期。华人店铺星罗棋布，中餐馆更是耀目的主角。华人说：“那时最有名的是南京饭店。二战期间，不少中国的将军都来这里吃饭，华人、印人名流，也均是座上常客。”
* 华人所从事的行业十分多元，包括裁缝、洗衣妇、医生、理发师、鞋匠及木匠等。在唐人街上，华人的烧肉店、药材店、古董店、金店、杂货店等更是应有尽有。
* 唐人街的会馆也很多，有些甚至还办起了华文学校，如南顺会馆内的建国学校、忠义堂所创办的梅光学校等，皆是华人求取知识的地方。至于华人庙宇，主要是供奉关帝和观音。
* 从清晨到午夜，唐人街总是熙熙攘攘的。天刚露出鱼肚白，菜市场早已人头攒动，叫卖声不绝于耳。菜市场是华人最佳的情感联络站、资讯流通站。若想探听最新的八卦，或派发结婚请柬，到这里准没错。每天晚上，小食挡摆售各类华人最爱的小吃，简直就是夜宵的天堂。
* 活力充沛的华人，把唐人街打造成一个繁华地带，不过也同时带来了帮派、赌博及鸦片。当夜色降临，三教九流之士，纷纷涌向烟馆或赌场。据说，当时四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染上鸦片瘾，而那些在牌桌上倾家荡产的华人更是难以计数。
* 不论是繁华之地还是罪恶之乡，这一切，均被1962年中印交恶的滚滚狂潮席卷而去，唐人街也就从此步向没落。
* 华人纷纷移居海外，唐人街因而人去楼空。今时今日，遗留下来的中式建筑都已经残旧斑驳，就连充满中国味儿的黄包车也都破烂不堪，无精打采地瑟缩在角落，静候瘦弱的印度新主人前来拖曳。
* 华人的身影，早已淹没于密密麻麻的印度人潮当中。
* 而今，唐人街仅住着极少数的华人。早晨是此处最热闹的时段，华人与印度人都会前来“饮茶”吃早点。老华人叹道：“只有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才能感觉唐人街再次复活了。”
* 印度华人最重视的节庆，非春节莫属。一千多人的塔坝华人社区，春节期间，可以飙升到一万余人。移民美、加等国的华人像候鸟一样，春节一到，都从四面八方飞返印度老巢。他们深情地说：“回到塔坝，才有过年的感觉。”
* 年三十大清早，家家户户都忙于祭祖的活动。杀鸡宰鸭、焚烧红黑色的天地衣帽，客家人的习俗历历在目。塔坝青年会，在除夕夜还出动醒狮团，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去拜年。
* 新春正式降临，塔坝更展现出惊人的活力。大年初三、初四，培梅学校在校园里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 另一个重头好戏，就落在春节一周后的礼拜天。不同籍贯、地域的华人，都会到阿钊坡拜祭开路先驱——杨大钊。那里有一座超过百年历史的土地公祠，人潮汹涌，香火不断。
* “这里的签很灵，过年时若求得上上签，一整年都会顺利如意。” 华人一脸虔诚地透露。
* 中午时分，醒狮队会在土地公祠的空地上助兴，鼓声喧天，引来众多印度人围观。华人家庭则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下，全家席地而坐，吃起午餐来，活像一家大小在野餐，别有一番风味。
* 印度，从未赐予华人富裕的生活，却奇迹般地在他们的心灵镌刻下难以磨灭的印痕。在这肤色、文化及价值观皆大异其趣的国度中，不少华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甚而萌生停靠下来的念头。
* 移民他国或许是年轻华人总是牵肠挂肚的心事，至于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中年华人，则并不十分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他们说：“其实我们并不期待离开，在印度挣钱虽不容易，但渐渐适应下来，也得以轻松度日。”这些年过半百的华人，早已习惯了印度朴素、淡然的悠悠生涯。
* 很多远走高飞的华人，心却徘徊在印度老家，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没断过。然而，为了下一代美好的生活，选择离开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感慨：“照这样走下去，印度华人消失，是早晚的事。”
* 在南亚与西亚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横亘着一片片沙漠、山地和高原。这些地区潜藏着全球最丰富的石油，不过这里的大部分国家，却陷入延绵不断的战争，遍地硝烟，导致它们仍处于落后与贫困的窘境。这地区散居着数量不多的华人，他们占全球华人总额不足1%。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华人除了汉族以外，还参杂了维吾尔族及回族等少数民族。大多数华人从商，但也仅能糊口于四方，绝少大富大贵者。在某些国家里华人受到歧视与排斥，于是出现了再移民欧美国家的现象。
* 本篇章将论述南亚、西亚、中亚诸国华人简史及现状。南亚包括巴基斯坦（Pakistan）、孟加拉（Bangladesh）、斯里兰卡（Sri Lanka）及马尔代夫（Maldives）；西亚包括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巴林（Bahrain）、伊拉克（Iran）、以色列（Israel）及阿富汗（Afghanistan）；中亚包括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及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
* 巴基斯坦的全名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位于南亚次大陆的东北部，东接印度，东北与中国比邻，西北与阿富汗相交界，西傍伊朗，是仅次于印度的南亚第二大国。
* 基斯坦是个多元民族、宗教复杂的国家，独立后不久，全国即陷入政治动荡的局面，政府更迭频繁。在长时期里，巴基斯坦有过好几次军人政变，实行军法统治，甚至发生政治暗杀的悲剧。国家的长期动乱，自然影响到经济的稳健发展。
* 农业在巴基斯坦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主要农产品有小麦、稻米、花生、棉花与茶叶；工业基础薄弱，拥有一些小规模的工业生产，其中以纺织业较大宗，其他还有制糖、烟卷、电力、水泥及化肥等工业。
* 巴国近年来对于引入外资不遗余力，但碍于基础设施如通讯、交通、电力供应的不足，成效不大。不过，由于这里具有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可生产丰富的棉花、棉纱及皮革；再加上巴国产品输往欧盟及美国，均享有优惠关税，所以仍然吸引了少数港台及东南亚的商人前往投资。
* 1999年，巴基斯坦便已有华裔约4000人，其中汉族约占80%。另外的族群是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约占15%；其他的则是藏族等少数民族。巴国华人多是早年从印度迁徙过来的，尤其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后，印度华人受到排斥而不得不离境。年轻一辈多移民加拿大与美国，年纪比较大的，一部分返回中国，另一些则流落到巴基斯坦。此外，也有少数华人来自东南亚以及港台。
* 与印度华人一样，早期巴国华人多数原籍广东梅县、湖北天门和山东，鼎盛时期数达两万人。由于早期华人在巴基斯坦的前景不太乐观，所以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们便陆续再迁居到其他国家。有的全家迁徙，有的则送子女到加拿大与美国念书，完成学业后就此定居下来。
* 然而，有人离境，也有新移民入境。80年代以后，来自江浙一带的新移民来到这里，人数众多。加上近年来大批到此工作的中资公司员工，如今巴国华人人口已达8万人之多。华人多聚集在首都伊斯兰堡（Islamabad）、拉合尔（Lahore）、卡拉奇（Karachi）等城市。
* 至于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原是新疆的主要族群，19世纪下半叶之际，在俄国沙皇的挑唆下，聚众背叛清朝，清朝派左宗棠率大军前往镇压，击败叛军，追剿余党，逼得他们向西逃亡，跨越边界，有些逃到中亚，有些流落到印巴，在这些地区安家落户，一代代繁衍下去，直到今天。这些新疆人的后裔，大抵靠做些小买卖，或是出卖劳力为生。另有一些人还是过着畜牧生活。
* 巴国华人的经济活动，可说是印度华人职业的延伸。华人多经营制革、制鞋、牙医、餐馆、服装、成衣与杂货等业。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则以经营畜牧及贩卖日用品居多，港台及东南亚华商投资的行业，则有制鞋机械、医药用品、加工业等，兹分述如下：
* 1. 制革业：华人经营的制革厂有30多家。大、中、小型各占三分之一。巴国华人的制革业是印度客家人传统职业的延伸。1962年，在印度从事制革业的华人搬迁到巴国来时，眼见巴国盛产牛皮及羊皮，不乏制革业的原料，所以他们就干起了老本行。他们的工厂多设于卡拉奇近郊，现已辟建为加工出口区，供专业加工制造皮革，产品行销欧、亚两洲各地。
* 2. 制鞋业：华人经营的制鞋厂约有50余家，其制鞋技术均传自印度，以手工缝制。近年来当地鞋匠也采用来自台湾的塑胶皮产品，推出市场，价廉物美，颇为畅销。华人工厂散布于卡拉奇、拉合尔、白沙瓦（Peshawar）及金塔等城市地区。
* 3. 餐馆业：华人的餐馆多分布在伊斯兰堡及卡拉奇，有粤式与北方式的菜肴。正宗的粤菜选材广泛，烹饪技术多样，为中国名菜系之一。但当地的中餐馆，为迎合食客口味，已变质为杂粹及炒面炒米粉之类。而北方式的菜肴，要以鲁菜为代表。南北式的菜肴各有特色，都能适合不同顾客的口味。
* 4. 纺织业：巴国盛产棉花，纺织业发达，也有港台华商投资生产成衣的。华人经营成衣的有十余家，分设于各大城市。
* 此外华人开设小商店，贩卖食品与用品，还有流动商贩、木匠及工匠，赚取不多，仅够糊口。
*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东南隅，西部隔着保克海峡（Palk Strait）和马纳尔湾（Gulf of Mannar）与印度遥遥相对，是南亚次大陆南端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位居海上交通要冲，是印度洋的航运中心。
*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1815年沦为英殖民地，经过长期斗争，终于1948年2月4日取得独立，1972年宣布成立斯里兰卡共和国。
* 农业是斯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农业人口达全国就业人口的40%，农产品主要有稻米、椰子、甘蔗、橡胶及茶叶等，斯国原是最大的茶叶出口国，但由于国内长年陷于内战，大大影响农业的生产。工业以农产品加工为主，有制糖、榨油、橡胶轮胎、制革和造纸等工业。近年来积极引进外资，增辟工业区，开拓外国市场。
* 华人足履斯国，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那时斯国还是荷兰殖民地，1740年，爪哇巴城发生了华人抗拒荷兰政府的压迫而揭竿起义的事件，也就是所谓“红溪惨案”，事后有一批华人“罪犯”，被强行押送到斯里兰卡来服苦役，服刑期满的华人可能有部分滞留下来。又据1911年的人口普查，引述在1816年，约有80至100名华人抵达锡兰，嗣后在各地安顿下来。他们并不像其他地方的华人勤俭刻苦，却沉溺于烟馆，爱好斗鸡。他们中也有与当地妇女通婚的。直至1911年的近百年间，华人人口并没有显著增加。
* 30年代初期，来自山东的一批商贩，带来了丝绸与刺绣品等物品，沿街兜售；也有人到乡间去，和乡民交换农产品及宝石，最终有一部分人定居下来；同一时期，来自湖北、广东、江浙的手工艺者及农民，也流落到这里谋生，后因战争爆发，无法归国，于是只好留居下来。
* 除了20世纪30年代曾有过一阵华人移民浪潮外，华人人口的增长，就只靠自然生殖。直至1948年斯国独立时，也只不过350人。到了1982年，华人激增至3000人，这可能是由于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移民涌入所致。
* 据1999年《华侨经济年鉴》的统计，斯国华人共约4000人，目前则有5000人左右。他们散居在首都科伦坡（Colombo）及第二大城市坎迪（Kandy）。斯国对居留的华人规定甚严，华人如欲取得公民权，需父母都得在本地出生，才能获得批准，因此近年来华裔青年陆续移居美加等国，华人的流动性颇大。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政府近年来逐渐放宽居留权条例，可是成效不大。
* 华人经济活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商业、制鞋业与服务业等，兹分述如下：
* 1. 餐馆业：中餐馆约有20余家，散处于科伦坡及坎迪。其中较具规模及历史较久者有：北平饭店、乐宫饭店、新新饭店、馥莲店及中华咖啡馆等等。
* 2. 制鞋业：为梅县客家人传统行业，多分设于科伦坡及康地两大城市，总共约十余家。
* 3. 牙医业：多为湖北天门人所经营，医所有4家，开设于科伦坡市内，执业者都有较高学历及专业资格。
* 4. 贸易及杂货业：多为山东籍华人经营，零售与批发货品多是“中国制造”，包括服装、雨衣、鞋袜、塑胶制品、电器、电子零件及医护器材等。
* 5. 绸布业：绸布庄多为山东与江浙籍人经营，约有十余家，多开设于科伦坡市内。其业务为经售丝绸及布匹，亦兼售日用品及手工艺品，均从中国大陆进口。
* 6. 旅游业：华人投资经营的旅馆有两家，均开设于科伦坡，一家属馥莲饭店兼营的旅馆，另一家为国际观光旅馆。
* 7. 制造业：在斯国有十家台商设厂，从事生产螺丝、螺帽、手工具、成衣、毛织衣、电话机及鱼网等。
* 近年来，中国与斯里兰卡改善了邦交关系，促进了两国政治、外交、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国不但给予斯国无息贷款，更派遣技术专家与建筑工人，为斯国承建巨大工程，如兴建班达拉奈克纪念国际会议大厅（BMICH）、最高法院大厦、中央电讯交换中心及医院等。
* 孟加拉东、西、北三面与印度接壤，东南与缅甸交界，南濒临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19世纪下半叶成为英属的一省。1947年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1971年3月东巴宣布独立，1972年1月正式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孟加拉是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口密度更为世界之冠。
* 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人口占全国总就业人口之半。主要农产品有稻米、小麦、黄麻、甘蔗、橡胶与椰子。黄麻产量居世界第二，多供外销。孟国南临辽阔的海域，渔产资源丰富，但由于捕鱼设备落后，运输交通不足，使其渔获量及商业价值欠佳。孟国的工业并不发达，以黄麻加工业及纺织业为主。近年来政府积极吸引外资，在外资的挹注下，吉大港（Chittagong）已有电子、五金、自行车等厂进行生产。
* 孟国的华人人口不多，大部分为早年从印度移居过来。据资料显示，1971年有华人约500人，20年后（1992年）也不过700人，可见这期间几乎没有华人移民入境，人口增加主要靠自然生育。华人祖籍多为广东梅县，少数为湖北、山东。过后大陆新移民涌入，人口才增加至1000人左右。华人多聚居在达卡（Daka）与吉大港两大城市。
* 孟国华人的职业多与印度、巴基斯坦的雷同，经营的大都是传统的行业，包括制鞋厂、中餐馆、牙医、零售店等。
* 近年来，孟国的政局较为安定，经济也纳上正轨，政府积极推出各种优惠措施，以吸引外资来发展工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少港台及中国大陆的商人，挟资前来投资，有的开工厂，有的做贸易，有经营中餐馆及旅馆也有兼营多种企业的。投资设厂的华商，以经营成衣厂、印染厂及制鞋厂较多。
*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孟国的成衣出口逐年增加。现有成衣厂4000多家，成衣出口额居世界第四位。随着成衣业的扩展，印染布料的工厂应运而生。成衣厂所用的布料，一般都是从外国进口坯布，然后按照服装设计所需的颜色到印染公司印染布料。台商到孟国投资设厂的有花旗国际鞋业公司，投资总额约370万美元，专营欧洲市场的鞋业订单，为新兴事业中较具规模者。另有少数人从事农业与畜牧业。
* 中国的建筑公司也到这里发展，并承建了横跨首都达卡河流上的中孟友谊大桥，及一些较高尚的住房。在达卡市还有一座中国无偿援建的孟中友谊会议中心，规模庞大，于2002年竣工。
* 马尔代夫位于印度半岛西南隅，是印度洋上的群岛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它由1190个珊瑚岛组成，其中只有200个岛屿有人居住。1887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65年独立，1968年11月11日成立共和国。
* 马国小国寡民，土地面积狭小，农业生产不足国内的需求，天然资源贫乏，渔产资源虽然丰富，但碍于捕捞技术与设备落后，运输和加工业不足，所以独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百废待兴。
* 独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力改善港口、电力、通讯等基础建设，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极力发展旅游业与渔业目。前旅游、进口贸易、建筑和运输，已成为马国的四大经济领域，其生产总值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60%，2002年的年均收入达到2090美元，是南亚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 马国的旅游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促进了建筑业、运输业与银行业的增长。马国的华人很少，据资料1999年只有约100人，如今可能略有增加。他们多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如开设商店，贩卖迎合游客的商品；经营中餐馆、旅行社与旅馆。
* 马国自1965年独立后，即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中国也给予马国无偿的经济援助。从1985年起，中国公司开始进入马国工程承包市场，为马国承建巨大建筑工程及公寓，两国的贸易额也逐年增长。
* 沙特阿拉伯是西亚最大的王国，占阿拉伯半岛面积的五分之四。西濒红海、东临波斯湾，周围接壤的国家有：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卡达尔、阿联酋、阿曼及也门。19世纪英国侵入，1924年统一，1932年建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以迄于今。
* 沙特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石油工业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巨额的石油收入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政府充分利用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建立外向型企业，逐步改变过度依赖石油的单一经济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同时发展工农业。政府鼓励自由经济和自由竞争，支持私人及合资企业。这一来，也促进了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及旅游业的发展。
* 沙特居民以阿拉伯人为主，其他种族约占30%，包括一部分华人（这里“华人”包括汉人及中国少数民族）。据《华侨经济年鉴》的统计，1999年这地区的华人约有2万7000余人，其中有两万人聚居在西部，以新疆的维吾尔族最多，占百分之90%，其次是回族约1000余人，他们来自甘肃、宁夏及青海等省，还有藏族400余人，汉人有1000多人。根据当地华人提供的资料显示，如今沙特华人已达4万人。
* 华人多聚居在西部，如塔伊夫（At Taif）、麦地那（Al Madinah）、吉达（Jeddah）及麦加（Makkah）。此外，首都利雅得（Riyadh）、延布（Yenbo）、达兰（Dhahran）等地也有华人。维、回族人95%已入籍，改革开放后入境的中国新移民则仍持中国护照。
* 汉族人数虽较少，但在各经济领域较活跃，经济地位较高。汉人经营的多是传统行业，包括杂货业、百货业、饮食业、贸易出入口业、运输业及建筑业等等。吉达有一家大型中国商业城，多是由汉人经营的商店，售卖各色各样的中国小商品，琳琅满目，价格廉宜。家电、服装、玩具、食品、皮革制品、钟表、瓷器以及机电、汽车和重工业机械设备等中国商品在沙特随处可见。那里的华商生活都过得不错。少数台商投资经营的企业，如台湾荣民营建公司、德仁建设公司等，资金雄厚，规模宏大。较大型的中餐馆，有台商的来来餐厅及新加坡人的中国餐厅。除此之外，其他大都是小本经营。台商也有投资设厂的，生产食品加工及肥料。
* 沙特阿拉伯约有12家中资企业，包括建筑工程、石油管理、远洋运输及通讯网络等，其中规模较大、资金较雄厚及员工（技术专家及普通工人）较多的，要算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江苏第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2009年中国土木工程公司标得承建利雅得一卡西姆铁路连线的部分工程，营业额高达7.2亿美金。江苏建筑公司也承包库巴市区的阿拉锡德大厦，工程浩大，营业额达5.25亿美元。华为公司也被选中，负责沙特阿拉伯领域内的网络运营，网络优化和备件管理等业务。
* 至于维吾尔族与回族之迁徙沙特，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下半叶，清朝的左宗棠率领大军前往新疆镇压维、回族的叛乱，叛军被迫向西逃亡，几经辗转，最终流落到沙特定居下来。另一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军阀盛世才大事屠戮维吾尔族，使他们不得不越境逃亡，最终在沙特安家落户。现居沙特的新疆人，都是当年逃亡者的后裔。经过了好几代的繁衍，物换星移，他们早已融入主流社会，入籍成为沙特王国的公民，对他们来说，故国新疆是那么遥不可及，他们早已遗忘了。今天在沙特的维吾尔族人，有些从事跨国性的商贸活动，有些经营杂货店生意，有些做烤饼（特米斯）及抓饭买卖，有些当劳工，有些做回老本行，从事畜牧业。
* 伊拉克位于亚洲东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北接土耳其，东邻伊朗，西界叙利亚、约旦，南傍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东南濒临波斯湾。伊拉克的两河流域，曾创造了古代巴比伦的灿烂文化。1920年它获得完全独立，1958年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可是立国以来，伊国却长期陷于战乱，先是爆发了8年的两伊战争（1980-1988年）。1990年，伊国又入侵科威特，翌年引爆了海湾战争，伊拉克大败。2003年3月，美国又借口伊国储存巨大杀伤力的核武，向伊国动武。经过多年战火的蹂躏，加上联合国的禁运与制裁，制造业器材、原料、组配件难以入口，石油等产品不能外销，国家元气大伤。
* 据台湾《华侨经济年鉴》的统计，1999年，这地区的华人人口约有1000人。由于长期战乱，所以很少有华人移民入境。相反地，因逃避战乱而离境的华人日多。如今，在巴格达（Baghdad）危城的中国人已经很少了，而相对比较安全的伊拉克北方的库尔德自治区（Iraqi Kurdistan），却有数百名中国人。
* 在2003年伊拉克发生大规模战争之前，伊国的华人多从商，有的开设商店，贩卖中国的日用品，大到发电机组、铁路机车，小到针头线脑、服装玩具，应有尽有。有的从事出入口贸易与批发，主要进口与批发中国货品。有的经营中国餐馆。有的承包建筑工程，在巴格达的中国建筑公司，有多达十余家。但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华商都纷纷结束营业，避乱到邻近的约旦、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家去。
* 伊国是个死亡陷阱，人们的生命朝不保夕，可是对一些精明而勇敢的华商来说，这里也是商机处处，容易发财致富的好地方。战争时期的伊拉克，生产陷于停顿，加上西方国家的禁运与制裁，所以市面上的食品、日用品与医药，都严重短缺。华商勇闯龙潭虎穴，进入伊国寻找商机，创立基业。至于那些暂时退避邻国的华商，对伊国虎视眈眈，伺机而动，他们早已在邻国囤积了堆积如山的货物，等待伊国战火平息，形势好转之后，便蜂拥而入，抢夺先机。那些承包工程的建筑公司，也早已着手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战后的伊拉克，必将进行大规模重建，时机一到，他们便可大展拳脚了。
* 目前在伊拉克营运的，还有两家中国通讯公司，它们是华为和中兴。伊国的通讯项目还得交给中国公司来做，因为先前的通讯系统主要是由中资公司承包的，要是不让中资公司参与重建，伊拉克现有的通讯网络便动弹不得。
* 巴林王国位于波斯湾西南部，介于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由35个列岛组成，巴林岛是巴林最大的岛屿。巴林小国寡民，是西亚最小的国家。
* 巴林的石油资源丰富，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石油及石油产品占国家收入60%以上。政府推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成效卓著。处于四面环海的优越位置，渔产丰。巴林的工业颇发达，有炼油工业、炼铝功业、石油化学工业、造修船工业及炼钢业等等。长期以来，国家政治稳定，经济蓬勃，国内基础设施良好，金融制度稳健，其国民年收入高达1万7000多美元。
* 据中国银行巴林代表处首席代表郭京思说，巴林目前有华人约2000人，大多是改革开放后迁移过来的，当中有少数台湾人。约有200人经商，有些经营杂货店，有些开中餐馆，业主包括中国大陆移民及台湾商人。中资机构则有中建公司、华为公司、中石油公司及中兴公司等。中建公司于2007年获得签署承建Zallaq五星级酒店的合同，合同额高达7846万美元。中石油公司于2009年获得巴林海上“二号区块”勘探工程，工程进行顺利。也有由中国政府派来的农业技术专家及大使馆人员。
* 这里也有远嫁到巴林来的华人媳妇，如来自台湾的郭芬惠女士嫁到巴林来已有27年；还有一个名为埃达的法国华侨，嫁给在巴林工作的丈夫而来到麦纳麦（Al Manamah）。
* 阿富汗是西亚的内陆国，西邻伊朗，北部接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部与南部界巴基斯坦，东北部隔着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与中国接壤。境内多山地与沙漠，没有出海口，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 由于阿富汗地处中亚和西亚进出南亚与南下印度洋的要冲，战略地位重要，所以19世纪后，这里便成了英国与沙俄逐鹿的战场。1878年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把阿富汗沦为英国附庸。1919年阿富汗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阿富汗，更是充满动乱，70年代的阿富汗发生了两次政变，1978年成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次年苏联出兵阿富汗，直至1989年才撤军。苏联离境后，阿国境内各派系爆发内战。1997年塔利班政权获得了控制权，改国名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由于塔利班支持恐怖活动，2001年美国以反恐为名，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扶持以卡尔扎伊为首的政府，进行艰巨的重建工作。多年来的战乱，使阿富汗经济备受摧残，人口严重流失。
* 据粗略估计，目前阿富汗约有800名华人。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国有或私营企业员工，主要从事修路与电讯工作。此外还有一些个体户，做着铝合金、副食品及餐饮业等各种生意。
* 这些年来，塔利班的势力卷土重来，尤其在南部坎大哈（Kadanhar）一带，经常发动自杀式的袭击、绑架、勒索及杀害员工，使这里的中国生意人与工人都有撤离的打算。
*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公司（简称“中水”）于2007年在喀布尔（Kabul）以东修建一条外国军车经常通过的公路。5月23日，该公路施工处发生一起针对外国军车的自杀式爆炸事件，造成“中水”雇用的警察和另外3名平民死亡。事件发生后，四五名中国工人坚决要求回国。韩国人质事件发生后，“中水”员工情绪再次波动，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干完活，尽快走人。目前还有几家中国国企也打算在完成现有项目后撤出阿富汗。
* 喀布尔的中餐馆约有十多家。第一家中餐馆是在2002年11月开张的，那时正是塔利班政权倒台后一周年。开张后生意红火，为了品尝中国风味，食客不惜排长龙等候。因为经营餐厅有利可图，餐馆接二连三冒起，竞争激烈。
* 以色列地处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东北与叙利亚为邻，东界约旦，南濒亚喀巴湾，西南部与埃及接壤，北傍黎巴嫩。据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以巴分治，1948年以色列建国。自建国以来，它与邻近国家发生了6次战争，占领了埃及的加沙走廊、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叙利亚的戈兰高原及黎巴嫩部分土地。
* 以色列土地贫瘠，资源短缺，坚持走科学强国之路。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举世瞩目，尤其是电子、通讯计算机软件、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工程、农业以及航空等方面拥有的先进技术和优势。
* 据2008年的统计，以色列华人人口高达2万3000人。有些是中国官方机构人员，有的是留学生，也有来自港台的企业家，及中资公司的人员，不过绝大部分是劳工。单单在以色列打工的中国人就数以万计，劳工占以色列的中国人90%以上。中国政府允许输出中国劳工以赚取庞大的外汇，以色列是主要输出国之一，所输出的劳工大部分是建筑工人，主要来自福建与江苏。自1994年至2002年，中国输出到以色列的劳工超过两万人，总营业额高达3亿美元。中国工人的建筑技术获得当地人的赏识，尤其是瓷砖粘贴与墙壁装饰技术，令以色列雇主非常满意。
* 有些以色列华人是开设中餐馆及杂货店的。以色列的中餐馆有几十家，多在特拉维夫（Tel Aviv）及海法（Haifa）等地。但正宗的中餐馆很少，大部分是西化了的中餐馆。
* 以色列华人中，还有一位中医师李洪芬，开了一间诊所，专医肿瘤病患。由于医术精湛，仁心仁术，救人无数，获得了以色列永久居住权。对一位非犹太人来说，这是一项殊荣。
* 也有台商来以色列投资，主要是入股投资，较少介入实际经营。目前和以色列业务有密切来往的业者，包括旺宏电子、宏基电子、华邦电子、台积电、中华开发工业银行、东元电机、台翔航太和东讯企业。
*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南部，南接阿富汗，东北、东南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西部与土库曼斯坦比邻。19世纪被沙俄侵占，十月革命后加盟苏联，1990年苏联解体后，翌年宣告独立，建立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乌国的经济，在中亚地区比较发达，国民经济支柱是“四金”，即黄金、白金（棉花）、乌金（石油）与蓝金（天然气）。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由于过度专业化，大部分耕地用来种植棉花，粮食不能自给自足，需靠外地进口。从总体而言，仍未摆脱落后状态。
*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共有129个民族，其主体民族是乌兹别克族，约占人口总数的73%。乌国独立后，其主体民族开始当家作主，一切都以主体民族优先，其他民族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迫使他们纷纷离境。过去中资企业或独资或合资，有160多家，现在只剩下40多家了。中国私人投资的企业也不多。境内也有一些老华侨，依靠经营小买卖过活，境况堪怜；新移民则多是石油与建筑工人。
*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与中国维持了良好的政治、外交与经济关系。除了两国首长互访与促进贸易外，还签订了经济与文化协定，中国政府给乌国提供无偿援助与无息贷款。政府也派遣了汉语老师前往教中文，以提高乌国学生中文水平，进一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都在里海以东，北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邻中国，南界伊朗、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在历史上，它们同样被沙俄征服，十月革命后，加盟苏联，1990年苏联解体后，翌年都宣告独立建国。
* 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与石油资源非常丰富，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规模开采。自1996年以来石油价格节节上升，导致土库曼斯坦的炼油工业迅速发展，吸引了外资的到来，从而推动了其他工业如电力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及建材工业的发展。轻工业方面的纺织业及食品加工业都有良好的表现。
* 至于塔吉克斯坦天然资源贫乏，多年来政局不稳，持续的内战与动乱，使工农业生产衰退，物价暴涨，失业率飙升，是中亚最贫穷的国家。
* 两个国家都是多元民族结构，土库曼斯坦有100多个民族，以土库曼族居多，占总人口的72%；塔吉克斯坦有86个民族，主体民族塔吉克族占68%。两国都有少量的中国少数民族和汉族。
* 华人涉及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商业与服务业。如近几年来，土库曼斯坦的商业逐步走上繁荣，在零售商品中，食品类主要有肉类、鱼类、蔬菜水果、食糖、面包和茶叶等，用品包括服装、鞋袜、家具及电器等，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制造”的，由当地华人批发商与零售商经营，由于中国货价廉物美，很适合这些国家人民的低消费需求，甚是畅销。在服务业方面，华人参与的有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
* 据民间估计，土库曼斯坦的华人多达1万2000人。他们多是石油技术工人与商人，从事修理油井、建筑工程与贩卖小商品。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大沙漠西部和东部，一支中国石油修井工人在修理油井的同时，利用8年时间艰辛地创建了一座“中国城”，里面有宿舍、库房、料场等，作为工作与生活休闲之用。到了2002年，工人再度以惊人的毅力与刻苦的精神，在荒漠上建起了第二座“中国城”，建筑里有电视厅、医务所、会议室、厨房、浴室、卫生间、换气与空调设施，一应俱全，而且有24小时热水供应。这同“中国城”外的荒漠形成鲜明的对照。
* 即使在贫穷的塔吉克斯坦，漫步在首都杜尚别（Dushanbe）的大街上，触目所见的，都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商店的橱窗里，“中兴”手机赫然在目；体育商店的柜台上，中国制造的健身器材被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在钱币兑换处，人民币被列为可自由兑换的币种之一。中国的新移民主要是建筑工人，其他则多是小商人。
* 南亚、西亚多个国家长期以来，战争绵延不绝，遍地烽火，军人平民死伤无数。尽管兵凶战危，处处是死亡陷阱，但也阻止不了华商的闯荡进入。这地区的华人，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他们踏遍千山万水，远道而来，在危机中寻找丰富的商机。但有些由于远景不明朗，华人陷于困境，因此有的打道回府，回归中国；有的再移民，勇闯欧美国家，再从头开始创业。
* 早在宋（960 - 1279年）元（1279 - 1368年）时期，中国商人已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到东南亚各个商港来贸易。华商在东北季候风吹送的季节，乘船南来，带来了中国精美的丝绸与瓷器，以换取当地的土产及奇珍异宝，再趁着西南风扬帆北归。不过那时的华商多是过客，少有定居。但自从明朝（1368 - 1644年）以来，尤其是郑和下西洋（1405 - 1433年）之后，南来的华商越来越多，并定居下来，形成了许多聚落。他们与当地人融洽相处，皈依当地的宗教，并与当地妇女通婚，繁衍了混血的后代，生生不息。
* 可惜的是，随着东南亚国家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种族间水乳交融的状态遭到侵蚀。尽管华人流血流汗，为各居留地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仍受到各殖民地政府的排斥与屠杀，埋下了排华的恶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当家作主，狭隘的民族主义气焰高涨，排华恶行蔓延各地。华人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的对象。排华酿成的悲剧，华人固然是受害者，但实际上是两败俱伤，有关方面宜三思而行。
* 本文将分两部分来阐述这个课题，第一部分是东南亚的排华事件，这个地区的排华行为，其历史与演变有共同的脉络及规律，可作为一个单元来阐述。第二部分是东南亚以外的国家，包括美、加、澳等国。这些国家的排华运动，也有相似之处，不过各国因情况各异，大同中亦有小异，可作为另一单元来阐述。
* 除中国之外，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约有4千多万，其中大约有90%聚居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就占了约3100万，其他越南、缅甸及菲律宾也各有超过100万的华人。华人移殖东南亚以后，开疆拓土，流血流汗，为东南亚的城镇建设，与促进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建了辉煌的业绩。可是华人也历经悲壮凄惨的命运，那就是屡遭歧视、排斥、甚至大屠杀。尤其是战后数十年间，排华浪潮此起彼伏，华人如惊弓之鸟，风声鹤唉，人心惶惶，生命财产备受屠戮与摧残，损失惨重。
*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除了新加坡与文莱以外，各国无不爆发了排华暴行，标志了华人噩梦的开始。各国排华悲剧的大小程度不一，有的频频发生，犹如狂风暴雨，暴民聚众呼啸，烧杀掳掠，极尽残暴之能事，如印尼即为典型的例子。有的排华运动时断时续，手段较为温和，造成的损失较为轻微，如越南、缅甸与菲律宾。有的偶尔迸发，震慑力和缓，犹如和风细雨，并达到了同化华人的目的，诸如泰国。
* 为什么会发生排华的现象呢？综合而言，有以下几个原因，即：
* **1.    殖民政府种下的祸根：**
* 荷兰统治东印度群岛（印尼）历经300余年，长期以来，荷政府在不同的种族间，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华人一味高压，限制华人居住在特定的地区，除非有特殊的通行证，否则不得擅自离开。华人从事的职业，不能随心所欲，受到立法的限制。华人需交纳沉重的苛捐杂税，稍有抗拒，便加以逮捕、监禁，甚至屠杀。高压的政策同样施诸土著的身上。荷政府实施的强迫制裁，把印尼人民视为奴隶，迫使他们无偿提供劳役，栽种政府指定的经济作物；稍有抗命不从，便以严刑峻法伺候。更绝的是，政府采用各种挑拨离间的手段，使两个种族互相猜疑与嫉恨，加深种族间的敌视，种下了仇恨的祸根。
* 西班牙殖民政府统治菲律宾，长达三个半世纪。对华人既爱又恨，政府既要利用华人来发展殖民地，又嫉恨华人势力的迅速膨胀，采取高压与限制的政策。华人稍有反抗，便不惜报以大屠杀或集体驱逐出境。另一方面，西班牙政府更在种族间挑拨离间，煽动菲律宾人对华人的仇恨清绪，加深种族间的裂痕。
* 其他如英、法殖民政府，分别在马来亚、缅甸及越南实施偏袒土著政策，并挑拨不同种族的矛盾，种下了种族间仇恨与敌视的祸根。这些由来已久的潜伏危机，到了战后，土著以当家作主的姿态，掌握政权，傲视一切，目中无人，视华人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 **2.    根本原因是贫富悬殊：**
* 印尼的政客、极端种族主义者、回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及别有居心的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华人都是富有的，是“经济强者”，而土著都是贫困的，是“经济弱者”。他们也夸大其辞地宣称，人口只占3％的印尼华人，却操纵了国家70％的资源与财富。他们恶毒地咒骂华人是吸血鬼、是剥削者，把华人的财富建立在印尼土著的劳力与血汗上，因此华人是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罪魁祸首，土著若要摆脱贫困，便要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包括烧杀掳掠或集体驱逐出境，迫使华人财产均分。这些对华人的偏见，经过了舆论的曲意渲染，更使广大的印尼人信以为真，使土著与非土著（华人）间的阶级不平等，升华为种族的矛盾与仇恨。一旦国家陷于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物价腾贵，土著便嫁罪于华人，在政客与种族主义者的煽动下，沸腾的种族主义情绪，便一发不可收拾，爆发了排华暴行。
* 实际上，富有的华人，只是少数的资产阶级，大多数华人是中产阶级，以及低层的商贩、工人与贫农。华人也并非操纵了印尼的经济，国家的石油及天然资源，多是国营或与外国则团合营，通过贪污或其他不法手段，官商勾结，使这些少数的土著富豪，积聚了大部分的财富。少数的华人富豪只不过分得了一杯羹。
* 在英殖民政府时代，马来亚政府致力于推行“马来人务农，华人经商” 的政策，导致了马来人贫穷与落后。那时，马来人多数居住在乡村，华人大多在城市经商生活，族群的经济地位差距颇大。1957年独立后，联盟政府基于土著优先的原则，积极扶持马来人，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于是大量马来人从农村流入城市，在政府机构任职。并在政府贷款计划下，马来人建立了成衣、木薯粉、橡胶等产品的加工企业，开办了批发和零售商店，另外还组建和经营了国有巴士公司。而且马来人的公司股权比例也提高了。经过政府多年的努力，华人与马来人族群间，无论是在就业、收入、贫富及公司股权等方面的差距也逐渐缩小了。
* **3.    土著与华人间文化的歧异：**
* 美国学者亨廷顿强调，不同的宗教文化是难以调和的。他认为不同的文明迟早要导致更大的冲突，这就是他的文明冲突论，只有主流文化去同化其他族群文化才是解决冲突之道，而他心目中的主流文化应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放眼世界，因宗教不同而产生种族摩擦，最终导致种族战争的例子，比比皆是。文化的歧异，尤其表现在宗教信仰的不同。在印尼与马来西亚，土著绝大部分是回教徒，而华人却多是佛教徒与基督教徒。宗教的不同往往造成习俗的偏见，互相不能融合与信任。土著执政者强迫推行同化政策，要华人信奉回教，鼓励异族通婚，并不为多数华人所接受，这种潜伏的种族内在危机，往往成为煽动排华的火种。印尼与马来西亚的排华暴行，往往是以回教为号召，高举圣战的旗帜，来煽动盲目群众仇恨的情绪。
* **4.    华人政治效忠意识受猜疑：**
* 一些土著怀疑华人虽然入籍成为印尼公民，其实并非基于效忠居留国，而是要保护其固有财产。华人仍然不能忘怀于中国，仍然把大批资产用于中国家乡的建设与对乡人的接济。华人甚至被怀疑是中国的“第五纵队”，为中国政府服务。因此每当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恶化，海外华人便成为代罪羔羊。另一方面，一旦居留国稍有风吹草动，出现危机，华人资本家便把资产转移国外。土著怀疑华人不忠于居留国，加深了对华人的不信任与怀恨，往往就散播了排华的种子。
* 排华的形式是多样化的，计有以下数项：
* **1.    暴力排华**
* 在印尼，暴力排华的次数最频密，手段也最残忍。排华事件往往是在政客与军人的煽动与策划下，鼓动暴民，成群结队，四处呼啸，手持武器木棍、铁条与利刃，砸车烧屋，掠夺财物，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极尽残暴之能事。最近一次大规模排华暴行，发生在1998年5月13至15日，被称为“黑色的五月”。这是一场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排华悲剧，为三十多年来所仅见。动乱波及各大小城市，而以雅加达最严重。暴徒杀人放火，掠夺财物，集体轮奸华妇，而且先奸后杀，有的更活活被烧死。暴徒手段之残酷，人神共愤，天地同悲。这场惨绝人寰的动乱，是由军方及极端势力幕后策划的。
* 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了一场排华事件。事缘当年5月11日大选揭晓后，执政的联盟损兵折将，很多席位落在反对党手中。反对党在庆祝胜利游行中，向马来人作出挑衅的行为，引起了马来人的报复，群起闹事。13日傍晚时分，马来人开始向华人发动攻击，杀人放火砸车，华人措手不及，死伤惨重。嗣后华人展开反击，事情闹大，政府宣布实施戒严令。军警奉命维持秩序，却把枪杆子向华人扫射。事后首相东姑下台，由敦拉萨接任，大权在握。“513事件”是马来西亚历史的里程碑，标志了国家格局走上一个新阶段。
* **2.    通过立法，限制华人从业，提高土著经济地位：**
* 自战后独立以来，民族主义浪潮高涨，一切均以土著利益为依归，政府实施的政策，都以维护土著利益，提高土著经济地位为前提。于是国会通过一系列的立法，限制外侨（多是华人）自由从业，多项职业保留给土著经营。即使是过去多年来由华人垄断的行业，也一声令下，强制华人停业，把华人的资产充公，交由土著接替。
* 自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菲律宾政府便颁布一连串的菲化法令，接二连三，层出不穷。先有零售业菲化法，限制华人不得经营零售业，由菲律宾人取代。接着有米黍业菲化法，在该法令下，过去由华人垄断的碾米厂都要关门大吉，而由菲人接手。还有专门职业菲化法通过后，工程师、建筑师、律师等专业，都把华人拒于门外。
* 早在苏加诺执政时期，印尼政府就在5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限制外侨（主要是华人）从事多项职业，这些法令包括限制外侨进口企业、限制华侨汽车商行营业、限制华侨经营碾米业、限制外侨经营木材业及禁止外侨零售商在县以下地区营业。其中以1959年的禁止外侨零售商法令对华人影响最大。那时乡村的零售商有80％至90％是华人，直接受影响者达50万人之多。华人被迫结束营业，而政府又没有给华人适当的安置与补偿，使广大华人顿时陷于失业，无所适从。
* 苏哈多执政时期，经济政策稍作修订，一方面继续限制华人职业，另一方面却要利用华人资金发展国内的经济，因此兴起了华人资本家与印尼官方及军人的联营企业，这就形成了所谓“阿里巴巴”联营企业，或称“主公制度”，即由华人资本家出资经营，并负责管理技术，而官商或军人只是挂名董事，却能分得营业利润。苏哈多家族就从联营企业中，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 南越吴庭艳政权当政期间，也于1956年颁布了第53号法令，禁止外侨经营鱼肉、杂货、柴炭、燃油、丝棉织物、钢铁、粮食、运输、碾米等11种行业。
* 缅甸独立以后，吴努政府除了宣布外侨职业限制外，实行私营企业、工商业国有化政策， 把外侨企业收归国有，华人经营的企业也受波及。自1962年尼温政变执政后，国有化政策更是雷厉风行，缅甸华人的工厂、商店、商行及酒家全部收归国有，华人辛苦累积的资产，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及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513事件”的产物。1970年马来西亚政府宣布的新经济政策（1970 - 1990年），目的是要：1. 消除贫穷；2. 废除以职业分野来辨识种族，重组社会。据估计，在1970年，有限公司的股份资本持有权，外国人有63%，华人有34%，而马来人只有2.4%，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重新分配国家的财富，增加马来人拥有的股份资本，在20年内增至30%。政府要剥夺华人公司部分拥有权，分配给马来引起华人的不满。
* 1975年，政府又颁布了工业协调法令，给华人中小型企业平添了种种障碍。繁文褥节，助长了滥用职权及贪污的风气，对中小型企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压制了华人企业的发展。
* 新经济政策推行后，成效卓著，华人的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在金融业、矿业及农园的持有权，逐渐转移到土著手中，而土著的经济势力大为扩张，据称1999年，马来人的公司股份资金已达致19.3%，但土著公司及国营公司在银行业、保险业、船务与电讯等业的支配权已大为扩充，所持有的股份资金应超过19.3%。
* 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显然已趋向种族化。原本的目的是不分种族，消除贫穷，但结果是华族穷人的生活没有获得多大改善，乡村的马来农民也没有多大受惠，只是制造了少数的马来特权阶级。20年过去后，统治阶级声称，马来人尚未达到30％的目标，因此新经济政策仍要继续推行下去。
* **3.    强迫华人入籍，推行同化政策：**
* 执政者认为，华人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爱中国多于爱居留国，不利于居留地的发展，必须实行同化政策，让他们彻底成为居留国的一分子，完全效忠于居留国的政府，因此强迫华人入籍。此外执政者也认为，华文学校、华文报章及华人社团，是培育同情与效忠中国分子的温床，必除之而后快。于是强制关闭华校、华报与华团，彻底摧毁中国意识的根苗。
* 印尼的国籍法较为复杂。简单地说，在1980年之前，政府并非采取出生地主义的原则，尽管华人在印尼出生，却不能自动成为印尼公民。要成为印尼公民，尚需附有其他条件。不但有许多繁文褥节，还要缴纳高昂的申请费，加上即使申请成为公民后，也只是二等公民，所以许多华人不愿成为印尼公民，仍然保有中国国籍，或是无国籍民。据1965年印尼政府公布，中国籍民有113 万多人，印尼籍民200多万，其他还有少数持台湾护照或是无国籍民。但1980 年以后，政府却要迅速解决外侨问题，放宽公民权的申请条件，简化申请手续，减低申请费用，鉴于大势所趋，华人纷纷申请入籍。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华人已入印尼籍，只有少数中国籍民与无国籍民。
* 在苏加诺时代，政府即开始推行华人同化政策。首先是加强对华校的管制，取消对华校的津贴。5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管制外侨报刊。追至1965年 "9.30政变”苏哈多上台后，强迫同化政策雷厉风行，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华校，华文报章停刊，禁止中文书刊、华语影片与华语录影带进口，禁止公开的华族节日庆典，并强迫华人改名换姓。
* 南越吴庭艳政府也推行华人同化政策，强迫华人入籍。政府采取出生地主义原则，规定凡是在越南出生者，即使其父母是中国籍，也一律是越南籍民。当局更采取种种措施， 强迫华人改变国籍。1975年，越共统一南北越后，一改过去善待华人的政策，开始迫害华人，强迫华人入籍。并以职业限制作为要挟，迫使华人加入越南籍。
* 菲律宾的国籍法，也是采取出生地主义的原则，即在本地出生者，达到法定年龄，即可归化成为公民。至于外侨要申请入籍，则需至少居住十年，并须经过语言测试，也因费用高，手续繁琐，申请时间长，所以归化的人少。但1975年后，政府简化入籍手续， 鼓励外侨归化，放宽入籍条件，反应热烈。据说，1975年至1986年间，约有20万华人加入菲籍。
* 50年代中期， 菲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势力渗透华校，开始对华校严加管制。1967年宣布停止成立新华校。到了70年代中期，绝大部分华校已实现菲化。菲化以后，华文学校主要教授英文与菲文，中文课程每天以100分钟为限。至此，华校已然变质，并日渐萎缩。
* 马来西亚独立以后，政府锐意要使华校变质，成为国民型的学校，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所谓国民型学校，即以英、巫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而华文的教学时间大大缩减，每周只有五六个小时，而且要有一定的学生人数才开班。后来经过华社、董总与教总的不断争取，终使华文小学得以保存下来。至于华文中学，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津贴，只好由华社自行开办独立中学，成绩斐然。
* **4.         集体驱逐出境：**
* 中国与邻国关系的好坏，往往决定了当地华人的命运。国与国之间关系良好，华人便受居留国政府的善待；一旦关系变恶，华人便成代罪羔羊，任人宰割，歧视、排斥、殴击、囚禁、关在集中营、甚至集体驱逐出境，越南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 1975年以前，中越关系良好。中国政府倾全力援助越南对外战争，当地华人也与越南人民并肩作战，抵抗外国的侵略，那时越南的华人获得当地政府的善待，人民的尊敬。但1975年越共统一越南以后，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两国渐行渐远，终致关系恶化。于是越共政府对当地华人的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怨报德，对华人横加迫害与打击，为了要改造华人，强行遣送华人到荒芜的“新经济区”去，任其自生自灭。在越南当局的迫害下，越南华人难以求存，只得沦为“船民”，投奔怒海，不知有多少人葬身鱼腹，成为海底冤魂。
* 至于越南北部的华人，也同样遭到迫害。自1977年，越南政府就在与中国比邻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行动，把中国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也有成千上万的华人，被越方从陆路赶至中越边境的老街、同登、芒街等地，然后赶回中国。截至1978年6月7日，被赶回国的华人已超过11万人。
*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排华运动就不断上演着。就排华的时间与激烈程度而言，美国、加拿大、澳洲及纽西兰要算是先锋。而中、南美洲等国家，也东施效颦，开始有排华的举措，但程度上较缓和。不过到了第二次大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国家政府不得不放宽移民政策，容纳更多华人移民入境，政府也以较宽容平等的态度，对待入境的华人新移民。不过这不等于说，这些国家的华人都受到平等宽待。在某些方面，华人仍然受歧视与排斥，而民间依然潜伏着仇视的心态。随着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大规模华人新移民浪潮，触发了族群间的商业竞争，以及其他生活上的冲突，在欧洲、非洲与大洋洲等国家，也爆发了暴力排华事件，幸而都是规模较小的孤立事件，没有酿成巨祸。
* 以下就各国排华的原因与形式作综合性的论述。原因有下列数项：
* **1.    白人的优越感：**
* 早期美、加、澳、纽的欧洲移民，有些是无恶不作的罪犯，即使是自由移民，也有些是流氓地痞、奸商无赖之徒，偏生移民到新殖民地之后，便以新主人自居，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优秀民族，高人一等。在他们眼中，华人是劣等民族，因此轻蔑鄙视中国人，侮辱性地称他们为“中国狗”（Chow）、“中国佬”（John Chinaman）。白人羞与中国人为伍，为了维持“白人社会的纯洁性”，他们高喊“中国人必须滚出去”、“加利福尼亚乃美国人所享有”的口号。澳洲的白澳政策，就是贯彻“澳洲是白人的澳洲”的理念。
* **2.    职业与商业的竞争：**
* 华人秉性勤劳刻苦，诚实可靠。他们不计较工作酬劳，也不计较工作的性质，白人遗弃的矿地，华人再去挖掘，白人不愿做的低贱工作，华人欣然接受，而且做得更好。因此白人矿主与园主，都乐意聘用华人为雇员，引起白人工人的妒恨。至于经商，华人的零售店与餐馆，一早就开门营业，到午夜才打烊，一天工作十余个小时，一年当中，除了春节休业几天外，天天都做生意。而且通过地缘、血缘与业缘的组织，华商编织了严密的网络，便于货物供求与资金周转，当地商人无法与华商竞争，因此产生排华的心理，这也是排华最基本的原因。
* **3.    文化的差异：**
* 华人与白人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信仰各异，因而引起种种的冲突。白人认为中国人是永远不能同化的。他们把所赚得的钱都汇回中国接济家人，漠视当地的利益。华人文化、教育程度不高，时常沉迷烟赌与娼妓，不讲卫生，传播麻风、天花等疾病，对白人的生命安全是一大威胁。总之华人的道德文化对白人产生不良的影响。实际上，华人固然有许多恶习，但白人又何尝没有酗酒、赌博与嫖妓等行为。反而，华人的勤劳、节俭、温和、奉公守法、诚实可靠等美德恰恰是白人所欠缺的。
* 排华的形式是多样化的，计有以下数项：
* **1.    暴力排华**
* 美国人的暴力排华，早在19世纪50年代即已爆发。首先发生在加州的金矿区，白人暴徒杀害中国矿工。此后遭杀害的华工几乎无日无之；有的被集体驱逐。据中华会馆的了解，1862年，被杀害的中国人计有88人，而凶手却大多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逍遥法外。
* 1877年7月23日，爆发了所谓“暴动夜”，一连三天，暴徒在三藩市华埠聚众闹事，放火烧屋，洗劫商店，幸军警及时赶到，将暴徒击退，维持秩序，华人才得以幸免于难。
* 嗣后，暴徒杀害华人的暴行，从三藩市蔓延各地，洛杉矶、科一罗拉多的丹佛市、内华达州、怀俄明的石泉矿区及西雅图等地，都爆发了排华暴动，造成华人生命财产严重损失。
* 19世纪中叶以后数十年间，加拿大西部的金矿区，不断发生白人欺压与杀害华人的暴行。如1869年在奎斯尼河口华商广利行的房屋被放火，十名华工遇难。
* 意想不到的是，100多年以后的加拿大，又因港台及中国大陆移民的激增，引起了加拿大人与华人族群的紧张关系。加拿大人对新移民到来造成的负面影响怀恨在心。如港台企业家投资房产，把地价炒高。又如华人移民兴建的高楼大厦，破坏了加国的风景线。华人的喧嚣吵杂，扰乱了宁静的环境。华人不良的社会行为，有损于加国文化与团结。这些负面的因素，都加深了族群潜伏的紧张关系。
* 19世纪中叶，澳洲盛产金矿的维多利亚州，也爆发了排华事件。华人集体被驱赶。流氓冲进华人商店，放火抢劫杀人，有数名华人遭杀害。1860年12 月，新南威尔士的金矿区，发生了蓝坪滩事件。蓝坪滩矿区的排华事件的特点是持续时间之长，暴徒手段之残酷。从12月至翌年8月间的8个月里，共发生了 7起暴徒袭击华工的暴力事件，平均每个月一次。暴徒烧房屋，杀人殴击，劫掠财物，华人死伤惨重。暴乱事件蔓延到昆士兰、墨尔本与悉尼等地。
* 20世纪以后大量中国新移民涌人南太平洋岛国、非洲与欧洲等地，华商在商场的大事活动，尤其是在零售业与餐馆业的成就，引起与当地商人的激烈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华商居上风，这一来导致了当地商人的嫉恨，从而掀起了排华的浪潮。
* 2006年4月18日，所罗门群岛的首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行为，前后延续了两天。这次暴动的原因，主要起源于多年来土著对华人的积怨。这里的华人有2千多人，他们控制了岛上的零售业、批发业、木材业与渔业，这些都是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所以引起土著对华人的嫉恨。而直接导致排华爆发的，是缘于4月5日的大选。选民怨恨大选舞弊不公，认为总统利尼（Rini）的中选，是由于华人资本家行贿的结果，而总统也答应中选后，将给华人许多好处。在反对派的煽动下，最终爆发了排华暴行。在两天的暴动中，暴民冲着华埠而来，放火焚毁华人的商店，大事掠夺华人的财物，华人惊慌逃命。澳洲与纽西兰派遣军警来镇压，政府施行戒严令。至20日，首都终于恢复秩序。
* 2006年11月16日，在南太平洋汤加小岛国的首都，也爆发了暴力排华事件，暴民聚众群起呼啸，手持木棍刀矛，火烧华人商店，掠夺华人财物，所幸没有造成人命伤亡。汤加的华商拥有首都大部分的商业，这里的华人约有500 多人，他们多已入籍，视汤加为故乡。暴动发生后，华人向各处逃难，中国大使也呼吁政府须保护中国侨民。
* 2009年5月13日，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发生了反华暴乱，当时百多人参加游行，最后演变为暴力和抢劫。15日，暴乱蔓延到第二大城市莱城（Lae），成千上万的暴民涌入当地华人商店大事抢掠，使整座城市限于瘫痪。暴乱造成一死数人受伤。据说许多当地人抱怨，近年来涌入大批华人移民，把本地人挤出了规模不大的商业市场，还有说华人老板虐待员工，华人犯罪率增加，以及向当地官员行贿，激起当地人的公愤，以致最终引起暴动。
* 1962年爆发了中印边境战争。印度人民群情汹涌，反华情绪高涨。舆论也推波助澜，厉声怒吼：“中国人掠夺我们的土地”、“中国人该死”。印度境内的华人首当其冲，横遭迫害。数千名华人被围捕，囚禁在沙漠中的集中营，达数年之久。另外几千名华人，被集体驱逐出境，回返中国。其余的华人，有的逃往邻国的巴基斯坦及斯里兰卡，有的投奔欧美国家。加拿大的多伦多，就有好几千名来自印度的华人青年。
* 港台及中国大陆新移民活跃于工商业舞台，很快就在工商业上占尽上风，把当地的小商人与小工业家挤出竞争的行列，引起他们的嫉恨。其他如工商业之间的纠纷等因素，都会加深族群间的矛盾与仇恨，欧、非的某些国家，在政客与野心家的策动下，便把矛头指向华人，进而爆发了排华暴行，试举例如下：
* 意大利米兰市保罗萨比（Paolo Sarpi）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唐人街，这里商店摆卖的成衣、皮鞋、皮包等日用品，业主都是中国人。近十年来，大量华人新移民涌入意大利，其中大部分是浙江温州人。官方估计中国移民总数达11万 4千人，但因非法移民很多，真实数字可能达到50万人以上。
* 保罗萨比大道与附近几条街的商店，几乎都被华人买下或承租，这个地区已逐渐成为华人的批发商区。住在这一带的意大利人，反而感觉自己像个外国人或少数族群。他们常投诉，抱怨这一带环境脏乱、嘈杂，违规停车，交通混乱。他们常组织队伍，示威游行，表示他们很难与中国新移民相处。
* 意大利官方明确表示，中国新移民自成一个小社会，使用自己的语言与生活习惯，已形成封闭的群体，华人区是米兰的“城中城”。由于语言的隔阂，造成误会，冲突事件时有所闻。种族矛盾不仅存在于意大利，欧洲华人移民近年激增，跟当地居民在文化上、法律上都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冲突，如果处理不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酿成巨祸。
* 非洲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Lusaka），1997年10月2日也爆发了排华事件。事缘中国人投资的铜矿公司，雇用了大批赞比亚人员工。可是工作环境恶劣，薪酬低微，激起了工人的愤慨，中国老板被认为是工人的剥削者。此外，廉价的中国货向赞比亚市场倾销，威胁到赞比亚公司的生存。而且华人人口迅速膨胀，已达3万人，过去十年间，华人在当地的经济力量日益壮大，引起赞比亚人的嫉恨。多年的积怨终于在1997年10月2日迸发，暴民在首都发难，华人在市内的商店与建筑物，成为暴民焚烧与掠夺的对象。经过两天暴乱后，终于10月4日恢复平静。
* **2.    立法排华**
* 经过多年的酝酿与波折，美国国会终于1882年5月6日通过了排华法令。规定在十年内，停止熟练与非熟练华工进入美国；非经正当途径入美的中国人，于法案通过之日起，将被驱逐出境；已在美国的中国人，无权申请美国国籍。
* 1888年，国会又通过了“禁止华工进入美国法案”，该法案对华工入境更为严厉，从第一法令的“停止”，进一步跃升为“禁止”。1882年的法令十年期满后，国会又于1892年通过了吉里法令（Geary Act），把禁止华工人境再延长十年，又增加了更苛刻的条文。此后1904年、1911年、1912年及1913年，国会更接二连三通过排华法令，对华人移民入境的限制与禁止，越来越严苛，入境的华人移民因此越来越少。1924年又制定了新移民条例，对华人移民入境的限制更严厉，是最严酷的律令。
* 加拿大的限制华人人境，也步美国后尘。先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通过“1884 年管制华人条例”。1885年联邦会议通过“限制和管治华人移民条例”，向入境移民征收十元人头税。另规定运载华人到加国船只每载重50吨只能接载一名华人。为了进一步限制华人移民少镜，后来又把人头税增加到100元。
* 加拿大限制华人入境的条例越来越苛刻，1923年联邦会议更通过“华人移民条例”，进一步从“限制”跃升到“禁止”，因为条例共有43条，一条比一条苛刻，华人称之为“四三苛例”。
* 1855年6月，澳洲维多利亚州国会通过限制中国人入境法令。规定赴澳船只载重十吨限载一名中国移民，而且得征收十镑人头税。嗣后，南澳、新南威尔斯等州也通过类似的限制华人移民法令。1901年，澳洲6个州成立了联邦政府，统一了限制移民政策，联邦会议通过了 “语言测验法”，规定申请者必须能听能写任何一种欧洲文字50个字以上，并能填写申请书及签名，才算合格。否则即被视为违禁的非法移民，不准入境。若入境被查获，当局有权将他们驱逐出境。这法令显然是针对华人移民而设，堵住了入境的大门。“语言测验法” 是白澳政策的顶峰，而白澳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持“澳洲是白种人的澳洲”，不许华人及有色人种污染。嗣后订立或修订的移民法令，更进一步规定不许华人入籍澳洲成为公民。1958年的移民法，才准许杰出人士与技术移民入境。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联手对日本作战，为了表示对中国友好，美国国会于1943年底通过废除禁止中国人入境律令。在该法令下，中国移民每年有105个名额入境美国，并允准中国人归化美籍。到了50年代，政府颁布了新移民法令，进一步放宽移民入境。美国华裔公民享有永久居留权，其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未婚子女、前妻或前夫子女也享有入境权。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移民法令，给予各国申请人（包括中国人）同等待遇，允许每个国家每年两万名移民入境。尤其欢迎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及资格良好的专业人士移民美国。此外留学生、难民也获准永久居留权。再加上非法移民蜂拥而来，使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激增，至今已超过300万人。
* 战后的加拿大政府也放宽了限制移民政策。1962年政府宣布，废除以人种、肤色及国籍为接纳移民标准，重视移民申请人的教育水平与技术训练。加国当年即吸纳了一大批香港移民。1967年政府宣布新移民条例，以平等对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申请人以教育程度及技术训练为取舍标准。自法令实施后，每年平均约有18万移民入境。入境后的新移民，也可以申请眷属移民加国。80年代以后，有更多华人移民涌入，他们分布在加国如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卡尔加利与埃德蒙顿等大城市。
* 澳洲政府也于1966年颁布新移民条例，初步废除白澳政策。1974年实施 “澳大利亚公民法”，最终否定了实行一百多年的白澳政策。此后港台投资移民与技术工人、东南亚等地的移民及留学生、以及印支难民纷纷涌入。8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及留学生，更是络绎不绝，使澳洲华人人数激增。
* 对比东南亚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排华事件，便会发现两个鲜明的特征。在对待华人的移民政策上，战前东南亚地区的西方殖民政府，是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除了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那几年限制华人入境外，其他时期华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境。移民浪潮尤以20年代达致巅峰。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以及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的结果，东南亚地区是华人聚居最密集的地区，接近全球华人的 90%。那时期，殖民政府虽然对各个不同的种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离间，加深族群间的矛盾与仇恨，但政府基于殖民地的经济利益，不愿意爆发暴力的排华事件。一旦发生了暴力排华行为，政府便迅速派军队镇压，恢复社会秩序。所以战前的东南亚很少发生暴力排华的悲剧。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这期间，由于东南亚独立政府普遍患上“恐共症”，对中国政府深怀戒心，把华人视为中国的“第五纵队”，所以严禁中国移民入境。因此战后东南亚华人人口的增加，完全得力于自然增长率。正如前述，战后东南亚国家的排华暴行，此起彼伏，持续不断。而且往往是政客及种族主义者在背后煽风点火，使星星之火，扩大为燎原之势，造成华人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 然而，在东南亚以外的其他国家，尽管华人流血流汗，挖掘金矿、种植作物、修筑铁路及建设城镇，到头来却遭受歧视与迫害。从19世纪中叶起，各国政府就立法严禁华人入境，强迫华人缴纳沉重的税收。华人居住的矿区、乡镇与华埠，屡屡遭到暴民的屠戮与焚毁。百多年来，排华暴行陆陆续续上演。
* 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迁，美、加、澳等国一改其战前严禁移民政策，变为宽大开放的政策，接纳各地移民入境。战后几十年来，这些国家成为各地移民的目标，蜂拥而来。不但港台、中国大陆的移民倾巢而出，其他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也都纷纷再次向欧、美、加、澳等先进国家进军。经过了一番移民大洗牌之后，使全球华人流布的比例重新分配，美国华人的人口，1980年估计只有80多万，1990 年增至160多万；2009年已超越过300万大关。加拿大1980年华人人口只有28万多，1990年激增至68万多，21世纪初年已超过100万。澳洲华人人口1960年只有 12万多，1980年激增至30万。估计1990年全球的华人人口约共有3700万，比1980 年增长了约1千万。亚洲的32个国家中，占了3200多万（88%）；美洲的32个国家中，占了320多万（9%）；欧洲的25个国家中，占了77万（2%）；大洋洲的 14国家中，占了37万多（1%）；非洲的33个国家中，占了约11万（少于1%）。
* 战后数十年来，这些国家虽然发生了零星的排华行为，但规模者环大，造成的损失也不太严重。但种族的歧视与排斥还是存在的，仍然潜伏着族群间的矛盾与仇恨，它就像埋在地下的定时炸弹，必须谨慎处理与预防，否则将会酿成巨祸。
* 长期以来，华人出国谋生，所到之处，开疆拓土，为地方的建设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中国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海外华人已摒弃了落叶归根的观念，代之以落地生根。时至今日，绝大部分的华人已入籍成为居留国的公民，身为公民的一分子，华人已经身无旁鹜，把居留国视为祖国。何况第二、三、四代的华裔，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主流社会，思维与生活方式都已西化或本土化，对他们而言，中国是遥不可及的外国，不再有很多的牵连。
* 不幸的是，一旦爆发了暴力的排华事件，暴民砸车、掠夺、放火、杀人、强奸，极尽残酷之能事，造成了生命财产严重的损失。在21世纪高度文明与人权至上的世界里，这是不能容忍的，难怪成了千夫所指、人神共愤的行为。排华行为的爆发，造成社会动荡，给所在国带来严重的后果。首先是所在国的华人人心惶惶，觉得这里并非栖身之所，伺机移民欧美国家，连同带走雄厚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是国内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更何况这会造成原有外资的撤出，新外资裹足不前，缺少外资的投注，国内的经济是不能发展起来的，人民的生活是不能改善的。因此掀起排华浪潮是智者所不取的。
* 长期以来，经过了华人不断的努力，已经为居留国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华人编织了严密的商业网，遍布各地，建立与促进了本国与外国的贸易来往，使货畅其流，供求不绝。华人的工商企业与金融业，成了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可或缺。可是排华动乱却发生，或者政府立法剥夺了华人营运的权力，转由土著经营。由于土著资金短缺，又缺少管理技术，虽然接收了华人的营业，却无法使其适当营运，反而造成了混乱。例如在菲律宾，米黍业菲化以后，就造成市场米粮供应短缺，米价飞涨。由土著接收的华人零售店，很快就出现了货源不足的问题，不仅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破坏了人民的生活节奏。
* 千千万万的华人已定居入籍，成为居留国公民，因此要把他们集体驱逐出境，是不切实际的事情。当政者应正视华人的资金及技术，视为国家的财富，给华人公平合理的待遇，让他们死心塌地留下来，将资金与技术留在国内投资设厂，从事企业生产，为国家制造财富，并为本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缓解失业问题。华人专才也是国家的宝贵资产，服务人群，造福社会，政府也应予以平等优惠的待遇，设法使他们留下来，或设法把他们吸引回国。否则如一味发动排华，或立法限制，造成人心惶惶，见异思迁，蝉曳别枝，到头来国家流失了资金、技术与人才，毕竟是国家的损失。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古有名训，愿当政者三思而后行。
* 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如能入乡随俗，吸纳当地文化，融入主流社会，言行举止优雅，变更思维与生活方式，改善人际关系，建立起完美的形象，将有利于消弭排华现象。
* 华人羁身海外，寄人篱下，中国的崛起与强大，固然有助于提高华人的地位，而居留地的大使馆与领事馆固然以护侨为主要职责，但碍于国际公法，不得干预他国内政，以及维持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中国政府往往会尊重当事国法律，无法发挥全方位的护侨工作。因此华人唯有自助自救，避免贻人以排华的口实。
* 言行举止优雅得体是必要的。尽管个人的自由不可少，但要以不妨碍及破坏他人的自由为原则，更不应扰乱及破坏他人优雅的社会。
* 法律是维系整个社会与国家安宁的基本准绳，因此华人须奉公守法，不作奸犯科，不破坏社会的安宁。数百年来，老华人及其后裔，都能守法不渝，持之以恒，予当地人良好形象，这种形象须保留并发扬光大。
* 华人靠勤俭起家，多年拼搏，成功创业，集聚财富，过着安逸的生活，固然无可厚非。但生活起居，不宜过分炫耀，以免招致他人的忌恨，予当地人以华人都是富有的剥削者形象。相反，华人应具有“取诸社会，用诸社会”及 “人溺己溺”的精神，慷慨解囊，救助弱势群体；尤其是发生天灾人祸之际，应及时伸出援手，减除他人燃眉之急。华人对他人友善，必会善有善报。在某些国家，经常由于一桩寻常的交通意外，或是华人的虐佣事件，成为酿成排华的借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华人应提高警惕。据闻南太平洋某小国爆发了排华行为时，在华人聚居的地区，挺身而出，手持武器捍卫华人者，正是华人平日善待的土著，华人也应紧记勿忘。
* 华人初来乍到，一时无法适应陌生的环境。由于语言的障碍与文化的差异，以致自我孤立，困守在华人的小天地，不与当地人交往，引起诸多误会，成为排华的根源。为了促进彼此的了解，华人有必要学习掌握当地人的语言，与他人交往，吸纳他人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融入主流社会，庶几突破种族间的藩篱，改善人际间的关系。
* 总之，华人必须放下涣涣大国国民的心态，改变自私自利的心理，在保留中华传统文化之余，吸纳当地人的文化，融入主流社会，与当地人并肩创业，迈步走向共存共荣之道，才是上上之策。

**大洋洲华人简史**

* 大洋洲涵盖了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三大群岛，另外还包括澳洲、纽西兰和新几内亚
* 现今，大洋洲华人人口已突破80万人，主要聚居在澳洲和纽西兰

**澳洲**

**移民简史**

* 1972年“白澳政策”废除：“公正、平等、正义、宽容”
* 澳洲社会以19至20世纪之交抵达的英国移民后裔，人数最多
* 出生于广州的麦世英被普遍认为是悉尼最早的自由移民（1818年）、经营“狮子”客栈据说，第一个从事家具制造业的华人，1827年抵达悉尼
* 从1840年开始，英国便停止向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输送囚犯，转而引进中国的劳工（月薪3-5元)
* 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发现金矿
* 淘金华工：广州西南一带（开平、台山、新会和恩平）
* 澳洲六合彩的前身：“白鸽票”赌博游戏
* 庙宇以关帝庙居多
* 1900年，西澳、维多利亚州以及新南威尔士约三分之一的华人都从事蔬果种植业
* 1901年限制移民法令及后来的“白澳政策”--1947年，华人仅剩1万2000人左右
* 政策转变：二战后
* 50-60年代：提供科伦坡奖学金（东南亚）
* 1972年底，澳洲工党政府全面取消了“白澳政策”：吸引中印半岛难民（船民）及港台中富裕人家（有船阶级）
* 华人都以“家庭团圆”、“商业移民”、“留学生”和“难民”等身份，入境澳洲
* “锡龙的足迹”：19世纪末，大批华工前往塔斯马尼亚岛采矿，主要集中在名为史葛斯迪奥的小镇
* “悉尼唐人街之王”方劲武

**经济**

* 约17%专业技术人员、11%行政管理人员、12%公务员、19%商业、担任产业工人及体力劳动者；其余从事服务业和体育、娱乐等工作
* 失业率最低的华人群体：新马华人移民
* 蓝领：东帝汶、中印半岛及中国移民
* 艾士菲“悉尼小上海”

**政治**

* 华人参政的转折点：1998年某党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华人成立澳洲团结党
* 黄肇强（印尼）
* 澳洲团结党创党人
* 澳洲历史上首位通过自组政党取得议员席位的华（1998年赢得纽西省大选议员席位）
* 创办澳洲中国留学生福利会
* 澳洲内阁第一位华人：黄英贤，2006，气候变化暨水资源部长
* 墨尔本市首位民选市长苏震西，当选为2006年度澳洲最佳市长
* 自由党华人主席香港移民廖禅娥
* 澳洲议会第一位女议员:1988年何沈慧霞(自由党候选人)
* 第一位进入政府下议院的亚裔人士:(马来西亚)林顺发

**教育**

* 中文教育代表团体：中文教育理事会，编写《中国语文》
* 澳洲最著名的华裔张任谦医生，于1984年成功完成澳洲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并荣膺“本世纪最伟大的澳洲人”之赞誉。在他逝世之后，当地还成立了“张任谦心脏病研究所”。

**媒体**

* 澳洲有大约60家中文媒体，数量在世界海外华文媒体中排行第二：《星岛日报》《老子》
* 私营中文台：2AC澳洲华人电台、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及3CW墨尔本中文广播电台
* 澳亚民族电视台
* 澳洲最大唐人街：悉尼市中心挂着“四海一家”、“中澳亲善”牌匾

**文化**

* 老华人创办的宗亲团体，多属于联谊性质
* 南半球最大的庙宇：南天寺
* 中国电影节、香港电影节、赈灾募款活动及中国书展等
* 一年一度的达令港国际龙舟赛
* 一年一度盛大的“东方魅力小姐”比赛
* 本迪戈华人于100多年前便开始进行舞龙的表演活动（每年1月15日），当地人称之为“复活节山会”；被称作“龙城”，当地华人历史博物馆被命名为“金龙博物馆”

**纽西兰**

* 1947年独立后，由欧裔白人掌政至今，而白人自称“Kiwi”（意即纽西兰国鸟——奇异鸟），借以宣示“土产”身份。

**移民简史**

* 第一个登陆的华人：1842，王鹤亭，抵达纳尔逊
* 19世纪中叶：黄金年代
* 第一波：1866年，首批12人华工来到纽西兰的丹尼丁奥塔哥金矿工作
* 第二波：二战收留难民，二战后放宽移民入境条件
* 第三波： 1987年颁布新的移民法令；华人可通过投资或一般移民（技术移民）的身份过来，只要住满了3年后，便可申请入籍
* 华人移民受同化的重要时期：1950-1980
* 华人聚集地：奥克兰（60%）、首都威灵顿、南岛基督城、丹尼丁
* 1866年，周祥从广东新会远赴纽西兰来淘金，成了纽西兰乳制品的奠基人，留名《纽西兰百科全书》

**经济**

* 华人奥克兰霍威特克区（Howick）的豪宅砖房给抢购一空--霍威特克区“Chiwick”（意即华人豪宅区）
* 马来西亚移民郑明贤，是奥克兰Tony Tay Group地产公司的执行总裁；今年与怀特克雷合作
* “薯条大王”：中国大陆移民黄玮璋
* “投资风险高，打工发达难”
* 华人商业中心：通往奥克兰市中心的多明丽路（最长的唐人街）

**社会**

* 2000年，纽西兰的国王、总督、总理、议长和最高法院院长5个官职，都由女性来担任
* 如今，男人反过来把妻儿放到纽西兰接受教育，而自己则留守家乡，使得当地华人社会出现阴盛阳衰的情况
* 2008年7月5日“亚洲反罪恶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大部分为华人（罪案受罪者）

**媒体**

* 1991年，马来西亚移民苏文德在奥克兰发行了第一份免费的中文报纸《华页》
* 1993年，香港移民冯朗山则创办了南岛第一份中文报《基督城华文报》

**社团组织**

* 香港女移民林爽创办了“语言交流园地”，召集导师教授英文
* 威灵顿华联会：组织“香蕉人论坛”
* 宋曼瑛、黄徐毓芳、陈梅显（律师）著华人领袖
* 荣登纽西兰十大畅销书排行榜的《也是家乡》，刻画了8名纽西兰华人女性移民的故事，作者叶宋曼瑛博士
* 黄徐毓是纽西兰首位华人内阁部长（2008，妇女事务部长）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巴新国旗上绘有天堂鸟，象征独立、自由、幸福，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 移民简史
* 开始：清末
* 1884年，德国占领了新儿内亚岛东北部之后，陆续从中国海南、广东、福州以及新加坡招募了数百名华工到马当省开发烟草种植业
* 19世纪末，2000多名华工陆续涌入，主要是来自广东省开平以及新会县
* 迁都：马当--马都比岛--可可帕--拉包尔（行政中心）
* 1949年首都与摩尔斯比港
* 中国大陆移民人数居冠，多来自福清、开平及台山
* 华人聚集地：首都莫尔斯比港、莱城、拉包尔
* 经济
* 马来西亚华人移民：常青集团及TST集团
* 空运乃是国内最重要的运输方式
* “只要下雨刮风，停电、停水、越狱，是一定发生的事。”
* 社会
* 土著的原始共产文化“one talk”：亲友、同乡及同族间互利互助的制度。也就是说，亲友失业或没钱开伙，都可以上门来免费吃住；一家人只要有一个人赚钱，亲友都可以上门讨钱，共享资源
* 华人和土著的后代被称为“半桶”
* 教育
* 华侨学校、天主教教会养正学校
* 老一辈土生华人：四邑话及英语
* 下一代：英语及土语
* 社团
* 中国移民：巴新中国友好联合会（2007）
* 土生华人：国泰俱乐部（1950）
* 华人之光陈仲民
* 巴新史上第一位华裔总理（1980，1994）
* 所罗门群岛“快乐群岛”
* 1976年1月2日开始自治，1978年7月7日独立，成了英联邦成员国
* 移民简史
* 19世纪末（英属保护地）：英国Levar Pacific公司由中国广东省招来一批华工，到当时的首府图拉吉服役
* 二战期间，霍尼亚拉成为新首府
* 1976年仅有452名华人
* 移民潮：1995-1998
* 唯一华人社团：中华总会
* 伐木业
* 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绝大多数从事伐木业
* 政府规划出27%砍伐面积
* 马来西亚伐木公司所占的比例最高，共有50多家，另有一家韩国、一家澳洲、一家菲律宾及一家当地公司
* 社会
* 石头餐：一种土著特有的土餐，以香蕉叶包扎肉类，然后堆放一块又一块烧热的石头，大概焗四五个小时，就可享用
* 最受华人欢迎的食材：凤梨、木瓜
* 2000年爆发种族冲突，主岛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及马莱塔（Malaita）隔岸开火，华人惨遭牵连。
* 骚乱肇因：贫富悬殊
* 早期，土著对华人敬重有加，尊称华人为“Master”
* 保留最完整的节日：清明节、重阳节
* 2006年4月18日，所罗门群岛唐人街遭火神吞噬
* 中国政府于4月22日作出撤侨决定，将受困华人接回中国
* 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
* 3大岛屿：塞班岛（首府）、天宁岛、罗塔岛
* 20世纪初，曾经有一名姓钟的广州人，到达了现属密克罗尼西亚的丘克（Chuuk），并与当地一名查莫洛女子结婚，曾居住于帕劳、瑙鲁及塞班，被命名为“中国城”
* 第一个来到塞班岛的香港人是严明睿（开眼镜店）
* 80年代，岛上制衣业蓬勃发展之后
* 在北马里亚纳群岛，只有查莫洛人可以拥有土地；租用土地年限为55年
* 唯一华人社团：美国塞班中华总会，2006年“塞班中文教学中心”
* 宝阳出版公司的《塞班侨报》
* 塞班岛第一家设有网络版的报章：“塞班王”陈守仁的联泰国际集团所发行的《Saipan Tribune》
* 天宁岛“太平洋上的拉斯维加斯”
* 岛上唯一的五星级酒店：香港人所投资的天宁皇朝赌场大酒店
* 中国人超市：黄顺公司、天红商店
* 当地人称华人与查莫洛人的混血后裔为Chino，即Chinese和Chamorro的合称
* 中华总会会所大楼于2000年在“中国城”马苏街落成
* 名副其实的中国城：塞班岛西部加拉班海滨路
* 关岛
* 首名到关岛的华人是Chaco（1648年）
* 混血华裔姓名的组成顺序：先是本身的名字，接着是母亲的中间名字，最后是父系的姓氏
* 美军工程师协会还特别将一年一度的高尔夫球赛命名为The Charlie Corn Golf Tournament
* 第一波移民潮：二战之后
* 第二波移民潮：70年代，台湾人居多（专业人士、到美国留学的台湾人、政治动荡因素）
* 已故关岛前议长安东尼奥平科，1977年通过关岛议会投票，将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定为关岛法定的教师节
* 华人聚集地：塔穆宁、得得多
* 著名的华人西餐厅Shirley Coffee Shop
* 中文月报《华音时报》
* 3大华人社团：中华总会、中国侨胞联合会及华商总会
* 关岛中华总会（1972）
* 引进“中天台”
* 创办“中华学校”使华人子弟有机会接受中文教育
* 向政府征求土地并积极募款建立“中华公园”
* 关岛华商总会（1993年）
* 之前该会名为“关岛华商协会”，自2005年林锦镛先生担任会长后，始改名为“关岛华商总会”
* 关岛海外华人联合总会现任会长赖文章先生，是北马利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天宁岛以及罗塔岛的经济旅游大使
* 2008年，岛上有3名华人医生，分别是陈光明医生（神经科）、邱正吉医生（内儿科）以及陈文彦医生（小儿科）
* 关岛第一位华裔立法议会议员、首位代表关岛的美国国会议员：已故华查混血儿Antonio B. Won Pat
* 岛上第一个卖冰淇淋的商人：Antonio 的父亲Won Pat
* 斐济
* 地球上“最东又最西”的国家
* 辛亥革命期间，大批来自四邑和中山的广东人逃到了斐济投靠亲友
* 当时，斐济三大公司之一的广泰公司，就是华人所开创的
* 1948年，政府成立了椰干管理会以及开办合作社，华商被禁止收购椰干，杂货行的土地也不再获准续租。
* 谭炳南创立的和利肉店
* 主要华人群体：以广东人为主，其中东莞、开平、中山和台山四地的移民占大多数
* 华人聚集地：首都苏瓦市、老托卡市、巴城
* 20世纪20年代，有一中山人方作标在斐济西区巴城开办了“方利行”，当地人以“方利”称呼他，巴城还有一条以他命名的街道“方利亍”。斐济华人在抗日战争中，共捐赠4架飞机给中国，其中一架由方作标独自捐，因此而得到蒋介石的褒奖，并获赠以中正剑。蒋还在他的墓碑上题写了「贞固流芳」4个字
* 2001年春节，斐济第一家中文报《斐济日报》
* 2005年，另一份中文报纸《斐济华声报》
* 南太平洋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刊物：《飞枝国民月刊》（1930），曾停刊两年后更名为《斐济华人月刊》
* 1936年，华侨学校建立，1976年它改名为“逸仙学校”
* 斐济第一个华人： 1855年，梅屏耀驾着小船，在当时的斐济首都列武卡（Levuka）落脚，开设第一家华人公司，取名“康利”
* 政坛华人精英：方文清（苏瓦镇议员）、余汉宏于（第一位华人国会议员）、司徒波（苏瓦市副市长）
* 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地）
* “世界最浪漫的地方”、“最佳蜜月胜地”
* 在19世纪中叶，澳洲发现“新金山”，华人前来后归程来到南太平洋
* 1861年，威廉史图华（爱尔兰人）得到了大溪地女皇的批准，在大溪地购买土地、招来华工以开辟棉田
* 人烟稀少的波拉波拉小岛（Bora Bora Island）上，唯一的杂货店也是华人开的
* 华人：客家人、广府人、香港、台湾移民
* 华人聚集地：大溪地岛首府帕皮
* ROULOTTE是以小货车改装成的流动小食档，据说由华人开创
* 大溪地盛产黑珍珠
* “大溪地珍珠之王”：温惠仁
* 自1968年开始举办的年度“飞龙小姐”（Miss Dragon）选美会，除了规定参赛者必须是华人或华裔外，他们也要有中文名字
* 大溪地关帝庙为南太平洋最大的关帝庙
* 沈秀纯：1869年5月19日，当地首个被砍头处死的人
* 大洋洲其他国家与地区
* 萨摩亚独立国
* 在1903年大批契约华工到来萨摩亚独立国之前，那里已有12名华人，其中6个经商：阿穆、阿苏、方违昌、阿清、阿松
* 20世纪伊始，大多数华工被派往乌波卢（Upolu）的种植园劳动，一部分被分配到萨瓦伊岛（Savaii）
* 商店集中地：首都阿皮亚（Apia）的法爱阿街
* 陈茂公司、Ah Liki家族集团
* 瓦努阿图
* 以农渔业为主
* 唐人街：Rue Carnot
* 汤加
* 银行业：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雷贤雄与雷贤生兄弟与当地政要合作投资，创设马婆金融银行分行
* 马绍尔群岛
* 华人聚集地：首都马朱罗
* 最受华人普遍膜拜的神灵：航海神妈祖（天后圣母）、关公（三国时代的关云长）以及观音菩萨

**非洲华人**

* 时间：18世纪
* 地点：非洲东部和南部的国家，如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汪等
* 方式：契约华工，有的是自由移民
* 如今，华人遍布在非洲国家的各个角落，人数多者如南非，有30多万华人

**南非**

* 非洲大陆最南端
* 东临印度洋，西濒大西洋
* “西方海上生命线” “彩虹国度” “经济发展火车头”

**华人移民简史**

* 2002年，在开普敦展出的一幅由中国人于1389年绘制的非洲大陆最古老的地图——《大明混一图》，清晰地标出了好望角的位置，这可能是华人最早到达非洲的证据
* 15世纪，威尼斯地图制作师弗拉·毛罗在好望角发现了一艘中国船
* 1660年，一名叫万寿的华人囚犯被荷兰殖民政府从巴达维亚流放到开普敦
* 19世纪70、80年代（1886年）约翰内斯堡发现金矿—淘金梦—误认为是美国旧金山南南非老华人先驱：1907年2月，最后一批契约期满的华工撤离南非，只有305人愿意留下
* 1953年到1963年间，只有28名华人前来南非（种族主义隔离政策）
* 1995至1999年是中国进口贸易和零售生意做得最火红的黄金时代
* 三类：

老一辈：上个世纪，广东顺德、梅县的老移民及其后裔；分布于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以及比勒陀利亚等大城市，主要经营中餐馆和杂货店

中年一代：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投资或技术移民的身份到南非设厂及经商的港台人

* 中国大陆新移民是目前南非最庞大的移民群（30万人，1998年中南建交）之后
* 全非洲第一条受到官方正式承认的唐人街：西罗町的街道（2005）
* “老唐人街”：约翰内斯堡老城的市中心（瑞兴行、顺德家私、燕子酒家）
* 2004年，南非华社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了华人警民合作中心
* 2006年2月，南非首家华人保安公司注册成立
* 因早期的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广东沿海一带，南非华文教育最早是以广东话为媒介语的
* 全日制华侨学校——斐京华侨公学

成立：1934年（国立学校）

地点：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的交接处

* 华文三报二刊：《侨声日报》（蒋介石题字））、《华侨新闻报》（冯荣生，1994年南非第一份民营华文报）、《非洲时报》（2005）、《虹周刊》（2006）、《声音》（2007，李铿发、刘利国）
* 2008年6月18日胜诉，获得了与黑人等同的地位与权益。这意味着凡在南非出生，以及1994年6月1日以前入籍的大约2万名华人，可享有“黑人经济振兴法案”。
* 南非首批华人国会议员：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黄士豪、印卡塔自由党（IFP）的张希嘉、南非独立民主党（ID）的王翊儒以及南非最大反对党民主联盟（DA）的陈阡蕙（皆来自台湾）
* 约翰内斯堡首位华人市议员：孙耀亨（2006）
* 华人社团皆以“寺庙”或“祠堂”的形式成立同乡会、互救会、宗亲会
* 历史最悠久：杜省华侨联卫会（“爱国侨社”，目前福建华人最多）
* 老人院：康宁院
* 基督教是目前众多老华人信奉的宗教
* 1996年南华寺--弘扬佛教
* 开普敦市 “朝天宫”妈祖庙，供奉“海上女神”妈祖像
* 自2007年起，华社还每年一次的举办“妈祖千里出巡南非绕境活动”（巡视开普敦、布鲁方丹、德班、纽卡索、及约翰内斯堡）

**马达加斯加**

* 非洲第一大岛，全球第四大岛，印度洋航运要冲突
* 华人到来方式：自由移民、契约华工
* 最早记录：1862年英国传教士雅礼士在塔马塔夫（邹省）见到一间华人所经营的杂货
* 19和20世纪：落脚点塔马塔夫；（北）迭戈苏瓦雷斯，（南）富多凡
* 1896法国殖民政府从越南北部东京的芒街招募3000名华工，分为4批运抵塔马塔夫
* 20世纪初：在中国招3000名契约华工（广东南海和顺德；福州）
* 1959年，岛上已有8032名华人；1975年，岛上仅剩下4039名华人；1987年，岛上的华人已增加到1万2000名
* 新移民（福建人居多）聚集在一条名为Behoririka的街道做生意（唐人街）
* 华人集中地：首都塔那那利佛（此后称塔那）和塔马塔夫（唯一国际港口）
* 华人的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道教及传统信仰
* 马达加斯加的中文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多达13所，以顺德话教学
* 3所影响较大的中文学校：（中国国民党）兴文学校、华体学校、华人天主教中心（又称古友道学校）。前两所学校后来合并成为塔马塔夫华侨小学。
* 如今，马达加斯加的中文学校只剩下在塔马塔夫的邹省华侨学校

**毛里求斯**

* 非洲著名蔗糖出口国
* 1840-1843：从新加坡和槟城，招来3000名华工（甘蔗园；工作，路易港“波累”）
* 1847-1860：这里的华商人数高达1164人
* 1860年：广东梅县客家人以商人身份来到，人数和势力都超过了福建人及南顺人
* 1901年，58名客家妇女成了第一批华人女移民
* 1920年，着手建立祠堂，南顺人一般称之为霍宅或陈宅等，至于姓刘、关、张的华人则有古城会馆
* 25卢比纸币印有朱梅麟头像（第二代华裔；毛里求斯华商总会的主席；二战号召华人成立中国人国土保卫队）
* 华人聚集地：路易港、鸠必小镇
* 新一代华人从小学习克里奥尔语——一种他们称之为“没有语法的法语”
* 非洲华人第一座庙宇：路易港的关帝庙（1842年，福建籍华人领袖陆才新）
* 在天主教规定的11月1日上坟扫墓
* 位于拉沙麟的华人公墓——南顺会馆坟场
* 仁和会馆、南顺会馆
* 岛上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优给特·李卓凡·皮耐欧女士，分别用法文和英文，出版了有关印度洋华人移民历史的书籍
* 4份中文报：《华侨时报》、《中华日报》（繁体字及纵向排版）和《华声报》日报，《镜报》周报

**留尼汪**

* 印度洋上最富裕的岛屿，法国海外领地
* 1844年：第一批华工从海峡殖民地而来
* 首名在留尼汪开店的华人：陈章满
* 首名客家商人：李定伯
* 华人聚集地：（北）首府圣但尼、圣安德烈和圣宾华；（南）圣皮埃尔和坦邦镇
* 南顺人：北部、东部 客家人：南部、西部
* 位于留尼汪北部的利涉堂和世昌堂，创立至今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且由祠堂发展成今日的关帝庙
* 自2004年开始，世昌堂邀请利涉堂共同庆祝关帝诞，打破了多年来各自为政的旧习
* 留尼汪的失业率高居法国之首

**安哥拉**

* 非洲西南沿海的热带国家
* 2002年，内战终于宣告结束
* 三波移民潮：

中国改革开放：10多名（贸易、中餐馆）

21世纪初内战结束（贸易、石油、建筑）

近年：2008年“安哥拉之年“（地产、制造业）

* 华人聚集地：首都罗安达（暂时没人入籍）
* 华人多来自陕西、安徽、四川等地

看家行业：承包商、建筑商、贸易商

新兴行业：物流业

未来行业：制造业和地产业

* 葡萄牙语是官方语言
* 花生月饼”——花生炒熟之后碾碎裹上面粉烤熟
* 安哥拉首份中文刊物——《中文安哥拉》于2008年7月1日创刊发行
* 当地目前唯一的社团组织：中国商会
* 商品批发集中地圣保罗市场

**尼日利亚**

* “黑非洲文化摇篮”“天府之国”
* 1931年：曾经有4名华人抵达尼日利亚
* 华人正式登陆：20世纪的50年代后期
* 早期华人企业家：朱南扬、查济民、沈文伯
* 朱南扬“伊克贾工业区酋长”
* 沈文伯：尼日利亚的首名华人公民
* 后来，由于尼日利亚开始陷入内战的纷扰，很多在尼日利亚投资的华人都暂时迁入西非的加纳或贝宁等地
* 如今华人超过7万，其中5万集中于有“西非纽约”之称的拉各斯，其他华人则分布在首都阿布贾、卡杜拉以及贡贝等城市
* 四大家族：董氏集团、查民集团“西非纺织王国”、李氏集团（拖鞋市场）、华享（陈氏）集团（搪瓷业）
* 中国集团两大项目：莱基自由贸易区、尼日利亚奥贡广东自由贸易区
* 当地目前规模最大的现代饮食企业集团：Cway
*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的伊柯贾区（Avenue Ikeja），有一条以香港在此地注册的企业——WEMPCO(董氏集团）来命名的道路。
* 华人聚集地：龙城（类似唐人街，位于拉各斯）、金贸商厦和尼日利亚大厦
* 无华文学校，但华人社团组织却不少：尼日利亚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尼华人商贸企业协会、尼中友好协会、中国工商联合会等
* 著名华人尼日利亚的酋长：胡介国、房一波和朱南扬
* 《西非统一商报》（2005），与大陆的《新民晚报》、《今晚报》以及新华通讯社合作

**肯尼亚**

* “野生动物王国”，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1963年12月12日独立
* 首都内罗毕被誉为“阳光下的花城”、“东非小巴黎”
* 郑和下西洋足迹：蒙巴萨、马林迪、拉穆岛（带长颈鹿“麒麟”回去）
* 华人聚集地：内罗毕、蒙巴萨
* 世界新七大奇观之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年一度的百万角马大迁徙
* 因气候温和，联合国人居署和环境署都选择在这里设立总部
* 华人团体：肯尼亚华人华侨联合会和肯中经贸协会
* 肯尼亚华人华侨联合会成立于2005年1月8日，是肯尼亚华人成立的第一个组织
* 华联会也联同中国大使馆、经商处、新华社等出版《华声报》双月报刊；网络报——《非洲之声》
* 2006年初，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在肯尼亚开设了海外第一家调频广播电台（CRI97.9FM）

**埃塞俄比亚**

* “非洲屋脊” “享有13个月阳光的国家”
* 咖啡原产国
* 非洲之光：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和亚的斯亚贝巴机场
* 第一批：40年前，主要是河北人
* 第一波华人移民潮：2003年（河北人、江苏人、浙江人）
* 华人聚集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 主要行业：建筑业
* 2008年成立埃塞中国商会

**苏丹共和国**

* “世界火炉”
* 苏丹政府和南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反政府武装组织于2005年1月9日在肯尼亚内罗毕签署《全面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内战
* 19世纪，英法联军统帅查尔斯·乔治·戈登在1860年率军火烧圆明园，后又出任苏丹总督
* 查尔斯总督于1885年被苏丹的民族英雄马赫迪所击毙
* 2004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李肇星访问苏丹期间，就向苏丹总统巴希尔表示：“中国人民欠苏丹人民一个人情。”
* 华人贡献：石油工业、建筑业
* 1999年，中国在穆格莱德盆地开发苏丹第一座油田
* 喀土穆以北约70公里的炼油厂被誉为“中苏的结晶”。2000年，中国副总理吴邦国参观炼油厂时，写下“中苏友谊丰碑”
* 1995年，武汉民营企业家李利红仅用了3年便创出资产过亿的星达公司，承包了整条尼罗河的航运
* 唐甜甜再喀土穆开办“绿湾中文培训中心”，校名灵感取自储光羲《钓鱼湾》中意境优雅非凡的“垂钓绿湾春”
* 除了友谊医院，喀土穆市中心还有华夏医院、天府诊疗所，当地医院多由河南人开办
* 第一家中文媒体——《华人商报》于2008年9月9日应运而生
* 2005年12月，苏丹籍画家阿菲菲出版了华人在苏丹的第一本画册——《我眼中的苏丹》

**埃及**

* *Maadi为开罗华人最密集的地区*
* *石材业：广东华人、、福建水头镇*
* 香港人黎馨馨创办的《中埃友谊——旅埃华人通讯》
* *旅埃华人联谊会在2009年4月创办了一本双月刊杂志《埃及华人》*

***非洲华人简史***

* 非洲是第二大洲，拥有56个国家和地区
* 在18世纪，法属毛里求斯、留尼汪、马达加斯加及荷属南非已经有契约华工的足迹。
* 1910年，非洲的契约华工已有约15万人
* 源流：
* 英属海峡殖民地及荷属爪哇
* 中国：广州、香港、澳门、汕头、厦门
* 山东的胶州湾、上海、天津、大沽及秦皇岛
* 东非：
* 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移居洛伦索马贵斯
* 早期移民为澳门华籍囚犯
* 19世纪末广东省工匠定居
* 1900年，洛伦索马贵斯和贝拉各有84名华人
* 1903年，谢三（木匠兼工程师）捐地修建中国亭
* 塞舌尔群岛首批移民：1886年23位来自毛里求斯的中国人定居首都维多利亚
* 1911-1945华人人口增长受到的影响：中国与世界形势的变迁，及非洲国家施行的华人政策
* 这时期女性移民增加，华人自然出生率提高，通婚现象减少
* 最受普遍膜拜的神灵：要数关圣帝君、天后圣母与观音菩萨
* 新移民：香港移民--台湾移民（80年代）---中国（90年代）
* 香港移民多为“投资移民”；台湾移民为“投资移民”与“技术移民”
* 中国移民以福建人居多，其次是浙江青田人
* 青田移民人数居欧洲华人之冠
* 经济活动：商业、工业、农业
* 南部纳米比亚中国城：首都温得和、奥西坎果
* 温得和中国城
* 创建人：李澄原
* 时间：1998年
* 前身：大仓库
* 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东方城
* 塞内加尔原是西非落后的国家
* 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百年大道”--“中国市场”
* 在东非的坦桑尼亚，估计有30名中医师替人治病
* 中国大陆企业家：
* 尼日利亚的朱南扬、加纳的周森林、南非的甘致竹、喀麦隆的陈伯松
* 莫桑比克华人投资发展的农场，就有30多家，大量种植香蕉等农作物
* 科特迪瓦的李承谷，与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技术合作，并聘用菲律宾的专业人才，经营大规模稻作农场，成为海外华人开拓农业的营运新模式
* 赞比亚华人农场佼佼者--中肯农场（王驰与李莉夫妇）
* 建筑业：赞比亚徐建学的扬子江建筑公司
*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
* 摩洛哥第一位中国女医生：丁惠敏（嫁过去）
* 2007-2008组织“龙行天下耀中华“的驾车远征队，从开普敦到背景，作为北京奥运会宣传
* 福建人组织：南非的中华福建同乡总会、博茨瓦纳的福建同乡会及纳米比亚的中华福建同乡会

 美洲华人史

* 美洲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8.2%
* 北美华人约有500万
* 华工存够了资本，就做起小生意，如开设中餐馆、外卖店、洗衣店、超市等

美国

* 美国是最受欢迎的移民国家
* 每一年超过100万人成为美国公民
* 1848年，美国西岸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东北发现金矿
* 1850年，共有1万5000名华工在美国淘金
* 1850年，旧金山约有700名华商
* 1853年，当地报纸将华埠命名为“中国城
* 华人本身将旧金山华埠称作“大埠”
* 加州（California）在1855年起便向华人征收每人50元的人头税
* 旧金山立法禁止华人到市立医院就医，担任市政工作，定下反华示威日
* 1862年，美国政府决定修筑横跨美国大陆，连接东西部的铁路干线——中央太平洋铁路。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工人中，华人占了95%
* 筑路华工每个月的薪金为28美元
* 1869年5月10日，太平洋铁路正式通车
* 1959年，夏威夷华人首富邝友良成为美国第一位华人联邦参议员，也是美国第一位参政的华人
* 最初30多年的自由移民时期，有30万左右的华人先后来到美国
* 1876年，美国迎来建国100周年，旧金山却爆发经济危机
* 1882年，排华法令（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正式于美国国会通过，象征了美国自由移民时代的终结。
* 排华法令明文规定，在接着下来的十年之内，不许华人移民到美国，而那些已经居住在美国的华人以及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一概不得入籍。华人当中，仅有外交官、旅游者、商人、教师和学生可以入境美国
* 1920年，美国的华人仅剩下6万人。
* 1943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宣布废除《排华法令》
* 通过《战时新娘法令》，华裔军人的妻子或者家属获准到美国来定居。
* 70年代中叶，美国政府收容了大批来自印度支那的华人难民
* 1965年之前抵达美国的华人移民都算是老移民。
* 新移民法令在1965年通过，1968年开始实行、
* 在中美建交之前，美国允许每年有2万名华人移居美国
* 198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2 万个名额给台湾移民，在1987年，香港也获得5000个名额。
* 中美于1979年恢复建交之后，大陆移民遂如海水般一波波涌入
* 在美华人总人数已突破350万
*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所引发的大火，将历史悠久的中国城烧成灰烬，美国政府储存居民身份资料的办公室也被烧毁。之后，美国政府让居民重新登记身份，有一些人便趁机用假身份取得美国国籍，这些人后来被称为“Paper Son”（冒名的家伙），其中包括不少华人。
* 2000年纽约华人人数约37万人，纽约华人占全美华人总数16%左右
* 洛杉矶（Los Angeles）和旧金山湾区（San Francisco Bay Aera，简称湾区）是高科技和创意行业的重镇
* 加州华人社区面积庞大，覆盖几十个城市，人数占了全美华人总数的40%
* 拥有超过15万华人的城市有休斯顿（Houston）、达拉斯（Dallas）、芝加哥（Chicago）
* 华人中，三分之一是拥有高学历、从事高薪工作的白领和上班族，三分之一是教育水平和收入偏低的中低下层，三分之一是介于蓝领和白领之间，以自雇人士和小老板居多，一般从事华人传统行业如餐饮业、零售业等
* 土生华人自幼受美国正统教育一部分能讲中文，但多数无法以中文书写，还有一些完全不懂中文，被称作外黄内白的“香蕉人”
* 成年新移民多数还与原居国保持密切联系，也无法放下对原居国的感情
* 受过原居国和美国教育的移民，一般则游走于两种文化间，因能熟练掌握中英文，在竞争中有明显优势
* 美国大大小小华埠约80多个，十大城市－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Boston）、费城（Philadelphia）、华盛顿、夏威夷（Hawail）、西雅图（Seattle）、萨克拉门托都拥有较大规模的华埠
* 曼哈顿唐人街和旧金山唐人街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且历久不衰
* 曼哈顿唐人街大厦林立，旧金山唐人街主要都是不超过6层的楼房
* 东百老汇（East Broadway）街成为福建新移民的地盘
* 曼哈顿唐人街已渐渐从一个广东方言为主的社区，变成一个普通话和福建方言通行的天地
* 1975年在曼哈顿唐人街落成的孔子大厦是其中一个公共住宅计划。孔子大厦高44层楼，共760个公寓单位，成为4000多名中低收入者的家园，其90%为华人住户
* “单房旅馆”是许多老人的安身之地。它就像一般旅馆，由单人房组成，浴室、厕所、厨房和客厅则是共用空间。
* 单房旅馆月租大概是206美元
* 曼哈顿唐人街店铺楼上和地下室住着很多大陆新移民。一位新移民抱怨：“市中心房地产价格一直在涨，一房单位月租金都要500美元以上，我们只能和人分租，有不少一房单位内住了七八个人呢。”
* 唐人街于2006年3月加入帝国区
* 60至70年代，台湾留学生人数遥遥领先；但现在，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已成为最大的华人留学生群体。
* 美国人有“华人是数理天才”的形象。
* “玻璃天花板”指的是非白人在白人企业机构内，晋升到某个职位后便难以突破，如同被“玻璃天花板”狠狠压住。
* 1995年，杨致远创办雅虎
* 矽谷每年评选出的“10大风云人物”，少不了华人的身影。
* 高学历、经济稳定的华人精英，一般都喜欢选择到郊区（Suburbs）或大城市（Metropolitan）居住
* 旧金山华人文化协会曾在十多年前为华人青少年举办过“寻根之旅（In Search of Roots)”，让青少年回到祖辈的家乡，寻找家族的故事和根源。
*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女作家汤亭亭、画家陈逸飞、钢琴家孔祥东、网球名将张德培、著名电视烹饪节目主持和中餐书籍作者甄文达等，都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优秀华人。
* 1974年联邦高等法院裁定旧金山伽利略高中华人学生指控校方违宪
* 2003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把中文列为大学选修课程（AP）
* 超过7500人参加过中文选修课程考试，大多成绩良好。
* 在华人人口密集的旧金山，有高达60%的华人每天阅读中文报。
* 由奥巴马领导的新内阁，也是美国历史上拥有最多华人成员的一届政府，他们分别是商务部长骆家辉、能源部长朱棣文、白宫内阁秘书卢沛宁、白宫公共联络主任陈远美以及国家安全部法律总顾问提名人方富宇。
* 在加省出生的美国华人关颖珊，在1996年及1998年均获得全美及世界溜冰赛冠军，但1997年泰拉立宾斯夺冠后，美国传媒MSNBC刊登的标题竟然是“美国人击败关颖珊！”
* 2001年1月11日，在乔治布什总统提名下，赵小兰出任劳工部长。她是美国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人，也是内阁中的第一位亚裔妇女。
* 200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华人又有了小突破。北加州有38名华裔候选人参选，余胤良当选为加州第一位华人参议员，马世云成为加州第一位女性华人众议员，而杨爱伦则成为纽约州议会的首位女性亚裔众议员。
* 1996年，骆家辉在华盛顿州州长选举中击败共和党竞争对手，成为美国第一位华人州长。
* 1983年，美国华人终于等到了两位华人市长。陈李婉若从一名医院社工，成为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市长；黄锦波则从1978起担任美国喜瑞都市市议员
* “天使岛”（Angel Island），是移民局用来羁押亚裔移民的拘留所。从1910年到1940年间，共有17万5千名华人移民被羁押在此。
* 1974年，在华人组织的争取之下，加州议会通过议案，成立“天使岛移民营历史公民委员会”。两年后，加州议会拨款25万美元进行遗址修缮。1998年，美国政府宣布天使岛为“国家级历史古迹”，并进一步进行保护和修复。
* 布碌仑日落公园（Brooklyn Sunset Park）8大道是继曼哈顿唐人街和法拉盛（Flushing）唐人街后崛起的纽约第三大唐人街
* 这个华埠占地不大，却住着超过10万华人，仅福州人就占了七成左右。主要是福建新移民

加拿大

* 加国三大城市——蒙特利尔（Montreal）、多伦多（Toronto）和温哥华（Vancouver）
* 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Steven Harper）在国会里用粤语郑重地说：“加拿大道歉”，超过200名华人出席者情绪激动
* 中国与加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两国的贸易往来从1780年便已开始，比中美贸易还早了4年
* 1858年，有人发现卑诗的弗勒泽尔河（Fraser River）中游一带有金矿，此事被称为“弗勒泽尔淘金狂潮”
* 1859年到1860年之间，约有2000名华人由美国的旧金山（San Francisco）和波特兰（Portland）登陆加国
* 1860年之后，有更大批的华人从香港和澳门乘船登岸，他们大多数来自珠江三角洲
* 1880年，在加国建设横贯东西的铁路工程之中，有1500名曾经在美国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服务的华工被雇佣
* 铁路于1885年竣工后，一些年轻力壮的华工涌往卡瑞布（Cariboo）金矿以采金为业
* 加拿大政府通过《1885年华人移民法令》，向华人征收人头税，每名华人的税收是50加元。
* 1900年，数额增加到每人100加元，而1903年则是每人500加元。华人所缴纳的人头税，总共为加拿大当时的国库增加了2300万加元的收入
* 1923年，加国颁布新的华人移民法令，禁止华人入境。
* 加拿大首个华埠出现在维多利亚（Victoria）
* 二战时共有500多名华人参战
* 1947年加拿大正式废除排华法
* 1967年，加拿大政府在重新检讨移民政策之后，实行了“点计制度”
* 当“97回归”的期限越来越近时，许多香港人患上了“97恐惧症”而选择移民
* 从2002年到2004年的颠峰期，每年都有3到4万名中国移民登陆加国，占加国接收移民总数的20%。
* 1924年，为了反对拒绝华人入境的移民法的执行，华人商铺在加拿大国庆日——7月1日当天罢市，并称之为“羞辱日”。
* 华人主要聚居在各大城市，其中70%的华人居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大多伦多地区（Greater Toronto）约有54万华人，居全国之冠，大温哥华地区（Greater Vancouver）也居住着约40万华人，华人总数还不到全国总人口的4%。
* 华语排在英语和法语两大官方语言之后，成为加国第三大语言
* 80年代以前，华人主要经营餐馆、杂货店、洗衣店等小生意。80年代以后，华人逐步涉足房地产、石油、金融保险、旅游、国际贸易、通讯、能源及制造业等领域。
* 温哥华的素里（Surrey）是了“小台北”
* 目前加国华人房东比例高达75%。
* 据估计，大约15%的大陆新移民长期处于失业状态，40%左右从事与原专业无关的工作
* 很多人过不了加国在职场上设置的重重门槛。第一关是学历和专业资格。第二关是语言能力。第三关最叫人头疼，就是加国经验。
* 第一个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名叫温金有，他在1861年出生于卑诗省的格拉斯堡，并且在新西敏市长大
* 2003年时，全加华文报刊已达50多家。
* 多元文化电视台（OMNI）设有少数民族移民频道（OMNI2），专门制作和播放中文节目。
* 1993年，全加很有影响力的中文媒体——“新时代传媒集团”成立了“新时代电视”，总部设在温哥华
* 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CBC）开通了中文网页
* 华社每日的生活有中文电台陪伴，如多伦多中文电台、多伦多第一台
* 多伦多许多非华裔也开始学习中文，他们透过“汉语角”活动，和华人互相交流，学习充满乐趣。
* 全加第一位华人督察源植勉
* 中侨互助会成立于1973年，由一批热心的香港移民成立，主要是帮助新移民适应新环境，尽快融入加国社会。
* 1998年，中侨互助会创立了青年领袖培训计划

墨西哥

* 墨西哥位于北美洲南部，北邻美国，南接危地马拉与伯利兹，东临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西南濒太平洋
* 墨西哥的天然资源丰富，主要有石油、天然气、金、银、铜等矿产，尤其是白银产量居世界之首，被称为“白银王国”。
* 墨西哥是文明古国，玛雅（Mayan）、阿兹特克（Aztecs）和托尔特克（Toltec）文化曾在这绽放出万丈光芒。它曾被西班牙统治长达300年，1821年宣告独立
* 1917年墨西哥颁布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将国名定为“墨西哥合众国”。
* 革命制度党从1929年起连续执政，71年后终于轮到国家行动党上台，执政至今。
* 1565年，随着西班牙征服马尼拉（今菲律宾首都）后，开展了与墨西哥的帆船贸易。
* 华人在墨西哥的繁忙港口阿卡普尔科（Acapulco）上岸
* 华人当中，除了一部分人在港口造船，还有一些人在墨西哥城经营理发、打铁、裁缝、铸银等生意，其中又以当理发师的居多
* 墨西哥人都亲切地呼唤华人作“拜山那”（Paisano，西班牙语意为“同胞”）
* 1864年，墨西哥迎来了第一批契约华工，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修筑连接美国与墨西哥的铁路。这批华工绝大部分是来自广东中山和四邑（台山、开平、新会及恩平）
* 枉死城和中国人山是华人在墨西哥奉献生命的见证
* 1910至1917年，墨西哥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 1911年，托雷翁市303名华人被杀害，正在店里做生意的华人，突然被士兵一个个拖出店外，捆在一起，让马匹拉着游街示众，直到他们皮开肉绽而死
* 1931年，墨西哥的华人人口从高峰期的4万6000人滑落至2万5000人。
* 1944年8月，中国和墨西哥签署友好条约
* 在墨西哥城的市中心有一座高约15公尺的中国钟，是墨西哥华人在1910年为了纪念墨西哥独立战争100周年而集资修建的。
* 在20世纪50年代末，墨西哥政府曾一度放宽华人移民家属到此地来团聚的条件，并且允许约3000名持“难民证”的华人从香港入境。
* 90年代初，经过墨西哥西北地区华社与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向墨西哥当局多次交涉，才解决了近万名华人合法居留问题。当地华人把这次的行动称作“大赦”。
* 目前墨西哥约有6万名华人，他们主要说普通话和广东话。另有约40余万的混血华裔
* 墨西哥华人非为4类
  1. 来这里不超过20年的打工族组成，占总人数的八成。
  2. 开小型中式快餐店的夫妻档或合伙人，占一成
  3. 有能力开连锁中餐馆，或从事私营行业如房地产等的，只有7%。
  4. 只占3%，他们多是拥有大量产业的家族企业成员。
* 墨西哥的华人目前大部分居住在西北部、北部以及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城镇。其中以毗邻美国的两个城市墨西加利和蒂华纳（Tijuana）的人数最多。
* 墨西哥城地处海拔2260公尺的高原，没有冬寒夏暑，终年云淡风轻，气候凉爽。
* 这里的华人约有一万名，以广东四邑移民为主，其中大部分是台山人，一般经营餐馆
* 北方中国人、香港人和台湾人则多数从事批发贸易，也有少数在大学任教。
* 西北部城市蒂华纳的华人人口约7000人。下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墨西加利，干燥炎热，地面气温最高可达摄氏50度，最低35度，居住着6000名华人。这两个城市的华人，90%都开餐馆，以来自台山和恩平居多。
* 全墨西哥包括自助餐馆、快餐店和火锅店在内的中餐馆超过2000家
* 墨西哥人，不管是平日还是周末，只要有机会，就会到华人自助餐馆，享用要价75到80比索的丰盛早餐。
* 墨西哥人口味偏甜、偏咸又偏辣，餐桌上绝对少不了辣椒酱、柠檬和酱油这三宝。
* 墨西哥华人餐馆在收银台前多摆着“金蟾蜍”、“招财猫”及一些具中国特色的小饰品
* 墨西哥唯一的华人律师阚凤芹（Kan Feng Qin）
* 墨西哥入籍必须经过口试、唱国歌、然后是100道西班牙外语问答题笔试。这些题目包罗万有，涵盖了墨西哥的历史、文化、名胜古迹、地理、政治、经济、贸易等。
* 墨西哥人喜爱的“捧钱青蛙”，据当地华人说是从中国民间流传的“含钱蟾蜍”演变而来，摆在家中或店里，能招来财富和好运。
* 美墨边境是全球最繁忙的边境之一
* 墨西哥中文学校中，以墨西加利中华学校的历史最悠久。这所学校是在1920年由来自三藩市基督教会甘巴仑长老院的施家祺和麦平锦两名牧师所创立。该校只提供小学一到六年级的中文课程，采用中国小学的教材。另外还有数学补习班和英文班。校长是梁成安。
* 蒂华纳华侨协会管理的蒂华纳华侨协会中文学校成立于1940年，2008年2月由前蒂华纳华侨协会中文学校的老师李卓洪复办。
* 在墨西哥城营运了十余年的墨西哥福尔摩沙中华文化学院（Instituto de Idiomay Cultura China,s.c. ），则是由来自台湾的华裔姐妹李美虹和李丽虹共同打理。
* 墨西哥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简称墨华联）是当地最活跃的社团。
* 墨西哥西北部的墨西加利是小广州
* 墨西哥城佐卡洛（Zocalo）区多洛雷斯街（Dolores）是墨西哥的唐人街
* 在这条不长的中国街附近，矗立着一座醒目的中华牌楼。牌楼竣工于2008年2月

危地马拉

* 危地马拉位于中美洲西北部，西部、北部与墨西哥等国为邻，东北与伯利兹接壤，东南与洪都拉斯及萨尔瓦多交界，南濒太平洋，东临加勒比海。
* 危地马拉是古代印第安人玛雅文化中心之一
* 危地马拉于1524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直到1821年独立，1839年建立共和国。
* 危地马拉经历数次军事政变，直至1996年底，才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内乱。
* 危地马拉在印第安语里有“森林茂密之地”的意思，林地占该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境内有中美洲最高、最活跃的火山。
* 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咖啡、棉花、甘蔗和香蕉等，小豆蔻出口量居世界首位，也是中美洲第二大咖啡生产国。
* 1860年，有一对陈姓兄弟，合力抬着一架手摇缝纫机，从墨西哥徒步走到危地马拉，从此落地生根。
* 1895年，登记的华人共有579人。
*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前来危地马拉的华人与日俱增
* 第二波华人移民潮始于30年代初，当时有不少广东中山人先到香港
* 危地马拉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华人入境的法令，包括1933年的取缔黄种人居留条例、1936年的取缔亚洲人营业条例，以及1944年的禁止新华人入境居留条例。
* 90年代的危地马拉有华人约1万4000人，其中80%以上已经加入当地国籍，大多居住在危地马拉城以及一些海港城市。
* 危地马拉华人大多经营中餐馆、杂货店和超级市场
* 华人餐馆以粤菜著称，深受当地居民喜爱。首都危地马拉城的市中心，中餐馆比比皆是，不少餐馆的室内装饰犹如香港50年代的茶餐厅。
* 危地马拉最负盛名的华商是陈幸雄。他于1978年从台湾移居危国，创建吉利公司，主要经营蔬菜水果销售。经过几十年的打拼，他已拥有150多家处理蔬果工作站，年营业额达1500万美元。生产的荷兰豆质量佳，大量供外销，故被冠以“荷兰豆大王”。
* 20世纪初，墨西哥发生排华事件，让危地马拉侨领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遂于1912年发起成立“旅中美洲危地马拉华侨总会”，简称华侨总会，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
* 1919年，两位热心的华商侨领慷慨解囊，加上当时华社的捐助，才成功买下了使用至今的会馆。
* 华侨总会会馆坐落在首都市中心1区的黄金地段，与国立圣卡洛斯大学戏剧院等国家重点保护建筑为邻。
* 危地马拉是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其中以信仰天主教最为普遍
* 危地马拉华人天主教徒家里同时膜拜观音和圣母玛利亚
* 危地马拉华人对与异族通婚仍然持保守看法。第二代华人受父母影响，也很少与当地人联婚，达适婚年龄的男子通常会到中国娶新娘。第三及第四代华人，除少数与当地人通婚外，大部分仍然坚守着祖先的遗愿，只与华人结婚。
* 种福堂基金会（简称种福堂）则于20世纪初成立，旨在向华社筹集资金购买地段，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当地华人的坟场。
* 华侨坟场由一间“先友祠”以及后方的灵堂墓园组成。
* 现代华人与当地人一样，习惯在每年11月1日扫墓。
* 华文学校坐落在华侨总会的会馆左侧，共4层楼高
* 危地马拉人民每年最期待的节庆非复活节莫属。尤其在安蒂瓜市所举办的大规模活动，吸引了许多人（包括华人）来参与

伯利兹

* 伯利兹有潜水爱好者流连忘返的海洋火山孔“蓝洞”（Blue Hole）
* 这里的总人口只有31万，种族多元，包括最早住在这里的马雅人、16世纪就到来的西班牙人、黑人与他族混血生下的克里奥尔人、仍活在19世纪中的德国村孟诺教徒、来这边工作的美国人以及开杂货店或餐馆的华人等。
* 1981年独立以来，伯利兹仍依靠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支援。经济发展不稳定，失业率居中美洲之冠，有三成以上的国民为生计担忧
* 1865年，一艘载着480名广东籍契约华工的货船，从中国大陆远航至伯利兹（当时为英属洪都拉斯）。这一批华工甫一抵岸便被安置在森林中，从此过着清苦的伐木生涯。
* 20世纪初，墨西哥爆发了排华暴行，迫使不少华人仓皇离境，从墨西哥逃难到伯利兹，这才壮大了华人的行列。
* 二战后至80年代初，这里的华人人口只增加了200多人。那时候华人主要是住在伯利兹城（Belize City），另一些则住在潘塔高达（Punta Gorda）以及口罗萨（Corozal）。
* 1988年，伯利兹政府为了加速当地的经济发展，特地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宣布外国人只要购买价值2500美元的伯利兹国家债券，就可以申请成为伯利兹人，并获得护照。这一年，伯利兹华人的数量有了激增的现象，达到1500人。
* 目前伯利兹大约有一万多名华人，他们大部分聚集在伯利兹城、口罗萨和橙埠（Orange Walk）
* 关世铭（Simon Quan）和伍永泉（William Quinto）旗下的企业。是华人在伯利兹规模颇大的企业
* 关世铭所创立的百货商店货品繁多，就如公司口号——“你说得出的我们都有”（You name it, we' ve got it）。
* 伯利兹公立教会学校念书，学费不算太贵，小学学费每年不到100美元，政府免费供应书本。

萨尔瓦多

* 萨尔瓦多位于中美洲西北部，东北接洪都拉斯，西北接危地马拉，南临太平洋，面积虽小，却是中美洲工业化程度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 萨尔瓦多境内有数十座火山，其中几座为迸发频密的活火山，故有“火山之国”之称。
* 萨尔瓦多原是印地安人居住地，是古代玛雅文化发祥地之一。
* 1524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宣布独立，1841年成立共和国。
* 1979年萨尔瓦多国内爆发了内战，长达12年之久，有近7万5000人因为这场战争而丧失了性命。
* 1992年萨尔瓦多内战结束，政府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目前国家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盛产咖啡、甘蔗与棉花。
* 1877年，萨尔瓦多就已有华人的足迹
* 1880年，一名叫Adan Ton-Loy的华人来到萨尔瓦多，可惜其中文姓名已经无从考证。当时，萨尔瓦多的移民条例宽松，外国人在入境的时候不必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只需在港口登记姓名即可通关。
* 萨尔瓦多华人大多数来自广东，另外有少数华人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这些从美国来的华人，有者是1869年美国东西铁路完工后被解雇的华工。
* 20世纪初，萨尔瓦多颇具规模的华人商号已多达7家，包括广生隆、东兴隆、厚得昌、鸿盛泰、安记、昌记和广经祥，皆以丝织品买卖为主。那时，这7家商号也被华社称为“七家丝发庄”。7家商号的老板都是来自广东南海的九江。
* 1920至1930年期间，萨尔瓦多政府颁布了禁止阿拉伯人、黑人、黎巴嫩人、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入境的法令。
* 1931年，萨尔瓦多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严重萎缩。华人商店必须每个月上缴200美元的营业税。
* 这项条例仅仅维持数月，即碰上一场改朝换代的军事政变。新的独裁政府上台后，并没有刁难华人。除了批准一些华人商店重新营业，也把营业税降到每月7.50美元，只是不准许华人售卖日常用品。
* 两年后，当时的圣萨尔瓦多市长不但把营业税提高至300美元，还限令华商必须于8小时之内缴款
* 1954年，华人的入境要求以及居留的条件才有所改善。到了1975年，当地的华人人数回升至700多人。
* 1979年10月28日，萨尔瓦多人民忍无可忍，最终爆发内战。
* 1992年内战结束后，当地政府开始实施6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移居他乡的华人才纷纷回流。
* 萨尔瓦多共有2000余名华人。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圣萨尔多，其中以混血华裔居多。他们的先人早期绝大多数来自广东省南海，也有祖籍中山、番禺等地的。后期移居此地的华人则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 萨尔瓦多华人的经济活动领域仍以中餐业为主，中餐馆约有20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3家；百货商店居次，其他行业则包括旅店、塑胶厂、面粉厂、成衣厂、资源回收公司、中医等。
* 海拔680公尺的圣萨尔瓦多常年气候宜人，也是华人舍不得离开的因素。
* 近年移民到萨尔瓦多的华人，多数是以餐馆厨师的身份申请过来。
* 萨尔瓦多的劳工保护法非常严格。如果老板开除员工，可能会被勒令关门大吉。
* 萨尔瓦多劳工很喜欢顺手牵羊进行偷窃
* 在萨尔瓦多，要当商店的保安必须超过21岁才能持枪，要不就只能用刀。华人多请持刀保安员，以节省费用。
* 40年代初期，华人先辈就曾开办过华侨学校，以期后代们能有学习华语的机会。
* 萨尔瓦多的学生每月只需交十美元的学费，就可以在每个周末到华侨学校上两小时的华语课。
* 这所学校目前设有幼儿、初级、中级及成人4个班级，学生人数约150人，教师有7名。其中有4名是在当地聘请的台湾华人，另外3名则是由台湾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派驻的义务教师。
* 华人后裔口操着西班牙语、吃咸咸的白玉米饼——普普萨（Pupusa）、喝甜腻的热可可饮料、支持萨尔瓦多足球队。
* 中美洲暨巴拿马六国中华会馆与华侨总会联合总会，在1966年1月27日于圣萨尔瓦多正式成立。这是中美洲最大的华团。

洪都拉斯

* 1502年，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在中美洲西北部发现了洪都拉斯，并赋予这个在西班牙语中有“无底深渊”意思的名字。
* 洪都拉斯国内政局变幻莫测，自1821年独立以来的100多年间，陆续发生了百多次政变。这里20%的富裕人口掌握着国家80%的财富，而50%的人民每天只有一美元的收入。
* 199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不只夺走了洪都拉斯1万3500条人命，也造成国家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早在19世纪末，便有一名华人从巴拿马来到洪都拉斯。他是祖籍广东的华人，叫作Dario Yip
*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洪都拉斯大约有400名华人。
* 洪都拉斯华人店主只需要懂得物品价格和名称，还有“muchas gracias”（谢谢）、“bienvenido”（欢迎光临）等日常用语，就足以应对一般交易。
* 一直到了80年代，中餐馆才后来居上，成了当地华人的主流行业。
* 1988年，包括土生土长的华裔在内，洪都拉斯全国的华人人口还不到1000名。
* 90年代初，洪都拉斯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而放宽了移民限制，只要愿意支付两万美金，就可移民
* 华人社会已发展成两个群体。他们主要分布在特古西加尔巴和北部工业城圣佩德罗苏拉（San Peho Sula），其余则散居在全国各地。

1. 第一个群体指的是在当地出生的混血华裔，人数约有两万，他们会西班牙文而不懂中文，绝大部分没有中文名字，只知道自己身上流着华人血统。前三军总司令熊伯雄（Mario Raul Hung Pacheco）、前国防部长Maria Elizabeth Chinz Sierra、前财政部长Wilian Chong Wong和前洪都拉斯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Rigoberta Chang Castilo,都是非常出色的混血华裔。
2. 第二个群体则是6000余名在最近数十年从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到这里谋生的华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这些华人不论是否在当地出生，多数从事中餐馆和杂货批发这两个传统行业。

* 一踏出洪都拉斯通孔廷国际机场（Toncontín International Airport），一路上都就可以看到中餐馆。在进入市区后，中餐馆更是四处林立。此外，市内与郊区，华人经营的杂货铺随处可见。
* 在特古西加尔巴山城，街道曲折起伏，群山环抱，开餐馆的华人95%是广东人。中餐因价格适中，份量又足，很受当地人欢迎。
* 在拉丁美洲一带，女孩满15岁就算成年，父母不管是贫是富，都会隆重其事，为女儿举行庆祝成年仪式。当地人多选择到中餐馆举办成年礼
* 只要有一个华人坐在店里，这家店的中餐一定既正宗又好吃。
* 洪都拉斯北部的圣佩德罗苏拉省的华人群体以及南部首都的华人群体，就是否该成立华侨总会这一个问题进行商谈。最终华侨总会在1930年代末正式成立，至今已经拥有超过3000名会员。
* 关有佩夫妇就在1937年设立了洪都拉斯华侨学校。
* 华侨总会在2007年复办了中文学习班。
* 洪都拉斯的广东人给这个国家取了一个粤语谐音「穷到拉屎」的别名

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中部，东邻加勒比海，西濒太平洋。小国寡民，经济落后。

境内湖泊遍布，尤其闻名遐迩的尼加拉瓜湖（Lake Nicaragua），是中美洲第一大湖，湖水湛蓝清澈，美不胜收。周边300多座大小不一的岛屿，是寻幽探秘的好去处。中部高原山地多为活火山，因而有“火山之国”的称号。

       1502年哥伦布发现了尼加拉瓜，1524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宣告独立，1823年加入中美洲联邦，直到1839年正式建立共和国。美国从20世纪初多次干预尼加拉瓜政局，并在1937年扶持苏慕沙家族（Somoza family）上台，开启了尼加拉瓜的独裁统治时代。

       1972年，首都马那瓜经历大地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1979年左派桑地诺解放阵线（FSLN，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取代独裁政权成立新政府，实施私产国有化政策。

百余年来，尼加拉瓜的政局动荡不安，国家经济停滞不前，民生困苦。生活在这个命运坎坷的国度，华人只能随之载浮载沉，前途未卜。

于华人何时最早抵达尼加拉瓜，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约于19世纪中叶，便有华人到尼加拉瓜来。另一说法却认为，直至1884年才有华人首次登陆尼加拉瓜的东岸地区。此外，也有记录显示，在1890年，有一些华人从美国、墨西哥等国移居到这里。

       接着，华人逐渐开始从东岸往西移，在马那瓜、格拉纳达（Granada）、马萨亚（Masaya）、莱昂（Leon）等省落脚。安定下来之后，华人大多数都选择从商，经营小型的杂货店，开设肥皂厂或饼干厂，也有华人经营餐馆，只有少数的华人务农或当工人。日子一久，便有一些华人和当地的妇女成婚，并且生下了混血的后裔。

       1930年，尼加拉瓜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华人入境。翌年，尼加拉瓜政府制定新的保护劳工条例，规定外侨所经营的企业必须有75%的员工是尼加拉瓜人。这一项新政策的推行，使不少华人陷于困境，不得不做离开此地的决定。

       如此一来，尼加拉瓜的华人人口自然就越来越少。1937年，尼加拉瓜的华人约有1000人。

       二战期间，大批华人涌进尼加拉瓜，华人人口逐渐回升。在1967年，尼加拉瓜已有大约3000名华人，其中以广东人最多，华人商号则超过250家。到了1970年代后期，这里的华人人口增至4000人左右，其中土生华人就占了3000人，他们主要是聚集在东岸和首都马那瓜一带。

       然而，70年代发生的两件大事，却令原本稳定的华社开始动摇了。一是首都马那瓜在1972年被大地震所摧毁。这次的地震不只造成死伤无数，经济大受影响，也震毁了位于市中心的中华会馆，并且阻滞了华资企业的发展。

       第二件事则是1979年桑地诺解放阵线成功推翻了苏慕沙的独裁政权，并将国家导向社会主义之途。这个新政府除了把私人财产国有化，也推行激进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陷入通膨危机。同时，由反对派挑起的频繁内战以及美国方面的经济制裁，更使原本危困的局势雪上加霜。

       眼看情况越来越糟，许多华人于是纷纷避走他乡，转往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及巴拿马等邻近国家，尼加拉瓜的华人人口骤降。而那些坚持留下来的多数是当地出生的华人。到了1983年，此处的华人商店已经减少至180多家。

       在1990年之后，尼加拉瓜的政局逐渐恢复稳定，新的民选政府励精图治，除了积极鼓励外商前来投资，亦很努力寻找解决外债的方法。

       从1992年开始，台湾人也陆续来这里投资设厂。到了2005年，华人成衣厂已经为尼加拉瓜制造了3万多个就业机会，当时的加工区一片欣欣向荣。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桑地诺解放阵线于2007年重回政坛，有好些华商担心过去的乱局将会重演，于是又再度酝酿着准备离开这里。

   目前，尼加拉瓜的华人可分为三大群体。第一个群体是老华人，他们多原籍广东，大多已年近古稀，主要居住在大西洋沿岸地区。

       第二个群体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是构成尼加拉瓜华社的主要群体，约有1800人，散居在全国各地。他们经过百余年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已经繁衍到第四、五代。这群混血华裔大部分都不会说华语，只会说西班牙语，也没有中文名字，有些甚至从外貌上看已不似华人，只能从他们的姓氏如司徒、刘、张、关、王等来判断他们具有华人血统。

       第三个群体则是近20余年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移居到尼加拉瓜的华人，约有300人。他们大部分是在成衣厂打工，或是结束工厂合约后，选择留下创业的华人。另一些华人则是早期外派到尼国协助开发农业技术的专家，任务完成后，他们因留恋这里的自然环境而留下来。

       华人大多经营中餐馆和从事商品贸易，也有华人经营杂货店、生产药品或种植稻米等。整体而言，华人在这里的经济状况还算不错，大部分人都有车有房。他们多数集中生活在首都马那瓜和莱昂省。

       由于尼加拉瓜近年来政经陷于困境，治安不靖，许多华人选择离开。不过还是有华人持观望态度，静观其变，何去何从，取决于今后局势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的尼加拉瓜加工区，成衣业发展欣欣向荣，为当地人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

       1992年台湾成衣制造企业富太，打响了华人到加工区投资的第一炮。翌年，年兴纺织也到这里开设成衣厂。接着鼎大、中国今一等也陆续到这里设立分公司。全盛时期，这个加工区共有12家华人成衣厂，总投资额达2亿美元，这是华人在尼加拉瓜史无前例的大型投资，也是华人经济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目前担任诚扬成衣厂（Chen Yong S.A. ）总经理的张光宇说：“早期这里的成衣厂很好赚。当时，尼加拉瓜的纺织品出口到美国没有限量，运输又便利。这里的劳工工资低，也没有劳资纠纷问题。那时的投资环境真是好得没话说！”他指出，像成衣厂这类劳力密集的工业，如果少了这3项优势，就很难维持成长动力。

       然而，自左翼政府奥尔加特（Daniel Ortega）执政后，一切发展优势不复存在。新政府至今已数次调高国民最低工资，从先前的月薪100美元调高至125美元，无形中提高了成衣厂商的生产成本。

    这里的生意不好做，政治不稳定，治安也越来越差，很多华人都选择离开。但是也有人选择留下来，而吸引他们留下来的，不是奢想大富大贵，而是那不愁三餐温饱，又能获得适当享受的简单生活。

       据这里华商反映，由于这里华人少，同行竞争不那么激烈，没有竞相压价的恶性竞争。而且这里人工便宜，虽然工人工作效率低，但秉性纯朴，很少顺手牵羊偷东西。当地人虽然穷，却舍得消费，所以生意还是很好做。

       在东方市场（Oriental Market）经营服饰批发的浙江青田人南旭东说：“我们这里是全国最大的中国货品批发中心，不止用现金交易，人流也很多，看起来是治安不太好的地方。但是我在这里做了几年生意，也没碰到有人进来打抢，反而常常看到店门前的路人被抢。可能是我们市场内的商店都会相互照应，抢匪才不敢猖狂作案。”

暇时南旭东会带着家人到海边购买新鲜海产，他开心地说：“尼加拉瓜两边靠海，海产很便宜，但是当地人不太吃鱼，我们就有机会买到便宜又新鲜的鱼虾。这里虽然不是什么都买得到，可是我已经觉得生活很不错了，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请几个工人帮我做事。如果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享受。所以我喜欢这里。”

       来自巴拿马的吴小丽说：“2006年8月我和夫婿决定来尼加拉瓜做生意。这里人民虽然穷却舍得花钱，竞争也小，生意好做得多。”他们现在一切满足，还没有离开的打算。

       尼加拉瓜华人基督福音会，是部分华人的生活场所。该会查经班成立了十余年，成员多是来自台湾的华人女性，每到周四，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分享阅读圣经的心得，闲话家常。此外，他们也会不定期相约在周六晚上，带着家人到餐馆饱餐一顿，唱唱卡拉OK，或喝酒聊天，愉快地度过周末。对他们来说，这些活动是日常生活里重要的调剂品，不管日子多么单调，能跟三五知己相聚也是一种享受。

 尼加拉瓜最早的华人团体，是1925年由7名华人共同成立的中国友好联盟（China Fraternal Union）。1930年代末，随着华人人口逐渐增多，当地华人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社团，以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团结华人的力量。1942年中国友好联盟改名中华会馆，并注册成为尼加拉瓜第一个合法的华人社团。成立初期，会员主要为居住在尼国太平洋沿岸的华人。

       到40年代后期，会员已发展到尼国各地，许多华人以个人或团体的身份加入，中华会馆成了尼加拉瓜最活跃和重要的社团。

       早期中华会馆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兴办中文学校，为华人子弟提供学习汉语文的机会。曾在中文学校念过书，拥有四分之三华人血统的刘兰坤回忆道：“还记得我十岁时曾经上过中文学校，那时会馆还专门从中国请老师来教我们说广东话。”

       另外，会馆还设立神像，带领会员祭祀祖先。中华会馆也为华人排难解纷，收留无家可归的华人，办理华人入境手续，及提供生活资讯等。此后，以中华会馆为核心的尼加拉瓜华社茁壮成长，随着华人移民持续移入，会馆的成员也不断增加。

       1972年，一次大地震使位在市中心的中华会馆会所毁于一旦，损失惨重。更不幸的是，随着1979年左派桑地诺政府上台，会馆被迫停止运作，直到1992年才恢复活动。

   华人人口少，加上文化断层，有些尼加拉瓜华人悲观地说：“30年后，中华文化说不定会在这里消失，如果没有办法把文化传承下去，下一代的华人将会忘记自己的华人身份。”而在这个非常时期，Fabio Lau所做的一切就显得难能可贵。

       60多岁的Fabio Lau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他只有二分之一华人血统，不会说中文，只会西班牙语，原来连自己姓“刘”都不知道，却在尼加拉瓜进行了3年多的华人研究。为了探寻华人先辈的足迹，他走遍尼加拉瓜，反复探寻和记录，并从各个政府单位收集官方资料，撰写了数本关于尼加拉瓜华人移民的史书。

       2005年，第一本《尼加拉瓜华人移民史》（Antecedentes Históricos de la Inmigración China en Nicaragua）问世。2007年的《华人在尼加拉瓜之根源与发展历程》，则更详细地纪录了华人先辈在尼加拉瓜的发展经过。他说：“接下来，我要让全国人民认识华人。”他计划把记录华人历史的文章，像传单一样免费夹带在尼加拉瓜日报供读者阅读。除了这些关于华人历史的研究，Fabio也将华人在当地的生活现况，刊登在由中华会馆出资，不定期出版的西班牙语刊物《EI Mandarin》上。

       Fabio之所以开始热衷研究华人历史则是缘起于数年前的一段经历：“2004年的某一天，一名加拿大学生来我们的华人中心，说要找华人在尼加拉瓜的资料。可是，我们无法提供任何资料。因为属于华人的历史，早在1972年地震时，就跟着旧中华会馆一起消失了。”

       在那之后，他意识到必须有人记录华人在尼加拉瓜的发展历程。他知道如果再不记录，资料就会越变越少，所以他便从父亲留下的一些文件中，开始着手研究华人在当地的移民经过。

 身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局势都不稳定的国家，选择留下来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人，没有十足的归属感。而土生华人，对中华文化已是一知半解，想要支撑起整个华社，已是有心无力。

       现阶段的尼加拉瓜华社发展，就像是一盘散沙，这里的华人，前途未卜，忧心忡忡。

  哥斯达黎加位于中美洲南端，介于太平洋与加勒比海之间，南北分别是巴拿马和尼加拉瓜。由于境内森林密布，野生动物种类繁多，享有“野生动植物园”和“生态家园”的美誉。

       哥斯达黎加政治安定，是拉丁美洲各国中实施民主政治最悠久的国家，于1948年内战后更废除军队，在国际间以爱好和平著称。如今，它是中美洲国家中经济最发达、教育最为普及的国家，2007年与中国建交。

华人移居哥斯达黎加已经有160年的历史。

       早期千里迢迢去到哥斯达黎加的华人，大部分都是苦力，他们当中多数曾参与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工程，最终定居于沿海一带。

       1855年，有32名华工自巴拿马被引入哥斯达黎的加泮大连省（Puntarenas）；同年，另有45人稍后抵达。他们被派往农园工作，是当地最早的一批华人。

       哥斯达黎加自19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兴建铁路，因而需要大量的劳工。当时，身在秘鲁策划华工兴建铁路的美国人Henry Meiggs Keith，在1873年引进了653名粤籍华工。这批来自香港及澳门的华工，在海上航行了近3个月以后，才抵达哥斯达黎加。

       甫一下船，这些华工便马上被安排去兴建连接圣何塞到大西洋沿岸的铁路。他们工作时赤身露体，餐风露宿，除了面对恶劣的非人待遇外，还必须面对蛮荒地区瘟疫的侵袭。不少华工因为不堪被凌虐，为求解脱而选择自杀，华人人数也就因此明显减少。根据人口统计调查显示，1855年抵达哥斯达黎加的77人中，到了1864年仅剩13人；而1873年间到来的华人，在十年后只剩下200多人。

       1897年，哥斯达黎加国会以华人是“有害种族”为由，通过了一项禁止华人入境的法令。直至1943年，经由吕华昌（Luis Wachon）等华人侨领的努力交涉之后，这些对华人不公平的禁令才得以解除。

       20世纪初，许多华工在合约期满之后均选择留在哥斯达黎加发展，有的弃农从商，有的栽植香蕉、可可、咖啡等作物。

       那时候，有一批中国人为了达成淘金梦，决意偷渡到美国的旧金山去，结果没有得逞，该船惟有南下并驶至哥斯达黎加的泮大连省港口。上岸了之后，他们在香蕉园或华人的店铺打工，储蓄了一定的资金便自已做生意。当经济状况开始稳定后，有一部分华人重返中国家乡成亲，并把妻儿带回哥斯达黎加，也有部分华人和当地的妇女结婚，从此衍生了许多混血华裔。

       从20世纪50到70年代，哥斯达黎加的移民政策相当宽松，较易申请入境证。华人只需在该国定居5年之后，便能够成为合法公民。因此，从广州、中山等地区涌入了大批中国移民。

       最近一波华人移民潮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哥斯达黎加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敞开国门，欢迎移民的到来，因而吸引了许多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等地区的移民。有些新移民开设中餐馆或杂货店，有的投资设厂。

目前，哥斯达黎加华人约有4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他们主要经营传统的中餐馆、五金店、杂货批发、伙食店等；近年也进军其他行业，如旅行社、旅馆、汽车行等。早期华人多来自广东，聚集在泮大连省；后来的大批恩平人则落脚柠檬省（Limon）。如今，大部分老华人以及新移民大多在首都圣何塞经商。

    如今，华人已成为哥斯达黎加社会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沿海的柠檬省、泮打连省内的小城镇到国际大都会圣何塞市中心，每隔几条街就可发现一两家中餐馆和挂着中文招牌的杂货店与五金店，华裔的脸孔也随处可见。

       最初，大部分老一辈的华人都抱着落叶归根的观念，赚钱回国、买地盖房、安享晚年。然而，经过几十年的拼搏，在当地闯出一番事业后，观念已慢慢转变。如今他们选择在当地购地置业、落地生根。无论在人口集中的城市，还是人烟稀少的小镇，华人已从家庭式的杂货铺、餐馆、伙食店等，逐渐扩大经营房地产等领域。尤其在一些华人聚居的城市，华人商业占有很大的份额。老一辈的华人多以开中餐馆起家。如今，这些中小型规模的餐馆遍布全国各地，非常受当地人欢迎，尤其在首都圣荷塞，华人餐馆最具规模，且数量也最多。这个不满30万人口的首都，在闹市的大路两旁，中餐馆鳞次栉比，相隔几步便有一间。较早时，华人因资金少，一般在较偏僻的乡郊创业，这些地方治安不好，大家都步步为营，做足保安措施，唯恐发生不测。

       中餐馆大多是小本经营，属家庭式的生意。只需一个小店面，几张桌椅，便可开张营业。老板、厨师、服务员，打扫卫生，则动员全家，各司其职。如果生意兴隆，顾客盈门而忙不过来，至多雇用一两个外人助手。不过在首都闹市，也有三几间大型的中餐馆，富丽堂皇，装潢讲究，上门的食客不是达官显贵，就是富商巨贾，像“皇朝”、“新东王”等饭店，都是有名的大餐馆。

  跟中餐馆一样，华人的杂货店，也多是家庭式的经营。不过，当中不乏具规模的连锁大型超市。超市售卖的货品，包括吃的用的，大多从中国进口；也有少数从日本、美国等国家进口电器、电脑与汽车零件。哥斯达黎加中哥工商联合总会曾举办过几届中国产品展览会，成为当地最具规模及影响力的商贸平台。

       从中国进口的各式商品价廉物美，深获哥斯达黎加人欢迎。华商每年都会往返中国几趟，与制造商洽谈合约进口货品。当地中国杂货业的繁盛，无形中也带动了该国进出口贸易行业的发展。

       哥斯达黎加以农立国，盛产的咖啡、可可、香蕉、凤梨、甘蔗等远销世界各地。华人资本家以其雄厚的资金，丰富的营运理念，购买大片的农园，大规模栽植蔬果，供本地市场与外销。也有企业家投资设厂，进军制造业与食品加工业。台湾人在渔业与水产业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移居到哥国之后，因势利导，占天时地利之优势，投资远洋捕鱼业及鱼虾养殖业，获利颇巨。

       哥斯达黎加沿海风光绮丽，境内多高原山地，火山穿插其间，迸发出的喷泉，云雾缭绕蔚为奇观。南部的拉米斯塔德国家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首都圣何塞美丽洁净，被誉为“美丽的花园城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的哥国旅游业发达，沿岸省份的海港，常有来自北美、南美洲国家的游轮，载来许多游客。这些小镇内的小型旅馆，大部分由华人经营。旅馆设计简单，但设备齐全，加上价钱低廉，单人旅客一晚最低收费只要十美元左右，成为许多游客的首选。这些旅馆大多是当地经营五金批发零售或农牧等业务的华商，进行多元化投资的副业。

       近几年华商除了发展传统行业，也积极开拓新领域。他们看中当地人每年重修房子的习惯，极力进军五金零售批发、室内设计装修、建筑工程承包等行业。随之还兴起了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替屋主办理买卖房屋、出租房子等业务。此外，亦有华人涉及服装、娱乐等行业。

       哥斯达黎加的国泰金融集团，是中美洲第一家华人控股的金融机构，集团旗下的哥斯达黎加国泰银行，可满足当地商家，尤其是华商在财务上的需求，同时促进该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商业发展。

在哥斯达黎加，华人一般上事业有成，生活安稳。尤其老一辈华人，生性勤劳节俭，颇受当地人敬重。然而，由于当年华人妇女移民较少，两性比例悬殊，定居之后，多半与当地妇女通婚。他们终日忙碌于创业工作，无暇督导子女，儿女们从小与母亲一起生活，长期受母方的熏陶，因.此都逐渐本土化，失却了中国的传统习性。但他们仍保有华人的姓氏，并以拥有中国血统而自豪。

       第二、三代的混血华裔，很多都已成为医生、律师、会计师与工程师等专业人士。他们也成立一个“华侨专业协会”，经常聚集连络感情。不少混血华裔也担任公务员，热衷从政，至今已有3位华裔国会议员。

       他们也重视仪表。出门前一定会悉心打扮一番。走在街上，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时尚优雅。见面或告别时，不忘握手、拥抱和亲吻等礼节。

       哥斯达黎加华人大部分祖籍广东，到中餐馆用餐或在家常吃到的大都是粤菜。然而，他们也接受当地美食，尤其偏爱炸大蕉、玉米、薄饼、黑豆炒饭等，平常在家中准备的中式美食，早已经混合当地的食材与口味。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盛产玉米的地方，华人家常饭菜中，少不了玉米粽、玉米饼、玉米团、玉米酒等。

       哥斯达黎加土质优良，盛产的蔬果新鲜甜美。华人喜欢在周末逛圣何塞的蔬果市集，这个大型露天蔬菜水果市集位于市中心附近的第十四大道，每逢周六沿街开放，出售各种新鲜蔬果，价格比超市便宜，广受市民的欢迎。

       哥斯达黎加的甘蔗糖赫赫有名，咖啡豆亦属顶级品种。大部分出口到欧洲国家。咖啡已成为华人早餐最普遍的饮料，而午餐和晚餐他们则饮用加粗糖制成的郎姆酒、糖酒等。每逢周末或假日，华人喜欢邀请好友到家中，喝着咖啡，吃着水果和甜品，闲话家常。

       搓麻将、下象棋是当地华人喜爱的休闲活动；运动方面，华人首选乒乓球及羽毛球。当地人非常喜欢与华人切磋球技，年轻华人则喜欢与当地人一起踢足球、跳交际舞、逛街或看电影，生活多姿多彩。这些互动的交流活动，无形中促进了华人跟当地人之间的了解。

   2003年10月6日，哥斯达黎加国会将每年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订为“中华文化日”，华人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这是华人经过160年辛劳努力的成果，也是当地政府和人民认可华人贡献的具体表现。

       每一届的中华文化日，哥斯达黎加华社各团体都会在旅哥广东华侨联合总会的带领下，全情投入，在国家公园、国会大厦和文化广场等地区，举办游行、书画工艺品展览、义卖、现场中餐烹调和传统歌舞表演等活动，中华文化气氛弥漫现场。除了华人，游行表演团队中还包括了一群当地青少年，与华人同欢共舞。

       哥斯达黎加华人重视中华节日，一般都会与家人一起欢度，春节会在家中吃团圆饭及向亲人朋友拜年。各地的中华总会，会举办一系列的迎春活动，尤其除夕夜的晚宴和大年初一的舞龙舞狮表演，更是不可少。

       每逢春节，在圣何塞市中心的中餐馆都会趁机推出应节菜肴。这些菜肴的名字都别具一格，寓意在新一年带来好运、幸福和财富。另外，业者也会准备一连串的欢庆活动，其中包括别开生面的醒狮表演、中国乐器、传统舞蹈演出、传统服饰时装秀、中华武术等。

       端午节最主要庆祝活动是赛龙舟。直到今天，在北圣何塞的La Ribera de Belen河畔，每年端午节都有举行龙舟竞赛活动。

       圣何塞市广东同乡会也曾举办盛大的中秋庆祝和牡丹小姐竞选会。这项节庆活动在酒家举行，会场以嫦娥奔月的彩画作布景，佳丽们身旗袍，在传统乐曲的伴奏下，登台亮相。如此气氯热烈的庆祝会虽然不是每年都有，却也为当地华人津津乐道。

当地有30多个华人社团散布各省，其中最主要的是设在圣何塞的哥斯达黎加中华总会，其他还有恩平同乡会、中哥华人华侨联合总会、致公党、台湾协会等。这些华人社团大多数仅靠老华人在支撑，年轻一辈华人大多参加哥斯达黎加华人青年协会、华侨专业协会以及中国哥斯达黎加工商联合总会。

       中华总会共有泮大连、柠檬、尼哥耶、圣十字中华会馆四个分会，鼎盛期会员人数曾高达2000余人，目前人数仅约200人。中华总会为加强各社团间的凝聚力与联系，经常举办大型新年、中秋晚会及其他艺文活动。

       为促进中哥两国贸易和提升华人社会地位，中国哥斯达黎加工商联合总会于1992年成立。现任会长翁翠玉上任后，于2005年创办了中美洲第一份中西文双语会刊——《工商》。该杂志面向哥斯达黎加主流社会及广大华裔，免费赠阅。杂志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哥斯达黎加双边贸易促进活动、两国商界投资资讯、杰出商业人士专访以及两国文化交流等；总统阿里亚斯、外贸部长鲁伊斯等官员都先后发表过文章。

       当地华人没有出版任何中文报纸，市场上可见的三份中文日报，即《拉美快报》、《拉美侨声》和《新报》，都是从巴拿马进口，除了巴拿马新闻，也有哥斯达黎的相关报导。而中文刊物则有《活水》及《号角周报》两份免费赠阅的资讯刊物；另外，中华总会、海外团结协会、台商会、台湾协会以及佛光山等均会定期出版会刊。

哥斯达黎加华人多为天主教徒，尤以第二代为甚。亦有小部分华人信奉基督教、佛教与道教。华人社会现有4间教会，即圣荷西华人福音教会、圣荷西国语浸信会、圣荷西活水基督教会和哥斯达黎加台福基督教会。四间教会的会友总数约350人，每周参与崇拜的人数约300人。身为佛教或道教徒的父母亲都很开放，会尊重孩子的选择。因此一个家庭成员信仰不同的宗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哥斯达黎加华人散居各地，当地没有华人庙宇。华人惟有在住家或店铺内安置神像或祖先灵位，每天简单祭拜。哥国唯一的华人义山设在柠檬省，历史悠久，多埋葬第一代华人移民。清明时节仍有少数老一辈的华人到这里扫墓，悼念先人。

       如今，华人葬礼都依照各自所属宗教仪式进行，分别葬在当地人经营的坟场。大部分华人后代皈依天主教，自然选择天主教式的墓地。与当地教徒一样，华人都在每年的11月2日万灵节，一家大小带着鲜花、水果等祭品，前往坟场扫墓，纪念先人。

 在哥斯达黎加，华人子女可享有6年义务教育。华人子女大多就读于公立或私立学校，亦有一部分进入美国学校或其他国际学校。公立学校教学语言以西班牙文为主，部分学校亦有英语课程。私立学校则以西文及英文双语教学，但仍以西班牙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美国学校以英文为主，兼有少部分西文课程。

       华人家庭重视子女的教育，大部分华裔青年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或专业的技能培训。

       目前，真正修读中文的华人后裔非常少，而且学习管道有限。现只有私立维多利亚学校及佛光山哥斯达黎加福慧精舍中文学校开办中文班。

       台湾人罗贞香女土开办的维多利亚学校，于1991年12月创立。从1979年开始的托儿所，到后来1990、1998年逐渐成形的中小学，通过当地台湾华人资助，罗女土一步一脚印慢慢地把学校办起来。该校原址位于首都圣何塞圣彼得区内，由于学生人数日益增加，学校在2000年搬迁到首都郊外。

       维多利亚学校把中文列入必修课，教学分为初级、中级与高级，从幼儿班至中学七年级，同时提供课外一对一补习课。毕业后，成绩优越的学生更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前往台湾大学深造。校内的学生大部分是当地人，只有小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地的华人学生。

       在哥斯达黎加成立了将近20年的佛光山，是中美洲地区的主要分社。佛光山福慧精舍配合当地慈善机构Atenas红十字会，有时派发物资救济该国贫民。

       除了弘扬佛法，福慧精舍亦设立中文学校，以培育华人下一代人才。该校目前有140多个学生，其中三分之一是当地人，其余则是华人后裔。中文班固定在每个星期六全天教学，也安排一对一的个人补习。由于当地华人在中文听力与书写上比较吃力，学校尽量采取图文并茂、轻松易懂的教材，分初级、中级和高级3种。

私立维多利亚学校创办人罗贞香女士是首位在当地办校的台湾人。

   随着中国的崛起，每年都有大量哥斯达黎加厂商参加广交会和其他中国商品交易会，到中国旅游的人也逐年增多，当地掀起了一阵学汉语的热潮。

       有鉴于此，中哥工商联合总会于2006年开办了首个“商务汉语”学习班，近20名哥斯达黎加企业界人士成为首批学员，其中不乏知名银行集团、物流企业、进出口公司负责人。当中更有一些华人后裔，他们多不谙中文，但仰慕中华文化，借此机会好好地学习中文。

  在哥斯达黎加，许多华人后代拥有地道的西班牙姓氏，例如Sanchez、Acon等；或者根本说不清来源，如Yockchen、Sanchun、Manzan等不中不西的奇怪姓氏；有些甚至一家人拥有不同的姓氏。

       西班牙式姓名的排列顺序通常为：名字、父姓、母姓。有些妇女结婚后，会在她的本名后加上丈夫的父姓，中间则用前置词“de”连接，如前柠檬省中华会馆会长黄倩珍女士，姓名是“Juanita de Acon”。

       早期华人与哥斯达黎加女性结婚后，为了得到当地户籍，都选择以妻子的姓氏为小孩登记户口。如华裔前驻华大使Francisco Tacsan，其家族在哥斯达黎加的姓氏是Tacsan，但其祖先本姓应为卢（Lu）。

在哥斯达黎加，华人从早期的被排斥到最终被接纳，是数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与抗争的结果。

       如今，华人已渐渐融入当地，成为哥斯达黎加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着富足与安逸的生活。展望未来，哥国华人的前途还是令人感到乐观。

   巴拿马，位处中美洲地峡部分，东西各与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为邻，南北濒临太平洋以及加勒比海。

       巴拿马境内贯通太平洋及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有“世界的十字路口”之称，在经济及军事上极具重要性。巴拿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该国发展成为中南美洲最重要的交通运输中心，以及拥有100多家国际银行代表处的金融中心。

       巴拿马于1501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独立成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1830年，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解体，巴拿马成为新格林纳达共和国的一个省。1903年11月3日，巴拿马脱离新格林纳达共和国，成立巴拿马共和国。

  巴拿马的第一批华人移民是在1854年左右抵境的，他们主要从事铁路建筑的工作。当时，西班牙殖民统治者为了发展当地经济，计划开辟一条横贯巴拿马地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Panama-Colon）的铁路。由于当时黑奴制度被废除，劳工极为缺乏，统治者遂转而引进契约华工。1848年，一家专门承包铁路修筑工程的巴拿马铁路公司，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招募华工。1851年到1856年之间，他们把大约两万名华人送到巴拿马修筑铁路。

       华人不仅是修筑铁路的主要劳力，在开凿举世闻名的巴拿马运河工程中也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从1881年运河工程动工开始算起，巴拿马运河公司在20年内先后招募了上万名华工。1914年运河竣工之后，巴拿马人在这项工程最险峻的地方树立了“契约劳工亭”，以表达他们对华工的崇敬之情。

       20世纪20年代，美洲国家接连颁布限制移民法令，巴拿马政府也依样画葫芦，制定了限制华人入境法令。这时期墨西哥爆发排华暴行，大批华人流落到巴拿马。1935年，巴拿马政府规定，在农工商业等领域所雇用的职工必须要有至少75%是巴拿马人，而外籍人士在巴拿马经商也必须有当地人股东，这导致华人营业困难，失业率激增。后来经中国驻巴拿马外交机构及华商的努力交涉，巴拿马法院最终裁决该规定违宪而停止执行。

       据中国驻巴拿马外交机构的统计，1945年巴拿马境内的华人不足2000。到了60年代，为了配合巴拿马经济的发展，巴拿马政府实施了开放式的外国人投资条例，促使很多华人重返巴拿马。

       基本上，巴拿马的华人新移民可分为两批。

       第一批是1990年代末期来自港澳的华人，他们属投资移民，带来雄厚的资金，准备投资在巴拿马运河区、自由贸易区或者商业中心。

       另一批华人新移民，则大部分来自广东花县，他们随着20世纪80、90年代的移民大潮来到巴拿马，并散居在郊区小镇，从打工开始，慢慢积累资本，再踏上艰苦的创业路。经营小本生意的以中餐馆、洗衣店、伙食店、五金店居多。

       这些充满冒险精神的华人新移民，散布于巴拿马许多偏远而资源匮乏的市镇，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力。

巴拿马城中巴公园内华人抵达巴拿马150周年纪念碑。

巴拿马华人人口居全中美洲之首，占巴拿马总人口的4%左右；而混血华商的人数可能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0%以上、当地华人有90%来自中国广东省，以花县最多，约占70%；另外也有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的华人。

       华人主要分布在首都巴拿马城和科隆市（Colon），部分散居在戴维（David）、贝诺诺美（Penonome）和奇特雷（Chitre）市等地。巴拿马城华人最多、新、老华人移民，分别聚集在新华人街区和旧唐人街。

       巴拿马华人中富商巨贾不多，多数是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平缓。150多年来，华人从小型中餐馆、洗衣店、杂货店开始，扩展到大型加工业、制造业、进出口贸易，进而渗透至旅游、医疗、金融、建筑、运输等行业，基础稳健。他们开的成衣店、珠宝行、钟表店、烧腊店等在巴拿马城区比比皆是；而城外较偏远的乡镇，街头巷尾都有华人开的伙食店和中餐馆。

       此外，也有华人从事农牧业，以种植蔬果和养殖鸡、牛为生。这些农产品在当地极为畅销，科隆区一家由华人经营的畜牧场，是该区最主要的牛肉供应商；此外，由台湾人投资种植的柚木林，占了巴拿马柚木总量的50%。

       巴拿马运河让巴拿马在国际上声名显赫。提起运河，当地华人会想到香港和记黄埔集团旗下的巴拿马运河港口公司，这家由香港企业家李嘉诚创立的公司，于1997年标得对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长达25年的管理权，并于2005年对运河扩建工程追加投资，和记黄埔在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投资总额已达4亿美元，让当地华人引以为傲。

       由于华人移民历史悠久，加上人口众多与集中，巴拿马华人在文化传承方面没有太大的难题。他们成立了中美洲最具规模的中文学校，也创办中文报、网路媒体以及中文电台，丰富了华人的精神生活。近年当地开放的经济体制，不断吸引、也留住了华人的心。他们积极参与当地发展，与国家共存共荣

 以前，老一辈的巴拿马华人为了生活和孩子的将来，不分昼夜埋头苦干。迫于无奈，他们把孩子交给当地保姆照顾，也让下一代接受当地教育，以便他们可以轻松地融入当地社会。然而，却忽略了让孩子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不知不觉中塑造出了许多黑眼睛黄皮肤的巴拿马人。

       如今，在巴拿马土生土长的华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入籍成为公民。他们与当地人一同学习、工作，说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可惜许多不通晓中文，对中华文化一知半解。他们被当地老华人称为“十一点仔”，意为差一点、是不完整的华人。这些新生代大部分不再子承父业，也不愿像父辈那样天天埋头经营餐馆，而是选择自己创业，或出任政府部门与大企业高职，或成为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基本上，他们的收入属中上层，生活西化，与老一辈华人比起来相对舒适无忧。

       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华人逐渐习惯了当地拉丁文化和民俗。华人与当地人一样，在正式场合一般都是西装革履。富有的华人女性多数都有一件名叫“波列拉”（Pollera）的传统巴拿马服装，以便出席隆重的场合。饮食方面，当地华人很喜欢巴拿马鸡肉汤“桑科乔”（Sancocho）以及肉煮赤豆，配上大米和玉米等主食。

       至于消遣活动，老一辈的华人喜欢到左邻右舍作客，下棋、搓麻将，闲谈生活趣事，或到赌场小赌。年轻华人则喜欢参与现代体育运动，如足球和棒球；周末或假日晚上，则相约三五好友去看电影或到歌舞厅劲歌热舞。

       同样的，当地人与久居巴拿马的华人接触日繁，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在巴拿马首都，华人经营的商店约有2000家，其中以杂货店和中餐馆数量最多。城中的萧德庆、振兴、永和昌、三环公司等大商行已是全国有名的大型杂货零售店。华人店里的中国货价廉物美，加上中国日益昌盛，尤其具中华风味的装饰品很受当地人喜爱。走进一间间华人商店，顾客大多是当地人，购买力非常高。

       此外，当地人对华人文化的认知，已从敬佩华人的勤奋营生，提升到对中式菜肴的欣赏。巴拿马人对中华饮食的高度接受，造就了当地蓬勃的中餐业，用筷子品尝炒饭炒面等食物的习惯，也已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从早期华人移居巴拿马开始，华人在此代代繁衍。巴拿马建国之初，华人多和当地人混居于市郊，经营小生意；如今，各大城市如巴拿马城、科隆市、贝诺诺美市等都形成了明显的华人聚落，成为正式与非正式的“唐人街”。

       国家经济中心巴拿马城，是最多华人聚集的地方。巴拿马城分古城、老城和新城3部分。早期华人主要聚集在巴拿马古城的Calidonia社区，这里别致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式的修道院、大教堂、医院和皇官等建筑，被狭窄的街道、色彩缤纷的楼房围绕着，散发着浓烈的西班牙风采。古城在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巴拿马第一个唐人街（如今统称旧唐人街）便现身在这个古城区中。

       当初巴拿马铁路和运河工程为古城带来了商业生机，竣工后部分留下的华工拿着苦苦省下的积蓄开始做小生意，慢慢地演变成今天的旧唐人街。早期唐人街的发展区域一度扩大到中央大道、涵盖Santa Ana公园，鸦片馆、算命馆、寺庙与华人老铺林立。当时陆路交通不发达，而唐人街就坐落在火车总站旁，许多在科隆等外埠的华商三两个月就搭火车到此进货，大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如今，城内有同乡会、杂货批发零售店、五金行、餐馆及中药铺等，还有填满一座座楼房的华人住家。除了火车总站，旧唐人街还连接中央市场及周边的码头、蔬果和鱼肉市场等地。这些都是华人与当地人聚集、交际、做生意的地方。

 随着巴拿马城的发展，华人社区跟着不断扩展，延伸至Betania行政区的El  Dorado新城。这个华人密集的商业中心，于1994年被巴拿马市长Mercedes Garcia de Villalaz正式命名为巴拿马新唐人街。一排排的店铺：中餐馆、旅行社、中国杂货店、理发店、洗衣店、中文影碟中心等，全由华商经营，而顾客则以当地人占大多数。

       巴拿马首都的华人多居住在新旧唐人街附近。一般年轻上班族栖身简单方便的现代公寓，较富有的华商则选择恬静幽雅的高级住宅区，不少与兄弟姐妹亲友为邻。每逢周末假日，华人都会涌向高楼林立的首都新城。位于老城和古城交接处的新城，其中央大街为全城最宽阔、最繁华的街道，是华人和当地人的购物天堂。中国银行也在这里拓展业务，为华社工商界和当地人提供金融服务。

       在角纪利省的贝诺诺美市以及科隆贸易自由港属的科隆市，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唐人街，但有许多华人聚集在那里生活。贝诺诺美市的发展早期是由两家华人主力开拓，如今继续由他们的后代在背后推动着。

 这里，华人多集中在市中心两条主要的横贯街道。华人表面上经营杂货店，实际上却通过三四代多年的置业投资，买下了市中心多条街区的店铺，控制了当地的房地产市场，进而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幕后推手。许多华裔姓氏更是在当地成了响当当的招牌老字号，例如Chang、Him、Lam等。

       离巴拿马城约100多公里科隆市，位于运河大西洋入海口处，是国内第二大、但也是最穷的城市。许多华人在这里谋生，当中以新移民尤多。华人大部分经营小型的中餐馆、伙食店及五金店，客源尽是当地人。这些华人都居住在店铺后方或楼上，生活简朴。

       而在位于科隆市东北部的科隆自由贸易区内，有不少较富裕的华商，在这占地约400公顷的2000多家企业中，与阿拉伯及犹太人肩并肩，从事进出口和转口贸易。他们从中国进口各类纺织品、日常用品、家电以及各型机械，再转出口到其他欧美国家。

在传统节日方面，当地华人最重视春节。华人遵循旧俗，除夕夜阖家团聚吃团圆饭，大年初一派红包、拜年等。由于大部分华人在农历正月初一仍做生意或上班，大部分节庆活动都安排在傍晚打烊后进行。巴拿马前第一副总统阿图罗·巴利亚里诺曾数次出席花县同乡会的春宴，而巴拿马市长也出席中华总会的新春晚宴，向全体华人拜年。不少当地人会与华人一起过春节，参与贴春联、挂红灯笼、放鞭炮、拜年和春宴等活动。

       每逢春节，各大华人团体都会举行春宴、茶会，庆贺新春的来临。角纪利、科隆等华人地方社团，会筹备敬老春宴、理监事就职等欢庆活动。花县同乡会曾举办过“投胜灯”活动，吸引了当地各大商行及金融机构出重金投标，以求个“万事胜意”的好兆头。而代表巴拿马全体华人的中华总会，每年都在首都不同的地点，尤其是购物商场及商业区，举办一连串的庆祝活动，如拜年、醒狮采青、文艺表演以及放烟花鞭炮等，把巴拿马城渲染在一片浓浓中华节庆气氛当中。

       巴拿马华社把每年的4月5日定为清明扫墓日。这一天，华人会聚集在华人历史最悠久的安肯山（Ancon Hill）El Chorrillo 坟场、El Carmen教堂等地祭拜祖先，凸显了当地华人重视儒家传统及孝道。他们认为清明除了悼念先人，也是获得先人祝福的重要节日。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巴拿马，华人大部分信奉天主教。但当地也约有2万5000名佛教徒，因此有些华人家庭中会有两种信仰共存的现象，例如年轻一辈的华人子女可能从小就受洗礼，常参加教会活动，却又恭敬地遵从父母亲意思祭拜祖先或神佛。

       19世纪首批华人到巴拿马建筑铁路时，就带进了关公信仰。当时，有多个客家团体，在如今的巴拿马旧唐人街区联合兴建了供奉关公、观音圣像的人和会馆。这座于1898年建成的人和会馆关帝宝殿，是目前当地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庙宇，每当华人庆祝农历新年、中秋和关公诞等节日，庙里庙外香火鼎盛，人潮沸腾。

* *自2004年开始，巴拿马政府宣布，每年的3月30日为“全国华人日”。这一举措是对华人为巴拿马所作的贡献表示肯定。*
* 年轻一代巴拿马华人从小生活在西方文化的氛围里，西班牙语及英语是他们的生活语言，只有少部分人会以简单的普通话或方言与父母交谈。当地最常见的华人方言有粤语和客家话，而部分新移民则习惯以普通话沟通。
* 巴拿马许多华人子弟都报读由基督教浸信会所办的学校，例如巴拿马城的Instituto PanAmericano学校、科隆城的La Salle de San Jose学校，以及La Academia Santa Maria学校等。由于一些天主教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信教才能入学，因此有些华人家长，让孩子在出世时就接受洗礼，以方便长大后入学。为了不让孩子丧失学习中文的机会，有不少华人家长为子女聘请家教补习中文。同时，也有不少家长趁着学校年终假期，把孩子送到中国学中文；有些孩子则在高中毕业上大学前，到中国学习华语一年。
* 老一辈华人移民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不断为下一代的中华文化教育而努力。1986年，巴拿马华人集资百万美元在新城边缘的友谊大道建立了一所集体育、教育、文化与观光于一体的普及化教育中心。这所全权由华人承办的教育中心——巴拿马中巴文化中心和中山学校，现有学生近2000名，是中美洲最完整、且最具规模的教育机构。学校内有会议室、图书馆、体育馆、游泳池、运动场等；学制分为幼稚园、小学及中学的12年教育。此外，该校还提供社区教学、烹饪、武术、美术劳作等副科。
* 在巴拿马，除中山学校外，教授中文的学校还有华人基督教所建立的仁爱书院。这所位于拜地耶区（Paitilla）、于2002年注册的学校，使用英、西、中3种语文教学。与中山学校相比，仁爱书院规模较小、教授中文科的时段较短，从幼儿园至小学6年级各4班，每班学员30名左右，中文课由3位教师负责，以融合当地教育与中华特色为办校宗旨。而其他学习中文的管道，包括基督教会、巴拿马大学以及中华工商总会开办的中文班。
* 华人只要有能力，都会供孩子完成大学教育，较富裕的家庭常把孩子送到美国、加拿大等地深造。在中山学校毕业、成绩优异的华人子弟，有不少获颁巴拿马各大国立及私立大学奖学金，免费进入大学就读，毕业后回馈社会。而到国外深造的华人子弟，毕业后有些继续留在国外，部分则选择回国工作，对国家发展贡献良多。
* 巴拿马华人除了成立中美洲规模最完整的中文教育机构，也透过中文报章、网络、电台3种方式，推动该区域中文媒体的发展。
* 巴拿马华社每天出版3份中文报，即《拉美快报》、《拉美侨声》以及《新报》，传播最新的国内外新闻。这3份中文报价格统一，零售价每份50美分，每月订阅费十美元，每天总发行量在3000份左右，读者群主要是通晓中文的老华人及新移民。他们大部分通过订阅，获取当地第一手的华社新闻，同时了解中港台最新消息。与当地土生华人相比，他们对当地华社及祖国的发展较为关注，中文报对他们而言已成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 于1992年创刊的《拉美快报》，是目前巴拿马发行量最大、历史最久的中文报，居拉丁美洲中文报发行量第二位。每日推出对开16版新闻，每周出版6天。发行区从国内各省延伸至哥斯达黎加，并在哥国设有分社，主要负责该国境内的报纸发行及广告业务。
* 前身是《侨声日报》的《拉美侨声》，创刊于2002年，同样以16大版发行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两国。秉持着“服务侨胞、华侨之声”的理念，该报配合国内外华社创办版面，着重报导华社侨团的各项活动。巴拿马最年轻的《新报》，则由当地华社于2004年集资成立，办报宗旨为提升华人在该国的形象与地位，同时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
* 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也加入中文媒体阵容，丰富且快速地传播华社资讯。对电脑科技兴趣浓厚的科隆侨领冯培坚，在2002年自行成立了“巴华网”，经常转载当地中文报新闻，为当地华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资讯管道。另外，中华总会也与时并进，于2005年成立了“巴拿马侨网”及“巴拿马论坛”，为会员提供即时华社动态。
* 此外，巴拿马还拥有唯一的一个中文广播频道——1180AM中文频道，每日广播新闻和各种音乐节目。中文综合节目“雯雯与你，空中相会”，尤其广受欢迎。该节目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从早上9点至11点播放，内容精彩多元，主持人以鲜明活泼的港式播音风格，吸引了当地许多原籍广东、通晓粤语的听众，大部分是年轻的新移民。
* 早期巴拿马华人分散在奇利基、角纪利省、科隆、西部等地区，成立宗乡组织，如科隆四邑同乡会、巴拿马花县同乡会、巴拿马西部中华公所、旅巴四邑华侨联谊会等。眼见社团各自为政，缺乏一个中心团体，各地华社之后成立了一个联合性的代表社团——巴拿马中华总会。
* 前身为中华会馆的中华总会，成立于1943年，其宗旨为“以一个慈善机构联络感情，共谋全侨福利，发展华侨事业，促进中巴文化交流”。中华总会理事来自各个华人社团，当中包括花县同乡会、古冈州会馆、中山同乡会、鹤山公所、四邑华侨联谊会、人和会馆及清远从化同乡会等。各地区同乡会主席或会长自然成为中华总会理事，国内其他省份的华人组织也都派有代表参加。总会透过工作委员会，不断扶助会员，并负责协调各社团、商会、民间组织等。同时，总会经常在国内发生重大灾情时参与赈灾活动。
* 如今，许多成功华商以及新移民创业家，都是通过巴拿马同乡之间“充会”的方式筹集资金。长久以来，华社利用同乡经常会面的机会集资，再贷款给有需要的华人，扶助他们创业或扩展经营。这一筹集资金和互助互利的“充会”方式，对新移民尤为重要，直接推动、壮大了华人经济发展。
* 巴拿马华人在事业有成后，从不忘回馈社会。例如始自1998年的巴拿马电力通（TELETON 20-30）慈善募款活动，中华总会每年的捐款额均在6万美元以上。2007年，中华总会正式成为电力通主要赞助单位，旗下各大华团捐款总额更高达8万8000美元。该笔款项将资助巴拿马儿童医院，造福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华人的爱国之心获得当地社会好评。
* 拥有中美洲最大的华人族群，巴拿马华社引领着中美洲华社的互动与交流。巴拿马城自1966年召开第一届的中美洲暨巴拿马华侨恳亲大会后，续由中美洲各国的华社轮流举办至今。中美六国恳亲大会可称得上是历史最悠久的海外华人国际性会议，且已发展成该区华人联系的重要平台，成就许多共识与合作。
* 老一辈华社领袖在每一届恳亲大会交流，不忘邀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每年，中美洲6国都会举办各自的华侨小姐选美，当选的华侨小姐将代表该国华社参加“中美洲暨巴拿马华侨小姐选美”比赛。而中美洲中国青年会的成立，也是由该恳亲大会发起。

现今许多巴拿马华人后代已失去祖先的姓氏，主要是因为早期华人初来报到登记资料时，由于语言障碍，当地官员常把华人姓名中第一个字误填为名字，后两个字填为姓氏。例如，陈阿福，登记时他会说自己叫“阿福”，记录的官员只写“Apuy”，流传到后代就以“Apuy”代替了“陈”姓。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奇怪的西文姓氏便取代了华人原先的中文姓氏。

       这类姓氏当中，姓Ah-Kai者其原姓是Cheng，Vong-Chong则为Wong。也有原姓Chong的被误写为Lim-Yuen，Him姓登记为Naranjo，Ho姓改为Othon或Ocon。当时，许多华人终日忙于工作，无暇处理更正名字所要面对的繁杂手续，将错就错让填错的西文名字一代接一代继续使用至今，有些当地华人的原本姓氏早已无从考究。

       所以，如今可以直接通过音译姓名来辨别华人身份的可能性极低。尤其部分华人后代信奉天主教、取了教名，或父母为了方便以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干脆把孩子名字拉丁化，其中文名更是无迹可寻。

 在华人踏足巴拿马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充满了心酸与悲愤的历。他们为了寻找美好的生活，漂洋过海来到巴拿马，在不同的阶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修铁路、开运河到现代化建设，洒下的血和汗凝聚出无数的成果。

       如今，巴拿马华人已渐渐融入主流社会，开拓出一番新天地。巴拿马运河的扩建工程、科隆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无一不是华人在幕后默默推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踏实勤奋的华人是推动巴拿马二十一世纪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古巴离美国佛罗里达州两百多公里，是加勒比海面积最大、也是当今世上寥寥可数的孤傲国家。这里的统治者不理会世俗的眼光，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

       古巴由1600多个岛屿组成，气候温暖湿润，以蔗糖为主要经济支柱。古巴出产的雪茄，及由糖蜜提炼的兰姆酒更是闻名于世。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旅游业揭开了古巴的神秘面纱，到古巴观光成为许多旅游者的目标，而到这里则一定不要忘记欣赏一场古巴人的棒球比赛——这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全民运动。

       在1868年与1895年的两次独立战争里，华人曾积极投身于古巴的革命洪流中。他们舍身杀敌的功绩，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那坐落在哈瓦那市中心、8尺高的黑色大理石记功碑上这么写着：“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但是，1959年那场改变古巴命运的革命，也同样改变了华人的命运。那时，能离开的华人都走了，留下来的，在50年后的今天，绝大部分都只能靠着政府每月的配给静静度日。虽然最近几年华人新移民不断增多，但华社昔日的荣耀已一去不复返。

  最早抵达古巴的华人是以苦力的身份到来的。1847年6月，212名广东籍的契约华工飘洋过海来到古巴。他们到岸后立即被剥去上衣，热烫的铁条接着便在他们的身上烙下一个“C”字，表示他们是属于古巴的；然后被他们带往哈瓦那的人贩市场，分为上、中、下3种等级，全身赤裸地任买主看验估价，甚至被鞭打以测试其筋肉反应能力。

       买主选好并付钱后，便将这些契约华工送到种植园去劳作。他们在工头的皮鞭下一周工作7日、每日十三四个小时不停地劳动。在买主的眼里，华工的性命不值一文钱，他们仅是出卖劳力的畜牲而已。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每个月仅有几个古巴比索的工资。挨了数年，好不容易到了合约期满，原本约定的一张免费回乡船票却被雇主扣押下来，回不去的他们唯有留下来继续工作。

       那时候，客死异乡的华工们最悲凉的下场莫过于死无全尸。据记载，在古巴还曾经发生过糖寮用华工的尸体混杂牛马的骨头，燃烧成灰来提炼白糖的事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活着的时候已被压榨得不成人形，在死后仍然得不到全尸。

 1874年，被卖到古巴的华工已经多达14万3000人，被虐待致死的竟有1万7000人。由于回国无望，华工唯有留在当地娶妻生子，并且开枝散叶，这便是古巴目前数十万名混血华裔的来源。不过，华工在行婚礼的时候，非常坚持传统风俗，他们不愿意前往教堂结婚，只希望能在关公像前与当地妻子互相许下终身承诺。

       1886年，古巴取消了奴隶制度，获得人身自由的华工们陆续进入城镇，他们用累积多年的资金自行创业，或在华人的商店里打工。

       在短短数年内，华人所经营的商行、杂货店、洗衣店、旅馆等已经遍布全古巴。而那些走街串巷的卖货郎，以及自产自销的蔬菜小贩也活跃于各个社区。除了哈瓦那之外，古巴东南面的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Santiago）亦成了另一个华人聚居地。

       那时候的哈瓦那唐人街，是美洲最大、同时也是最兴旺的华人社区。这里极为热闹，烧腊点心铺、布店、药店、杂货店林立，还有好几家戏院和麻将馆，向来非常注重子女教育的华人也在这里建立了中文学校。

       1893年，一批华人在哈瓦那成立了中华总会馆，每逢农历新年或其他中国重要的节日，他们就会聚集在谷奇瑶（Cuchillo）与桑哈街（Zanja）之间，燃放爆竹、舞龙舞狮，热热闹闹地进行各项庆祝活动，一直到了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维持着这样的传统。

       1915年前后，中华总会馆筹资了数万元，设立颐侨院，专门收容那些60岁以上孤苦无依的老人，又购下一块国家墓地作为中华总义山，让华人死后能够入土为安。

       华人最后一次大量移民古巴，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到50年代革命的前夕，那时候，有不少华人因为中国动荡不安而逃到古巴来。

       但是，自从卡斯特罗宣布带领古巴走社会主义经济之路，华人又纷纷逃离古巴。卡斯特罗政府采取极为严格的国有化措施，没收所有人的财产，取缔所有私人经济，甚至连修补鞋子的小摊位也要收归国有，对华人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无数人的资产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短短的数个月间，华人人口非常明显地急速减少，能走的都移居到附近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留下来的旦夕之间都变成了领工资的劳动者，以往一片欣欣向荣的哈瓦那唐人街也迅速变成了落寞孤寂的街区。

       从那时候开始，美国海关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偷渡的古巴人能够抵达美国的陆地就算移民成功，不会被遣返。可是，倘若在海上被逮住的话，就只能遣送回国。1959年之后，从古巴移出的众多华人当中，可能大部分都选择前往美国。

   在推行社会主义治国的最初阶段，古巴政府全面禁止个人拥有私产，因此有些老华人就算想把私下收藏的三五千美元，留给自己的儿女也不行，因为一旦被政府发现，就会收归国有。那段日子，华人都不敢把钱存在国家银行，因为只要被政府发现在银行存入超过每月基本工资的钱，就会被当局彻查资产。

       自1959年古巴推行计划经济后，长期以来，古巴的经济就停滞不前，民生困苦，境内的年轻华人都已远走高飞。如今，这里只剩下198名老华人，他们都在65岁以上，祖籍包括广东四邑（开平、恩平、新会和台山）、番禺、斗门、顺德、九江等。他们大部分都在40、50年代之间移入，主要聚居在哈瓦那华区周围，其中有8名老人住在市中心的颐侨居里。

       另外这里还有多达10余万名混血华裔，除了少数几个混血华裔懂得华语，活跃于华人社区，担任中文教师、社团主席等职务外，其他人几乎都已不会中文。除此之外，现在在古巴所见到的年轻华人，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据悉，古巴华人是拉美地区华人社区里与异族通婚最多的群体，混血华裔改名换姓现象最为普遍。为留住即将消失的古巴华人历史，邵正和将军和现任中华总会馆主席的崔广昌等人，多年来积极致力于哈瓦那华区的挽救与复兴工作。但放眼来看，古巴华社暮气沉沉，前景依然不甚乐观。

    50年来，时间之神似乎跟古巴开了一个玩笑，整个国家好像依旧在原地踏步。在古巴留学6年的阳楚明说：“这里好像是中国大陆的80年代，但是那种感觉却又不太一样，好像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说不出的情绪是复杂的，也的确无法用单纯的思维去理解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仅就货币制度而言，古巴就比其他国家复杂得多。这里同时流通两种货币，华人称那类供当地人使用的货币为土比索（Cuba Peso），也就是古巴比索，称另一种供游客使用的货币为红比索（Cuba Convertible Peso），也称为可兑换比索。华人通常用土比索到国营商店和菜市场买东西，红比索则是到自由市场、超级市场、旅游区等地购买奢侈品时才派上用场。

       在古巴要赚红比索不容易，这里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是以土比索来计算的，每月平均只有300元左右（约12个红比索），如果是公务员则可以按薪水比例，每月获得额外的10至30个红比索补助。

       古巴的老华人多数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每个月可领取约200土比索。他们每天带着供应本，到指定商店领取一颗比拳头小一点的免费面包，像果汁、汽水这种要付红比索才能买到的奢侈品，他们可能要省上几年的时间才舍得去买。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在古巴赚到可观的红比索，就不要有物质奢望，不然日子会很难过。

    老华人说这里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政府并没有让他们挨饿。在古巴，只要有粮油供应本，每个月都可以用低价买到定量的日常所需，包括鸡肉、鱼肉、牛肉、大豆、米、菜油、肥皂、牙膏等。“面包、糖加水”就可以当一餐，当然不会饿死，只是想多吃些什么就要自己想办法了。有华人表示，他们有时半年也吃不上一粒鸡蛋，牛肉的话，恐怕要多走几家商店才能买到，鱼肉呢，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另外在供应本上有个特殊的栏目，就是每月老年男性可免费领取数支雪茄和4包香烟，7岁以下的孩童则免费配给牛奶。

       因为国家长期物质短缺，所以不得不实行供应本以保障国民基本生活所需。古巴民间常常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今天有的，明天未必有。”

       阳楚明说：“我就经历过市场上足足两个月没有卫生纸的日子，那时候有机会去酒店，就从那边悄悄带些出来，不然能怎么办？”那种感受当然不好，因此她后来也养成了生活必需品在有的时候就尽量多买的习惯。

       4卷卫生纸要价1.5红比索，按照当地收入来看，真不便宜。阳楚明这样的留学生没有供应本，许多生活用品就得到红比索商店购买，开销很大。不过她认为自己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只要省一些，对生活不要太计较就行。“其实现在的古巴比以前好很多了，尽管现在有钱还是买不到一些想要的东西。”她说。

       在劳尔（Raul Castro Ruz）未接任哥哥卡斯特罗的总统职务以前，古巴华人简直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除了通过外国游客得知外面发生的事情外，就没有其他管道了。直到2008年劳尔上任后，政府才逐步放宽通讯限制，开放手机市场，也批准国营商店向个人售卖电脑等。

* *在1961年4月17日猪湾事件发生后的隔天，古巴华人为保家卫国而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华侨民兵队，这支编号179的民兵队被称为黄淘白（Jose Wong），是为了纪念在1939年遭政治谋杀的华人革命领袖黄淘白。此后每年的4月17日，古巴社会主义同盟都会为这位古巴革命先驱者、革命组织保卫工农联盟领导人及民兵队举行纪念活动。*

       尽管有进步，但从国外拨电话到古巴，费用依然高昂，且通话也不清晰，要想跟古巴华人通过电邮联系，也要等上好一阵子才会有回应。

       目前，古巴互联网的发展很不均衡。在大学校园内已经可以使用无线网络，但在一般百姓家里还是不能自由上网。古巴华人想要上网，只能到特定地点，费用每小时要价6个红比索。外国人则可以自由申请互联网服务，月租费约合28个红比索，限用30个小时。

       一名中国留学生说：“因为网速慢，费用昂贵，而且有时间限制，所以我每次都只是上网发邮件，内容都是离线打好后粘贴到邮件上的。”

  古巴人喜爱读报，最受欢迎的《格拉玛报》常在开卖两个小时后就会售罄，如果想看，就只能从起早摸黑去排队的古巴人手上用多出几倍的价钱购买，常常一份原价20分土比索的报纸，二手价高达80分或100分。

       在龙岗亲义总公所等待免费午餐的81岁老华人李鼎来，就习惯每天清晨6点半到报摊去排队，买格拉玛报来看。不过，他却不一定买得到，因为许多人比他来得更早。对古巴人来说，虽然转手卖报纸的收入不算可观，毕竟也是一个额外收入。

   龙岗亲义总公所旗下的餐馆，是华区唯一提供免费午晚两餐给无依无靠的老华人的地方，老华人把这里称为“老人食堂”，每天中午11点半都可以看到数十名老人聚集在这里用餐。除了吃午餐，他们也自带餐盒把晚餐带回家。

       90岁的马熙平是“老人食堂”的常客，1948年从中国大陆来到古巴。数年来，他前后6次想离开古巴，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成行。马先生这样的经历，也是许多老华人的写照。

       由于这里物质匮乏，“老人食堂”虽然有政府资助，免费供应的饭菜也仅仅是一块小小的肉，一小碗由黄豆或黑豆熬成，时淡时浓的汤汁或面条汤，再加上一小堆有点干硬的白米饭。对这些孤苦无依的老人来说，虽说不上美味可口，但至少还能够填饱肚子，因此，他们都很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食物。

       除了龙岗总公所，古巴洪门民治党旗下的餐馆，也一样每天免费供应午晚餐给老华人，但是来这里用餐的人必须是民治党的会员才行。

   在哈瓦那除了唐人街的十家中餐馆，还可以看到另一类别具一格的餐馆，那便是由华人社团所经营的中餐馆。有趣的是，这些餐馆的名字就是社团的名称，餐馆的老板就是社团的主席。这些社团主席，必须是华人或华人后代才有资格担任。

       中华总会馆是古巴最大，也是唯一没有经营餐馆的华人社团。第二大华团是民治党，社会主义同盟排在第三。其他有黄江夏堂、李陇西公所、九江公会、余风彩堂、安定堂、朔源堂、至德堂、陈颖川堂和中山自治所。另有一家林西河堂已宣告倒闭，现在成为古巴武术学校办事处。

* *古巴是拉丁美洲地区最早出现华人社团的国家，即1867年由古巴华人钟熙等人在哈瓦那市成立的“结义堂”。*

古巴每一个华人会馆的会员，每年都必须缴交12个土比索的会费，他们除了可以参加新年聚餐外，会馆每个月也会为当月生日的会员搞生日会，并派发一袋小礼物。这样的福利在古巴非常少见，因此许多人都希望成为会馆的成员。只不过入会并不容易，一定要提出确凿的华人血统证件才行，以杜绝有人冒充华人后代。

       古巴至今仍不允许私营机构的存在，但是在哈瓦那却有华人私人餐馆，原来，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与古巴的友好关系，以及华区促进会的努力而促成的。

       华区促进会成立于1993年，由邵黄将军和一群古巴华人在庆祝中华总会馆成立100周年时所发起。当时，他们委任拥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背景的华裔伍月梅，规划重建华区的蓝图。

       伍月梅指出，在重建计划中，除丁修复华区老建筑外，他们也希望能延续中华文化的传承，因此，他们的规划定期举办中华文化活动及文娱表演。不过，这样的计划需要大量资金，那时古巴经济极度低迷，政府根本设有资金拨款协助华区的整修。

       这时，华促会想到了自给自足的方法，便向政府申将唐人街内的9个店面规划成餐馆特区。然后他们再把执照发给华人或华裔，与他们合作开设私人餐馆以筹集资金。这项计划除了能招揽游客促进观光业外，也能筹到数修华区的经费。

       后来，华促会把这个概念扩大使用，与华人社团合作馆，挽救了许多因严重短缺经费而濒临关门的社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会馆和餐馆合二为一的原因。

       与华促会合作的餐馆在运营初期，华促会每周都会调查餐馆的成本和利润，经过计算再决定每周该向餐馆收取多少营运费用。

       华促会还建立了老华人养老院——颐侨居、古巴武术学校和中国传统艺术馆。其实，对伍月梅来说，自己不仅不懂中文，对中华文化的接触也非常有限，复兴华区的工作对她而言是很艰难的任务，她说：“能够走到现在，真是很不容易。”

       尽管华促会已在2000年解散，但是伍月梅坚持传承中华文化的决心却仍未消失。她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回到华区转转，看看这里的发展状况。

   现阶段，华区内的古巴武术学校已经办得有声有色，每周一至周六的上午7点半到9点半都会看到学员在这里练习武术，有时舞剑，有时挥拳，有时耍棍。

       武术学校负责人李荣富说：“我们主要教学员两种修身养性的功夫，分别是导引养生功和练功十八法，小孩、年轻人、老年人、生病的人都可以到我们这里练功。”

       该校目前有5000多名学员，全古巴包括公园在内，共有50多个不同的练习场地，全国有40多名武术老师。

       值得一提的是，李荣富的一名华裔女学员黄美莲的表现非常出色，常常能在古巴的电视节目如“看中国”中，看到她的表演。黄氏曾到北京学习过数年武术，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另外一位必需介绍的华人，是在中国传统艺术馆教授普通话的邓小荣。当年他也是华促会的成员之一，是难得会说广东话和普通话的纯血统华人。

       “我之所以能够说流利的广东话，是因为我母亲以前在家里开班教小朋友广东话、唱歌和玩游戏。所以从小我就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学习。”后来他发现，如果想要更透彻地了解祖籍地的文化，必须学会普通话，所以到林肯学校去上课。

       当时，林肯学校是古巴唯一能学普通话的地方，华语教师也只有一个，他就是冯啸天。邓小荣去上课的时候，冯啸天已经在那里教华语30余年了。

       邓小荣说，冯啸天在世时，除了当华文教师之外，也曾担任过华文报《光华报》的总编辑。1995年在中国传统艺术馆里成立的华文班，也是由冯啸天一手创建的。对于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的贡献，冯啸天功不可没，直到去世数年后的今天，古巴华人仍会常常提起他。

       一位中文名叫美兰的古巴华文教师，很努力地用生硬的华语解说道：“除了星期天以外，这里每天都上课，上课时间从傍晚到晚上8点，每个月的学费是20个土比索。华文班分成一至四年级，念完四年级后可升到高年级。”她对华文有浓厚的兴趣，也是冯先生的学生，她的女儿目前也在这里学华文。

       此外，艺术馆在周六还另外开设免费的普通话和广东话补习班，而教师就是平日在傍晚上华文课的学生，他们都是义务教师，学员则从小学生至50多岁的老人家都有。这里的师生非常希望中国政府能派出正规的华文教师到古巴授课，毕竟这比学生做义务老师强多了。

  1868年，古巴的独立之父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Céspedes）为了反抗残忍的西班牙殖民者，带领古巴人民展开第一次独立战争，而契约华工们为了替惨遭棍打鞭笞致死的同胞们讨回公道，也义无反顾地从庄园逃出来参与这场斗争。

       在这次的独立战争期间，有一位名叫Tankredo的华人中尉，作战时遭西班牙军队逮捕。当时，西班牙人误认为他仅是一名“苦力”而要将他放走，可是一身傲骨的他却从口袋里取出文件并交给对方看，以证明自己是“古巴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并非苦力，然后他说：“射吧！”请对方了结自己的性命。另一位名叫Pio Cabrera的华人战士则是在1878年的一次战争当中，为了掩护战友安全地转移阵地，而独自一人面对50多名西班牙殖民军，直至壮烈牺牲为止。

       到了1895年，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领导人民展开了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华人军官胡开枝把他的全部财产都捐作革命军饷，并以大量的粮食接济古巴革命军。在革命结束之后，胡开枝曾经担任圣克拉拉（Santa Clara）省的卫生局长、哈瓦那移民局领导等职。他一生性格豪迈，且乐善好施，死后被古巴政府授予上校军衔，安葬于中华总义山。

古巴华侨纪念碑，为纪念华人参加两次独立战争中的贡献，上面刻着：

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

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在长达30年的独立战争当中，有成千上万留着辫子的古巴华人投身革命洪流，当时有数支部队是由华人所组成。一名古巴老华人自豪地说：“那些西班牙军很怕我们华人军队，他们都以为我们华人会武功，很能打又不怕死，还没有跟我们的先辈正面交锋就已经被吓坏了。”

       1938年于古巴马坦萨斯省出生的华裔将军邵正和（Moisés Sío Wong），曾经与古巴领袖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并肩作战，一起投身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目前，他是古巴储备局局长兼古中友协主席。

       卡斯特罗曾问过他，到底有多少名华人参加古巴独立战争和革命战争？邵将军回答说他也不知道确实的数字，因为有许多华人已经改用西班牙名，仅从姓名上完全无法分辨他们的身份。不过，保守估计前后至少有一万多名华人参与两次的独立战争，而参加卡斯特罗革命战争的，则可能有数百人。

       为了纪念这些在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华人勇士，仍在古巴生活的华人于每年的清明节，总会到哈瓦那市滨海大道与Reina街交汇处那8尺高的记功碑，以及中华总义山的先烈纪念碑敬献花圈，以表达对先贤的敬意。

    哈瓦那市中心的德拉贡乃斯街（Dragones）是华区的入口处，那里有一个写着“华人街”3个大字的中式牌楼。这条华人街是1993年经过华区规划和整修后而形成的。

       走过4个街口，眼前出现了另一座小小的“中国城”牌楼。从牌楼下走入华区，常令人疑惑，这里真的是华人区，抑或仅是一个招揽观光客的旅游景点？

       没错，这条满是游客的步行街，就是昔日唐人街的原址。入口处左边，挂着残旧招牌的金鹰戏院仍在营运，只不过，观众早已不再是华人，而是当地人。

       有50%华人血统，只会说西班牙语的古巴社会主义同盟主席沈先莲，回忆父亲在世时的生活时，也聊起了自己当年在戏院玩耍的经历，她的父亲以前在市场卖猪肉，她小时候最喜欢跟着父亲到唐人街的社团、公园、餐馆和戏院送肉。

   “有时，父亲没办法照顾我，就把我放在戏院看戏。我最喜欢戏院里的卡通片，虽然我懂的中文不多，也看不太明白卡通片的内容，不过戏院里会有人解说，所以我很喜欢去戏院。”她回忆说。那时，除了新大陆戏院，还有一家新民戏院，另外还有演出粤剧的上海大剧院。不过现在都已拆除，只剩下金鹰戏院。

       父亲是华人，母亲是古巴人的中华总会馆书记周卓明，对唐人街里的电影院也有很深刻的记忆。他说自己的广东话和普通话就是从电影里学来的，小时候自己总喜欢往电影院里钻，还依稀记得一些那时候放映的电影“宝莲灯”、“黄飞鸿”、“方世玉”……“那时，每周都会有一部华语新片上映。”

       老华人说，虽然这里的街道依然和从前一样热闹，只不过，一切已变了样，从前的永兴隆、广生荣、万草和、两利、恒安隆、广昌隆等老字号，都已经找不到痕迹，现在这里只有排列在两旁，由华人或者华裔经营的十家中餐馆。

       事实上，真正由血统纯正的华人经营的餐馆只有两家，其中一家是东坡楼，业主是已经在古巴生活了60多年的老华人陈钊森。

       另一家是1997年由李荣富夫妇所开设的天坛饭店。李荣富只有1/4华人血统，太太陶琦则是在1995年和父母来哈瓦那寻找商机的上海人。

       为了吸引游客，这里的中餐馆装潢，必不可少的就是红灯笼、鞭炮、对联，还有佛像。而为了配合天性浪漫的古巴人，这里所有餐馆的室内照明设备还特别采用了昏黄的灯光。

       岁月沧桑，昔日鼎盛的唐人街，如今已很少看到华人的踪影，特别是年轻华人。没有人知道这条唐人街究竟承载了多少故事，但是每当走过这里，就会隐隐地让人感到有些悲凉。

 百余年来古巴华人的命运，随着古巴的发展而大起大落。

       他们经历过腥风血雨的独立战争，也历经过从腰缠万贯到一贫如洗的日子。对他们来说，以前的日子是值得缅怀的美好回忆，但是现在的日子过得也不算太凄凉，虽然手头没有几个钱，却能平静地安度晚年。

       他们之中有人到死都还想着回中国看看，只不过能如愿以偿的并不多。也有回过中国几次却还是选择回来的老华人。

       或许他们回到哈瓦那，每天抽劣质雪茄，跟老友打上两圈麻将，然后在华区闲逛几圈再回去休息，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才能让自己安心吧！

       许多人都有顾虑，华人总有一天会在古巴完全消失，中华文化会在这里灭绝。然而，依照目前的发展看来，中华文化似乎还能苟延残存，只是今后如何发展，就取决于华人今后的动向了。

    牙买加风光旖旎，每年接待至少100万名游客。除了旅游业，铝土和蔗糖也是重要的经济支柱，其中铝土产量位居世界第三。

       牙买加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却融合了非洲的诡谲氛围、西班牙的华丽风格及英国的贵族传统，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它以蓝山咖啡闻名于世，在贫民窟长大的鲍勃马利（Bob Marley）则创造出风靡全球的雷鬼音乐（Reggae Music）；而短跑飞人博尔特（Usain Bolt）更是横空出世，连创佳绩，叫人啧啧称奇。

       经过百余年的岁月洗礼，华人已逐渐从小型咸头铺（Ham Tdiu Poo）老板，蜕变成零售业巨子。早期华人一般对这里怀有深厚的感情，很少想过离开，但随着当地治安每况愈下，新移民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熟悉的画面周而复始地上演着。

 早在1854年，华人已经取代黑奴而到牙买加的甘蔗种植园以及糖厂来工作，其中包括英国殖民政府从中国广东招来的客家华工，还有由巴拿马转移到此地的契约华工，共有472名。

       这一批华人刚抵达牙买加不久，大多数便因为健康欠佳，或无法适应当地环境而相继死去，只有极少数人存活下来。

       在合约期满之后，有者选择回国，也有一些人移民到其他国家去，而决定留下来的则各自创业，有的从事批发行，有的开咸头杂货铺。

       从1864年至1870年之间，又有200名左右的契约华工，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或圭亚那迁移到这片土地。而第三批华人移民则是在1884年直接从中国乘船过来，主要是来自广东东莞、宝安和惠阳3县的客家人。在这之后，陆续抵达牙买加的华人大多数是这批客家人的亲属。

       另外，也有一些来自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的华人，他们中包括了男性、女性以及婴儿共680人。

       1893年，牙买加华人增至800多人，他们大多集中在金斯顿市中心创业。此处开始成了华人主要的活动地点，中国城也就逐渐成形。经商的华人收入日益丰厚，商店也逐渐由小型转为中型规模。

       1904年，这里的华人筹资修筑中华义山；1923年，他们开设了华侨留医所；1924年，新民学校成立，供华人子弟学习中文，华人社会日渐成熟。

       1950年代，华人在牙买加的经商势力，已经从零售业扩展至食品制造业以及轻工业等。那时，华人拥有全国最大的冰淇淋厂以及数家大型超级市场；同时，华人在面包业也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外，还有部分华人将触角伸至电影、保险、旅游以及房地产等行业。

       根据统计，牙买加当时大约有两万多名华人，其中超过半数是纯华人。在这一个倡导“来自多元，一个民族”（Out of Many，One People）的国度里，华人的身份认同逐渐倾向于华裔牙买加人（Jamaicans of Chinese Origin）。

       到了70年代，牙买加开始向古巴靠拢，在国内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政治倾向引起社会恐慌，许多华人担心本身的私产会遭国有化，于是以低价变卖产业，接着迁往加拿大、英国、美国以及圣马丁岛等地展开新生活。

       那段时期，牙买加华人人口大减，各地的商店可说是十室九空，仅有数千名华人选择留了下来。

       80年代末，牙买加积极推动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吸引了大批华人前来谋生。此后，华人群体更趋多元，除了客家人，也有很多来自福州、温州、广州等地的移民，另外，还有一些因为苏里南的政局动荡而来到牙买加的再移民。

       90年代中期，华人人口回升到两万人之多，这一个数目至今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牙买加住着一万多名土生华人，祖籍以广东东莞、宝安和惠阳3县为主。他们大部分已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不会说家乡话，平常以英语或帕托阿语沟通。然而，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还是相当重视，如农历新年会吃团圆饭、清明时节举行公祭（Gah  San）等等。他们在各自领域也都有亮眼的表现，零售业巨子Wayne Chen、音乐家Bryon Lee、国家商业银行（National Commercial Bank）大股东Micheal Lee Chin就是当中的佼佼者。

       至于新移民，尽管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日子，但投入的感情并不深厚。对他们来说，牙买加不过是移居加拿大或美国的跳板，赚够了钱就会离开。究其因，他们说：“这里治安越来越差，政府又束手无策，我们每天做生意都不安心，所以才会想着离开。”

土生华人长期从事零售业，占了极大的市场份额，早期开设咸头铺的经验，乃是他们经商的最大优势。Super Plus Food Stores掌舵人Wayne Chen的父亲，就是靠在穷乡僻壤开咸头铺起家，目前拥有25家超级市场连锁店。

新移民也大多追随前辈的步伐，开设咸头铺或从事批发业。单单就金斯顿市中心和蒙特歌湾（Montego Bay）的大街小巷，就能找到上百家华人杂货批发店。另有一些华人选择开设超级市场、中餐馆、快餐店、面包厂，或在华人店铺打工。

    开咸头铺是牙买加华人的传统行业。早期华工在契约期满后，就陆续在全国各地开起这类主要售卖日常食品，如咸牛肉、咸猪皮、咸猪尾、咸鳕鱼、咸马鲛鱼的店铺，顾客大多是市井小民。

       早期开咸头铺的华人，通常会就近住在店铺楼上。华人初来乍到，往往连一句英语或帕托阿语都不会说，也不晓得怎样做生意，只好默默观察顾客的眼色，接着拿起竹竿轻敲着货品，问说“This？That？”直到顾客点头或回答“Yes”，才把货品取下来。

       今天，首都金斯顿的公主街（Princess Street）聚集了至少20家华人咸头铺和批发商店，但从店名或店铺外观，根本难以判断老板是否为华人。店内架着铁栅栏，从地上延伸到天花板，只有探头细看，才能发现一张张躲在铁栅栏后的华人脸孔。他们有的是坐在特意筑高的柜台往下监看员工的“掌柜”，有的则是在铁栅栏内忙进忙出拿货的伙计。守在第一线的通常是当地黑人。来这里购物的顾客，其实无法随心所欲地浏览，他们只能隔着铁栅栏说出自己想要的物品，再请店员帮忙取货。

       在蒙特哥湾的超级市场则大开门户，让顾客任意选购商品，而老板就在柜台上方的阁楼，观察店内的营业状况。就此，华人店主剖析道：“我们这么做，不但较容易抓到小偷，而且能更快察觉到匪徒有所行动，以防受到攻击。另外，疲倦时也可以小睡一下。”约15尺长，6尺宽的空间，可容纳一个单人床架、一张办公和电脑桌，除了去厕所、出外办事，华人一整天几乎都会呆在这里。

  基于牙买加法律极为注重对女性的保护，这里的男性一般都不敢随意碰触女性，所以只好耍要嘴皮子，转以轻佻语言来占女性的便宜。

       在蒙特哥湾与先生一起经营咸头铺的古绮云（Sweetie Liu），就常常碰到黑人顾客向她示爱。她说：“那些游手好闲的黑人，不管你已婚未婚，只要看到你是华人就喜欢把‘Do you want to marry me? I really love you!’(我真的爱你，嫁给我好吗？）挂在嘴边。你如果不搭理，他就用帕托阿语骂你几声，骂完之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向你示爱。”他们乐此不疲，就是好玩。

       刚到这里的华人女性几乎都有过这般境遇，所以她奉劝各位女性切勿躲躲闪闪，只要强势应对，他们也就知难而退。

       Wayne Chen出生于牙买加，却不受当地复杂的男女关系影响。他说：“我认为父母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对婚姻的忠诚、做生意的居安思危以及对儿女教育的关注，我会想办法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

牙买加华人女性倾向于与华人男性结婚，在她们看来，华人比黑人男性来得可靠。黑人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对生活没有太多规划，反观华人，大多拥有稳定的工作，或自己开店做生意，无论是经济能力，还是对伴侣的忠诚度，都比黑人高。

       在中华会馆担任中文教师的苏燕指出：“我教的牙买加男学生都已成家立业，有好几个孩子，但向我介绍他们的妻子时，还是用‘This is my girlfriend’（这是我的女友），跟我们很不同。还有几个50多岁的学生，子女都在国外，都是自己或跟父母一起生活，从不提起另一半。”

       华人男性，则大多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也是华人。不过，由于到牙买加谋生的华人男性比女性多，讨到华人老婆的机会便相对少了，因此许多已届适婚年龄的华人男性，若在本地无法找到合适对象，一般会通过媒妁之言来完成终身大事。

       选择与当地人一起生活的萧德文（Siu Tak Man）则说：“感情的事没有种族之分，缘分到了自然就会在一起，我跟她很合得来，我开店她帮我很多，我们不常吵架，只有讨论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才会出现争执。”

       一个是23岁时才从香港移居牙买加的华人，一个是在当地出生的黑人，双方的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截然不同，唯有多番磨合才能在感情路上走得更长久。

       经历了一次抢劫事件后，他就萌生带妻小回香港的念头，只是担心家人无法接受他与当地人结为夫妻的事实。尽管如此，他还是乐观地认为：“孩子都生了，他们还能怎样？”

 土生华人与新移民之间难免会一些文化上隔膜。由于新移民不会说英语或帕托阿语，而土生华人又对华语或家乡话一窍不通，故此，土生华人与新移民的交流可说是几乎等于零，新移民一般也不会去参与当地华人社团所举办的活动。

       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移居牙买加超过20年，现任中华会馆会长的陆康华（Wilson Look-Kin）意识到这一点，希望能通过中文教育来促进彼此的互动。他说：“当务之急就是大力开展中文教育，让我们的后代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此外，土生华人和新移民聚在同一间教室上课，也提供了多一个相互交流的管道。”

牙买加中文班由新民学校首办。新民学校于1930年易名为华侨公立学校，40年代获得大力发展，学生人数高达300人，但由于师资、经费短缺，50年代开始改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语为辅的方式授课。中文班曾一度停办，直到近年才由中华会馆复办。

       目前，中文班的一切教学工作，都由中国公派教师苏燕负责。她亲自教授周一至周六的中文学习班，包括成人班、儿童班、汉语考试辅导班等，工作压力着实不小。会馆希望能多找几名教师减轻她的负担，但这里的中文人才不多，中国公派又须等上一段时间，现在唯有由苏老师一个人支撑。

       华语在牙买加只属外语，受重视程度远远不及英语和帕托阿语。苏老师有些泄气地说：“班级太大，时间太短，很多学生又常常迟到，能学到的就更少。加上这里没有一个让小孩说中文的环境，这个星期学的可能下个星期就忘记。”其实，她了解学生所面对的问题，却无法做出什么改变。

     牙买加有一份免费派送的中文报纸——《蓝山侨讯》（The Blue Mountain Journal）。这份出版将近30年的报纸，由华人协会资助。现阶段由来自中国的李蕾琴（Maria Lee）和来自印尼的吕启明（Lui Kai Meng）担任中文和英文编辑。《蓝山侨讯》每月出版一次，印刷1000份，内容包括英译的中国大陆新闻以及中译的牙买加新闻。

       兼做中医自然疗法生意的李蕾琴说：“我们都是这份报纸的义工，因为这是一份免费的刊物。我们主要是为华人服务，让华人有个发表心声的空间，同时也希望让刚来这里的华人多了解他们周遭发生的事情。华人来到牙买加，却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那是没有意义的。”此外，她自费将报纸送到国外，希望外界更了解牙买加华人的动向。

       至于华人所办的英文媒体，以前有《宝塔》（The Pagoda）杂志，现在则有中华会馆不定期出版的《中华会馆通讯》（CBA News）。《中华会馆通讯》涵盖面广泛，内容包括当地杰出华人的专题介绍、华人节庆的由来等等。

       除了提供讯息，这份刊物也是会馆与会员之间的沟通桥梁，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每逢公祭，会馆将在会讯注明祭祖的时间；中秋节将至，它也广邀会员前来参加聚餐。陆康华说：“至少我们每年清明祭祖时，能看到许多华人面孔，比较可惜的是，新移民鲜少参与。”

       农历新年期间，中华会馆也会推出一份随《新闻集锦日报》（Jamaica Gleaner）星期天刊附送的英文特刊，专门介绍牙买加华人过去一年在音乐、科学等领域的发展与贡献。这仅有助于华人更了解自身群体的动向，也是当地社会了解华人群体的一扇窗。

  在牙买加，除了店铺，新移民最常出没的，该是教会了。早在20世纪中期，当地华人就试图通过信仰基督教，融入当地社会；如今，新移民则是从宗教信仰寻找心灵慰藉。

       这里共有两所华人基督教会，一所是金斯顿的牙买加华人基督教会，另一所是蒙特哥湾宣道会。天主教和佛教由于信徒不多，至今仍未设立教会。

       蒙特哥湾宣道会发起人之一陈婉燕（Nancy Poon）说：“平日出席教会活动的信徒大约20至30人，而受洗的华人将近300人，多数是新移民。”金斯顿的教会人数，则比宣道会多出好几倍，有土生华人，也有新移民。对信徒来说，教会不仅仅是每周日必须报到的地方，更是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场所。

   蒙特哥湾没有华人社团，因此每当华人碰到难题，总会第一时间向宣道会求助，位于金斯顿的中华会馆和中国大使馆，可说远水救不了近火。许多新移民初来乍到，无法适应新环境或内心积累太多压力，都会找牧师倾谈；与雇主产生纠纷，也会透过教会去调解。

       以1999年抵达牙买加的熊琼霞为例，她当时在一家华人纺织厂工作，后来结婚生子，没想到丈夫在一次争执后离家出走。从那时起，她便独立撑起整个家，日子并不好过，所幸她从宗教信仰找到精神寄托：“对我来说，‘主’真的非常重要，他让我找到生活下去的力量。”她非常希望“主”会把丈夫带回他们身边，毕竟年幼孩童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另外，教会也撮合了不少佳偶。许多华人刚抵步，语言不通，通常会选择加入教会，开始结交新朋友。日子一久，许多男未娶、女未嫁的单身男女就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蒙特哥湾宣道会近几年曾多次举办结婚典礼，在牧师的见证下，新人在三房一厅的教会活动中心许下终生承诺。

   在牙买加常常会听到华裔被称作“十一点”（Ship Yit Diam），关于它的由来，有两种说法。据当地华人作家钟全安解释：“一跟十合起来就成了“土”字，代表土生华人。”在蒙特哥湾经营超级市场的潘文健则持有不同的观点：“十二点是正中间，指纯正华人，十一点少了一点，就是指不会说华语或家乡话的华人后代。”

       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许多华人新移民也入乡随俗，把跟自己没有共通语言的华裔称为“十一点”。

       华商对这个称谓相当抗拒，因为他们觉得带有歧视意味。然而，牙买加知名媒体从业员李逢生却认为：“当你知道你是谁，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你就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即使被人当面称作“十一点”，他也丝毫没有受歧视的感觉。

       此外，当地人常会以Miss/Mr.Chin来称呼华人，“如果刚好姓陈，可能会感到诧异，如果不是就会莫名其妙。”

       对此，华人不厌其烦地解释道：“早期到来的华人，以广东东莞陈（Chin）姓客家人为主，郑（Chang）曾（Chong）李（Lee）姓的客家人也不少。当地人对华人这4个姓氏印象较为深刻，所以只要看到华人面孔，就会称他们为Miss/ Mr.Chin，或换上其他3个姓氏。”这与通行中南美洲的“Chino”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当地人来说，华人的名字并不好记，于是索性把常见的姓氏当作对华人的统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牙买加华人基于当地政局动荡而移居国外，后来形势逐渐明朗，部分华人选择回流，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这里始终是他们的家。

       今时今日，这个国家尽管称不上人间乐土，但是其独特的风土民情还是充满着魅力的，也难怪这里的华人大多不舍得离开。

       所以，初来乍到的华人如果对这片土地没有什么好印象，那只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不够长，因此，若是还没来得及发现牙买加的美好，就匆匆决定移居他方的话，那就真是太可惜了。

    与海地（Haiti）相邻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位于加勒比海第二大岛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东部，占该岛三分之二的面积。首都圣多明各拥有历史悠久的教堂、医院、法庭，名胜古迹随处可见。

       相继被西班牙、法国、美国统治过，多米尼加如同文化大熔炉。外来与本土文化碰撞出独具特色的多米尼加风情。温暖的阳光、蔚蓝的海水和洁白的沙滩，更让游客流连忘返。此外，制糖、咖啡和卷烟工业也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

       国内贫富悬殊，基础设施不完善，时而断水断电，但当地人总是乐观以对，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而华人到来，也不过是为了一圆淘金梦。秉持这股信念，华人目前已占据当地快餐和汽车旅馆业的领导地位，并把触角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

 据记载，最早来到多米尼加的华人应该是于1862年抵达的。这批华人大部分是契约华工，以来自广东的台山和恩平人居多。

       住在多米尼加已有50年的华人律师何荣欣披露，第一名出现在多米尼加历史上的华人，名字叫李潘乔（Pancho Lee的音译），曾经参与1864年的复国战争（War of the Restoration）。

       另一位名留史册的华人是华商Gregorio Riva。他从古巴引进了少数华工，前往多米尼加的希巴欧（Cibao）生产砖块以及生石灰。之后，这一批华工先后到萨马纳（Samana）、尤纳（Yuna）和莫卡（Moca）定居，并各自发展本身的事业。

       在1920年代，多米尼加的移民政策比较宽松，因而吸引了更多华人移居到此地。抵达多米尼加后，他们大部分在章鱼养殖场、洗衣店及餐馆里工作。之后，也有一些华人陆续在城镇做起生意，并且带动了当地零售业的发展。在1940年代的多米尼加，售卖汽水、果汁、啤酒、三明治、烤面包的华人“凉水馆”（即茶餐室）随处可见。

       1950年，这里的华人人口已经达到455人，以广东恩平人居多，也有一些从古巴迁移过来。当时，华人的经济渐具规模，许多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陆续转型为超级市场。圣多明各的杜阿特街区（Duarte）汇集了多华人商店，唐人街开始成形。另外，一些华人也开始经营菜园，以满足当地的日常所需。

       到了1960年代，一名吴姓钟表师傅从香港移居到多米尼加，并引进了钟表珠宝的营业概念，在当地掀起一股热潮。那时候，华人修理钟表的技术精湛，加上信誉良好，以致华人钟表业一度占据了95%的市场份额，华营钟表店曾经多达80家。

       在1966年抵达多米尼加，而今已经移居美国的岑灼槐说：“我到多米尼加替一位同乡的叔伯打工，主要是做首饰和修理手表。那里聚集了数千名华人，光是我们的那一家店就有十多人在工作。”对那时的生活境况，他仍然记忆犹新：“在这里，人们都十分热情、友善，不会歧视华人。有的甚至还认为华人高人一等。”

在累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华人便陆续投入其他行业，数名华人于1963年合股在圣多明各建起第一家名为“皇宫”的汽车旅馆。

       1980年代初期，此处的华人人口增至5800名，主要分布在圣多明各以及其周边城镇，除了投靠亲友的恩平人之外，也有来自香港台湾的投资移民。

       为了使新来的同胞更快融入多米尼加的主流社会，华侨总会开始出版《侨讯》，可惜后来因为缺乏人才和资金，在1990年代中期被迫停刊。

       1990年代以后，大批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移民抵境，使华人人口迅速膨胀。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主要经营利润丰厚的炸鸡快餐店（Pica Pollo）和指甲彩绘店；来自台湾的移民则多数是投资商人。

       2006年之后，多米尼加华人人口达到百余年移民史上的最高峰，并持续上升。华人主要分布在圣多明各、那罗曼拉（La Romana）、圣地亚哥（Santiago）等地，他们大部分从事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

       据华侨总会统计，多米尼加目前有两万多名华人，主要是广东人后代，以及来自中港台的新移民。土生土长的华人，大都说西班牙语、英语，会说家乡话或华语的少之又少。在这当中，较受瞩目的是鲜花基金会主席吴玫瑰。她不仅积极推动中国城的兴建工程，也筹备出版《多米尼加华人移民史》，记录19世纪至今多米尼加华人的移民概况。在当地华社提起吴玫瑰，几乎无人不晓。可惜身为混血华人的她不会说华语，但她的儿子曾到北京修读十个月的华语班，简单对话不成问题。

       百余年来，华人在多米尼加发展顺遂，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而当地人对新移民也抱持开放态度，华人可以自由从事任何工作，当医生、教师、会计师、律师、作家或经济学家的，不乏其人。

       在多米尼加的大城小镇，不难找到华人开设的炸鸡店，粗略估计，全国大概有500家。华侨总会秘书陈佩珠说：“华人开的炸鸡快餐店数量很多，就连全国连锁快餐店集团，也快要被我们逼出市场。”

       近年迅速崛起的，则是由杨浩文和一名来自美国的越南华人引进的指甲彩绘店，全国约有70至80家。多米尼加约有50家华营汽车旅馆，绝大部分集中在圣多明各郊区，而经营杂货店、超级市场、进出口贸易、食品买卖等生意的华人也不在少数。有的华人还投资经营高尔夫球场和乡村俱乐部。

       多米尼加华人人口虽少，但经济影响力不容小觑，难怪总统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Leonel Fernandez Reyna）非常关注华人在当地的发展，并呼吁当地人多花时间学习中文。

吴玫瑰推动中国城的兴建工程，贡献良多。

在多米尼加开炸鸡店只需几万美元成本，但想从这盘生意赚钱，必须靠长时间营业及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

指甲彩绘店是华人的新兴行业。

每天上午9点，华人业主就要到市场买鸡肉、大蕉、木薯、猪蹄、牛腩等食材，然后赶回店内烹煮菜肴，完成后即放入保温柜内。到了11点开门营业，客人陆续进来点菜，才能稍稍喘一口气。一般华人店铺会营业至深夜12点，有些甚至到凌晨一两点才打烊。他们大多全年无休，或只在生日时放自己一天假，余下的时光都献给工作。

       炸鸡店老板每天就在炸鸡、砍鸡、炒菜中度过，而身为太太的，除了服务顾客和收钱外，还要处理许多突发事件。旺角炸鸡店老板娘陈佩珠表示，自己的西班牙语说得不太好，很多问题无法妥善处理，因此只好找儿女代劳，毕竟两个孩子从小在这里长大，熟悉西班牙语，也了解当地民情。

       其实，像陈佩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华人就算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却还是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他们的生活圈子，就像一个小小的中国城，自己走不出去，别人也走不进来。

       炸鸡店生意虽好，但必须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汽车旅馆的回报更优。因此，有一定资本的华人都选择合股投资汽车旅馆，只是这行业成本高昂，没有千万至亿元很难成事。投资这门生意的华人，大多是靠其他行业起家，如经营炸鸡店、超级市场和照相馆，合作对象也几乎都是华人。有需要的话，他们还得成立银会（Chinese Money-Loan Associations）筹集资金。

       对许多华人来说，在多米尼加开设一家小小的店铺，就能养活整家人，衣食无忧。虽然华人社群不大，却也能找到三五知己，闲暇时一起相聚出游，偶尔办个聚餐联络感情，至少比留在祖籍地替人打工来得强。

       多米尼加华人，只要行为端正、刻苦耐劳，一般都能找到工作。他们每月平均工资比当地人高，约为1万5000比索，而且老板通常提供免费吃住，可谓衣食无忧。做生意的华人，若想长久居留，也会买房置地。反观当地人，大多态度懒散，薪资不高，且没有储蓄的习惯，钱花光后就跟老板预支，买东西通常选择分期付款。

       这里的华人大多选择跟同族结婚，如果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们通常会回到祖籍地物色对象。毕竟两夫妻胼手胝足经营生意，总好过一个人单打独斗，就算是入行门槛较低的炸鸡店，也无法一个人独立经营。

  另一方面，或许是成长背景相似，一些土生土长的华人男性还是会选择当地女性作为终身伴侣。他们愿意与异族通婚，能否白头偕老，彼此的包容、体谅还是很重要的。

       择偶之外，华人做生意也倾向于跟文化背景相近的同族合伙。大部分当地人天性乐观，认为迟到是理所当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不来上班就不来上班，工作只是为了赚取生活费；做生意即使签了合约，他们还是有本事要赖，难以令华人信任，所以寻找同族合伙人，较为妥当安全。

       当然，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将Supermercado 100%超级市场打理得有声有色的夫妻档梁顺伟（Deigo Leong）和何仪秀，就相当欣赏多米尼加人的单纯善良。梁顺伟说：“许多当地员工在我这里工作超过十年，彼此和睦相处，我们很放心把事情交给他们去办，他们也办得很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雇主和员工要互相体谅，好好沟通，一起合作才能达到双赢。”

     多米尼加华人喜欢合伙做生意，喜欢聚在一起吃早茶，也喜欢到会馆搓几圈麻将。此外，他们还喜欢一起搞社团，这里的社团数量之多，在加勒比海地区可说数一数二。

       自1940年代开始，多米尼加华人先后成立了多个华人团体，服务广大华人。依成立年份排序有1942年华侨总会、1975年华侨青年会、1977年三益堂、1981年至德宗亲会、1989年台湾商会、1993年洪门致公总堂、2000年鲜花基金会、2002年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多米尼加支盟、2004年中多联合总商会，以及2006年七姓堂等。这里还有两个宗教团体，即中华基督教浸信会咏恩堂和慈济基金会多米尼加联络站。

  目前有4个社团的会所坐落在中国城内，包括华侨总会、七姓堂、至德宗亲会和洪门致公总堂。而三益堂则在离中国城不远的位置设下堂口。这些团体在多米尼加不仅扮演着凝聚华人的角色，也逐渐成为一般华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七姓堂和至德宗亲会为例，它们为华人提供了完善的娱乐设施，包括液晶电视、麻将桌、特别订制的发牌桌等，还有服务员不时斟茶递水。而洪门致公总堂则设有乒乓桌，让大家通过运动强身健体，近年也开始举办乒乓球公开赛。

       此外，这些社团也发挥了文化传承的功能，华人逢年过节的庆祝活动，几乎都由这些社团联合包办。每逢农历新年，华侨总会和台湾商会通常会找一些大型场地举办联欢会，有时候是聚餐，有时候是郊游。庆祝方式虽然简单，节日气氛却依然浓厚。

       大部分当地华人，每年清明节都会选在休息日或在开店营业之前，携带鲜花、香烛、冥纸等，到个别会馆的公墓去祭拜祖先，整个扫墓仪式既简单又庄严。有时他们也会带同孩子前去祭祀，以灌输他们饮水思源、不忘先人的观念。

由于多米尼加是个天主教国家，所以设在当地人坟场内的华人墓地，为了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除了会在墓室内置放十字架，也会采用当地人的安葬方法入殓。后人会将先人的棺木放入大型存放格内，7年之后捡骨，再放入较小的存放格，往后就以献上鲜花、焚香烧冥纸的方式祭拜。值得一提的是，由多米尼加华人集资筹建的华人公墓在2008年2月23日开始启用后，举凡无亲无故的华人往生后都能安葬于此。

 多米尼加的华人子弟，自小就从父母的身教言传中学习到孝道和对长辈的尊重，并且懂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华人也非常重视子女的中文教育。许多家长希望孩子至少能听懂华语，所以从小就让他们到中文学校上课。因此，这里的华人子弟一般都能掌握3种语言，首要是西班牙语，其次是广东话，再来便是普通话。由于这里与海地为邻，许多私立学校也教授法语。语言能力强的小孩，还会说英语和恩平话。不过，孩子难免会诉苦：“我不喜欢学华语，不喜欢写中文字，因为很难写！”

       翻开多米尼加的中文教育发展史：华侨总会于1958年就成立华侨学校，当时由朱华担任教职，饶凤祥于1967年接任。1980年代中期是华侨学校发展的全盛时期，那时一共开设幼稚园班、初阶、中阶、高阶4个级别，学生人数将近100人，教师由台湾侨务委员会聘请。当年还有由华人基督教会附设的圣多明各中文学校，那时学生有30余人，不过后来随着学生逐渐减少而关闭。

   华侨学校也曾多次面临关闭的风险。“1998年接任教职的施老师才到这里没多久就染上赌瘾，几乎天天上赌场，完全没有尽到教师的责任。”熟悉华侨学校历史的秘书陈佩珠说。

       从那时起，侨校的学生人数迅速减少，校内运作始终无法回到正轨。眼看侨校快要倒闭，陈秘书在2004年毅然接下教职，同时让自己的女儿到校兼课。直到近两年另一名新教师加入，学生人数才慢慢回升到30多人。

       而另一所办了十多年的台湾商会附属中文学校，其师资与环境都较华侨学校强。副校长鲁玉香这样介绍学校的营运情况：“目前，学校固定在每周五和周六上课，分小学、初中、成人等14个班级。学校共有200多名学生，98%为华人子弟，其余则是本地人的子女。”

       令人惊喜的是，这里即将出现一所崭新的中文学校，即中多联合总商会附属中文学校。该会总顾问吴国祥透露：“我们商会目前还没有会所，所以计划在一片2000平方米的土地上，兴建4层高的办公楼。我们还打算在大楼内设置大礼堂、公尺文和英文学习班教室、学生自习室、文化中心和100个车位的停车场。如果这个计划顺利推行，预计能在明年完工。”这项计划估计耗费150万美金，完全靠中多联合商会的13名执委和50多名会员联合出资。看情形，多米尼加中文教育即将迈入一个新阶段。

 位于首都圣多明各市中心杜阿特街区的中国城，是多米尼加华人主要的商业中心。这座于2008年4月17日正式启用的中国城，共有两个入口，分别设有“天下为公”和“四海为家”两个牌坊。一条横街加上一条竖街，整个城区共有40余家商店。

       中国城内有孔子广场，孔子像后墙上是栩栩如生的龙凤雕饰；另一座广场则矗立着十二生肖、观音雕像，富有中华文化气息。

       据说当地华社曾多次提出兴建中国城的计划，但皆告失败，究其因是华人在多米尼加的影响力还不足。直到曾任策划部副部长的吴玫瑰展现出莫大的魄力，这项计划才初露曙光。

       吴玫瑰与其他数名推动者吴健儒、何荣欣和吴华叶，不仅要周旋于市政府各个部门，还要争取广大华人的支持，着实不易。所幸后来在总统的大力支持下，才获得市政府融资。

      建设中国城，是为了重新打造这个地区，除了兴建两座广场和两座牌楼之外，也将更新这里的照明、通讯、道路系统，翻新华团会馆，兴建图书馆和中文学校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平日虽然只有四五个华人菜摊，但每到星期天就会变得车水马龙，人头攒动，讨价还价声此起彼落。为了应付一星期的需求，顾客通常都是将蔬菜大把大把地装入购物袋内。

       菜贩忙着做买卖，中餐馆服务员则不停地招呼喝早茶的客人。在多米尼加，除了中餐馆和炸鸡店一周营业7天之外，从事其他行业的华人大多在周二休业。

   多米尼加华社可说是加勒比海上一颗热力四射的明星。在经济上，华商们试图把触角延伸到各个领域；在中文教育上，他们更是不遗余力地倾注心血。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打拼，在祖籍地发生天灾时慷慨解囊，在多米尼加遭遇风灾时亦出钱出力。一个是祖籍地，一个是居住地，如有可能，两者都要兼顾。

       也有的华人觉得这个地方落后肮脏，跟不上时代，当地人不文明、没礼貌，于是将孩子送回祖籍地生活，希望他日赚够钱后能回乡与子女团聚。

       然而，还是有许多华人不惜耗费万余美元，申请移居多米尼加，一方面到这里来碰运气，另一方面则试图以此地作为跳板，再移居到美加等国去。

唐人街上的牌楼刻着“四海为海”4个字，道尽了多年来尼加华人的苍凉。

   波多黎各原为印第安人居住地，在西班牙语中寓意“富裕之港”。西班牙曾在此建立殖民据点，1898年美西战争后割让给美国。1917年起，美国承认波多黎各居民为美国公民，并于1952年赋予它“美国自由联邦”的政治地位，在税务、教育、卫生、住房、文化、语言等领域享有自行决策权力，美国联邦政府则主控移民、国籍、海关、防卫、外汇、交通、通讯、国际贸易等事务。岛民可投选波岛总督，却无权参与美国总统的投票。1998年就未来政治定位举行公投，超过半数的岛民对此并未表达意见。波岛的身份地位，仍旧得不到确认。

       波岛自1950年代起迅速实现工业化，现已成为美洲重要的医药业和制造业中心，同时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然而，密集的人口和有限的资源，成了波岛经济发展的阻力。多年来失业率偏高，致使涌入美国工作、定居的波多黎各人，接近岛上的半数人口。

       今天，岛民衣食住行，样样都是美国品牌，但生活、文化层面依然保有拉丁美裔的特色。这里西班牙文比英文盛行，从路牌、招牌到餐牌，都采用西班牙文；不会说西班牙语的人很少，却约有四分之三的人根本不说英语。

迈入21世纪，移民往来愈加频繁，岛民的背景文化更趋多元，不变的是，波岛依旧难以摆脱“美国驿站”的角色，而华人，则是这驿站的常客。

    早在19世纪，华人已踏足波多黎各。

       在西班牙殖民时代，除了拉丁美裔人士之外，其他移民一律不受欢迎进入波多黎各。直至19世纪末，西班牙与美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推动地方发展，大批的中国男性才通过“苦力贸易”登陆美洲。多米尼加、古巴及波多黎各一般都是他们踏足美国的驿站。

       不过，也有部分华人为波多黎各优美的景色及淳朴的民情所迷，决定留在这里从事餐饮或洗衣业。

       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令，华人移民因而无法以劳工的身份入境美国或美属地区。一部分原本就在美国生活的华人，也迫于无奈而迁移到波岛，并参与当地的铁路及城市建设工程，据说另有一部分华人在庞塞（Ponce）的制糖厂工作。

       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波多黎各因为《巴黎条约》的签署而成了美国的海外属地。政治地位的改变令华人入境波岛的阻力更大，岛上华人的人口增长率因此减缓了下来。

       到了1899年，由于美国担心人口贩卖集团把大批华工引入波岛，于是进一步强化排华法令，禁止古巴华人进入波岛；只有那些原本就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华人，才能够自由往返美国和波岛。

       1959年，古巴共产党革命胜利，大部分古巴华人为了避免私产被收归国有，纷纷逃往国外，波岛也成了他们其中一个落脚点。到了1960年代，委内瑞拉及多米尼加等中南美洲国家的华人陆续涌入波岛，同时也有少数来自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华人移民。

       迈入21世纪，华人移民潮仍然没有间断，主要来自中南美洲，而中国移民也不少，其中以广东恩平人最多。他们一般都会在这里住上二三十年，待挣够了钱并获得美国绿卡之后，便另寻出路。

       早期的华人，有的已经离境，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则与当地人通婚，早已脱离了华人圈子。

       今日的波多黎各华人，大多是在1970年代之后才抵达的。在这一批人当中，来自古巴的华人可说是资历最深的前辈，目前仅剩数十人，现任中华会馆主席周国强便是其中一人。他笑说：“其实我算是来得比较迟的古巴华人了。”

       事实上，古巴华人早在1959年革命之后，就已经大批迁移到波多黎各。当时最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们的雪糕生意。由于波多黎各的天气炎热，雪糕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古巴华人只需要购置一台雪糕机器，便可开一家雪糕店。“雪糕店的成本低，盈利高，自然成了最热门的生意。”周国强说。

       在岛上住了将近40年，看尽了华人社会的变迁。他说：“从数百人，慢慢变成2000、3000人，如今已经突破7000人了。当年祖籍九江的华人很多，现在新移民则多数是恩平人。”

周国强是现任中华会馆主席。背后悬挂着孙中山遗像及波多黎各邦旗

黑头发黄皮肤的亚裔人士，是波多黎各的少数民族。约一万名亚裔人口当中，华人占了多数，共7400人。华人家庭只有280户左右，余下的都是单身男性，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衡。

       岛上华人看似朴实无华，但笑容里却掩不住经年累月漂泊后留下的沧桑。他们当中以恩平人居多，但绝少数直接从恩平移民波岛。许多华人抵达波岛前，曾在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古巴等地生活过，或跑遍了半个地球，最终决定停驻波多黎各。

       波岛华人以第一代移民居多，大部分居住在首都圣胡安和周边城镇，约98%从事餐饮业，少数经营杂货进出口或零售等小生意。新一代华人则大多成为上班族或专业人士。

       “在中南美的生活经验，让我们更轻易融入当地社会。我们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也熟悉拉丁美洲的文化风情。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对亚洲人总是那么友善、亲切。”这是华人普遍的说法。

       然而，波多黎各是华人奋斗、挣钱的地方，却不是厮守一辈子的家园。美国才是华人的终极目标。

       不少华人辛勤工作，都把赚到的金钱送到律师楼，为的就是早日申请到美国绿卡，一圆他们的美国梦。等待是一种煎熬，许多华人即使在波岛拥有稳定的收入，却为了居留问题而忐忑不安。

       华人一般选择在波岛创业，在美国置产，把子女送到美国深造，最后全家迁移到美国。也有不少人大半辈子就在美国、中南美州和加勒比海岛国之间奔走。

  波多黎各不大，却集原始与文明于一身。城镇和郊区的落差甚大，圣胡安或周边城镇人口密集，交通设施完善，建满平房、高楼及商店，尽显波岛繁华的一面；走入郊区，人烟稀少，处处是黄泥路，眼前都是高山绿林。

       华人到波多黎各，绝非为了远离世俗或亲近大自然。他们正是冲着岛上的勃勃生机而来，大部分居住在圣胡安或周边城镇。华人聚居地不多，却显得有点零散，整个族群缺乏凝聚力。

       华人就在自己的小天地有规律地生活着，也许是一个厨房、一家小店铺、一所房子或一张赌桌。

  波岛市区最常见的是五彩缤纷的快餐店招牌。一公里长的街道上，往往并排着四五家快餐店，足见当地市场之庞大。“当地人不爱烹调，比较喜欢到外用膳或订购外卖。”华人餐饮业者道出其中原因。

       多为小本经营的中式快餐店，犹如一匹黑马、以风味独特的美食，成功冲破众多欧美连锁快餐店的重围，争得一席之地。

       中式快餐店的招牌上鲜少出现方块字，倒是常看到“Asia”或“Chino”的字样，并挂上红灯笼或漆上红色来突出华人的特色。店内装潢一般简洁明亮、柜合后方贴着菜单，列明菜式名称和价钱，有些还附上照片；餐桌整齐地排列着，地砖抹得发亮，绝对可媲美连锁快餐店。中式快餐店大多设在路旁或路口，主要为了方便顾客开车到“Drive Through”叫外卖，有的还附有小型停车场。

       从硬体设备至待客服务，中式快餐店与连锁快餐店可谓旗鼓相当。客人选择中式快餐，主要还是对它的食物情有独钟。“这里的人非常喜欢吃饭，如果他们只爱吃面包，我们就完蛋了。”华人笑着说。

       中式快餐店的招牌菜是炒饭和炸鸡，另有迎合当地人口味的青椒牛肉、辣椒鸡肉等菜式，同时也售卖当地传统美食，如炸大蕉、炸猪扒、炸猪肉等等。“以前雪糕也是我们的一大卖点，但由于准备工作太繁复，很多店家只好把它放弃。”一名快餐店老板说。

 现今，华人在波岛开了600多家中式快餐店及20多家服务式中餐馆（Service Restaurant）。

       服务式中餐馆大多开在商场内，规模中等，约有4至8名招待员，不时推出中西自助餐，消费群主要是当地的中产阶级。近几年，日本餐开始在岛上流行，华人也把握商机，以期能分得一杯羹。现今，日本餐馆的老板和师傅几乎都是华人，要吃到日本师傅做的料理还真不容易。

       “华人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框框内，相互竞争。比方说，某华人开了家餐馆，如果生意不错，另一家华人餐馆马上就开在它附近。”在波岛生活超过20年的台商梁鹏，分析了华人餐饮业所面临的问题。目前，他积极开拓新市场，所经营的几家餐馆，装潢高贵时尚，兼售中西美食，希望能吸引中上层的消费群。

 在餐馆打工的华人，称得上是当地的高收入群。一位华人厨师说：“当地人月收入少于2000美元，我们这行的月收入却介于2000至3000多美元！”难怪华人纷纷投入餐饮行业。只要不上赌场，在餐馆打工的薪水足以让华人过好生活，并可在短短几年内，存够资本，自行创业当老板。

       由于资金有限，中式快餐店多属家庭式经营，最常见的是丈夫掌厨，妻子掌柜，或亲属联手打理。若生意火红，或许会多请一两名华人厨师或当地人当收银员。

       “波岛的员工薪金支出太高了，多请一名员工，一年就少了几万美元的收入，许多华人情愿自己辛苦一些。”华人老板说起他们的难处。另外，几乎所有快餐店都使用即用即弃的塑料餐具，省却了聘请洗碗工人的费用。

       当地人多数一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周末休息，每天下午3点半之后，公路上便开始出现下班赶着回家的车龙。华人赚取了稳定的收入，却牺牲了正常的生活。有的一星期工作6天，每天从上午11点一直忙到晚上11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一名在餐馆打工的华人无奈叹道：“我们的生活日夜颠倒。当地人晚上9点吃夜宵，我们才吃着晚餐呢。”其实，华人也希望能与主流社会多些接触，但现实却不容许。“就算华人圈子要办联谊活动，我们也很难挤出时间，大家都太忙了！”华人感慨。

  出席华人宴会，是一件累人的事儿。华人办喜宴，总是要等到午夜12点才能开席，曲终人散已是凌晨两三点，小睡片刻，又要抖擞精神，起身干活。“多数华人结婚都不宴客了，因为很难挑到一个适合的日期。我也很久没吃喜酒了！”湖南酒家老板“醉龙”笑说。岛上两家最大的中餐馆——利口福和湖南，适合举办大型宴会，但设宴的通常是当地商人或高官显要，华人甚少大排筵席，顶多是亲友聚餐。

       近年来，波岛经济开始下滑，餐饮业带给华人的利润，远不及1990年代般丰厚。Kimpo Garden餐馆老板张志明说：“这几年百货腾涨，我们餐馆用得最多的白米，价钱涨了好几倍，成本越来越高，盈利越来越少，生意难做啊！”

     竞争激烈、经济不景之外，华人还面对生命威胁。一名快餐店员工说：“持枪抢劫在这里司空见惯。我碰过好几次，匪徒午间冲进来，用枪指着我，我只好把收银机的钱全都掏出来给他。”华人快餐店多数用现金交易，自然成了抢匪的干案目标。“2008年，有一个华人被匪徒在脑袋开了一枪，死了；2009年，另一个华人被射穿肺部，幸好保住性命。”华人心有余悸地说。有些餐馆为保安全，只好聘请保安人员在晚间看守。

       创业能赚取比打工更可观的收入，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于是这群踏实、耐劳的华人，继续在餐饮业里默默耕耘。

      少数华人成功跳脱餐饮业，转向其他行业发展。

       岛上的第一家华人超市——加华超市，创立于1980年代。老板娘王景香分享创业点滴：“当年我原本也在餐馆工作。看着华人越来越多，我想这些华人离家那么远，一定非常想念家乡的食物。于是我就开了这家超市，专卖华人食品，比如罐头、酱料，还有从纽约运来的新鲜华人蔬菜！有些顾客还开心得跑来向我道谢，这也是我开超市最大的满足感。”

 现在，岛上共有4家华人超市，集中在圣胡安市区，大多从下午2点营业至凌晨2点，因为主要消费群——华人都是在午夜下班后，才前来选购食品和杂货。除了从事零售业务，超市也批发蔬菜和食材给中式快餐店和中餐馆。

       运输发达的今天，货物流通快速，但亚洲超市老板娘李慕贤回忆起当年：“这里的超市只能买到小白菜，其他蔬菜或食材根本找不到。有华人从美国回来，带给亲友的手信，就是各种各类的蔬菜！”如今，岛上出售的食品和蔬菜，虽比美国贵了一倍，但还是大受欢迎。毕竟对华人来说，身处异地，却可以尝到家乡风味，真是无上的享受啊！

       “现在在岛上生活的华人真是幸福多了。”一个在岛上住了接近20年的华人说。除了食品越来越多样化外，华人接收中文资讯也更加方便。当年要看中文报，就必须订阅。中文报纸从美国船运过来，送到手中往往比出版日期慢了几周。现在只要到超市，华人就可以购得当天出版的《星岛日报》、《世界日报》、《侨报》和多种中文杂志。

       此外，华人也可以透过互联网、卫星电视，观看中港台最新的节目。和另一端华人世界的距离，终于拉近了许多

除了餐饮业和超市，也有一些华人经营食品批发业。华美和中美是岛上两家食品批发公司。华美创立至今已超过20年，中美则属后起之秀，两者主要批发米、油、盐、肉类以及蔬菜给餐馆。

       另有华人从事礼品零售和批发生意。在圣胡安老城区，有两三家华人开设的纪念品零售店，专做游客生意；服装店和假首饰店的消费群，则是当地妇女。

       华人的经济发展局限在特定领域，大规模的商店也寥寥可数。商人张志光说：“和美国的连锁品牌店相比，我们实力相差太远了。我们根本无法和他们竞争，大商场也不会给我们机会。”华人只好继续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守住一盘小生意。

       大部分华人后代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在父母的鼓励下，前往美国发展，多数成为白领阶层。少数不喜欢美国生活的年轻人，则留在波岛，选择创业的不多，一般都是上班一族。

   在阳盛阴衰的波多黎各华人社会里，许多男性到了适婚年龄还找不到伴侣。一名华人回忆道：“在岛上孤独老死的华人不少。我曾两度替朋友抬棺木，灵堂上空荡荡的，死者没有家人，朋友也寥寥无几，非常凄凉。”

       一些中年男子努力工作，存够“老婆本”后，便透过媒人或亲友介绍，回乡娶妻，然后带着妻子回到岛上继续打拼。老夫少妻的现象在这里很常见，不少年轻的过埠新娘坦承对波岛毫不了解，却义无反顾地决定出走，无论婚姻成败，都是一次心甘情愿的冒险。

       波岛华人思想传统，结婚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感情大多在婚后才开始培养。为了子女的未来，他们携手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丈夫通常支撑家里的生计，妻子则负责打理家务、照顾孩子。如果丈夫选择创业，妻子就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两人共同为一盘生意拼搏。

       华人父母尽量在物质方面满足孩子，也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只要能力许可，父母坚持把孩子送到著名的私立学校求学，让他们掌握好英语和西班牙语，以期日后能顺利考上美国大学。父母用心付出，子女一般听话长进，但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双方在思想上总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一名母亲说：“我的女儿西班牙语说得比家乡话好，有时她想跟我分享一些事情，却碰上语言障碍，看她着急的样子，我也难受。我走不进她的世界，她也不了解华人的传统观念。”华人后代外表像华人，但个性和生活方式却跟当地人没有两样。他们从小说西班牙语和英语，家乡话或华语只是家用语言，对中华文化多半是一知半解。

       除了家中亲友之外，出现在华人后代生活圈子的几乎都是非华裔。一个华人女生说：“母亲希望我以后的结婚对象是华人，但跟我同辈的华人真的少之又少，要碰上喜欢的就更难。华人总认为当地人太花心，婚姻难持久，但跟华人结合就一定幸福吗？”土生土长的华人，大多和当地人共组家庭。

       老华人一般对当地人有着负面的印象，如当地人喜欢享乐，对人生缺乏规划，不懂未雨绸缪，加上对待爱情合则来不合则散的态度，都叫华人父母安不下心。然而，为了孩子的幸福，许多父母最终还是妥协：“只要孩子喜欢和开心就好。”

 华人父母为孩子铺设未来，花尽心思让子女到美国升学。省下的钱，一部分用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另一部分则用来购置美国的房地产。“我们通常会在美国买房子，那么孩子升学时就有地方住。以后我们退休了，也会搬过来一起生活。”10个华人中，8个都会说出类似的人生大计。

       岛上有不少华人家庭长期分隔两地生活。有些父母留在波岛工作挣钱，孩子独自在美国求学；有些则是丈夫一人留在波岛工作，太太随孩子到美国当陪读妈妈。

       华人坚信，暂别是为了以后的重聚，分隔两地，也是为了美好的将来共同努力。

    波多黎各华社中单身汉占多数，他们没有家庭，只有工作和同事，每天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最恼人的是如何打发业余时间。岛上营业到深夜的只有酒吧、舞厅和赌场。酒吧和舞厅挤满了当地人，热闹的氛围更凸显华人的孤寂。落单的华人多数会选择可单独进行的活动——赌博。因此，赌博成了许多华人的生活乐趣，甚至精神寄托。

       美国政府有意把波岛打造成加勒比海上的拉斯维加斯。大部分酒店都附设赌场，主要是为了吸引游客，却意外招来大批当地华人捧场。有些华人平日一下班便赶到赌场搏杀，到了星期天晚上，由于隔天是大部分华人餐厅的休息日，因此赌场更是挤满华人。华人赌得倾家荡产的不多，但无法自拔的赌徒却不少。“那些嗜赌的人若不戒赌的话，再拼个十年八年，最后也会是落得身无分文的下场。”一名华人感叹。

       岛上生活单调，缺乏娱乐，赌场确实是消磨时光的好去处。“到赌场不一定要赌，我们也常邀约朋友去喝茶聊天，那里的环境相当舒适。”当地华人说。

       为了吸引人潮，赌场不时会办活动。“每逢春节赌场都会举行派对，设有幸运抽奖，还有舞狮和华人歌星演唱，香港歌手罗文也曾来登台呢！很多华人喜欢到赌场过年，可惜这两年经济不好，活动也减少了。”一名华人太太说。春节在波岛并非公假，加上华人分居各地，过年时大家都如常埋头苦干，“年味”不浓，其他华人传统节庆也一样。

       曾经，中华会馆是让华人联谊的地方。中华会馆成立于1975年，是岛上第一个华人组织。随着会员老化，人数逐年下降，所办的活动也越来越少，现在华人到会馆，大多是搓麻将或聊天。“要不是摆着几张麻将桌，那就更难聚集华人了。”中华会馆主席周国强叹息。

       如今较活跃的华人组织，该是成立于2000年的洪门致公总堂（简称洪门）。创办人兼现任主席何永强对当地华人情况非常熟悉，领导理事们收集当地华人资料，协助华人处理问题、解决纠纷。另外，洪门也和中国大陆领事馆及世界各地洪门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接待到访的海外宾客和媒体等，拉近波岛华人与海外同胞的距离。

       “波多黎各人口流动量很大，华人要不忙着工作，要不在美国、中南美州之间来回奔走，召集华人办活动并不容易。”洪门理事道出华人组织所面临的困境。

       今天，华人人数不断攀升，华社壮大了，但关系却比以前疏离。

  对波岛华人来说，三餐温饱比心灵富足更为重要。很多华人对宗教毫无概念。岛上的佛堂乏人问津，目前规模已缩小至一张小桌子，桌上摆着几尊供人膜拜的佛像，就算初一十五，来上香的人也非常少。

       然而，不少心灵空虚的华人仍渴望透过宗教得到精神慰藉。1997年，波岛华人写信向香港基督教会传达他们对宗教的需求，于是两名香港女传道士千里迢迢到岛上传福音，并协助成立华人基督教会。现今，教会共有200多名教友。每个星期天的主日会，分成两个时段——午间2点和晚间11点举行。“白天出席的多数是华人家庭，我们还特别为小孩开办主日学和中文班。晚上11点出席者以单身男性居多。”传道士梁清云解释。

       前来赴会的教友大多居住在圣胡安和周边地区，住在偏远地区的教友，由于工作时间无法配合，加上路途遥远，因此甚少参与教会活动。传道士说：“我们也会尽量抽出时间到访郊区，把福音传给更多华人。”

 除了是一个宗教组织，华人基督教会也负起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教会开办的中文班规模很小，教学方式也不正统，但至少让华人子弟享有接触方块字的机会。教会的中文老师说：“我们用西班牙语和粤语教学。这里粤语最通行，无论是台湾人或中国大陆人，几乎都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每逢华人传统节庆，教会也举办一些庆祝活动，学校假期则举办郊游，联系彼此。

   创办于1974年的Star Cream，是波岛最有名、且历史最悠久的中式快餐店。现任业主方宝璇夫妇回忆说：“当年我们从美国来到这里时，岛上只有古巴华人开设的雪糕店，以及几家售卖川菜和粤菜的杂水楼。我们一开始只卖雪糕，后来尝试加入炒饭和炸鸡，反应不错。之后我们再参照欧美快餐店的概念，就开创出中式快餐店了。”他们为快餐店取名“Star Cream”，也是希望借“Cream”来纪念他们以雪糕创业的历史。

       Star Cream真正引起注目，与一场火患有关。“当时店铺附近发生火灾，媒体采访时正巧提到我们的店名。或许是因祸得福，我们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客似云来。”方宝璇回忆。自此，Star Cream迅速窜红，成为业界亮眼的品牌。

       Star Cream成功后，马上引起一阵跟风潮。一些曾在Star Cream打工的华人自立门户，开了风格相近的中式快餐店，另一些华人新移民眼见有利可图，也遵循这经销模式大量复制。不久，中式快餐店迅速遍布大城小镇，到了1990年代，中式快餐开始在波岛餐饮业中站稳阵脚。巅峰时期，Star Cream开了7家分店，甚至有上市的计划。可惜后来家族里的年轻人都往美国发展，管理层青黄不接，他们只好逐步结束分店生意。现在方宝璇夫妇在打理的，是仅存的一家店，经营了约20年。

       方宝璇感慨地说：“许多已到美国生活的波多黎各人，回来度假探亲时，会特地来这里吃炒饭和炸鸡，他们想念这味道。老顾客透过我们的食物，找回了旧时光。”

       方宝璇夫妇守住的岂止是一盘生意，当中还包含了风光的家族历史和早期华人移民的珍贵回忆。

 在岛上居住超过二十年的老华人，早已习惯四海为家。他们在岛上花光了青春，积累了财富，时机到了，就潇洒地挥一挥衣袖，往邻近的美国大陆奔去。他们相信，那就是「家」。

       对土生土长的波多黎各华人来说，这里就是家。他们深爱着这片土地，并以它为傲。然而，他们却不能背弃父母的期望，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离开的终究比留下的多。

       历经万水千山的漂泊，「家」的轮廓已逐渐模糊，但华人却不曾放弃追寻。

   坐落在加勒比海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的圣马丁，南部属法国管辖，北部是荷兰属地，两地分割350多年来，没有海关也没有边界，岛民不需护照就能自由往来。圣马丁岛山清水秀，年平均气温不超过摄氏30度，每年都吸引无数欧美游客到这里来过冬。

       从17世纪开始，圣马丁陆续遭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英国入侵。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在17世纪为了争夺食盐而爆发战争；法国与荷兰人于18世纪为了甘蔗种植园而发生冲突；18至19世纪英国殖民者还前后3次占领圣马丁。后来统治权又回到荷兰和法国手中，两国终于在1815年签下巴黎协定，正式确定法属圣马丁占地52平方公里，荷属圣马丁占地34平方公里。

       在荷、法、西、英4种文化的互相融合下，圣马丁散发出自己特有的文化魅力，也吸引了世界各地近百个不同国籍的人民到这里居住。这些文化各异的族群，在坚持自己信念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文化，和平共处。因此，40多年来华人才能在这里自在地生活，并乐观积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

 根据在圣马丁生活了近40年的华人余玉华透露，最早到这里讨生活的两名华人，名叫余永良和张生。余永良是从荷属阿鲁巴（Aruba）迁移到这里，张生则来自荷属库拉索（Curacao），两人的原籍地同是中国广东。

       1962年，他们听说圣马丁还是个未开发的地方，物资缺乏，也比阿鲁巴和库拉索容易创业，因此不约而同地踏上冒险之旅，前往圣马丁一探究竟。

       在这里打工存了一点钱的余永良和张生，1964年合资开了岛上第一家中餐馆，取名为“中国夜”。在毫无竞争的优势之下，他们所售卖的中式杂碎餐一碟2美元，顾客每天络绎不绝，收入日渐丰厚。后来张生选择再移民到其他国家，余永良则在这里继续打拼。

       在圣马丁住了20余年，来自台湾的侯晋德补充说：“和余永良差不多同期抵达的华人还有林木龙。60年代，圣马丁渔业兴盛，很多台湾渔船都停靠到这里补充食品，林木龙当时就因喜欢这里的环境而留下来。这里最好的时候，港口能停驻超过50艘渔船，不过现在鱼都差不多被捕光了，也很少看到渔船。”

       在这里开洗衣中心将近20年，来自香港的王柏林说：“在1962年至1964年之间，这里住着7名华人。”从1970年到1972年，又有20多名华人从千里达和牙买加移民到圣马丁。1973年，余玉华从苏里南到圣马丁投靠余永良。

       1975年至1976年期间，大约有70名华人从千里达、多米尼加、牙买加等地过来，中华会馆第一任会长岑悦昌及最后一任会长余健新便是于这段时期移居圣马丁的。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华人移入圣马丁的巅峰时期。于这段时期到来，而今仍然住在这里的华人包括王柏林、赵国良、朱远光、黄慧霞、侯晋德、黄少为、蔡云天等，这批华人不论是住在荷属圣马丁还是法属圣马丁，都已入籍荷兰或法国，或拥有两地的长期居留身份。

      华人在圣马丁虽然只占总人口的5%，却稳居零售批发业的第二位，同时在餐饮业也占据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目前华人已开设超过70家超级市场和近百家餐馆。

       根据中国驻安提瓜和巴布达大使馆统计，圣马丁大约有4000多名华人，平均每22个华人之中，就有一个华人拥有自己的商店。这些华人大部分来自广东省，少数来自香港。这些华人在商业上的发展，可说是岛上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圣马丁至少住了20年的华人，彼此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亲戚或姻亲关系。在这里以香港楼的老板余玉华的亲戚最多，而跟岑悦昌一家有亲属关系的也不少，还有朱远光家族则因为有9兄弟姐妹，所以由他们申请过来的亲戚也很多。因此，来圣马丁只要找到这3个家族，就大致能够了解华人在整个圣马丁的发展情形。

  居住在圣马丁的大部分华人是生意人。

       在这里经营超级市场的华人，除了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辛劳，也必须节俭度日，才能把钱累积起来。他们大部分都是乐在其中，并没有太过埋怨这样的日子。

       一大清早，当地人喜欢在上班前到华人开的超级市场排队购买新鲜出炉的面包，下班后大约是4点半左右，也会再度光临等待新鲜面包。圣马丁的居民一般上薪资不高，在扣掉房租和交通费以后，他们只能选择便宜又美味的面包当作主食，不然一个月的薪水根本不够负担生活开支。

       50多岁的朱远光在17岁时就到圣马丁帮姨丈余健新工作，4年后在姨丈的协助下他自行创业，开了现在的超级市场。他在香港的本行就是做面包，到这里后，他也不忘本业继续在超市内卖面包。对他来说，做面包的利润太少，比一般超级市场要花更多时间，不过可以带客入店，带动生意。

 这些华人超级市场，由于在店内供应现烤新鲜面包，所以他们凌晨4点半就要到店里准备烤面包的所有材料。他们说：“我们都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早上起来吃了早餐，就去开店，一直忙到晚上7点多才休息回家吃饭。”

       他们的午餐通常是随意解决，对他们来说，晚餐是比较重要的一餐。部分华人喜欢自己在家里做晚饭，有时候煎条鱼，炒个小菜，弄些沙拉（Salad），再加个腊肠切片，就是丰盛的一餐。只是他们的用餐时间一般比较迟，通常都是7点半收工回家烧菜做饭，到真正用餐的时间已经8点半，如果是开店到9点半的华人就更迟。这样的生活的确辛苦，但是对这些华人来说日子过得还算充实。

       由于圣马丁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两地商家在买卖货品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标价方式。在荷属区的商店内，所有商品的标价都必须采用荷属安德列斯盾来标示。不过在付款方面可以选择用盾或美金，只要在收银机上按键，系统便会自动转换。美金也通用于荷属区。

虽然在这里做生意的华人都习惯了这样的计算方式，但是他们却仍然觉得这种货币制度还是有些麻烦，他们说：“不明白为什么在荷兰境内早就淘汰的荷兰盾，在这里却还要继续使用，其实我们希望能取消这样的制度，毕竟领美金薪水，会比荷兰盾更省事，至少不用再做货币兑换。”

       在法属区，则已从早年采用法郎的制度改为通行欧元，政府也规定商家在店内只收欧元，不能用美金，用美金等同犯法，被抓到就要罚钱。

       除了要适应不同的货币制度外，在法属区和荷属区做生意的华人也要面对两地施行的高税收政策。在法属区做生意的赋税包括劳工保险、营业税等至少占生意额的四成或更高，荷属区的税务则约占生意额的一半。在法属区做生意的华人，每月必须给予当地员工的法定最低工资为1100欧元。而荷属区的每月法定最低工资则约为700美元。不过在这里开超级市场，扣完税后，一般还能有三成左右的盈利，因此部分华人认为还是颇有赚头，也逐渐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来适应这样的税收政策。

       朱远光觉得现在生意没有以前好做，利润也没有从前高，税务也太重。但是他却认为：“比起以前，现在的我更懂得做生意。我来这里的时候怎么说都只有17岁，哪里懂得什么是会计、怎么去做生意，在这里这么多年，看到政府那些精明的官员，是怎么跟我们这些小生意人算税，我学了很多，自己也在进步，就知道如何去应付他们。”

岛上唯一的华人酒店——幸福酒店。

   在圣马丁做生意的机会很多，有心人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只要持有护照就不必申请营业执照，只要有钱有地方就可以开业，税务缴足政府不会来找麻烦。

       只可惜在这里做生意的华人，除了超级市场、酒店、餐馆和洗衣店之外，经营其他行业的却不多。目前只看见一些华人开设的珍珠奶茶铺、影视光碟和摩托车出租店。而在岛上吸金最多的珠宝首饰、电器等名牌商品店则没有华人的踪影，都掌握在印度人手中。

       住在这里的华人，几乎都对圣马丁的整体治安和环境感到满意。税务虽重，但是是有得赚，因此觉得钱还不够的华人一般都不会想着离开。有钱赚，生活又过得相当稳定的华人，更希望在这里定居。

在圣马丁生活的华人，经济能力较好的通常会置业。一些华人贪方便，就会买下距离店铺不远的房子，或者就住在店楼上。当然，也会有人到治安比较好的半山腰地段买房子。

       想在这里置产的华人大部分都有在这里定居的打算。但是他们通常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这里念大学，如果要念小学就一定要念私立学校，要念中学就必须是美国和加拿大名校，大学当然是送到美国或加拿大去，他们都希望孩子能成为人中龙凤。孩子如果打算回来，他们通常都已决定继承父母的生意，当然也有人会在这里创业，毕竟比起在美国帮别人打工，还不如自己回来做生意好。

       以T恤、短裤和拖鞋打扮就能出门的王柏林，就正和业主洽谈买下他现在居住的房子。他说自己住了十多年，都懒得搬家或者离开这里，儿子有工作，女儿也嫁到加拿大去，他已经没什么好担心。他说：“都住习惯了，朋友都在这里，回去老家没有朋友，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还不如留在这里好。”

       超级市场的老板娘朱慕升则选择在圣马丁建自己的房子，这栋房子在2009年初建好。她说：“我在这里呆了20多年，能建起一幢大楼，我已经觉得此生无遗憾。我满意现在拥有的一切，并认为在圣马丁的华人都应该感恩自己能生活在这片土地。”她觉得这里的华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没有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当地的文化那么丰富，华人却还是生活如前。“我喜欢参与社会活动，捐助慈善单位，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跟当地人打成一片。”她语重心长地叙说自己的想法。

    而对朱远光来说，虽然现在的日常收入不比以往，却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需，日子过得还算舒适。他曾经考虑移民加拿大，但后来却由于资格不符而放弃。其实他在这里那么多年，想离开又谈何容易。在这里他可以找到生活的重心，找到满足感，又何须到其他地方受苦？至于未来，他总是抱着平常心去看待。“我今天规划，事情明天可能就出现变化，与其去规划不知道的将来，倒不如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好，不是更好吗？”

       在圣马丁经营珠城酒楼（Pink Pearl Bar Restaurant）的赵国良是位好客的华人，他喜欢和朋友分享美食，朋友说起某家的包子好吃，他隔日就给捧上一个自家的让朋友试吃：“怎么样，比那家的好吃吧？”在这样的热情下，谁还说不好吃？当然包子的好味道也真是没话说。

       正因为赵国良对于美食的这份好胜心，珠城酒楼才能屹立不到。同时顾客只要来到珠城用餐，就可以免费欣赏圣马丁美丽的海滩风景，这也是这家餐馆的重要卖点。这里不只游客和当地人喜欢光顾，华人在周日的时候也喜欢到这里喝茶聊天。

       朱慕升和黄慧霞是对好朋友，她们偶尔会在周日选择到珠城酒楼用点心，两个家庭的成员一起到餐厅用餐享受天伦之乐。而刘戴安娜（Diana Liu）则喜欢到天鹅酒家（White Swan Bar & Restaurant）用餐，她说：“这家餐厅是我每天必到的饭堂，每次老板都会给我做好菜，常常有惊喜，我喜欢在这里吃饭。”戴安娜觉得吃饭最重要是开心，不喜欢吃主食只爱特色小菜的她，最明白个中乐趣。

       在这里有数位平均年龄不到30的年轻少妇，每个周日都会带着自己的宝宝，找个地方聚会聊天，她们一个月平均会光顾珠城酒楼一次。大部分来自广东恩平和新会的她们，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移居到圣马丁来，在这里住了两年到十多年不等。

       提起相互认识的经过，其中一位年轻妈妈冯小燕说：“那时我们正好都怀孕，待在家里很闷，就不约而同走到海滩散步。那时碰到跟自己差不多年龄的华人孕妇也在散步，就很自然地交上了朋友。”

       只不过这群年轻妈妈对圣马丁这片土地并没有太强的归属感，她们始终认为自己的家乡比较好。其中一位妈妈说：“等孩子大一点我就要把他送回大陆让我的父母带，在中国的学习环境比较好，我还是希望让他在那边求学。”其实，身为父母的哪舍得跟自己的孩子骨肉分离，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总会有回国的一天，所以也就不介意那短暂的分离。

       每个人对于生活的定义都不同，但是能肯定的是，这些华人大部分都能在圣马丁找到自己的人生归属，对他们来说，是走是留都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活在当下。

  在圣马丁岛上，有两位华人从无到有建起慈济联络站，并致力为岛上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虽然耗上许多时间精力，却成功地赢得了当地人和政府机关对华人的尊重；这两名华人就是张振业的父母——张杰荣和朱细芳。

       张氏夫妇在1984年从香港经由加拿大，辗转来到圣马丁发展事业。在这里经营超级市场多年后，朱细芳开始走访圣马丁的老人院及残疾收容所，希望在这里找到心灵寄托，找到一个能回馈社会的方法。终于在数年前，她在一次回香港的旅程中，在当地书展看到了静思文化的书摊，从此开启了她的慈济生涯，也让她经历了不一样的人生。

     认识慈济后，朱细芳于2001年决定在圣马丁建立慈济联络站，以大力推广为善的理念，希望亲朋戚友和超市员工都能投入慈善事业。经过数年努力，他们成功地让员工自愿投入慈济事业。现在只要他们发起任何慈善活动，员工几乎都是二话不说地全情投入。而那些当地女性员工，也已经习惯在当义工的时候梳着标准的慈济头型，穿着蓝色或灰色上衣以及白色长裤来做慈善。

       “可惜的是，这里的华人都不太参与慈济，现在我们的义工只有20多名，定期捐款的会员也不多，只有50多人。”也帮母亲分担慈济行政工作的张振业感慨地说。

       不过他们从事慈善事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因为在数年前他们的善行获得了荷属圣马丁国会议员的肯定和表扬。

       张振业认为慈济改变他许多观念：“我们一家人变得更和睦，做什么事都很团结。我非常乐于从事慈济。”慈济的义工们通常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到老人院去服务，帮忙老人家剪指甲，并表演唱歌和手语给他们带来欢乐。

       当然，在这里除了从事义务工作，有些华人会选择在周末到俱乐部去和朋友喝一杯或跳跳舞。经济能力要是好些，也可以选择到附近的萨巴（Saba）、圣尤斯特歇斯（Sint Eustatius）等小岛轻松度假。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年一度的四月份狂欢节中，华人也会献上舞龙舞狮的表演，一起欢庆这个圣马丁岛上重要的节日。

      来自中国天津的田树培博士，是位卓越的教育家，他在圣马丁建立了岛上规模最大的加勒比美国大学医学院（American University of The Caribbean School of Medicine）。

       1964年，他到美国短短的9个月，就完成了由餐馆跑堂到电子公司技术员的角色转换，后来又进入辛辛那提大学攻读电机工程硕士，最后又在美国联合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为时8年的苦读，为田树培打下了进入美国教育界的坚实基础，他先后在两所大学担任过电子工程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教务长。

       他在1975年获选为立百乐蒙工艺学院的校长，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在任期的3年多光景，他先后增设了8个科系，学生人数增加了50%，令该院达到了空前的繁盛。

       然而，这位教育家却在1978年时辞去年薪丰厚的校长职位，在一所天主教大学租借宿舍，用4万多美元开办了加勒比美国大学医学院。这是第一次由一位东方人用私人名义在美国兴办医科大学。

       可惜199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灾难将田树培苦心经营的大学毁于一旦。但田树培并未因此而放弃，反而越挫越勇。

     如今在校园协助舅舅处理业务的刘戴安娜说：“幸亏我们之前就已经在圣马丁买下十英亩的土地，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就到这里重建大学。我们是在1995年8月23日搬到圣马丁岛的。那时候的我简直忙得焦头烂额，十多年来，还是一直在忙。”

       提起这位舅舅，刘戴安娜的脸上总是挂着敬佩之情：“我很多事情都是跟舅舅学的，他对每一件事情，不论大小事，都一丝不苟，仔仔细细地完成。他觉得华人在国外不能被别人看不起，一定要比别人强，所以他坚持要做的任何事情，就一定会完成。”

       已经有80岁高龄的田博士，如今不再为加勒比美国大学医学院的校务烦恼，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事业全权交由儿子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不再热心教育事业。除了圣马丁的医学大学，田树培也在天津捐助了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的建校工程。刘戴安娜补充道：“我舅舅打算在天津捐助一所中学，预计投入数十万美金。”

 圣马丁数百年来由两个国家管理，岛上各族长久和谐包容地生活着，身在其中的华人，也充分体会了只要愿意去尝试，就能看到奇迹的精神。

 华人都习惯将这个国家称为千里达。它主要由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组成，超过70%的人生活在特立尼达岛上。

       1498年，哥伦布宣布特立尼达岛为西班牙所有，而多巴哥岛则历经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多次争夺而易手。1889年，两岛终于合并成为英国殖民地。1962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宣布独立并加入英联邦。

       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这个国家多元种族共存的局面。其中，印度人与黑人占大多数，其余还有欧洲人、阿拉伯人以及各族混血的后裔等。

       而华人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渊源已超越了200年。

     在早期的西方殖民政府时代，由于许多当地土著印第安人死于传染病，导致殖民者到这里建立甘蔗园及咖啡园之后，面临缺少劳工的困境，于是就把非洲人贩卖到此处当奴隶。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华人和印度人就成了千里达最主要的契约工人。

       1806年，第一批为数147人的契约华工抵达首都西班牙港。早期的华工大多数都来自广东省，且以中山县居多，其次是东莞、台山和新会人。在契约期满之后，决定留下来的华人就把积蓄投资在洗衣、制鞋、制衣、餐饮等行业。

       当时，在千里达的华人女性只有20多人，导致许多华人男性与黑人或印度妇女结婚。

       华人所经营的店铺遍布西班牙港，大多是小本经营。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里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华人企业家、银行家，其中阿良家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1926年，阿良家族的祖辈踏上了这一块土地，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成功创立了以食品加工、日用品化工、房地产、餐饮业等为主体的家族公司。

     华人在经济上站稳了脚步后，便开始将原本身在广东的亲友陆续接到千里达，这里的华人人数逐渐增长。90年代，新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香港的移民，他们多数在华人餐馆或商店打工。

       “华人刚来时，身无分文，拎着两个皮箱就来闯天下了。他们大部分都是先替朋友或亲戚打工，累积了一些钱之后才做生意。”当地的华人回忆说。“华人大多从事小本生意，几乎所有的伙食店都是由华人经营的。”

       千里达的商业竞争力较弱，所以华人赚钱也很容易，这是吸引华人前来的原因之一。

       1989年，千里达发生暴动，大部分华人的店铺都遭了殃，超过半数的华人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

       然而，华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待事件平息了之后，他们重整旗鼓，继续营业。华人为了实现自己所憧憬的美好生活，不惜一切重来。他们大多数都是从早忙到晚，一周工作7日，每日工作18到20个小时。

       “老天还是会眷顾有心人的，幸运的是，千里达近十年来的经济越来越好，大家的生活也逐渐安定。”这是当地华人一般的看法。

*祖籍广东宝安的何才爵士（Sir Solomon Hochoy），于1960年出任最后一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督，是历来首位获英国委任为总督的华人。他在当地独立后的1962年至1972年，出任首任高级总督（Governor-General）。为了纪念他，人们将千里达第二大城市圣费尔南多的一段高速公路命名为“何才”公路。*

 千里达约有6000名华人，但在全国134万人口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华人来到这里，悠悠两个多世纪，积年累月用青春和汗水一点一滴地搭建自己的舞台。

       祖辈们最早落脚的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仍然是华人最密集的所在。首都西班牙港是新移民大展拳脚的地方，大部分知名的中餐馆、百货店都集中在那里，华人四大社团也集中在市中心的大街上。

       客家人是最早到来的华人，但大部分都移民了，他们留下来的后代，就像老树盘根错节，已根深蒂固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并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他们紧紧地拥抱着这里的文化，说的唱的都是流利的英语，华语反倒疏远了。

       这里90%的华人，来自广东一带。部分新移民来自福建，以亲属、厨师的身份移居到千里达。英语是他们融入当地的必修课。

       华人最感遗憾的是，这里没有中文学校，也没有中文报刊。

   华人踏海来到千里达，船一靠岸，右面是细滑白沙，清澈海水，左边是山丘屹立，碧草如茵。华人窃喜：“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加勒比海阳光暖和，微风迎面徐徐吹来，华人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毫不犹豫地决定留下来。

       刚到的华人，一般都是替亲戚或朋友打工，先熟悉环境、学一点英语，攒积了本钱后，再自立门户，自己开店当老板。

       华人离开家乡，心里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寄人篱下，天天看人脸色的打工仔，他们认为“工字不出头”。“帮别人打工，就是帮别人赚钱，自己开店做生意，赚的钱都是自己的。”于是，千里达的华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做生意。

       初次创业的华人，大部分都会选择开中餐馆。

       对华人来说，开一间中餐馆成本少，但收益大。“早上用了100元买食材，晚打烊时就可以连本带利全收回来了。”千里达人酷爱中餐，简单的炒饭炒面加鸡肉令人百吃不厌。在他们心目中，华人是一流厨师，并执着地认为只要是华人就一定会下厨，而且厨艺一定很好。

       因此，千里达中餐馆不怕没人来光顾。

     华人小本经营的小型中餐馆多如牛毛，有些是夫妻携手打理，有些则聘请几个店员帮忙作业。因为治安问题，小型餐馆的柜台上都架上了大拇指粗的铁栅栏，将里外截然分开。不论从里往外看，还是从外往里看，怎都像是活在笼子里。老板、员工、厨师、家人的活动全都在笼子里。“没办法，围栅栏可以防盗，也可以保护自己。”华人无奈地说。栅栏底部还有个小小四方格空间，让人付钱买单。

       经营中餐馆的时间自由。一般的中餐馆从上午十点开始营业，到晚上十点打烊。“如果人手足够，你甚至可以营业至凌晨一两点。”周末，客人在店里喝酒嗑花生，华人就不着急赶客人。“运气好，还可以多卖几瓶啤酒，赚些小费呢。”华人笑着说。

       千里达有近5000家大大小小的中餐馆。用最简单的乘除法来计算，意味着平均1.2个华人就有一家店！

       “其实，这里大部分的华人习惯分散投资，他们常在同一时间开好几家分行。”小小的中餐馆只要开张就能赚钱，所以即使辛苦，华人也乐此不疲。

       位于圣费尔南多的点心皇大酒家的老陈炎平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在千里达奋斗了十多年，一人兼营好几家中餐馆，除和朋友合股经营占地一万平方尺的点心皇大酒家，卖点心也卖各式粤菜。此外，他还单独另开了几家中餐馆，生意都不错。“千里达中餐馆很多，多少还是有些竞争。大型的中餐馆人来人往赚得比较快也比较多，小餐馆则是分散投资，赚点零用钱。”他如是分析。

       圣费尔南多的长城酒家，是千里达面积最大的中餐馆。它像是一座中国城堡，因为治安问题，主人要求客人把车开进来，停车免费。下车后，经过小型“御花园”，行过小桥流水，才来到餐厅。客人推开大门，中国菜香味扑鼻而来。千里达的总统、高官、名媛淑女、名人球星特爱光顾。

       老板宋耀金来自东莞龙岗，爱吃梅菜扣肉、焖猪肉，是个不折不扣的客家后裔。在千里达住久了，他已忘记如何说客家话。他用英语说：“在千里达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赚到钱，不像欧美国家，那里的竞争力大，华人餐馆若不出奇制胜，就没有立足之地。”他那爱好音乐的小儿子，也从加拿大回到千里达，因为只有在千里达的慢步调，才能兼顾他的工作与兴趣。

       在Chaguanas镇上的Buffet King自助餐厅，可容纳百人，在千里达一枝独秀。与其他叫餐点菜的中餐馆不一样，来到的客人付上一定的费用，就可以自助式地任选任吃。自助餐馆因此异常红火，即使营业了十年，客人还是源源不绝。老板Ronald Chow于60年代从广东来，他说：“自助餐盈利很高，开张第一年，我原以为其他华人也会效仿经营，哪知等了十年，还是没遇上同行对手。”他很失望，连做梦也希望千里达可以多冒出几家自助餐馆和他一决高下。

      华人星期天饮早茶吃点心的文化，也渐渐成为千里达人的习惯。

       星期天，茶楼必定人山人海，华人、黑人、印度人齐聚一堂。“一大早，当地人就来喝早茶了。以前，他们点菜千篇一律，不是烧卖就是虾饺，现在可会吃了，凤爪、排骨、蛋挞、奶黄包样样都要试。”西班牙港金鹰酒家的老板萧容庆说。

    餐馆生意好，华人也头疼，最大的困扰就是人手不足问题。特别是星期天，生意滔滔，人手不够，所有的事情都会乱糟糟。“这里请人工作很难，老板还得看员工脸色，特别是大厨，他们自尊心很强，骂一骂就走人。有些攒够钱的华人也会自己开店做生意，华人很少打长期工。”老板也有本难念的经。

       因此，很多华人老板透过经纪公司，以两年签约形式，在中国大陆聘请厨师。“这有点像赌博，一赌就是两年，万一聘请到情绪化的厨师，只好自认倒霉了。”华人说：“签一个厨师的手续费用至少6000美元，老板不仅需要为他们免费提供伙食和住宿，每个月还得准时发薪水，薪水每个月约1800至2000美元不等。”

       当老板苦水多，然而，“老板”这头衔却是华人出外闯世界的梦想。

## 

    如果说中餐馆“劫持”了千里达人的味蕾，那华人百货、超市就成功地占领了千里达人日常生活的消费市场。

       走在西班牙港的夏洛特街（Charlotte Street）上，会发现很多华人经营的百货店或超市。早期的伙食店已消失，顺应时代改变，华人把自助式、开放式的超市营业模式，呈现给千里达人。

       当地人爱吃零食爱吃甜品，一些华人百货店就零售糖果、饼干、让当地人自由选择。“只要卖些包装可爱的精果干粮，当地人就很喜欢了。他们口袋只要有钱就会天天来，有些更是早上、晚上来两趟，店里不怕没人来光顾。”在夏洛特街拐角处经营明斐贸易公司的潘丽珍说。

       当地人爱花钱、爱购物的欲望，正好满足华人爱赚钱的心态。

* *为了让当地人意识到华人的杰出贡献，2006年，千里达总统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华人抵达千里达200周年。那一年，千里达政府更是把10月23日的华人登陆日设为公共假期，全国放假一天。*
* “百货店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卖，进货的时候，看见什么都会拿到店里去卖，数量不多，但一定卖得出去。”小型百货店设什么规则模式可言，华人想卖什么就卖什么，小小的一家店，里里外外，塞满了各种货物。当地人说：“除了应有的商品外，偶尔还可以在华人百货店找到惊喜。”所谓的惊喜就是，譬如原本想买面包，结果却“捡”到便宜且合心意的帽子。
* 夏洛特街上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永盛唐山百货。店面不大，一进门还有铁栅包围着，几个类似警卫的当地人在门口把关。客人要购物，得先通过黑人那关，他们只要对你咧齿一笑，那就表示你合格，可自由通过铁栅门进去购物了。整个过程，在几秒钟内完成，明明要去买东西，却感觉是去银行保险库领黄金。
* 永盛唐山百货是老字号，店里全卖华人货品和食品。干粮、调味料、药丸药品，还有华人拜祭的物品等，填满整间店铺。这里是华人常来“朝圣”的地方。特别是星期天，华人喝了早茶，就来购物了，人来人往，店家忙得连去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 “这里的东西，在许多超市都买不到。千里达天气热，华人喜欢来这里买龟苓膏、腐竹、薏仁等回去煮凉茶或糖水。”老板黄帝良说。他在千里达住了40多年，家人孩子都移民加拿大了，他却留在这里。“我喜欢加勒比海的天气，喜欢这里的老朋友街坊。”他说。
* 他和当地华人相处融洽，华人喜欢到他店里溜达。“在这里买东西很有亲切感，老板常会给优惠价，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折扣。”一个提着大包小包刚从永盛百货出来的华人说。
* 华人生病了，也去永盛百货。“华人病了都习惯吃些成药。小孩咳嗽了就来买枇杷膏，肚子吃坏了就买保济丸，女人吃的白凤丸也可以在这里买得到。”华人说，在千里达看医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这里看医生要等很久，常常都是痛的时候看不到医生，不痛了才见着医生。”为了省时省麻烦，华人小病小痛，自然而然地就往永盛百货跑。

|  |  |
| --- | --- |
|  | 夏洛特街的永盛百货最受当地华人欢迎 |

     就像旅游书籍推介，在加勒比海滩晒太阳，是最舒服的度假方式。当地全年夏天，有点炎热，但海风徐徐吹来，也算舒适宜人。比起北美和欧洲大陆的寒流来袭，华人更是享受这里天天摄氏27度的气候。

       撇开忙碌的工作不谈，华人的生活可用写实写意、悠哉游哉来形容。

       千里达是个美丽的岛国。这里植被繁茂，四季鲜花盛开，酸甜香郁的热带水果压满枝头。明媚的阳光，洁白柔絮的海滩，清新湿润的空气，加上阵阵轻柔的海风吹拂着岸边的椰林和棕榈树，让华人找到释放疲惫的休息站。

       这里有好几个漂亮的海滩。忙累了，华人带着妻儿，就在Maracas Bay清澈的海水中游泳，或滑板冲浪。躺在细软的沙滩上晒晒太阳也是常有的事。“千里达很小，驱车到海边也不过几十分钟，星期天下班了，就坐在车上吹海风，很舒服。”黄帝良介绍说。

       华人无论怎么忙，都可以找到放松解压的方式。在千这里很难找到一个肤色白皙的华人。或许因为天天与沙滩阳光为伍，华人的肤色几乎都是健康的古铜色。

       华人说，来到千里达，他们是幸运的。天天与阳光“见面”，想法也变得很积极。

       对新移民来说，闯世界、创事业是辛苦艰难的，然而他们的想法和态度却没有因此而消极。他们努力工作，辛勤地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铺路。他们不赌不嫖，星期天陪着家人去饮早茶，或是带小孩到海边玩。

* *来自广东省的李龙（John Lee Lum)是千里达第一个发现油田的人。1880年，他来到千里达，刚开始在朋友的百货店工作，后来自己当老板。他在千里达发迹，后来还投资开发石油、办银行，并受政府委托发行首批千里达货币，是千里达华人的翘楚。*

       有些华人则上教堂寻找寄托。平安与满足写在华人的脸上，心底流出的微笑明显地刻在他们的嘴边。“华人与当地人共用一个教堂，每个星期天一起崇拜，教堂的费用一起分担。”来自香港的陈伟国说。每个星期天，他负责教会的粤语唱诗班。“干里达的华人多说英语，参与教会的华人其实不多，懂得用中文宣教的人更少。”

       千里达的华人必须会说英语，因这里的人种多，即便是占多数的印度人也说英语。华人入乡随俗，也天天用英语。“很多中文词汇都忘记了，要说华语，其实有点为难。”华人说。

       千里达的新生代很少能说华语。土生土长的黄洪治回忆说：“这很容易理解的。小孩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忙于工作，小孩童年时接触的所有东西，包括教育、资讯、娱乐、电视、课本都是英文，朋友们也都说英语。英语无处不在，强烈地包围小孩，就连在家里，家长也和小孩说英语。”

       “以前，爸爸妈妈会用蹩脚的英语和小孩沟通，想要从他们那里学到更多的英语词汇，好方便做生意。”不知道是小孩影响父母，还是父母影响小孩，到最后，千里达的华人，老的少的都说英语了。他们的英语，带着当地的口音和特殊语调，也混杂了当地人自创的词汇。

       早期的华人多与印度人、黑人通婚，他们的下一代已不再是华人那样的黄皮肤。千里达大部分的新生代，都不会继承父辈的生意。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想要自己去闯。

       于是，他们选择当医生、律师、校长或银行的高级职员，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威望。“在千里达，华人地位很高。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生意发展都很成功，是华人的骄傲。”千里达著名华人厨师周国强说：“唯一的大型购物兼娱乐商场Movie Town也是属于华人的。”

       华人在千里达代代相传，但在这里住得越久，身上中华文化的成分就越来越微弱，连中餐的餐牌，也渐渐地换上了英文字母。老一代的华人还能用粤语或客家话说上几道华人菜名，像Pak Chan Kai（白斩鸡）、Chow Har Look（炒虾仁）、焖猪肉、梅菜扣肉等。新生代只有兴趣吃，根本不懂菜名。

       如今华人都说英语，让中华文化的传承工作更显艰难。这里没有华文报纸和华文学校。华人有心要办报，但办报的资金以及专业人才是最大问题。“我们也试过办学校，常常都只有老师没有学生。”当地华人说。

       “虽说华语是自己的母语，但是小孩学了也用不上，因为这里是英语通行，所以还是得为小孩的前途着想，一切英语为先。”大部分的华人家长都说同样的话。“这里连中文名字也用不上，我已经忘记自己的中文名字是怎么写了。”一名家长如此坦言。

       华人也不过中秋节、农历新年或其他的传统节庆了。“偶尔朋友送月饼来，我们才知道快过中秋了。”在餐馆打工的华人说。

       农历新年，千里达没假期，华人也照常上班。除夕夜吃团圆饭这回事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但华人说：“我们还是会坚持给孩子红包，象征祝福，让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安康顺利。”

       新春佳节对新移民来说，是平淡的一天。对新生代来说，更是个模糊的日子。

       然而，夏洛特大街上的四大会馆，可不会因此而放弃。为了提醒华人不忘农历春节，他们每年都很用心地筹备新年聚餐。

     迎着海风面向海洋，华人承认心里总会惦念着海洋另一岸的故乡。然而，想到自己用一辈子青春努力建立的家园，看着一手培育的孩子踏向幸福的人生，他们觉得由衷欣慰。

 南美洲西部的秘鲁，是古代印加文明所在地。后来又是西班牙殖民政府在南美洲的统治中心。首都利马建于1535年，以浓厚的殖民色彩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秘鲁矿产丰富，铋和矾的蕴藏量居世界首位，石油自给有余，在拉美诸国中，属于经济中等水平的国家。山地约占总面积的一半，全境从西向东分为热带沙漠气候、高原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适合发展多样的农作物种植和畜牧业。秘鲁人经常自夸，他们的土地可以种出将近4000种不同品种的马铃薯。

       20世纪80年代，秘鲁经历了严重的社会动荡，通货膨胀高达10000%；90年代备受争议的总统藤森上台，才扭转颓势。近几年，秘鲁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稳定，利马城到处大兴土木，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

       这片古老而富足的土地，养育着世界各个种族的人群，其中包括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南美最大的华人族群。

近年的史料显示，早在1613年，就已经有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人住在利马城，他们多数从事石材加工以及手工劳作。

       然而，世人一般都公认19世纪中叶才是大批华人抵达秘鲁的年代。那时的秘鲁刚独立不久，百业待兴且急需劳动力，于是，为数75人的首批契约华工，在1849年10月15日抵达秘鲁。后来，秘鲁废除了奴隶制度，又立法奖赏那些引入华工的国人。此后的25年内，十万名华工源源不绝地踏上了卡亚俄（Callao）码头，形成秘鲁历史上最大的华人移民潮。

       这些华工大多数在广东以及福建沿海一带被拐骗而来，签下了长达8年的契约。在为期4个月的海上航程中，华工挤在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船舱内，仅有大米和咸菜充饥，很多人因为传染病而接连病倒。在航程结束时，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华工葬身茫茫大海。

       熬过这段“死亡航线”上岸之后，华工们随即被带到苦力市场任人挑选。有者因为身体瘦弱而无人问津，被迫站在烈日下暴晒好几天，最后被人口贩子以贱价卖出。当时，在当地的报章上经常刊登这样的广告：“又一批苦力完好到达，身体健壮，无生理缺陷及恶习”。对买卖双方而言，华工不过是一件会劳动的商品而已。

       由于当地的印第安人认为下海是不吉利的，大部分华工因而被卖到沿海的棉花及甘蔗种植园当苦力。他们早上4点便得起床工作，晚上则睡在上锁的寮棚内。部分华工在钦差岛（Las Islas Chincha）挖掘鸟粪，作为出口肥料。烈日下，他们忍受着恶臭，以铁铲挖鸟粪，再将之装上船，稍有松懈便遭毒打。另外，也有华工在塔拉帕卡（Trapaca）和阿塔卡马（Atakama）一带的硝石区采矿，或者在中部及南部修建铁路。总而言之，在秘鲁，最危险和最辛苦的工作都由华工来承担。

       华工那微薄的工资，在七除八扣之后已所剩无几，许多华工在合约结束以前就积劳成疾或受虐至死。也有人趁着监工不备时自缢、跳崖自尽，甚至挖鸟粪自埋。在那个年代，每一个种植园都有华工的墓地。埋葬于小沙堆底下的他们没有棺木，也没有寿衣，甚至连一小块注明姓名的墓碑也没有，似乎也没有人记得这群可怜人。

       1874年，秘鲁和中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废除对华工的苛刻规定，并严禁华工买卖及虐待事件，此后，华工的生活才得以改善。契约期满的华工大部分流向内地，转行经商或者从事农工业生产。那时，利马的卡蓬街（Capon）渐渐形成了唐人街，到处都是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面包店、裁缝店、理发店、修鞋店和小饭铺，还有赌馆及鸦片馆。这些小商人除下布衣裤的农民打扮，穿上了呢绒西装。

       1890年至1930年间，一批香港移民抵达秘鲁创业。他们很快便垄断了秘鲁华人的商贸活动，并进军金融保险和船运业等。这些卓越的成就使当地人对华人刮目相看，加上秘鲁政府严禁鸦片，以致华人瘾君子的数量大为减少，秘鲁人于是逐渐改变了先前对华人的不良印象。

 几乎每一名离乡背井的移民，心中总是怀着衣锦还乡的梦想。而身在家乡的父母也翘首企望，通常还会先为儿子娶亲。在婚礼当天，新娘子就只能和公鸡拜堂。然而，由于新郎一直都没能回来，根本不知道父母在老家已给他添了家室，所以多数会在当地与印第安人或黑人妇女成婚。

 当年，有华工请人到山里找来一群女子，然后双方蒙眼进入屋内，并且分成两排面壁站立。当主持人击掌时，男方和女方便同时转过身来，站在对面的就是自己的终身伴侣。这种情况看似荒唐，却是早期华人极其无奈的真实写照。

       在那个年代，得以踏上漫漫长路回乡，是一件让人羡慕不已的事。即将返乡的华人除了在报上登广告之外，还要请同乡吃饭饯行，十分铺张。欣喜若狂之余，回乡的行李还带上送给亲人们的衣服、收音机、甚至脚踏车。

       华人再度大批来到秘鲁，是在20世纪70年代。移民初来乍到，大多数都只能在街上卖菜、猪肉以及洋葱炸肉“奇卡隆”（Chicarron）。他们居住在市场对面的横巷，每日早上4点就得开始工作。而那些早来的华人却已经发展到坐拥良田，设有碾米、麻绳和布匹等工厂，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

       此外，自8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广州人移居秘鲁，当时华人约有4万人，华人商贸公司遍布利马各地。他们在塑胶、土产批发、玩具生产、粮食加工、保险和电器等行业都有一定的成就。

       近年来，一些华人不法之徒，将秘鲁沦为偷渡的中转站。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新移民登上了开往美国海岸的船只。途中，有人因为遇上风浪而翻船、或是为了躲避海警而跳海，甚至被无良的人蛇遗弃荒岛，尚未抵达彼岸就已经含恨而终。秘鲁华工的辛酸史早已落下帷幕，小部分的新移民却开始奏起了另一首悲歌。

* *19世纪中叶，在利马南部小镇干盆地庄园的华工因不堪长期受欺压，在南美洲太平洋战役中充当智利军的向导，击退了秘鲁军队。这件事激起秘鲁庄园主人对华工的仇恨，引发大规模的屠杀华工事件。仅仅一个月之内，便有1500名华工惨遭杀害，写下秘鲁华人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秘鲁华人的确实人数，至今仍是个解不开的谜。

       华人和当地人经历几代通婚，后裔血统复杂。有人估计，华人华裔数量已突破300万，超过秘鲁总人口的10%。

       华人大多聚居在首都利马，北部的特鲁希略（Trujillo）、奇克拉约（Chiclayo）、标拉（Piura）以及意基度（Iquito）等城镇也分别有几十户华人。秘鲁华人大多祖籍广东，主要是中山，其次为番禺、鹤山、台山、恩平、新会等地。这也是为什么粤菜得以成为秘鲁饮食的主流，以及利马每条街上都有中餐馆的原因。

       华人凭着智慧才干，在商业领域表现突出。土生土长的华裔融入秘鲁社会各阶层，从蓝领阶层的德士司机、技术工人，到白领阶层的教授、经理、总裁，再到政军界人物都有。

       今天，华人和秘鲁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吃一样的中式炒饭，建设秘鲁的经济，丰富着秘鲁的艺术，共同打造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中文媒体和学校不缺，但在普及中华文化方面，眼前却是一段漫长而未知的路。

     首都利马是秘鲁华人的大本营。

       在这里，燥的陆地和潮湿的海滩相邻，残破的老房和新式的大楼交错，富人和穷人擦肩而过，一切是那么两极化，却又是那么和谐。

       老华人、新移民以及许许多多混血后代安分地各据城市一角，寻找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位于市中心的唐人街，成了各群体的汇集地。华人来买《秘华商报》，来茶楼吃港式早点，来选购中国食品，来参加社团活动，甚至就在这里开店谋生。隔着一百多的时光，剪去长辫子、摘下瓜皮帽的人们，正在同一条街上，和怀着同样梦想的先贤遥遥相望。在街上不期而遇的华人，仍以华语或广东话问候聊天。如果不是穿梭其中的秘鲁人，还有那招牌上的西班牙文，人们也许会误以为这是广州或香港的某条街道。

       对秘鲁人来说，中国并不遥远，因为中国人就在他们左右，中餐就是他们的主食。

       大半个世纪以来，华人在5000家中餐馆里忙忙碌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当地人称作“chifa”的中餐馆，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到了秘鲁每个角落。秘鲁中文杂志《新视野》曾报道，连没有华人居住的郊外小镇也出现挂着大红灯笼、写着Chifa招牌的小饭馆。不过，那是懂得煮几道中餐的当地人经营的“翻版中餐馆”。

地人之所以会把中餐馆称为“chifa”，个中有段渊源。早期移民多为广东华工，每到吃饭时间，送饭来的人就高喊“吃饭！吃饭！”当地人乍听之下像是“chifa”，久而久之“chifa”就成了中餐的代名词。当时的华工肯定没想到，今天秘鲁人对中餐的喜爱，甚至超过了华人本身。一名年轻的秘鲁人说：“如果只有一种选择，我会放弃秘鲁菜而选吃中餐。”

       1921年开张的第一家中餐馆南京酒家，让利马市民开始接触中餐。此后，当地人的餐桌上不再只有马铃薯、玉米和面包，而是各式中国菜，米饭更成了秘鲁人的主食。如今，中餐已和秘鲁餐并驾齐驱，成为当地两大菜系。报摊上摆着中餐食谱，扭开电视可看到中餐烹饪节目，中餐在秘鲁无所不在。当地人可以随口说出一串熟悉的中餐菜肴：炒米饭、炸馄饨、馄饨汤、柱候鸡。60年代中餐风行起来，市面上出现了一些西班牙语新词，如姜叫kion，酱油叫sillao，炒饭叫chaufa，云吞汤叫sopa wantan。当秘鲁人喊出这些和广东发音相似的字眼，也意味着中华饮食文化已在这里落地生根。

       创业起家的艰苦辛酸，早已随时间消逝，但遍布利马各个角落的中餐馆，却成了华人奋斗最好的见证。

       在利马数一数二的富临门酒家，就是华人以坚毅、冒险和勤奋得来的成果。这里接待过秘鲁许多高官显要。继承父业的罗兆雄有他的坚持：“我们要推广正宗的中餐，也要提高中餐馆形象。”他的厨师都是从广州和香港重金聘请过来的。餐厅的自助餐极受欢迎，他还计划推出让客人在家上网点菜叫外卖的创新服务。秘鲁的中华美食节，富临门是主要承办单位，还请来秘鲁总统主持开幕。

* *平安夜的餐桌上，很多华人和秘鲁人都会以烧乳猪取代火鸡。中华饮食在秘鲁的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利马蔚蓝的天空下，有在五星级酒楼运筹帷幄的商贾，也有在城市边缘挣扎求存的新移民。事业稳定的华人可以开房车，可以去郊游、打麻将或唱卡拉OK。以福建人为主的新移民，却只能和那间仅可容纳五六张桌子的小“chifa”相依为命。他们说：“除了生大病起不了床，不然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生活要比在中国老家辛苦十倍。”不走的唯一理由，就是赚到的钱比老家多。当地人最爱吃的炒饭售价一碟4块新索尔，一个月下来餐馆就有2000美金的盈利

    新移民集中的圣华区（San Juan de Miraflores），目前有两三百家这类中餐馆。那一带以当地贫民居多，治安不靖。哪怕只是一张小凳子，或是一张餐单，经常不翼而飞。对新移民来说，即使是一个廉价灯泡，也是重要的财产。

       新移民语言不通，只能在城市一角默默耕耘，似乎早已被世界遗忘。因此，当张献珉牧师带着福音走进他们的小“chifa”，很多人深受感召。宣道会秘鲁华侨事工会每两星期一次的聚会，教友都风雨无阻的出席。这也许是全世界最晚开始的基督教聚——午夜12点，新移民打烊后匆匆赶来，有时连晚餐都来不及吃。平淡生活中唯一的心灵养分，的确比生理上的饱餐更重要。

  秘鲁虽未追上发达国家的脚步，但它却不是一无所有。除了矿产、石油、生态资源等，秘鲁的农渔产品尤其丰富，却因为疏于管理而得了个“坐在金山上的乞丐”称号。然而，善于开拓的华人，还是找到了创业起家的空间。

       今天，秘鲁人到中餐馆吃饭，到土生华人黄业生经营的“Wong”连锁超市买生活用品，穿着由黄仲儒创立的Calimod品牌鞋子。秘鲁小孩用的文具，多由刘铨兴公司、泰兴公司、泰来公司或大陆公司批发出来。近几年秘鲁的建筑业和矿业前景看俏，揣着资金的新移民，飞到秘鲁大展拳脚。圣窝霞区（San Borja）这个新兴商业区的公寓，住进了许多踌躇满志的华人。这个地区治安较好，消费自然水涨船高，一栋中档公寓要六七万美金。

  混乱与污浊，是很多华人对利马的第一个印象。一年只有几场霏霏细雨，这里既不需要下水道排水，也不必携带雨具出门。少了大雨的洗礼，利马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当汽车疾驰而过，路上黑烟四窜，尘土飞扬。“窗明几净”这种美好画面，在这里是不可能的事。

       比起国际大都会，利马也许不够繁华，不够先进，甚至不够干净。但是华人发现，这里也因此没有发达国家的匆忙和压力，没有大都会的冷漠和疏离。秘鲁人亲切和善，没有等级观念，而且包容心很大，乐于接纳每个族群和文化。人文环境如此和谐，真正难得，下不下雨，倒显得微不足道了。

       华人移民常对他们远方的亲友说：“利马是个留人的地方。”也许是为了四季如春的气候，也许是为了发展的机会，也许是为了包容和谐的社会，但最重要的是，这地方从不让华人觉得难以适应。想念中餐，道地的粤菜、上海菜、四川菜、火锅都有，连婚宴喜庆需要的鱼翅乳猪也一应俱全。腻了，有海鲜或牛肉为主的传统秘鲁美食，也有当地盛产的玉米做成的饮料和甜品。华人既吃秘鲁鱼生（Cebiche）,喝秘鲁汽水印加可乐（Inca kola）,也到郊外烤肉。秘鲁华侨宣道会的刘牧师在国外住了几年，还是决定回来，原因竟然是：“这里的水果很便宜。”

 居住在利马的华人，总找得到爱上这座城市的理由。

       华人一旦住下来，多数都不愿走。不过，1996年，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袭击了日本大使馆并绑架人质，到处人心惶惶。有些华商为了人身安全，变卖产业，举家迁移他国。隔年，恐怖分子遭政府一举歼灭，利马的治安才逐渐改善。今天，和许多首都一样，利马也免不了一些小偷小抢事件，不过华人都知道哪一区是安全地带，哪一区是治安黑区。庆幸歹徒一般不伤人，对当地华人来说，利马仍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城市。

       每当夜幕低垂，霓虹灯闪烁的赌馆和角子机店，成了城里的一座座游乐园，诱惑着华人。有人只是赌赌运气，有人却押上了全副身家。某某华人沉溺赌博的新闻，偶尔在华人圈子里口耳相传，华人基督教团体还因此办过几场戒赌讲座会。秘鲁不禁赌，遍布利马大街小巷的赌馆很多是当地华人经营的，利马最大的赌场亦由华人投资。

       利马地广人多，却没有地铁连贯各区。搭出租车既方便又便宜，是华人出门的首选。当地人收入不高，路上充斥着兼职司机，加上政府管制不严，有执照的、没有执照的、旧车、破车都开到路上来载客。司机为了争取时间载客，在路上横冲直撞，而且为了节省都不开冷气，仅是开车窗透风。抵达目的地，又是一阵灰头土脸。当地华人对司机的驾驶态度颇有微言，但想想一公升无铅汽油要超过17块新索尔，还是搭出租车比较划算。

这座看似失序的城市，其实住着一个悠哉游哉的民族。秘鲁人约会一定迟到，答应的事也经常食言。了解了他们的习性，华人学着放慢脚步。在这个地方，一切都需要包容，他们深深明白这点。

   像漂泊的船终于找到停泊的港湾，许多华人来到秘鲁便停下了流浪的脚步。

       这么遥远的一个国家，为什么每年竟吸引了近万名新移民千里迢迢前来？“秘鲁不是花花世界，生活却很自在；秘鲁不是先进国，华人地位却很高。”这是在这里待了18年，经营旅社的汪丽群所得出的结论。

       秘鲁社会对外来移民的包容和接纳，让人忽视了传统的价值。春节期间，唐人街的舞狮舞龙固然热闹，一名父亲却说：“家人各忙各的，年夜饭也吃不成了。”

       每逢端午中秋，走在唐人街的华人后代，已经无法从包装缤纷的应节食品里，体味到其中包含的传统文化底蕴。

   中文教育亦然。早在1925年，秘鲁华社就设立了中文学校。不过多年来几间中文学校的大门总是开开关关，至今剩下3所，即中华三民学校，其分校孔子学校以及若望廿三世中文学校。这3所都是正规的私立学校，在利马颇有名气，每星期有2到3节的中文课，其余科目皆以西班牙语授课。

       在若望廿三世中文学校任教多年的高老师说：“学校里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有华人血统，但他们学起中文非常吃力，倒是有时秘鲁人更有兴致学中文。”这所学校由意大利人丘先觉主教创办，所以校园里有一间天主教堂，高老师和其他十几名华人天主教徒每个星期日都来做弥撒。

       今天的秘鲁华人，仍然努力在主流文化之外寻找保留祖先传统的一方空间。他们在秘鲁亡人节举办集体祭祖活动，并请神父来祈祷。少了清明的肃穆，少了传统的元宝蜡烛，秘鲁华人敬仰先辈的精神始终未改。

       两族通婚的婚礼中，有上香、敬茶仪式，也有秘鲁式的晚宴派对。根据秘鲁习俗，新郎要跟女方所有女亲戚跳舞，新娘则必须跟男方所有男亲戚跳舞。

       华人和当地女子通婚几乎成了这个社会的传统。自华工开始，秘鲁女子就对华人的刻苦、负责和专一赞赏有加。难怪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华人是蜜糖”的说法。秘鲁有个有趣的规定，婚前15天，结婚双方必须在教堂和3家不同的报章刊登启事，公告天下。

适应和融合都需要时间，而华人社团总是及时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当年，重获自由身的华工无法马上适应当地社会，带着强烈宗亲色彩的华人会馆于是在利马沿海城镇成立。先贤在秘鲁开拓、建设，也带领华社融入当地，为华社排难解忧。他们走了，却留下了一个和平而没有纷争的华人社会。

       “秘鲁华社非常团结，没有帮派之分。”说起这件事，古冈州会馆主席罗源深感自豪。古冈州是秘鲁最早的华人会馆，成立于1867年，也就是第一批华工抵达的18年后。此后，其他八大会馆相继成立，即番禺、中山、同升、鹤山、介休、花都会馆、龙岗公所以及龙善社。中文读物也陆续诞生。至今还在出版的《公言报》就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老报。而走过了70多年岁月的西语杂志《东方文化》，仍是土生华人了解东方文化的重要平台。

       当秘鲁中华通惠总局在1886年建成，当地华社从此有了核心的管理机构。

       今天，华人仍以位于唐人街中心点的通惠总局马首是瞻。至于其他的华人会馆，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霜，它们的任务似乎也完成了。想当年，先贤曾在这里开过多少会，做过多少关于华社的重大决定，安顿过多少无处可去的新移民。如今，会馆的墙壁已斑驳，墙上的照片也已发黄，它们就像一个个寂寞老人，向无数经过的后代，絮絮诉说着那些早已远去的辉煌事迹。偶尔一两名路过的后辈仿佛听到了这些故事，他们走到先贤的灵位前深深鞠躬，再给旁边的关公塑像上香。

       秘鲁华人始终相信，关公保佑了他们漂洋过海的先贤，也一定会继续保佑在秘鲁生活的万千华人后代。因此，5000间中餐馆都不约而同地挂上了关公画像。每年6月，古冈州会馆、同升会馆以及龙岗公所都会准备烤猪，隆重庆祝关圣帝诞辰。秘鲁中文网站“秘鲁通”，也会报道当时的盛况。

* *中医极有可能是随着华工一起进入秘鲁的。直到1918年，利马发生了致命流行病，由一名中医师潘侣安所配制的中药挽救了很多人命，中医中药才被秘鲁民间所认可，在秘鲁，中医师一度享有颇为崇高的社会地位。如今，中医诊所非常普及，然而那些拥有小铜秤以及百子柜的传统中药店却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关公也许真的听懂了秘鲁华人的祈求。今天，华人在秘鲁是备受尊重的民族。很多秘鲁人拥有华人血统，自然是其中一个原因。然而最关键的是华人的贡献。

       “中国人不仅为秘鲁人提供了美味的中餐，也提供了一流的哲学家、作家和专业人员。如果没有那些在19世纪耕种了我们土地的中国人，秘鲁不可能取得现在的发展和成就。”秘鲁前外交部长费尔南多德特拉塞格涅斯 格兰达（Fernando de Trazegnies Granda）这样说。最好的例子就是当年戴宗汉引进新的稻米种植法，提高了秘鲁稻米产量，获得政府颁予的农业勋章。参与建设的同时，华人也全力回馈秘鲁社会。他们为贫困地区建学校、盖医院、送物资。

      不管天灾或人祸，华人华裔始终和这个国家站在同一阵线，甚至，走到了最前线。

       1999年是华工抵秘150周年，秘鲁从官方到民间都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那年，圣窝霞区建起了中国公园，卡亚俄港口伫立了一座纪念碑，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一套纪念银币，通惠总局和土生华人组织联合举办许多大型的庆典活动，有花车游行、文化表演、联欢晚会、土生华裔小姐比赛、表彰有功华人等等。秘鲁国会和文化界也出版了多部跟华人移居史、中华文化以及中餐有关的书籍。

       同年，秘鲁总理更为早期秘鲁雇主欺压华工的事件，公开道歉。虽然这句“对不起”迟了150年，然而，华人和秘鲁人并没有把自己羁绊在历史恩怨里，因为大家早已是一家人，难分彼此。

       走到今天，最令华人安心的是华人可以在秘鲁自由地参政。华裔将军和高官比比皆是，甚至有人担任过总理。即使只要住满两年，或与当地人通婚3个月后就可入籍，一些华人仍旧拿着永久居民的身份。反正在这里，身份、种族、肤色都不是重点。差别在于，永久居民必须每年缴付约20美金的外侨税，如果要和秘鲁公民结婚，则须出示自己在原居国没有结婚的证明。

1921年，配合秘鲁独立100周年纪念，通惠总局筹资在利马市区的大公园里建了一座宏伟美观的大型云石喷水池作为贺礼。4年后，总局又以全秘鲁华人的名义，向利马市政厅捐赠了两座分别为“驼羊”和“训牛”的铜雕，庆祝利马开埠400周年。

  通婚是两种文化互相交融的捷径。在秘鲁，这个过程早在100多年前就开始了。

       如今，每十个秘鲁人之中，就有一个拥有华人血统。他们也许有着鲜明的东方轮廓，也许还保留中国姓氏，也许懂得说几句广东话，也许还受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影响。又或许，在一些通婚好几代的家庭，所有关于中国人的蝶丝马迹，经历过时间的冲刷和过滤，早已消失殆尽。然而，他们跟在当地出生的纯华人一样，都拥有共同的名字——土生华人。

       很多土生华人都知道，自己身上流着一定比例的华人的血。然而，秘鲁文化才是大部分人的母体文化。

       一出世，他们就和当地人一样，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以后，最隆重的节日都和秘鲁习俗有关。元旦前夕，土生华人穿上代表好运的黄色衣服，和朋友喝酒、跳舞、开派对。有人在大街上焚烧布人偶。他们相信，霉运会随着一切烧成灰烬。有人换上远行装束，拖着行李箱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盼望来年得偿所愿到国外旅行。当午夜的钟声响起，有人吃下12粒葡萄，许下12个月份的期许。在拉丁文化下长大的土生华人，总能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上挥洒热情。

       部分土生华人曾听长辈的唠叨，或因童年到过中国，对美丽的中华文化念念不忘。于是，他们创立了土生华人组织，如秘鲁华人协会和秘鲁华人文化中心。通过文化表演、展览等活动，拥有同样身份背景的人来寻找对自我的认知，寻觅着一条通往祖辈文化的道路。这个过程，化成了文字和照片，记录在秘鲁华人文化中心出版的月刊上，留给后人去回顾。

  华人来到秘鲁，不只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秘鲁的社会结构、饮食习惯，甚至创造了秘鲁一部分的历史。

       秘鲁的过去和现在，都写上了华人的名字。未来，秘鲁人仍会亲切地把华人唤作「同胞」（Paisano）。这份和谐，一定会代代相传。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其国名在西班牙语为“赤道”之意。它曾经是印加帝国发源地，1532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长达300年，1809年宣布独立。二战后政局动荡，政变迭起，文人和军人政府交替执政达19次之多，直到1979年之后，政局才渐趋稳定。

       厄瓜多尔属于发展中国家。其石油产品占其出口贸易总值三分之一以上，是该国最重要的外汇收入。此外，厄瓜多尔也出口香蕉、虾及咖啡。2000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厄国取消了贬值中的苏克雷货币（Sucre），改用美元为通用货币。

       厄瓜多尔气候因地区而异：港口城市瓜亚基尔（Guayaquil）四季皆夏，是全国最繁忙的城市；首都基多海拔2830米，属凉爽的高原气候；而丛林区如克维多（Quevedo）属于潮湿的热带雨林气候。华人基本上分布在以上3个地区，并顺应环境发展各种行业。

   1875年，一批广东中山人被人用“卖猪仔”的方式骗到秘鲁建造南美大铁路。当时有许多华工或过度劳累、或染病致死，有者甚至因为不堪折磨而自寻短见。所以，有不少华工费尽心思准备逃到周边国家。与秘鲁相邻的厄瓜多尔，就这样迎来了第一批华人。

       他们首先在曼塔（Manta）登陆，然后辗转来到克维多。在农民出身的华人眼里，克维多的沃土是一块难得的宝地。他们传授给当地人种植方法，当地居民也对他们以礼相待。华人终于认定克维多为栖身之所，正式为漂泊不定的日子划下了句点。

       待一切都安顿下来以后，华人在缺乏资本及语言不通的困境下，只得从事当地人不愿意做的粗重工作，例如挨家挨户地收集脏衣物，替人洗衣糊口。

       1899年，厄瓜多尔政府开始禁止华人入境。这项变相的排华法令，完全断绝了厄瓜多尔华人的发展，迫使华人无奈地再次踏上征程，另谋出路。而走不了的华人就只能听天由命。1918年，厄瓜多尔境内只剩下1500名来自广东的华人。

       1944年8月，厄瓜多尔前总统维拉斯哥（Velasco）发表声明，欢迎华人通过正规的手续移居到厄瓜多尔来，从此掀起了第二波的移民高潮，同时也惠及了原本就在境内的华人。经过数十年的彷徨，老移民终于获得合法的居留证，他们的财产也获得更大的保障。

       此后，到来的华人大多是合法的移民。他们从中国飞到南美洲的周边国家，之后再辗转进入厄瓜多尔。此外，也有一部分移民从秘鲁迁往此处。新一批的华人移民虽然是名正言顺入境，而且出路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耕田种地等劳力工作，但是在手头上没有太多资本的情况之下，他们免不了还是要打工数年，一边苦干一边偷师学习经商之道。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出国热，适逢厄瓜多尔的移民条件放宽，只需要在中国把手续办妥，在入境厄瓜多尔7天之后就可以领取合法证件。这一来，华人自然更是蜂拥而至，这一批移民的出现，为当地华社注入了一股新力量。

*当年，厄瓜多尔政府曾专门聘请了6名农民出生的华人，前来传授耕田种稻等种植技术。该国农业发展蓬勃，并成为盛产香蕉的“香蕉之国”，华人功不可没。*

     目前，厄瓜多尔约有混血华商17万人，他们主要说西班牙语；另外约3万名华人则是老移民及其后代，以及讲华语的新移民。

       华人集中在瓜亚基尔、克维多和首都基多3个主要城市，其中以沿海的瓜亚基尔华人最多，其中又以来自广东中山的华人老移民为主。早期，首都基多并无华人移民，直到最近十年，新移民人数渐多，而且来自五湖四海，各个籍贯皆有。

       厄瓜多尔庞大的混血华裔社群有着历史因素。早年华人移民均为男性，在此落脚后即与当地女性成婚，衍生出混血华裔。随着时间的推移，代代相传，混血华裔如滚雪球般增加，远远超过纯血统华人的数量。

       混血华裔已完全被同化，不论是生活方式、思想行为，宗教信仰，都已全然本土化。他们能讲流利的西班牙语及地方语言，但却不会华语或中国方言。不过他们仍保留“变相”的华人姓名。他们也隐隐然意识到自己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并引以自豪。

       虽然厄瓜多尔华人的构成分子复杂，从事不同的行业，彼此不相往来，但也没有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多年来相安无事。彼此相处尚算融洽，隔阂不大。

在厄瓜多尔，不同籍贯的华人，从事行业亦有别。广东老移民多投身餐饮、五金、杂货等行业，而九成以上的福建新移民则从事贸易，并以经营鞋子及手提袋为主。据悉，福建人曾尝试靠“锅铲”起家，但因烹调手法不合当地人口味，导致生意惨淡而被迫结业。近年来新移民中的外省人，多从事零售、批发进口及餐饮业。

       目前厄瓜多尔共有约800家规模不一的中餐馆，其中500家集中在瓜亚基尔，另300家则在首都基多。

       此外，华人五金店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可观，目前，全国拥有约130间华人开的五金铺。在瓜亚基尔，五金店铺都集中在一起，几乎家家都生意兴隆。但投入五金行业的商家越来越多，竞争激烈，造成该行业难有突破。商家表示：“这一行依旧有利可图，只是发展再难攀高峰。”

       如今，中餐馆和五金业已呈饱和状态。商业头脑灵活的华商，转而引进中国商品，中国货价廉物美，大受欢迎，这就大大促成贸易进口业与零售业的兴起。进口的中国货种类繁多，包括服装、鞋袜、电器、装饰品及脚踏车等等。

   至于台湾商人，携来丰厚的资金，投资设厂，生产食品、纺织及塑胶等产品。

       厄瓜多尔华人亦有从事种植业及养殖业的。种植业主要集中在土地肥沃及雨量充足的克维多，养殖业则分散在沿海地区，大部分集中在马查拉（Machala）一带。一些华人拥有自己的农园，在自给自足之余，也批发予当地市场。华商朱家俊就拥有30公顷的农园，除了种植供自己超市贩卖的蔬菜之外，也种植油棕幼苗，外销他国；当地著名企业家梁公壁也种植水果供自家工厂生产罐头。

       在首都基多，还有少数华人从事旅行社及美容院等行业。

       厄国混血华裔则人才辈出，其中包括厄瓜多尔大学教授华盛顿·阿霍伊（陈志忠）、经营太平洋香蕉王公司的“香蕉王” 赛贡多·王（已故），及前劳工部长吉列尔谟·陈博士，都是当地著名的专业人士。

     当年中餐在当地掀起热潮时，广东话译音的“Chaulafan”（炒冷饭，意为炒饭）及“Chifa”（吃饭，现指中餐馆）等外来词，也被纳入厄瓜多尔的西班牙文里。而炒饭更是各家中餐馆的“镇店之宝”。  说起“Chaulafan”的典故，就得回溯几十年前的往事。据说，当年广东人陈箕公在厄瓜多尔经营餐馆，某晚11时左右，陈箕公的餐馆如常要打烊时，店里突然闯入3个当地人，嚷着要食物。当时店里已无主要食材，老板灵机一动，生火把冷饭炒一炒，再加点酱料、虾仁、鸡丁、肉块及青菜丝，炒成3大盘炒饭。那3名当地人狼吞虎咽、饱餐一顿后，满意地离开了。

       3天后，店里来了六七个生客，对着菜单看了又看，却叫不出名堂来，说了半天，老板才恍然大悟，再次生火炒起冷饭来。客人问起菜名，老板不假思索地说“Chaulafan”，翌日，菜单上就多了这道菜肴，并在当地大受欢迎，当地人甚至以“Chaulafan”称呼华人，让人啼笑皆非。

       改良式“炒饭”征服了当地人的味蕾。当地客食量大，消费能力有限，所以经济实惠的炒饭经常成为餐桌上的主食。

       走在瓜亚基尔街道上，偶尔可见中文字的招牌。小小的店铺上，挂着“Chifa”的招牌，高挂的红灯笼永远成双成对；走进店内，墙面上的中国结、红彤彤的挂历映入眼帘——这些正是厄瓜多尔小型餐馆、甚至任何华人店铺的招牌装饰。放眼望去，顾客九成是当地人。

       当地人好中餐，因此以“Chifa”为招牌开设的餐馆在当地有一定的号召力。华人说，近年来连当地人也看中了中餐馆的商机，也纷纷开起“Chifa”来了。

  当初，多数华人抱着“赚到钱即移民北美”的想法而来，岂知当赚得第一桶金后，他们却已心系厄瓜多尔。“当时，几乎人人都盘算着赚了钱便走，但到后来实际走的也没几个。”老移民李树强表示。

       如今还留在那里的老移民，除了继续忙碌过日子，每逢周日还会相聚，打打太极、会友聊天，甚至组团到南美各国参加各项比赛。当初的美国梦，早已不知所踪。

       新移民眼见老移民发展不错，便接二连三到来。不少来自穷乡僻壤的新移民向亲友借了钱，冒着非法逗留的牢狱之险，背负着一家老小的期望来到厄瓜多尔。他们总是期盼着数美金的日子快些到来，早日把债务还清，衣锦还乡，或到美国去，一圆美国梦。

       他们先是勤奋刻苦、安分守已地打工挣钱，稍有积蓄，便当起老板来。厄瓜多尔的创业成本低，区区一两万美金，便能做些小生意。

       不过，厄瓜多尔的华人移民，落叶归根者人数远不及落地生根者多。目前，3万名华人之中只有六七千人仍持有中国护照。许多华人为了实际利益及经商便利，而选择入籍厄瓜多尔。

 一名华人表示，拿着该国护照，可免签出入中、南美洲国家。“只要有了证件，学会西班牙语就不怕被欺负。碰上海关刁难，我还能理直气壮地与之争论。”

       放弃祖国国籍，并不代表忘本。许多已入籍的华人，每年也必忙里偷闲，一家大小返中国一解乡愁。部分人则坚持保留原国籍，期盼有一日能告老还乡。

       新移民多为福建人，而老移民多为广东人，两者语言不通，又从事不同类型的生意，彼此甚少打交道，关系也比较淡薄。除了为生活挣扎求存，新移民还面对语言不通的困境，难以融入社会。后来，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贴心地为新移民开办西班牙语班，并聘请通晓粤语及华文的老移民担任导师，不但帮助了新移民，也拉近彼此的距离。

       一些热心的老移民还会赠送电器及物品给新移民，用以装备他们租住的居所，双方关系日渐融洽。

* *设于1978年的肯尼迪医院（Grupo Hospitalario Kennedy），是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医院，创办人为王（Wong）氏与林（Lama）氏两大华裔家族。医院由王氏出资开设，林氏则负责看病问诊。医院从只有20名医生及60张病床，发展至今已有160名医生及近千张病床的规模。这家医院还有个连当地人都不晓得的优惠，即凡华人问诊，费用会自动打九折。*

       目前，该国共有20个华团，由不同的群体组成。最早的是成立于1907年的中华总商会。后来移民陆续到来，华人人数增多，分歧在所难免。当年厄瓜多尔中华总商会就因政治及家属因素，分化成两大派系，权力斗争相当激烈，最后导致一代商会就此没落。

       自中华总商会没落后，华社群龙无首，直到1993年成立“8人小组”，并吸纳了100名原属瓜亚基尔华侨华人协会的会员后，终于1999年成立了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再次团结华社。

       如今，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发展稳定，每年固定主办节庆活动之余，也当起红娘，举办活动让未婚男女相互认识，而8月份的花车游行更是华社的年度盛事。

     除了为华人服务，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也负责接待中国官方访问团、表演团体等，住宿、饮食、旅游全由华人解决。

       1967年成立的克维多中华慈善会，则在70年代建立了该国唯一的华人公墓，这在南美洲诸国中实属难得一见。华人公墓虽建在天主教坟场里，但并不局限任何宗教的先人在此长眠。华人会在每年11月2日至11月3日的万圣节（又称亡人节）前来扫墓，而中华慈善会在这一天也会提供元宝、蜡烛、烧猪、水果等祭品让来者供奉先人。克维多华人公墓仅有160个墓位，所以一些华人死后或葬在当地坟场，或由后人将遗体运回家乡安葬。

   在厄瓜多尔，华人移民后裔懂华文者少之又少。这些老移民后代，外貌虽仍是百分之百的华人，但是他们几乎已完全同化，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但华语或方言却一窍不通。

       其实，厄瓜多尔曾出现过正规的中文学校，并拥有校产，高峰期曾有300名学生，共开办6个班级。然而随着华人移民减少，华人子弟和混血华裔又不上中文学校，故中文学校被迫改制成当地学校，并招收当地学生。后来，随着中华总商会的没落，学校因无人管理，在1997年关闭及拆除。

       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与厄瓜多尔的贸易扩展，前往中国做生意的商人越来越多，更多人需应用华文华语，相应地提升了华文的价值。目前，厄瓜多尔至少有4所大学开办中文班。

       在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国家汉办的支持下，振华中文学校于2007年9月正式成立，华人终于有机会学习母语。不过，振华中文学校仍在起步阶段，目前只有一名老师及60名学生，每周授课两次，每次两小时，采用中国编印的教科书，3个月为一学期，收费40美金。

       老移民生活宽裕，且重视孩子的教育。他们一般把孩子送入每月学费约300美金的美国国际学校，让孩子以后能到美国接受大专教育。通常，孩子毕业后会留在美国发展，成家立业，再把父母接过去定居。不过老移民一般习惯了原居地，只是厄美两地来往穿梭。

       “我把孩子送入德国学校，好让他们多学一种语文。”华人家长认为孩子不会华文已输人一截，所以应学会另一种外语，有助于将来的出路。

* *台湾高雄的菩妙上人一心想在厄瓜多尔弘扬佛法，经由台湾移民的热心捐助，建成了厄瓜多尔第一间佛堂元亨寺，占地一万平方公尺。该寺于2007年对外开放，并特邀瓜亚基尔市长Jaime Nebot主持剪彩仪式，厄瓜多尔电视台亦有报道。庙堂的静坐班及华文班还吸引了不少当地学员。*

       一些老移民把孩子送入德国国际学校就读，学习德语、英语及西班牙语，继而到德国接受免费大专教育。

       厄瓜多尔唯一的华语电台，是1968年在基多市始创台的“安第斯之声”（HCJB-FM）。它一直延续至今，是厄国唯一的华语电台。然而以往一连7天开播的电台，如今只有在周六与周日晚上十点才开播，分别有粤语及华语的“医药信箱”及“非常岁月”两个节目。

       2007年，卫星转播让厄瓜多尔的电视荧幕出现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在同一年里，华人也创办了华文报章《厄华侨报》。12版的《厄华侨报》为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的机关报，内容以中国及厄瓜多尔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为主。

       该报的出现对华社而言是一大惊喜，该报先是免费派送3个月，后来因广告收入不足，亏损过巨，只得收费销售。尽管目前日销600份，依然入不敷出，每月亏损800至1000美金不等，还需仰赖华团补贴，才能支撑下去。

郝晶是振华中文学校唯一的中文老师。

从厄瓜多尔华裔的西班牙姓名里，可寻见中文姓名的踪迹，而所谓的中文名字，实际上为小名。原来，当年首批华人移民目不识丁，在登记时误报小名及乳名，当地官员也不明就理地把小名当成姓氏来记录，这么一来，“阿海“（粤语A Hoi）成了”阿霍伊“。由此造成的变”姓“比比皆是。

       如今，华裔西班牙文姓名中常常出现“阿二”（A Er），甚至“阿狗”（A Go）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姓氏”。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批移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不再重蹈覆辙，姓氏翻译也较为正规，例如将“顾”姓译为“Cruz”。

       变“姓”之误固然令人遗憾，但如今古怪姓氏却成了华裔考究祖籍的唯一线索。他们从残留的中文姓氏中寻根问祖，再认祖归宗，亦在抽丝剥茧的寻根过程中了解中华文化，对自身拥有的华人血统感到光荣。

       2006年，厄瓜多尔第五代华裔华盛顿·阿霍伊（陈志忠）就曾千里迢迢从厄瓜多尔到中国中山市三乡白石铑山村寻亲。他高兴地表示：“虽在厄瓜多尔成长，但在祖父的调教下，我还会说中山客家话，与乡亲沟通绝无问题。”

  “东方大酒楼”是厄瓜多尔企业家梁公壁的一项投资，从筹建至开业只花了一年时间。

       这座4层楼高的豪华餐馆，是华人办婚宴、洗尘、请客的最佳选择。餐馆内的会议厅曾获厄瓜多尔总统垂青，在该处召开记者会。

       梁公壁自1975年由香港到厄瓜多尔闯天下，以制酱油起家，因此有个“酱油梁”的称号。创业初期，他带着产品到小商铺推销，游说店家摆卖其产品。后来产品受欢迎，生意渐上轨道，他再借机生产自家品牌的即食面，产品还外销至周边国家如巴拿马及墨西哥。

       做生意“求新、求变、求快”的梁公壁似乎永不言倦。这边生意一上轨道，那边便开始涉猎其他行业。他还以“一条龙”形式生产水果饮料及罐头，全权包办种植、生产及销售。

       本着永不停歇的企业精神，他在2008年开设了第三家工厂。这回，他看准厄瓜多尔“水比汽油贵”的市场，在山泉地带建了200公顷的现代化工厂，生产矿泉水。除了主干产品之外，其“东方食品公司”亦生产香蕉粉、玉蜀黍粉、味精、辣椒酱等。

   厄瓜多尔华社是复杂的。华人与混血华裔之间，老移民与新移民之间，因思想上的分歧及生活方式的差异，始终存有鸿沟。然而有时中国的情意结，却把老、新移民联系在一起，一旦面对共同的难题，他们便会站在同一阵线，共赴时艰。

       当初被华人视为跳板的驿站，经过了长期的经历与考验后，华人改变了对厄瓜多尔的看法，觉得这个赤道边缘的国家，地方美丽，人民热情，确实有留下来的理由。

       厄瓜多尔华人，终究还是幸福的一群。

 玻利维亚因纪念拉丁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而得名。1825年，正是这位来自委内瑞拉的英雄率领大军，帮助玻利维亚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

       拉巴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首都城市。它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和平”，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然而，独立后的玻利维亚一点也不和平。

       与邻国的两场战争，使玻利维亚不但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国土，而且还从临海国家变成了内陆国。国内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前后经历了190余起政变，平均每十个月一次，更换过近70名总统。加上贪污腐败盛行，工潮澎湃，即使蕴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各种资源，玻利维亚至今仍是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

       尽管没有吸引人的优越条件，这里却包容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为了生计而勇闯四方的华人，一直到了20世纪初才注意到玻利维亚。据说，最先抵达此地的是一名姓方的广东人，他当初是从秘鲁坐着牛车而来的。

       玻利维亚华人的先驱为宗教移民，此一现象在整个海外华人世界中并不多见。1963年及1965年，在香港普世教会的安排之下，两批移民由香港乘船来到圣克鲁斯市（Santa Cruz），每一批约有十户人家。

       60年代的圣克鲁斯仍是一个落后的乡镇。这里完全没有柏油路，只有稀疏的路灯，房子屋顶上盖的是棕榈叶，而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则是马车。

       当时，教会将移民安顿在中国第一农场和第二农场，给他们提供生活上的一切所需，包括住宿、衣服以及一年免费的伙食。

       起初，这些华人在农场里种菜，每逢收成时节，他们便挑着担子步行到城里去售卖农作物。直至两年后，教会自香港运来自行车，华人才有了代步工具。

       他们省吃俭用，存够本钱之后，就开始饲养猪、鸡和牛等家畜。当时，圣克鲁斯市的人口还是很少，市场并不大。有的华人购买了卡车运货到首都拉巴斯去卖。

       渐渐地，华人开始走出农场，进城开店，做起小生意来。其中以开设餐馆的最多，也有少数人开设杂货店、贸易行与小工厂。如此一来，日子长了，两个中国农场也就荒废了。

       台湾人到来则是70年代后期的事。他们以投资移民的身份开设小百货店。另有一些应聘过来的技术工人，在合约期满后，就留下来经营小生意。

       嗣后，这里慢慢有了华人开设的珠宝首饰店、汽车和电器修理铺、旅馆、面包店、礼品店、舞厅、照相馆、中医诊所、理发店、纺织厂、塑胶制品厂和食品加工厂。然而，到了70年代末，玻利维亚的华人总数也不过约寥寥的100人。

       那时，玻利维亚的商业发展尚在起步阶段，华人的店铺生意兴隆。但是，好景不常，1982年的一场货币危机，导致华人的存款大大贬值，一夜之间，财富几乎化为乌有，让人欲哭无泪。老华侨回忆说：“到医院生个孩子都要背一麻袋的钱去。”

       由于前途茫茫，华人唯有纷纷打道回府，或另觅栖枝。

       在货币风暴过后，依然有华人前来投靠亲友，甚至携带家眷过来闯事业。90年代，中国大陆的移民来得最多。当时，玻利维亚的签证条件较为宽松，许多人都将此地当作移民欧美国家的跳板。

       有些移民通过中介偷渡入境。他们大多来自福建的农村，每人只需付3万美金，中介便能代购船票，获得经济担保书，办妥签证手续。

       在那些年代里，华人被欺诈及勒索事件每天都在玻利维亚上演，遇害被杀的案子也不时发生。华人大多经商，经济条件比较好，往往成为受害者。

       后来，当地华社痛定思痛，毅然团结起来对抗这些不法分子，迫使他们知难而退之后，玻利维亚华人的日子才逐渐回复平静。

尽管玻利维亚政变不断，游行示威频繁，经济落后，华人移民仍然继续入境。现今3000名左右的华人，居住在东部最大城市圣克鲁斯的占三分之二，其余则散布在首都拉巴斯和西部城市科恰班巴（Cochabamba）。

       福建莆田人姗姗来迟，但已跃升为主要的华人群体。他们几乎无例外地开炸鸡店或烤鸡店，圆着自己安家致富的梦想。夜里，他们大多喜欢打麻将或上赌馆消磨时光。早来的香港人及台湾人则延续传统行业，安份地经营中餐馆、百货店以及其他服务业的商店。少数佼佼者也在进出口贸易和工业领域别开天地，脱颖而出。

       当初，很多人的确把这里当跳板。然而，住下来的华人觉得，如果资金有限，到北美国家只能替别人打工，又要遭人白眼。在这里，不管店面多大，自己毕竟是老板，乐得自在。

       这里华人人数不多，却也组织起华侨联合会守望相助。人在异乡，并不妨碍他们建起佑海宫膜拜妈祖。中文学校的出现恐怕还需时日，华人期望能先办个中文班。

       时光流逝，不知不觉，华人其实已经对玻利维亚日久生情，平添了几许留恋与不舍。

    社会政治局势长期不稳，的确严重阻延了经济发展，加上市场空间有限，无法造就财力雄厚的大企业家，外来移民更缺乏一展身手的余地。教育程度不高的华人，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在当地复制一间又一间烤鸡店。

       华人从20世纪70年代起涉足烤鸡店，很快就后来居上，取代了日本人和韩国人。目前，华人经营的烤鸡店已突破200家，也就是说，基本上每十多个华人中就有一个是烤鸡店老板。在华人比较密集的圣克鲁斯，华人烤鸡店几乎占据了当地烤鸡业市场的80%。

       王和夫卖了20多年的烤鸡，回忆当年，犹是无限感慨。“当初的店铺都是租来的铁皮屋，摆上几张桌椅就开张做生意。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烤鸡、收钱、打扫、洗刷，样样都要自己来，非常辛苦。”

       这些烤鸡店单一菜色，要么烤鸡，要么炸鸡，规模大一点的店两种套餐都卖。不用推出新菜式，也不用创设新煮法，更不必大肆宣传，却天天客似云来。烤鸡店甚至不用装璜，因为当地人只想填饱肚子，不讲究任何情调或排场。当地华人常说：“烤鸡店真是伟大的行业。同样一式的烤鸡不只养大了好几代的玻利维亚人，也养活了开烤鸡店的几千名华人。”

       一座城市有上百家烤鸡店，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华人靠的就是薄利多销。烤鸡套餐除了有鸡肉、炸薯条、炸香蕉片，还附上米饭或面条。当地人觉得比较划算，更喜欢光顾华人烤鸡店。

       只提供汽水和矿泉水，不卖酒，是华人烤鸡店不成文的做法。原因是当地人嗜酒，老板最怕招来借酒装疯的“醉猫”。

       店里的34寸电视机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它对招揽食客大有助益。装不起卫星电视的玻利维亚人喜欢到店里边吃烤鸡，边观赏电视节目。到了足球赛季，店里更是座无虚席。顾客少的时候，华人老板会把电视转到中文频道，关心一下中国大陆或台湾的最新消息。

       烤鸡店属于小本经营，开业不难。新移民过来后，只要在亲友的店打工偷师，再拿出几千美金，就可以另起炉灶。当地劳工便宜，哪怕是初来乍到的新移民，也会请几个玻利维亚人到店里帮忙。

   早上8点，华人老板就必须打开店门，让工人进来清洗鸡肉、烤鸡、炸鸡，或做其他琐碎的准备工作。11点，烤鸡店开始营业，忙碌的一天正式开始。店里人声喧闹，老板不断把柜台的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收钱、算钱。员工充足的时候还能应付，要是有员工请假或缺勤，老板就得卷起袖子，到又闷又热的厨房帮忙。到关门打烊，华人回到店后或楼上的住家，已经是午夜十一二点。

       烤鸡店全年无休，华人老板嘴里抱怨疲倦，心里却很踏实。每个月的盈利，除去基本开销，就是汇款回老家，或让孩子上好一点的学校。

       玻利维亚没有太多奢华的物质诱惑，华人最大的娱乐不过是和朋友打牌搓麻将，唱唱卡拉OK，或是上赌馆解解瘾，生活俭约而朴实。

       说起勤俭持家，当地华人可是想到做到。很多人以店铺为家。如果租房，月租大约70到140美元。虽然他们开的是2万美元一辆的二手车，外出主要还是搭公车和出租车，一来方便，二来省钱。尤其在拉巴斯，市内道路狭窄，车子又多，开车上街老是找不到地方停车，还不如搭出租车便利。只要拨个电话，三五分钟后出租车就开到家门口，到市中心收费一般不会超过1.5美元，经济实惠。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赚得少，花费也小。

       对华人来说，发大财也许不太可能，但实实在在工作，扩大营业，一家人三餐温饱也不成问题。除非有一天玻利维亚人突然不吃鸡肉，要不然华人在烤鸡业这行仍可以细水长流。

 “不喜欢的早就走了，留下来的都喜欢这里。”这是一名老华侨谈到玻利维亚时的切身感受。

       的确，也许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有资格去评断一个地方的好坏。

       在外人和离境者的眼里，玻利维亚政局动荡，是一个令人却步的国度；但留下来的人看法不同，觉得生活环境安定。虽时常上演的罢工示威，是他们熟悉不过的街头一景，但对生活并没有大碍，日子照样可以安心地过下去。

       问问做各类生意的华人，答案竟惊人地相似。

       经营塑料制品厂和木材厂的郭照庆，手下有40个工人。去过不少地方，但惟有回到玻利维亚，他才能真正放松下来。在圣克鲁斯住了快30年，他毫不掩饰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其他地方的人工作是工作，娱乐是娱乐。在这里工作就是娱乐，不必刻意去休闲放松。”

       与郭照庆差不多同一时期来的还有大约200多名台湾人。他们在这里开素食餐馆、美容院、旅馆、保龄球馆等，生意大都上了轨道。其中陈锐津开的养猪场，现已发展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农场，也是唯一的华人大型企业。

       民风纯朴，环境干净，生活简单，没有压力，是华人身居玻利维亚最实在的体会。

       即使在这里扎下了事业根基，甚至建立了新的家园，第一代华人仍不时想起老家的种种好处。大部分人赚到钱后，多半会将子女送往欧美读书就业。他们在这里撒下了汗水，消磨了年华，是留还是走的问题，在日复一日的劳碌中，成了他们心中难解的困惑。毕竟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已化为他们的记忆与情感，很难潇洒地说走就走。

       虽然玻利维亚的周边国家，平均生活水准都比较高，东面的巴西更是南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但久居这里的华人深深了解，生活中那份自在悠闲，才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里没有邻国紧张兮兮的工作环境，没有令人沮丧的交通堵塞，没有空气和噪音污染，更没有败坏的治安问题。看似萧条的城市里，其实也透着生机，只是一切都显得宁静而安逸。不疾不徐，不慌不忙，正是这里的生活节奏。因为从容，幸福放大了，快乐深化了。当地华人从不因身在南美洲最穷的国家而看轻自己。

       内心的满足，难为外人道也。

    当外人好奇华人对玻利维亚的留恋时，华人想也不想，脱口而出：“不必担心青菜有农药，因为农夫没钱买农药。海产肯定很新鲜，因为鱼贩没钱买雪柜。”三两句话，几分幽默，几分轻松，伴着几分智慧，几分热情。

       既来之则安之，市场太小，华人小规模、多样化经营即可。只要诚实、公平做生意，这里不会让人饿肚子。当地餐食菜式单调，华人学着去欣赏，慢慢地也爱上了用土豆、豌豆、玉米、大葱加上肉类熬煮的热汤。路上遇上游行，交通堵塞，可以干脆把车子停在一边，反正大家都不赶时间。这时候烤鸡店反而门庭若市，因为当地人做不了什么事，只好跑到餐厅打发时间。不过，罢工若持续好几天，运输不畅，煤气和鸡肉短缺，华人老板又难免会愁上眉梢。

* *拉巴斯地处高原，一般电饭锅煮出来的米饭熟不透，因此当地每户华人家庭和烤鸡店都有高压锅，才能做出美味可口的米饭和面条。*

       在华人看来，玻利维亚原始、朴素，充满着新奇和特别的事物。穿戴着传统服饰的人随处可见，热闹的露天市场喧嚣不断。人民天真纯厚，容易相处。当地华人曾遇到这样的事：买柳橙不能买一整篮，买针只能买一根。问为什么不能多买，当地小贩会瞪着眼睛说：“这么快把东西卖完，那我下午岂不是没事干了吗？”

       当地人做任何事都当作享受，但是数学不好，经常找错钱。他们没有减法概念，让华人既觉有趣，又感无奈。比如说，一件东西23元，拿张50元钞票付账，收款员会慢条斯理打开抽屉，边拿出钱，边从23开始算起，直至加到50，那叠多出的钱就是该找还的余数。数学能力堪称天下第一的华人，这时虽然已经心算几十遍，却也只能耐心等待，最后还要道声感谢。

       乐天随性的当地人，什么事都可以等。即使生病看诊，也是慢吞吞的，让华人哭笑不得。拉巴斯的中医师于萌，就经常碰上没有准时赴约的病人。7年过去了，他已经不会动气：“只好自己晚点回家休息。”不仅如此，每次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病患找上门来，他不但分文不收，还给他们车费回家。他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

       当地华人常说：“当初根本没想过要呆下来。”结果留了下来的华人也不在少数。

       因为，玻利维亚还有其他的魅力吸引着他们。

       是天气！圣克鲁斯地处平原，属热带气候，四季阳光灿烂。中部山谷地区科恰班巴市属于温带，温和宜人。

       两个城市夏天不热，冬天不冷，硬是留住人心。

       拉巴斯处于3600公尺的高原，低温、缺氧，竟然也可以吸引华人。也许，站在这个全世界最高的首都，抬头看到那片湛蓝，乡愁融化，就不再念念不忘要离开了。

       其实，当初华人也都经历过一段适应期。3年前从福建过来和丈夫团聚的周敏，就曾病得一塌糊涂，后来才克服了高原反应。“现在反而不习惯圣克鲁斯的平原气候，太热了。”拉巴斯印地安人以羊毛斗篷和五颜六色的手编帽子保暖，华人出门都带上毛衣或外套；圣克鲁斯华人则是终年穿着夏装。从拉巴斯到科恰班巴，从科恰班巴到圣克鲁斯，不过是几个小时车程的距离，高低凉热，却让人以为到了地球的另一端。一天之内，温热变幻无常，身处其境，也是有趣。

## 

这个地方让华人有归属感，除了环境和民情，还因为政府对移民的宽厚政策。

       只要住满5年，外来者就可申请永久居留，之后再归化为公民。不过，近来归化条件多了一条，即申请者必须会唱玻利维亚国歌。第一代华人西班牙语本来就不灵光，用来唱国歌更是提词忘句，尴尬得像个孩童，所以都乐于当个永久居民。反正入籍与否，差别不大。

       玻利维亚公民60岁以后可每个月领取200玻币的养老金。这对华人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此外，每次总统大选，公民都必须前去投票。有些华人被政府抽中当投票站站长，也就一板一眼地履行起服务公众的职责。

       受惠太多，理应回馈。华人关切当地的方式有多种，人数也越来越多。当得知玻利维亚尚有64%的人处在贫穷线以下时，华人纷纷带着物资和金钱，走进当地人的社群，送上一点心意。最近，佛教慈济刚刚在圣克鲁斯和拉巴斯设立办事处，开始为慈善事业忙碌奔走。当地一名退休银行经理受感召加入了义工团队，并坦言：“中国人在这里帮助我的同胞，令我非常惊讶，也很感动。”

       尽管入乡随俗，尽量去了解当地，但华人也意识到要敞开胸襟，用文化来介绍自己。华人社团曾和中国使馆联合举办过一次“锦绣中国”的大型展览。用色彩斑斓的照片展现出中国面貌的日新月异和华人文化的多姿多彩。当地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了一个相关报道，让玻利维亚观众对中国有更深的认识。

       除了看家的中餐手艺外，华人也把望闻问切的中医带过来。圣克鲁斯和拉巴斯都有中医诊所，提供针灸、推拿、按摩等治疗。政府承认中医，近几年中医师经常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当地人对中医，尤其是针灸便熟悉起来。只见中医师拿几支针这里插插，那里扎扎，病痛马上消失，仿佛魔术一样神奇。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西医看不好的病、很多人都会来找中医解决。中医收费相对便宜，连带中医师也让人觉得更加亲近。

       到华人住家转一圈，墙上春联已经褪色，小小的中国结沾着些灰尘，很难再看到更多其他具中国特色的摆设。润物细无声，倒是玻利维亚人对中华文化越来越感兴趣，精致的中华小饰物更是令他们爱不释手。一些对中华文化认知更深的当地人，摆放的中国饰品甚至比华人家里还要多。一个不小心，会让人误以为进入了一个华人家庭。

       华人与当地人，开始结下不解的情缘。

当地人热情善良固然是事实，但华人还是愿意有一个自己的圈子。

       华语、福建话、广东话或莆田话，是第一代华人惯用的语言。对他们来说，西班牙语像隐形的障碍，使他们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每年春节，圣克鲁斯的两广同乡会和拉巴斯的天河中国文化之家，都派出舞狮队伍来给华人商家拜年。平常多累都不愿休息的华人，会提早打烊，参加华人社团举办的佳节聚餐。端午中秋，大家互赠自家做的粽子月饼。人数虽少，节日气氛难比故乡，但脉脉温情，聊慰于心。

       中文报在目前还是奢侈的计划，不过两本内容丰富的侨刊填补了空缺。玻利维亚中华总会出版的《侨声》和玻利维亚中华工商总会的《长城侨刊》，成为华社圈子的信息来源。而其中的当地新闻和移民权益的相关特写，更是当地华人所需的生活指南。

       曾经，华社内部纠葛连连，让人寒了心。如今这里的华人走出阴影，安居乐业。他们深深感到，团结，才能安身；和谐，才有安定。

       中华总会、两广同乡会、莆田同乡会、中华工商总会、华人基督教会和佑海宫管理委员会，是圣克鲁斯的6大华人社团。现在它们已经成立华侨联谊会。联谊会的最高执行员，由6个会长轮流担任，每两个月轮换一次。华社的任何冲突和问题，都在联谊会的月会上公开协商、沟通和解决。烤鸡店老板如果遇上当地官员借卫生检查来敲诈，社团会义不容辞协助争取权益。华商们说：“近来，这类烦人的事件明显减少了。”

       大部分华人在春节期间，会到圣克鲁斯的佑海宫上香。佑海宫古典雅致，供奉的妈祖娘娘，是近年刚从万里之外的台湾请来的。不管怎样，侨领和华人信众都相信，此后那些戾气十足的事情果然少见了，人心也越来越齐。香烟缭绕中，华人祈求神明继续保佑这群跨海越洋谋生的子民。

一些新老移民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988年，圣克鲁斯华人修建起自已的教堂，正式成立了华人基督教会。主日崇拜定在周日下午4点到5点半，因为这段时间烤鸡店的顾客比较少。

       每当夕阳的余晖照进这座教堂，寂静的圣殿顿时充满了祷告、赞美和感恩之声。

       除了温暖富足的生活，华人还在这里找到了心灵的依托和平安。玻利维亚的可爱，也包括让华人自由拥有自己社群的生活。

    在玻利维亚，婚嫁成了华人的大问题。

       华人在这里找对象不容易，异族通婚还只是偶尔有之。单身男子通常到了适婚年龄，就请老家的长辈物色对象。待一切准备就绪，他们飞回中国娶亲。婚后返回玻利维亚，等到孩子出生满月，他们才设宴请客。

       有了孩子，教育又是另一个难题。烤鸡店生意忙碌，父母只好把孩子送回中国请长辈照顾，也好让孩子学学中文。等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再接回来。

       这里的华社在不断改善，唯独欠缺的是中文学校。以前曾经开办过中文班，可惜早已停办。华人有意让下一代接触些华文教育，但现实中又不可能。华人孩子一般会送去当地的私立学校就读，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不错，但学费却非常高，然而为了让后代有更好的出路，华人家长都不惜代价。他们不想让孩子像自己一样，困在一间间闷热的烤鸡店里。

       私立学校注重西班牙文和英文，华裔子弟的双语说得异常流利，但因为没上过中文课，只能说简单的华语，读和写的能力不高。

       重开一个中文班，是目前玻利维亚华人的急切企盼。

       孩子在当地学校上学，突破了语言鸿沟，但一毕业，他们又飞到外国去深造。出去了，感受到大都市的繁华热闹，很少人会再回来。玻利维亚，只是他们每年回来度假、探亲的地方。

       “这一辈子赚到的钱都花到孩子身上了。”华人常这样感叹。

       这正是他们的生活写照——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只要梦想在延续，自己在玻利维亚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周遭的一切也是美丽的。

   坐落在拉巴斯一条宁静街道上的天河中国文化之家，是玻利维亚唯一一家华人开的武术馆。

       馆主黄幼十多年前和队友受邀到南美洲表演武术，后来滞留在玻利维亚。那时他身无分文，只能在公园过夜。户外寒风凛冽，衣衫单薄的他根本无法入眠，一早起来练功取暖。到公园来晨运的路人看见一名中国人在练功夫，马上过来好奇地询问。原来当地人很早就对中国武术有种莫名的迷恋，只是一直没有人教。黄幼于是应邀当起教练，中国武术从此式走入玻利维亚。

 武术馆名气越来越大，黄幼也经常上电视台表演以及接受报章杂志的访问。几名学有所成的徒弟已经成为他的助教。经过黄幼的不懈努力，武术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受到当地的普遍欢迎，连海军陆战队军人、名人政要的保镖都来拜师学艺。

       当地最早的舞狮舞龙活动也是由他发起。他激动地回忆：“这里第一只舞狮是我自己亲手制作，一笔一画完成。”近期，他更是把武术馆大大改造一番，门口刻上了两只栩栩如生的雕龙，馆里也增加了更多中国特色的装饰。每一部分，他都是自己动手，用心打造。目前，天河中国文化之家正在筹办中餐烹饪班、雕刻班、绘画班、书法班以及中文班。

       如今他和玻利维亚籍妻子已有一儿一女，家庭生活美满。从被迫在公园过夜的穷光蛋，到今天是超过6000个学生、备受敬仰的武术师父，黄幼写下了华人玻利维亚故事的精彩一页。

新春时节，天河中国文化之家的舞狮会积极排练，准备给华人商家拜年。

    最初陌生担心，现在熟悉自在，华人在波利维亚落脚，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

       这个南美高原之国虽不是华人的故乡，却热情款待他们，给了他们奋斗的空间，成就了他们小小的梦想。当初为何决定移居这里已不重要，因为这些华人都开始了新的生活，都找到了留下的理由。

 南美洲内陆小国巴拉圭资源匮乏，先天条件不足，被西班牙长期统治；加上几次战争，更使它元气大伤。19世纪60年代，巴拉圭倾全国之力对抗巴西、阿根廷、乌拉圭3国，连8岁儿童和年迈老人都被征召到前线。战败后，被迫割让大片国土，还失去超过一半的人口，成年男子剩下不到3万人。

       1932至1935年，与玻利维亚的一场血战，又使它的国力跌到谷底。在1989年斯特罗斯纳的独裁统治被推翻之前，巴拉圭经历了无政府状态与军政府专政时期。

       巴拉圭长期依赖农林畜牧业，经济增长缓慢，贫困人口高达40%；贪污腐败盛行，治安败坏，社会乱象丛生，难题多多。唯一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与巴西合作建造了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伊泰普水坝（Itaipu Dam）。

       面对各种严峻挑战，巴拉圭一直是南美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因此，直到20世纪中叶，才有华人踏足这片土地。

1952年，欧玉明和家人从香港来到巴拉圭，13年后，他的妻舅陈雄才一家跟着到来。如今，陈雄才的后人仍然留在这里。

       此后，贫瘠落后的巴拉圭，就一直没有太多华人问津。

       到了70年代，台湾掀起出国热，许多华人选择登陆巴拉圭。实际上，这些移民大多是要到巴西、阿根廷、美国和加拿大等大国，只是巴拉圭签证条件较为宽松，容易入境，所以成了最好的跳板。

       然而，老天似乎给这些华人开了个玩笑。当年，在巴拉圭的亚松森机场，前来接机的亲戚神色凝重地告诉他们：由于巴西加强入境管制，现在，他们恐怕是过不去了。前方无路可走，他们就只好先留下来找些事做，再伺机而动。很多人就是这样滞留在巴拉圭。据说，这时期领取过巴拉圭身份证的华人数以万计。

       那时的巴拉圭非常贫困。一名华人忆述道：“一下飞机，看到破败的机场，马路是泥土和石头铺成的，巴士好像随时会散开，眼泪就掉下来了。”然而，生活还是要继续。

       华人最在行的就是做小买卖，因此，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逐渐布满了亚松森街道，中间也穿插华人所开设的旅行社、中餐馆和旅馆，还有当地人称为“Copetin”，即一种以卖点心和汽水为主的小吃店。

       开了店，又进了货，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除了毅力，他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不论卖什么，都得用纸笔、计算机，再比手划脚一番，才能把价钱说清楚。

       没想到，他们这一呆就是几十年。更没想到的是，他们后来的命运，竟然也跟着巴拉圭的经济一路起伏跌宕。

* *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特别在桥头成立了扫黑组，负责保护当地华人。扫黑组的警员都住在桥头的中华会馆，当中还有多名警员会说华语。*

       在80年代中期，巴西与阿根廷严厉管制货品进口，税收极高，物资也严重短缺。同时，巴拉圭则采取自由进出口政策，降低进口税。因此，周边国家的人纷纷前来跑单帮，以华人为主力的批发以及零售百货业也随之形势大好。

       当年赶上这波“经济奇迹”的华人依稀记得：“走在路上，总是有当地人搭讪问时间，华商因此大量入口手表，还有首饰、化妆品等。”

       那时候的运输业不发达，华商必须亲自去台湾或香港把货押来。这些小物件可以带得多，卖得也好。一只手表只有5分钱蝇头小利，但一天可以卖几万只。来巴拉圭的航班不多，每个上机的华人都至少带着几十包货。那时，机场满地都摆满了华人准备带上机的货品，蔚为奇观。

       到1985年，当地华人人数已突破1万5000人。近年来，更有一些中国大陆移民陆续前来；大展拳脚，期待能够创造新的奇迹。

 巴拉圭目前有6000名华人，80%聚集在第二大城市桥头，其他则散居在亚松森、贝多芳市（Pedro Juan Caballero）和英格纳松（Encarnacion）。

       多年来，华人坚守百货零售和批发业，掌控了桥头60%的商业活动。少数涉足木材和家具出口、黄豆出口、农药进口、机械进口、木屑发电厂、旅行社等。

       桥头是个拥有17万人口的移民城市。巴拉圭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韩国人等多方杂处，华人在其中打造出自己独特的社区。华人商店、中文学校、社团、中文报章和宗教团体，一应俱全。因此，通晓华语、英语和当地语的第二代，到国外念书、就业都极具优势。

       不轻言放弃，是当地华人的信念。如今百货市场低迷，华商并没有萌生去意，反而觉得这是转型的好时机。他们始终觉得，巴拉圭极具发展潜力和经商机会。

巴拉圭是农业国家，工业落后，工厂缺乏零件，须坐飞机出国去买。在这种情形下，进口就成了最好做的生意。华人到此，不管是什么出身，都下海从商。资金雄厚的做进出口，口袋有点钱的开间小店，什么都没有的就先打工。

       做生意，总有风险。在巴拉圭经营进口贸易，更要面对市场不按牌理出牌的游戏规则。

       “巴拉圭是个畸形市场，大好大坏的极端都会出现。”华人说时轻描淡写，其实经历了不少惊心动魄的场合。这些年来，经济大起大落，市场时好时坏，官员敲诈贪污，盗贼伺机而动。山穷水尽，柳暗花明，还好每次经济下滑总跟着另一波经济重振，华商早已处变不惊，总算闯出了一条路。

       90年代，华人聚集地由首都亚松森渐渐迁往东部的东方市（Ciudad del Este），并且开始了另一个传奇。

       东方市地处巴拉圭、巴西与阿根廷的交界处，由于3国同属南美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MERCOSUR），3国之间的民众可自由出入境，并不需要签证。而且附近有世界奇景伊瓜苏（Iguazu）大瀑布以及伊泰普水坝，每日都吸引不少游客和单帮客前来。

    桥头是巴拉圭最大的贸易区，每天迎接着成千上万的人流。对突如其来的拥挤，小城有点招架不住；空间小了，垃圾多了。这显然不是最理想的居住环境。然而，华人却在这里聚集、生活。

       桥头市中心，几条街道纵横交错，这便是华人主要的活动空间。漫步街上，可以看到华人经营的中餐馆、面包店、东方食品百货店、牙医诊所、图书以及录影带出租店、保龄球馆。还有中华会馆、中文学校，都是相隔几步之遥。                 华人依然过着出国前的生活，他们说闽南语、华语、客家话，吃地道的客家菜、豆浆油条、蚵仔面线或港式点心，家里都安装“小耳朵”卫星转播，收看中国大陆和台湾电视节目。网络普及，年轻人听的是港台最流行的歌曲。“有时候一整天都说不上几句西班牙语，根本感觉不到这是在国外。”这绝非夸大之词，之前有个销售员只说会闽南语，生意额还很高呢！

     难得的是，传统习俗在这里依然如故。派红包、舞狮舞龙、提灯笼或口味繁多的应节食品也都不缺。然而热闹归热闹，大家还是每天照旧开店营业。华人忙碌之余不忘参加社团聚餐，有时每人带一道菜去，让大家分享，有时到中餐馆边吃边唱卡拉OK.

       一切得来不易，桥头华人非常惜福。

       华人之间不是亲戚，就是邻居，关系非常好。闲来串串门子，打打麻将，日子平淡了些，胜在舒心自在，浓浓的人情味叫人倍感温馨。东方市中华会馆会长孙志雄就是因此而决定留下。他也是个热心人。只要有人找上门，即使请教芝麻小事，他也会一一给予满意的答复。

     “我们可以在半个小时内横跨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3国。”此话并非夸大其间，尤其是一水之隔的巴西福斯市，对桥头华人有极大吸引力。那里的消费水平比桥头高1.5倍，但环境洁净，空气清新，治安良好，搬去居住的华人有增无减。早上，华人从福斯到桥头开店，桥头孩子则到对岸上学。周末，桥头华人到福斯购买日用品，也有人开车过去吃早餐。

       每一天，两三百名“两栖华人”在友谊桥上擦肩而过。过了桥，是另一个国家，也是另一片天地。

       巴拉圭大盗小贼横行霸道。当地华人都说：“遇劫就像吃饭那么平常。”曾有盗贼在光天化日之下，载走华商整座仓库里的货物。市区华人于是选择有保安的公寓，走出家门则马上提高警惕。

       盗贼能防，贪官却防不胜防。官员经常以查税为由，向华商索取财物。华商语言不通，又不了解当地法律，只能任人鱼肉。殊不知贪官食髓知味，变本加厉，连政要也来索贿竞选。久而久之，华商养成了“破财消灾”的观念。

       巴拉圭就是这样。看似风平浪静，其实险象环生。为了生存，大家各出奇招，明哲保身。

   巴拉圭贪官多，贫民更多。华人走在街头巷尾，总看见伸手要钱的失学孩童。车子停在红灯前，街童马上翻跟斗、要杂技，盼看官赏赐一两个硬币。另一些则在身上挂满小商品，穿梭在车子之间叫卖。这个国家的贫穷，就是这样暴露在阳光下，毫不隐瞒。车内车外，不过一窗之隔，却俨然是两个世界。

       华商入驻，为当地人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话说回来，华人也需要他们当雇员、帮佣和保姆。偶尔家长抱怨：“孩子太依赖帮佣，洗个碗都不愿意。”但每户华人家庭都离不开当地工人。在华人眼中，巴拉圭员工忠诚、尊重老板。不过他们同时也有拉丁民族乐观知足的天性，不太把工作当一回事，不但无故缺勤，还装病请假。华人最受不了他们慢吞吞的态度，但全国上下都一样，叫人无可奈何。

       对当地人来说，工作是明天的事，今天应该用来享乐。大路旁、公园里、店门口，总坐着无所事事的人们，手里一个茶杯，怀里一个茶壶，悠闲地喝着南美人最爱的马黛茶（Mate）。

夏天的巴拉圭气温可达摄氏40度，茶中加入冰块就变成“马黛凉茶”（Terere），也有华人抱起茶壶边走边喝。大部分华人其实不习惯马黛茶的味道，也无法接受传统喝法。

       当地人也未必接受华人的食物，对没吃过的中餐食材不敢尝试。华人吃得津津有味的虾，在他们看来是一只只恶心的虫子。当地的中下阶层没能力上餐馆，吃中餐成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除此之外，双方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多交流。

       华人认为巴拉圭人有热情，没感情：“送礼物给他们时就表现得很热情，有事请他们帮忙却不得要领，还说礼物可是你自愿送的。”时间一长，华人便筑起一座隐形的城堡。巴拉圭人无意走近，华人也在自己的城堡里自得其乐。双方始终保持雇主和雇员的安全距离。

       孩子若是跟巴拉圭人交往，家长多半要反对。早年战争使巴拉圭男性人数锐减，如今男女比例是1对7，加上当地人婚姻观念开放，一个男子可能在3年内结3次婚，一个女人的5个孩子也可能有不同父亲。道德伦理观念薄弱，华人说什么也不愿女儿嫁给当地人。虽然当初是自己把孩子带来这里，下一代跟当地人来往在所难免，但看到许多异族通婚夫妻都以离婚收场，只好硬下心肠棒打鸳鸯。

       死后，华人和当地人安葬在同一墓地。华人遗体都在24小时内下葬到公立或私立墓地，私立的有保安人员看守，以防有人“盗墓”。曾有一群医学院学生为了省钱，叫人到公立坟场挖走死者头盖骨，直到家属要捡尸骨火化，才发现亲人头盖骨不翼而飞。只要负担得起，华人宁愿多付一点钱，也不要亲人死无全尸。

  东方市中华会馆是桥头华社的核心，陪着华人走过了25年风雨飘摇的岁月。会馆的活动中心总有人在学西班牙语、上电脑班，参加社交舞蹈班、唱歌联谊会和棋艺社。会馆也设立了贫寒子弟奖学金。此外，亚松森中华会馆、巴拉圭客属宗亲会、台湾商会和巴拉圭工商妇女会也相当活跃。

  近几年新成立的华人社团不少。当地华人常开玩笑说：“一个招牌掉下来，打中的可能就是某某会长。”

       巴拉圭自上世纪80年代就有华人基督教会，那是最早的宗教团体。如今桥头有4个华人基督教会，教友超过100名。

   90年代，佛光会和慈济陆续在亚松森和桥头设立据点，同时开办各种手工学习班，反应热烈，甚至当地人也皈依佛法。亚松森道场经常看见当地人打太极、做禅修，非常积极。同时也有华人信奉一贯道和白莲教。

       此外，华人组织积极回馈当地社会。慈济功德会连续7年募捐旧衣物给贫困的印第安人，为他们盖学校、赠送桌椅课本，同时长期参与救急扶危，协助车祸伤者、顽疾病患。一贯道在亚松森设立普济医院，针灸收费非常便宜。其实，大部分华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只要做慈善，大家一定出钱出力，从不计较名利。

 热心的华人曾因捐赠轮椅过关卡，遭受敲诈而显得沮丧，但也因为受惠者一个友善的微笑，或一个感激的拥抱而开心。巴拉圭佛光禅净中心的主持觉圣法师还记得：、“一个男子坐上轮椅后喜极而泣。40年来只能在地上爬行的他，第一次发现坐起来后，天空竟如此广阔。”这是给施赠者最好的回报。

 蓦然回首，移民的辛酸历历在目。不过，诸多的人生梦想，却也因当年迈出这关键一步，才得以实现。

       忙忙碌碌，就是为了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和教育。孩子也不轻松，清晨五六点就起床，准备到当地学校或搭校车到巴西学校念书。放学回来，又得赶到中文学校上课。

       巴拉圭有4家中文学校，桥头有民办的中山学校、大成学苑、中华语文学校，亚松森则有巴拉圭中正学校。在这里，接受中文教育的华人子弟高达85%。

       而来自大陆的家长则多数把孩子送回家乡就读。

       20年来，第一代华人坚守岗位，细心照料这一片片文化的园圃。中正学校的萧哲文校长多年来坚持为学生的文章剪报写评语，中华语文学校豁免贫寒子弟学费，中山学校则每年举办园游会和校庆，让孩子在互动中学习。学校经费不够，华人马上捐出日用品。

       春风化雨，学生中文水平颇高，混血儿也说得一口流利华语。巴拉圭中文学校因此成为南美洲中文教育的楷模。

       第二代华人自在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间，不过交友时要么选择华人圈子，要么选择当地人圈子，楚河汉界，非常清楚。课余，华人子弟除了参加才艺班，也趁空档打篮球、打保龄球，生活非常充实。

 高中毕业后，有人到合湾升学，小部分留在当地，其他的到欧美国家深造。通晓华语、西班牙语、英语、瓜拉尼语，甚至是巴西的葡萄牙语，使他们就业时无往不利。近来，不少人进入墨西哥华资企业工作。

* *华人往来于桥头和福斯市，言谈之间不时夹着巴西的葡萄牙语。他们把这种自创的语称作葡西语（Protunol）。*

       离开好像是一种必然。虽然第二代华人认定自己是巴拉圭人，在巴拉圭有家人有朋友，有他们认为全世界最好吃的香肠夹面包（Pancho），但就是少了发展机会。除非愿意在百货店里复制父辈的人生，否则他们将在外国成家、扎根，延续上一代寻梦和圆梦的故事。然后，等着父母捎来他们爱吃的圣诞蛋糕、巴西特产水果汽水（Guarana）、以及巴拉圭亲友的消息。

       父母宁愿两地奔波，也不想把孩子绑在身边，担心这个环境磨损了年轻人的斗志，又担心下一代找不到对象。倒是他们自己，还在几个落脚点之间徘徊。回去台湾，恐怕已跟社会脱节，故人也所剩无几。有心跟孩子团聚，却担心难以在欧美国家另起炉灶。一切要重新来过，太冒险了。

       只要生意还能做，还是呆在巴拉圭比较好。

       于是，他们安于现状，努力工作，再用换来的酬劳，去化解现实中种种问题。水质不干净，买矿泉水或滤水器；警方执法不严，买枪自保；贪官横行，给钱了事。再有余钱的话，还可到周边国家旅行。

       为方便出入境，第一代华人多数已入籍。不少人拥有多重身份，左手拿巴拉圭护照，右手持巴西居留证，在北美洲有业务的还持有美国、加拿大护照。

       近来，申请入籍巴拉圭除了口试还要笔试，导致入籍人数减少。

       拿到巴拉圭护照，并不等于就有了归属感。这也许是华人不关心当地政治的原因。他们大多不去投票，即使参政也只是昙花一现。迄今，只有一位叫林阿枝的桥头华人当上过市议员。

       西班牙语不灵光，一直是他们的致命伤。一名移民16年的华人承认：“会一些单字，全没文法，也连不成句子。”关于居住国的种种消息，只能依赖阅读当地唯一的中文报《传薪日报》以及巴西出版的《南美侨报》。之前还有《城市新闻》以及承播台湾电视节目的影视公司，可惜都已停业。

       第一代华人的隐忧是就医疗服务。孩子不在身边，自己不会西班牙语，有病痛无法找医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为此，不少人萌生起回老家的念头。这一天，却不知是何年何夕。

《传薪日报》创刊于1991年，每周一至周六出版。

   20多年前，华商看到许多巴拉圭人三餐不继，动了恻隐之心，主动捐出物资。孰料物资来不及送到贫民手中，就被贪官瓜分，还拿到市场上出售。原来做善事倒成了考验智慧的事。于是，巴拉圭华人慈善基金会应运而生，就是希望汇聚更多华人力量，更透明、更有规划地推动慈善事业。

       基金会办过的活动不胜枚举，有冬令大型物资发放、圣婴节玩具派送、轮椅捐赠、意外紧急救护、义卖、资助病痛复健中心、提供电脑教材给贫寒学生等。十几年来，它和国际佛光协会巴拉圭分会一起，每天送面包、牛奶、日常用品到老人院、孤儿院和聋哑学校。基金会还捐出几十台豆浆机，教人用当地盛产的黄豆制造豆浆，取代价格较高的牛奶。

       中巴佛光康宁医院，是巴拉圭华人慈善事业的另一个里程碑。耗资100万美元的医院坐落于幽静郊外，主要对象为妇孺。只要踏进医院大门，所有服务皆免费。当地孕妇早产问题普遍，医院的保温箱已救活2000多个小生命。穷人死后没钱下葬，基金会也会施赠棺木。

       生老病死，只要贫民有需要，基金会总是解囊相助。

       如今，巴拉圭第一夫人基金会、当地私人企业和非营利团体纷纷跟华人慈善基金会合作。经由媒体报道，华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几年前桥头计程车司机罢工示威，当地人特别叮嘱：“华人帮助我们，别去骚扰他们。”李云中会长道出感悟；“要在别人的地方立足，一定要回馈当地社会。”

       巴拉圭华人也许不是最富有，却是最懂得施惠的一群。付出，令他们内心更加宽怀、富足。

  巴拉圭，无疑是这群华人生命中的转折点。居住环境和日常生活不尽完善，但他们并不祈求太多。一间自己的住房，一份比在老家时高点的收入，一个让孩子受更好教育的机会，巴拉圭正好实现了这些梦想。

       和主流社会仍有一大段距离，然而华人以慈善开了头，并将循着这个方向，主动走近对方。坚韧、坚强、坚持，曾帮助华人渡过许多难关，也一定能让他们从容面对未来。

  乌拉圭是南美洲第二小国，夹在阿根廷和巴西之间，仿佛注定了它受人忽视的命运。然而，它也曾因为在1930年夺下第一次世界杯足球赛冠军而声名大噪。50年代的乌拉圭，曾有过一段令人美慕的辉煌时期，那时期它政治稳定、福利优厚，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度位居全拉美之首，还因此赢得“拉丁美洲的瑞士”的美誉。这一切随着1973年军政府上台而烟消云散，高压政治迫使十万人民迁移到邻国。

       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了，乌拉圭的经济还在原地踏步，工商业发展停滞，人民主要依赖农牧业为生。还好乌拉圭境内几乎没有高山，不是丘陵就是草原，土壤肥沃，非常适合耕种和畜牧。

       走过风光与低潮，而今的乌拉圭安静恬然，几乎让人忽略了他的存在；即使因优越的自然环境与舒适的气候而被列入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十大国家之一，也没引来太多的华人。

  这里的华人可算是姗姗来迟。

       在20世纪50年代，广东省新会、开平及浙江省的中国移民，乘船来到乌拉圭。这里移民人数的增长率十分缓慢，直至1967年，也只有区区151人。他们在这里经营洗染店、杂货店和餐馆，一些人则从事劳力工作。

       从70年代至80年代初，有少数台湾人挟带着资金到乌拉圭定居，从事小买卖安家立业。同时，也有一些台湾士兵因为退伍之后有意到海外发展，遂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当时，经常有台湾的远洋渔船停靠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港口，这些台湾船员就成了当地华人做买卖的主要对象，有者索性将中餐馆开在码头旁，以招徕台湾船员的生意。

       此后，乌拉圭华人的状况便没有多大变动。

       一直到90年代，一小批来自中国大陆沿海一带的移民辗转到这里住了下来，才使乌拉圭的华人人口略有增加。

 时至今天，乌拉圭只有区区300名华人，在乌拉圭300万总人口中显得微不足道，但他们往来密切，相处融洽，更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

       乌拉圭的环境洁净、景色秀丽，人民热情。这里的华人开设中餐馆，与当地人分享中餐和素食；中医悬壶济世，为当地人解决疑难杂症。然而，由于移居时间尚短，他们和主流社会之间难免仍有许多隔阂。

       今天，华人成立了社团、出版了刊物，开办了中文班，在当地的主流文化之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也一点一滴找回归属感。也许，先找到了自己，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别人的生活中。

     这里是一片没有污染的处女地，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全国文盲率只有3%，劳工教育水平极高。蒙德维的亚港设施完善，然而，乌拉圭独独缺少那些踌躇满志的华人所需要的市场。“留下来的都是没有憧憬、胸无大志的人。”当地华人总是这么自嘲。是的，如果他们真的想发大财、赚大钱，当初的目的地就不会是乌拉圭。

       可是，他们不是不能走，而是不想走。

       蒙德维的亚安静的大街上，散落着二三十家华人经营的杂货店和礼品店，还有少数贸易公司、超级市场、照相馆和旅行社。

  这些店主多是夫妻档。他们像是一个上了发条的钟，每天定时开店、理货、买卖和打烊。晚上煮顿晚餐，租看连续剧光碟，或到朋友家打打麻将，唱唱卡拉OK，或跟在国外深造的孩子通电话聊天，平淡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这些年来，也不是没有其他华人来过这里，只是看到这么一小块蛋糕，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乌拉圭的工业至今难成气候。塑料袋工厂老板王东埔说：“我来的时候，已有一家当地人开的塑料袋工厂。当我的工厂投入运作，那家工厂就不得不关门大吉。”

       20年过去了，他的工厂仍是当地唯一一家塑料袋制造厂。然而，这中间曾有过风浪。乌拉圭的工会势力很强，动辄煽动员工罢工示威。他的工厂一度因为员工罢工停产。此后请工人的时候，他会筛掉工会成员，果然换来了风平浪静。

       乌拉圭法律规定，3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工会，如果发生劳资纠纷，工人有权利霸占工厂，把老板赶出去。有意在这里投资设厂的商家，因此都打退堂鼓，一走了之。乌拉圭现在的4家华人工厂都是“老工厂”，有十几年历史，包括一家化工厂、一家塑料袋制造厂和两家渔业加工厂。

       “想当初，因为语言不通，又不了解人家的法律和风土人情，吃了不少亏。”吃一堑，长一智，经营渔业加工厂的翁贵重总算摸索出一条路。他还一度名列乌拉圭150大出口商。他的工厂主要把渔产品加工冷冻再出口到国外。

       当地人虽然住在海边，却不爱吃鱼，对海产了解甚少。早期他就是在海边捡当地人不要的鲨鱼鳍，卖到中国大陆和香港，打下了事业基础。他深深明白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道理。身为乌拉圭台湾商会会长的他，认养了当地的孤儿院、公共食堂等福利机构，极力帮助弱势群体。

       90年代抵达的那一批华人没有经济基础，得知当地人爱吃炸春卷，索性在家制作春卷卖给当地餐馆。至今大概有十个家庭从事这门生意，竞争相当激烈。其中以王振德创立的斌歌中华料理最具规模。他利用机器生产，一天最多可以卖出6000条春卷，许多餐馆和星级酒店都向他要货。

       位于市中心的十几家中餐馆，春卷也是主要卖点。除了中餐，一些中餐馆也卖当地食物。乌拉圭人本来只爱吃牛肉，而且食量是华人的两倍。近来当地人健康意识提高，加上全球刮起瘦身风，成就了当地3家华人素食馆。

乌拉圭，可以说是当地华人一个意外的发现。

       没发生过惊世骇俗的大事件，也没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大成就，在偌大的世界版图中，乌拉圭是这样一个安静的小国。这群路过的华人住了下来，而且正以同样的态度，不强求，不急躁，写下自己最满意的人生。

       乌拉圭地处亚热带，气候舒适，温度常年保持在摄氏18到24度，四季常青，风景秀丽。这里工业发展缓慢，没有污染，水质干净，空气清新。一个患有呼吸器官疾病的华人，来了几个月就不药而愈。现在，她说什么也不愿走了。

     周末的街上，露天咖啡座飘散着浓郁的咖啡香，公园木椅上坐着聊天休息的人群。除了广场中央遛狗的路人，一切看起来就是一幅静止的画面。蒙得维的亚城里最寻常的街景，完全体现了这里的恬静、安详与平和。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身心自然开朗愉快。

       真有什么烦恼，大不了驱车到郊外，享受不用花钱买的蓝天白云和青青草地。再远一点可以到著名的旅游景点。东边有著名海滩东角（Punta del Este）、西边有独特的湖光山色和位于萨尔托（Salto）省的大温泉。

       在全球“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名单中，乌拉圭总保持在前5名的位置。可以想象，能够和大自然相处得这么和谐的，一定是个温和而友善的民族。乌拉圭人的热情，叫华人受宠若惊。他们都说，即使是路上的陌生人有困难，当地人也会主动帮忙；如果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会两肋插刀。

 “乌拉圭人非常淳朴，人情味浓，跟他们交往不必拐弯抹角，很轻松。”移居这里不过十年光景的吕先生，却做好了落地生根的打算。他偶尔会和孩子说中文，但是他很清楚，学好西班牙语才是最重要的。往后，乌拉圭才是他们的家。

       这里一切的美好，只奖赏给愿意留下来的人。

   在乌拉圭，生活从来不会焦头烂额，而是让人享受的悠哉游哉。吕先生的农场种了满山梨树，每到收成季节，他就骑着马巡视工人采收梨子。南美小国有此景此情，不免让他想起一千多年前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

       “当初也有一段过渡期，每个人都一样。突然之间，文化不同了，语言不一样了，朋友也变少了。还好，华人之间平常来往频密，浓浓的人情味很快弥补了心灵上的失落。”吕先生是虔诚的佛教徒，也是国际佛光会乌拉圭协会的主席，在乌拉圭这二十几年的得失，也许只能用因缘来解释。

       今天，这个小群体里的每个人都彼此认识，凡事互相帮忙。比如家长们自组中文班，把孩子送到其中一个人家里，由家长轮流担任义务老师。这做法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随着乌拉圭华人协会在2007年成立，当地才有了另外一个正式的中文班，也办起了唯一的中文刊物《乌拉圭华人通讯》。

    他们总是用尽一切方法，把自己和传统联系起来。

       过年过节，应节食品匮乏，华人自己制作糕饼互相赠送。除夕夜，几户家庭约好一起吃团圆饭。婚礼上也保留迎娶和敬茶仪式。中国食材在这里非常稀罕，于是，回国探亲后回返的行李中，总有大包小包的药材、食品。连家里摆设的佛像或观音塑像，也跟着他们千山万水来到乌拉圭。

       有一年中秋，乌拉圭华人协会托人从距离3个小时船程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买来月饼，分送给会员。2007年的中秋节，他们还第一次举办了中秋茶话会。乌拉圭的月亮不见得比故乡圆，但那一晚，月光却照亮了每颗思念传统文化的赤子之心。

      就像无法适应当地那些甜得令人舌头发腻的甜品一样，许多文化差异也不是一时之间可以适应。

       至今，许多华人父母仍无法接受孩子和当地人交往。那些发生在异族通婚家庭的文化冲突，他们都听得太多。比如，华人家庭以男性为主，但乌拉圭是女性地位更高；当地人没有长幼之序，在家都直呼父母亲姓名；儿媳婚后也不懂称呼公公婆婆。这一切对仍有强烈传统观念的华人父母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的。

       华人移民乌拉圭只有半个世纪，要求第一代完全融入主流社会，的确太难。其实，华人对当地人而言，也只是刚刚搬来的新邻居。双方对彼此的生活习性仍是一知半解。

    尽管如此，当地人都乐于接纳这群陌生的邻居，从政要首领到平民百姓皆不排外，华人在当地生存和就业都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只要持有临时居留证，就可以呆3年，同时还能马上申请永久居留。当地政府承认双重国籍，符合条件的华人大多已入籍。

       很多华人毕竟不是这里出生长大，持乌拉圭护照，对他们来说只是多了一层方便。然而，他们也无法否认，乌拉圭的土地承载了他们太多的感情，当中还夹杂着一种习惯。习惯了，就不想再奔波，再漂泊。唯一可以令他们再次动身的，也许就是来自家乡的呼唤，以及身在跟国外的孩子团聚的心愿。

       “我们西班牙语不好，万一有什么病痛都不晓得怎么告诉医生。”上了年纪的华人，最担心这件事。把孩子叫回来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当初怎么胼手胝足也要让孩子上当地私立学校，然后送到欧美国家念书。这个地方没有让子女施展才华的平台。于是，这些羽翼丰满的孩子飞出去了，留下渐渐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弟妹。弟妹们长大了，总有一天也要走的。

       乌拉圭拥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当地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大学和专科学校均免收学费。但是，公立学校上课情况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翘课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他们常常罢课示威，要不然就自己放假去了。私立学校则不会有这种荒唐事，不过学生每月要交高达六七百美元的学费。“现在最大的负担是教育费。”这是华人家长共同的感受，但开放式的教育制度，的确让孩子获益不浅。在这里，功课都是分组完成，孩子有机会在讨论和分享中学习。

       乌拉圭华人家长高度重视子女的中文教育，50年代之际，社团几乎都热衷于开办中文班，一度把当地的中文教育推上高峰。1951年，乌中文化学院成立，除了开设华文、书法、绘画班外，还开办中国文史和哲学班，学生大多是当地人。每到节庆之日，还有茶会、酒会和电影招待会。

       后来，一名叫曾瑜的人创办了中国文化中心（1963年扩建为中国文化之宫），进一步把中华文化推广到乌拉圭各阶层。60年代，华文班的当地学生曾达6000人。此外，一名热衷中文教育的乌拉圭女子也办过中文学校。

* *乌拉圭人不喜欢大红颜色，一些华人会入乡随俗，就算在春节时期也避免穿得红彤彤。乌拉圭人的名字必须冠母姓，因此当地华人的身份证也有两个姓氏：母亲姓氏与家族姓氏，变成“复姓人”。比如李大明，母亲姓刘，他的名字就是刘李大明。*

       另外，华人也曾经从瑞士运来十多万册的中文图书，至今还收藏在乌拉圭国家图书馆。

       1954年，华人还成立了中华会馆。会馆曾经安养许多孤苦无依的老移民，并筹建了中华公墓，安葬去世的老移民，每年还买鲜花去祭拜。如今这个社团因为后继无人，已经不再活跃，但是为华社的种种付出，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虽然华人经济能力比一般当地人好，但勤俭持家的乌拉圭华人不张扬，不炫耀，从身上穿的衣服到开的车子，都是强调朴素和实用。不过，有些人却舍得花三五万美金，为去世的长辈买一块花园式墓地。这也许是他们这一代移民的最佳写照——侍奉父母、照顾孩子。这一辈子，总在为别人奔波劳碌。然而，他们却甘之如饴。

 当初对乌拉圭一无所知，后来发现它的种种美丽。当初只想要过境，今天却割舍不下。这一切都在华人的意料之外。

       也许，乌拉圭华人真的没想到要落地生根，但一直到今天，许多人还说不出一个离开的理由。如果平静是一种生活赐予，那他们已经拥有，而且心底还带着点甜甜的滋味。

   阿根廷仅次于巴西，为南美洲第二大国。它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濒大西洋，西接智利，北界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东北连巴西与乌拉圭。

       阿根廷自然资源丰富，有石油、天然气、煤铁等矿产。农林牧渔业发达，盛产米粮与肉类。工业相对进步，种类繁多，有钢铁、汽车、电力、化工、石油、纺织、机械及食品等。

       20世纪初，阿根廷经济迅速增长，一度跻身世界经济十强之林，吸引大批移民迁入。但自1930年的一场政变，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阿根廷政府更迭频繁，大大影响了经济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更是重创阿根廷经济，继而引发社会动荡。一路颠簸了20多年，目前已趋向平静，并以丰富的物产成为世界五大粮食出口国之一。尽管如此，它至今仍无法走出负债累累的窘境，使得外资一直保持观望态度，裹足不前。不过，乐天知命的阿根廷人还是一如往常跳探戈、看足球，乐此不疲。

       阿根廷经济局势暗潮汹涌，当地华人生活亦随之起伏不定。

    追源溯流，华人最早在19世纪末，途经秘鲁、智利、巴西等地之后而来到阿根廷。

       接着又有一些中国移民从欧洲辗转抵达这里。有者为欧洲船上担任海员的广东人，也有一战时期被招募到欧洲战场当华工的浙江青田人。战争结束后，他们一路打短期工，以凑足船资，然后来到阿根廷谋生。

       那时侯，阿根廷政府十分欢迎欧洲移民，对亚洲移民则管制较严。因此，直至20世纪的20年代，阿根廷只有40多名华人。

       50年代前后，一些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游客入境之后，申请居留获准，华人逐渐增至300人。70年代之后，台湾人听说阿根廷不但局势稳定，而且遍地黄金，于是不惜花费几千美金办理手续，全家移民到阿根廷来，阿根廷华人的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

       在那段时期，对比周边国家，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较高的。华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营洗衣店、水果店、中餐馆、中餐外卖店等，生活稳定。

       当时，阿根廷华人的地位颇高，阿根廷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切不明白的事都可以去问华人。”

       但好景不常，正当大家准备在此地安居乐业的时候，阿根廷却陷入了债务危机。接着，阿根廷政府垮台，1989年，物价还一度上涨了50倍。

       许多华人被迫放弃本身的业务，迁往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地，或者回到台湾。华人人数从原本的5万人滑落到3万5000千人。

       到了90年代，一批批中国大陆移民涌入，华人人数又很快地回升。他们大多来自上海、福建、浙江和广东一带。

       2001年，阿根廷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所有人的个人资金惨遭冻结，每个月仅能从银行取出一定的数额。至今，提起当年的惨况，一些老移民仍然心有余悸：“原来可以购置一套三房一厅房子的存款最后只够买一张短程车票。”

       2002年，阿根廷经济逐渐好转，一批中国大陆人闻声而来，当中许多人并未取得合法的身份。两年后，当地政府宣布大赦，允许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办理合法居留权，约有9000多名华人取得合法身份。

       此后，阿根廷华人急速上升，迄今已高达十万人，成为南美洲华人人数增长幅度最快的国家。以福建福清、福州、长乐等地为主的新移民，占了十万华人中的三分之二。

       近20年来，尽管阿根廷经济波动激烈，它依然是中国人向往移居的国度。

20世纪50年代之际，由于当时华人人数不多，很难买到中国食品。当地人的主食是牛肉，青菜只有马铃薯、番茄、黄瓜等几种，因此华人决定自己栽种青菜，吃不完就拿到贝尔格拉诺区（Belgrano）中华会馆附近贩卖。摊档越来越多，每个周末还有人卖鸡鸭，形成一个市集。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人街遂逐渐成形。

       生活稳定后，华人开始向更多领域拓展，大多数人以经营杂货店、珠宝店、陶瓷店、旅行社、中西药店、旅馆、照相馆等。少数人涉足工业，包括设立造纸厂、炼油厂、塑料厂、食品加工厂、成衣厂，也有人在农牧业、渔业开拓事业。

       今天，华人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4000家超市、700家中餐馆、200家洗衣店、100家网吧以及60家进出口公司。此外，机械厂、汽车维修厂、电器维修厂、食品制造厂、化工厂等，也发展到数十家，均为小型企业。

       如今，每星期有一两百名新移民带着期待的心情，坐着长途班机降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纵然很多华人并未入籍，然而，这里环境宜人，当地人不排外，如果事业顺利，定居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有300万人口，加上周围同属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22座卫星城镇，总人口达1400万。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此。这个繁华热闹的城市，是很多人创业的起点，当然也包括远道而来的华人。

       他们首先发现这里物产丰富。牛肉是当地人的主食，阿根廷境内的牛只比人还多，不管物价如何高涨，吃牛扒始终最经济实惠。当地人没挨过饿，造就了他们平和洒脱的个性，凡事大而化之、慢条斯理，到银行办一件事排上三四个小时是平常事。当地华人不禁形容阿根廷为“整个国家像一部没有上紧发条的机器”。

       当地人不思竞争，反倒为华人制造许多机会，加上商业环境自由，华人超市迅速扩张。短短20年，遍布大城小镇的华人超市占据零售市场30%份额，年度销售额高达85亿比索。超市的兴起带动华人相关行业，包括律师事务所、翻译、运输报关、旅行社、超市货架和设备销售、传单印刷、移民事务所等，专门为华人提供配套服务。

  当年，新移民刚从农村出来，没有太多资金，又不懂当地语言，只好先到中餐馆或杂货店打工，有了积蓄后，便承顶下阿根廷人的小超市，边做边学。华人勤奋苦干，周末也不休业，给城里人带来许多方便。他们很快取代阿根廷人，掌控了城里大部分超市。现在，许多阿根廷人的店铺也效仿华人超市，周末照常营业。

       为了节省开支，老板什么都得做。忙不过来，就把家人接过来，每个人都身兼多职。很多新移民还来不及多看阿根廷几眼，就开始了昏天黑地的工作。生活似是一部单调的电影，不断重播。一切都在匆忙中完成：起床、开店、吃午餐、进货、收钱、打烊……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超市是唯一的生活平台。

       规模较大的超市除了食品、卫生用品、厨房用具、衣物、家电、烟酒、海鲜和蔬菜水果，还附设牛肉部。超市雇用秘鲁或玻利维亚外劳，但他们经常缺勤。碍于法令过于保护劳工，而且员工难找，超市老板往往都忙得团团转。大超市老板在柜台安装了广播器和麦克风，以方便跟员工沟通。

       长时间营业、薄利多销，是华人超市后来居上的致胜妙方。一件货哪怕只赚一毛钱，也不会放过，一天下来，两三千比索的营业额不难，通常两三年就可以回本。好事传千里，同乡纷纷赶来分一杯羹。

       向人借也好，和别人合伙也好，凑足30万到60万比索（约10万到20万美元），在店门口挂上“supermercado”（西班牙语：超市）招牌，一间新超市就开张了。当地华人说：“3年还没本事开店是很丢脸的事。”

 新移民循着相同的轨迹，一步步走向发迹的梦境。苦干几年后赚了钱，或扩充营业，或和朋友合股再开一间超市。一个人拥有好几间超市股份并不稀奇。现在，每个月平均有19家华人超市开张。据说前几年的移民高峰期，几乎每天一间。

       市内超市数量逼近饱和，有人把心一横，闯进周边的贫民区。那里治安不靖，黑社会猖獗，连当地人都却步。然而，15万贫民的庞大消费市场，却叫华人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贫民区的华人超市果然大受欢迎，那里的左邻右舍说：“有了华人超市，我们不必到很远的地方买东西，这里什么都有，价格又便宜。”为安全起见，超市都聘请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驻守。市区内的华人超市也安装铁门、警报器和闭路电视，以防盗贼毒手。

       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华人无法忘记2001年阿根廷经济崩溃时，398家华人超市遭暴徒洗劫的惨剧，也记得遭大型零售集团肆意抹黑的教训。庆幸每一次，华人都咬紧牙关熬过去了。

 气候凉爽，空气清新，这是大部分华人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个印象。400多年前，西班牙人来到这里，就把它命名为Buenos Aires，意思是“空气清新”。如今，这里空气清新依旧，华人开车时最爱拉下车窗，使车内弥漫着清爽的气息。

       古老而庄严的欧式建筑散落各个角落，雕像和纪念碑林立，植物四季常青，街头艺人自得其乐。抬眼望去，俨然是某个欧洲城市的街景，处处美不胜收，果然没辜负“南美小巴黎”的美誉。

       美景令人舒心，然而，华人忙碌到无暇欣赏。他们大多数是移居不超过3年的新移民，最熟悉的路线是从家里到超市。有人甚至很少走出店里，在超市2楼加几张床褥，添几张桌椅和厨房用品，就是一个家。一直到午夜，才有洗澡和电视机传出的声音，回荡在偌大的屋子里。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刻，就是观赏卫星电视的中文节目。

       其他的消遣活动似乎跟华人无关。阿根廷人在舞厅大跳探戈，在歌剧院看演出，在海滩享受周末阳光，华人则在超市里打滚。每天傍晚，阿根廷人在横跨市中心的女人桥上和河畔散步、聊天，华人却还在超市里工作。阿根廷人享受圣诞和元旦的长假，华人依然蜗居在超市里。

       难怪替华人打工的阿根廷人会说：“华人没有7月9号也没有5月25号（这两天都是法定假期）。”

周日来临，大部分超市只开半天，总算可以松懈一下。这时候，平时游客居多的华人街街道上，仍可见许多华人在商店、中餐馆、理发店、中医和牙医诊所、美容院、咖啡馆进进出出。有人乘便到中国屋和东亚超市添购自己超市没有的东方食品，也有人选租了几部连续剧，或给家乡的亲友拨打长途电话。

       除此之外，他们既没时间，也不需要花费，吃的喝的、日常用品都可取自超市。比起当地大学生1500到1800比索的月薪，超市老板的收入足以挤进中产阶级。有了一定积蓄，买车子买房子都以现金一次付清。此举并非炫耀财富，而是认为分期付款要还利息太划不来。

       即使买了房子，很多人还是继续住在超市楼上，理由是“每家超市都被打抢过，住楼上既方便又安全”。曾有人不甘血汗钱被劫匪抢去，顽强抵抗而酿成死伤悲剧。阿根廷允许民众拥枪，华人都带一两把防身。

       新移民还没能力买一部3万多比索（约一万美元）的汽车，出门大多乘搭地铁。在阿根廷搭地铁是件有趣的事。第一站上来一个卖口香糖的，第二站来个推销剪刀文具的，第三站又来两个街头艺人，在车厢里奏起乐曲，路程充满乐趣。

       有车的华人有时也搭地铁。“车资一律75比索，几平等于不花钱，而且不会堵车。”首都车流量高，经常要堵上一两个小时，但不堵车时又得面对当地司机的“疾速考验”。华人常说：“阿根廷人什么都慢，只有3件事快，花薪水快、放假快、开车快。”

       但是，又不得不佩服市内的街道规划。偌大的城市有2000多条大大小小的马路，包括能让24辆车并排通行、全世界最宽的街道——七九大道。这里每个街区都经过严密规划，每一条街固定有100号，街道两侧门牌单偶数相对，非常工整。即使真的找不到目的地，还可以询问路上站岗的警员和热情亲切的路人。

阿根廷社会丰富的拉丁文化，华人要了解和融入，需要一段很长的磨合期。

       第一代华人日常生活中极少有跟当地人交流的需要，学几句简单的西班牙语就能应付。总的来看，华人社群至今仍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说自己的语言，过自己的生活。

* *2006年，华人青年刘松代表阿根廷参加第八届的南美运动会，并且摘下乒乓球男子单打金牌、男子团体赛的银牌和男子双打铜牌。此后，他还曾代表阿根廷参加过两届奥运会，甚得阿根廷人民的爱戴。*

       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对华人而言非常新鲜。华人发现：“阿根廷人个性浪漫，感情丰富。”在地铁站打电话讲到伤心处，可以旁若无人哭起来；位于街心的广场或公园，常见躺在那里午睡的人们，或正拥抱亲吻的情侣。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真情流露的民族。

       说到装扮，他们却一点不马虎。阿根廷人注重仪表，出门一定是套装或西装。他们爱面子的程度，最让华人感到好笑：“年底放长假，阿根廷人爱到海滩把皮肤晒成古铜色。没钱去度假的人为了面子，买好干粮，足不出户在自家天台晒两个月，好让别人以为他们也去度假了。”

       待得较久的华人，生活习惯多多少少受到影响。到当地餐馆吃饭，也学会了把面包当前菜，烤牛肉吃得不亦乐乎，吃完正餐后再来一个甜点或一杯咖啡。跟当地人打招呼，同样会把右脸贴上对方的右脸。含蓄的第一代华人开始总觉得很忸怩，“练习”几次就会越来越自然。

       华人比较难接受的是当地人对遗体的处理方式。曾有华人死后火化，阿根廷妻子主张把骨灰撒向大海，男方家人却不愿亲人“魂飞魄散”。还有一回，碍于当地法律，一名遭谋杀的华人迟迟不能下葬，直到破案为止。华人虽重视入土为安，却也无可奈何。

宴会是当地华人参加得最频繁的社交活动。今天张三结婚，明天李四孩子满月。一名华团领袖笑说：“一个月有20个晚上要在宴会中度过，有时一晚要赶几场。”

新移民很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正值适婚年龄，首都中餐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婚宴。为了迁就开超市的亲朋戚友，宴会在晚上11点才开始。午夜时分，餐馆外寒风凛冽，餐馆内“salud”（西班牙语：“干杯”）敬酒声此起彼落，一直到半夜两三点才结束。酒足饭饱，回家小睡一下，第二天还是照旧开店营业。

       日子没一刻空闲，连传统春节也挤不进他们忙碌的人生。派红包、吃粽子都在超市里。春节期间，如果没参加华人社团的聚餐，几个人在家吃一顿简单的便饭，也就算过年了。

       难怪当地人对华人的印象，一直是“开超市的”或“工作很勤奋”，其他的一无所知。虽然对中华文化不甚了解，却掩不住好奇。当舞狮舞龙出现在华人街，阿根廷人总会争先恐后，涌到最前面摸一摸龙头，祈求走好运。他们对中国小饰物、风水以及中医更感兴趣。中国医药专科学院创办人钟清医师的学生几乎全是当地人，尤其以西医为多。当地华人说：“他们学成后治病中西贯通，很受病患认同。”

       钟医师在阿根廷开班授徒50年，出版过许多相关书籍，培训了很多当地人，曾荣获当地移民局颁发的贡献奖。这份肯定令他欣慰，但大部分华人无力维持文化传承却让他担忧。

中医在阿根廷不需执业执照，吸引很多当地人来学。这是中国医药专科学院里唯一一名华人学生。

   20世纪的第二代华人，在这里长大、受教育，融入得非常快。他们互相称呼彼此的西班牙语名字，爱泡露天咖啡座，喜欢追看足球赛。周末不是在舞厅跳舞，就是在同学家开派对。受当地人影响，土生土长的年轻华人18岁后喜欢搬到外面公寓独居。他们跟阿根廷人一起长大，跟当地人通婚的例子不少。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第一代难免担心土生儿和母体文化渐行渐远。庆幸一群有心人在20世纪70年代就种下了中文教育的幼苗。

       那个年代，资源和条件有限，几名家长以车库和储藏室充当教室，自己敲敲打打钉了桌椅，开始教中文。后来他们在华人街办了侨联中文学校，却因无法负荷不断增加的学生人数，一再搬迁。

       创办人之一的杨镕鉴老先生回忆起过程的艰辛：“有一年开学，全校师生被拒于借来的校舍门外。我只好带大家到附近的植物公园举行开学仪式。”

       30年岁月流转，阿根廷多了华兴中文学校、新兴中文学校、爱育中文学校以及最年轻的富兰克林中文学校。4所资历较久的学校老师还成立了阿根廷侨校教师联谊会，切磋教学方法。

       如今，前人种下的中华文化之树，正在这块南美土地上茁壮成长。

每个周末早上9点到下午5点，1500多名孩子到学校上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课余则学习古筝、书法、跆拳道、空手道、水彩画、舞蹈、音乐以及各种球类运动。校方每年举办各种学术比赛、办校刊，学习过程充实而精彩。坚持到高中课程毕业的华人子弟，中文造诣颇高，中文交谈、阅读和书写都不成问题。

       近年来，华人把孩子送到中国念书蔚然成风。一方面家长工作忙碌，没时间关心孩子学业，另一方面也希望孩子从小接受中文教育。那些在阿根廷完成高中教育的，少数到台湾或欧美国家升学，也有人成功考进当地著名的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只上半天课，华人学生利用下午时间打工，赚些看电影、喝咖啡的零用。

       当地师长对华人子弟印象很好。一位中学校长赞誉道：“华人家庭教育一定很严格，跟阿根廷小孩相比，他们注重礼貌、校服整齐、上课不迟到、责任感强，看到老师还会点头行礼，这在阿根廷是很大礼节呢！

华人子弟数学和英语成绩特别好，即使是插班生，只要掌握西语，很快就追上课业。接着就看得懂西班牙语的电影和报章。     这对第一代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第一代新移民因为语言障碍，遇到问题只能去请教早来的移民。这后来促成了第一份中文报章的诞生。创办人解俊林回忆：“同样的话重复一百次，我想不如办一本刊物。加上当时我本身经营旅行社，想做一本宣传公司、招揽生意的小刊物，于是就有了《阿根廷通讯》。”那是1984年，当年印刷不普及，每则新闻都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写着写着，20多年过去了。如今报纸易名为《新阿根廷通讯》，与《新大陆周刊》和《世界新闻》一起为华社提供各种资讯。翻开报章，除了新闻，广告占了很大篇幅，且大多刊登在显著版位。超市聘请切牛肉工人的广告最多，其次是超市转让、承租等，再来是社团的聚会、活动通告。当地另一本中文杂志《时事商业报》同样以超市业者为主要服务对象。

*阿根廷的电影协会曾经联合中国相关部门，以阿根廷华人的创业经历为题材，摄制了一部名为《天涯尽处的中国人》的纪录片*

大部分华人并没有宗教信仰。他们把300坪大的超市当作最实际的依靠。只有少数人参加佛教团体活动，或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阿根廷共有7个华人基督教会，不少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20多年来，教会慰藉了许多空虚的心灵，帮助许多新移民熬过过渡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和阿根廷新兴教会有小班制的西语课程，帮助新移民掌握当地语言。规模较大的教会不仅开办华语、闽南语和西语聚会，还出版周报和小刊物，让教友们交流、分享。

       教会的关怀和理解，让新移民在超市以外，找到了另一个寄托所在。一位牧师分享：“很多年轻人因此成功戒掉烟瘾。”超市星期天营业半天，一家人无论多累也坚持轮流上教会。教会也积极配合，特别设早堂和午堂两场主日崇拜。

       宗教组织不时访问贫民区、孤儿院、老人院和智能障碍学校等，帮助华人走进当地人圈子。阿根廷慈济义工甚至号召当地人一起参加活动，市政府也极力配合每次的义诊和物资发放。

    陌生的环境、对法律不了解以及真假难辨的稽查人员，一再考验着他们的毅力和决心。更无奈的是华人同业之间不时发生钱财纠纷。两家超市靠得太近，常有争执、打架，甚至暴力威胁事件。也有新移民想一步登天，成帮结伙打劫、勒索同乡。

       华人社团不得不从中调解。福清会馆为了避免这类恶性竞争，规定会员的超市至少须相距3条街。成立于2004年的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则通过专题讲座、超市展销会等，积极整合和引导小资本超市改善营业情况。公会出版中西文并茂的月刊，刊登法律、税务制度等实用商业资讯，是华人超市老板最实用的参考书。懂得使用网络的老板还可登陆网站www.casrech.com浏览最新资讯。

       为了收得事半功倍之效，该会还特地聘请阿根廷人担任秘书，协助争取华商权益，同时树立华人良好形象。阿根廷近几年通货膨胀令百姓雪上加霜，公会主动跟政府签署协议，维持物价。为此，阿根廷总统还向广大华人致谢。

       成立短短几年，公会的成绩有目共睹，成了当地影响最大的华人团体之一。与此同时，以业缘和地缘为主的新社团不断冒起，几乎每年平均增加十个。

       岁月静静流过，阿根廷华社已在逐渐成熟、壮大。

       新移民持续通过留学、旅游、探亲等渠道进入阿根廷。当地政府很大方，不会遣送逾期逗留者回国，更让华人趋之若鹜。

       现在，很多人持有永久居留身份（俗称红本）。华人之间的家常，不是超市就是红本。持红本者可参与省政府和市政府行政当局的省长选举，入籍者则可投票。不过，要不是法律强制规定国民必须投票，华人宁可把时间放在工作上。

       在心底深处，仍有许多人只把自己当过客。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们的答案千篇一律：“谈不上满不满意，习惯了。”对于这片土地，大多数人的感受也相同。“物产丰富，没有天灾，适合居住”；“商业机会多，不歧视华人”；“生活节奏较慢，压力小”，说着说着，却又舍不得离开了。

1972年，第一个华人社团——阿根廷自由华侨联谊会成立，并在华人街上建立中华会馆。如今这里成了许多老年华人的聚会地点。他们在这里下棋、喝茶聊天、跳舞或唱卡OK，消磨时间。

   早期，阿根廷人经营的自助餐，效益一般。后来，华人闯进这一行业，以更低廉的价格吸引顾客，终于使自助餐受到阿根廷人的欢迎。甚至曾有华人自助餐馆因生意太好，店里无法容纳众多顾客，老板突发奇想，到郊外把一家戏院改装成自助餐馆。如今，最大的自助餐厅已发展到可容纳千多人的规模。

       华人自助餐馆靠的是薄利多销。在自助餐馆内，顾客只要付12到15比索，就可以吃到烤牛肉、鸡肉、意大利面等主食，以及各种中式菜肴，还有当地甜点、蛋糕，样式繁多，任君挑选，能满足食量比华人大两三倍的阿根廷人的胃口。市区内主要的步行街开了好几间这类餐馆，竞争非常激烈。每到晚餐时间，员工都拿着广告单走上街头招徕顾客。

       在阿根廷，自助餐叫做tenedor libre，据说是当地华人创造的词汇。当时华人不晓得西语“自助餐”怎么讲，想起自助餐就是拿着叉子走来走去，于是结合了西班牙语的叉子（tenendor）和自由（libre），创造了这个新词汇。

  一间间超市像一艘艘小船，阿根廷华人正在海上破浪前行。这些年来的坎坷仍历历在目，但顽强的华人却早已重新摇动手上的桨，奋力向对岸划去。

       他们是一群太专注划船的水手，不知不觉错过了沿途的美景，也错过了和从旁经过的船家交流的机会。然而，只要他们愿意敞开心胸，主动招呼和攀谈，一切都不会太迟。

    智利是全世界最狭长的国家。在地图上，它宛如一条曲折的道路，蜿蜒于南美洲大陆的边缘。有人夸张地形容：“当你把头枕在安第斯山脉，脚就伸进了太平洋。”这里气候多变，北部是干燥的沙漠地带，南部却有冰山漂浮于海面，智利的地理环境，就是那么不可思议。

       16世纪中叶，智利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08年，趁着西班牙国内动乱之际，智利人民高举独立的旗帜，击溃了殖民地的军队，于1818年正式宣告独立，成立智利共和国。独立后，智利历经政治动乱，经济萎缩。但近些年来政治渐趋稳定，治安良好，政府廉洁，对外贸易发展蓬勃，吸引不少外来投资者，其中也有不少华人企业家。

       目前，智利有华人1万5000人，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混血华裔。

 华人最早来到智利，是出于偶然。

       在19世纪中期，一批广州沿海一带的华人被送往秘鲁、古巴和巴拿马当苦力。他们之中约有70人临时改变航程而到智利去，在北部阿塔卡马（Atakama）及沟进波（Coquimbo）的矿场工作。

       1879年，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发生太平洋战争。当智利攻打秘鲁时，原先在秘鲁甘蔗园和农场受尽虐待的1000多名华工，协助智利军队取得胜利。战争结束后，智利政府为了答谢华工的助战，于是允许他们留下来。就这样，华人在盛产硝石的达拉帕卡（Tarapaca，原属秘鲁）、安多法卡斯达（Antofagasta，原属玻利维亚）及伊基克（Iquique）等城市住了下来。

       20世纪初，轮船公司开始有了往来中国与南美之间的航线，越来越多的华人因此来到智利。当时在智利的华人至少超过1500人，他们从事各项足以糊口的买卖活动，并且省吃俭用，有了一点钱就在硝石矿场附近开店售卖牛肉、酒、家用燃料以及食品杂货等。

       等到经济好转，华人就迁往城内。北部的达拉帕卡、伊基克和阿里卡（Arica），首都圣地亚哥开始出现华人店铺。

       自30年代起，全球经济大恐慌严重地冲击智利的硝石出口，市场萧条，杂货铺更是惨淡经营。有的华商被迫变卖家当，然后回国；有者选择迁居到邻国去碰运气；更多的人则因为破产而滞留智利，回国之日遥遥无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牛肉店成了智利华人的新兴行业。除了牛肉店及传统杂货店之外，华人也经营服装店或电器店等。据说，当时伊基克的街道拐角处全都是华人店铺。

       华人与当地女子通婚的例子也越来越多，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然保留中国姓氏，不过大多数已经和当地人没有多大分别。

       1973年之后，智利的局势逐渐恢复稳定，于是开始有不少台湾人陆续移民过来。他们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带着资金过来开店售卖礼品、服饰和文具等，也有一些华人在伊基克从事进出口贸易。

       1983年，席卷智利的经济风暴致使新移民纷纷迁到欧美国家，有的则选择回到台湾。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广东人因为有同乡或亲戚在智利开中餐馆，因此前来投靠他们。从1990年到1995年，智利的经济前景一片大好，华人纷纷赶来分一杯羹，到了2000年，智利华人已经增至5000人。

随后，又有从中国北方过来的大批新移民登陆。自此，智利的华人群体便不断地扩大。

早期伊基克中华会馆在公墓买下一个坟墓区，安葬客死异乡的华人。

  带着冒险的勇气，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华人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这里。

       目前，居住在智利的华人约有1万5000名，大多是近20年间的移民。遍地机会的智利没有让人失望。广东鹤山、恩平和台山人在中餐馆开创人生，而台湾、浙江、福建等地的华人，则在百货贸易行业找到了自己的小天地。

       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首都圣地亚哥是华商圆梦的乐园。辛苦是必然的，还好回报也成正比。今天，大多智利人都熟悉中餐；每户智利人家里，都可找到几件中国货。这些年来，华人社团、中文学校、宗教组织陆续成立，中文网站和中文报纸也在近两年陆续登场。

       智利华人不介意比别人付出更多，因为，每天当第一道阳光照进这座城市时，他们便又向梦想靠近了一步。

  中餐馆在智利极受欢迎。“哪怕只是一间小店，只要脚踏实地工作，没有赚不到钱的理由。”智利华人总是这么说。在700家中餐馆里埋头苦干的华人，为的就是丰收那一天。“中餐馆中午开店，午夜打烊。回家看看电视节目，凌晨两三点才睡。第二天早上11点再回到店里工作。”这是昌华大酒家老板马志华一天的作息，日复一日。即使生意上了轨道，有当地人伙计，但订货、算账，老板一定亲力亲为。

       拼搏了大半生，现在很多华人已拥有好几间中餐馆。

 丰富多姿的中餐，飘洋过海来到智利，最后只剩下寥寥几味——葱炒牛肉、春卷和炒饭，再加上经过改良的“炸馄饨”，这就是智利人认知的“中餐”。尤其是当地人称作蒙古牛肉的葱炒牛肉，几乎是他们必点菜肴。中餐馆老板说：“几十年来就吃这一道，智利人的口味太容易打发了。”

       如果说很多华人靠葱炒牛肉发财致富，并不为过。他们纷纷把家乡的亲戚朋友接过来，先在中餐馆打工，然后开外卖店。外卖店不需桌椅，不请工人，小孩负责看柜台，父母负责煮炒，夜里就睡在店里。快则一年，慢则两年，就可以开餐馆了。

       智利的中餐馆就是这样一家变两家，两家变四家，而且都是自家人在经营管理。第三代华人的新兴酒家老板罗文广说：“现在我们家族的中餐馆加起来有三四十家，这还不包括远房亲戚呢！”

眼前的风光，实在很难令人想象智利人曾排斥中餐。早期当地人觉得中餐馆不卫生，污蔑华人用猫肉、狗肉和老鼠肉做中餐食材。后来，华人聘请当地人当主厨，又请当地官员到中餐馆吃饭，想方设法，才政变他们对中餐馆的观念。中餐逐渐登上当地饮食文化的殿堂，并渗透到智利人的饮食习惯里。以前智利人不吃葱，现在郊外的农田种着大片的青葱，还有华人爱吃的大白菜、苦瓜等。

       智利人爱享乐爱消费，华人爱做生意、肯拼搏。不只中餐馆以平均每月一家的速度增加，价廉物美的中国货也很快“攻陷”智利市场。在圣地亚哥火车站附近的百货市场、韩国街和智利中国商品贸易中心（当地华人称作温州城），中国制造的玩具、手表、礼品、布料、衣服、五金等商品琳琅满目。

       火车站附近的百货市场就是唐人街。华人店铺占90%，除了大大小小的批发零售店，还有中国食品店、中餐馆。华商笑说：“只有在这里才可以看到短裤拖鞋打扮的人，因为只有华人才会穿得这么随性。”占尽地理优势的市场，早上十点开始人潮不断，直到傍晚6点才散去。

       眼光独到的华商比别人更早掌握当地市场趋势。梁政渊创办的Golf球鞋、钱维国的Fashion Park服装连锁店和石崇的Cuci背包已是当地知名品牌。近来，越来越多华商回到中国大陆设厂，再把自己工厂的商品运来智利，开创了新的产品销售网络。远在智利北部伊基克的华商，也是这么两点一线做贸易。2007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智利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华商在其中作出不少贡献。

     “只要这里还有赚钱的机会，就会继续呆在这里。”习惯漂泊的智利华人，对于未来，总有一丝不确定。

       无可否认，智利庞大的商机，是大部分华人移居的理由，也是他们至今还在这里的原因。加上迷人的景致、友善的民族、浓郁的文化气息，就显得锦上添花。连频繁的地震，也只是华人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在智利经历过无数次地震的华人，早已习以为常。

       开埠400年之久、充满殖民时代风格的圣地亚哥城，在无数次的地震和洪水中，经历着侵蚀、破坏、修复和重建。街上往来的路人仪表堂堂，连乞丐都衣著整齐。圣地亚哥治安良好，市中心每隔几步就有身着绿色制服的警察巡逻。路旁的长椅，经常有人在聊天或闲坐；露天咖啡座上，永远有人啜着咖啡谈笑风声。

       这份闲情逸致，对华人而言却太奢侈。他们的目标明确，不能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在温州商城经营服装店的郑婉洁，别人晚上8点放工后就回家休息，她还一个人跑到仓库搬货。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已是午夜12点了，但她没有抱怨：“只要有生意就好。”温州城里有许多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很多才踏出大学校门，就来这里创业，卖一些中国进口的鞋子、首饰、背包等小商品。

       圣地亚哥消费颇高，这一带租用两房一厅的公寓，月租600美元。在外买个便餐大概也要5到10美金，华人大都自己带便当，一来省钱，二来不习惯当地食物。智利人一日三餐离不开肉类和面包，又喜欢甜食，口味比较重，华人也会偶尔品尝，天天吃就受不了。

智利人的这道菜肴，混合肉类和各种蔬菜炖熟的Cazuela，相当受华人欢迎。

 天生喜欢享乐的智利人，花钱只图当下开心。周五发薪，周一口袋已经空空如也。华人拼命郎似的工作精神，丝毫也影响不了智利人。这点，身为老板的华人感受最深：“即使给他们双倍工资，他们还是不愿超时工作。如是华人，过年也要赶来加班！”无关孰对孰错，只是文化和价值观不同。

       这些文化差异，华人都适应了。但让他们忧心的是孩子选择当地人为婚嫁对象。反对归反对，街上不时可以看到当地女子挽着华人男子的现象。等到论及婚嫁，父母亲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

       智利是天主教国家，不鼓励堕胎和避孕，拉丁民族又热情开放，单亲妈妈比比皆是，很多女孩才上初中就怀孕了。华人家长惊吓不小，认为社会风气太开放，不太适合小孩成长。有些人因此计划等小孩到了上学年龄就打道回府。智利人爱抽烟，全国有40%的人是烟民，也使他们担忧。

  不过，在华人眼中，智利人单纯、善良、个性温和，非常尊重外来移民。智利人对很多事情不求甚解，不会刻意过根究底，生活的确少了很多烦恼。

       大部分第一代华人因为语言障碍，与当地人交流甚少。极少踏出华人圈子的他们，很多时候只讲华语，偶尔会说几句西班牙商业用语。当他们的孩子跟智利朋友在咖啡座谈笑风生，在智利朋友的生日派对上跳舞歌唱，他们却只能“袖手旁观”。

       不过，只要相互尊重，主动踏出第一步，一切隔阂都会迎刃而解。

     2002年，圣地亚哥的智利佛光协会成立后，陆续开办的中文班和中国武术班，让很多智利人认识了中华文化。在素菜教学和佛经讲解的活动中，也以智利人居多。当地已有3000名智利佛教徒，远远超过为数200多人的华人基督教徒。除了圣地亚哥和伊基克道场，圣地亚哥郊外小镇塔拉甘特（Talagante）建设的佛光园也已开放。

       关怀，让双方又靠近了一点。佛光协会不时举办义卖筹款、募捐和轮椅捐赠活动，帮助当地贫困人士。基督教徒也经常举办活动奉献爱心。圣地亚哥华人基督教会还定期率众探访老人院、孤儿院和家暴受害者。

  奔波，是许多智利华人共同的生活写照。有时为了社团之间的联系，有时为了生意，有时为了探望妻小。从伊基克到圣地亚哥，再从智利到中国，他们马不停蹄，处处留痕。

       从智利搭飞机到中国，要在好几个机场转机，过程非常繁琐。然而隔着海洋的家乡，让智利华人心甘情愿地在地球的两端，一次又一次地跋涉。要结婚就回国去讨媳妇；老移民过世时举行火葬，好让家人把骨灰送回老家。尤其那些成年以后才来到智利的华人，他们不愿，也无法融入当地。这里赚了钱，就回去买房子，很多人是这么想的：“总有一天要回去。”说着说着，大半生就过去了，他们却还在智利。

       华人入籍，很多时候只为了智利护照带来的出国便利。外来移民在银行存入两万美金，就可申请居留，两年后改为永久居留。一旦在智利居留满5年，就可以申请入籍。智利并不强制国民投票，但一旦登记为选民，就必须前往投票。华人嫌麻烦，大多选择不登记。加上很多人并不想长久呆在这里，总是抱着一副事不关已的心态。内心深处，那个他们出生长大的地方，才是家。

       由于智利人不爱爬楼梯用餐，这里的中餐馆无论规模有多大，大部分都仅以底楼做生意。很多中餐馆老板干脆把二楼当作住家。

       在这里长大的第二代却不是这么想。他们说智利人的语言，吃智利人的食物，读智利人的书，玩智利人的游戏，甚至都有西班牙语名字。他们的工作、家庭和朋友都在这里。他们的未来，也在智利。

       这些年轻华人，有人如鱼得水，却也有人迷失彷徨。有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父母来到这里，受智利文化影响极大，模仿智利人的一切，想当个“智利人”。他们的确融入了主流社会，但在当地人眼中，依然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有些沮丧，担心迷失了自己。

       移民智利，改写了两代华人的人生，也让两代人之间衍生出许多矛盾和挣扎。

智利很早就有华人社团。19世纪末，在圣地亚哥的智京中华会馆成立之后，其他城镇也相继出现中华会馆。早期，穷困潦倒又无依无靠的华人，就靠着智京中华会馆安排三餐住宿，得以度过晚年。那个穷困的年代已经结束，但会馆旁边那一排残破的楼房却一直没有拆除。斑驳的墙壁是智利华人的历史烙印。

       随着圣地亚哥新移民增多，新社团纷纷冒出来。华人社团总数并不多，而且地域性相当显著。广东人加入智京中华会馆，台湾人参加智利华侨联谊总会、台湾会馆和台湾商会，江苏人则有智利江苏商会，另外还有一些大陆商人加入智利（伊基克）华商联谊会。

       社团除了举办传统佳节聚餐，也定期举办夏令营，让属下青年会的成员重新认识并亲近自身文化。智京中华会馆和智利华侨联谊总会也分别买地充作华人专属坟场。

       中文教育，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是使命，更是责任。1914年，老移民曾创办了一所中文学校——华侨华文学堂。这么多年来，即使华人人数不多，中文教育断断续续，有心人却一再捡拾起这颗文化种子，一次次播种、施肥、灌溉。

       在伊基克，台湾会馆开办了中文班，以小班制的方式让孩子在周末上课，母亲们轮流当老师。首都则有隶属智利华侨联谊会的圣地亚哥中文学校，以及隶属智京中华会馆的智京中文学校。两所学校设备相当齐全，可惜孩子们始终难以理解父母亲的苦心。方块字对他们而言，陌生而艰涩，说华语经常词不达意。下课钟声一响，他们就说起了西班牙语。

       孩子们渐渐长大，当地学校的课业越来越繁重，能够坚持每个周末来上4小时中文课的人越来越少。上了高中后，他们更加抽不出时间。

   华人子弟成绩好，成功进入名牌大学的不在少数。出国的出国，留在本地大学的多选修医药、法律、会计等专业科系，很少继续选修中文课程。智利圣地亚哥大学开办的中文课程，报读的都是当地人。

       大环境固然有其限制，但“有志者，事竟成”也不无道理。2008年2月，智利华人引颈企盼的第一份中文报《智利华报》终于亮相。在此之前，智利华侨联谊总会出版的《智利侨讯》和智京中华会馆出版的《旅智华声》是华人主要的中文读物。年轻人则喜欢上智利华人网和智利华人天下，浏览各种讯息。

       智利也有一群爱好文学的华人，来到天涯海角仍孜孜不倦。他们成立了智利文艺协会，出版过5期《智利文艺》。第一届会长钱维国还办过“包子宴”，一篇文章换一个包子，鼓励大家投稿。智利本身是个文艺气息浓厚的国家，提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已故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不少当地华人都知道，智利人更是一脸自豪。这位诗人曾3次游历中国，写下了壮丽诗篇《中国大地之歌》，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2007年，5名华人子弟在圣地亚哥中文学校修毕高中中文教育，在毕业典礼上接受校方赠送的礼物，以资嘉奖。

  面对海天一色的太平洋，背靠一望无际的沙漠，这就是伊基克独一无二的风景线。寸草不生，滴雨不下，看似荒凉，却居住着1000多名华人，因为这里是著名的免税区（Zona Franca，简称ZOFRI）。

       30年前，免税区初设，设施简陋，生活艰苦，路上随时可见赶着马车的人们，但没想到后来却成为华人做生意的天堂。当时智利邻国物资短缺，华商看准时机经营转口贸易，加上竞争不大，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当时的华商都是台湾人，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商人逐渐增加，连带中餐馆也迅速发展到30多家。免税区里华人开店接近200家，占所有店铺的10%，其他商家来自印度、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但卖的都是中国货。这里只批发不零售，拥有固定的顾客群。每天早上9点，来自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买家已等在店门外。仓库一般设在批发店隔壁，卸货的港口也在免税区附近，非常方便。玩具批发老板叶庆和说：“这是最容易做的生意。”

       生活朴实悠闲，常年都是摄氏18到22度的好天气，在浩瀚的海洋和荒凉的沙漠之间，唯一要忍耐的是单调和寂寞。偶尔免不了有人抱怨“连一间有情调的咖啡馆都没有”，或是“青菜选择太少”，但伊基克华人学会了在单调中找乐趣。周末不开店，到超市买日用品、看场电影、或是到漫天沙地的高尔夫球场打球，都可以非常尽兴。为了互助联谊，这里设立了台湾会馆、伊基克佛光协会、台湾商会、高尔夫球协会，有早期广东人创办的中华会馆，也有新移民成立的华商联谊会。

       这个充满潜力的小城，将继续迎接怀着理想而来的华人。

   华人最初停留在这里，纯属偶然。今天，他们的停留，也未必长久。

       这么多年来，智利华人总是不停地寻找、停驻、再启程。他们像是盘旋在高空的苍鹰，看准目标，就勇敢往前冲。为了未来，一切的冒险和挣扎都有了意义，因为他们始终深信明天会更好。

       远处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脉，一直默默注视着这群来来往往的过客。不管抵达还是离境，不管停驻还是过境，智利总是以这种安静而沉着的姿态，敞开胸怀，迎接华人到来。

    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西北隅，北临加勒比海，西濒太平洋。它是世界第二大咖啡生产国，咖啡在这里被称作“绿色金子”，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哥伦比亚也盛产黄金；绿宝石出口量占世界总供应量的50%左右。

       哥伦比亚不仅资源丰富，优美的景色也使它享有“南美洲的雅典”之美誉。高山地带如首都波哥大四季如春，而沿海地带的巴兰基亚（Barranquilla）及卡塔赫纳（Cartagena）则有着让人心旷神怡的秀丽美景。近年来，哥伦比亚政府积极扫毒，誓要洗净背负已久的可卡因生产老大的恶名，还哥伦比亚一个美丽的名声。扫毒工作得到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协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历史上，哥伦比亚原为印第安人安居之地，却在1499年遭西班牙人入侵，此后沦为西班牙殖民地，直到1810年独立。独立后，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直到2000年5月，独立人士乌里韦当选总统，这一格局才得以改变。

       华人在灾难深重的19世纪离开祖国，跋涉到这个美丽的国家，用血汗谱写了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故事。

   在19世纪40年代，第一批广东台山人飘洋过海，来到了圣安德烈斯岛（San Andres Island），它是哥伦比亚的管辖区。

       第二批移民则是在1870至1890年间到来。那时候，美国正兴起排华浪潮，迫使华人从旧金山等地迁移到墨西哥、巴拿马、秘鲁等国。谁知排华风又蔓延到这些国家，导致华人别无选择，只得再次迁移，因而来到哥伦比亚。

       那时候的哥伦比亚仍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宝地，空有肥沃土地，却无人力去劳作开垦。大部分为农民出身的华人，正好发挥所长，将本身所熟悉的种植技术引入哥伦比亚。除此之外，辛勤的华人也不畏艰苦地从事采矿工作。因此，早期华人对哥伦比亚的农业及矿业都有不小的贡献。

       当地政府非常欢迎华人的到来，所以在那时期，华人的入境手续非常简单。更多广东台山人纷纷闻风而至，他们从广州乘船出发，历经两个多月的航行，先抵达巴拿马，再辗转到达哥伦比亚。直至1913年，华人人口已从寥寥数十人增至1200人。

       1930年代，拉丁美洲的经济开始陷入萧条的困境，失业率日益飙升。一些别有居心的政客借意在哥伦比亚掀起排华浪潮，试图转移国民对经济问题的视线。大批华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离开，使哥伦比亚的华人锐减至300人不到。直至50年代，哥伦比亚政府重新接纳华人，于是掀起了第三波的移民潮。然而，政策规定，只有与哥伦比亚境内的华人具有父子关系的人才可申请入境，因此当时移入的清一色是男性华人，后来他们大部分与当地妇女通婚。

巴兰基亚的哥伦比亚码头（Puerto Colombia）是当年华人的一个登陆点。

  这批中国大陆移民从家乡前往香港乘坐飞机，先到巴拿马，再转入哥伦比亚。他们在哥伦比亚买地种菜，并以井水灌溉田地。当菜地的经营运作上了轨道之后，他们便开始饲养蛋鸡；后来，由于肉鸡的市场非常好，他们又开始饲养肉鸡。如今，传统的养鸡业已经逐渐没落，目前硕果仅存的3家鸡场分别为“中国第一鸡场”、“中国第二鸡场”以及“富兴鸡场”。随着饲料价格不断上涨，鸡场老板近年来还得自作饲料以减低成本。

       1980年，随着哥伦比亚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华人又陆续前来。源源不绝的移民使华人人口在7年内飙升至将近3600人，当中以广东人居多，台湾人则占了一成左右。到了1998年，华人人数更达到高峰，增至1万5000人。

       2006年1月，哥伦比亚移民局宣布，凡是持有中国护照者，可免签入境证，遂掀起了新一波的移民潮。为了控制移民的人数，哥伦比亚政府不得不在3个月后中止免签条例，但是仍有大批的华人以游客的身份入境，并且逾期逗留。移民众多，良莠不齐，当中有小部分的害群之马在此地干起非法勾当，令华社蒙羞。

*1970年代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华人曾集资百万美金创建占地一万多平方公尺、员工120人的“幸运超级市场”，其附属生意“熊猫面厂”生产的速食面及威化饼畅销全国，风头之健，一时无两，可惜好景只维持了十余年，后因管理方式不合时宜而结业。*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约有新老华人移民两三千人，是华人人数最多的城市。第四大城市巴兰基亚的华人人数则居全国第二，约有1100人。其余华人散布在哥伦比亚27个城市。

       华人主要以开设餐馆谋生。目前，全哥伦比亚一共有400多家中餐馆。以台山人为主的早期移民中，几乎都以开餐馆为业。这种情形在巴兰基亚尤其明显，当地约有400多名台山人，就开了80余家餐馆。巴兰基亚华人社会单纯，人数不多且相互认识，彼此非亲即友。波哥则大约有两三百家中餐馆。

       此外，也有部分华人经营杂货铺。可是，让南美华人赚得盆满钵满的中国商品，在哥伦比亚却不见踪影，华人杂货铺里卖的多是当地货。这是因为当地政府实施严厉的进口条例，例如，单是5个不同品牌的酱油就要5张执照，而且申请手续冗长费时。商家还需交出物品样本供化验，至少需3个月时间等待报告出炉，物品才能上架售卖。再者，哥伦比亚大百货商场遍布，随处可见法国家乐福及哥伦比亚自家品牌EXITO，使中国货品“红”不起来。

   饮食业是哥伦比亚华人的主要行业。中餐馆的店门口往往顶着油漆斑驳的陈旧中文招牌，店内张灯结彩，还供奉着关公神像，有的甚至挂上毛泽东画像，装潢如出一辙。

       按常理说，同行之间势必争个你死我活，但在哥伦比亚却不然。哥伦比亚人爱吃中餐，每家餐馆都有各自的客源。店家无需出奇制胜抢客户，免去了激烈竞争，人人心安理得。

       然而，满街的中餐馆却没能烧出一道原汁原味的正宗菜色，最受当地人欢迎的中式菜肴，就是炒饭。尽管如此，哥伦比亚的中餐厅，仍然高朋满座。

三几张桌椅，简单地布置一番，即能开业。餐馆几乎都是家庭式的小本生意，老板、厨师、收银都是自家人，当地员工只负责招待、切菜等打杂工作。

       在哥伦比亚首都，也有一些富丽堂皇的中餐馆。它们一般设在北部的高级住宅区，开业资本动辄二三十万美金。店里的装饰品，多采用中国味极浓的吊饰、陶瓷与对联，有的更设计成拱桥式的屋顶。不过，许多豪华中餐馆里，却摆着西式餐具，华人亦入乡随俗，吃饭用叉舍筷子。

       除了中餐馆外，巴兰基亚的华人也开西式餐厅，卖红酒、芝士蛋糕等高档西式餐饮。这类餐馆拥有高雅的西洋格调，顾客只能在餐牌上的中式菜肴——炒饭中看出一点中华特色。

* *华人在此地做生意，即使不会说西班牙语中的数字也无甚大碍。华人只要说“广东”二字，手持计算器即可。原因是“广东”二字正巧与西班牙语“多少钱”谐音。当地人相信计算机精准无误，觉得华人使用计算器谈生意是表示基本的尊重。*

 贩毒、抢劫、狙击与杀人等恶行，经过媒体大事渲染，仿佛草木皆兵，使得周边国家的人民对哥伦比亚望而却步。

       哥伦比亚真有那么危险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哥伦比亚华人处变不惊，笑而不语，似乎里头大有玄机。

       以巴兰基亚为例，小镇民风淳朴，华人朴实随和。无论陌生人或熟人，见面都能毫无顾忌地侃侃而谈：“来来来，吃饭，吃饭。”这就是巴兰基亚华人的待客之道。华人习惯晚饭后驱车至中华侨联会会馆，或去同乡家，会会老友、打打麻将，直到深夜才踏上归途，也无需担心安全问题。

       华人勤劳刻苦，大多经营小本生意，积年累月，虽非大富大贵，但总属小康之家。平日省吃俭用，工作之余忙里偷闲，每一年，他们总会抽出时间出国度假、探亲。“通常，我们一行人合资租辆小巴士到处去，住的是五星级酒店，吃也选比较好的餐厅，一趟旅行大概花费数万美金。”哥伦比亚华人说来淡然，绝无炫耀之意。

       在4000多万人口中，哥伦比亚华人属少数民族，然而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怡然自得、与世无争。“游击队不搞我们，当地人又喜欢华人。”当地华人欣慰地说。

       实际上，在华人眼中，哥伦比亚人民善良好客，也尊重华人，彼此相处融洽。哥伦比亚人，无论平民百姓或军警，文化素养高，待人亦彬彬有礼。满街各色制服的军警，从不会找华人麻烦。在捷运站驻守的实习警察，甚至还会热心地为华人引路，普遍上不存在针对华人的歧视现象。

       总体而言，哥伦比亚人普遍上对华人还是存有好感的，这应归功于当地华团的付出。2006年圣诞节，华团主席徐铭添名下的坚利国际有限公司，赞助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7200件玩具及灯饰等圣诞礼物，并由联谊会副主席扮成圣诞老人，把礼物送给贫穷地区的小孩。哥伦比亚华人取诸社会，亦晓得回馈社会，自然能赢得当地人的尊敬。

  哥伦比亚一共有4个华团，均以地区划分。其中以成立于首都的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最为活跃，会员最多。另外还有巴兰基亚中华侨联会、卡塔赫纳中华会馆及圣马尔塔中华会馆。 老移民大都把孩子送往外地留学，让他们顺理成章在当地落地生根，也为自己将来移居美国铺路。华人新生代大多无兴趣继承父业，父母也不希望孩子步其后尘，一辈子窝在弥漫油烟的厨房里。这里的发展空间有限，而外地则海阔天空，若要大展鸿图，就得冲出哥伦比亚。

       第二代华人无意经商、不从政，对社团也不感兴趣，社团接班人面临青黄不接的危机。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主席的位子也在苦苦寻觅接班人。“第二代人不出来，新来的人不懂，旧人又慢慢老去。”连任两届主席的徐铭添连连感叹。他自2001年起出任主席至今，深知此位的担子不轻，举凡任何筹款，主席必须带头号召身先士卒，而且还要出钱最多。哥伦比亚华人领导不能空有满腔热情，慷慨解囊、树立典范，才是重要的条件。

       在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的支助下，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中文学校终于在2006年6月创立。

       联谊会腾出会馆的空间，花了8个月的时间填平鱼池，兴建校舍，耗费甚巨。此外，校园内的一景一物，包括桌椅、校铃、饮水机，甚至学生的书包文具，都靠华人集资购得。哥伦比亚华人社群小，但对华教事业却不遗余力。

       中文学校聘请波哥大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来教华文，教科书则采用暨南大学专为海外华人撰写的华文课本。为了学生安全，学校亦安排了4辆专车载送学生往返学校。

       办校不易，更何况身在异国。“我是打杂的，也没有办公室，是校长也是校工。”校长卢钟泓说道。为了开源节流，校长管理校务之余，也毫不计较地打点学校的一切，上至编班，下至敲校钟，卢校长都亲力亲为。

 1985年7月1日问世的《哥侨周报》，每逢周一出版，20多年来风雨不改。“我只想为华人服务，让他们了解哥伦比亚的政策及动向。”发行人周成德秉持最初的理念，坚持到现在。

       《哥侨周报》的创办人兼主编徐延树为旅居哥伦比亚的台湾人。他热爱写作，亦写得一手好文章，所以在朋友的鼓励下策划办报。这一办就不曾停歇，直到逝世为止，而遗孀周成德依旧为报纸默默耕耘。她每周不计成本影印200份《哥侨周报》寄给分布在哥伦比亚各地的订户，却不向他们追讨邮费。

       《哥侨周报》创刊号以手写形式问世，后发展至电脑打字。这份报章如A4纸张一般大，共5页，并以复印形式发行。报章的重点新闻以台湾新闻为主，内页则有哥伦比亚及国际新闻。

       周成德表示：“每个月开销，单是邮费就花去了600美金，其他开销还需千余美金。”然而，《哥侨周报》却没有固定的津贴，一切费用全由周成德负责。“我有商铺及餐厅等收入做后盾，能为华人奉献，小小付出算不了什么。”

       除此之外，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亦在每个月出版《旅哥侨讯》派发给当地华人。这本厚达50页的刊物，以当地华人动向、中国大陆及国际新闻为主。近年来，哥伦比亚华人可以付费收看华文卫星电视，获取华文资讯的管道越来越多元。

《哥侨周报》发行人周成德

 “主席，您在就好，您在我就放心了。”“主席，您回来啦，今天到我家吃饭吧。”

       哥伦比亚华人口中的主席正是徐铭添。华人在哥伦比亚遇到麻烦或遭到不公平对待时，只要徐铭添一出马，问题马上就能得到妥善解决。他曾经放下手头上的生意，大老远从国外飞回哥伦比亚，为的就是保护华人，维护他们的权益。

       “华人在此安居乐业，没干坏事，是好人，我一定帮忙。”好几回，有华人因无居留证而被逮个正着，在送往机场被遣返之际，徐铭添靠着与官方良好的关系，让他们得以长居此地。他后来还将这些人安置在自己的餐馆工作，以防他们再遭逮捕。如今，徐铭添更着手为哥伦比亚华人争取大赦。他说：“这是我退位前必须完成的事。”秉持着孙中山“天下为公”的信念，身为广东中山人的他不只为哥伦比亚华人付出，亦热心服务社会。

       徐铭添自小在哥伦比亚成长、受教育，然后到香港念了几年书，再负笈美国接受大专教育。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与哥伦比亚政要保持良好的关系；标准的华语让他能与中国大使亲切地以母语交谈；而流利的粤语更是他与华人移民之间的沟通工具；英语则让他在生意上无往不利。

       “语言就是条件，多学一种语言，就多一份优势。”身为广东中山人的徐铭添，却能在台山人为主的哥伦比亚当了8年的华团主席，且备受华人尊重。任职主席一职不易，徐铭添一来不推卸，不畏麻烦；二是他好学不倦；三是他幽默豁达，行事作风明快，因此广结善缘。

       徐铭添也是名成功商人，曾登上香港商业杂志的封面。他从事的生意非常多元化，其中包括餐饮业、珠宝业、进出口贸易、礼品连锁店、旅行社等。

  哥伦比亚华人历经风风雨雨，终于在多年后的今天，享有安居乐业的平静生活。

       老移民对哥伦比亚产生了感情，但为了替孩子寻觅更光明的前程，他们仍不停地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一幕幕「孟母三迁」的故事。然而，每当一批老移民离去，必有一批新移民涌入填补他们遗下的空间。哥伦比亚华人社会，就在这种迎新去旧的循环中，生生不息。

逾百年历史的巴兰基亚中华义山，埋葬着许多早期华人的身躯及他们的美国梦，如今只供举目无亲的华人长眠。

 委内瑞拉在西班牙语意为“小威尼斯”，来源于早期原住民在湖边盖房子的生活景观。1498年，哥伦布登陆委内瑞拉，眼前尽是阿拉瓦族和加勒比族印第安人。1567年，它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后来在民族解放英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的领导下，才彻底摆脱殖民统治，1811年宣告独立。

       当全世界因油价高而鼓噪时，委内瑞拉华人却笑说：“委内瑞拉的油比水便宜。”的确，石油为该国带来了巨大财富，但其多变的局势，令未来发展蒙上阴影。自1999年执政以来，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推动一系列变革。

       新政策纷纷出台，委内瑞拉华人难以适应，但凭着坚毅刚强和灵活变通的民族特性，时间久了，相信一切均能迎刃而解。

   根据记载，第一批抵达委内瑞拉的华人，是在1836年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拿马等邻国，辗转来到这里的广东恩平人。

       另一种说法是，一艘开往美国和加拿大的轮船，因为发生故障而停泊在委内瑞拉，船上的数十名恩平人被迫滞留在当地，结果便阴差阳错地成了首批踏足委内瑞拉的华人。

       第一批华人移民多数从事耕种或洗衣等行业。他们不辞劳苦，挨家挨户地收集脏衣服，一双手不停地洗刷粗厚的衣物，然后送到家家户户去，以换取极为微薄的报酬。另有一些华人则在餐馆当杂工，或售卖香烟和食物。

       1920年代，终于有了第二批华人抵境，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在中国染上了恶习或触犯法律，如吸鸦片、赌博、偷窃等，以致亲友迫不得已把他们送到委内瑞拉来。

       1930年代，委内瑞拉迎来了第三批华人。这群华人大多是从邻近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入境。他们十分勤奋，一般从事咖啡馆以及酒馆生意。

       身在他乡的华人，日子好坏与当地政府对待华人的态度息息相关。委内瑞拉的历届总统当中，胡安·戈麦斯（Juan Vicente Gomez）最为厚待华人，所以华人经济发展顺遂。到了1935年，拉斐尔·卡尔德拉·罗德里格斯（Rafael Caldera Rodríguez）继任总统，3年后即发生排华事件。

       当时委国政府限制华人入境，关闭华人所经营的店铺，并且还准备了3艘邮轮，打算将华人遣送回国，只是适逢中日战争爆发，导致航路不通而作罢。可是，无法离开的华人，依然被迫将利润丰厚的酒馆生意转让给欧裔移民。

       由于委内瑞拉宪法的限制，华人也无法取得当地的国籍，华人移民入境更是难上加难。

       直至1974年委内瑞拉与中国建交，情况才稍有所好转。此后，只要持有中国护照和身份证，华人便可申请合法入境，这个转变导致华人移民人数与日俱增。

       到了1980年代末期，中国再次掀起移民热潮，当时至少有一万多名华人从中国涌入委内瑞拉，其中以恩平人最多。

       2004年，查韦斯总统决定给予外国侨民大赦，大批华人获得了正式的居留身份，而且申请的手续极为简易，许多华人因此陆续移居到委内瑞拉。华人大都以“乡亲投靠乡亲”的方式到来，因此，恩平人的人数始终居高不下。

 “一元人民币的商品，在这里能卖上一美元。委内瑞拉满街都是钱，就看你怎么捡。”许多华商如是表示。

       外来商品一入“委门”，则身价十倍，委内瑞拉百货店铺多不胜数，不无道理。因此，局势再动荡险峻，老华人仍然不离不弃，新移民来了一批又一批。

       新移民的创业首选为开设百货商店、超级市场，其次是经营餐饮业。

   这里的百货商店与超级市场外观相似，出售的商品却大不相同。百货商店一般销售日常用品、装饰品、礼品、文具等，而超级市场则主要摆卖食材干粮等。两者多为小本经营，虽不见连锁形式，但有些店铺的商品种类达千种之多。也有些华人在家中腾出小小的空间，然后向亲友取货，即能开业。“就算是街坊买卖，也稳赚不赔。”华人异口同声地表示。

       华人餐馆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设计简单的快餐店，主要做当地人的生意；第二类是装潢讲究的中餐厅，客源以华人为主。首都加拉加斯有3万多华人，就有多达800家中餐厅。

       华人开设的快餐店，经营方式与西式快餐店无异，大多设在商场里，菜单以当地人喜欢的烤鸡、炒饭等为主。不过，从店面外观来看，难以辨别老板是华人抑或是当地人。

       想在委内瑞拉品尝正宗的粤菜，绝对没问题。中餐厅大部分开在首都的高级住宅区内，且毗邻而建。门外不见大红灯笼，反而以利落的西式建筑风格为主，内里又是一片古色古香的氛围。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与华人不同，但中餐对他们而言，却有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

       近年来，尽管政局不稳、市道不景，但生产及制造业前景备受看好，发展空间极大，不少华商蠢蠢欲动，筹备设厂，以便在这块经济蛋糕上分一杯羹。华商纷纷收购意大利及西班牙人在马拉凯工业区留下的中小型工厂，再从中国购入机器，生产自家品牌的塑料袋、塑料容器、衣架、纸箱等等，盈利据说比批发零售更高且快。

        83岁的冯雪茂可算华人商界的佼佼者。他早期从餐饮业转战杂货业，还涉足房地产、塑料制造、媒体等生意，如今仅百货商店、超级市场就有十多家。

        委内瑞拉资源丰富，肥沃的土地尚待开发，丰富的矿物只等人挖掘，发展潜能无限。华人一方面感叹当地人不会善用，一方面则不得不等待时机。

     华人在委内瑞拉耕耘了百余年，尽管曾有华裔当过部长，但社会与经济地位并不高。再者，政局动荡，治安欠佳，更使华人吃尽苦头。

        治安较差的华恋社中区，白天黑夜，两幅景致。天色渐沉，白天的车龙与人群，瞬间被黑夜吞噬，在橙黄街灯的照映下，独留破砖烂瓦的倒影，形同一座荒废已久的死城。当地人于傍晚6点关店乃习惯使然，而华人在7点锁上大门，以策安全。

        华人到餐馆用餐，随时会碰上枪指太阳穴的惊悚场面；即使待在高级酒店，匪徒一样有本事破门行窃。尽管如此，委内瑞拉华人大多逆来顺受，既没佩戴枪械，也不聘请保镖，唯有家里的保安做得最足。

踏入华人家门，总得先解开外锁，再开旁锁，门的下方还有个内锁，好不容易开了铁匣，内里还有一个暗门，进门后又得重复刚才的步骤把门锁上，整个过程需时至少15分钟。

        无奈的华人没法改变整个大环境，但也懂得见招拆招，部分华商靠着与警长的私交而获得“警察顾问”、“警察特派员”等证件，一旦被军警刁难，就能派上用场。

        近几年，“快餐式”绑架取代了哄抢，这边绑架恐吓，那边收钱放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让人始料不及。有鉴于此，华恋社中华会馆及华人商会联合成立护侨小组，与警方密切配合，成功倾覆几个匪巢，解救多名人质。此护侨小组也附设护侨基金会，以便向有需要的华人提供经济援助。

  委内瑞拉华社结构复杂。

        不同语言使用的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迁。过去，非恩平人到此做生意，必须入乡随俗学习恩平话，否则难以融入当地华社，即使能说得一口标准的广州话，一样没辙。倘若口操普通话，即被贴上“北佬”的标签。

        如今，情况稍有改变。华商若能说普通话，将有利于生意上的交往。与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沟通，也需要讲普通话。十字港（Puerto La Cruz）的华侨福利会也在近年开设普通话班（华文会话班），让华商在周末上课学华文。

* *委内瑞拉的恩平人占八成，因此出现西班牙语“恩平化”的情况。有些华人会把百货商店称为“经解野”（西班牙语Quincalleria的译音），中文报章一般选择以恩平话译音，如把“巴伦西亚”（Valencia）写成“华恋社”、“玻利瓦尔”（Bolivar）写成“保利华”等，规范的中文译名反而少用。*

        委内瑞拉华人之间的人情味，建立在彼此的信任程度及相识时间的长短。华商征聘员工，一般优先考虑华人，倘若员工肯做肯学，雇主还会大方地出钱出力协助员工当老板。据悉，冯雪茂就曾帮助至少100名华人创业。

        政府明文规定雇主必须聘请当地人工作，但一些华人存有“老番为人信不过”的想法，表面上关系和谐，实际上日夜防范员工监守自盗。近年来，华人与当地人的关系已稍有改善。

        委内瑞拉的华人是矛盾的，尽管对当地人有所抱怨，却又希望他们不思长进，原地踏步。如此一来，华人少了竞争对手，生意就会越做越旺。

    近几年，委内瑞拉各大华团纷纷在会馆内开设华文班，使用暨南大学出版的海外教材，部分学生完成小学一到四年级的课程后，还会到中国继续升学。

        “希望孩子们毕业时已能阅中文报。”中文教育宗旨明确，而部分华文班亦设有“祖根课”，学校不时举办“回国寻根”之类的课外活动，让学生放松身心的同时，也借此多认识中华文化。

        全委内瑞拉中文教育体系最完整的，要数华恋社中华会馆所设立的中文学校。它拥有8名专业华文教师，6个班级，一星期上5天课，每天5小时。大部分学生早上在当地学校上课，下午就到中文学校学习母语。

* *委内瑞拉全国华人文学艺术爱好者联合会（简称“全委华人文联”）于2008年1月成立，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宗旨，凝聚华人文化力量。*
* 华人虽然仍受歧视，但倘若华人子弟表现优异，进入国立大学并不成问题。西蒙·玻利瓦尔大学及中央大学为当地著名的大专学府，学费廉宜，学位亦受美国和加拿大承认，毕业后许多工作机会都会主动找上门。
* 华人在异国赚钱，依旧不忘捐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冯雪茂就曾于1986年捐献300多万人民币，在恩平县建立了雪茂学校。

目前，委内瑞拉的中文报章有《委国侨报》以及《委华报》等。《委国侨报》是委内瑞拉的第一份中文报刊，仅比第二份中文报刊《委华报》早出版3个月，至今已有十年历史。目前《委国侨报》报社全职员工有十余人，而业务和发行人员则遍布委内瑞拉各省市，基本上都是兼职性质。报纸的销售量为4000份左右，主要在委内瑞拉几个华人偏多的大城市销售。

     2009年，《委国侨报》报社创办了另外一份西班牙语报纸《CHINA EN ESPANOL》，读者群面向委内瑞拉人，以及不懂中文的委国土生华人，以让他们多些了解中国，宣扬中华文化。这份报纸也受到了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支持，目前已发展为中委文化、商务交流的平台之一。

        《委华报》主要报道中国和世界新闻，而中国中央电视台也曾转载该报的新闻报导，销量约4000份，旗下还出版《委华博览》杂志。

        委内瑞拉屡屡在世界选美赛中荣摘桂冠，中文媒体也顺应华社及当地人对选美的兴趣，《委华报》于2005年首开先河，举办全委华人选美小姐比赛，而2007年3月创刊的《南美新知》中西双语杂志也以华裔美少女为封面。

        目前，中文报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各中文报馆规模甚小，员工只有十余人左右。报章每周出版一期，交由会馆及通讯员派发。读者投稿纯属兴趣，并没有稿费。

《南美新知》以中西双语出击，争取华人及当地读者群。

    每逢星期天，早晨7时至下午1时，委京中华会馆摇身一变成了唐人市集，聚集了大批华人。约60个大小不一的华人档口在这里摆摊营业，所出售的装饰品、糕点、影碟等大部分来自中国，而蔬果则为当地产物。

        这个唐人市集已有十余年的历史，原先在委京中华会馆对面的中餐馆外摆摊做生意，但附近居民投诉唐人市集制造噪音及污染环境，当局遂展开扫荡。当时，摊主做不成生意，华人也少了一个购物集中地，后来经由委京中华会馆主席梅其羡医生以私人交情与当局协调，摊主获准继续摆卖，但只限于委京中华会馆内。

唐人市集每周开放一次，售卖各类蔬果、日常用品和家乡美食。

委内瑞拉内忧外患不断，但华人移民毫不退缩，依然纷至沓来，而华人经济发展也日趋多元。

        然而，即使拥有百余年的移民历史，委内瑞拉华人社会地位却未见提升。他们始终还是弱势的一群。华社尚未成功，华人仍须努力。

 南美洲北部大西洋沿岸，曾经有过3个圭亚那，从西向东依次为英属、荷属和法属圭亚那，即如今的圭亚那合作共和国、苏里南共和国和法属圭亚那。这里森林密布，河流纵横，在印第安语上，有“多水之乡”之称。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是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这里却有世界最高的木质白教堂、世界最长的浮桥。它曾被西班牙人与荷兰人占领过，1831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966年宣布独立，是南美大陆唯一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因为历史渊源，圭亚那种族结构复杂，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

       独立后的圭亚那政局长期动荡不安，种族关系紧张。如今，政府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解决种族冲突，但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仍不断上升，这一切都让人望而生畏，前来冒险闯荡的华人人数也一年比一年少。

       大部分华人都把这里当成歇脚点，一赚到钱，便纷纷移民海外。但是，也有华人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园，说是习惯了这里悠闲的生活，哪里都不想去了。

从早期的契约华工直至后来的新移民，华人在这个国家落脚的时间已经有近160年。

       1834年，英属圭亚那废除奴隶制度，黑奴离开了种植园。为了补充廉价的劳动力，英国人便从中国及印度招募苦力，以解决甘蔗园劳工短缺的问题。

       1853年，首批来自中国沿海的契约华工乘风破浪而至，掀开了华人在圭亚那生存和发展的序幕。

       据说那时的契约华工价格比印度劳工还高。在合同期内，华工的劳动力价格是25英镑，印度劳工则只有15英镑。为了降低成本，种植园主都比较偏向于聘请印度劳工，不过，由于种植园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加上华工勤劳卖力，工作认真负责，且奉公守法，得到英国人极大的信任，故此，越来越多契约华工涌入圭亚那。

       根据统计，到1912年为止，圭亚那共有约1万5000名契约华工。后来，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被转送到加勒比海一带的国家，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牙买加等地，也有一些华人在合约期间由于工作操劳过度而丧命。

       逐渐地，也开始有华人女性进入圭亚那，不过人数不多。1861年，玛格丽（Margery）的曾祖母来到了圭亚那。“听说她是第一个到达圭亚那的中国女人，她的脚板只有5寸长。”玛格丽是圭亚那第四代华人，她家的柜橱里珍藏者祖辈们从中国带来的“宝贝”：5对金莲鞋、茶壶、玻璃碗筷、福禄寿瓷器、煤油灯等，保存得完好如初。“这些‘古董’，都是长辈从中国随身带来的，意欲可以给他们带来好运与光明。”玛格丽这样解释。

       一般来说，华人的契约期为5年，期满之后，华人可以自行决定自已的去留。想返回中国的，雇主会付每人50英镑的路费，愿意留下来的，则可以得到补助金。

       回乡对当时的华人而言，是一个极其冒险、九死一生的旅程。他们至少需在海上航行半年时间，才能抵达中国沿海地区。船上的卫生条件恶劣，还得提心吊胆地面对变幻莫测的大海。那时侯，华人在海上的死亡率高达40%。

       故此，一些华人选择了续约，继续留在种植园里工作。不过，大多数华人不为土地或补助金所诱惑，他们决定离开种植园，在城镇定居并转行经商，有的开食品店、洗衣馆、餐馆，有的当了理发师、铁匠、裁缝师、木匠等。也有华人选择去法属圭亚那、苏里南、巴西等地谋生。

       1966年，圭亚那宣布独立，社会秩序曾经有过一段混乱期，导致人心惶惶。“那是圭亚那最苦的时候，没有面包没有米饭，人们只能自己耕种。”华人回忆说。

 因此，华人纷纷移民他国。“那个年代，只要到了英国就可以拿到合法居留证，要办理加拿大居留也很容易。华人手中只要有机票的，都会选择离开。”老华侨说。

       那些走不了的华人唯有听天由命，继续经营伙食店或餐馆。“虽然这里什么也没有，但是做生意就很不错，至少市场竞争力不强，成本低，赚钱容易。”所谓富贵险中求，留下来的这一些人，希望能在这里创一番事业，日后才可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由于早期华人移民当中，女性的数量非常少，所以，大部分的男性移民都和当地其他种族通婚。而他们所生下的混血后代虽然大部分保留着华人的姓氏，但是却连一句中文也不会说了。

       华人非常重视教育，父辈们总是宁愿自己吃苦受罪，也要设法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所以，大部分圭亚那的混血华人都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多数是社会上有地位的成功人士。

       虽然不论样貌还是肤色方面，都很难让人将他们和华人联系起来，但是，传承下来的家庭格训，让他们认定中国人就是他们的祖先。

  目前，不包括混血华人在内，圭亚那华人只有约2000人，多数集中住在首都乔治敦。

       华人新移民大部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来自广州白云区，数量超过1000人。由于不谙英语，他们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大多数人都在餐馆里找生活。

       成立于20世纪初期的中华会馆联系着整个华人社会，但因为种种原因，它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附属的中文学校时办时停，常常有学生却没有老师。

       这里的每个华人都想要把华社做好，只是群龙无首，长期处于松散状态。

 圭亚那资源丰富，却穷得不可思议，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在这里，华人凭借餐饮业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华人在圭亚那百多年，做得最多的就是餐饮业。这里有200多家不大不小的中餐馆，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市中心或郊区。

       圭亚那中餐馆主要分成3种。家庭式餐馆最普遍也最简陋，一般多为夫妻俩或一个人在经营，卖些炒饭炒面和简单的热食，价钱也最便宜。普通的中餐馆有冷气设备，除了炒饭炒面外，热炒的种类丰富些，有些也承包宴会用餐。另外，这里还有几间大酒家，集中在乔治敦，店内宽敞洁净、菜色选择多样，用餐环境与菜肴口味都令人满意，但价钱比较高。

       在圭亚那开一家普通的餐馆，成本不高，平均1万5000美金就可以自己当老板了，家庭式餐馆的资金，更是低于这个价钱。华人说：“圭亚那人口少，失业率高，他们对中餐的要求不高，装潢费人工费都可以省下来，剩下的就是租金而已。”

       大部分的家庭式餐馆都用木板搭成，光线穿过板与板之间的缝隙透进来，阴凉的感觉与外头强烈的阳光形成对比。小小的楼面仅仅简单地摆了些桌椅，连电风扇也没有，更别说其他的摆设或点缀。

       家庭式餐馆的柜台上方，写着简单的菜单。为了安全考虑，柜台外围上栅栏，将老板与顾客隔开，栏杆底部空出约30厘米左右的空间，以方便老板与顾客沟通，与旧式银行的柜台设计一样。在圭亚那点餐，好像去银行取钱一样，老板与客人之间永远隔着一些距离。

    “这里治安欠佳，凡事都要小心谨慎，凡事都要考虑安全。营业时间不要太长，门窗要锁好，不要让别人有机会对你下手。”华人都知道若没做好基本安全措施，就等于送羊入虎口。

       尽管有诸多风险，华人还是很享受自己当老板的感觉。中午没客人的时候，老板可以借机睡午觉，客人来点餐，只要在柜台外大喊几声就可以了。

       “相较于经营百货店生意，开餐馆最轻松不过了，至于安全问题，只要低调、不张扬，时刻提高警惕就行了。”和妻子一起经营家庭餐馆的朱构雄如是指出。朱家的店就在郊区大路旁，每天平均可卖四五十碟炒饭炒面，一天约有100至250美元的收入。

       圭亚那的中餐馆已有100余年的历史，深受当地人欢迎。在乔治敦外的郊区，有一家非常受当地人欢迎的中餐馆。老板自豪地说：“这里很多人都是吃我的饭长大的。”

       小小的中餐馆，虽千篇一律，但却是大部分华人在当地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华人说，在圭亚那做生意最自由。“只要照章纳税，遵守法律，你开什么店，营业到几点都可以，没人会刻意刁难你。”华人在这里做生意如鱼得水。

       近年来，廉价的中国百货风靡全球。乔治敦的大街上也出现了几家华人百货店和衣饰店。百货商品一般是从苏里南进口，华人在圭亚那开店售卖。

* *连任两届圭亚那总统及国家元首（1970-1980年）是名叫阿瑟钟（Raymond Arthur Chung）的华人。他的父亲是来自广东的客家籍契约华工。阿瑟钟曾留学英国，返回圭亚那后，担任律师及高等法院法官。1977年，他曾经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中国。他在圭亚那享有崇高的威望，2008年辞世时，举国放假一天来悼念他。*

       苏里南华人也因此过来做生意。“苏里南百货店已达到饱和状态，竞争激烈。听说圭亚那华人不多，还是片处女地，便过来尝试一下。”苏锐辉是浙江人，在苏里南住了几年，累积了闯天下的经验后，就单枪匹马地来到圭亚那发展。

       越来越多中国商品进入圭亚那，从大型的拖拉机到小巧的打火机，都是“中国制造”。华人说，圭亚那人对中国商品非常喜爱。圭亚那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雨量充沛。当地人一出门，至少会带一把伞。有些当地人对设计精美的中国雨伞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们会拿在手里，边亲吻伞边说：“我喜欢中国伞。”

       “在圭亚那做生意，竞争小，利润多，但是员工薪水比较高。”苏锐辉说。以前，聘请一个当地人每个月要100美元，现在则是每个月350到450美元不等。星期天还要付双倍工钱。因此，华人商店最多聘请一至两个当地人，其余都是亲戚朋友来帮忙打理。哥哥放假去旅行了，就请弟弟到店里来坐镇；弟弟到国外进货，哥哥就会到店里帮忙打理。

       圭亚那贫穷，但物价却出奇的高。“这里的人口不多，薄利多销是行不通的，每样商品的顾客群都不多，只能提高商品价格销售，否则成本压力会很大。”华人说。

       虽然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华人商店的销售量还不错。华人透露：“当地人消费观念和华人完全不一样，他们非常乐观，只要身上有钱，就会迫不及待地要把它花光。”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的钱好像永远也花不完。

       原来，这个国家70万总人口中，竟然有50万人长期定居在发达国家，留在圭亚那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亲人在海外，他们的家人会定期给他们汇款，因此当地人每个月都会有不菲的收入。

       “加上他们天性乐观，真的没钱了，也会卷起裤脚到河边抓鱼虾去卖。或者到深山去采金，只要在山里待上半个月，就会有钱了。”华人说，“他们有钱，我们的口袋就有钱。”

       因此，这个国家看起来很贫穷，但生活消费一点也不便宜。

     圭亚那有些华人从事伐木业。

       这里超过85%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着。“圭亚那的每一片森林都是宝藏，埋藏着无尽的宝物，等着伯乐来发掘。”华人如此形容。听说在这里伐木也能赚到钱后、华人、外资公司便陆续前来投资，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

       巴拿马伐木集团、长青集团、中国木业资源集团是这里数一数二的大型华人伐木公司，其中，巴拿马伐木集团在香港上市，掌舵的是马来西亚华人。这几家公司在圭亚那有好几个规模非常大的林区，虽然政府批准他们伐木，但也规定他们注意保护生态平衡，不能过度开采资源。

       森林里蕴藏着无限资源，同时也潜藏着无限危机，特别是蚊虫带来的危害。“圭亚那森林里有超过十种毒蚊，有些毒蚊的潜伏期是十天，被叮着的人一定要留在圭亚那，因为只有圭亚那才有药医。”华人说，“一般人不能被两种以上的蚊子叮到，不然就有生命危险。很多人以为只要上山把树锯断，再运下山就可以换取一桶桶的金币了。殊不知，他们贸然上山，往往会走上黄泉路。”

       “然而，有些林区很安全，他们会先‘消毒’林区，然后再进行伐木工作。”华人说。比起一般小规模的伐木发展商，大型的伐木公司会更注重伐木工人的安全，他们的林区还有医疗所。

       圭亚那交通不发达，从市中心到林区路程遥远，一般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的车程。人们到了林区边缘的小码头，还得乘坐小船才能去到目的地。这对于每天往返奔波的人来说，实在是浪费时间。

       于是，有些华人干脆就住在林区。他们有来出差的、伐木的、在伙食店打工的，也有参与新建食堂的华人等。他们生活简单，早上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后，就和朋友踢踢球，6点半天黑了就吃晚餐。天黑以后，林区野兽出没频繁，华人只能待在宿舍，避免野兽攻击。“无聊时可以上网，想不到吧，在林区还可以无线上网。”华人说。

   随着时代的进步，林区的物品供应也渐渐地丰富起来。有华人在这里开伙食店。小小的伙食店，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毛巾、床褥、煤油灯等应有尽有。雪柜里还有冰冻肉类、水饺、汤圆等。

       伙食店老板知道林区的员工多来自东南亚，就卖东南亚的罐头、干粮等食品。“马来西亚的美禄、炒面特别受欢迎。”老板说。每隔3天，他就把新鲜的蔬果、干粮送到林区去卖。

       华人一般不会在林区待很久，有些华人3个月或半年就回家一趟。他们说，他们的家不在圭亚那。

    尽管圭亚那政治局势长期动荡不安，物资匮乏，物价奇高，但还是有华人留在这里。

       “这里什么都没有，治安不好，医疗设备不齐全，消费又高，生活很不方便。”华人希望退休后可以到一个比较“先进”的地方养老。“至少可以吃得到宵夜的地方。”华人要的其实不多。

       然而，留下来的华人也多了份圭亚那人对生活安闲的态度。

       乔治敦是个宽敞且悠闲的城市，这里没有高楼大厦，一排排的平房散布在随风摇曳的椰树间。宽敞的街道一览无遗，载货的马车与汽车并行，简单的4轮马车功能大，有的装载几根木头或水管，有的则载满了一笼笼小鸡。

       车夫戴着草帽随意地坐在货物上控制马匹，马儿一步一步地走，身旁的车辆一辆一辆地滑过，车上的人则一边悠闲地抽烟一边哼歌。红灯一亮，车夫悠悠地拉拉绳子，马儿渐渐放慢脚步停下来，不缓不急。“当地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们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赶时间。”华人说。

       华人既来之则安之，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他们的生活态度，也渐渐敞开胸怀，学习享受人生。

当地人对物质也没什么奢求，工作效率慢吞吞，常常领了薪水就不去上班，“你和他们发脾气也没用。他们自有道理，说什么今天有钱不花，万一明天死了怎么办？”华人无可奈何，只能调整自己来适应他们。

       圭亚那人热爱生活，摇床是他们家里的“标志”，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两张摇床。下午时，把摇床悬挂在椰树之间，躺在摇床上，享受着徐徐的大西洋海风，看着椰树和芭蕉树在风中起舞，很是惬意。华人有样学样，也把摇床悬挂在屋外的柱子上。

     很多理由，让华人迟迟不想离开圭亚那。

       每个华人都说，圭亚那人情味特别浓。“老华侨都很乐意帮助新移民。新来的华人如果无依无靠，到各中餐馆，大家都会请你吃饭。”来自广东的黄埔源指出。甚至有些已经移民到欧美的老华侨，因为习惯了圭亚那的人情味，还特别折返回来。家人都在美国的周绍良说：“我去那么多地方，还是觉得圭亚那的人情味浓。虽然我已经拿到了美国居留权，但我还是比较喜欢留在这里，哪里都不想去。”

       华人还说，圭亚那森林多、河流多，不仅空气异常清新，就连蓝天白云看起来都比别处近，感觉自己靠近大自然，心情常常会感到特别的舒畅。“心情郁闷时，也可以租条小船到河上去兜风，让大风把烦恼吹走，很过瘾的。”经营中餐馆的萍姨说。

## 

   中华会馆是当地唯一华人社团。早在19世纪中期，圭亚那华人就组建了自己的社团，但没有注册。直到20世纪初，才正式注册成立了圭亚那中华会馆。

       早期的会馆为华人提供了大量的服务。老华侨说：“那时候，凡是无家可归的老人都可以免费住在会馆。没有华人流落街头。”

   只是，在80年代，圭亚那华人大规模地迁徙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后，会馆的会员人数逐日减少，会馆的凝聚力也渐渐转弱。大家走的走，留下来的华人也忙于打理自己的生意，会馆的事情，也就很少参与，有些新移民甚至不知道有中华会馆的存在。

       “会馆还是正常运作，只是犹如一盘散沙，大家都没时间帮忙处理华人事务。”中华会馆会长黄埔源很无奈地说。就连他自己，也常常周旋于自己的生意，对会馆的事情上难以兼顾。

       “会长的事情很繁杂，新移民一有状况就会找你，你可能要去法庭帮他们做翻译；中国大使馆有时候也会请你过去帮忙。”华人的事情，大部分都是黄埔源一个人在做，他相信如果有更多人热心参与，会馆可以发挥更大的功效。

       华人希望圭亚那能早日出现一个健全的华人社团，把背景不同的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大家在这片土地上，都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比起大多简陋的中餐馆，新隆酒家在圭亚那可谓赫赫有名。

       刚开始，老板车剑萍和丈夫肖广钊用了4000美元来创业。“1989年，我们到圭亚那旅游，发现这里没有好吃的食物。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发展餐饮业肯定有前景。”车剑萍和丈夫拖着两个行李箱就过来了。

       车剑萍是女中豪杰，肖广钊是细心老板，夫妻俩双剑合壁，在圭亚那闯天下。大家都以“萍姨、钊叔”来称呼他们。

       夫妻俩初到圭亚那时，人生地不熟，到超市买菜、订货、下订单、洗厨房等都自己做。“早期做餐饮业很辛苦，但是赚钱容易，只用了3个月时间，我们就已经赚回本了。”他们越做越开心，越做越有心得。

       “中餐馆的炒饭炒面份量大，口味好，此外，到中餐馆聚餐也是一种娱乐。”萍姨分析着华人餐馆兴隆的原因。

   1995年，她把赚来的好几万美元投资在新餐馆，还特地从美国订了4台冷气机，也开始聘请员工。因为不懂英语，她半开放厨房，在橱窗上挂着猪肉、鸡肉、鸡蛋、青菜等，让客人点菜。“他们只要指着那些食材，我就知道要怎么炒菜了。”

       没想到，透明厨房的创意，吸引了大批客人。“他们一方面觉得很新奇，另一方面也觉得卫生，看得见厨师在炒菜，大家吃得放心。”于是，店里客似云来，2000年萍姨的事业达到高峰。

       华人说，是圭亚那人就必定会到新隆酒家用餐。无论是商人要招待朋友、官员要请客、外资公司办聚餐、侨乡团聚吃饭等，都会想到新隆。“这里人来人往，可以认识很多人。”因此，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政府官员，萍姨钊叔和他们多少有点交情。

       可惜，因为一把火，一夜间，他们的餐馆化成一堆灰烬。

       那次的意外事故，让萍姨的心情跌到谷底。过后，她重新振作起来，决心要在圭亚那打造一个当地最大的中餐馆。她在中国订做餐桌餐椅桌布，还特别在中国大陆聘请了专业设计师和建筑工人来圭亚那为他们装修新店，共投资了350万美元。

       新的新隆酒家有3层楼高。3楼隔作厢房，有好几间包厢，也包括可容下30多人，结合开会与用餐的大会议室。2楼的露天餐厅，场地宽敞，客人可以迎着海风品尝佳肴。楼下的自助餐品种繁多，更是让人垂涎欲滴。

       圭亚那是多元种族聚居的国家。为了满足多个族群的需要，新隆酒家还提供印度餐、黑人餐、素食等。它就像一个小联合国，随处可见各种肤色的人种，无论是谁，都能在此享受到居家一样的温馨服务。

  玛格丽是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混血儿，她既过印度人的节日，也过中国的传统节庆，如中秋节与春节。每年华人的农历新年，她都在家里办聚会，并规定亲戚朋友须穿旗袍或唐装才能出席。

       圭亚那买不到华人传统服饰，他们就上网订购。“农历新年前两个月，我们就开始订购了，有些人还特别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去购买唐装。”她说，“除了服装，还得购买一些红色的、喜气的小饰品来搭配。”

       “我的孩子取笑我，一个不会说中文的人，竟然坚持过华人节日。”玛格丽的用心，其实也感动了很多的华人。出席盛会的多是土生土长的混血华人。“他们不会说中文，但可以感受华人新年气氛。”玛格丽还会准备一些简单的表演节目娱乐大家。

       熟悉的中国曲风加上华人的热情表演，往往都能感染当地人，让他们也融入其中，与华人一起欢度新年。

       那一天，圭亚那华人会互给红包。玛格丽说，早期华人踏海而来，身上没多少钱，新年时，他们在红包里放着一大一小的鸳鸯八卦铜板代替零钱，表示祝福的意思。“如果每天都把红包携带身上的话，那就表示你一整年都有钱用。”玛格丽就随身携带丈夫给她的红包，希望好运天天来。

       玛格丽有个心愿，她花了十多年时间收集资料，访问老人家，记录整理了几近完整的圭亚那华人族谱，希望为自己的下一代留一些线索，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圭亚那华人不多，大部分更是与异族通婚了，有了族谱后，华人才不会误和自己的家人结为夫妻。”族谱很厚，其中一份副本被保存在圭亚那国家图书馆。

华人踏足圭亚那已近一百六十年。不喜欢这里的华人，早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留下来的华人，已经与当地人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留恋的是这里的悠闲生活和浓浓的人情味。

       华人在这片土地，留下了一路走来的汗水与泪水，以及脚踏实地、辛勤劳作的成果。他们也在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洒下了永不熄灭的民族之光，提醒新一代华人，不要忘却自己的根。

    法属圭亚那，本是不为人知的法国海外领地，随着1964年法国在这里建造航天中心，一支支火箭腾空而起，渐渐远近闻名。

       这里也曾经是法国的流放营。1973年，好莱坞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经典越狱电影《巴比笼》（Papillon），就是描写当地一个因沉冤入狱的囚犯为了自由而越狱的故事。百年来，岛上留下的种种传奇故事，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

       法属圭亚那森林密布，景色优美；加勒比海人用他们天生的率真，热情地拥抱着远道而来的华人。渐渐地，华人对这片土地产生了眷恋之情，留下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如今在法属圭亚那生活的华人，起初都来自英属圭亚那（即今圭亚那合作共和国）。1870年，有十名契约期满的华人，因为不愿意续约，又不想就此回国，于是便抱着拓荒的精神，带着本身仅有的积蓄，从乔治敦（Georgetown）跋山涉水步行至苏里南，再由苏里南的日计里（Nickerie）辗转抵达法属圭亚那。

       后来的华人都称他们为“十杰”。这十人大多数为广东客家人，初来乍到时，语言不通，在沟通方面也成问题。起初他们仅能以面包或杂粮充饥，并睡在公车站廊。后来，他们慢慢与当地人混熟了，开始跟随他们到海边捕鱼、到森林中伐木、到山上去狩猎，有些甚至还到荒岗掘金。

       任谁也没料到，华人竟能如此快速地融入当地社会。当地华人说：“那些老前辈们为了生活，有的仅仅花了3天的时间就能和当地人聊起来。”

       日子一久，“十杰”攒积了一点钱，便开始转而从事商业活动，这地方也自此有了华人杂货店、中餐店、面包坊和洗衣店等。老华人回忆道：“虽然那些店面非常简单粗陋，可是这对当时落后的法属圭亚那来说，已经算是创新的行业了。”而今，接下“十杰”棒子传薪的后代们，有些还留在此处，有些则已经移民到其他国家去了。

       到了1950年代，移居过来的华人日益增加，他们大多数是广东惠阳、宝安和东莞的客家人，并以“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的方式，逐步将家乡的眷属申请过来团聚。华人拎着两个皮箱乘船而来，一艘艘渡船承载着的都是他们满满的梦想。他们之中，有的是过埠新娘，有一些是年轻小伙子，更多的是为了改善生活而被迫离乡背井的中年人。

       1951年，法属圭亚那已经有60名华人，其中女性有6名。

       当时的华人非常团结，又相互关怀照应。“我们客家人是很好客的，一有新的华人移民过来，每家人都会轮流请他们吃饭，以表示欢迎。”法属圭亚那的华人每每提起50多年前家家户户轮流请客的情景，就好像饭局才刚刚结束一样，那热情的余温犹在。

       当时这里也来了一户以修理钟表为生的郭姓人家，他们是第一户居住在法属圭亚那的浙江青田人。

       70年代的法属圭亚那还没有完全开发，人口的增长率也非常缓慢，土地更是一片荒芜。一名华人妇女回忆道：“听别人说我老爸在这里开餐馆，我便想过来帮忙。哪里知道飞机落地之后，看见那简陋的机场，和没有路灯的黄泥路，四周都是黑人的影子，我的心就一直往下沉。”眼见这里比自己的国家还要落后，她真的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可是想转头离开也来不及了，唯有留下来努力挣钱。

       两手空空而至的华人，通常来到这里就会先替亲戚打工，让亲戚将他们的工钱存下来，几年过后再把积蓄拿来开店做生意。此处的华人，几乎皆是这样起家立业的。

       早期华人大部分经营伙食店，客家人称这种伙食店为“咸头店”，是属于家庭式的小店铺，专卖日常用品及食品等，只要手头上有2500至4000法郎的资金就可开张营业了。

       来自香港的何广富是首名经营“咸头店”的华人。1907年，他抵达法属圭亚那，听说这里有金子，就做起了“淘金梦”。哪知上山掘金比他想像的还要困难得多，只有少数的当地人才能忍受那种艰苦。于是，他只好转行，在圣罗兰（St. Laurent）开了一家伙食店，没料到居然会门庭若市，客人源源不绝。

       当地人的性情单纯友善，他们到“咸头店”买货时，若是身上没钱，就会用金块来换取日用品。华人说：“他们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就把金块放在柜台上，任由我们来估算。”

       当地人每次在店里买了饮料之后，就会坐在店外，三五成群地边喝边聊。如此一来，华人和当地人就有了更多的沟通机会。“多一些和他们闲聊，学讲土话也学得比较快。”

       “咸头店”的面积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多为夫妻俩一起打理，工作时间长，而且相当辛苦。店里卖的多是柴米油盐、蒜头、酒、豆类、也卖些腌制食物如咸猪尾和腌牛肉等。“当地人很喜欢吃腌制的食品。小小的伙食店一星期就可卖掉25公斤的咸猪尾，利润非常可观。”老华人回忆说。

       每一家“咸头店”的前头都有一个柜台，客人把棍子握在手里，要买什么就指什么，老板再把货物拿给客人。老华人说：“当时的货品完全没有包装可言，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秤量。有的客人要半公斤的盐、有的要一公斤的油、有的要两公斤的面粉……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爬上爬下地拿货给客人，一天忙下来，把人累得够呛。”

       那时候的法属圭亚那基础设施落后，居民的生活既贫困也简单。他们经常到华人伙食店赊购食物，待发薪时再慢慢地付还欠款。当地人几乎都没有储蓄的习惯，为了生意着想，华人只好让他们赊账。他们说：“宁可大家做个朋友，让他们慢慢还钱，也总比他们到店里偷东西来得好。”

       客家人说，这也叫做生意，常做常有。

       虽然华人在法属圭亚那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收获丰厚。

       在80年代初期，浙江青田籍的华人才开始小规模地踏上这片土地，他们虽然来得比较迟，但是却发展得最快。而他们今日的成就，都得归功于郭胜华这一名令浙江人在当地站稳脚跟的核心人物。

     法属圭亚那目前共有华人6000人。其中广东客家人约有4000人；其次是浙江青田人，约有2000人，首府卡宴一直都是华人最密集的小城，罗兰这个与邻国苏里南一河之隔的小镇，也是华人的聚集地。至于太空城市库鲁（Kourou），也有约400名华人定居。

       在这片土地上，华人人数虽只占总人口的3%，但华人店铺却占了商铺总数的70%.可以说，华人对该地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随着时代改变，华人逐渐走出咸头店，进军各行各业。他们有的开旅馆，有的经营精品店，但更多的还是从事百货超市、餐馆、服装等行业。据估计，现有的华人店铺有600多家，其中有400多家集中在卡宴市。

       其中，备受欢迎的中餐馆成为继咸头店后，法属圭亚那华人引以为荣的另一行业。

       相较于其他南美各国，这里最大的中餐馆只能容纳百余人。华人说：“法国是万税之国，什么都要抽税，地方大一点就要多缴一点钱。”小小的中餐馆，装潢也简单，却能聚集多方客人。

       这里中餐馆受欢迎的程度让人惊讶。每家新开的餐馆必定门庭若市。百多年来，客家、粤菜让法属圭亚那的人们回味无穷。餐馆老板谈起成功原因时说：“主要也是因为价钱合理，一个人吃饭的话，估计十欧元就很够了，若点菜则大概就要15至20欧元。”相比之下，吃西餐若点一个主菜、一杯红酒再加甜点咖啡，至少也要花上30至40欧元。

位于卡宴市的喜宝茶楼，算是华人的主要饭堂。每天清晨，那里必定人潮汹涌。华人喜欢到那里吃点心，喝茶聊天。“每天最新的新闻、八卦是非、各路消息等，都可以在那里打听得到。”他们说：“别说华人，就连当地人也爱去那里吃午餐。若没预先订位，搞不好会等待很久。”

       当地人爱吃面包，喜欢把面包当早餐。于是华人就卖面包、批发面包。“早市的中餐馆要卖牛油面包、牛角包，超市也要卖法国面包，所以每天清晨5点多我就得去送面包了。”27岁的曾启文（Jean Tsang）说。他在这里土生土长，曾到巴黎留学，现继承父业，与弟弟一起经营面包坊生意。他说：“这地方小，面包生意竞争大，大家各凭创意，看谁能在这小小的圈子里赚得到钱。”

       法国政府在库鲁市建设太空城后，引进了许多欧美专业人员，爱吃面包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市场也就越来越大。来自上海的老谢，就在那时候看见商机，买了德意法兰西（Delifrance）的经营权，如今他每个早上就可卖掉200多条面包。

       面包房的烤炉温度很高，让人难以忍受，因此即使高薪聘请华人，他们也不太愿意从事这份工作。于是大部分的店主只好聘请当地人。“但他们没有责任心，上班聊天喝咖啡，请假没有理由，心情不好就不来上班，让人头疼。”店主如是道。

       尽管对当地人有诸多不满，但私下里，华人还是认为他们个性单纯、热情，如果不是因为双方的雇佣关系，他们会成为华人很好的朋友。

据华人说，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是华人在法属圭亚那做生意的黄金时期。那时期姗姗来迟的浙江人，却正好赶上了好时机。他们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创造出自己的春天，在短短几年间就把法国与犹太人的百货商店挤向了边缘，让中国百货和服装称霸整个法属圭亚那的市场。

 他们经营的百货店遍布整个卡宴。在卡宴大街，甚至有条“青田街”，街上的华人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店外高挂着用汉字或汉语拼音译成的招牌，如DaDi、DaDu、东方、FaFaFa等。

       华人商店的门面有大有小，店铺内出售的货品多达千种，但店里没有什么装潢设计可言，几乎每家百货店都呈现一个模样，琳琅满目地摆满了“中国制造”的廉价电器、塑胶用品、门帘挂饰等——华人费尽心思地将有限的空间充分利用，到处都挂满、塞满了货品。

       当地人不像华人那样省吃俭用。“他们刚领了薪水，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把钱花光。我们哪能这么潇洒？”华人说。另外，当地人过节时，会大量购买礼物及添置新衣。特别是复活节、母亲节、圣诞节等节日，他们都会买礼物送人。华人从中发现了商机。

       可以说，这个市场需要什么，华人就会提供什么。遇上开学日，店外两旁挂满了书包、衣服鞋子，走廊边也摆着地摊，上面堆满了颜色鲜艳的文具、日用品等。有的华人还为客人提供制作名片、设计菜单、打字、婚礼拍照等服务。华人充分地把握了当地的每一个商机。

       虽说早期来的广东客家人已经够勤奋了，但后到的浙江新移民比他们更为拼搏。别人早上8点开门，新移民则清晨6点不到，肯定就会打开百货商店大门开始营业。别人晚上7点关门，他们则坚持到9点才打样。有人笑说，要和华人比勤劳，连下田耕种的牛都会认输。

       “初到的华人，个个都拼命工作。我们华人‘会走路哪有慢吞吞的’？只要大货柜一到，大家都是以赛跑的方式来搬货，22分钟内一定会搬完。”华人颇为自豪地回忆当初他们工作的情况。

法属圭亚那发展缓慢，然而，到来的华人绝大部分都不想再离开。原来，这里有比香港、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加拿大温哥华更吸引人的地方。

       当飞机徐徐降落在卡宴国际机场，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虽然南美的热带阳光火辣辣地照在身上，但透过百叶窗徐徐溜进来的清风，却让人感到有一丝丝凉意。走在身旁的当地黑人，会亲切地给你声声问候：“Bonjour”（你好）、“Ca Va Bien?”（你过得好吗？）面对着那份笑容那份真诚，即使再冷漠的心也会融化。

       遇见当地朋友，一句“我的孩子，来抱一下”，他们就会热情地把人拥进怀里。要不，就来个南美式的亲吻，脸颊碰脸颊，碰了右脸再碰左脸。南美人的热情，总在相见的第一刻，就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

       华人与当地人也因此结下了百多年的情感。

       “许多大城市的华人，赚到了钱，自我优越感就会很强，但是这里的华人不会。华人和我们的感情很好，他们没有架子。早期的客家人还和当地人通婚呢。”佐治曾是圣兰玛莉（Sinnamary）的市长，他说，法属圭亚那华人礼貌至上，即使法语说得不好，但见了人，不管认不认识都会先说一声“Bonjour”。

       在法属圭亚那，不管白天的天气有多热，到了晚上，一定是凉风习习。“这里空气很清新，深深吸上一大口气，你一定会爱上这片土地。”华人说。

       这里民风淳朴，生活简单，节奏也慢，工作起来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当地人做事效率很低，想急也急不来，但好在大家都很遵守秩序。”经营礼品店的老板邹素怀（Nathalie Zou）似乎已经习惯了卡宴的慢步调，她说：“回到深圳，我发现那里的人步伐太快了，好像没有休息时间似的，感觉自己和他们格格不入。”

       虽然很多华人常说自己无法接受当地的生活和饮食习惯，然而，他们在这里生活久了，多多少少也受到一些感染。例如，华人喜欢吃的咸猪尾巴，就是一道典型的当地菜肴，用番茄酱、香料等煮成，口感酸酸的，足以增加食欲。此外，大部分的华人吃饭，也喜欢搭配葡萄酒，因此饭桌上总少不了一支酒精度在7至14度之间的葡萄酒，又称Table Wine（桌上酒）。饭后，华人也会喝杯咖啡或吃点甜点。

香浓醇厚的咖啡让华人体验了生活的悠闲与轻松。“不止咖啡，还有吊床！”华人补充说：“下午躺在吊床上，看着报纸，吹着凉风，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啊！”

       在这里，可以花钱的机会不多。法属圭亚那吃的、用的、穿的几乎都从国外进口，物价高而选择少，所以华人一般都到国外去购物。华人说：“很多时候你有钱也未必买到东西。”因此，这里没人在乎潮流这回事。

       他们也说：“这里四季如夏，一件衣服穿个十年，也不会有人笑你。”这里生活随性自在，穿着也不需要太拘束。“穿着短裤凉鞋就可以出门了，舒服又自在！”太过整齐，反而让人觉得受约束。

       看来，华人似乎很享受这里的南美法式生活。

以前，法属圭亚那人只说法语或者当地的土话，现在英语也能用得上了。接受法国教育的华人新生代，一般至少都能说上5种语言——粤语、华语、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日语等。华人说：“孩子懂多种语言，对他们的前景会好一些。”

       华人重视孩子的学习，也欣赏法国的教育制度。“这里重视通识、外语教育，除了教给学生书本知识外，也努力拓宽孩子的视野，增强他们对世界的认识。”

       尽管法式教育在孩子群中深受欢迎，家长也乐意看到孩子们学习法语和英语，然而，在他们的心里深处，还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懂中文。因此，近年到中文学校学习的小孩越来越多。

       法属圭亚那的中文学校就设在华侨公所（Association Fa Kiao Kon So）里。学校课程以前受台湾影响较大，后来则由中国大陆机构资助，由北京方面的侨务机构和中国驻苏里南大使馆负责为学校提供教材。学校从早前的两个班级，增加到现在的5个班级，学生估计共有250人。学费是每人150欧元；除了春节与圣诞节放假外，学校每个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上午都要上课。

       “我们的师资充裕，都是有经验的中文老师，他们有的在国内还当过校长。”冼慧贤校长说。她希望孩子学好中文之余，也能明白华人传统道德。“小孩除了功课好，了解中华文化传统也是必要的。”

       中文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令华人感到欣慰，但遗憾的是，中文媒体仍是一片空白。

       冼校长曾试过开办华人电台，好不容易向政府电台争取了一个小时中文广播时间，但华人听众甚少，最后只能黯然收场。她也办过中文报纸，但是找不到有热诚或有志投身此行业的工作人员，华人社会对报纸的发行也反应冷淡，所以在维持了一段时间后就关门大吉。

       有华人分析中文媒体失败的原因说：“这地方小，华人居住集中且彼此认识，消息在华人圈里传播得特别快，信息一点都不闭塞，也就很少有人去关注华文媒体了。”另外，这里上网方便，更有华商代理了欧洲版的《星岛日报》、《欧洲时报》等内容更丰富多彩的中文报，当日的报纸当天就能在大街小巷的任何一家超市中买到。

 老华人说，早期的华人少，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当地人在我们店外喝酒，大家认识了，周末就到俱乐部跳舞狂欢，华人的舞艺高超，连当地人也自叹不如。”已经80多岁的何子良陶醉在年轻时代的美好回忆中。

       渐渐地华人越来越多，大家需要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和共同认可的组织，华侨公所也就应运而生了。

       那时候法属圭亚那贫穷落后，华人不过200人。但大家都同心协力，竭尽所能地凑钱修建大楼。年长的华人回忆道：“大家省吃俭用，一些打工仔更是把数个月的工资都拿出来。”为了公所，华人想尽办法筹措资金。当时苏里南的华人发展比这里先进，华人数量也比较多，于是法属圭亚那的华人还专程到帕拉马里博找当地华人帮忙捐款。或许因为苏里南华人几乎都是客家人的缘故，慷慨解囊的也特别多。

* *早期法属圭亚那的华人，大部分都姓何。由于姓何的华人不能与同姓结婚，因此很多人都出嫁到苏里南，或到那里娶亲。*

       经过一番努力，法属圭亚那华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华侨公所大楼，建筑面积达数千平方尺。这座凝聚着无数华人心血的公所，是法属圭亚那华人的共同产业，因此卡宴市的每一家华人店铺都是华侨公所的会员。

       后来，华人越来越多，圣罗兰同乡会、广东同乡会、江浙沪同乡会也相继成立。然而，华侨公所仍是当地华人社会的核心组织。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江浙沪同乡会，不少会员也加入了华侨公所。华社的团结，让法属圭亚那华人的整体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妇女会的诞生，更为公所锦上添花。它虽是公所的附属组织，但女将们协助公所打理会务，可说是细心周到。隶属于公所的中文学校在她们的管理下，学生的中文水平日渐提高。

       华人尽心尽力地为社团付出，努力在这片土地上编织绚丽美梦的同时，也散播中华文化的种子。

郭胜华的爷爷是第一个来到法属圭亚那的浙江人。郭胜华出生在青田县农村，1976年他来到法属圭亚那，是这里的第八个浙江人。

       那时他早晨在父亲的钟表店工作，晚上就骑着自行车踏遍卡宴的大街小巷，考察这个市场还能有些什么发展。他发现，当时由法国人或犹太人经营的百货超市，货源大多从欧美国家进口，所以价格昂贵。在充分调查后，他动起了经营中国百货公司的念头。

       “那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华人多经营伙食店，百货业一片空白。这是一个崭新的尝试。”他说。1977年，他开始进口中国百货，从代销开始，逐渐过渡到批发贸易，生意越做越兴旺。

       1981年，他在法属圭亚那开设了第一家专营中国商品的“友谊百货商场”。他在店里示范使用高压锅烹煮中国菜，吸引无数当地人困观。“我记得营业第一天，店内就人头汹涌，大家都排队来买货。”这时期中国货大受欢迎，商品往往供不应求。

       物美价廉的中国日用商品迅速占领了整个法属圭亚那的百货市场。“以前卖的电饭锅一个要接近100欧元（约五六百法郎），价钱贵得让人吃不消。现在只要15至20欧元就可以买到。”郭胜华骄傲地说。

       3年后，他陆续把家乡的亲朋好友一批批地带出来，还特别聘请法语老师来给他们上课。“唯有克服语言障碍，才能创造出自己的事业。”他从过来人的经验出发，为后到的人设想周全。

       此外，郭胜华也为他们安排工作，或借钱给他们创业成家。几乎每一个浙江人都曾得到他的帮助。“我们过来的时候，身上没带一分钱，他就是我们的老板。没有他，我们也不会来。”说起郭胜华，新移民都满怀尊敬与感恩之情。

       郭胜华是新移民心中的领袖。不管谁遇上什么问题，一定都会找他。就连婚丧嫁娶，也会请他来主持大局，或作见证。在他们每个人心中，郭胜华犹如他们的大家长。

       “相较早期或者其他国家的移民，法属圭亚那的新移民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郭胜华，省下了漫长和艰辛的创业路程。”这里的老华人说：“几乎每个新移民都听他的。”

       郭胜华也扮演了桥梁角色，不管是新移民还是老华人，他都吃得开。身为江浙沪同乡会会长兼华侨公所副主席的他，左手牵着新移民，右手领着广东老华人，一同踏着和谐安乐的步伐，一步一脚印地构建法属圭亚那华人的大家庭。

法属圭亚那华人与邻国苏里南华人来往密切，基于大家都是客家人，所以感觉就像亲戚一样。苏里南的广义堂和法属圭亚那华侨公所每年都会以运动会友，两国华人轮流举办运动会，比赛项目只设篮球、乒乓球和足球。只要赢了两种球赛，就是年度冠军，但还需得连续3年蝉联冠军，才可以把奖杯带回去。

       每一年两国华人都会相聚一起，除了打球，还有说不完的话题以及吃不完的饭局。华人在一起会相互取经，例如广义堂中文学校第一次办夏令营，就曾虚心地请教华侨公所的负责人。每一年，广义堂中文学校也会替法属圭亚那中文学校向中国驻苏里南大使馆申请中文教材。它们的关系就像兄弟一样亲密。

       2008年，轮到法属圭亚那主办运动会，苏里南五六十名华人浩浩荡荡前往赛场。队伍中有老有少，有运动员，也有专程赶来加油打气的家长。两队参赛的几乎都是“泥鸭“——客家人把土生土长的新生代喻为”泥鸭“，即不会游泳的鸭子，意指他们对中华文化已很陌生。

       运动会作为两国华人加强沟通的桥梁，扩大了华人特别是新移民和新生代的交际圈子，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结识不同的人，同时把苏里南与法属圭亚那的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片土地或许并不富裕，甚至有点破落，然而对于许多华人来说，这里却富有人情味。

       迎着卡宴的海风，伴着热带雨林的景色，法属圭亚那华人生活悠闲而安逸。他们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都多少融入了些法国特色。华人笑言，喝红酒、咖啡，已经成为日常习惯。

       法属圭亚那华人辛勤工作，所得到的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初来乍到的华人，或许还有想走的念头，但是，留下来的老华人，早已把这里当成家了。

苏里南旧称荷属圭亚那，是荷兰王国在南美洲的殖民遗迹，1954年成为荷兰海外自治省，1975年独立。

       有“森林之国”美称的苏里南，国土面积的95%为森林所覆盖，空气异常清新。这是个美丽的国度，境内河流纵横，土壤肥沃，只是懂得弯腰捡枝耕耘沃土的人不多。因为历史渊源，这里还有“小联合国”之称，黄、白、黑、棕，各色皮肤应有尽有。漫步在首都帕拉马里博街头，映入眼帘的是欧洲式、印度式、非洲式等各种风格的建筑，宛如置身于国际建筑博览会。

       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因各种机缘巧合留了下来，没有疙瘩，没有仇恨，大家和乐融融地相处。多年来，这些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族群通婚率极高。混血后裔代代相传，使苏里南的多种族色彩更显浓厚。

       苏里南人一般都能说上几种语言，因此这里也被公认为语言天堂。

       近年来，越来越多华人到苏里南。他们说，这片土地得天独厚，易于谋生，连种菜都可以发达，于是，后期抵步的华人绝大部分都留了下来。

早期的苏里南华人大多是来自中国广东省的惠阳、东莞、宝安一带的客家人。那时期，客家话是华人较主要的沟通语言。

       1853年，第一批抵达苏里南的华人共有14人。他们都来自印尼，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在苏里南的农庄、甘蔗园工作，其中3人在合约期间去世。契约期满之后，共有8人返回爪哇，其余3人则自愿留下，被聘为下一批500多名华工的翻译员。

       从1858年到1874年，有2500多名来自印尼、澳门、香港等地的契约劳工抵达苏里南。华人踏海而来，乘风破浪数个月，经好望角横渡大西洋，吃尽各种苦头才抵达苏里南。翻开老华人悲惨的回忆录：“那时船上完全没有任何医药设备，旅途上一旦有人染病死了，就像死猪一样被残忍地丢进海中，葬身鱼腹，华人的性命犹如蟑螂一般低贱。1864年，一艘载了475名华人的船只上，就有197人因死于疾病而被丢进大海。”

       历经九死一生，这些华人的双脚终于踏上了苏里南的土地，但是创巨痛深的经历，让他们感觉双脚犹如踩在甲板上，四面仍是汹涌的浪涛。

       对于在海上飘荡的际遇，老华人始终不堪回首。“那是切肤之痛，现代人是不会明白的。现在搭乘飞机从东南亚一带来这里，只需要27个小时。以前坐船，至少要3个月才能到达苏里南。”年事已高的苏里南老华人这么说。

       苏里南地处热带，登革热（热带传染病）流行，华工生活条件极度恶劣，雇主苛虐华工如同对待奴隶一般。华人好不容易才抵达苏里南，又因为被欺压虐待及水土不服等问题，而丧失了性命。苏里南契约华工的情形甚至引起欧美舆论的谴责。之后，中国政府也颁布禁令，不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境内招募华工，只允许华人以移民的身份自由出入。此后，再也没有听说过华人以契约华工的身份进入苏里南。

       华工对被欺压的经历心有余悸，所以契约期满后全都不愿意续约。因此，大家渐渐地从种植园里走出来，有些华人选择了回国，有些则决定留下来。

       “那时候的生活真的很艰苦，华人都只能够靠廉价的劳力糊口，衣锦还乡这回事，连做梦都不敢想。”老华侨这么说。

       留下的华人有了积蓄，就开始经营起小本生意来。苏里南的老华侨基本上都是靠伙食店起家的，客家人称之为“咸头店”。伙食店售卖咸牛肉、火柴及煤油等用品，赚取蝇头小利。

       一般由夫妻俩所经营的伙食店，就只有两个人打理整间店铺的大小事务，从早忙到晚，生活的担子把他们压得透不过气。

       苏里南华人辛苦耕耘，颇见成效，由华人所经营的店铺，不久之后已遍布城郊的每一个角落。

有了扎实的经济基础之后，华人开始将亲朋戚友们一个个接过来。

       苏里南流传着一句话：“来了一个华人，就多了一家店。”华人认为，只有做生意，才能够有出头天，因此，即使当初只是来打工的华人，两三年内也必定会自立门户，自己开店当老板。

       苏里南这片土地得天独厚，风调雨顺，很少发生天然灾害。随便丢下一颗种子，都能在这片绿油油的沃土上长出丰硕的蔬菜水果。“只要够勤俭，做生意就一定能赚到钱。虽然称不上大富大贵，但也肯定不愁吃穿。”老华侨说，在这里的竞争并不激烈，华人做生意，极少会蒙受亏损。

       大家都说：“这里赚钱容易，治安也很好。”华人的前景，必定是无限美好的。

       就这样，华人的经济发展日益蓬勃。街上的华人店铺逐渐增多，有金店、洋货店、钟表店、摄影店、鞋店等等。旧式的伙食店则被较具规模的百货店、超级市场所取代。

       中餐馆赚钱快速，利润又高，所以华人都乐意经营，因此也越开越多，生意极好。

 苏里南现有4万多名华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然而，他们在经济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近十年是苏里南华人的全盛时期，浙江和福建人风闻这里赚钱容易，也纷至沓来。廉价的百货店、超市和服装精品店开了一家又一家，大街小巷的中文招牌随处可见，华人商店无处不在，约占了全国商店总数的70%以上。

       最热闹的帕拉马里博是大部分华人的聚集地，而少数华人则散居在郊区，如日计里（Nickerie）、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等地。

       客家人来得最早，他们多半生活稳定，事业有成。他们的行业包括：金饰、五金、批发、汽车维修、汽车零件、建筑、餐饮等。

       华人人数多了，华人社会也日趋成熟。在这里，华人社团林立；中文学校建在首都市中心，各种设施比公立学校还要好；中文报、中文电视台都应运而生。

 华人多从商，生意越做越大，成功的因素很多，通过“月会”筹资，就是其中之一。

       当地华人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几个好朋友想要做生意，大家就互筹资金，把一定数额的钱集合在一起，每个月每人轮流领一次，以备急用。”这就是“月会”的起源。它像小型投资，也像分期供房子一样，如果每人每月要交1000元，那十个人就有一万元，十个月内，大家轮流领钱。“不等钱用的，最后会得到比较多的利息。”因此，华人不必向银行贷款，不借高利贷，个个可当老板。

       “月会”最讲求信用。由于曾经有人领到钱后就远走高飞。为杜绝后患，因此华团后来索性当起号召人，通过“月会”制度解决华人财政问题。广义堂是苏里南最有名望的华人团体之一，它每次从“月会”中抽取会首金，作为堂内重要的经济来源。

       “月会”虽是华人民间的一种筹措资金方式，但所有的缴钱手续、审核一点都不马虎。为了预防有人拿钱潜逃，会员至少要有5个值得信赖的担保人。“万一有人拿了钱逃走，至少还有担保人要负责，其他人也不至于亏了血汗钱，这对大家都公平。”

       苏里南华人的“月会”办得非常成功，有些华人甚至一个月供好几份“月会”作为短暂投资。华人拿这笔钱去创业，或解决家庭经济危机，也有人用来扩展生意，或者让小孩到国外留学等。华人不愁资金运转，因此当上老板的特别多，单单在帕拉马里博就有5000多家华人店铺。

由于苏里南生活日用品十分匮乏，许多华人新移民便从中国浙江义乌等地办货。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廉价货品，如小型家电、服装、化妆品等，迅速充斥了苏里南的百货市场。

       这些货柜一到苏里南，华人就在当地报纸或中文报刊上登广告，招聘当地的经销人员。华人说，早前市场走俏时，成本20万人民币的货柜，估计可净赚50万人民币左右。

       华人卖的货品价廉物美，就连当地擅长经营生意的印度人都不是华人的对手。原先由印度人垄断的小超市，渐渐被华人取代。华人超市的数量成倍增加，十家有九家是华人经营。虽然也有一些印度人直接到中国批货，但华人懂门路，所以卖的东西还是最便宜。

    天还未亮，华人就起床开门营业；下午4点半大家关门下班，华人店铺都坚持晚上十点才打烊，即使是公共假日、农历新年，他们店铺也照开不误。华人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让印度人自叹不如。

       华人商家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但他们脸上却都挂着亲切的笑容。“我们属良性竞争，不会随意调低货品价格，也不刻意薄利多销，因为大家心里明白，那是个恶性循环。”浙江同乡会会长郑国庆说。苏里南华人以和为贵，绝不为了一己之利而搞砸整个市场。

       小小的百货店铺，应有尽有，华人什么都卖，包括衣服、鞋子、参考书、纪念品、化妆品、电器、饮料、零食、柴米油盐醋等。店里内堆满了各样货物，而值钱的小玩意就摆在透明的橱柜里。天花板上还有勾子，挂满各种款式的包包、帽子和玩具等，琳琅满目。

 当地人喜欢购物。苏里南人有个习惯，就是从来不存钱。“他们好像和钱有仇，手上一有钱就迫不及待地花掉，特别是在圣诞节与元旦，他们都喜欢到百货店来买礼物。因此年底一到，华人的生意总是特别好。”

       华人赚了钱，大部分都会买地皮盖房子。刚开始，大部分华人都租房子来做生意，一楼经商，二楼住人。一些华人会扩展业务，甚至干脆把百货店扩充成贸易公司，从零售转到批发业。

       在首都郊区的飞龙摩托综合商城（Filong Trading Center N.V.）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里占地6000平方公尺，是苏里南最大的华人店铺。原本只卖摩托车的老板郑国庆，在赚钱后便把店面扩充，卖起脚踏车、婴儿手推车、电器、吊灯雕饰等，零售兼批发。飞龙生意不错，曾经在一年内卖掉6000台摩托车，老板的秘诀就是增加售后服务项目。苏里南有60多家摩托车行，只有飞龙提供售后服务。

老板郑国庆在商城一侧盖了自己的房子，与妻小一同居住。他说：“这里地方大，人口不多，只要一切符合政府规定，华人可自由地在自家土地上盖房子做生意。”

       近年来，苏里南基础建设热火朝天，房子、商场与大楼越建越多。华人看准房地产热，从中国运来大量建筑材料。许多原本开中餐馆、金饰店的华人也纷纷转行经营五金店，有些则经营贸易公司，专门批发建筑材料，或者开设建筑公司，直接承包建筑工程。

       华人盖房子讲求效率，收费便宜。不管日晒雨淋，工作有多辛苦，从不抱怨。因此，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都喜欢找华人承包工程，让华人替他们盖房子和维修大厦。

       苏里南最大的良友商场（Maretraite Mall）就是华人建的。它有两层楼，算是城中数一数二的大型购物商场，而规模较大的中餐馆龙凤酒楼就设在二楼。龙凤酒楼可容纳2000多人，华人一般都会选择在此宴客聚餐。

       首都唯一的汉堡王快餐店（Burger King）也是由华人承建。从建设到开张，不用40天就搞定了。“这里的娱乐活动其实不多，只能寄情于工作，快速地把工作做完，才能有更多的工作，多赚一点钱。“一名华人边喝冰汽水边说。

       苏里南中餐馆林立，每条大街几乎都有吃饭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变迁，中餐馆的菜色也变得多样化。从单一的广东菜、客家菜，慢慢增加了四川菜、北京菜、上海菜等，华人的选择渐渐丰富。

       中餐馆宽敞又干净，各有特色，菜色口味不一，老板的经营手法也大不相同。有的华人会把源自印尼的马来餐编进食谱里，华人炒马来菜，口感特别，当地人也爱吃。早在荷兰殖民时期，一些华人与印尼人从爪哇远渡而来，他们的食物与文化也成为苏里南的特色之一。

       当地茶楼每到星期天的清晨，便人满之患。在茶楼，华人喝茶吃点心，顺便见见朋友，聊聊天、谈谈新闻。话题聊开了，屁股就粘在板凳上起不来。直至上午11点，茶楼一直座无虚席，人声鼎沸。

 很久以前，有人在苏里南山区发现了金矿。华人听说在这里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大大的天然金块，于是千里迢迢赶来，想要分一杯羹。

       事实上，上山淘金是一项非常艰苦而危险的工作。如果不慎被山中巨大的毒蚊叮咬，很容易丧命。一般上，当地人都是固定一两个月在山里工作，然后再把黄金拿到市中心去卖。华人没有挖金经验，一些人遇上危险而丢了性命。后来，华人不再挖金，开始经营起金饰生意，有些则拜师学艺，学习分辨金饰真伪，研炼金饰等。

       苏里南华人的金饰店多集中在首都市中心的马登大街（Maagdenstraat），华人把这条街称作“唐人街“。整条街上几乎都是华人店铺，包括鞋店、服装店、家具店、贸易公司等，但还是以金饰店居多。

       这个国家产黄金，人民对金饰也情有独钟。“当地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习惯把金饰往身上挂，他们一天不穿金戴银，就全身不自在似的。”金饰店老板钟晓舒还有过一大早就被地人电话吵醒，催他开门营业的经历。

       华人说：“苏里南的天然金块非常独特，自然形成各种抽象造型，只需稍微加工就可以做成项坠、耳环等，当地人叫PP金。周边的委内瑞拉人、圭亚那人会定期到苏里南收购，然后作为天然艺术品，卖到美国和欧洲去。”每逢旅游旺季，华人金饰店特别忙。由于苏里南的金饰便宜，所以很多游客或者回家探亲的华人都会买金首饰送人。

       苏里南金饰店不赶时髦，一种款式过了十几年仍然流行。当地人对旧款的手链、戒指情有独钟，那些刻着传统图案的金戒指售卖了40多年，至今还有人问津。如今，华人金饰店追求时尚设计的同时，也保留了传统设计，以迎合不同顾客的需求。

       苏里南一度抢劫猖獗，华人金饰店几乎都有警卫坐镇。打开大门，一整排透明的橱窗陈列着各种款式的金饰。展示柜外隔着栅栏，栅栏与展示柜之间有十公分的空隙，方便客人看首饰，作交易。为了店面美观，一些华人也把监狱式的栅栏改成大片玻璃，用玻璃隔开客人与店家的距离。凡此种种，华人不过希望把意外的发生几率减到最低。

     在苏里南，客家人几乎占了华人总数的一半。俗话说：“客家好客，好客之家”，苏里南华人确实热情好客，又富有人情味。

       苏里南华人都是通过亲戚关系到来的。华人见华人，分外亲热，再听到熟悉的客家话，心里就认定对方是自家人。华人与人相遇，必定会主动问好，即使在路上看见陌生长辈，也会用客家话问安：“好没？”客家人注重礼仪，筵席上看见长辈，也一定主动过去打招呼。

       华人如此亲切又热情，一声招呼，一句问候，一个点头微笑，双手紧握，不管认识与否，一见面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轻易地化解了人与人之间初相识的拘束。在这里，想到华人家串门子，都不需要预约，主人家随时打开大门欢迎，还会用最好的茶水招待客人。

       “我们客家人见人第一句话，就是问别人吃饱了没。没吃饱，就带你去喝茶吃饭，吃饭比见皇帝还要重要。”《洵南日报》社长兼苏里南中文电视台副台长陈舜军笑说。

       中华会馆会长张秋源指出，大家初来乍到，寄人篱下，如果不团结不相爱，就很容易遭欺负。他觉得，苏里南的华人特别团结。“一个华人有事，大家都会挺身帮忙。有时候出国旅行，我也会因为挂念着这里的人情味而提早回来。”

       这里地方小，华人彼此认识，下班或下课后，都会相约到白莲花俱乐部踢足球、打篮球或打兵乓球，流一身汗，顺便舒展筋骨。它是早期华人社团广义堂隶属的机构，也是华人平日的好去处。

       周末或假日，许多华人也爱在白莲花俱乐部打发时间。年轻男女活跃在各个竞技场上，小朋友们则在游泳池里嬉戏，或在娱乐场上荡秋千、玩捉迷藏。妈妈们坐在休息椅上，一边看顾自家孩子，一边与朋友畅叙家常；老人家则与朋友较量棋艺。

       在苏里南赌博是合法的，赌场开了一家又一家。小小的市中心，就有超过十家赌场。赌场提供啤酒等免费饮料，有人说，就算不赌钱，来赌场也可以喝到饱。

       农历新年，赌场送餐券、礼券，吸引更多华人前来捧场。“华人是赌场的财神爷，新年一到，赌场免费招待吃喝，里里外外都是人。”华人大多图个热闹，至今未有人因赌博而家破人亡。

       华人其他的休闲活动，还包括打猎、钓鱼、唱卡拉OK等。

    苏里南有数十个华人社团，其中广义堂、中华会馆以及华侨商会的历史最悠久。

       华人社团凝聚了华人力量，解决华人问题，政府也透过侨团传上情下达。若华人与当地人发生纠纷，或者华人发生了重大事件，政府一般都会找侨领协商解决。

       苏里南华人社团的活动，常吸引整个华社参与。广义堂堂长池玉基说：“新一辈的侨领思想新颖，办起事情来也比较灵活有系统，他们办的活动庆典，往往吸引了大批华人参与，活跃了整个华社气氛。”每年的中秋节活动就是一例，参加人数就超过3000人。

       华人一有事情，就会找社团帮忙，特别是广义堂。广义堂俨如华人大家庭的家长，为华人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由于成立较早，人面广，办起事情也更方便。新移民受伤住院，或出入法院、移民厅、警局，都找广义堂的老华侨帮忙翻译和疏通。

华人说，在苏里南，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一环。“在这个国家生活一定要认识人。比方说，华人生病住院，如果认识当地医生或护士，就能得到妥善照料，否则就像弃婴一样，搁在病房外，好几天没人理。这是苏里南的‘文化’，大家都靠人际关系办事，我们也只能有样学样。”华人无奈地说。

       隶属广义堂的苏里南中文学校，是当地唯一的中文学校。它成立于1986年，拥有自己的校舍，占地超过2000平方公尺。学校里有图书馆、室内篮球场、舞蹈室和教师宿舍，基本设施比公立学校还要完善。

       华人说：“中文学校的教室有冷气，窗口、铁架都完好无缺。但公立学校连电风扇也没有，窗口也是铁丝网构成，太阳晒起来的话，会要人命。”中文学校的主要开支由广义堂负责，其他的华人团体也会赞助。

初创时，这里只有两个班级，50个学生。“20年后，学生已有280人，老师8人。这里提供完整的6年制中文教育，学生每星期上课两次，每次上两堂课。”校长林少波说。

       苏里南华人有个共识，即把小孩送到中文学校。每个周末，家长会自动送孩子上学，除学习中文之外，也让他们参加学校活动。

       广义堂的《洵南日报》是华人自创的第一份报纸，从采访、编辑、排版到印刷，都由华人一手包办，每天印刷1100份。《中华日报》则是由中华会馆出版，对华社的影响也大。

       中文报是华人的精神粮食，特别是对不懂荷兰文的华人来说，它似一个会说话的朋友，将每日的新闻娓娓道来。

《洵南日报》是苏里南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黑白印刷，每日发行1100份。

   2008年2月，苏里南中文电视台正式开播。“要在这个落后的国家创建自己的电视台，预算很高，估计需要400万美元。光是安装一个电视发射塔，就要150万美元的安装费。广义堂投资了70万美元，每个月还要支付员工薪水，其余的数额只能向银行贷款了。”台长张志和说。

       免收费的中文电视台是华人的骄傲，它代表着华人的呼声，也显示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身份和地位。社团若有任何节目或讯息公告，它就是最好的广告栏，只要在苏里南境内都能收看得到。

       “电视台会播放很多港台的连续剧，我们试着和香港的无线电视台联络，希望可以得到他们的播放版权。然而，我们打了无数次电话，传了无数次电邮，对方都不理我们。”华人努力和“外界”联系，却不得要领。

       然而，他们并不因此打退堂鼓，反而积极通过多种管道，尽量满足华人观众的需求。“2008年中国奥运开幕典礼的DVD一推出，我们就迫不及待在电视台上播放，让全苏里南的人都可以收看。”一名电视台工作人员兴奋地说。

 这里很难找到大众传播的人才。“这个国家小，专业人才不易找。翻开华人的履历表，都和大众传播没有关系，而之前的主播也毫无上镜经验。全靠一位来自帕拉马里博的老师，以本身在中国当过主播的经验，给予一些技术指导。”台长张志和淡然地说，电视台也请了两个新人负责摄影，广义堂出资送他们到国营电视台学习操作录制器材。

       电视台的目标虽然很远大，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做起事情来还需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目前，他们与中文报纸合作，自行录制每天傍晚6点和晚间9点的新闻。晚间9点新闻一般会先预录，后再播放，以减低播报错误的几率。

       平时，中文电视台会播放一些英语或荷语卡通片，让小朋友观看。为了迎合不同观众的口味，电视台也会播放粤语与华语的港台连续剧和综艺节目。晚上没人值班，就直接转播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苏里南华人勤奋工作，店铺越开越多、越开越大，在商场上游刃有余。但若只有经济上的成功，而无法在政治上立足，华人的诸多权益也就得不到保障，更不可能融入当地社会。因此，华人也开始参政。

       杨进华是苏里南第四代华人，也是目前唯一的纯华人血统部长。

       杨进华的曾祖父17岁来到苏里南。“为了生活，我爷爷什么行业都试做过。”杨家是客家人，特别注重下一代的教育。“那时候，爷爷赚到了钱，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我父亲就曾在美国纽约念新闻系。”

       17岁那年，杨进华到加拿大多伦多念书。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之后回到苏里南接管父亲的生意，曾从事过汽车销售、报业、旅游、贸易等方面的工作。

       后来，他弃商从政，阔步踏入政坛，为的就是希望苏里南华社更加壮大。“毕竟我在这里长大，已经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这里就是我的家。”

       2002至2004年间，他担任苏里南贸易部长。“在政府部门打工，薪资不高，华人忙于生意，很多人都不愿意参政。我要代表华人发出声音。”他把印尼排华事件当作借镜，认为华人不能只在经济上独当一面，还要懂得参与政治。“华人应该了解当地人的文化、习俗与经济背景，知彼知己，才能百战百胜。”

       他是个很好的“外交官”，精通多国语言，如荷语、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也懂一点巴西土语，就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没他厉害，唯独中文无法掌握。他说：“没办法，我爸爸连方块字都看不懂，全家说英语。”身为一个不会说中文的华人，他深觉惋惜，所以特地到台湾辅仁大学报读两个月的中文课程，但他的中文程度还是不足以用来沟通。

       1980年代，苏里南政局动荡，大批华人往外迁移，让当地经济受到重创。为了挽回华人对苏里南的信心，杨进华曾积极推动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当上部长后，他甚至到访中国与当地官员交流。

       “要振兴苏里南的经济，就必须招揽更多生意人过来投资，而中国人就是最佳选择。”令他欣慰的是，经他一宣传，短短几年间，苏里南就来了几千名华人。

       2005年，杨进华转任环境规划与土地森林政策部长。他在政治上站稳阵脚，华人也受益良多。“苏里南是个多元种族国家，主要由印度人、黑人和印尼人执政，在福利争取上，他们都会帮自己人。华人若不帮华人，就不会受到尊重，也就没人理你了。”对于华人的事，他往往多留一分心。

       杨进华与华人社团关系良好。很多华人虽然对政治不热衷，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华人只占总人口的10%，但一经凝聚就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杨进华扮演桥梁的角色，一方面把华人的声音反映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意见转达予华人社团，协调着彼此的关系。

       因此，华人参政，不管对苏里南，还是对华人群体来说，是双赢的。

华人笑看人生，在乎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他们之间的和谐相处。虽然苏里南华人只有区区四万人，但他们却异常活跃，生活充实忙碌，每天仿佛有忙不完的事情，包括工作、家庭、社团等。他们倾力传承文化、推广教育，事业有成的新生代，都尽力回馈社会。

       苏里南华人努力耕耘，享受人生，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华人要的不多，天堂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巴西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这片土地原是印第安人的家园，直到16世纪被葡萄牙航海家发现，才掀开了它被殖民统治的序幕。葡萄牙国王后来开放门户，允许外国人移民，为巴西日后成为世界移民大国奠下了基础。如今，这个南美洲人口最多、最富有的国家，集合了200多个民族，流通100多种语言，但彼此之间相处融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经济年均增长10.1%，创造了“巴西奇迹”，全国欣欣向荣。此后20年间，因受区域和内部因素影响，经济波动不断，近年才逐步恢复元气。如今，巴西咖啡、足球和桑巴舞闻名于世，不过，严重的贫富悬殊现也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治安状况令人担忧。

       自200年前第一批带着茶苗来试种茶树的华工开始，巴西华人就一直与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华人移民故事大抵滥觞于1810年。

       当时，统治巴西的葡萄牙帝国试图拓展种植茶业，于是派人到中国的广东及澳门一带招募了400名华工前来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简称里约）。茶叶试种的计划虽然成功，但是很多华工却因过度操劳，及无法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而客死异乡。

       后来，又来了两批为数600人的契约华工，负责到农场种植茶叶、甘蔗和咖啡。他们每日工作9小时，月薪仅得4至5美元，每周可领取十磅米或面粉，3磅半牛肉、咸鱼或猪肉，一磅糖以及3盎司茶，此外，每年还有棉布上衣两件、长裤两条、毛毯一条；同时，雇主也必须负责他们的医药费。总体而言，巴西华工的待遇比其他国家的契约华工稍好。

       20世纪初，巴西的种植园发展日益蓬勃，劳工短缺的问题却依然严重，于是便计划从中国引入100万名华工。当时，中国政府并不鼓励人民移居海外，因而拒绝了这项建议。后来，巴西得到日本政府的积极配合，输入了20万日本劳工，当年的日本劳工，今天已发展为100多万人的巴西日裔群体。

       一战结束后，一部分欧洲华人离开了荷兰、法国等地，辗转抵达巴西，导致当地华人的人数增加到1000人。他们大多数经营酒吧、洗衣店、餐馆、有的则当裁缝、或贩卖手提包和小礼品等。当时，洗衣业也几乎由华人垄断，在东北部的许多城市，人们甚至称洗衣店为“中国”。

* *在里约热内卢蒂如卡国家公园内有一座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凉亭，据说是葡王若奥六世（D. João VI）时期所建，以表彰华人茶农的贡献。*

       华人大批地移居巴西是二战以后的事。自1950年代开始，广东人便陆续抵达巴西。接着，香港的浙江籍企业家和退伍军人，以及台湾的企业家也相继入境。他们的到来，正赶上了巴西1960及70年代的经济巅峰期。港台企业家带来雄厚的资金及先进的管理技术，给巴西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针。

       70年代末，印度支那发生了排华事件，迫使“船民”投奔怒海，部分印支难民为巴西政府收容，他们大多加入行商行列，靠售卖角仔或提包为生，过着清苦的生活。而手上有点资金的港台新移民则经营加油站、停车场和洗车中心，财力雄厚的则往农产品出入口、农牧、食品加工、纺织或化工等领域发展。例如：华人企业家林训明旗下的公司就一度高踞巴西黄豆出口之首，使他赢得了“黄豆大王”的称号。

       从1980年代，大批中国大陆与其他地区移民不断涌进，使华人人口不断膨胀。到了1998年，巴西已有10万名华人；近年来已有超过20万人在这里生活。

   走过近200年漫长的移民岁月，华人如今在巴西形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

       现在的巴西华人约有25万人，主要来自广东、台湾、福建、浙江等地。80%居住在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Sn Palo），其他则散居在里约热内卢、首都巴西利亚以及福斯市（Foz）等地。

       华人之中，有的是白手起家的商业巨子，有的是德高望重的专业人士，也有贩卖走私冒牌货的市井小民。他们吃中餐、看中文报、看中文频道、到佛堂上香。新生代则在专业领域工作，完全融入巴西社会。尽管如此，传统佳节气氛比其他南美国家浓厚的巴西华社，中文教育却不够普及。一个家庭里通用葡语、华语和方言是常见的事。

       人们称巴西是天堂和地狱的结合体。这里没有种族歧视，唯一让大家人心惶惶的是治安问题。这里可以赚大钱，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这个华人视为冒险天堂的国度，让人欲走还留。斟酌间，华人已成为巴西多元社会的一分子。

圣保罗是个名副其实的花花世界。街道纵横交错，形形色色的人群擦肩而过。华人在这里经营百货店、进出口贸易公司、超级市场、中餐馆，也有人在制造业、建筑业、工矿业等领域寻找机会。他们累积着经验和资金，蓄势待发。当地华人季友益的“季家电话”（Teleji）和尹霄敏的“尹氏箱包”（Yin's），已是巴西家喻户晓的品牌。

       华人小贩、企业家、专业人士，在巴西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力量。

       巴西是发展中国家，但当地轻工业产品无法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很多民生用品都得依靠进口，其中又以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独占鳌头。角仔店、提包业和跑单帮已经被时代淘汰，小资本的百货业却迅速崛起。

       这些以批发零售杂货为主的华人小店和地摊，集中在圣保罗25街、巴拉伊斯区（Prais）和里约热内卢沙拉区。多年来，不少新移民以25街为起点，开始在巴西创业。岁月悠悠，这条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老街，见证了成功的华人发迹，也目睹了落魄的华人三餐不继。

       春去秋来，这些生活故事还在不断延续着。

       25街一带的廉价公寓住着很多华人，每天清晨6点，天刚刚破晓，他们已推着载满货物的小车子来摆地摊。他们多数是浙江青田、温州及福建的新移民。他们曾经听人天花乱坠地叙述这里遍地黄金，于是交上至少3000美金，向蛇头换取一个发财的机会。

       他们或是夫妻俩，或是单枪匹马，向早来的同乡批一些小百货，比如墨镜、文具、发夹、帽子、手提袋、围巾、手帕，什么都好，反正什么都卖得出去。商贩在晨曦中摆摊，转眼就把冷清的街道挤得密密麻麻。后来的人没有位子，必须向“前辈”租摊位。据说，现在一个小摊位已经炒到每年一万雷亚尔以上，令人咋舌。

       当城市慢慢苏醒，路上行人来往匆匆，和着小贩的吆喝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使25街进发出勃勃生机。华人商贩在充满朝气的喧哗中，利落地摆货、收钱。他们只有区区两个小时，因为得赶在警察上班以前收档。要不然随便一个理由——贩卖走私货、无执照营业、没有居留身份，都会让他们惹上很大的麻烦。

       收档后，他们不是去批货，就是提着黑胶袋，搭上公车到郊外沿街叫卖。存到钱，就和别人合伙在25街的百货商场里租店做生意。商店抵押金就一万，每月还要交几千租金。开销这么大，华人商贩根本不敢休假，每天8点准时开店，傍晚6点打烊。不过，也有人选择继续摆地摊。摆地摊不用执照，不用交税，可以省下好多钱。

       新移民见缝插针地摆地摊、开店铺，25街逐渐饱和后，大家又往附近的巴拉伊斯区涌去。现在，25街和巴拉伊斯的华人店铺、摊位加起来有3000间，占了这两个地区商店总数的四分之一。

       巴西人喜欢穿戴名牌，但很多人买不起名牌货。25街华人从中国进口的膺品销路特别好，但也引来警察和关税局人员，三天两头就来取缔。一有风吹草动，地摊小贩马上落荒而逃；店主也拉下铁闸挡灾。迟一步的人一见到警察就先给钱疏通，谈不拢货物统统充公，或连人带货一起抓。再把货要回来，最少三千，多者几万，数目不小。

       每天诚惶诚恐，华人埋怨“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却没有要马上离开的意思。赚不到钱自然不能回去，赚到钱更加不可能一走了之。每天在这座城市隙缝中挣扎求存，既不能休息，也不容放弃。他们欠了债，没有身份，教育程度又不高，继续打拼是唯一的出路。

       看着早来的同乡不但赚到房子车子，还赚到让孩子出国留学的费用，他们只好咬紧牙关，继续撑下去。

  巴西宜人的气候和景色，令许多华人流连忘返。圣保罗处于丘陵地带，地势较高，平常天气凉爽，一热就下雨；里约则是背山面海的城市，有着全世界最美丽的海滩。虽然这两座大城市日常消费高，但庆幸巴西物产丰富，蔬菜水果和牛肉特别便宜。蔬果市场每到中午12点就大平卖，一堆新鲜青菜只要一元。据说，早期穷困华人都是吃这些菜挨过来的。

       当地人总觉得上帝一定是巴西人，其实不无道理，他们说：“从古至今，巴西只有人战死、病死，从没听说过有人饿死。”

       丰衣足食的社会，养出了乐天知命的子民。巴西人赚多少花多少，凡是随性而为，不会未雨绸缪。华人雇主总要好一段时间才能明白，当地员工不愿加班，原来只为了去海滩晒太阳或游泳。

       相对地，25街华人新移民的生活显得单调。工作十几个小时后回到租来的小房间，胡乱煮些东西吃，七八点就累极睡着了。很多人一天只睡四五小时，不过年也不过节。对自己最大的奖励，就是到中餐馆点一桌吃不完的菜，仿佛这样可以弥补一切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

       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去认识巴西。

       反观1970、80年代的华人移民，他们多数事业有成，消遣活动丰富，包括参加华团开办的合唱团、拉丁舞培训班、开车去体验各个小镇风情、到私人农场休闲等等。圣保罗还有华人的高尔夫球协会、网球协会、保龄球协会以及篮球协会。第二代华人经常和巴西或日本人后代混在一起，多少沾到当地人喜欢享乐的个性，工作和学习之余，最爱泡酒吧和舞厅。

       巴西人性格开放，女人穿着暴露，好象永远嫌布料太多似的，华人常说：“在巴西卖布肯定亏钱。”这当然只是玩笑。巴西人异常热情却是事实。

       老华侨说：“如果向当地人问路，对方不理你，他肯定是个哑巴。”这个乐于助人的族群，帮助很多华人适应新环境。住下来，华人又发现他们容易相处，脾气温和，不记仇。今天和人闹意见，明天见面又可以勾肩搭背。你还在为昨天的事耿耿于怀，他们早忘了这回事。有人移居巴西20多年，竟没看过当地人吵架。当地人很有礼貌，华人入乡随俗，也爱把“请”和“谢谢”挂在嘴边。

       巴西景色优美，资源丰富，人民热情，本来是个近乎完美的定居地。奈何随着贫富悬殊日益增大，当地治安每况愈下，谋杀案发生率高居世界第四，又以圣保罗和里约最恶名远扬。一位里约华人说：“我认识的朋友都被打劫过。”还有华人调侃：“里约好山好水，好危险。”

       在巴西，买枪就像到市场买根葱那么方便，许多劫匪都是持枪抢劫。当地华人不管贫富，都尽量低调行事。他们住在保安森严的公寓，穿最不起眼的衣服出门，经常更换上下班路线。此外，买车得买路上出现最频密的那款，豪华房车则安装防弹玻璃。万一遇上劫匪，要保持镇定，只要不反抗，最多伤财，不会丢命。虽然当地夜生活精彩，很多华人却宁愿躲在家看电视节目、玩扑克牌、打麻将。

 套一句巴西华人的话：“巴西不打仗，只打球，如果没有治安问题，就是人间天堂”。小部分人因治安不靖而萌生去意，开始往中国投资，送孩子回去念书，为日后回归故里铺路。

       巴西人吃中餐、学汉语，但在他们心目中，真正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是武术。巴西人因李小龙电影，开始向往神秘的功夫世界。当中国武术专家移居巴西收徒授艺后，学武之风马上席卷巴西。

       今天，巴西人已了解到武术是一门结合健康、自卫和管理的艺术。中国武术成了巴西的全民运动。鹰爪功夫总会的李荣基师傅透露：“1970年代初巴西只有4名中国武术师傅。今天加上巴西人，武术师傅可能有几十万人。”拥有80多间武馆的李师傅，徒弟已传到第四代，学生数以万计，当中不乏警员、军人和专业人士，深受当地人敬重。

       除了中华武术之外，中医也风靡巴西。

       基于利益冲突关系，中医师的地位和权利一直受当地西医质疑。不管怎样，在巴西风行了30年的中医因就诊简便、收费廉宜，一直深获大众喜爱。目前华人中医师有4000人，巴西中医师则超过两万名，还创立了中医学会。

   在刘之明中医师眼中，巴西是发展中医医学的好地方：“全世界80%的中草药可以在这里找到。”除了看诊，他还开办针灸班、气功班、中草药班、推拿班以及风水班。风水是近来巴西人的热门话题，当地华人苏成皿还以葡文撰写了《吉祥风水》。

       圣保罗大学自1968年开设东方文学中国语文组后，报名就读的都是巴西人。倒是华裔子弟不太热衷学习华语，估计只有30%华裔子弟到中文学校上课，真正看得懂中文、会说华语的不多。

       巴西人正走进中华文化的门槛，探索其中奥妙。

       华人的中文教育始于战后。1970年代，全国中文学校和中文班加起来有100所。纵然众志成城，仍敌不过许多现实问题，至今剩下40多所，主要由宗教团体或华团开办。少数为附属在巴西语言学校的中文班或个人开办的补习班。圣保罗中华会馆中文学校和圣保罗华侨天主堂中文学校的规模最大；而由著名企业家张圣凯赞助的仁德国际学校，则是巴西唯一的葡中双语学校。

 华人孩子自巴西私立学校毕业后，不是到欧美国家深造，就是进入当地名牌大学，如最著名的圣保罗大学升学。

       第二、三代华人俨然已是巴西人。对他们而言，葡萄牙语才是母语。

       因此，当地中文报读者一直是第一代华人和新移民。除了拥有20多年历史的《巴西侨报》和《美洲华报》，如今只要动动鼠标，也可以在《巴西侨网》浏览新闻。

       免费派发的刊物，也是华人的精神粮食，包括《台湾侨报》、中华会馆的《华光报》、圣保罗华天主堂的《心声》、中观寺出版的杂志、里约华人联谊会的《华联报》以及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的《华人报》。南美华人作家协会亦不定期出版《南美文艺》，让文友抒发情感和意见。

       华文文学谈不上普及，却有一群人正努力用方块字记录自己的移民故事，并结集成书。也有人在美术学会、摄影学会、书法学会、唐韵艺术团等找到兴趣归属，水墨画家周毛如珠、圣保罗歌剧院首席女高音陈黄淑英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巴西没有唐人街，圣保罗的东方区（Avenida Liberdade，也称作自由区）是华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聚集地。国际青商会巴西协会华侨分会就是在这里举办“新年快乐活动”，欢庆春节。这项活动每年吸引16万巴西观众，不只电视台来报道，市政府也推举它为模范的社区活动。

       中餐馆和中国食品店林立的东方区，也伫立着圣保罗中华会馆、巴西广东同乡会会所、客属宗亲会馆、圣保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巴西华侨教会、弥陀寺、中观寺和观音亭。它们是巴西华人群策群力，团结合作的见证。

       1929年成立的中华会馆是巴西历史最悠久的华团，而1956年创立的华侨天主堂则是最早的华人宗教组织，对华社影响深远。1970、80年代，华人如潮水般涌入圣保罗，这两个团体接济过很多无依无靠的新移民。在圣保罗山度士（Santos）港口，萧金铭和何彦昭神父帮忙填表格、通海关。中华会馆也帮忙找工作、租房子。至今，教会仍跨越宗教，服务当地华人，和医院合作建立惠及群众的医疗保险制度，设立和平公墓，安葬老华人。目前，它正筹建博爱园安老院。

       此外，还有巴西华人协会属下的广东、青田、温州、闽南、北京、上海、东北、江苏、江南、大西南等同乡会，总是及时对受到“老飞”（华人对当地警察的俗称）敲诈或遭到警方扣留的新移民伸出援手。

圣保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拥有40多年历史，设有华语、葡语和闽南语的主日崇拜。

 新旧社团在岁月推移中传承、交接，巴西累积创办的华团超过200个。有联谊同船移民的台湾乘船移民南美联谊会；有引导华人争取政治地位的巴西华人选民联谊总会；有集合退休军人的巴西荣光联谊会和旅巴中国空军联谊会，还有最新成立的杀鸡业公会。

       巴西华人大多数信奉佛道或道教，在家供奉关公或观音。佛教组织、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也有20多个。

       除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聚餐等例常活动，华人组织也不时给当地人捐助，发放金钱、食物、日用品，以及义诊。如来寺发起“如来之子”计划，给贫困儿童布施米粮和用品，教导他们手艺，使他们不致于在街上游荡。巴西华侨慈善基金会多次筹办募捐活动，并亲自前往灾区救助。不管灾难发生在中国大陆、台湾、南亚，甚至是偏远的巴西亚马逊河流域，都阻挡不了华人奉献爱心。

       可想而知，各种社区活动占据华人不少时间。不过，每到星期四，圣保罗华人就会减少出门。原来，为了缓解堵车问题，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以及傍晚5点到8点，都有指定车牌不能上路。星期四轮到车牌最后一个号码是7和8的车子。华人车牌最后一个号码多数是8，星期四就是他们车子的“禁行日”。

     华人社团把第一代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那里有来自同一个家乡的人，有熟悉的华语和方言，有相同背景和文化的朋友。然而，他们不排斥巴西文化，并且愿意入乡随俗。

       他们尝过巴西道地的烩豆饭（Feijoada）、烤肉、橙汁、咖啡和Guarana水果汽水；收到礼物时，当着对方的面把礼物拆开，表示感谢。复活节买巧克力做的彩蛋给孩子；亡人节带鲜花拜访亲人墓地；丰收节（Festa Junina）如来寺会举办玉米庆祝活动，和巴西人一起欢庆农作物丰收。

       即使孩子要和当地人结婚，家长也欣然接受。婚礼中西合璧，早上到教堂完婚，晚上在中餐馆请客。也有人以巴西方式——沙拉、面和烤肉3道菜宴客。主人家通常不收礼金，来宾改为签字或写婚联祝福新人。

       在巴西，一个华人家庭里有韩国、巴西或日本成员，甚至混血后裔都是平常事。

       巴西是个移民大国，种族复杂，混血儿比比皆是。当地人种族观念不强，而且当地反种族歧视法律严厉，让华人觉得更为踏实。当初想把巴西当跳板的华人都说：“现在给我钱，送我到美国，我都不去了。”

       在巴西，外来移民和国民待遇差别不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择业。这么多年，巴西仍是华人心目中的“金矿”。有人通过亲属申请过来，有人和巴西人或是持有身份证的华人假结婚入境，有人则逾期逗留。

如来寺是佛光山在巴西的据点。占地15公顷的如来寺是南美最大的佛教圣地，也是当地著名的观光景点。

 巴西政府几次大赦，允许非法移民申请居留，最后一次是在1998年。大赦时，非法入境或在巴西留下不良记录的移民，都在中文报刊登护照遗失启事，然后到当地中国大使馆拿一本“清白”的新护照，申请居留证就能马到功成。

* *中国画家张大千自1954年起旅居巴西十多年。他在圣保罗郊区兴建有名的八德园，并在这里完成许多画作。张大千仙逝后，政府在该地段修建水坝，八德园从此淹没在水下。*

       有了居留证，只要住上5年，能说葡语，拥有正当职业，且没有犯罪记录，便可申请入籍。居住15年以上的，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即可。子女在巴西出生的，父母自动成为永久居民。巴西地大物博，容纳移民完全不成问题。老华侨大多成了巴西国民，而新移民仍抱着“赚够钱就回去”的想法。可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些人不但没离开，而且还把家人都接了过去。

       经济基础稳定后，华人开始进入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代表人物有创办巴西第一家加护病房的心脏病专家王昭平、华人法官马劲球等。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社会救济而获颁殊荣的华人也不胜枚举。近几年，不少华人后裔开始在政府、议会、军队及政党中担任要职。2006年，纯华人血统的巫威廉在圣保罗州当选为首位华裔联邦众议员，巴拉那州则由徐敏淦代表华人出任州议员。

       在巴西，真正代表东方文化的是日本人，但华人地位正日益提升。以往华人走在街上，巴西人都这么打招呼：“日本的朋友，你好！”现在巴西人会先问：“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让华人深感欣慰。

角仔店、提包业和跑单帮是很多巴西华人安家立业的起点。

       “角仔”是用面粉裹着肉碎、竹笋和乳酪油炸的点心，巴西人很爱吃。20世纪60、70年代，圣保罗的电影院、车站、每个区域的中心点都有广东人架起来的角仔架，全市约有几百家。角仔现做现卖，一个25分，等于搭一趟电车的车资。穷人点三四个角仔和一杯鲜榨甘蔗汁，就能填饱肚子。“角仔佬”工作辛苦，还必须应付流氓和偷鸡摸狗的顾客，身心俱疲。1980年代初期，巴西大财团开办的角仔连锁店以及国际知名快餐店强攻饮食市场，华人角仔店招架不住，只好收摊转行。如今在里约华人聚集的沙拉（Sara）商业区，还有几间硕果仅存的华人角仔店。

       提包业比角仔业开始得更早。第一批提包人，很可能是20世纪初从欧洲来的华人。当时他们把带来的珠链串满双手，一手提一个包穿街走巷叫卖。后来，提包业进入售卖桌布和黄金珠宝的风光时期。不少青田人，就是这样日晒雨淋存到第一笔钱。1990年代，女性成了提包业主力，她们推一辆小车，沿街挨户兜售家用电器、香水、化妆品、手表之类的小礼品。小孩为了帮补家用，也加入提包行列。

      提包业盛行，需要大量小商品，跑单帮应运而生。以里约华人为主的单帮客每次搭上“野鸡车”（专载单帮客的巴士）到巴拉圭东方市（Ciudad del Este），背回上万美元的走私货，批发给提包人、商店、公司和街边的摊贩。1990年代初期，跑单帮风行一时，引来不少新移民。跑一次有1000美元，代价却很大。野鸡车司机超速，路况又糟，有人因此魂断公路；有人长时间背重物，患上肩膀、脊椎酸痛的毛病。运气不好的话，货物被充公了还得交罚款。后来巴西开放进口，并严厉管制巴拉圭进口货，单帮客逐渐沉寂。

       1990年代末，提包人因常遭土匪和警察敲诈，萌起转行念头。不过，这时候已有许多华人买大车、住大屋，或累积了足够资本往其他领域投资。提包业、角仔店和跑单帮渐渐走入历史，但其中交织的辛酸血泪，却是巴西华人奋斗史上永不磨灭的烙印。

 巴西华人一步一脚印，经历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当地社会取得不俗的成就。

       纵然过程有辛酸有泪水，但巴西美丽的湖光山色、多姿多彩的生活以及巴西人热情的微笑，足以抚慰他们的挫折和失意。

       对喜欢冒险的巴西华人而言，这个梦想之都永远有许多预想不到的惊喜。

  碧波荡漾的加勒比海，点缀着千万个大小岛屿，串成多个小国寡民的岛国。这里的国家大部分都有同一特点，就是主要以农立国，旅游业发达，但工业却尚处于萌芽阶段。此处的华人移民姗姗来迟，人口稀少，多靠经营小本生意为生。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少数港台移民向加勒比海地区进军，投资设厂。而自70年代以后，也有部分中国大陆新移民迁徙到加勒比海地区，使华社的结构起了变化。华人的籍贯更多元，经济范围扩大，社团组织也多了起来。

  介于大西洋南端美国佛罗尼达州（Florida），中美洲东岸及南美洲北岸，是辽阔的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它是因当地原居民加勒比印第安人而得名。在这片辽阔的海域上，有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岛屿，有些是珊瑚岛礁，状呈一大弧形，宛如璀璨的串珠，光彩夺目。这里风光明媚，处处鸟语花香，充满热带情调。

       众多岛屿主要由3组群岛组成，即巴哈马群岛（Bahamas）、大安的列斯群岛（Greater Antilles），包括古巴、海地（Haiti）等及小安的列斯群岛（Lesser Antilles），包括多米尼克（Dominica）、巴巴多斯（Barbados）、格林纳达（Grenada）等，这些群岛也被统称为西印度群岛。

   远在15世纪末西方列强势力入侵之前，当墨西哥南部中美洲一带的玛雅文化绽放着绚丽的色彩时，加勒比海地区的印第安文明还在萌芽。这里的印地安部族基本上还是处于渔猎或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文明阶段。

       1492年，在西班牙女王的赞助下，哥伦布率领舰队航抵古巴与海地，建立了最早的殖民地据点。到了16世纪中叶，西班牙已经将古巴、海地、波多黎各及牙买加纳为殖民地。

       自16世纪之后，英、法、荷也到新大陆来开拓殖民地，和西班牙展开殖民地争夺战。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间，西班牙国势衰落，英国得以从西班牙手中掠夺其胜利品，同时与法、荷展开的殖民地争夺战中取得上风，而获得加勒比海地区许多国家的宗主权。

       法国在殖民地争夺战中败下阵来，只落得留守住几片残羹，它们是：法属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今海地），马提尼克（Martinique），瓜德罗普（Guadeloupe）等。除了海地于1804年摆脱法国取得独立外，其他仍是法国的“海外省”。

       荷兰实力不如英法，只能在加勒比海地区保住几个小岛，它们是库拉索（Curacao）与阿鲁巴（Aruba）等小岛。

       西方列强近400年来的殖民统治，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生活水深火热，自由受压制，激起人民的怒火，从18世纪末年就爆发了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与牺牲，最终摆脱了列强的桎梏，取得了独立建国的辉煌成就。如海地（1804）、多米尼加（1844）及古巴（1902）都先后成为共和政体的独立国。一般而言，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地政府，历来都是采取高压手段与政策，独立过程比较艰辛与曲折，殖民地人民需经流血与牺牲，付出极大的代价。至于英属殖民地的独立，则多是通过宪制谈判的过程，以避免流血冲突，不过大都是迟至第二次大战后才完成独立，如巴马哈（Bahamas，1973）、巴巴多斯（1966）及特立尼达与多巴哥（1976）。

在西方殖民地政府的统治下，加勒比海地区的发展缓慢。虽然殖民者带来了新的文化冲击、改善了物质文明，但只有少数人受惠，广大的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中。加勒比海地区除了少量的石油外，矿产资源贫乏，但大部分土地肥沃，适合耕种。殖民地政府鉴于甘蔗、香蕉、椰子、棉花、咖啡、可可与烟草等农作物是世界市场最为畅销的产品，除了能够带来庞大的盈利，又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因此大力发展种植业。为了鼓励外国资本家到来开垦种植，除了给予投资者种种优惠，还协助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成效卓著，以致几百年来，农产品成为各国的主要经济支柱。

       加勒比海地区风光旖旎，引人入胜。近二三十年来，各国政府都大力发展旅游观光事业，兴建豪华旅馆与赌场，改善机场与市内交通，以吸引各国游客的到来，为国家带来庞大的外汇，成为国家重要财政来源之一。

       鉴于这地区的资金不足，人才短缺，政局不稳定，因此能够吸引的外来投资不多。除了巴哈马等少数国家有石油提炼厂外，其他国家也只能发展轻工业，大多集中在纺织业、制衣业、造纸业、电器业、皮革业、塑胶业及食品加工业等领域。

   古巴是华人最早登岸的加勒比海国家。1847年6月3日，一艘英国商船从厦门载来212名华工，在哈瓦那登岸。1859年，法国殖民政府从广州运载华工到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去，这批华工多被派往大农园种植甘蔗。1882年，法国殖民政府从上海又招到2102名华工，这批华工则被运往瓜德罗普。

       在19世纪80年代，即有华人在库拉索开垦耕地。1915年，也有华工和技匠在那里的炼油厂工作。早在1920年，库拉索首都威廉斯塔德（Willemstad）市内就已经出现了小唐人街，并有中国人所开设的餐馆和小商店。

       19世纪末，阿鲁巴发现黄金，吸引了大批华工前来淘金。1924年，阿鲁巴建立炼油厂，厂内也聘用了华工。此外，岛上也有从事种植蔬菜与水果的华人。

       早期的华工都是契约工人。契约华工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自从过去盛行的非洲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宣告废除后，美洲新大陆就出现严重缺乏劳动力的困境，西方殖民主义者与资本家于是便从东方寻找新的目标。而中国人吃苦耐劳的天性，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廉价劳动力”，因此，人口贩子便以厦门、汕头、广州、澳门及香港等地为中心，利用拐骗与掳掠的卑污手段，将华工运载到美洲各地去，或被分配到大农园种植甘蔗，或派去修筑铁路与运河，或进行挖掘矿产或鸟粪等劳力工作。

       契约华工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与雇主所订的契约，如同卖身，限期5年或8年不等。这期间华工必须从事无补偿的劳动，工作时间长，生活与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又受督工殴打虐杀，死亡率极高。

       1874年以后，契约工人制度便走向衰落，开始有大部分华工的身份变为自由民。

      自由民可以自由迁移，流动性较大；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新移民从中国大陆或美国旧金山迁徙过来，因此扩大了华人分布的区域，过去没有华人的地方，也开始有了华人的足迹。华人的增加，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甘蔗的种植与蔗糖的生产。

       进入20世纪初期，加勒比海地区掀起了一股移民浪潮，流入英荷属地。他们多是自由移民，以手工艺者及小商人居多。1900年至1940年间，超过7000名华人到此地区登陆。移民中有些是从美、加及拉丁美洲来的再移民。华人人数日益增加，许多华人从乡村流入城市，职业也随之改变。他们有了少许的积蓄，便弃农从商，从事餐馆、杂货店、洗衣店等小本生意，经过多年的经营，生意由小而大，有的办工厂或农场，有的经营出入口生意，从而提升了社会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国陷于内战，国民党溃败后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与此同时，世界出现了东西两大集团对抗的局面。这些状况的形成，大大遏制了全球华人移民的浪潮。加勒比海国家不与中国来往，中国政府也严格限制人民出境，因此，自1950年后的20年间，除了少数台湾与香港的商人入境外，鲜有中国大陆移民。

       这种情况一直到了70年代以后才改变，随着古巴首先在1960年与中国建交，牙买加、巴巴多斯、安提瓜与巴布达（Antigua and Barbuda）等国也相继与中国来往。另一方面，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掀起了一波移民浪潮，中国人纷纷涌入美国、加拿大、西欧、澳洲与日本等国家，其中也有少部分流入加勒比海地区，加上1980年以后，从香港和台湾前来的投资移民也激增，这一来，便扩大了这地区的华人人口。

       加勒比海地区的华族群体结构，大致上可分为以下3个群体：一、老华人，为早期移民，多数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四邑（台山、新会、开平与恩平），也有少数的潮州人、福建人及客家人。他们注重传统，沿袭中国习俗，使用中国方言，感情上还是眷念故国；二、年轻的华裔，是属于第二、三或四代具有华人血统的后裔，他们土生土长，接受当地的教育，结交的朋友也大多是本地人或西方人士，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不会说华语或中国方言，更加不懂得书写中文；三、新移民，大都是战后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的移民，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科学技术，及较多的财富，其中尤以港台人士为甚。他们多是投资移民或技术移民，或投资设厂，或受雇为专才。他们视野广阔，但感情与思维仍然倾向中国，依然遵循中国人的生活习俗。

       这些不同的华人群体，地域观念较浓郁，来自同一地域的人，凝聚力较强，至于不同地域的华人，大都不相往来，鲜少交流。

       华人社区阶级分明，上层的包括企业家、医生、律师以及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中层阶级包括公务员、小商人与小农场主；下层的成员是劳动工人，终日劳作，仅足糊口。然而，这种阶级分化是处于流动状态的，有些下层阶级的成员因为奋发图强，因而摇身一变，顿成富翁，跻身上层阶级之林；也有少数原是上层阶级的富豪，生意失败，宣告破产，变成一穷二白的穷光蛋。

       有些地区有社团组织，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缘与血缘性的组织，如会馆及姓氏公会，各地都有。第二种是代表地区的泛华人组织，如巴哈马的华侨联谊会，阿鲁巴的中华公会；第三类则包括一些俱乐部与教会组织。至于华文学校的设立，鉴于财力与师资所限，数量不多，如巴哈马只有一所华校。

       另一个对华人移民人数增减有所影响的因素是外交关系。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如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圣茨基和尼维斯（Saint Kitts and Nevis）、圣卢西亚（Saint Lucia）及圣文森特及格林纳丁斯（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等，台湾政府在这些国家设有大使馆，双方也不时派代表互访。台湾除了派遣农业技术、养猪及竹工专家去协助外，更协助公共工程的建设。而新中国自建国以来，与之有外交关系的则有古巴、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和格林纳达等。中国政府通过大使馆或商务代办机构，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扩大贸易，也承诺给予对方优惠贷款，并派专家协助改善生产技术，修建桥梁、公路等建筑工程。大使馆人员每逢春节或其他良辰佳节，举办联欢招待会，广邀当地华人华侨代表、中资企业代表、港台同胞及学生参与其盛，场面热闹非凡。

 加勒比海诸岛国，小国寡民，开发较晚，经济落后，以农业为主，工业仍是处于萌芽阶段，资本欠足，规模不大，因此对外来移民欠缺吸引力。到这里投资的华人移民稀少，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也多是餐馆饮食业、杂货店与出入口贸易等。近年来，随着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企业家前来投资，制造业日益兴盛，其中尤以成衣业最为发达。兹分国论述如下：荷属安的列斯群岛（Netherlands Antilles）为荷兰海外属地，包括库拉索岛、波力耳（Bonaire）、圣尤斯特歇斯岛（St Eustatius）、荷属圣马丁岛及沙巴岛（Saba），1954年获得内部自治，2010年10月10日将解体，其中库拉索和圣马丁将成为高度自治属地，余者则成为荷兰海外行政区。群岛耕地面积小，土地贫瘠，生产的农产品仅供当地居民消耗。国家收入主要依赖石油出口，促进了海运与空运的发达。近年来观光旅游业也兴盛起来。

       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居住的华人约有5500人。库拉索岛的华人有70%是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人，早期华人移民多广东籍，新移民主要是80年代移殖过来的港台人士。华人多聚居在首都威廉斯塔德及新港两地，多数经商，经营餐馆业、杂货业、贸易进出口业、洗衣店、超级市场、照相馆、家具业与旅游业等。这里的华人做小生意，容易赚钱，对于生活现状也大多感到满足。

 巴哈马是由700多个小岛及礁岩组成的岛国。其经济以石油出口、金融业及旅游业为主，国民平均收入高，是加勒比海最为发达的国家。当地华人约有500人，以广东籍的第二代华人居多，大多数聚居于首都拿骚（Nassau）。

       这里的华人多经营杂货店以及餐馆业。根据资料统计，1999年由华人开设的杂货店有18家；餐馆约17家；还有华人经营的旅馆5家，金融机构则有香港恒生银行于拿骚所设立的分行。

       此外，有华人的建筑公司一家，还有洗衣店、文具店、书店、美容店、西服店、照相冲洗店等。而中国的齐鲁建设集团公司则承建过巴哈马国家体育场。香港和记黄埔自由港港口公司、自由港集装箱码头公司、大巴哈马岛机场公司是香港和记黄埔公司（Hutchison Whampoa Limited）在大巴马哈岛投资的三大公司，主要经营集装箱运输、客运码头和机场业务。

阿鲁巴位于委内瑞拉北岸，农业不发达，国家的主要收入依赖石油出口与旅游业。华人约有5000人，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裔占了80%，他们多已融入了当地主流社会，不会说华话或方言。老一辈华人多属粤籍，以鹤山、恩平人居多，新移民则多来自港台，大部分华人聚居在首都奥拉涅斯塔德（Oranjestad）。

       这里的华人多数经营杂货店、餐馆业、旅馆、超级市场、药房、五金店、家私店及洗衣店，都是小本生意。一般华人工作勤奋，稍有积蓄，就拥有自己的房屋汽车，属中产阶级，生活过得安逸舒适。

 位于加勒比海岛屿的最东端，人口约26万，为世界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国内盛产甘蔗，富石油资源，加上旅游业发达，三者成为国家主要外汇来源。

       岛上华人只有区区600人左右，多聚居在首都布里奇敦（Bridgetown）。大部分当地华人都经营餐馆业与加工业。餐馆多属小规模，业者多为中国大陆与香港移民。另有杂货店、裁缝店及塑胶加工厂。

       巴巴多斯于1977年与中国建交，中国多次给巴国援助贷款，并于1993年援建体育馆。中国在巴国设有大使馆，常在佳节举办招待会款待当地华人代表，联络彼此的感情。有两家中国建筑公司进入巴国承建庞大建筑工程，它们是中国建筑总公司巴巴多斯分公司和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业绩卓著，声誉良好。

       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南端，盛产香料，其豆蔻、丁香、肉桂之产量，居世界之冠。由于风光明媚，气候宜人，旅游观光业相当发达，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

       该国的华人大概只有100人左右，大多是广东籍，多数从事餐饮业、百货商店、商贸、食品加工及建材加工等行业。

       格林纳达与中国大陆建交后，中国多次派遣农业、医药与体育的专才予以协助发展。同时也有数家中资机构在此承包庞大的工程建设。为了配合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也投入兴建三星级酒店。

位于加勒比海东部，以观光、农业（盛产甘蔗）为经济基础。这里的华人只有近100人，多从事观光、农业相关产业。该岛国与台湾建交至今，两方常派代表互访。

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南端。以农立国，大量生产与出口香蕉、椰子、甘薯及香料。旅游业是另一庞大收入来源。

       华人在这里所开设的，都是小规模的餐馆，以赚取薄利为生。该国与台湾建交，台湾也派遣农技团协助该国改善农业生产、养猪及植树等技术。

   位于加勒比海海地岛西部，由于长期政局动荡不安，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农业产量不高；工业以制造业为主，也仅供国内消费；交通运输设备欠完善，致使旅游业难以发展，因而成为中美洲生活水准最低，文盲比率最高的国家。

       由于华人的经济活动范围受限，仅有一家餐馆，一家成衣厂以及一家农场。自1956年以来，海地与台湾便开始建交。除了经常互访，双方更订立了文化、科学与农业等合作协定。

 多米尼克以农立国，尤以香蕉的出口，占全国外汇收入的50%。工业基础薄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很小。

       据2001年的资料显示，当地华人仅43人，其中20人来自台湾。由于多米尼克给予中国人落地签证的待遇，近年来大陆移民较多，目前华人已有大约200人，而且超过半数已入籍。他们多经营小型杂货店或餐馆为生，规模不大，且发展有限。

       华人经营的小型杂货店以及现代超市，单单在首都罗索就有13家，均由大陆移民经营，货物多半由中国进口。罗索也有十余家中餐馆，其中以中华阁与古都的规模较大。也有专营外卖的，不过多是家庭式的小生意。另外，这里也有华人所开设的旅馆、礼品店、洗衣店等。至于在该国栖身的台湾移民，他们主要在经营洗衣厂、中医、小型餐馆及礼品店。

  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向风群岛中部，以农业占主导地位，尤以香蕉及可可种植业为主。圣卢西亚山明水秀，有利于发展旅游业，成为第二经济支柱；不过，工业基础却尚处于薄弱的阶段。

       岛上华人人口很少，大约只有百余人，主要从事餐馆业与杂货业。值得一提的是岛上有个“中国城”，那里有3家中国美食城、4家中国商店、一家批发中心，还有一家水上运动公司。

       圣卢西亚于1984年与台湾建交，接受台湾的援助，但到了1997年双方中止关系，转而跟中国建交，中国曾援助圣卢西亚建体育馆及精神病院。但是到了2007年，却与台湾复交，引起中国的抗议，中国中止与圣卢西亚一切外交关系，包括各项签订的协议均告失效。

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北，经济以农业与旅游业为主，盛产甘蔗、棉花及葛薯，旅游收入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工业方面则有制糖、炼油及水泥等领域。

       这里的华人主要从事中餐馆、小商品零售店以及超市，都是小本经营。

       该国之前曾与台湾建交，1983年双方断交之后，便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跟据资料，中资在该国有两家大企业，一家是中国进出口集团，另一家则是合资的安提瓜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在加勒比海一带的海岛国家，山青水秀、风光旖旎，旅游观光业的无限潜能，确实是吸引华人前来这里的重要因素。比起北美以及南美，加勒比海的华人移民历史短浅，人口稀少。早期的华人以广东籍人士居多，华社也比较单纯。这地区的华人，大多是小康之家，生活还算安逸。有的人安于现状，打算长期居留；有的则以此为跳板，希望有朝一日，累积了足够财富，再移民美、加等先进国家，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俄罗斯

*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国土西自芬兰、东抵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海岸线从北冰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
* 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曾经在1917年，与周边国家共同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 1991年，苏联解体
* 俄罗斯是华人最早到达的欧洲国家。
* 15世纪或更早以前，就已有华人移居到西伯利亚。
* 在绵长的中俄边界上，中国的牧人、猎人、渔夫以及采掘人参者便经常来来往往，自由活动。
* 清朝初期，莫斯科附近甚至出现过一座“中国城”以供华裔交易。
* 18世纪，莫斯科出现了俄国史上第一所汉满语学校，任教者是来自清朝的满族人周戈
* 17世纪到19世纪，清政府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俄国。
* 19世纪中叶，中国西北反抗清政府的回族起义军被镇压之后，余部逃亡至当时已并入俄国版图的地区，被当地人称为东干人。
* 中国商人在莫斯科、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托母斯克（Tomsk）、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等数十座较大的城市都设有商行，销售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及各种手工艺品，再购买俄国的金沙、呢绒、皮货、毛毯等，带回中国贩卖。
* 两大商团是在俄罗斯各地贩卖石器的浙江青田帮，和以纸花而闻名的湖北天门帮
*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劳工短缺，沙俄招募了一大批主要来自中国山东及东北等地的华工。
* 中国山东及东北等地的华工被运送到俄国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从事修筑铁路与垦荒工作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在中国招募劳工人数达15万，大部分被分派到全国各地的码头、工厂、矿井、伐木场和荒地充当苦力，还有万余人则被送往前线挖战壕、抬担架、运弹药。
* 当时在远东的中国商人，以东帮（山东）、南帮（江浙）、北帮（河北、东三省）和广帮（广东）为主，经营商品贩运、建筑、酒馆、洗衣铺和杂货铺等生意。
* 在莫斯科红场的俄罗斯国家一级公墓中，安葬着两位曾为了十月革命而献身的中国革命者的尸骨，纪念碑上还镌刻着“张，死于1917年”、“王，死于1917年”的字样。
* 邓小平和蒋经国等名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
* 蒋经国还娶了位苏联太太，即日后的蒋方良。
* 俄罗斯华人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Irkutsk）、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乌兰乌德（Ulan-Ude）、海参崴（Vladivostok）等地，其中以莫斯科华人数量最多。
* 俄罗斯华人有相当数量来自中国东北黑龙江、辽宁、吉林，以及北京、福建、山东和浙江等省市，极少部分来自台湾。
* 如今俄罗斯华人社会的主流，是一批被称为“倒爷”的华商。
* 在莫斯科还剩下半幢唐人楼
* 俄罗斯华人有宗教信仰的不多，华人是基督教信徒。
* 每年1月7日的东正教圣诞节，是俄罗斯最热闹的时候，当地人通常会有十天的假日。
* 在莫斯科十分著名的新圣女公墓，安葬着中国革命家王明。
* 公立学校中最为著名的是莫斯科的1948学校，它的校长打出“只要学习华语，就有面包”的口号，吸引了很多当地学生。
* 俄罗斯目前在市场上发行的华文报纸有《路讯参考》、《华俄时报》、《捷通时讯》、《环球日报》、《侨报》以及《莫斯科华人报》。
* 《路讯参考》和《莫斯科华人报》还设有自己的网站，读者主要是俄罗斯当地和打算到俄罗斯的华人，以商人和学生居多。
* 在莫斯科有一支已经有十多年历史的华人足球队。
* 白俄罗斯
* 白俄罗斯位于东欧平原西部，与俄罗斯、拉脱维亚、波兰、立陶宛以及乌克兰接壤。
* 国家以民族命名，意为纯俄罗斯人。
* 白俄罗斯被誉为“万湖之国”
* 20多年前，在乌克兰境内、近白俄罗斯边境处的一场震惊全球的切尔诺贝尔核泄漏事件
* 在白俄罗斯定居的早期华人，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历史因素的迁徙，另一类是为了到这里留学而来的，这些留学生原先大部分是属于公派性质的，后来则多为自费的留学生。
* 白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数度被划入俄罗斯的版图，又曾经是前苏联的一部分，所以有些俄罗斯华人的活动范围曾经扩展到白俄罗斯区域，他们的迁移史已成了俄罗斯早期华人历史的一部分。
* 清朝道光年间，来自浙江青田的章旦乡以及留庆云等人，抵达了当时还是属于俄罗斯疆域的明斯克，他们起初贩卖石雕，后来又去当矿工。
* 如今在白俄罗斯的华人中，河南人还是占大多数，并不似其他的欧洲国家，以浙江人为主。
* 2000年过后，在白俄罗斯的华人留学生越来越多，最终甚至占了当地华人的97%至98%
* 白俄罗斯地广人稀，华人打工薪水低，税率高，语言不通，商机可遇不可求。
* 目前生活在白俄罗斯的华人多数是留学生，仅有少量的中国大型企业的工作人员和个体商人。
* 留学生和商人中，以中国河南籍居多，其次为东北人，大部分集中在首都明斯克一带。
* 因为经济能力的不足，这里的华人社会还没形成规模，媒体、社团也势微力弱，所以还称不上是成形的华人社会。
* 当地人常说的“白、俄无国界”，让人觉得白俄罗斯附属于俄罗斯。
* 那些在白俄罗斯生活了十多年的华人说：“我走过这城市的每一条街，对每个角落都充满感情，想回国的欲望越来越小，唯一的牵挂就是国内的亲人。时间越久，对白俄罗斯越不舍，越觉得这里像故乡。”
* 在明斯克，必到的景点是“泪岛”。这里有座流泪的小天使铜像，按照当地风俗，抚摸小天使，会保佑自己多子多福。
* 在白俄罗斯的华人圈子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娶到一名美丽的白俄罗斯太太，或者交了一个漂亮的白俄罗斯女朋友。而华人女性嫁到白俄罗斯的例子却微乎其微。

乌克兰

* 乌克兰意为“边陲之地”，首都基辅享有“俄罗斯诸城之母”的美誉
* 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乌克兰，在1991年之前，却未曾正式独立过
* 直到前苏联解体，乌克兰才真正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 社会体制转型，国家成立时间短，法规政策不完善，这些不利因素，反而成为了以赚大钱为目的的商人的契机，其中也包括纷纷涌入的大批华商。
* 在清朝末期，有些浙江青田人以及山东江湖艺人沿着陆路走过俄罗斯到西欧，最终停留在乌克兰境内。
* 乌克兰隶属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时期，有中国派留学生进入乌克兰
* 60年代，中苏边境爆发伊犁事件
* 从1994年开始，大批以做皮货生意为主的华人“倒爷”涌入
* 1995年至1996年间，有福建和浙江的近万名农民移入乌克兰，他们以零售各种纺织品和轻工业品为生，还在基辅开辟了一个属于他们的露天市场。
* 在乌克兰的华商中，盛传一句话：“要做大事业，就去敖德萨。”
* “七公里”是乌克兰最大的露天集装箱批发市场。因距离市中心的火车站7公里而得名。
* 东欧的商人，不做赚不到一半利润的买卖，但这里的华商们却只是赚取蝇头小利，以量取胜。
* 在基辅华人开设的中餐厅里，王明熹的九龙餐厅，要算是行业中的翘楚。
* 华人称作“乌克兰四大菜系”的土豆、洋葱、圆白菜和胡萝卜
* 不打算在乌克兰扎根的华人，在乌克兰生活一切从简。即使是结婚，也不像在中国那样讲究
* 乌克兰式的婚礼十分热闹，要分别举行3个仪式，即教堂仪式、注册仪式和马拉松式宴会。若集中在一起举行，要闹上24小时

波兰

* 波罗的海之滨、中欧北部的波兰，曾经长期受制于其左右两个强悍国家——德国和俄罗斯
* 波兰是二战中按照人口比例计算死伤最惨烈的国家。
* 最早一批的波兰华人，是20世纪30年代从俄罗斯辗转而来的十几名青田人。
* 靠打苦工或兜售纺织品以及小工艺品为生
* 青田华侨大会的移民资料记载，浙江青田的刘焕清，辗转法、意、捷、德等国之后，1936年在波兰开设了橡胶工厂，还雇用7名工人，安装7部电话，1947年回到中国时，带回了一万多银元
* 二战之后，一些温州人来到了波兰。他们在那时就已做起了皮鞋生意，并多数在华沙或罗兹（Lodz）安家立业。
* 1959年从北京嫁到波兰的李丹凝大夫，在波兰攻读了医学博士，并被称为波兰的中医之母
* 波兰当地华人自称是“在欧洲历史最短的华社”。
* 华商大部分聚集在华沙市外的GD中国城。
* 只要能多挣钱，华人最不怕吃苦。条件良好的市场环境，并不能成为吸引他们的诱因。
* 《波兰环球周报》和《波兰华人周刊》都是当地活跃的华商因感到信息的闭塞而在2007年创刊的。
* 《波兰环球周报》是香港华商成标创办的华文报纸。
* 《波兰华人周刊》则走杂志路线
* 波兰引为自豪的传统食物是饺子
* 问起波兰华人有何特点，很多人都会回答“在欧洲的历史最短，但能力最强。”
* 柴洪云是中国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来波兰之前，有着一份稳定舒适的工作。
* 1994年作为贸易公司的一名员工从中国上海来到波兰，每个月的薪水300美元。
* 在柴洪云餐厅的收银合前，有一份彩色打印、用钉书机装订的A4纸的《华都文摘日刊》

捷克

* 东连斯洛伐克，南临奥地利，西接德国，北枕波兰，是欧洲中部的内陆国。
* 捷克在欧洲是个制造业发达的国家
* 皮尔森酿酒技术，可以与奔驰、宝马齐名的斯科达汽车
* 加入欧盟后，捷克反而比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更快建立起规范的市场体系。
* 据史料记载，20世纪初，就有华人在捷克穿街走巷，贩卖货品。
* 从1950年至1985年间，在捷克的华人仅有20余人。
* 目前在捷克的4000多名华人中，有一半以上获得了永久居留权
* 捷克华人大部分居住在首都布拉格，在奥斯特拉瓦（Ostrava）和布尔诺（Brno）等城市居住的仅有百余人。
* 捷克华人中来自浙江青田的华商就占了三分之三
* 近年来，全球贸易不景气，致使在捷克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华商数量一再滑落，反而是中餐馆却一家接着一家开业。
* 初时，捷克华人平日在大市场做买卖，周末还要到外地去勤加跑动。
* 在捷克曾有个说法：“越南人靠华人货活着”。意思是说，市场的状况是越南人向华人拿货，或者把摊位租给华人
* 近三四年间，中国快餐、中国饭店遍布捷克大街小巷，以及购物中心。
* 捷克的经济快速发展，使这里的薪金、机会、工作环境和西欧相比都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了意大利、西班牙的一些地方
* 若来的顾客是华人，一般店主都对厨师喊一声“给中国人吃的”，厨师便会酌量地少放些勾芡。
* 20世纪50年代随丈夫来捷克定居的唐云凌，十多年前创办华联会，目的竟然是为了对付华人的恶势力，主持社会正义。
* 华联会最大的一项成就，就是坚持主办了捷克唯一的华文报纸——《捷华通讯》。
* 而网络上华文媒体则以多种形式存在，有综合性的网站《捷华网》、论坛形式的《中捷行捷克华人华侨网》、《捷克华人》及《留学生之家》、提供各种信息的《捷克华人网》、《华人街》和捷克汉语工作者主办的《CINSKY》、以及博客形式呈现的《布拉格华人视界网络杂志》。
* 华人来到捷克有不同的原因，有来此创业做老板的；也有不能入境他国辗转流落到此暂居的，偏偏就是少有一开始就决定要移民捷克的。
* 当地唯一一所华文学校——布拉格中华国际学校，被华人称作“中华小学”。
* 曾有旅捷华人写过一部小说，叫做《布拉格有张床》

斯洛伐克

* 斯洛伐克是中欧的一个内陆国家，与捷克、波兰、乌克兰、匈牙利及奥地利为邻。
* 斯洛伐克原本仅是一个区域名称，最初是大摩拉维亚王国（GreatMoravia，830-905年）的中心地区，十世纪后成了匈牙利国土的一部分，1919年独立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 1939年，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占领，并首次宣布以“斯洛伐克”立国，但当时仅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国。
* 二战后，斯洛伐克再度与捷克联合为一国，直到1993年才脱离捷克，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
* 斯洛伐克与捷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各方面却受匈牙利影响。
* 捷克：重工业发展
* 斯洛伐克：传统农业
* 斯洛伐克开始工农并重，发展逐渐步入佳境。
* 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成了工业发展中心，造船、家具、化学、烟草等工业皆有不错的发展，斯洛伐克成为华人经商移民的选择。
* 有人说，其他国家的华人需100年时间才办成的事，斯洛伐克华人却能在短短的十年内完成。
* 20世纪50年代，当捷克斯洛伐克还未分家时，大部分华人都聚集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Prague），而斯洛伐克境内的华人则是少之又少。
* 1992年12月31日，捷克与斯洛伐克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斯洛伐克处于百业待兴的状态。那一年，聚集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华人不过区区23人。
* 在到处都有浙江人的欧洲，这23名华人却不是来自浙江，而是来自北京。他们大多在此待了一段时日之后便陆续离开。
* 1994年到1995年期间，斯洛伐克的移民局开始实施限制移民的苛刻条例，华人必须符合种种条件才能获得签证，这就是当地华人所谓的“签证被卡死”。
* 斯洛伐克最大批的移民是在1995年至2003年间的第二阶段。
* 斯洛伐克有可能是因为急需填补人口，因此才将入籍条件放宽。
* 斯洛伐克华人的主流行业仍是“开库”，即批发库。
* 移民历史不过十几年，区区二三千人口的斯洛伐克华社，社团组织却有6个，包括最早成立的青田同乡会、斯洛伐克华人华侨联合会、斯洛伐克中国友好协会、华人华侨商会等。

匈牙利

*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矗立着7个穿着东方服装、骑马射箭的勇士雕塑，他们代表着最早创建这个国家的7个部落，是为纪念匈牙利人西迁定居欧洲1000周年而建。
* 有着浓郁东方情结的匈牙利人经过十多年的官方考古协会研究，宣称自己的祖先源自新疆天山一带。
* 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50年的路。”在海外这么说，就知道是指匈牙利华人。
* 匈牙利现有3万华人，约2万人直接来自中国大陆，一万人则从西欧流动过来。
* 四虎市场如今已成为布达佩斯地图上的一个景点，被称为中国市场（Chinese market）
* “在匈牙利生活过后，会觉得其他国家都没有布达佩斯方便。”这是很多匈牙利华人的切身感受。
* 匈牙利最大的连锁中国超市——环宇超市
* 华文媒体在匈牙利开始的时间并不长，1996年才有第一份华文报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市场上已有9家华文报刊。其中，除了匈牙利华商经营的华文出版社发行的《世界华人名人录》杂志外，《新导报》、《市场报》、《欧洲万事达时报》、《欧亚新闻报》、《欧洲论坛》、《中华时报》、《布达佩斯周报》、《中欧商报》都为周报。其中一些还兼办杂志、搞印刷和制作电视节目。
* 这些媒体虽被当地人称为“非主流族裔媒体”，但是报人们认为，他们已经藉此融入了匈牙利的主流社会。
* 《新导报》、《万事达报》，在办公室里都设有专业的摄影棚，器材、背景、灯光完全不逊色于当地同行。商品和模特儿的拍摄，都是由报社的华人摄影师独立完成。
* 匈牙利人在欧洲被誉为“有数学脑袋的民族”，

奥地利

* 奥地利位于欧洲中部偏南，是个历史久远，艺术氛围浓厚的国度
* 二战曾导致国内人口锐减，战后一段时间，国土被美英法苏4国分别占领，后来才重获统一。
* 奥地利于1955年宣布为永久中立国。凭着良好经济基础，它大力发展工业，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允许外国人入境就业、定居。
* 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一些湖北天门人、山东江湖艺人及浙江青田人来到奥地利
* 一战结束后，孙巨兴4兄弟从贫瘠的浙江青田，乘船两个月，在意大利登陆，辗转西班牙、法国、荷兰、德国，落脚于奥地利。
* 背着石雕、领带、袜子、手套等商品，沿街叫卖，挨家挨户兜售
* 二战的炮火打散了孙家4兄弟。两人打道回府，一人去了荷兰。孙巨兴和张岩方、王兴标两名青田同乡则留在了奥地利的格拉茨（Graz），靠为当地人做粗活度日。
* 那时中国人移居奥地利的不多，除了孙氏和同乡，有的就是来自台湾的移民。
* 70年代初，奥地利已有二三十家中餐馆，店主皆为台湾人。
* 几千名来自柬埔寨、印度、越南等国的华人，于1975年后纷纷涌入，使当地的华人急剧增加
* 80年代末，奥地利经济起飞，各行各业面临劳工短缺，政府开放劳工市场，凡持旅游签证来到奥地利的外国人可办理工作居留。
* 短短一年，已有两万华人来到奥地利，有的当教师、科技人员，也有的成为音乐家、画家等。
* 直至90年代末，奥地利的经济下滑，政府对移民的限制严厉，华人移民才明显地减少。
* 奥地利国小民富，华人大都聚居在首都维也纳
* 奥地利的3万华人，有七成来自浙江青田及温州
* 当地制度规范、社会福利优越，外国人只要连续8至10年交税，就可以申请入籍成为公民
* 约三分之二的华人都选择加入了奥籍。
* 除了占大多数的浙江人外，还有来自福建、东北、上海、北京、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和印度等地的华人。
* 大多经营餐饮业，只有5000余名来自中南半岛的华人在林茨（Linz）的工厂工作。
* 奥地利环境优美，治安良好，旅游业发达，人际关系简单。
* 导游总是这样介绍：“也纳历史悠久，教堂有300多座，可是这里的中餐馆比教堂还要多。”
* 光在维也纳就有中餐馆600多家，整个奥地利的中餐馆加起来约有1400余家。
* 几乎每户青田人至少拥有一间中餐馆
* 奥地利局势安定，社会福利健全，华人克勤克俭，只要干上几年，就能买车置房，过上安定目子。
* 每年来到奥地利的华人学生就有近万人，其中70%的人都选修艺术科系，尤其是音乐专业
* 目前在奥地利有3所教授中文的学校：温州华人创办的维也纳中文学校、在外企工作的华人发起的维也纳中文教育中心、以及台湾中文学校。
* 在奥地利活跃着3份华文周报和3个华文网站，分别是以公司形式经营的奥地利《欧洲联合周报》、浙江华人联谊会主办的《华信报》和青田同乡会主办的《中国人》，另外还有朋友网、欧华侨网和欧拓社区网。
* 奥地利的早期华人移民人数少，所以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唐人街或中国城
* 奥地利的两个主要政党－－奥地利人民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被华人称作“黑党”和“红党”。黑党较保守，代表当地中产阶级的利益；红党则反对歧视、主张为条件欠佳的人提供平等机会。作为移民的华人倾向于“红党”。
* 加入奥地利国籍的华人，约占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二
* 第一代华人不热衷参政，对自己的投票权利并不重视。

德国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四周与9个国家接壤，因处于东西欧来往要冲，素有“欧洲的心脏”之美誉。
* 雄伟的阿尔卑斯山东西迤逦，境内有美丽的莱茵河与多瑙河缓缓流淌，壮丽的雪山，柔情的流水，交相辉映，谱成美妙的旋律。
* 德国的日耳曼人是一支优秀的民族，富于浪漫的情调与绵密的思想，无论在文化艺术，或是科学技术等领域，都绽放出万丈光芒
* 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曾说过，德国人很“可怕”
* 这个爱思考的民族，造就了太多的伟人：马克思、尼采、歌德、黑格尔、贝多芬、巴赫、爱因斯坦、格林兄弟等等。
* 认真严谨和恪守纪律的天性，使它的工业技术傲视全球。说起汽车、机械、电子电器、航空、航天甚至皮革，都会让人不禁联想到这个连续5年称霸“世界出口冠军”的欧洲中部大国。
* 1945年战败投降后，德国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最终在1989年推倒了分隔两地的柏林墙，东西德重归统一
* 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盟最大的成员国，跻身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 德国从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走向开放及接纳外来移民，至今拥有许多来自东欧与地中海区域的移民，华人不到德国总人口的0.2%
* 诗人海涅于1823年写的一封书信中，提及在德国的两名中国人，他们是冯雅学与冯雅生
* 冯雅学与冯雅生两人从广州经伦敦辗转到柏林卖艺
* 19世纪70年代，清廷派遣第一位特使到柏林，也带来了首批留学生和军事实习员
* 中国学生联合会早在1880年已成立，当时会员大约有40多人
* 一些广东海员到德国打工，他们居住在汉堡（Hamburg）港区
* 另一批华人来到德国，是在19世纪末。他们有山东的江湖艺人，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莫斯科和东欧国家入境
* 20世纪20年代，已有数千名华人生活在德国。汉堡的圣堡利区Schmuckstraβe街已形成了繁华的唐人街
* 当年的《汉堡晚报》就称这一区为“小中国”。
* 30年代有许多华人子弟来德国深造。当时的3700名华人中，留学生就大约有700人
* 德国过去的华人以粤人及浙人为主，后来福建、江苏、上海、东北等地人士也来了。粤浙人目前各占华人总数40%，其他则约占20%
* 他们有些是老华人的后代；十万人来自中国大陆，其中两万人已入籍；台湾人有8000多，入籍的有3000人；印支华人约有4万；还有来自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
* 华人较集中的城市有柏林、汉堡、法兰克福（Frankfurt）、慕尼黑（Munich）、纽伦堡（Numberg）、北莱茵（Nordrhein）、波恩（Bonn）和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等
* 华人的传统谋生工具有菜刀、剃刀和剪刀，德国华人只有第一把刀——菜刀
* 19世纪末、德国出版了华文刊物《日国》
*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曾涌现过许多中文报刊，但最后都销声匿迹了，办得最久的是走过25个春秋后才停刊的《西德侨报》
* 1997年创刊的《华商报》，是德国第一家商业化的中文报纸，也是第一家以半月刊形式出版的报纸
* 《欧华导报》、《联合周报》、《欧洲商旅报》等报纸，有中文杂志《本月刊》、《商务先锋》，以及中德文对照的《你好欧洲》
* 德国最早成立的中华会馆，从1929年至今
* 欧洲首家少林寺开设在柏林市区中，由5名来自中国少林寺的师父住持
* 德国唯一的华人公墓在1929年由中华会馆争取建立，设在汉堡卧尔斯多福公墓内（Hauptfriedhof Ohlsdorf），共租用两片墓地。
* 旧的公墓可容纳百余个穴位，立了一个刻着“华侨公墓”的石碑，德文则写着“纪念在汉堡逝世的中华海员和同胞”。其中，中华海员的字体特大，可见当时该会馆和华人社会都是以海员为主体，后来才包罗了其他行业成员

瑞士

* 瑞士地处欧洲腹地，因境内盘踞着欧洲最高、最大的阿尔卑斯山脉，有着“欧洲屋脊”的称号
* 是旅游胜地，山青水碧和终年不化的冰河使它成为“世界公园”
* 是“钟表王国”，久负盛名的钟表业迄今不衰
* 是金融保险业发达的“金融帝国”，人均在国外的资产占世界第一
* 瑞士独立于1648年，1815年宣布为永久中立国，及后实行独特的银行保密法，令它一直承载着许多传奇
* 瑞士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接受移民的条件也特别严格
* 极力捍卫人道和人权，愿意为许许多多的弱势群体打开方便之门
* 最先到达瑞士的华人是浙江青田人
* 在一战之后，日内瓦（Geneva）成了国际联盟的会址
* 20世纪30年代，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李石曾，率领一批人员抵达瑞士日内瓦并于1936年在国际联盟的会址设立了“中国国际图书馆”，主要是供到欧洲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进修之用
* 90年代，华人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
* 政治稳定，经济发达，设施先进，教育完善，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住在瑞士的华人儿乎都会这样形容这个国家
* 华人社会中，还有自中国大陆移入的4000人；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则分别有500人左右。比较大的州属，通常聚居了较多的华人，比如苏黎世、伯尔尼、日内瓦、圣加仑（St.Gallen）等州
* 瑞士是一个国际大都会，有至少157个国家的人居留在此
* 瑞士的化学和化工领域发展蓬勃，许多大型企业如西药制造商都在当地设厂
* 瑞士华人养成早上10点、下午3点的“瑞士式”喝咖啡习惯。
* 只有瑞士籍或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人士才有资格买房子，而华人通常都用储蓄了20年的养老金来付款购屋
* 瑞士华人以信奉佛教居多，印度支那移民没来之前已是佛教徒
* 卢塞恩附近的瑞士佛光山面积2200平方公尺，在1996年由旧建筑改造而成

意大利

* 欧洲南部的文明古国
*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是古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版图遍及整个地中海沿岸
* 古罗马的辉煌成就，表现在文学艺术、建筑艺术、雕刻绘画、农业技术、地理科学及医学等方面，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 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意大利
* 意大利虽然自然资源贫乏，但却是当代欧洲四大经济强国之一，经济实力全世界排名第六
* 工业发达，其中以汽车工业与钢铁工业最为称著；制鞋业更是传统工业，为它赢来“制鞋王国”的美誉；旅游业发达，为世界第四旅游大国。庞大的外汇收入，足以弥补国家收支的逆差
* 外来移民占总人口4%，约240万人，其中华人约26万，散布在全国各地
* 中国浙江省文成、瑞安及青田的农民是第一批来到意大利的华人
* 他们于20世纪30年到意大利来谋生，最年轻的只有18岁
* 他们从上海出发，在海上飘荡了41天后，终于抵达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Milan)
* 第一批意大利华人流落到陌生的异域，人生地不熟，没有居留身份，身无分文，再加上言语不通，只好沿街兜售领带、皮夹等小商品
* 他们白天在海滩、街道上叫卖，晚上到餐馆、咖啡店向食客兜售
* “两个里拉”成了华人的代名词
* 他们不绝的叫卖声终于引起当地人的厌恶，结果经常遭到驱赶。他们只好提着货物到乡下去卖。一年的辛苦劳碌，只能够挣来维持生活的区区360里拉
* 二战爆发，中国与意大利成了敌对国。他们有的被关进集中营，有的遭到枪杀，生命、财产几乎都失去了保障
* 战争结束，作为战败国的意大利，赔偿了华人在战争中的部分损失，有人便利用这笔钱重新创业，也有人返回了中国
* 50年代中，随着意大利华人经济条件的逐渐好转，家乡亲戚们也陆续接踵而来，其中也包括战后离开该国的华人
* 那些重新踏上这片土地的华人凭藉过往的经验，积极发展皮革业，得心应手的他们发展迅速，很快就打进了被当地人垄断的市场
* 华人群体以浙江人居多，其余则来自福建、北京、山东等地
* 即使同为浙江人，也散居各地。文成人聚居在米兰，瑞安人在佛罗伦萨（Florence),青田人在威尼斯（Venice),温州人在罗马
* 40年代的皮革业、70年代的餐饮业、80年代的服装加工业还是90年代的批发贸易业，都发展迅速，成功扎根于各大城市之中
* 华人社团数量高达80个，有十多个侨团还自行创办了中文学校
* 当地华人贫富悬殊。富者拥有多处房产，出入以名车代步，生活令人称美
* 贫者为了还债日夜工作，那些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华人更是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 高峰期，佛罗伦萨的皮革加工厂有2000多家，但目前只剩下约400家
* 鼎盛时期，米兰共有500家中餐馆，罗马有300多家
* 米兰如今200家日本餐馆中的95%，其前身都是中餐馆
* 普拉托（Prato）是意大利的纺织业基地，华人于2001年到此
* 如今，普拉托的服装加工厂已有3000多家，90%都是华人业主。业主大多以温州、青田人为主
* 新人遵循着中国的风俗，男女双方在注册结婚后，会在中餐馆举行盛大的宴会。婚宴一般在下午两点开始，傍晚6点结束。
* 佛罗伦萨中文学校是当地唯一一所由政府资助的全日制中文学校
* 意大利有6份中文报，即《欧华时报》、《欧洲快报》、《欧洲侨报》、《华商报》、《欧洲华人报》及《欧华联合时报》，皆由华人或社团创办
* 报章内容以翻译当地的法律法规为主，重点报道劳工的申请、身份及居留等问题
* 《欧华日报》于1996年创办，是当地创刊最早的中文报，每份售价欧元一块半，每期销量在一万至两万之间，扣除了开销、印刷费用后，有时不赚反亏，苦苦支撑两年后才有起色，但也是维持着一个不盈不亏的局面
* 在意大利，华人社团多达80个
* 法律规定，只要有会员3人就可以注册成立社团，因此它的种类繁多，有同乡会、联谊会、文化交流协会及商会等。历史较长，影响力较大的社团，要属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及罗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
* 米兰华侨工会于1956年创办，前身是意大利北部华侨华人工商会，直到1986年才改名并沿用至今；后者成立于1998年1月，是罗马地区较大的华人团体
* 2000年成立的罗马华人华侨妇女联谊会，在维护妇女同胞的权益之余，多次为当地筹集善款，大大提升了罗马地区华人的形象
* 2004年3月，来自青田的潘永长在罗马市30余万外来移民的支持下，当选为罗马移民议会议员
* 同年9月，他又被选为罗马移民议会副会长，任期5年
* 潘永长是首位荣膺这个职位的华人，也是欧洲政坛职务最高的华人
* 入籍意大利的华人林红玉，于2008年当选为佛罗伦萨省冈毕比森齐奥市政府移民局局长，专事负责处理中国移民事务

克拉地亚

* 1991年克罗地亚脱离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宣告独立后，随即陷入内战，直到1995年才签署和平协议
* 克罗地亚摆脱了社会主义框架的束缚，走向自由主义经济的道路，经济才逐渐发展起来
* 在巴尔干半岛诸国中，克罗地亚的经济较为发达，工业及制造业稳步发展，在石化、机械、造船、医药等行业，均以先进高超的技术见称
* 克罗地亚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地区渔产丰富，渔业发展甚佳。境内有高山绵延，河流密布，自然风景秀丽，享有“千岛之岸”之美誉，亦被称为欧洲最美丽的国家之一，是其中一个旅游业最发达的欧洲国家，旅游业每年为该国带来数以亿计的外汇
* 最早抵达克罗地亚的华人，是一批大多来自中国北方的知识分子
* 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之后，迁移到克罗地亚的华人便逐渐增多，他们大部分来自周边国家，主要有罗马尼亚、波黑及奥地利等国，其中，罗马尼亚和奥地利的移民人数最多
* 移民的原因，除了为财富，而且还为了保命
* 当年，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华人才从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Belgrade）迁至克罗地亚
* 2002年至2003年间，到来的华人人数最多，并且多数属于商业迁移
* 华人来此的目的并非旅游，面是为了商业考察，一旦发现此处有商机，就会即刻着手创业
* 九成华人集中在首都萨格勒布，他们多来自浙江青田，东北人则占少数

希腊

* 奥运发祥地，西方文明的摇篮
* 首都雅典是希腊文化与艺术中心，巴特农神庙、雅典娜纯金塑像以及无数的神殿、古迹等，其建筑艺术风格之独特，及雕塑与装饰图案之精湛，可谓独步古今，充分显示了古希腊人的聪明与睿智
* 拥有3000多个星罗棋布的岛屿
* 最早把华人带到希腊来的，是跨国婚姻
* 华人分别聚集在首都雅典，以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Thessaloniki），主要从事批发、零售及中餐业
* 批发货行的老板多是浙江人，零售店的老板则多是福建人
* 希腊唯一的中文报《欧洲联合周报希腊版》
* 当地政府于2006年开始，规定从商者必须持有“老板居留身份”，才有从商的资格，否则必须关闭店面以保住原有的居留身份
* 希腊的华人社团包括希腊华侨联谊会、希腊华人华侨总商会、希腊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希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希腊福建同乡会、希腊青田同乡会、希腊萨洛尼卡华人华侨联谊会及希腊华人华侨妇联总会
* 希腊2005年才出现了首份，也是唯一的中文报——《南欧时报》，内容包括希腊经济、政治、当地法律和风俗人情，扩大了华人的视野
* 2006年9月，《中希时报》与法国《欧洲时报》、上海《新民晚报》合作，正式加入《欧洲联合周报》报系，更名为《欧洲联合周报希腊版》
* 希腊青田同乡会于2007年开办了中文班，首批学生只有8人，后来通过宣传增至15人
* 上课分为大、中、小3班，由来自中国的李芳老师负责执教，每周5天，每天从下午2点到4点
  + - * + 保加利亚
* 素有“玫瑰王国”之称的保加利亚，是全世界最大的玫瑰产地，酸奶、葡萄酒更是享誉国际
* 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东部，北连罗马尼亚，南接土耳其、希腊，西临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东濒黑海
* 公元681年，斯拉夫人及古保加利亚人，在多瑙河流域建立了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
* 1946年宣布废除君主制后，成立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 1990年11月15日，正式定名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 多年的封闭，让保加利亚被视为巴尔地区最神秘的国度
* 20世纪40年代，3名来自河北吴桥的中国男子随杂技团前来表演。后来，其中一人随波兰籍妻子回乡发展，另一人离开后不知去向，只有一人留了下来
* 来自北京、当时年仅23岁的张荪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积极投身抗战医护工作。在硝烟战火中，她邂逅了响应“国际医药援华会”的号召、前来支援中国的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
* 移民政策的限制、过高的关税加上难学的语言，纵使有钱可赚，也难以吸引更多华人到来
* 其中，青田人占了总数的80%，其次则是温州、福建、河北、上海及江苏人
* 早在20世纪50年代，保加利亚医学院就设置了针灸临床专业
* 保加利亚卫生部，也承认中医师的行医资格及中药的合法性
* 目前，中医诊疗所共有4家，中药和相关保健品，则在药店、化妆品店等地广泛销售

罗马尼亚

* 景色秀丽，雄伟的喀尔巴阡山、蓝色的多瑙河与绚丽多彩的黑海，是三大国宝
* 1989年齐奥塞斯库独裁政权被推翻后，罗马尼亚从此山河变色
* 历经了近15年的争取，罗马尼亚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欧盟
* 来自浙江文成的支德严，是最早定居在罗马尼亚的华人
* 。1990年，约有20名来自福建、浙江、河南的华人，带着装满了小商品的行李前来跑单帮
* 当时短期访问罗马尼亚并不需要签证，致使1993到1998年之间有大量的华人涌入，在高峰时期，华人共有两万名之多
* 在布加勒斯特市郊Colentina，一片尘土飞扬中，映入眼帘的尽是批发商铺和摊档
* 因“Colentina”发音与中国的高粱地相近似，华人初期干脆称它作“高梁地”
* 这里原来是一片庄稼地，在1993年被开发成拥有20多家批发摊档的欧罗巴市场。露天的摊档以土灰、砖石及水泥搭建，再用铁皮间隔而成。店面粗糙简陋、店前摆货物，店后则是仓库。华人打趣地称之为“铁皮房子”
* 批发市场上的华商以浙江青田及河南人居多
* 尼罗市场旁的唐城批发市场，则是首个由华人投资并管理的批发市场
* 罗马尼亚是第三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 目前，罗马尼亚共有18个华人社团，其中多以同乡会居多
* 罗马尼亚华人虽少，却拥有4份中文报，分别是《旅罗华人报》、《欧洲华报》、《欧洲青年报》及《企业家报》，其中以《旅罗华人报》最受欢迎
* 罗马尼亚华人成立了“旅罗华人维权中心”，由90名商家共同集资，合力将布加勒斯特政府控上法庭，并在当地中文媒体发表《告全体旅罗华胞书》

塞浦路斯

* 公元前1500年，希腊人迁入塞浦路斯，后土耳其又于1573年占领该岛，并带来大量的移民，形成希腊、土耳其两大民族并存的局面
* 塞浦路斯共和国于1960年成立时，即由这两大民族组成了联合政府
* 两大民族因为信仰等因素的分歧，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 1974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占领了37%的领土，导致希腊族南迁，土耳其族北移，形成南北对峙、国土分裂的局面
* 南、北之间有一个联合国缓冲区，通称为“绿线”（Green Line)，将首都尼科西亚一分为二，成了柏林围墙推倒后，世界上最后一个被分裂的首都
* 南塞政府于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北塞则被拒于欧盟之外
*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地区第三大岛屿，传说爱神维纳斯即诞生于此
* 20世纪40年代，华人为了逃避战乱，飘洋过海来到塞浦路斯
* 那时候的塞浦路斯仍是个荒凉的岛屿，道路破旧，设施落后，除了首都市区，其他地方连交通灯都没有
* 塞浦路斯分裂为南塞、北塞之后，华人大多生活在南塞，分散在首都尼科西亚、利马索（Limassol）、帕佛斯、拉纳卡（Larnaca）及阿亚纳巴（Agia Naba）各地
* 在岛国上生活的华人约有5000名，入籍或持有永久居留身份者有约300人，余者则以留学生为主
* 大多来自中国东北、辽宁、福建、浙江及南京，少数来自香港、台湾
* 当地华人涉足的行业，包括中餐馆、网吧、酒吧、服装批发、食品及婚纱设计等
* 首家中餐馆名为“Pagoda”，于1968年开设，老板是个娶了香港妻子的英国人
* “路不拾遣，夜不闭户。”这是华人对早期寒浦路斯众口一词的形容
* 塞浦路斯有三宝：气候、橄榄及葡萄酒
* 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冬暖夏凉，气候宜人
* 椒榄是当地特产，餐桌上无论主菜、配菜或头盘，它都被派上用场
* 习惯中餐的华人，对当地“无橄榄不欢”的口味仍无法全盘接收
* 塞浦路斯餐与希腊餐不相上下，菜色都以烤肉为主，烤得焦焦的肉类口感欠佳，所以华人还是以中餐为主食
* 婚礼通常采用希腊形式进行
* 华人婚前都先受洗成为东正教徒，之后才正式在东正教堂里举行婚礼；至于非教徒则于市长办公室内，在两名证婚人的见证下注册结婚，接着便举行简单的自助餐会宴请亲友
* 没有华人公墓，只有东正教公墓与政府公墓，早期在当地过世的华人都葬在公墓里
* 塞浦路斯是一个福利国家，国立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学费全免，还另有多所私立国际学校
* 当地第一代华人都以中文沟通，至于第二代则多为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的后裔，自小在当地接受教育，平时多以希腊语、英语交谈
* 当地没有中文报刊出版，华人都通过塞浦路斯唯一的中文门户网站——“塞岛在线”，获取当地的资讯
* 来自上海的蔡伟洲，是当地首位华人中医师
* 塞浦路斯第一位华人歌手——胡庄礼

马耳他

* 处在南欧、北非之间的地中海上，共由5个岛屿组成
* 首都瓦莱塔，位于马耳他岛的东北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 国土虽小，但素有“地中海心脏”之称，它是欧、亚、非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
* 追源溯流，至早踏上马耳他的华人，要属上个世纪70年代的华人客工，他们是由中国大陆公派至马耳他筑建码头的
* 该批华人曾对这个国家作出贡献，可惜并没有居留下来
* 第二批华人则来自香港。他们是首批正式驻留于此地的华人，担任中餐馆厨师一职
* 马耳他华人以自由移民居多，其中包括了居留移民、技术移民、或通过与当地人通婚而移民等
* 外来者必须居留此地长达19年以上，并符合种种要求才可获得公民权
* 有人笑说，倘若在马耳他岛迷了路，沿着海岸线就能走回原地
* 没有所谓的华人聚集区。华人留学生多集中在马耳他大学附近的幕思达（Msida）。
* 马耳他华人来自五湖四海，包括广东人、浙江人、陕西人、四川人、山东人及香港人等，其中以广东人最多
* 捕鱼技术却非常落后，海产业并不发达，国家主要收入来自旅游业
* 马耳他另一小岛——戈佐（Gozo），住有20几个华人，全来自四川；无论当老板或替人打工，一律从事餐饮业

葡萄牙

* 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最西端
* 号称“欧洲之角”
* 葡萄牙东及北部连接西班牙，西部和南部濒临大西洋，并且囊括大西洋亚速尔群岛（Azores）以及马德拉群岛（Madeira）
* 15世纪之际，这个蕞尔小国，竟是地理大发现的始作俑者，曾经一度是在非、亚、美洲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海上霸主
* 1986年，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也即是后来的欧盟）
* 8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移民潮的到来，来自上海、广东、山东、福建、北京等地的移民陆续迁往葡萄牙
* 目前葡萄牙华人大约有1万5000人，主要由中国大陆移民、澳门及非洲华人三个群体组成
* 中国大陆移民以浙江青田和温州人最多，占了近90%
* 主要居住在首都里斯本、波尔图以及南部的旅游城市法鲁（Faro）
* 葡萄牙华人有三业，指的是早期一枝独秀的中餐业，和近年慢慢开创出来的“三百”业和批发业。这3项行业平分天下，在葡华经济蛋糕中各占三分之一
* 大略估计，葡萄牙的华人批发商已有近1000家
* 葡中工商协会成立于1978年，是葡萄牙第一个致力于中葡经贸关系发展的工商界联合机构
* 除了葡萄牙华侨华人协会和由北部华人组成的葡萄牙华侨华人总会为主要华团外，活跃的还有葡中工商协会、葡萄牙中华工商总会等
* 全葡大约有30多个华团
* 995年2月成立的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至今大约有固定会员260人，也拥有固定的道场
* 里斯本基督教生命堂于1999年10月21日成立
* 波尔图市分别在2001年及2006年成立波尔图基督教生命堂和明德路基督教生命堂
* 第一家中文学校——里斯本中文学校，在2001年才在里斯本出现
* 创办初期的14名学生，发展到今天已有200多名学生，已成为葡萄牙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
* 1999年创刊的《葡华报》，是目前唯一本土出版的中文报纸
* 前身为半月刊《葡华通讯》
* 《葡华报》自加入欧洲联合周报的体系后，与其他报章如中国的《新民晚报》合作，有更加全面的新闻报道
* 葡新报》（由西班牙华文传媒集团出版的葡萄牙报章）、《欧华报》、《侨声报》和《华新报》等。此外，还有在中国印刷，免费在葡萄牙派送的《同心报》

西班牙

* 位处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西邻葡萄牙，东北与法国接壤，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北部相望，东濒地中海
* 境内群山巍峨，高原起伏，沿海海岸线绵延，多优良港湾
* 1492年，西班牙就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
* 曾一度是海上强国，在全球各地都有殖民地，但于1588年开始衰落，1873年爆发革命后建立西班牙共和国
* 1936年，佛朗哥（F.Franco）发动武装叛乱，西班牙内战爆发
* 1939年，共和国倾覆，佛朗哥建立了独裁政府
* 长达36年。1975年弗朗哥病逝后，西班牙才走向西方议会民主政治
* 强烈地中海风情的西班牙，被誉为世界上最令人神往的国家
* 世界三大旅游王国之一
* 早在16世纪，华人便已经踏足西班牙，他们是跟随西班牙传教士而来的佣人
* 1570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之后，与当地华人接触频密，并且展开了贸易往来
* 当年首名入籍西班牙的华人，就是来自菲律宾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部分法国和英国所招募的华工，便转到西班牙来定居
* 一些山东杂耍艺人经由俄罗斯以及东欧等国，辗转进入西班牙
* 生活费比较低，谋生也容易，致使他们最终选择了此地作为立足点
* 温州人和浙江青田人也一批又一批地踏上这块土地
* 石雕工匠，后来转行经商，穿街走巷兜售领带、首饰和青田工艺品等
* 来自湖北省的天门人也千里迢迢来到西班牙，在当地或售卖纸花，或当牙医
* 曾经担任西班牙青田同乡会会长的陈迪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名定居于西班牙的华人
* 直至1973年中国与西班牙建交之前，在西班牙定居的华人仅有大约500人
* 在西班牙过百万名外来移民中，华人是第四大移民群体
* 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其中70%来自浙江的青田、温州；其次是上海、广东、福建，另外还有一些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华人
* 多数持着居留证，分布在西班牙120多个大小城市，较集中的是首都马德里、巴塞罗那（Barcelona）和瓦伦西亚

（Valencia）等。有近万名华人已入籍西班牙，其中一半是在西班牙出生的华人

* 当地政府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整个西班牙，有超过30%的华人移民都是老板
* “埃尔切大火”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华商的营销模式和西班牙本土模式的冲突
* 原来的郊区封都（Fonto），如今已发展成巴塞罗那的华人城
* 现今，全西班牙共有90个华人社团，主要设立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其中75个由中国大陆移民创立，余者则属台湾移民的团体
* 1983年成立的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和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社团
* 是唯一获选为西班牙外国移民组织执委的华人社团，同时也是唯一享受政府每年津贴的组织。该会秉持的“两个维护”方针，即维护华侨华人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华侨华人社会安定团结，也推展到整个欧洲华人社会
* 只有逾十万名华人的西班牙华社，就拥有至少5家当地出版的中文报章
* 早的《华新报》创刊于1994年，目前每逢周三和周六发行

中国报》、《欧华报》、《侨声报》和《西华报》则属周报，此外，还有葡萄牙的《葡华报》和《同心报》等，种类繁多。有些报纸着重报导区域新闻，有些则把重心放在中国新闻

* 2002年成立的《欧华报》是唯一获“最佳移民媒体”奖的中文媒体，它在主流社会的影响也让它成为西班牙期刊协会唯一的华人会员
* 2005年出版了西班牙文报纸El-Mandarin《东方周刊》，以最直接的方式让当地社会更了解华人的动态
  + - * 法国
* 法国位于欧洲西部
* 早在18世纪之际，就产生了一批如卢骚与孟德斯鸠启蒙思想家
*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推翻了专制君主，树立了宪法议会民主共和制
* 19世纪初，拿破仑一世（1769－1821）自立为法国皇帝，率领千军万马，铁蹄横扫欧洲大陆，长驱直入莫斯科
* 法国也是现代化的强国
* 有高度发展的经济，是一个以工业为主导，农业非常发达的国家
* 重工业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造船业及钢铁业饮誉全球
* 其他工业如机械、冶金、化工、电子及纺织业，也享有盛名
* 如今的法国是戴高乐于1958年领导建立的第五共和国，其首都巴黎是享誉全球的时尚花都
* 在欧洲大陆，法国是华人最早登陆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18世纪初
* 最早到达法国的华人是福建莆田人黄嘉略
* 于1702年跟随传教士前往法国，曾任法国国王的中文翻译，并娶了法国女子为妻
* 法国语言学家合作编写了《法华字典》、《汉语语法》，还曾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共同探讨中国历史、语言、刑法和习俗
* 华人首次大规模到法国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法国与中国的北洋政府达成协议，从中国北方几个省份招募了14万劳工到法国从事战地后勤服务
* 1918年战争结束时，他们大多数死于战场，幸存者中有的历经千辛万苦返回故乡，但大约有3000人选择留在法国谋生
* 大多住在巴黎火车站附近，从事劳力工作
* 早期到法国的华人还有浙江温州，青田人，马赛港口和里昂火车站是他们的聚居地
* 70年代中叶，法国政府接纳了大约15万名印度支那的华人难民
* 来自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柬埔寨和寮国三地，使当时法国华人人数激增
* 80年代开始，以温州人和青田人为主的中国人，纷纷移民至法国
* 作为勤工俭学运动先驱的“留法学生俭学会”
* 曾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留法学生，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中国政治领袖，包括周恩来、陈毅、李富春、李立三，以及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 法国华人最大的特点是：人数众多且居住集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华人聚居在大巴黎地区，其余散居在马赛（Marseitle）、里昂（Lyon）、里尔（Lille）等大城市。差不多每40个巴黎人中，就有一个华人
* 法国华人主要有两大群体，即各占40%的印度支那华人和中国大陆新移民，其中温州人又占了中国大陆移民的70%；港澳台移民很少
* 印度支那华人由于拥有法国文化背景，熟悉法语，容易融入主流社会，他们绝大多数已入籍
* 中国大陆新移民虽受制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但仍凭着拼搏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在法国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 法国华人社会较成熟和活跃，全国共有约100多个大大小小的社团
* 除了百余家由各个机构开办的中文学习班，媒体也是丰富多彩，至少有3家中文日报以及数十种中文杂志，还有数家中文电子媒体
* 法国华人有传统的四大经济支柱，分别是皮革业、餐饮业、服装业和杂货业
* 皮革业起步较早，基本上是温州人的天下
* 1951年，华人最早的皮革批发店“庙街之星批发店”在巴黎开张
* 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就曾说过，由华人林东岩在1986年创办的“牛车水饮食中心”，是他最爱的中餐馆
* 巴黎的服装业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拥有“服装王国”之称
* 法国的中餐已经融入了很多当地元素。譬如，菜式虽以中餐为主，但味道却更像当地的西餐，更加入了饭前喝开胃酒、用餐饮葡萄酒和餐后吃甜点或喝咖啡的法国餐“程序”
* 目前，华人在法国经营的杂货店，已有1000家左右
* 华人聚集区的杂货业，通常经营亚洲蔬菜、水果、罐头食品、干粮、肉类冷冻食品及日常消费的轻工产品等
* 非华人区则以供应西式食品为主，兼卖亚洲熟食
* 巴黎第一家专营亚洲产品的超级市场——陈氏百货商场和郑辉创办的巴黎士多商场，主营亚洲食品，货品应有尽有，已成为法国社会家喻户晓的品牌
* 法国人喜欢用3个谐音字 Métro、Boulot、Dodo 俗语来形容自己一天单调劳碌的生活，意思是搭车、工作和睡
* 1981年，法籍华人成之凡曾宣布竞选法国总统。她是法国，也是欧洲第一位竞选总统的华人
* 1995年成之凡又两度参加法国总统竞选，引起全球华人极大关注
* 2001年的法国市政选举，出现了两位华人副市长，而且都在塞纳马恩省
* 中国留学生何英被选为碧西市副市长；从寮国移民到法国的颜如玉，则当选艾斯玻利市副市长
* 来自柬埔寨的陈文雄当选为巴黎市13区的副区长，主管经济发展事务
* 法国华人更于2004年，把春节大游行破天荒地移师到巴黎最著名的香榭丽舍（Avenue des Champs Elysees）大街上
* 这是巴黎市政府第一次允许外籍侨民在“法国第一大道”举办节庆大游行活动
* 全法国共有60万名佛教徒，其中大部分是华人
* 巴黎已成为欧洲华文媒体的“心脏”。全欧最大的两份华文日报《欧洲时报》（1983年）和《欧洲日报》（1982年）均创刊于此
* 法国的中文媒体一方面争取与当地主流媒体合作，如《欧洲时报》和法国《巴黎竞赛周刊》联手出版法语版的《中国特刊》，同时又加强与中国大陆媒体的互动，如《欧洲时报》和中国上海《新民晚报》共同打道的《欧洲联合周报》，更开拓了华文媒体广阔的发展空间
* 当地除了能收看到香港的凤凰卫视台外，由当地华商所创立的陈氏传媒公司，还在2006年把中国中央四台带到了法国，再从法国辐射到周边国家，大大丰富了欧洲华人的娱乐资讯生活
* 1907年李石曾创办的《新世纪》，可能是法国最早的华文刊物
* 而在法国留学期间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曾于1922年编辑过一本名为《少年》的月刊，后改名为《赤光》
* 法国的华人团体大大小小近百个，主要集中在巴黎
* 成立于1949年的旅法华侨工商互助会（现改名为法国华侨华人会），是法国最早成立的华人团体，也是最有凝聚力的华人之家
* 987年10月，一本名为《黄色黑手党在法国》（La Mafia Jaune en France）的法文小说出版。书中把华人描写成走私贩毒和杀人不眨眼的黑帮，唐人街更是藏污纳垢、神秘危险的街区。为维护华人的尊严和形象，法国潮州会馆与陈氏公司联名把该小说作者控上法庭，最后获得胜诉，法院裁定将该书全部收回，不许出售。此事在华人社群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也直接促成了华人融入法国促进会的成立，积极维护华人权益和协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 巴黎13区、3区和4区唐人街，后来崛起的有19区、11区以及中国城，被认为是全欧洲最大的华埠
* 但这里所说的“唐人街”，其地位并没有受当地政府承认
* 13区的华人主要来自东南亚，街区具有浓厚的东南亚特色
* 13区唐人街被誉为塞纳河畔的香港
* 3区、4区则是温州人和青田人的天下，其他省籍华人难以插足
* 9区美丽城则是13区饱和后形成的又一个唐人街，也是东南亚华人和温州、青田华人混合居住的街区
* 巴黎东南面的安富市有个于1992年建成的中国（商业）城，面积4万2000平方公尺
* 卢森堡是欧洲内陆小国，四周与德国、比利时和法国相接壤
* 是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国，200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全球首位
* 钢铁业、金融业和卫星通讯广播电视业是其三大经济支柱
* 公元前50年，这里曾是高卢人居住的地方；公元400年，日耳曼部族入侵；后经历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和荷兰的统治，直到1890年才彻底脱离荷兰的统治
* 有着“千堡之国”的称号
* 居民一般会讲4种语言，除了卢森堡语，还能说法语、德语和英语；不少人还懂得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
* 在清末年间，就已有中国移民到达卢森堡，但人数不多
* 第一个来到卢森堡的华人，有说是瑞士籍的香港人，也有人说是英国籍的沈阳人
* 20世纪50年代，有许多香港华人来到卢森堡。60年代则是比利时籍华人到来的巅峰期
* 中国广东籍、浙江籍华人逐渐移入，使卢森堡华人的地域结构更加广泛
* 面积小人口少，市场也相对地小，加上生活消费颇高，因此移居该国的华人并不多，且流动性极大
* 1975年至1984年间，卢森堡收容了一批以华裔为主的印度支那难民
* 卢森堡华人约有2500人，散居在各地，首都卢森堡市是主要聚居地
* 人数不多，华人大都互相认识，但因分散在各个角落，平时各自忙于生计，彼此少有联系，偶尔通过社团或宗教活动才会聚在一起
* 当地华人以青田人最多
* 1979年，詹冠令成为首名登陆卢森堡的青田人；至今，已有1000多名青田人移居此地
* 部分人是来自温州、上海、北京、昆明等地。台湾人则不多，除了台湾投资厂商驻卢森堡人员及家属外，其余多分散在境内各地经营餐厅；另外，据说还有大约30名台湾女子远嫁到卢森堡来
* 卢森堡是个生活节奏缓慢而平静的国家。在许多新移民的眼中，它显得暮气沉沉，单调乏味
* 有超过90%的华人在餐饮领域打拼
* 华人在全国各地开设餐馆，大多以中餐为主，也有一部分经营东南亚餐、日本餐和韩国餐等
* 源自台湾佛教团体的法鼓山，在卢森堡华人家中设有联络处，免费派送台湾出版的《法鼓》月刊
* 卢森堡并没有本土的中文报，但是，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发行全欧洲的《欧洲时报》以及《欧洲日报》
* 也有华人以邮购的方式长期订阅荷兰、比利时等地的中文报章
* 2007年9月创刊的《海潮——侨界通讯》，则是卢森堡—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协会所出版的刊物，也是当地华人的第一本刊物
  + - * 比利时
* 与法国、卢森堡、荷兰和德国为邻
* 球铁路密度最高，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部高速公路设置路灯的国家
* 首都布鲁塞尔除了是北约和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同时也驻有近1000个重要国际机构
* 欧洲第二大港口的安特卫普市（Antwerp）是世界最大的钻石加工地，因此享有“钻石之都”的美称
* 历史上，它曾先后沦为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和荷兰的殖民地，1830年才脱离荷兰独立
* 是一个南北两半各有自治权的联邦国家，南部法语社区由瓦隆行政区管理，北部荷语社区由佛兰德行政区掌管，东部边疆地区居民以讲德语为主，首都区则三语共存
* 因地理位置的优越，早在19世纪，就有华人海员及商人抵达比利时，因此，比利时可算是西欧国家当中，中国人较早涉足的国家之一
* 清朝末年，比利时已有中国留学生。根据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卷十中记载，他访问布鲁塞尔时，曾代表清王朝向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致谢，感谢他对中国留学生的优待
* 20世纪初，许多华人陆续到欧洲各大港口当海员，这当然包括欧洲第二大港口安特卫普
*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卷十中记载，他访问布鲁塞尔时，曾代表清王朝向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致谢，感谢他对中国留学生的优待
* 第一代来此开餐馆的华人大多数是广东籍，因此中餐以广式菜肴为主
* 老移民说：“我们都称这种卖广东菜的餐馆叫‘集粹’，也就是‘杂菜’的广东话发音
* 蒋华是中国近代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第四名女儿，曾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并于1951年旅居比利时
* 华人聚集最多是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
* 华人在比利时属于中产阶级，但在税收方面却贡献良多，因为一般华人都自己开业做生意，每单交易抽税至少21%
* 安特卫普的唐人街——冯·维森贝克街（Van Wesenbekestraat），在安特卫普官方网站的“购物指南”一栏被推荐为值得一游的地方
* 1973年成立的联合会，是比利时最早的全国性华人社团组织
* 比利时是个多语言的国家，但由于华人是少数民族，中文很难在当地受重视，更别说被列入主流教育的教学中
* 创办于1965年的旅比华侨中山学校，是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学校
* 学校拥有自己的校舍，是由台湾代表处拨款一半，并由华侨餐业公会和台湾乡亲会合力购买的校址，一共开办16班教导约300名学生。虽说是间台湾办的学校，学生群中却有80%来自中国大陆，学习的是注音繁体字
* 广东人较多的安特卫普市，最早的中文学习班是由华人教会在80年代开办的，通过广东话来解说圣经故事和背经句等，也传授中华传统的思想和价值观
* 二战时，钱秀玲不顾个人安危，竭力劝说德国将领肯豪森免除近百名比利时人质的死刑，她因此成了比利时人心中的英雄，被誉为中国的“女辛德勒”
* 战争结束后，比利时政府在1945年颁发国家英雄奖章给她。当地的小镇艾克兴市更是特别将一条街道命名为钱夫人街
* 欧洲西部濒临北海的荷兰，是千百年来与海争地的低洼之国
* 荷兰国名“Nether”指的是“低的”，“lands”则意为“土地”
* 说它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一点也不夸张——它有一半以上的国土低于海面或海拔不到一公尺。而这些环海的陆地上，却住着六成国民
* 自1229年，荷兰境内耸立着逾万座由荷兰人发明用来抽水和提供动力的风车，使它赢得了“风车王国”的美誉
* 是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
* 仅5%的国民从事农业，其鲜花、蔬菜、奶酪和土豆种子的出口量却居世界第一
* 仅5%的国民从事农业，其鲜花、蔬菜、奶酪和土豆种子的出口量却居世界第一
* 这个国家不屈服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反屡创奇迹，曾以200万人口的国力建立起海上贸易和殖民强国
* 今天的荷兰，是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
* 不大的荷兰华社，仍孕育出超过250个华团组织
* 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旅荷华侨总会，其前身是1947年由浙江青田、温州人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的瓯海同乡会，现在则是在全国都有分会和中文学校的核心组织
* 最早的中文学习班可追溯到1919年，拓荒者是当年中华会的主要成员。华人移民骤增后，欧洲福音布道会也在1973年开设中文班，两年后购买会所，创办全荷兰第一所中文学校。后来许多社团也把推动中文教育视为己任，纷纷设立中文学校
* 早期华人多数是广东籍，中文教育全以粤语授课。近年来，以华语为教学语言的中文学校纷纷开办后，许多老学校也逐步缩小粤语班规模，或完全改以华语教学
* 除了语文，大部分的中文学校还设有其他课程，例如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为500多名学生开办了21个各类文化学习班。该中心还创立了荷兰丹华奖学基金会，及中文教育专刊《桃李园》
* 荷兰华人申请了中央政府补助，推展《中文教育发展计划》，自行研究和编写教材
* 荷兰第一份中文刊物是旅荷华侨总会在1977年创刊的《华侨通讯》，成为华人了解居住地和祖籍国的窗口
* 移民持续增加，促使中文媒体蓬勃发展，除了90年代出版的《唐人街中国人》、《华侨新天地》，还有2003年出版的《中荷商报》等，每份报章的发行量可达3万份
* 荷兰第二代年轻华人组成的“城市之声”电台
* 阿姆斯特丹唐人街里还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佛寺——荷华寺，是由政府献地，华人捐助建成
* 荷兰华人社会非常关注老人问题，他们一直秉持着“少有所教，老有所养”的精神，努力为年老华人打造一个安乐环境
* 每年9月，许多华团还会举办全国“敬老日”
  + - * + 英国
* 英国地处欧洲大西洋不列颠群岛上，主要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组成
* 殖民地曾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足足占了整个地球20%的面积
* 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 沈福宗是第一个抵达英国的中国人
* 1687年，他随着一名叫着菲利普·科普列特（Philip Couplet）的神父到了牛津博德利图书馆（Oxford's Bodleian Library）编中文图书目录
* 从18世纪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亚一带大肆扩张，他们雇华人为海员，把华人带到英国去
* 840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政府
* 华人是继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之后英国最大的亚裔群体，超过25万华人拥有英国公民身份，主要集中在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Manchester）等地，其中，伦敦的华人数量最多，居住地也最集中
* 英国的华人，估计约有40万
* 散布在英伦各岛的华人，英格兰约有33万人，苏格兰约5万人，威尔士约5000人，北爱尔约1万5000人，主要聚居的城市包括伦教、利物浦、伯明翰、格拉斯哥（Glasgow）、爱丁堡（Edinburgh）、曼彻斯特、卡迪夫（Cardiff）等
* 有70%的华人来自中国香港。其他的则来自台湾、中国大陆、东南亚及世界各地
* 英国目前约有200多个华人社团
* 早期的华人社团像利物浦致公堂、四邑总会馆和伦敦正义工商会、伦敦互助工团等已有近百年历史了
* 解放》、《民主阵线》、《诗语》、《华人商业影响》、《亚欧评论》等中文报刊，都见证了英国华人社会每个阶段的发展历史
* 1975年，欧洲版的《星岛日报》在英国诞生
* 每个周末，《星岛日报》也会附上刊载亚洲讯息的杂志《东周刊》，以丰富当地华人的生活。每日发行至少14万份的《星岛日报》，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覆盖了整个英国的华人社会
* 英国，中文报刊至少超过十份。除了《星岛日报》需要付款购买外，其余的中文报刊，像《欧洲时报》、《文汇报》、《英中时报》、《英中商报》、《华商报》和《新欧侨报》等一律免费
* 国的中文电视台主要有3家。其中，欧洲东方中文卫星电视台是香港徐展堂东方卫星电视在欧洲的分支机构，总部设在伦敦，有普通话和粤语节目，以中国内地节目为主，每日播出4个小时。欧洲无线卫星电视则以港台节目为主，每日播出16个小时。另一家传讯电视，则是香港传讯电视在欧洲的子公司
* 华语广播电台有4家，全国性和地方性各两家
* 英国官方所办的英国国际广播公司中文部，每日有一个小时全国性的华语节目播出，华人所办的伦敦国际电台中文部，每日也播出一个小时粤语节目
* 成世雄来自香港新界，是英国少数参政的华人之一
* 英国伊斯特本市（Eastbourne）市议员，也是所在选区的郡、区和地方议员，是英国第一位同时拥有4项议员头街的华人
* 伊斯特本是英格兰东南部东萨塞克斯郡（East Sussex）最大的自治市镇，大约有十万居民
  + - * + 爱尔兰
* 西临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与英国相望，山明水秀，风光旖旎
* 爱尔兰人曾在英国的占领下，度过了700多年灰暗的日子，到1921年才获得自治权，但北部6郡一直在英国管辖下
* 1973年爱尔兰加入欧洲共同体后，经济开始突飞猛进。以前的农业小国，摇身变成欧洲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年人民平均收入甚至超过英国
* 华人移民爱尔兰的历史很短
* 在20世纪50年代，移居到这里的华人只有十来位
* 早期的华人，大多数是从英国或香港辗转而至，另外，还有少量来自越南、马来西亚和台湾，总数估计也不超过一万人
* 他们大部分都集中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那里不但气候温和，而且到处均是绿油油的草地及盛开的鲜花
* 爱尔兰十方华人大多聚居在都柏林，其余散居在科克（Cork），高威（Galway）及其他大小城镇
* 早期爱尔兰的中文学校均以粤语授课
* 爱尔兰的中文学校不多，估计不超过十所，且大部分集中在都柏林
* 爱尔兰有11个华人社团。它们多属地缘和业缘的组织，有成立最早的爱尔兰华人协会、爱尔兰越南华人协会，以及近期才诞生的华人专业人士协会、福建同乡会和福清同乡会等
* “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每一个爱尔兰华人的心里
* 爱尔兰主要有3家中文报刊，分别是《新岛周报》、《华人报》和《海外新报》。
* 《新岛周报》与《华人报》的读者较多
* 3家中文报的负责人都年轻有冲劲、想法新颖。它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包括中国内地及爱尔兰本地的媒体，像中国新闻社、新华社、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Irish Time、Daily Star、Herald等。此外，它们也与欧美17家中文媒体透过互联网建立伙伴关系
* 来自大连的王瑞新，在爱尔兰居住了7年，早先在中国做现场直播的主持人，说是因为酷爱爱尔兰音乐和歌手恩雅，才被吸引来到了这个国度
* 在爱尔兰成立了一间文化传播公司（Chinatown Promotion Service），负责制作和筹划有关华人节庆或文化的节目
* 芬兰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边，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在北极圈内
* 内遍布大大小小的湖泊，有“千湖之国”的美誉，景色秀丽。广袤静谧的树林，湖滨小木屋，是芬兰最常见的景象
* 夏季的光照时间长达20个小时，又被称为“太阳不落之国”
* 芬兰人笃信“认清事实是智慧的开端”
* 政府在教育和科技研发方面，不惜投下大笔经费。享誉全球的手机品牌诺基亚、Linux操作系统，都是芬兰人智慧的结晶
* 在2003至2005年，连续3年名列全球竞争力之首
* 上世纪的60年代，芬兰仍然属于欧洲的少数穷国之一
* 第一个定居于芬兰的华人是陈安萍，她是因为在1953年嫁给了一个芬兰人而来到了这里
* 大部分华人居住在首都赫尔辛基及坦佩雷（Tampere）、爱斯堡（Espoo）、万塔（Vantaa）等几个首都周边的城市
* 大约4000名分别来自香港、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的华人来说，芬兰虽不是当初的首选，可是这个小国却给他们带来安定的生活，让他们内心充满安全感
* 1992年，作为芬兰的第一个华人组织，华人华侨协会正式成立

瑞典

* 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
* 19世纪初期还统治过芬兰及挪威
* 1814年起，它一直谋求中立，近200年来不曾卷入任何一场战争
* 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大音乐输出国
* 瑞典产品以其实用、简约的风格闻名于世，宜家、爱立信、沃尔沃等均是风靡全球的瑞典品牌
* 瑞典成了北欧最多华人聚居的国家
* 第一个踏上瑞典这片国土的华人，是一个名字叫作阿福的广东人，他是在1786年以海员的身份登陆的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数名浙江青田人来到瑞典
* 住了半年以上，就能和瑞典人享有同等的福利，满5年就可申请入籍
* 国民一年享有5个星期的年假、55天的病假，瑞典人认为，不能为工作卖命或牺牲掉生活
* 尊重女权
* 比较活跃的有3个社团，分别是香港人居多的瑞京华人协会，凝聚青田人的青田同乡会及越南华人创办的潮州同乡会
* 瑞典目前有一万名越南华人，其中大多是在1979年以难民身份迁移过来。南部城市马尔默（Malmo)是最多越华居住的城市，但他们散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越华的第二大聚集地是忆基斯都娜（Eskilstuna)
* 在忆基斯都娜这个距斯德哥尔摩一小时车程的城市，住了大约1000名越华，其中近六成为潮州人
* 成立了潮州同乡会和耆青联谊会，凝聚当地的老人和青年
* 号称“西北欧的桥梁”，位于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由西兰岛（Zealand）、菲英岛（Funen）和日德兰半岛（Jutland）及406个小岛组成
* 具有北欧国家的典型特色——经济发达、高福利、高收入、高税收、高消费，虽是北欧最小的国家，但其首都哥本哈根却是北欧最大、也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 丹麦王国曾经非常强大，统治过挪威、英格兰、苏格兰大部分以及瑞典南部
* 世界主要的农国之一
* 成为世上人民最快乐的国家
* 最早把华人带到丹麦这个童话国度的是杂技团
* 1902年的夏天，有34名华人来到趣伏礼公园（Tivoli Garden），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华人村”展览，成员多为香港及广东人
* 早期的华人移民当中，有大半是香港、广东以及海南文昌县的海员，还有来自浙江青田的小商贩
* 1970年，已有为数500名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华人留居丹麦
* 一群越南华人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之间，陆续以难民的身份进入丹麦
* 丹麦约有1万5000名华人，其中半数左右已入籍
* 来自福建、浙江及广东的华人，占了一半以上，其余则是越南、香港、台湾及新加坡华人
* 大部分都居住在哥本哈根、奥胡斯（Aarhus）、奥登赛（Oderse）、奥尔堡（Aalberg）等大城市
* 丹麦华社虽不大，却有20多个华人组织
* 以中式烧烤店（Kina Grill）起家
* 第一家中式烧烤店是由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海南人所创
* 丹麦的中餐馆基本已发展出烧烤店、外卖店和餐馆3种类型，全国共有约300家，单在哥本哈根就有258家
* 只要3个人就能注册成为一个团体

挪威

* 多年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 界第三大石油出产国外，挪威农、渔、牧业，也非常发达，大批出口的三文鱼，更是享誉全球。2007年，人均收入还名列世界第一
* 中国青田人陈特浩，是第一个闯荡挪威的华人
* 先后在法国、意大利和丹麦逗留过，再辗转来到挪威，决定留下来发展
* 挪威目前约有一万名华人，大多来自中国的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地，有些来自越南
* 华人主要集中在首都奥斯陆，其次是卑尔根（Bergen）、斯塔万格（Stavanger）等大城市
* 拥有自己的中文刊物《北欧华人通讯》，还有华人社团及宗教组织等，这些都是华人保持联系的媒介
* 挪威华社现共有14个组织，社团间互通有无，往来频密

冰岛

* 由火山聚成的
* 2000多万年前北大西洋深处的一次岩浆喷发，铸就了孤悬海外的冰岛
* 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痕”的雅号
* 又被称为“冰火岛
* 3/4是高原，1/8被冰川覆盖，冰川面积约8000平方公里
* 地下蕴藏着丰富的地热资源，温泉数量居全世界之冠
* 境内共有火山二三百座，其中有许多是活火山
* 邻近北极圈
*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整座冰岛的华人也不足5名
* 冰岛的渔业相当丰富，在渔场谋职自然就成了早期冰岛华人最主要的行业
* 冰岛总人口约32万，限于地理条件，人口密集度非常高，首都雷克雅未克就集中了全岛60%的人口
* 约800名华人，同样也主要居住在雷克雅未克及其近郊
* 华人多来自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身份大部分是老板，也有的是体育教练、研究人员，还有留学生和家庭主妇等
* 2007年，在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上，冰岛更取代了挪威成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位居世界首位
* 冰岛唯一的华人杂志《冰花》
* 有人说，极夜的漫长让书籍成为冰岛人最好的伴侣，有人说，绮丽的山川让他们充满想象力，也有人说，冰岛人继承了祖先的浪漫与思考，《尼雅尔萨迦》传奇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荡气回肠的《埃达》史诗更被誉为文学奇葩。